我所经历的新中国

作者： 铁流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一）

作者： 铁流
来源： 看中国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纪实性作品，通过作者一生命运的升降沉浮、贫富荣衰，展示了共和国一幅凝重的历史画卷，而这些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故事，又莫不和 时代的变迁连在一起。此书分五部：第一部《天翻地覆》；第二部《风波万里》；第三部《黑牢岁月》；第四部《冰山崩溃》；第五部《搏击商海》。全书共一百万 字，以纪人纪事为主。书中人物均为真名，没有作任何回避，力求事件与细节的真实，同时也不回避自已人性上丑与恶的东西。本着对历史负责，让历史再现。

第一部《天翻地覆》

40 年代的成都

新一章四九年前的成都

成都是座千年古城，历史悠久，名胜众多，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成都是座如诗如画的城市，风景优美，绿树碧 草，繁花似锦；千畦菜花，万顷稻海，纵是农家小院也是一幅幅充满川西田园情调的油画；成都又是座悠闲的城市，一街茶馆，遍地小食，玩牌品茗，醉不思归；谁 不爱我故乡成都？

一、历史名城的来源与轶闻趣事

成都位于川西北高原山地和川中丘陵之间，西部地势较高，中部和东南部 是广阔的平原，平均海拔 500 米左右。境内兼有山景、平原和丘陵之美，且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年平均气温摄氏 16 度上下，降水量约 1000 毫米，素有冬无 严寒，夏无酷暑之誉，加以土地肥沃，水利先进，物产十分富饶，历来被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明珠”。

成都早在一万多年前就已成为蜀族先民活动的中心和舞台。在市区和广汉三星堆的出土文物表明，至少在四千年以前，古蜀先民就用自己辛勤劳动的双手，在这里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古蜀文明。

大约 2500 年前，古蜀国开明王朝把国都从樊乡(今彭州市、新都县交界处)迁到此处，取周文王迁岐“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一典故定名成都。这时的成都已经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城市。

西汉时期，成都因经济繁荣成为当时中国的"五都"之一，织锦业已成为汉朝的重要国库收入来源。成都是蜀锦织造的中心，朝廷在此设置了“锦官城”，派有“锦官”进行管理。所以成都又称为锦城，绕城而过的府南河又称为锦江。

蜀 汉时期，诸葛亮在四川实行休养生息，扶持农商的经济政策，成都作为蜀汉首都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从晋代左思《蜀都赋》的叙述可见当时盛况。他说“市廛所会， 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万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好一幅百货云集，万头攒动的市场交易图。唐代，成都有“扬一益二”之誉，说她的繁华仅次于江南的 扬州。

到北宋时期，成都已成为仅次于汴京的大都会。这时的成都，由于在晚唐五代的纷争中处于相对安定的情况下，工农商业都有所发展，商 市贸易突破了传统的坊市格局，发展了专门的交易市场，不仅有城内东南西北的综合市场，也有了专营的市场，如草市、糠市、盐市、骡马市等，闹市区还有了“夜 市”。此后的成都历经元、明、清诸朝和民国时期，其间虽有多次的兴衰起落，但她作为四川省经济中心的地位并无变化。

成都龙纹蜀锦

成都也是历史上着名的工艺之乡。蜀绣、蜀锦名满天下，列入中华四大名绣、四大名锦之列。成都的漆器以制作精美、工艺独特，为历代传世名品，近代汉墓 出土的文物中许多成都漆器可以作证。唐代成都出产的“雷琴”，载誉全国，被声乐界视同珍宝。成都的印刷业在宋代是全国三大印刷业基地之一，有“宋时蜀刻甲 天下”的赞誉，伦敦博物馆所藏敦煌文书中有五代时期成都的木刻历书，为世界最早的木刻历书印本。成都的造纸业也很着名，唐代成都造的益州麻纸是官方规定的 诏书、册令用纸。女诗人薛涛制作的“薛涛笺”被文人诗客视为上品。成都的金银丝制品、竹编、草编、也都有数百上千年的历史。

成都是灿烂 的蜀汉文化发祥地之一，也是四川文化教育的中心城市，拥有辉煌的文明历史。早在西元前 140 多年，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兴学，开办了中国第一所正规的官办学 堂，为四川的文化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汉赋四大家成都市有司马相如、扬雄两位，晋代史学家《华阳国志》作者常璩、唐代女诗人薛涛、音乐家段安节、五代 词人欧阳炯、绘画大师黄筌、宋代学者《资治通鉴》副主编范祖禹、理学家魏了翁、医学家唐慎微、明代文学家杨升庵、清代着名的儒将岳钟祺，加上现代文学巨子 巴金、艾芜、李劼人等人都是成都人士。当然，造就成都文明史的还有历史上众多的外来名臣、文士的巨大贡献，成都是历史上文化名流汇集之地。大诗人李白、杜 甫、岑参、高适、韦庄、陆游、大文豪苏轼等人都曾寓居这里，为后人留下了大批的文化遗产，使成都的发达文化享誉国内外。

1949 年前的 成都市人口约六十余万，面积穿城九里三，围城四十八，有五十二条正街七十二条小巷，全圈在高十米宽五米高大的城墙里面。城墙有东、西、南、北四个门洞，门 洞为进出双开。抗战爆发后日本飞机常来轰炸，为便利疏散民众，国民政府开设了一些新门洞，也拆除一些旧门洞。

黄包车--“洋马儿”

城里交通工具主要是黄包车（上海叫人力车）和少许自行车（成都人叫“洋马儿”），轿车不过十余辆，私家车除了裕华纱厂大老板黄渔门有一辆，其他皆是大军阀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田颂尧、王瓒绪等所有。有钱的商贾老爷、太太、小姐都是私包车。何谓私包车？第一，它是专用不载客，此车与街上黄包车外型 一样，但它比黄包车漂亮，车身外壳是黑亮亮的油漆油过，车把是闪光的铜杠，车軲辘是汽胶圈，车轴承钢丝一根比一根亮，旋转起来像个银球在地上滚动，车座的 踏板上按有脚踩的铜铃，一遇人多的地方或行经闹市，坐车的主人便踩响铜铃，一是叫让路，二是显示高贵身份。拉车的人多是彪形大汉，跑得特别快，并兼保镖任 务。

全市照明是椒子街启明电灯公司垄断，装机容量不大，是个烧煤的火力电厂，故发出来的电力不足，电灯一眨一眨的像油灯。抗日战争胜利 后，有人出资开办公共汽车公司，大街上曾看见两三辆烧木炭的公共汽车，没有跑上半月就熄火了，一是票价贵，二是地痞流氓坐车不给钱，三是不久内战爆发，人 心思变，终未如愿。

在文化艺术方面也颇有独到之处，报纸刊物有十多家。报纸有《中央日报》、《新新新闻》、《东方日报》、《华西日报》 、《工商导报》、《新民晚报》、《鬼半月谈》等，除“中央”、“新新”是国民党的官办报纸外，其他皆为民办。言论自由不遭禁止，只要你有钱有本事就可开报 馆。报刊也有检查制度，如果有些文章经检查不能刊登，报馆可开“天窗”以示抗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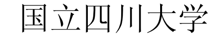
电影院、戏院集中在闹市区春熙路、总府街一带，最有名的是春熙东路的春熙大

舞台，专演京剧，星期日两场，平日只演晚场。名角有刘荣升、攸虎成等；川戏院有两家，一家是华新街的悦来戏院，，一家是春熙北路的三益公戏院，名角有贾培之、蔡如雷、竞华、陈书舫等。

电 影院较有名的是新明、智育、蜀一、青年等四家。新明在城守街，专演美国大片，《泰山之子》、《出水芙蓉》、《魂断蓝桥》就在这里推出的，一时万人空巷热闹 了好几个星期；智育、蜀一在总府街，演的多是国产片；青年电影院在春熙路青年会馆里面，他是教会办的，票价特低，有时还不要钱。

城里还 有十多座教堂，最大的教堂是平安桥街的平安教堂，它附设有育婴堂，专收被人遗弃的孩子。在教堂门外设有两个大木箱，谁家孩子生下来无力抚养，就抱去丢在木 箱里，修女便抱回教堂一直从小养到大，包括教孩子识字、读书、学本事，到成家立业。应该说这是一件善举，不知怎么在中共当政后却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 桩罪恶。

暑袜街那个教堂也不小，每周做弥撒，小时姐姐带我去过两次，只要我在耶稣像前行个礼，牧师就给糖给书。书是洋纸印的，上面有许多彩色图画，很好看。


国立四川大学

公园有两处，一处叫少城公园，一处叫中山公园。少城公园西边，有条小河圈着它，有个荷花池和一座假山。还有图书馆、博物馆。博物馆里放着许多铁炮、 铁人，说是从坟里挖出的。除此还有个动物园喂得有野猪、野马、豹子、老虎和孔雀、白鹤，后来跑警报人人顾命，谁还管动物，就再没看见了。公园四面街道大多 住的是满人，故有不少黑漆门洞的公馆，北京叫四合院。大学著名的有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光华大学；中学有名的是石室、树德、华阳、成都、高琦、华英等。

另 外，四城都有城隍庙，最大最好的是北门城隍庙，那十殿塑有“下油锅”、“上刀山”、“奈河桥”、“望乡台”、“王婆婆卖迷魂汤”、“雷打张继保”等，栩栩 如生，活灵活现，有警世的作用，故香火旺盛，敬香上油的人不少。东门城隍庙很大，塑有阎王爷却无十殿。因它地处干道，多年来就成为城里最大的米市。

买 米卖米不论斤两，以斗、升、合为计量单位：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一斗相当于十六进位的三十二斤市。米市有专打斗的经济人，不论谁买谁卖，都由他打斗， 近似今日市场上的公平秤。不过那倒米却要技术，据说会倒米的他端起簸箕，可以把米倒得来一颗一颗地立在斗内，这样一斗米可少到半斤到一斤。

最大的寺院是文殊院和昭觉寺，都是上百上千年的古庙，柏树森森，蔽日遮天，早晚一片鸦声，从没有人去打它和爬上树取蛋，这样做会遭菩萨谴责和其他人的反对。

成都人自来喜欢吃，喜欢玩，喜欢吹牛，喜欢打小牌，纵然下顿没米下锅也悠闲自得。所以遍街是餐馆、茶馆、小吃店，每个十字街口早晚有汤圆担担、涝糟担担、腌卤摊摊。夜里打牌打饿了，还有专门敲竹梆的担担面，供赌客吃喝。



成都茶馆

成都茶馆素有高低贵贱之分，但茶房布局基本一样，竹圈椅，小方木桌，有茶船的茶碗（俗称盖碗茶），吃的茶多是花茶，质低的一毛（折合现市价约一元人 民币），高的五毛，掺茶的服务员称堂倌或叫幺师。有些茶馆还设有打帕子、送水烟袋的人，顾客只需一叫："拿张帕子来！"打帕子的服务员站在很远地方，手往 上一抛，那热呼呼的毛巾像只白鹤凌空飞到茶客手中。需要吸水烟，叫声"拿烟来"，一根长长的水烟袋管便送到你嘴中，只需你咕噜咕噜吸就行了，自有人为你装 烟燃火。如你想掏耳、捶背、修脚，动动嘴就能达到目的。

茶馆不卖吃食，有来去穿梭卖瓜子、香烟、糖果、白糕、油炸饼之类东西的小贩，包你饿不着肚子。茶馆是个花花绿绿的小世界，吃的、喝的、看的，应有尽有。只需花上几毛钱泡碗茶，便可悠哉游哉可消磨一天。

坐 茶馆的好处是既可以交流资讯，又能结识朋友，还可做成一笔笔生意，并可以发泄发泄肚里不满，骂骂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或臭臭军阀与有势有钱的人，

没人举报，更不存在抓捕危险，只要你想骂就放开喉咙骂，这叫“吹牛皮不犯罪”，正如思想旅行不需花钱一样，故茶馆生意火红，经年不衰，成了成都人最好的消闲娱乐场所。

值得一提的成都还有一景，就是东南门城墙边的游民练习所。所谓游民就是扒手小偷或不学好的烟鬼赌棍，犯了事不够判刑，便由警察局看管起来，教他们做些工艺和轻微劳动，诸如扫街、运送拉圾等。为防止他们逃跑，每人脚上都套有一条铁链，故走起路来叮当叮当响个不停，大家呼之为“嗯哥” （即鹦鹉）。只要他们一出来扫街，不少人便给钱、给烟、给吃食，以示怜恤同情。

在背街处有种小食摊，专卖一种经济实惠的牙牙饭（又称挨刀饭），这饭专供拉车和下苦力的人吃。何谓“牙牙饭”？就是一锅煮两三斤米的饭，煮好后用刀切成一牙一牙的等量，购买者看着自选，童叟无欺，明码实价。我没有去吃过，因吃不完一牙，有点望而生畏。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二）

二、难以忘却的童年记忆

我家是个穷家小户乡下人，三十年代后期才迁来成都居住。原是新繁县崇义桥乡高家巷村人，那里距成都二十华里。去成都叫“上省”，庄稼户很少去，大不了逢年过节带点时鲜去看主人，续接来年佃租关系。平常买点卖点什么的，顶多去赶赶附近的乡场。我们近处有三个乡场，崇义桥逢二五八，距家五华里；天回镇逢三六九，距家九华里；两路口逢一四七，距家十二华里。故大半赶场都去崇义桥，少有去天回镇，更难得去两路口。

赶场天一街是人，叫卖叫买，乱哄哄闹喳喳，人挤人肩擦肩，煞是热闹。乡下人卖的多是鸡鸭蛋，差急钱时才去卖点粮食；买回的东西多半是油盐酱醋，花布洋布之类。女人们多半是将平时织的网篼，每半月拿去找庄头（又称贩子）换点钱，以做零用。

翻开《黄氏江夏宗谱》，才知道我们是“湖广填四川”一族，又称客家人，客家人的话叫“广东话”（俗称土广东），但这个广东话不是粤语，广东人听不懂，当地人也听不懂，故只能在客家人里面说。比如爸爸叫“阿爷”，妹妹叫“幺姑”，飞机叫“飞该”，吃饭叫“卡饭”，我学了半辈子也学不会。

在我们家宗谱上有这样一首诗：“骏马登程出异乡，任从随地立纲常，年深外境皆吾境，身故他乡即故乡，世代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荐宗祖香，伏望苍天垂保佑，三七男儿聪职昌。”这里要说明的是“三七男儿”是指在南宋年间，我们宗祖震兴，官拜尚书，娶官氏、吴氏、郑氏三妻，生二十一子，我们是郑氏一支

宗脉。

按宗谱排列，我爷是华字辈，父是奕字辈，有弟兄三人和一个姐姐、一个妹妹。父亲排行老三，叫黄奕章，二伯叫黄亦合，大伯叫黄奕龄。我们是泽字辈，三兄弟各有一儿一女，我叫泽荣，姐叫泽芳，大伯、二伯的儿女叫泽梅、泽民、泽沛、泽莲。

我还有个小名叫润芝，小时候大人都这样叫我。我不喜欢这个名字，十二岁外出学徒，坚持改回辈分名。中共建政后才知道毛泽东有个名字也叫润芝，庆幸我改得早，不然掉了脑袋，一个小老百姓怎么敢和皇帝名字一模一样。

听 二伯大女儿黄泽莲（我们叫大姐）讲：原来爷爷在城里一家叫同兴公的刨烟店（是中国一种传统行业，就是把烟叶用油渍浸，用木榨压成捆状，再放在木马样的座架 上，用锋利的刨子样的椎刀刨成很细的烟丝，此行业现已绝灭不见。）当管帐先生，一生克勤克俭，忠于主人。主人儿子少掌柜不成器，吃大烟又赌钱。在清宣统年 间的一个春节，他赌钱赌输了向爷爷强要，爷爷不给，便取出藏在身上的刨烟刀，将爷爷活活砍死。

爷爷死时我父亲三兄弟皆未成人，妇道人家 的奶奶长期生闷气，不久气瞎双眼。好在同兴公掌柜有良心，赔了我们家一大笔钱，还将大伯叫到烟号上学手艺，后开设了品中和刨烟铺。二伯在家里种田，只父亲 一人读上书。农、工、兵、学、商，我们家占了农商学，一步步发展，很快成了小康人家。

“树大分桠，儿大分家”。奶奶死后，他们弟兄三人 均已成家，妯娌闹不到一起，便各立门户。我出生不久，即与大我五岁的姐姐泽芳迁到了成都中北打金街居住，那是两间三进的门面房，紧挨着大伯品中和刨烟铺， 一间开设土杂店，一间家用。不久母亲去世，父亲娶一姓温的姑娘作继母。民间有句俗话“有后娘必有后老子”，自此父亲逐渐变心，对我们姐弟常常打骂。大伯、 二伯都说父亲做得不对，父亲虽然听不进但也不敢怎样过分。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飞机常来轰炸成都，只要日本飞机一来，城里人就没命地往城外有树林的地方跑，叫“躲警报”。警报器安装在四城门的城墙上，只要日本飞机一进到四川天空，就呜呜呜叫起来，城里人携老扶幼，打包提箱，没命地往乡下跑，钻树林藏坟坝到处是人。

为 了不拖累父母，我和姐姐还有大伯的女儿泽梅，送回乡下老家崇义桥。大伯家有钱，可供泽梅姐在高家巷小学读书，我和姐姐却不能，住在当年那间出生的老房子里 吃白饭。在别人家里吃饭就得帮人做事，姐姐帮伯娘煮饭，我就帮二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田里活，诸如扯稗子、劈谷庄、栽菜籽等。

二伯脾气暴，家里人都有点怕，对我还不错，逢到下雨涨水，就叫上我拿上虾爬（一种竹编鱼具）和他到河沟里去捉鱼，捉回的鱼很小，全喂了猫。他是庄稼行家，不论抛粮播种，使牛踏耙，栽秧打谷都是一把好手。

除 此，他很会经营管理，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从不浪费一个铜板，甚至赶场天不在外面花钱喝口水，不到农忙决不雇请长短工，是个典型的“狠铜匠”（成都话吝啬 鬼）。因此家道逐日兴旺，到四九年前夕积攒了不少钱，便一下置成田土，很高兴地常常翻着地契看，喜滋滋的向家人说：“我种了一辈子田，现在才有了自己的土 地，这东西贼娃子偷不走，棒客（土匪）抢不走，只有不争气的子孙才卖掉。”

但不到两年共产党来了，土地改革划成份险些划成地主，他好说 歹说经过多次查实，最后定为自耕富农，买的那些田土全被征收去（按土改政策规定：地主的田产是没收，富农的田产是征收）。他气得半死，常常捶胸顿足说： “那田地是我辛苦大半辈子挣来的钱买的，怎么一下就成了人家的了？这世道还有没有天理王法啊！”自此闷声闷气，不久开始大口大口的吐血，后来饿死在“三年 困难时期”。死前向儿女们说：“我至死也想不通，为什么勤快人受罪，懒人白得好处？”当然，想不通的不是他一人啊！

大伯烟店生意不错，雇了三四个匠师，长年起早贪黑，到了秋冬穿着草鞋拿着雨伞，步行两三百里去什邡县农村收购烟叶，辛辛苦苦，没日没夜操劳，1947 年累死在家里。他死后大伯娘染上鸦片烟，吃光了家当，所幸后人没有当上资本家。

父 亲是个典型的惧内男人，温家妈又顾娘家，偷了不少钱回去，土杂店生意越做越小。不久继母生产细娃，患上了产褥热，连同襁褓中的弟弟一同死去。继母死后不足 半年，父亲再娶二婚的周氏作继母。到了 1947 年内战全面爆发，物价一日三变，父亲不会随势起舞，在币制贬值的折腾下，土杂货店很快负债倒闭。于是我家成 了无产阶级，我外出做学徒，父亲到大北茶厅坐柜当先生。

不过在乡下躲警报的那段日子，使我对老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老家是座品字形的院 子，有四间住房，外加两个横厅、一个下屋、一个装稻谷的仓库，还有磨房、牛圈、堂屋。院子四周是泥坯土墙，院子前面有座龙门，后面是茂密的竹林，四川话叫 林攀。竹林很大很大，竹子又多又密，四季阴浓，走进去不见天日，长年阴黯黯黑森森就像天在下雨。竹林里飞着一种类似蜻蜓的昆虫，绿茵茵的但头不大尾不翘， 俗名“七姑娘”，煞是好看。

隔不上三五天，我便要和姐姐到竹林里捞取落叶，背回厨房作柴火。老家的厨房特别大，灶台上有三口锅，一口煮饭，一口炒菜，一口煮猪食，灶口前挂有一个吊壶，二十四小时有热水用；柴房里堆着菜杆、麦杆、葫豆杆以及树干树枝，烧过的灰是最好的肥料。

院子前后都有小河沟，后面那条小河沟是从董家堰流下的，水又清又凉紧绕竹林缓缓前行，还有一小段还被圈在竹林里，二伯放上几块石板作为洗衣服的地方。姐姐每次洗衣服，我总是跟着她去玩水。天热了就光着足片来叉水，凉凉的心都会冰透。

前 面那条小河沟很宽，距院子笼门约两百米，是陈家碾流下来的水，水深流急，我从来不敢下去，经常看见有打鱼船在上面打鱼。打鱼人不用网，全靠鱼老鸹和

水毛子 （即水獭）。他们驾着一叶窄窄的小船，鱼老鸹站在船弦上，打鱼人手一挥，鱼老鸹就钻进水里，不一会儿就把鱼衔上来放在鱼篓里。每衔一次鱼，鱼人就喂它小块 鱼肉作为奖励。水毛子比鱼老鸹厉害，它专门钻到岩洞里把鱼赶出来，让鱼老鸹去衔。

我每天早晚的任务是放牛，牵着大水牛沿着路边田埂让它啃草，如果是热天还要牵它去滚水（洗澡）。水牛个子大，有对弯弯的长角，样子很凶但驯善听话。有时我走累了就骑在它背上，让它一边啃草我便一边看小人书，有点“吹箫牧童横牛背，飞线村姑坐花前”的诗情画意。

不 过也有恐怖的东西留在脑海里，距老房子三个田远的小院子，住着守寡多年的陈三娘，她大儿子一天被疯狗咬伤了腿，吃什么药也医不好，成日在床上打滚狂喊狂 叫，先是把自己十个指头嚼来吃了，后是乱抓心口肚子，听说把肠肠肚肚都抓了出来，血淋淋的吓死个人，断气时简直不像个人样了。

此后好长一个时间我都怕狗，特别怕硬着脖子翘尾巴的狗，说这个样子的狗就是疯狗，不但咬着你会疯，抢了你人影也会疯。为什么有疯狗呢我问大人，大人说蛇冬眠进洞嘴里会衔着一个石头，到春天惊蛰出洞就把这个石头吐出来，狗咬了这个石头就成疯狗。不过我总没有想通。

在 我们院子后面有个大沙包，听说那儿有鬼。鬼是什么样？大人说与人一个模样，就是看不见脸，走路不见脚，我天生好奇，想看看没脸没脚的鬼，一天晚饭后我跑出 去藏在大沙包芭茅丛中去看鬼，害得二伯找了好半天，鬼没看见却挨了顿臭骂，不过鬼的印象一直缠留心里。后来长大成人，却不敢一人在乱坟坝里走，总觉得那里 有鬼！

在距我们住家不远的东北面有座山叫凤凰山，其实不是什么山，只是些黄泥巴的山坡坡，很早就修建了机场。可是停在那里的几十架民国 政府小飞机，被日本飞机炸个稀烂，失去了制空权。自此日本鬼子来轰炸成都，要想怎么炸就怎么炸，出入如无人之境。为了找准轰炸目标的命中点，日本飞机总是 飞得很低，有时低得可以看见飞机里的日本鬼子。

炸得最厉害的一次是 1942 年 7 月 27 日（史称 7-27 空难），48 架日本飞机轰炸成 都，那天天气特别好，48 架飞机在天上一字儿排开，黑压压一片比老鸦还多，遮去半边天空，去去来来炸了大半天，从少城公园（现叫人民公园）炸到西御街，从 西御街炸到盐市口，从盐市口炸到科甲巷，仅少城公园就炸死了几百人，电杆上、树硝上挂满了血淋淋的手膀子、足肘子和肠肠肚肚，真是惨不忍睹，惨不忍睹！

炸 倒的房子不下一千多间，昨天的公馆大厦一下成了一片瓦砾。距我们住家不远的科甲巷吃了两个炸蛋，一家糊纸盒李姓的人家没有去躲警报，老人公和媳妇就被炸死 了；结拜弟兄周道炎家的裱白铺炸得找不到一块好木板，所幸没有伤人。轰炸后的一片瓦砾没即时修房，那些卖打药的、耍把戏的、玩猴子的浪人，就用它作谋生场 地，日久天长便称之为“扯谎坝”。

成都人把日本人叫日本鬼子，一提起就恨得咬牙。我们细娃有细娃恨的办法，用硬纸折成小人人，写上日本鬼子几个字，然后把纸人人丢在茅房里（即厕所）架上高射机枪（即小鸡鸡）扫射，好像出了心里窝着的气。

1943 年美国空军来华援助中国抗日后（就是陈纳德将军的飞虎大队），凤凰山机场驻下不少的美国兵和美国飞机，每个美国空军人员衣服的背上都有一行 字“来华洋人帮助中国”。自此，只要日本飞机一来，美国飞机就飞上去迎头痛击，常常打得日本飞机屁股冒黑烟，损失极为惨重，此后轰炸的次数越来越少。美国还有种两个身身三个脑袋的飞机叫“黑寡妇”，它可以停在天上不动，只要日本飞机来一架被打下一架，打得它不敢再来了，成都再没跑警报了。

有 天中午，我们听见天上响起一阵机关炮，忽见一股黑烟自天而坠，不一会儿人声嘈杂，说一架日本侦察机被打了下来，掉在陈家碾不远处的一座林攀里。我也跟着大 人跑去看，路上看见一个农民拣了一块飞机残骸，他听见天上有飞机响，即忙把那块残骸藏起来，说飞机上的人看得见会向他讨回。我听后纳闷：怎么飞在天上的飞 机把地上的事看得那么清楚明白？

到了目的地，看见那架被打掉下来的日本飞机，碎了一地残片，飞机头栽在地里，还在燃烧冒烟，一个日本鬼 子尸体的一条大腿，在火里烧得吱吱作响。老百姓扬眉吐气，一边看一边骂：“狗日的、龟儿子、杂种，活该！再来揍死你。”我想再往前挤，背枪的乡丁不让。不 会儿开来一辆吉普车，车上走下来几个美国兵，取出相机对准日本飞机残骸“咔嚓，咔嚓”不停地拍照。看热闹的人竖起大指拇不停地叫：“密司头顶好！密司头顶 好！”

成都人对美国兵挺友善，美国兵对成都人也挺好，常将一些糖果、罐头给近处的中国孩子吃，听说还将一个农民孩子带到美国去玩了几 天。在城里福兴街专设了一个盟军招待所，里面有不少妓女供美国兵玩，那用过的避孕套为一些乞丐拣

上洗净，当洋茄子（旧时人们对汽球的称谓）吹胀拿到街上 卖。一些姑娘不知道花钱买来玩，后来知道了急往地下扔，羞得一个脸红到耳根。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内战爆发，为了抗击共产党，国民政府不断征兵。“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抽得老百姓鸡飞狗跳，大家都不愿意打内战当炮灰。一些地方为了完成上级指令，便强行拉丁，秩序就不安定了。

为了保护一方治安，乡里丶村里组织了团防，好些农家屋里都有枪。二伯家有两支枪，一支马枪，一支步枪，到晚上轮流去不远地方老鸦林幺店子守夜，防“棒老二（即土匪）”，但一次也没有遇上。

到 了“神仙难过二三月”青黄不接时候，一些穷人成群结队拿上口袋丶箩筐，到有钱人家抢粮，叫“吃大户”。“吃大户”不犯王法，但不能伤人，不能抢金要银，抢 米抢粮也不过几升几斗，到了庄稼成熟的时候，这种现象自然消失了。我们住的地方离崇义桥的场口不远，乡长宋炳光又是哥老会的大爷，地方上“干人”（即穷 人）听他招呼，不敢太难为他，只要“吃大户”吃得不过分，他也就睁只眼闭只眼，“针过得线过得”就算了。

不论怎样说，成都平原留在我记 忆中的是一幅画，一组诗，一首歌，刀砍斧凿，深深地深深地刻在心里。抹不去，忘不掉，七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如此：春天，油菜花千里金黄，如锦似缎，无边无 际；夏天，秧苗碧绿，连天接地万里一色；秋天，粒粒饱满的稻穗，压地铺天让人感到丰收的喜悦；冬天，麦苗青青一地秀色，映得万里长天发蓝泛碧。它不但景色 优美，而且民风纯朴邻里亲善，和睦共荣讲孝崇义，重信守法相敬如宾，家家如此户户同一。

每年冬至节后没有不杀年猪的庄稼户，每逢新年初 二后没有不摆春酒的村里人，红色春联，威武门神，好一派除旧迎新景色。你请我我请你，要请到正月破五，大碗大碗的酒，一个巴掌厚的肉，在桌上劝去劝来，猜 拳行令，笑脸张张。大人玩龙灯，小人玩竹簧，一天锣鼓，一地笑声，银花火树一直闹到大年十五。

记得，1972 年我因于川南宜宾汉王山劳 改茶场，这里虽是一座监狱，但它面对的却是绿水青山，只要不是饥寒交迫的时候，往往给人不少遐想。特别是在春寒料峭的星期日，我独坐炉边，一边煨着茶梗， 一边双手抱头，看着那茶缸里袅袅上升飘浮的水蒸气，在浓浓的茶香中，不禁使我想起家乡成都的富饶美景，好似又回到了那遥远而又令人留恋的岁月。

我 在一首诗中写道：“蜂恋百花人怀情，船行江海柳迎春。五十年代成都好，笙歌妙舞锦官城。街市井然有秩序，尊老惜幼乡风淳。少年勤学壮男奋，遍地都是读书 声。语耻庸俗恶奢侈，言必及义显壮心。路不拾遗夜少盗，月下惟见笑眼睛。餐馆锅红鱼肥美，果店主愁糕点陈。酒肆里巷香满路，肉吊案桌待购人。公园竹翠鸳鸯 椅，情侣依依总销魂。舞步翩翩轻如燕，笙歌嫋嫋薄似云。极目川西八百里，女坐布机男忙耕：醉里鞭梢催壮牛，荷塘水澈跃千鳞。红脸村姑飞彩线，光腚顽童戏蜻 蜓。鸡鸣院落鹅唱道，鹰舞长空鸟闹林。黄谷累累仓胀破，金果灿灿枝压沉。此景如画非笔赞，难忘当年芙蓉城。”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三）

三丶古城的旧人旧事

我家从 1938 年乡下迁到成都打金街定居，直到 1948 年春我到上中东大街雨前春茶叶店做学徒为止，这条街上 一直有我的足印，每棵绿树伴我成长。打金街位于成都东南面，上联湖广会馆街下通新南门，分为上中下三段，上段叫上北打金街、中段叫中北打金街、下段叫下北 打金街，现通称为红星路。

为什么叫打金街？顾名思义，打金，打金，就是打金子。这条街上有好几家专事打金的作坊店铺，即通过一种特殊的工艺，把十足的赤金捶成比纸片还薄一千倍的金铂，专用于贴粘匾对和给菩萨穿衣。

打 金的掌柜、匠师均来自山西五台山一带，距我家很近的安爷爷打金铺，是打金街字型大小最老的打金铺，就是山西迁来的。他家来了成都快一百年了还说山西话，背 地里大家叫他“安老陕”。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不姓安姓温，说是抱给人做命根接香烟的；二儿子在一家大学读书，从不和街上孩子玩，我们叫他安三 哥；女儿人很漂亮，只一条腿不灵，走路一跗一跛。

他们家的人很慈善，安母母为人不错，喜欢帮助邻里救困解难，人们常当着安爷爷的面说： 你家好善乐施，不整人不害人，来日儿孙定会当官发财。这话还应验了，十多年后安三哥真的当上了共产党的大官市财委主任，后又升为中共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８０年为我“平反”落实政策帮了很大的忙。

这条街除了打金铺外，更多是做皮箱生意的作坊。这种皮箱是内木框外羊皮，绷制好后漆成各种颜色的漆，再绘上彩色花案钉以铜钉，亮晃晃的煞是好看，买主多是县城里的人。邻近的福兴街是卖各种帽子的，瓜皮帽、博士帽、蒙蒙帽（一种遮去头部只现眼睛的帽子），应有尽有。

小 科甲巷是专门绣被面、枕头的，驰名海内外的蜀绣就是出自这里男女工匠一针针一线线绣出的；春熙路大部份商店是卖绸缎布匹百货、金银首饰珠宝和开设银行的， 近似今日北京的王府大街，是富人来去的地方。一到晚上灯火通明，歌声嫋嫋，穿着各色旗袍和高跟鞋的摩登女郎，一个个浓妆艳抹，招摇过市一展风姿。

烟 袋巷是专卖各色铜制品烟袋的。香烟是泊来贷，先初中国人不吸，外国人不仅不要钱，还请人敲上洋鼓吹上洋号见人就送。每盒香烟里还有一张洋画，洋画几张连在 一起编有号，如果能连上号拚成一只虎一只鹿，还可得奬哩！纵如此成都人还是吸水烟，吸水烟就需要水烟袋。水烟袋铜质的好坏和式样的精巧，代表家庭等级品 味，烟袋巷的烟袋故有几百种之多。

打铜街是把铜、铁、铝压成簿簿的料皮，然后打制成各式各样的锅、盘、碗、盅和茶具、餐具之类的器皿；纱帽街是专卖绫绸和承制传统戏装的，锣锅巷是专卖木器家俱的。总之经过上百年市场运转机制和人们相沿的习惯，逐步形成了专业经营的街市。

顾 客只要去到这些街市，无论价格、品质、款式，只稍微一比较（俗称货比三家），便能很快决定要买的东西，决不会上当受骗。用今天经济观点审视，1949年前 的成都就已经形成资本主义的专业市场，无论从经营管理、销售网路、诚信价格，和今天市场比较似乎还完善与超前，可惜随着中共建政后各种政治运动已彻底毁损 了。

我家恰好住在中、下打金街和大科甲巷与江南会馆街的交叉十字口，地处要冲能接触到多方面的人。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一个是江南馆街租连 环画的铺子，那是一个双间门帘的苏裱褙铺兼营租赁连环画生意，几个大柜子里装满了上千册连台连环画，《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薛仁贵征东》等，看几天几夜都看不完。我童年多半在这里看连环画，也是最早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地方。

另 一处就是春熙路的铜人坝，之所以叫铜人坝因为那里立着一个孙中山的铜像。铜像前有花坛、水池子，四邻八街的小娃娃都在这里搞恶作剧，诸如用纸团塞进人拉车 车座后的纸灯笼，使它燃烧起来取乐，或者向“吊膀子”（拉客）的“货儿子”（即妓女）要零钱，待到春熙大舞台散戏前夕，便混进场子看戏和拣拾戏客留下的剩 余食品，这又是野性发挥的场所。

我最初读书的地方是上北打金街的奉私小学，因我爸爸和那条街一个姓叶的街正（街正是民初的职称，早于保 甲长制度）要好，只交很少的学费就上了奉私小学。这个学校设备齐全，有图市馆、标木室，操场的四面墙壁上写有斗大八个大字：孝、悌、忠、信、礼、义、廉、 耻，老师注重学生品德教育，教材不含政治色彩。

成都学校有两类，国家办的叫公立，私人办的叫私立。奉私是私人办的，环境很不错，教学品质高，可没有读完初小一册就跑警报了，两年后从乡下回来去诸葛井街读了一年私塾。

诸葛井街有座诸葛庙，供奉的是诸葛孔明，庙里有口古井，传说是诸葛先生当年开掘的，所以叫诸葛井。传说它可以直通九眼桥，有人放过一只鸭子试验，几天后鸭子从九远桥水里冒出来。

我 在这里读了半年，读完了《百家姓》、《千字文》、《增广》、《千家诗》，这些书老师每天号圈圈，全要背诵，奠定了一生中古文底子。再后转到城守东大街成德 小学读八册，校长叫白天章，一个梦想以“教育治国”的商人。不管后母怎样反对我读书，父亲还是没有剥夺我受教育的权利。大伯、二伯总告诫父亲说：“你不能 害孩子一生啊！好歹总是你血脉。”

我自幼很淘气，喜欢打群架。一次和一群孩子把一个卖豆腐干的小贩推倒在地上，这个小贩想讹诈我们，躺 在地上不起来，啊哟连天地叫个不停。孩子们都吓着了，不知怎么办？我大着胆子向小贩说：“我们叫警察来评理，看是你打我们，还是我们打你？”小贩怕警察， 不再躺在地上耍赖。

再有就是从看《三国演义》连环画上学来的“桃园三结义”，我们几个要好的孩子学着大人样，与科甲巷街画罩帘兼裱白铺 周伯伯的儿子周道炎，吃血酒结成把拜把弟兄，跪在一起对天发誓说什么“生不同天，愿死同日”。然后聚在一个叫运兴商行的空道里摆机关布阵，把一些木板、篾 筐、小石块放在门框上，一不注意就会打得些同伴鼻青脸肿，回家只好向大人扯谎说成是走路跌伤。

一次我们去华西坝后面分水垫洗澡，玩得嘻嘻哈哈高兴极了，不防小偷把衣服偷跑了回不去，急得不少人哭起来，总不能赤条光身的回家？我出了个主意用荷叶遮上屁股和前面小鸡鸡，这样才回了家去。以后再去洗澡便轮换着人看衣服，再没遭偷了。

那 时我们心中崇拜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铜人坝的孙中山， 一个是经常看见坐在私包车上的尹昌衡。听大人讲，孙中山是推翻满清的伟人，尹昌衡是杀赵尔丰的英雄，他 原是大清国的标统（相当于现在营级校官）。孙中山发动的辛亥革命成功后，清帝宣统宣布逊位，但四川总督赵尔丰不下台，坐镇皇城负隅顽抗，四川同志会心急如 焚。后起义士兵冲进皇城，从睡梦中把赵尔丰抓到皇城外坝坝里，可是没有人敢上前举刀杀他。尹昌衡提刀上前强按赵尔丰的头，叫他跪在铺好的红地毡上，赵不 跪，尹昌衡大喊一声刀起头落，把赵尔丰杀了。

赵死后他自封都督，袁世凯称帝削了他的官位，自此闲赋在家当寓公。人说“大船烂了还有三千 钉”，听说家里仍是都督排场，花厅上摆着十八般武器和那把砍死赵尔丰的马刀。他个儿高大，腰杆很长，一脸杀气，两个眼睛射着冷光，挺胸昂头坐在私包车上高 人一头，谁见了谁都怕。我们常在一起私下议论，一次我拍胸说：“有一天我也杀个大官儿，威风威风”。这事为父亲知道后，狠狠揍了我一顿，说这是“造反”灭 族的胡思乱想。

稍大一点，便喜欢听评书和圣谕。不少茶馆为了招睐顾客，夜里专请说书先生讲评书。讲的内容多是剑仙侠客，妖魔鬼怪，贯穿 一个作恶没有好结果，行善一定有好报的因果关系。说书人坐在一人高的台子上，手拍惊堂，手舞足蹈，又比又划生动极了。一部书可以讲两三个月，每晚闸板都留 下一个悬念，第二晚不得不去听。我们给不起钱，在坐客后听“战国”（即站在人后听）。

“圣谕”是大热天夜里，一些坐铺面人家搭个台子摆 上香烛，当中供奉着一个写有“圣谕”二字的木牌。讲的人身着长衫，戴帽穿鞋，先毕恭毕敬，燃香秉烛，祷告上苍，然后长声悠悠地唱着：“一愿天下风调雨顺， 世间太平；二愿子孝父慈，一家长寿康宁；三愿夫妻和睦，白头到老；四愿行善积德，子孙昌盛……”他们讲的都是劝人行孝行善的段子，不拍惊堂，不挥手蹈足， 文文静静地坐在台上讲，诸如《安安送米》、《雷打张继保》、《三娘教子》、《活捉王魁》、

《三元记》等。一晚上讲一个，不留悬念不过夜，听的人多是婆婆大 娘和小孩。

讲圣谕的人多是善堂里的执事，不向听书的人要钱。当我听了这些圣谕后，心里在想：我要当个孝子，好好读书成个状元。自此，再 不做先前那些恶作剧的事了，回到家不是给父亲摇扇便是端茶送水，父亲很奇怪，怔怔地看着我，嘴里低低说："娃儿变了"。正因社会提倡向善，大家都和气做 人，街道上少有打架闹事，生意人重商德，不卖假货不骗人，邻里亲善和睦相处，少有纠纷。早晨各家店铺自动洒水扫街，周而复始从不间歇；酷暑天十字街口有人 施舍解渴的茶水，有的还佐以清凉药物，任人喝个饱，清洁卫生，适量而取。

成都有不少乞丐（地方话称叫化子），但乞丐都有帮口，划有地 盘。这个地盘的乞丐不能到那个地盘去乞食，否则视为犯规。犯了规，帮口会出面处理，轻者赶走，重则下膀砍腿，再重沉塘丢河。乞丐都不敢犯规。乞丐有三种： 善讨、强讨、骗讨。善讨磕头作揖，叫爹喊妈，多是年老和残疾人；强讨多为强壮之人，自幼好逸恶劳，逢单个路人或弱户人家，非得要对方施舍，不给不走；骗讨 把自已装扮得十分可怜，断腿缺手，流脓生疮，让人心生慈悲给米给钱，权作善事。

还有一种是专门骗吃的乞丐，他们先去饭馆吃个酒醉饭饱， 然后头顶板凳跪在饭馆门前地上叫喊："善人、老爷，太太、小姐，大慈大悲，行善行好，我实在饿得不行，才去吃了顿饱饭，现身无分文，不能走路，求你们行行 好，给我付了这顿饭钱，老天爷保佑你儿子当大官，女儿做皇后。"一般叫上两三个小时，就有善人去解套。窃贼也是划了地盘的，各有各的堂口，各个堂口有掌门 人，管着窃贼，一当犯事负责打捞，窃到东西就如实上交分肥，故没有野堂口的窃贼。

各街各巷有义务消防组织，备有水桶、铁钩、铁抓等器 具，还有两人用力压的火龙（即消防车）。这种救火车是个大圆木桶，加上铁制压盖梢条，再接上水管，下面有四个軲辘，遇上火警义务消防队员拉着救火车拼命向 火场飞跑。一次华西大学遭遇火灾，就是义务消防队扑灭的。义务消防不要国家发工资，也不用单位供养，全是公益善事。

还有若是大热天久旱 不雨，几条街的人便相邀玩水龙。水龙几十米长，龙体是草扎的，有十多节，用布联成一体。玩龙的人只穿一条短裤，站在街中任人泼水，故各户门前摆有清凉的水 盆，用瓢舀上向玩龙的人泼去，能起到降温作用，近似泰国的泼水节。打金街做皮箱的游伯伯长得腰粗臂圆，玩龙能把龙头玩得风转，常为人叫好。

一 条街上的邻里相互没有不认识的，一家有事没有不相互帮助的。有天早晨，一辆载货汽车把一个拉黄包车的车夫撞死，趁没人加大油门想逃之夭夭，被做牛皮箱的刘 大爷发现，他一边喊一边追："大家快起来，汽车撵死人了！快起来！他想跑，大家追呀！"熟睡中的邻里被叫醒，上百多人冲出家门拦住路口，丢扳凳放石头，迫 使司机停车就擒。如果有贼前来偷东西，只要有人一叫，大家会奋不顾身出力，擒贼抓赃勇敢无比，绝无坐视不管的人。

国民政府时代市仍叫政 府，市政府下分很多区，区下面是保，保下面是甲。保

长设有保办公室，有保丁和打更匠。保丁工资由保长管，打工匠工资和吃住由受益人户承担。打更匠的任务有 二，一是每晚准时打更报辰。一个晚上要打四次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二更时间大约是晚上十点至十二点，三更时间大约是晚上十二点至凌晨两点，四更时 间凌晨两点到四点，五更时间凌晨四点至六点。他一边打更还一般吼叫：“注意防火，注意防盗，关好门窗，睡好大觉。”保里有什么事，由他负责通知。保长由众 人公推，一般是公正善良有点家底人担任，责任是负责各户安全，向政府反映大家意见，保里发生打架闹事，出面在茶馆协调解决，输方承担茶资；甲长没办公室， 协助保长处理本甲事务，一个甲大约五六十户，十个甲为一保。

成都人有喝早茶习惯，大约每天早晨六点多钟一条街的聚在茶馆里，不是谈生意便是交流趣闻，相互总是争着付茶资，亲善和睦互不争斗。泡茶的水是从河里用板车拉来的，井水味咸不能沏茶。喝茶有规矩，当堂倌把茶冲上盖上盖，约两三分钟 后才能举起茶碗揭开茶盖，反盖一浪茶的香味直冲鼻孔，那白白的茉莉花瓣在水里翻滚很是好看。

在距我家不远的大科甲巷靠近城守街口的正心 堂，是一个专做好事的善堂。善堂起于何时，不得而知。只知那个正心堂是专为穷人做好事的地方。穷人生了病来此看病吃药不要钱，死了人可以来这里要棺木，大 寒天没衣穿可以来这里要衣服，逢年过节还可以来这里要米票。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全是有钱人自觉自愿的捐赠。捐赠的人叫善人，善人的捐赠营造了正心堂，正 心堂用善人的捐赠救济穷人，调济贫富矛盾，有利社会安定稳固，街上很少有扒手小偷。

正心堂每年还要做几次法事，三月十五观音会，七月十 五盂兰会，九月初一玉皇会。逢做法事，善堂公请来一些和尚或道士，穿上法衣敲锣打鼓，扬幡飘旗，祈福求安，寄愿上天。每做这些法事要撒鬼弹子（即面团做的 一种糖果），我们高兴得爬在满地抢。除做法事也搞请神、邀仙、扶乩显灵一类活动，我父亲就从善堂请回一幅关圣大帝显圣像供奉一辈子，却未保佑他交上好运。 这些善堂在成都市有上百家，四九年已后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共产党宣布取缔，说它是“一贯道”汉奸的组织，不少堂主被公安机关逮捕的逮捕，判刑的判 刑，老百姓再想做好事找不到地方了。

四、“四九”血案始末

1947 年内战全面爆发，国共逐鹿中原打了起来。打得血流成河，尸骨堆山，断垣残壁，田地荒芜，巢禽无树， 狗猫没窝，鸦含枯肠，狼叼人肉。战争真惨烈！应了一句古语“一将功成万骨枯，头上皇冠亿民血。”好在成都地处边远地带，一时听不到枪炮之声，但由于战争波 及物价，货币贬值，民不聊生，人心思变，社会开始紊乱。

此时地下共党组织发起了旨在配合“解放战争”的“反饥饿，要生存；反内战，要民 主”的示威大游行。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光华大学和一些中学高年级学生，纷纷打着长条横幅，挥着小纸旗走上街头，先在主要街道游行，然后集中在督院街省政 府大门前请愿。他们又唱歌又呼口号，又扭秧歌又演剧，煞是热闹。

当时四川省政府主席是邓锡侯，他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由于缺乏实力，从 不树敌，故为人圆滑老练，在四川军阀中是出了名的“邓汤圆”。他的公馆在五世同堂街，高高的封火墙，黑漆发光的有铜环的大门。他每天早晨骑着高头大马，后 面跟着几个扈从，威风凛凛地从湖广馆经打金街、穿新南门，绕锦江一圈然后从东大街回去。他个子高大，穿一身呢制服，戴着博士帽，背上披个风敞，小时候经常 见到他，如老百姓向他打招呼也不拒绝，凡有叫寃者必下马亲接状纸。似乎那时的官没有后来共产党官的架子大，现在平民百姓别说见省长，见个区长、县长比登天 还难。

示威游行成千上万的学生，从走马街到南打金街一带，把个省政府围得水泄不通，呼口号唱解放区歌曲，闹得天翻地塌。省政府门前站满 了宪兵、警察，一个个像门神动也不动，听着学生喊“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也眼睁睁看着学生连台上演国民党士兵如何抓壮丁，国民政府官员如何 腐朽昏庸的活报剧。

听说邓錫侯省主席下有手谕：只要学生不行凶不杀人，不放火，不冲进省政府，叫什么、演什么都不要去管，如果喊渴了演 饿了，还叫手下副官送水送饭。他深知学生哥、学生姐都是富豪人家的公子、小姐，轻易得罪不得，人人后面都有权柄人物在支持，未来前途不可限量，全是国家民 族栋梁之材，说不定当总统、当部长有的是。

再有，学潮是共产党支持煽动起来的，“后颈窝摸得着看不着”，国共两家争江山谁输谁胜难以预 料？自己何必去计较认真，得罪任何一方都不识时务。听说有次学生提出非得要省主席出来说个清楚：“国民党为什么要发动内战？”他躲不过，竟然出来与学生见 面。他态度极好，站在学生面前向大家深深一鞠躬，然后拱着双手说：“本主席才疏学浅，未给父老乡亲办好事，深表惭愧，惭愧！至于打内战一事，本人是反对 的，也不会派兵参预，如果诸位不信可去南京找找蒋总统。在下是省主席，只管四川省内事，不管全国事。多谢多谢！”学生拿他没办法，反正闹饿了管饭，闹疲了 收兵。

成都人是天生喜欢看热闹，纵是谁在地上啐口淹液，只要有人看就有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围上来看，不会儿围成一大堆人，叫 “扯场子”。现在上千上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看的人自然比学生多。我们这些“半截子幺爸”（成都话小孩子的意思）自然不放过这看热闹的机会，早在人群中钻 去钻来。

只见好多男女学生头缠白毛巾，腰系红绸带，扭动着屁股，双脚一前一后摇去摇来地唱：“姑娘穿着花花袄，走起路来扭扭妮……”，才知道扭秧歌。学生闹了几天闹不出什么结果，只好回校上课，隔不多久又出来游行示威，反正见怪不怪，久而久之成都人就习以为常了。

不知是“邓汤圆”太软还是到点的原因，1948 年换成了王陵基当省主席。王是蒋介石先生的嫡系，在江西打过共产党，是个反共的强硬派。1948 年 4 月 9 日，学生又打起横幅，挥动小纸旗到省政府门前示威游行。

先 初王陵基也睁只眼闭只眼不想强行干预，请川大校长黄季陆出面劝阻。学生不依不饶，叫黄季陆校长滚回去。请愿示威越闹越厉害，闹得不让省政府上班人员进出， 王陵基只好派出幕僚与学生谈判。学生代表提出三条强硬要求：一，不准省政府派兵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二，不准省政府向老百姓抽丁派捐；三，不准军、警 、宪干预学生请愿游行……于是谈判破裂，双方处于僵持状态。学生仍围着省政府不撤，还对着警察、宪兵叫："警察好，宪兵妙，个个头上戴个呱呱叫。反转枪口 打老蒋，人民要求要做到！"又演出"灵官扫台"的活报剧。

这下惹火王陵基，认为学生目无王法，欺人太甚，再不拿出点威风出来，这个省主 席就当不下去了。于是下令警察、宪兵：给我用水龙头冲！可是水龙头冲不散学生，有的学生还上前抢水龙头冲警察、宪兵。他气得拍桌大骂："妈的，简直反 了！"即叫宪兵、警察用木棍、皮带打。学生还是怕硬的一手，纷纷抱头鼠窜逃之夭夭，其中有几个共党学生不怕事，竟和宪兵、警察扭打起来。自然学生打不过警 察、宪兵，有的衣服被撕破，鞋袜被打掉，有的被打得脸青面肿，头破流血，躺在地上起不来急送医院。

那时舆论不受政府控制，"新闻自由"是民主社会生命。第二天，省内各报纸大登特登此一消息，说："王陵基镇压学生，督院街血肉横飞"这便是震惊国内外的"四九血案"。在这次血案中抓了十几个带头闹事的学生，不到十天全被学校保释出去了。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四）

第二章天翻地覆

这是个富人倒楣，穷人翻身的时代；这是个传统礼教被打碎，马列共产风兴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一夜之间我从学徒跃升为国家的"主人"，穿上灰制服，戴上八角帽，腰上插着手枪，成了吃皇粮的国家干部，多威风！

一、难忘的学徒生活

1948 年春我刚 15 岁，家穷读不起书，经姐夫张贵武介绍，去到成都市东大街雨前春茶叶店当学徒。"雨前春"是家百年老店，与春熙南路的"锦春"、春熙北路的"陆羽春"和总府街的"裕昌源"，合称成都四大茶叶巨头。

四十年代的广告

当徒弟第一件事叫拜师，即向师傅、师兄、匠师磕响头，叩完头后师傅要发一通训示，诸如“当徒弟要学好手艺，勤快诚实，见事做事；要手脚干净，不贪小便宜，对买主恭敬，无论生意成不成，都要拿烟倒茶……”我诺诺应着。

这家茶叶店是一楼一底的双家大铺面，亮堂堂朱红漆的楠木柜一尘不染又高又大，货架上摆着江西景德镇特别烧制的有“雨前春”字型大小的几十个大青花磁缸，里面装着按季节分等分级的茶叶，上面覆盖着厚厚的棉垫，不让跑走香味。

店铺面对成都主干道东大街，向东经牛市口入成渝公路直达重庆，向西过茶店子通到灌县茂汶一带，可称黄金口岸。它又是前门开店，后门设厂的那种老式作坊店铺，有着浓郁的中世纪味道。

铺 面后面是个长条形的天井，穿天井登上五级石阶穿过公馆似的门洞便是师婆的住室。师婆住室前面是个走廊，对面是制茶的烘房，斜对面是个花台。沿师婆住房前行 是个很大的客厅，客厅左面有两间房，一间是二师傅寝室，一间是他的书房。出得客厅前行五步，是个两层砖砌库房，长年堆放茶叶。库房边有条狭窄的石板路，走 出石板路是个空坝，左边是口深不见底的水井，右边是几棵果树，井边一排三间平房，是奶妈、丫头、煮饭大嫂的住房。上得梯坎，便是大师傅、三师傅房间，后面 则是一个很大的厨房与厕所。

茶叶店老板姓张，兄弟三人，主事的是三师傅，叫张叔奇，是个胖子，对人厚道，不苛斥下人。大师傅抽大烟不管 事，在家里没地位，常常偷些茶叶出去换鸦片烟抽；二师傅是国民党四十九军的中校参谋，与军长黄逸民有较好的关系，他早出晚归从不过问生意，具体管事的是他 们的母亲，我们叫师婆。她也是个大胖

子，一脸富贵相，常年戴副老花镜，管理店铺精明细致。每天坐柜收钱，生怕丢掉一个铜板。

他们除有这个双间门面的茶叶店外，在龙潭寺乡下还有祖上留下的一百多亩上等的好地好田，算得上是有钱人家。

茶 店有五个工人，一位六十多岁的宋姓匠师，我们叫宋先生。他已年过六十身体蛮好，热天穿中式对襟白布褂，冬天戴顶呢毡窝帽，长袍马挂一付斯文相，他有一手制 茶特技，凭手知道茶叶的干湿度。他常向我们说："学手技要靠自已灵光，对人不真诚是学不到本事的。"叫刘大师兄的是位满师后参师的师兄，参师是行规，在拜 师的契约上就写定：三年徒弟满师后，为回报师傅恩德参师一年。在这一年中师家发给匠师相同的一半工资。刘大师兄二十出头的人了，成天想着讨老婆，坐柜讲生 意心不在焉，两个眼睛老是盯着街面上的来去女人。除我外是将要满师的两个师兄，一姓姜，一姓罗。姜师兄性格内向，寡言少语，长年吃药，患有痨病，成日成夜 咳过不停，背后叫他"药罐罐"。罗师兄为人和达，一说一笑，但不喜欢做杂事，有"媳妇熬成婆"的架子，故扫地抹桌一应由我包干。

内屋还 有一位奶妈，一位丫头，一位煮饭的大嫂。奶妈管三师娘的细娃，丫头叫祥云模样儿不错，手粗脚大，下巴上一层黑麻麻的汗毛，主要负责照护师婆，送水送饭兼管 洗澡。罗师兄一次悄悄说"熟透了的桃子我可不想吃"。我不懂这话意思问"怎么不能吃？"罗师兄嘻嘻一笑"你想偷嘴？"一次我去仓库取茶碰见她一人在那里， 她笑盈盈长时间看着我，突然冲上前死死紧紧地抱住我，弄得我上气不接下气，不断求饶说："祥云姐放开我，我快憋死了。"自此我看见她就跑，生怕再被抱住憋 死。我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是洒水扫街、开铺板、然后到厨房端饭、挑水，再后是制茶、坐店。

制茶分两道工序流程，一是烘烤，一是筛磨。茶叶店的茶是从邛崃、大邑等县茶农手里卖来的，称本山茶，特点是味浓、经泡；从宜宾、马边等地一带买来的茶，叫河茶（大概是通过水运从船上来的原因），特点是叶细、水清。这些茶都打成麻包，每包六十斤，紧紧粘连一起，成块状。

第 一道工序是拆包、打散、烘制，分等级装箱或入坛，待到五六月茉莉花出来的时候，再拌以茉莉花烘制焙干俗称花母茶。卖时与素茶掺合，再论质计价。清明前的茶 叶是上等茶叶，十六进位的一两，可卖到一个银元；次一点的是夏至以后的茶，再次是秋分后的茶，一个银元可以买一斤，天壤地别，悬殊太大。

茶 叶除讲色香味外，还得条型一致，就得加工筛磨。先把茶叶过筛，筛不下的用手抓住在同一筛眼的竹筛上搓磨，使其达到条型一致。焙制茶叶是传统技术，全凭眼睛 与手感，一是看火候，二是掌握干湿度。火候把握不好会把茶叶烤焦，干湿度把握不好茶叶会变味。在这关口上宋先生作用至关重要，我终于明白了"有艺不辜身" 这句古训。

焙制茶叶的主要工具是铅皮烘箱，烘箱放在平腰高的砖砌炉灶上，炉灶架上钢炭

（俗称木炭），制茶人用两掌不停地在烘箱里翻动茶 叶，稍不注意就会灼伤手皮。制茶季节多是暑天，加上烈烈的炭火，温度高达摄氏五六十度，光着脊梁只穿条短裤，汗水仍顺着额头脊柱往下流，所站立的地上会印 下湿湿的足迹。茶叶有层黄绒绒的细毛，一翻动就随风飞扬粘人一身一脸，乍看去全变成了深山里的野人。在不制茶的季节，我们便成天坐在柜台后选茶，就是将茶 叶中的茶梗、茶果择出来，使其更有卖相。

茶叶店早上七点开门，晚上九点关门，然后自学或看书写字，在这个时候三师傅张叔奇便来和大家聊聊天，讲讲做人的道理，比如忠呀、孝呀、诚呀、信呀，总之要求你上进，不要沾上坏习惯。大约十一点前睡觉，睡觉前由师婆将门上锁，早晨再由她将锁打开。

学徒没有工资，每月只有一个银元的剃头费，三餐两菜一汤，白米干饭尽肚子装没有定量。每月逢初一十五“打牙祭”一碗熬锅肉，两个“捎晕”（四川话即肉炒的菜），一个连锅子汤（肉与蔬菜合煮在一起），每人约半斤肉。

日子月复月，年复年，就这样平平淡淡的过去。但在这平淡的日子中，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一件是生意上的事，一件是感情上的事。先说生意上的事吧：

茶 叶最小气，见味就抢，进口就会发觉。有天店里的大花猫，在烘制好的茶叶堆里撒了一泡尿，使得几十斤茶叶成为废品。三师傅吩咐倒掉，师婆却有点舍不得，叫放 在一边。巧好，第二天三台县一个小贩来买茶，把价压得特低，师婆拍板叫卖，却悄悄叫我们把那准备要倒掉的、有猫尿的茶叶打成包混在里面。

下 午三师傅回来，问及此事，得知情况后大大生了气，他先指责匠师宋先生，说：“我妈不知道，难道你不清楚么？我们雨前春是百年老店，怎能把有猫尿的茶叶卖出 去，还要不要招牌？一个做生意的人，看重的是信用，不能为了赚钱不要良心，让顾客喝猫尿。”师婆发现自已做得不对，一肩挑起责任说：“不怪他们，是我不 对，罗师兄，你快骑车去把买主追回来，给人家换过货。”罗师兄闻言骑上洋马儿飞跑，花了大半天时间直追到牛市口，才把那个三台的小贩追上换回有猫尿的茶 叶。

是夜，三师傅又把这事讲了一遍，一再告诫我们：“做生意不能只想到赚钱，更要想到信誉，不然生意永远做不大。”此事深深刻在我心里，三老师傅那张胖呼呼诚实的脸和那颗金子般的心永远留在脑海中。

感情上的事是这样发生的：

每天早晨天刚亮，天空还是鱼肚色的时候，我即洒水扫店面前的街沿和街道的一半。那时每家商店都如此，成了约定俗成的公共规矩，不用谁叫谁喊，人人自觉，家家如此。

每 扫罢街，悬在电杆上的路灯才由黄变淡，渐次渐次地消逝在晨光中。接着街

市上开始有人走动，最先是“咚咚咚”拉尿水的板板车，再后是小贩们断断续续的叫卖 声：“称豆芽”，“拈唐场豆腐乳”，“辣菜，辣辣菜”……这些音调婉转抑扬顿挫的叫卖声，颇像山歌小调在城市上空盘旋。我们铺面门前当街的地方有株洋槐 树，它枝繁叶茂，春绿秋黄，看见它就是不翻皇历也知现在是什么时令。洋槐伴我成长，也伴我学徒生活的单调岁月。在它浓荫的庇护下，有不少鸟儿在枝间跳来跳 去，叽叽喳喳给了我无穷欢乐，使我忘记了童年的苦闷与忧郁。我常在树下面撮着嘴巴嘘哨逗弄，和它们一同享受天地的自由。

不久发现，每天 在我扫地扫到一半的时候，“叮当叮当”一辆油光水亮的私包车从面前飞驰而过、那黑漆的车杠前端包有铜皮，铜皮在晨曦反衬下闪着金光，滚动的车轮追逐人影扬 起一片灰尘，雪亮的钢丝好似一个旋转的电光圈。拉车的是个彪形大汉，穿一身青府绸衣裤戴一顶宽边沿草帽，脚下麻板丝耳草鞋的鼻梁上还系一朵大红绒结。

坐车的是位长发少女浑身一色白，只有发带是红色的，还有胸口那枚三角校徽是蓝色的。她腰身纤细，肤色润泽，眉毛黑长黑长，轮廓分明的鼻梁下，嘴唇红得发湿，大眼睛明彻透亮从不旁视，显示出大家闺秀特有的傲气。

不 知是出于标榜富豪，或者是提醒过往行人注意她的风姿。她总是正襟危坐把脚踏板上的铜铃踩得特别响：“当当！当当当！”。铜铃震聩我的耳膜打乱我平静的心， 惹得我常常投去愤怒的一瞥：“哼！洋个啥？还不是靠你老子几个臭钱？有本事自己挣，要我才不坐哩！”有时真恨不得上前揍她两笤帚，直打得她告饶方解恨。是 嫉妒还是所谓“阶级仇恨”？我也说不清，有时深觉自己可笑：“别人坐车踩铜铃，碍你什么？”生活原本是一束五色的花环，多姿多态五彩缤纷，给你欢乐也给你 忧伤，给你幸福也给你灾难，给你享受也给你苦酒。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端阳节后的早晨，一个大地铺锦镶绣的大好晴天，我打开店铺和以往 一样从井里挑来净水，放下扁担拿出瓜瓢，满满地盛上一瓢又清洌又明净的凉水，正准备向街面洒去，忽见洋槐树上飞来一只相思雀（又名红嘴鹂），这鸟羽毛金黄 发亮，长长的嘴喙闪着蓝茵茵的光。它的叫声清脆悠扬好听极了。我看得忘情听得入迷，没有注意飞驰而来的私包车，反手当街一瓢水——“哎呀！”一个尖溜溜圆 润润的叫喊声，冲得我一怔：糟糕！满满的一瓢水泼在了那位坐车少女的身上。她惊愕地用手挥掸着，白白的衣衫上湿漉漉一片，紧贴着她丰满的胸脯。拉车大汉立 即放下车杠，挥拳捋袖横眉怒眼向我逼来，嘴里还不断恶狠狠地骂：“狗日的杂种，眼睛球日瞎了，老子今天非得教训教训你。”

拳头，斗大的 拳头，青筋暴绽贯着风响，眨眼就要落在我的头上。我畏葸退缩思谋着对付的办法。蓦然，又是那个尖溜溜圆润润的声音：“唐师，干啥？他又不是有意的，快走 吧！要上课了。”主人的吆喝，使拉车大汉收回了拳头，不过他余怒未息咧嘴龇牙嚷道：“下次再这样，老子捶断你的脊梁。”

“当当当！当当当！”私包车旋风般的上路了。晨风，霞光，长发，黑亮亮车身，渐渐地渐渐地，消失在远处，不见了，不见了……

是 感情发生了变化，还是思想日趋成熟，还是对客观事物有了新的评价？从此我不再讨厌和仇视那震耳欲聋的铜铃了，它变得亲切动听，像和煦轻柔的春风，又像清洌 潺潺的泉水，甜人肺腑沁人心田，给人以美感和享受，似乎老远老远地在向我问候：“你好呀！你好呀！”同时我还发现车里那位少女，既不矜骄也不傲气，每当私 包车从我面前擦身而过时，她总是和善地对我微微一笑，那笑出自心田出自真诚，好象无声地在说：“你好，辛苦了！”我呢一直目送她，送得很远很远，希望第二 天再看见，如果第二天没有看见心里便空空的，像丢失了什么？我们就这样保持着奇特的“友谊”，彼此心照不宣，把美，一种纯真的美，深深地埋藏在人们眼睛看 不到的地方。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五）

二、喜迎“解放”

1949 年 4 月，自《新新新闻》（当时国民政府在四川的主要媒体，中共建政后更名为《川西日报》，1953 年并省后改为《四川日报》）登载了中共军队打过长江的消 息后，师傅、师婆开始紧张起来，成天愁眉苦脸，少有言笑。一天下午我去厨房取饭路经客厅，听二师傅正向师婆说：“妈，龙潭寺那百多亩地快卖掉吧，不然共产 党来了会给你分掉的。”

师婆一手拿着纸拈，一手抱着水烟袋咕噜咕噜地抽过不停，想了会儿才摇着头道：“这是祖上留下的，不能到我们这一辈败了啊！这样，我怎么有脸去见祖宗？再说，现在卖也卖不起价，一亩顶多一百元钱（指大洋）。还有，老蒋那么多队伍就打不过解放军么？”

二师傅继续开导道：“不要说 100 元一亩，就是 50 元一亩也要卖。你不卖，共产党来了不但全部没收，还要吃斗争……”

“我不信，共产党也要讲理呀，除非是棒老二（指土匪）差不多。我们的田土又不是抢来的，贪来的，占来的，是辛辛苦苦一滴血一滴汗挣来的，要没收总得有个说法。”

“妈呀，什么说法不说法”二师傅仰天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我了解共产党，它革命的宗旨就是发动穷人打垮富人，分田分地是重头戏。成都解放只是迟早的事，我们军部早就在暗地商量‘和平起义’……”

“怎么，老百姓拿钱拿粮养着你们，连屁也不放一个”师婆停住手中纸拈，双眼睁得大大的：说“难道你们肩臂上扛的是吹火筒么？”

“妈，兵败如山倒，天意不可违啊！”二师傅无可奈何地叹口气道：“上面不想打，我们做参谋的有什么办法。”

“你想过没有，你们是吃公粮穿老虎皮的人啊！共产党能放过你吗？”师婆担心地提醒，二师傅陡然站起来在堂屋走几步，有点大义凛然地说：“我又没有反抗它，要是它真不讲理，老子就和它拼了！当军人还怕死么？”

通 过这些细微动静，我发现有钱人怕共产党，心里着实高兴。睡觉前我把听到的这些话告诉三位师兄，他们想了会儿，你看我我看你，还是刘大师兄先开口说：“共产 党就是过去的‘霉老二’，十多年前就在通南巴（指四川北部通江、南江、巴中三县）一带闹得很凶，说要打成都，吓得成都有钱人往重庆跑，后来老蒋的中央军开 进四川，才没来成都。我爸做生意路经巴中，他说共产党把那里有钱的绅粮全抓来关在牛棚里，又打又吊又捆，还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收了田地房屋，听说还共妻 啊！不知是真是假？”

姜师兄咳咳咳地道“不管怎样闹，对我们穷人没什么坏处，能分几个就分几个，分不到也没关系，反正我们是帮人的命”，说着又咳了起来“现在，谁能治好我的病，就是大恩人。”

罗师兄抠着下巴，似开玩笑似认真地说：“我最希望是共妻，我一生怕打单，共产党来了要能分个婆娘给我，我一定喊它万岁！”

他的话引得大家一阵哈哈大笑，我默默在想：“看来世道有大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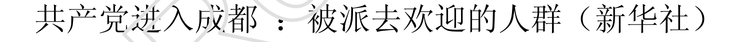
半年后成都“和平解放”了。

四 川军阀刘文辉、潘文华、邓锡候、王瓒绪等大人物，还在中共军队渡江前听说就在商量“起义”一事，早早地派出代表与二野的刘伯承、邓小平谈判。待国民党中央 军从成都经西昌撤走，成都就成了真空地带，为防乱军，商家自动凑钱在各街口修建了临时木栅栏，一到晚上就关上不通行人。

此时，原当过四 川省主席的王瓒绪组织了一支“治总”的部队，出面维特成都市面秩序，并颁布十二条杀令：凡抢劫、杀人、强奸、闹事、纵火、偷盗、趁火打劫者，一律格杀勿 论。那插着“治总”旗帜的大卡车，一天到晚在大街小巷来回巡逻，不几天真杀了几个抢匪，自此街市安静得像座古庙没一个人敢撒野，木栅栏很快撤除。

应 该说成都在共产党来前的一两个月时间里，王瓒绪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不知为什么没捞着官儿，共产党只给了他一个省参事的职务。１９５７年４月“整风反右”前 夕，这位前主席却偷跑到深圳准备从香港出国，被公安局抓个正着，后关在成都梓橦街省公安厅监狱，于１９６１年饿死。他第七个儿子王泽仁被划为极右，开除公 职送劳动教养，曾一起在省公安厅劳动局“４１５”劳教筑路支队“改造”。后虽然“摘帽解教”回家，却在成都街头拉架架车，有人说这是共产党给王瓒绪先生 “起义”的奖励。

中共军队日夜兼程，未响一枪一炮就进入了四川省会成都。他们先驻扎在市郊天回镇一带，等待“起义”将领张罗入城欢迎仪式。那几天二师傅特别忙，与各界商议如何欢迎共产党的军队进城一事，进进出出一头汗，只不过不再穿军装。



共产党进入成都 ：被派去欢迎的人群（新华社）

大概是 1949 年 12 月 22 日，刘邓统率的第二野战大军先头部队正式入城了。上面发来通知，要各行各业派人去欢迎。当老板的都不愿意去，师傅张叔奇 也一样便派了我去。我手里挥着小纸旗，随着茶叶同业公会的欢迎人群向北门大桥走去。一街的人，一街的旗，最有劲的是那些学生哥学生姐，他（她）一个个欢天喜地笑颜逐开，像过年样的高兴，男男女女头缠毛巾腰系红绸一边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呀，呀呼嘿嘿，依呼呀嘿……”还一边唱一边扭屁股。在锣鼓鞭炮声中，刘邓百万大军骑着高头大马，坐着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来的美式炮车，威武雄壮地穿过万人 空巷，从川陕大道自北向南缓缓地流进了古城。街道两旁挤满欢迎的人群，学生、市民、工人，人人手执红旗，撕破嗓子高喊：

“解放军万岁！”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欢迎的人群中，我不知是受情绪感染，还是出自内心的喜悦，也大声喊口号，用劲拍手掌，有点近似疯狂，感到世界真的变了！

过 不了几天，成都市街上遍是挎着皮包的解放军向大家宣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政策，听众多是年轻人。一天，我凑了过头去听，可听不全懂，什么“马克思牛 克思”，“地主剥削农民”，“资本家压迫工人”、“三座大山”等等。不知是由于我的好奇，还是表情的认真，要不就是身上穿的衣服破烂，引起了一位挎皮包的 解放军的注意。他上前来拍我肩头，笑着叫我小兄弟，然后问我姓名、年龄，是干什么的。我一一如实作了回答。最后，他又问我家庭情况和茶号位址，并记在了一 个小本本上。临走前他亲切地告诉我说：“小兄弟，你家三代受苦受穷，全是万恶旧社会剥削压迫所致。共产党、毛主席就是领导穷人起来闹革命，推翻压在头上的 ‘三座大山’。你们现在翻身了，会很快富起来。像你这样的人是我们革命的依靠对象，也是新社会未来的主人。好好干，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一直走到共产主义 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我一脸迷惘不知所措。他似乎看出我心中疑惑，笑了笑耐心地解释道：“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社会，在那个社会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自由，个个平等，千家万户都过着美好的幸福生活，有汽车，有电话，有面包，有牛奶……”

“真的？”我惊喜得叫出声来：难道真有这样好的事？

“当然是真的，所以我们穷人要起来革命”他十分认真，一脸诚恳，谁也不会再有怀疑。

但是，谁能想到谁又能想到，七年后我竟成了全省以至全国的大右派，被批被斗历经 23 年的囚徒生涯，他呢？据说在 1959 年“反右倾”的运动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屈死于十年文革。唉，是我们走错了房门，还是房门本身就是错的？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六）

三、加入“组织”

那位最早给我送来“革命真理”的解放军叫王孝纯，川大学生，1947 年就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组织领导过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现在在军管会群工部工 作，任务就是发现培养革命极积分子。自此，他经常和我接触，除向我宣讲革命的道理外，还不断启发我的“阶级觉悟”，比如地主如何利用土地剥削农民，资本家如何通过工厂剥削工人剩余价值。还向我讲国民党如何反动，蒋介石如何卖国，旧社会如何不公平等。我听得十分认真，有时恨得牙响，甚至气得高喊：打倒国民党 “反动派”！打倒“万恶的旧社会”，为死去的“阶级弟兄”报仇！经过他不断调教、摆弄，我渐渐地成熟了，经常向他汇报思想情况以及一些在老百姓中流传的话 语。一次他突然问我：“有人说共产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你怎么看？”我不假思索道：“这个谣言听我们师兄也说过，我告诉他蒋介石‘反动派’八百多万‘武装 到牙齿’的匪军，都被我们‘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消灭了，还有什么‘反动势力’打不倒？共产党江山万万年！”

他听后十分高兴，夸我“立 场坚定”，“觉悟高”，进步很大，已具备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条件。我望着他军帽上红五星问：“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他忍不住哈哈地笑起来 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是革命青年人的先进组织。”我想想又问：“怎么才能加入？”他说，“你要提出申清，填写入团申请表。”我立 马道：“我申请！”他重重拍我一下肩头：“好，明天我就把入团申请书带来。”

第二天他拿来一张纸质不甚好的十六开单页纸，一面印有毛泽 东的大头像，一

面印有许多长短不一的空格，计有姓名、性别、年龄、家庭出身、个人成份、社会关系等，他不但是我入团介绍人，也是帮我填表的人，我只在申请 人一栏上写上自己名字。三天后他悄悄告诉我说：我已经正式被“组织”批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开始秘密过起“组织生活”来。在 1950 年 12 月 前党团组织活动均未公开，直到１９５１年初才开始亮相。自此我是有“组织的人”了。

什么是“组织？他说“组织就是父母，但比父母还重要。父母给予我们的是身体，组织给我们的是灵魂、是理想。有了组织就是有了伟大的母亲，我们对母亲一定要忠诚老实，什么事也不能隐瞒，要永远为她工作战斗，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此 后，他便以组织的名义向我布置各种“革命任务”，给我的第一个革命任务就是搜集街上谁人是保甲长，谁在国民党政府里做过事、当过官，以及谁家有枪只弹药等 等。也问到我们茶叶店的情况，对二师傅的事问得更详细，当的什么官？平时干些什么事？说过些什么话？骂过共产党没有？家里有几支枪？平时接近些什么人？我 一一地如实作了回答。

第二个“革命任务”是要我尽快串连同行业的茶叶店工人，动员他们起来组织工会。于是，我按照他的布置积极活动起 来，有时间就四处跑。开始师婆有点做脸做色，对我的行为表示不满，我有点心怯，向他作了反映。他说：“不要理睬他们，现在不是资本家的天下，有共产党撑 腰，怕什么？”

我心里踏实了，跑得更疯狂，一天师婆终于发话了：“师兄，你天天吃了饭不做事，没日没夜地跑，这样不太对吧？”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公开回顶道：“你不要再‘压迫’我们，现在我们‘翻身’了，八百万蒋匪军都被我们共产党消灭了，未必还怕你们资本家不成？”

“你，你，你”，师婆皱巴巴的脸气得成了棵大白菜，抱水烟袋的手在不停地发抖说：“什么你们我们的？我做生意赚钱，你是我店上徒弟，吃我饭拿我钱，难道我不能管你吗？”

我也来了气，毫不示弱地回答道：“你不要忘了，现在是‘新社会’，我们是‘工人阶级’，吃你饭拿你钱怎样，不该吗？难道你委屈了？我天天没日没夜的跑又怎样？你去告我嘛！”

师婆翻着白眼，眉毛立成两把刀，把水烟袋重重地往钱柜上一摞，用手指着我：“我塘小了，你鱼大了，养不下你，你……”

“吵什么哟”三师傅张叔奇回来了。他是个明白人知进知退，从不拿着脑袋撞崖，可能知道共产党已看中我，迟早一天会离开茶叶店的，何苦在这关节眼上得罪人，便笑嘻嘻地向我说：“你师婆是旧脑筋，多原谅原谅她。你跑你的吧，忙办工会事，师傅支持了。”

我气消了，心里好得意。我把经过向王同志作了汇报，他十分高兴地表扬我：“很勇敢，有‘阶级觉悟’。上级布置了，要我们尽快把工会筹备起来。”

就在工会筹备会成立前夕，春熙北路陆羽春茶店一位姓蒋的工人被老板解雇了，原因也是跑组织工会。我立即把情况向王同志作了反映，王同志没作过多考虑，斩钉截铁说：“这是随便解雇工人，破坏劳资关系，我们得打打资本家的威风，显示下工人阶级的力量，开会斗争他。你立即组织工人，我通知他们同业公会的理事长。”

陆羽春茶店的老板姓邹，五十多岁，是个强脾气，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斗争会选在金鱼街茶叶业公会交易市场召开，来了百十位工人，会议由我主持。按照王同志的布置，我首先指责陆羽春邹老板无故解雇工人是破坏劳资关系，是违法行为，应向工人赔礼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邹老板根本不道歉，一上台就吼就闹，说他解雇姓蒋的工人是他的权利，谁叫他吃了饭拿了钱成天乱跑不做事。参会的工人一下傻了眼，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说不出话来。我急了，只能唱独脚戏，面对面和他辩理。在辩不过他时就领着大家呼口号：

“打倒不法资本家陆羽春”

“不准随便解雇工人！”

“工人弟兄团结起来，保护我们权利！”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口号一喊，大家来劲了，有几位工人弟兄也跳上台与邹老板辩理。人多势众，声大力增，邹老板胆怯了，又在参会的同业公会罗理事长的压力与劝阻下，表示收回成命不解雇蒋姓工人。我们胜利了，大大鼓舞了士气。我成了成都市茶叶业工人中瞩目人物。不几天，在茶叶业公会任职的姐夫找到我抱怨说：“老弟，你作这事想过没有，你得罪了陆羽春邹老板，就等于得罪了全市茶叶店的老板，今后谁还敢请你帮工，还想不想在这个行业混饭碗？”

我认为姐夫思想软弱落后，没有斗争精神，反去教育他说：“你还是抱着老皇历不放，现在不是有钱人的天下了。那天要不是王同志早有规定‘只能说理，不能出手’的话，我早就会叫工人揍他一顿。”

姐夫长久久望着我一脸杀气腾腾的样子，惊得嗫嗫嚅嚅地道：“小弟，你变了，你变了……”

不久，成都市郊响起了叛乱的枪声，在龙潭寺一带尤为激烈。城外交通基本中断，物价暴涨，人民币一下变得不值钱，买东西全要银元，人心惶惶谣言纷纷，说共产党马上就要垮台了。组织上下达命令，党团员不准私自上街外出，不准向商店购买东西，随时准备战斗，为革命作出牺牲。

由 于土匪是散兵游勇，大多数穿着便衣，聚散无定，来去无踪，很难对付。王同志曾听说龙潭寺是我们师傅的老家，我多次去过那里对地形很熟悉，便决定派我去为一 个进剿的武工队（便衣解放军）带路。我没有犹豫，行前去顺城街大北茶厅向当坐柜先生的父亲辞行，他没反对只是说：“娃儿，子弹可不长眼睛，打着就没命了， 你是黄家的独苗苗啊！”我拍拍胸脯，慷慨激昂道：“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为了保卫共产党和毛主席，为了我家世世代代不再受苦受穷，纵是割下脑袋也心甘 情愿。”父亲上了点岁数，不像我那么血气方刚，考虑决定件事总是顾虑重重。他环顾左右，突然压低声音说：“我听人说，共产党天下长不了，你去拼命值不值 得？”

“爸呀，你思想怎么这样落后，国民党蒋介石八百多万匪军，都被我们共产党消灭了，几个毛毛土匪还能成事。”父亲知我脾气，一旦决定的事八条牯牛也拉不回，只好关切地提醒：“好，我同意你去，眼睛得放灵光点。”

土匪是散兵游勇，清剿的部队一开去，他们就如鸟兽散，跑得没一个影儿了，接着大部队开到四周各县，叛乱的枪声哑了下来。

回到城里不几天王同志告诉我，我的组织关系已转到一区工委工组（当时成都分为八个区，一区所管辖地段在东门锦江河内一带），我即忙去一区工委报到，组织告诉我先去七县联合办事处工作（指温江、郫县、崇庆、新繁、灌县、双流、大邑、邛崃七个县）。

七县联合办事处是个临时性机关，负责催收地主退回农民的押金和多收的租米，史称“减租退押”。我正式穿上四个口袋的灰布制服，戴着灰布鸭舌帽，腰插手枪（手枪套上还系一红绸子），每月领取旧人民币 12000 元（折合新币 1。2 元）薪金，过着供给制的国家干部生活。

从 一个学徒娃儿一下当上的共产党的干部，成了国家主人有点神气十足，工作又是出入过去从不敢问津的公馆大门，每天到地主家去催讨押金租米。地主都是有钱人住 着大房子，有的还有丫头、帮工，仍有过去气派。可我们一去他们再没有威风，就像老鼠看见了猫，说话都在打罗嗦，有的头也不敢抬。

一天我 去福兴街一个姓谢的地主“催押”，这个人过去当过市参议员见过一些世面，可在“退押”上老拖时间总是说：“小同志请放心，有钱我一定会退，纵是卖房子也得 找上买主嘛。”我叉手瞪他一眼，粗声粗气说：“谁要你卖房，把金子银子拿出来。”他笑笑：“小同志呀！要我家有金子银子早交给政府了。”我忽见里屋有几张 笑着的脸在晃动，其中有两张脸特年轻，想必定是他儿女们。我认为他们在嘲笑我，于是我在桌上一拍道：“少废话，你到底退不退？要不退今天我就把你带走。” 他沉默，既不答应退也不说不退，双方陷在僵持中，我气得不停拍桌子，一手摸着插在腰上的手枪说：“不退，就跟我到区上去。”这时两个学生哥儿走出来，陪着 笑脸说：“同志歇歇气，我们一定保证最快退还押金。”我认为是威风起到了作用，趁势缓和语气说：“你们和我一样都是年轻人，要站稳立场帮助你家尽快退还农 民押金，要下次来再不退，我走会把他带走。”这个姓谢的参议员发现我很厉害，立即放矮身架连声说：“是，是，

是。”“好嘛！”我挺着胸昂着头大摇大摆的走 了，心里却好得意：有钱有势人算什么？一付熊相。

四、有趣的意外邂逅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我的“得 意”与“荣耀”并未花费什么力气，既无“十年寒窗”之苦也无“勤学苦练”之劳，仅仅是时代骤然变迁一下得到了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东西。地位改变必然带来思 想改变，我再不象以前那样埋头做人，变得态度傲慢张狂，特别在那些有钱人面前，开口闭口总是我们共产党怎样怎样，我们毛主席怎样怎样，处处摆出一付革命的 架子。

一天我去一户地主家催讨租金，路经联升巷一座黑漆公馆门前，看见了那位昔日来去坐私包车的姑娘。她已无昔日风光与傲气，可怜巴巴 地守着一个旧货地摊。地摊是用门板搭的，两端放在条凳上，上面卖的全是些值钱的物品，诸如古色古香的瓷器陶器，貂皮帽羔羊袍，玉器手饰等。这是意料中的 事，靠收地租的有钱人家，现不但无地租可收，还得退还佃户押金，日常衣食住行，油盐柴米只能靠卖原家里值钱的东西过日子。

五十年代初摆这种地摊度日的有的是，革命嘛，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可我有点同情她，行走的脚步不自主地停下来，在地摊前久久不忍离去。我不是浏览物品，是什么说不出。也许我眼光太热，竟然使她惶恐不安，连织毛衣的手也微微颤抖，几次错了针。

天 长日久，日久天长，我每天都要在她地摊前站个把时辰，尔后默默地惬意离开，走不远又回头看，好象遗落了什么值钱的物品。也许是我看得太痴太傻的缘故吧，一 天适值地摊无人围观，她陡然仰起丰润洁白的脖子，嗔怒地盯我一眼，以极不满意的口吻问：“你买什么嘛，天天都来看，又不是西洋镜。”这不软不硬的话，弄得 我进退维谷，哑口无言，是呵，该买点什么？这地摊上的东西有哪样适合我买？为了掩饰破绽，我故作镇静地笑了笑：“来看当然就要买。”

她秀俊的脸庞上荡起一丝笑容，红得发湿的嘴唇向上一翘，白白的齿缝间冒出一句：“好吧，那就请你问买哪一样，是琥珀手镯，还是翠玉耳环？”

好厉害的嘴，嘲弄揶揄，我有点受不了，少年的心被激怒，必须反击。我溜了一遍，最后把眼珠停留在地摊一隅的那串银灰色的项链上——这项链是她常系之物，下面还吊有个小巧玲珑的红玉石鸡心，不知什么原因，此时摘下放在那里。

“就买那！”我指着那项链说。她惊得一怔，织毛衣的竹针险些掉在地上，黑眼仁盯着我一动也不动，好象在说：“你这是故意耍花招，有意刁难我。”但她却不动声色，把黑黑的长眉毛一扬，用手抓上项链，猛地送到我面前：“卖！”

“买？”我嗫嚅了，该怎么办呢？不过人的感情一经激怒，就不轻易冷却，此时的我好似一个进入赛场的角斗士，能中途退场么？买就买！“多少钱？”

“这……”现在轮到她犹豫了，是呵，一个姑娘怎能把自己的心爱之物卖给第三者，这不等于出卖自己吗？假戏快结束吧，让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谁知她不“休战”，长发一甩，继续进攻：“5 元！”

形势逼迫我不能再考虑，尽管当时五块银元是个不小的数目，我也必须如此：“买！”当，当，当，我从怀里取出五块银元，一枚一枚扔到地摊上。她此时表情复杂，进退不得，我不敢怠慢，抓起项链飞也似地走了。

自 此，我来去绕道，生怕碰上再惹出麻烦，可心里老想去她地摊前站一站，哪怕是一分钟也好！她的地摊，神秘的地摊，有股摄人魂魄的力量总是拉扯着我。大约一周 后，我远远地从此巷经过，蓦然，她叫住了我：“喂——。”无名无姓的称呼，使我停下脚步。“我的项链呢？”她走近说，声音很低很低，表情羞涩而不自然。

“我不是买了吗？”我有点懵懂，看着她不停钻地的脚尖。“不卖了，还来，这是你的钱。”她腰肢一扭，显出姑娘特有的娇态。

我瞧着她手里那五枚发光的银元，似笑非笑地：“买卖买卖，有卖才有买，哪有成交的东西叫退？退也可以，得用十元来取。”

她瞪我一眼，把一头蓬松的散发往后甩了甩，咧开小口一笑：“你比威尼斯商人还贪婪，才七天就打了个利滚利。”说到这里，她明亮的眸子一转，声音甜得像糖：“我不是叫你退项链，是叫你退鸡心里的东西……”

鸡心里有东西？我根本不知道，因为我拿回家还从来没看过，一直珍藏在箱子里，现在见她那失悔爱恋样儿，心里有股说不出的乐劲，忍不住问：“什么东西？”

“你呀，小官僚。”她脸庞绯红，越发不好意思了：“拿回家也不打开鸡心看一看，那里面有我的照片。”我一听，顿觉自己胜利了，故意放声大笑：“我，就是买的它。”

她生气了，憨嗔地把小嘴一翘道：“你真坏，快还我。”我忙收敛起笑容，认真地道：“没在身边，我回家取去。”欲转身，她又说话了：“不要去取了，你就留着吧，但有个条件，不能给第二个人看。”我应着，心里荡起一股甜丝丝的涟漪，好象得到什么。

很 快我们开始了交往，她叫王宝宜，父亲是地主兼银行家，母亲是个名门闺秀的师范学生。记得一个春暮，我们相约去公园，公园在城中心，四周环着一条小河，在楠 木林的不远处，有座假山，假山有座凉亭，遥对凉亭的是座高巍巍的辛亥保路纪念碑，除此，还有许多花草。初解放，政府来不及管理，地上遍是落叶，显得萧瑟、 凄凉。

我们沿着小路，缓缓向前走，彼此没有说话，呼吸的气流直冲对方脸庞。我很高兴，行动说话都特注意，似乎一下成熟了许多。她心跳得 厉害，胸脯一起一伏，

沿途攀折树叶，一点一点撕扯着。到了小径的深处，一排杨树遮断行人的视线，这里好静，不知名的鸟儿在枝头上唱歌。夕阳的余辉给大地罩上一层橙黄色的光环，我惊奇地发现，她太美丽了：一身合体的阴丹士林旗袍，外罩米黄色开士米外套，白套袜，小元口皮鞋，举止落落大方，说话文文静静。她的眼睛不但光泽明亮，而且饱含喜悦的光芒。

她一边走，一边细细地说："我不是穷人，有点天生的热爱共产党。你不知道，我最恨有钱人欺负穷人，当官的压迫老百姓。一次，我爸爸解雇了一个正在生病的职员，那职员找上门求情，爸爸不同意，推说银行业务不好。我在一旁劝说爸爸，业务再不好也能容下一个人。爸爸只好同意，事后爸爸向我说：天下穷人同情不完，我们做生意将本求利，不是好善乐施的慈善家。还说中国人吃饭是个大问题，孔夫子和孙中山都解决不了。"

我插言道："共产党就能解决吃饭问题，'打土豪分田地'，就为着解决穷人吃饭。"她不假思索地回道："这是暴力，我有点怕暴力。暴力要流血啊！和平一点不行么？"我认为她的话有些走题，便把新学到的一些革命理论原盘托出说："革命就是暴力，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不流血怎么叫革命！"

她纤细瘦弱的身躯，为之一颤，脸上露出一丝忧伤的苦笑。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七）

五、"运动"人民的"运动"

“减租退押”工作告一段落，城市农村忙着建立各种机构，共产党撒出大批人马，把散沙式的中国构建成为一个密不透风的钢筋铁屋。

城 里按行业组成各种工会，街道按住户编成居委会；农村按自然村组成村农会、乡农会。社会的中空地带又有青代会、妇代会和各种学习班、训练班以及名目繁杂的群 众团体。一句话，偌大的神州再没有个人自由活动的空间，一切全网路在政治利益的圈圈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纵是走动一步也得向你所在的“组织”请假，步行 十里必须有“组织”开出的路条（即盖有红戳的身份证明）。哪儿不是眼睛？哪儿不是暗哨？村村有关卡，处处查证明，别说“特务”、“反革命”，就是狐狸、野 兔也无法藏身。

一天王同志向我说：“小黄同志，革命形势发展得太快到处都需要干部，第三期‘革大’马上就要开学，你能不能介绍几个你最 了解的工人同志去参加学习。”我认为这是组织对我的相信，感到十分高兴立即应承下来。王同志又说：“去的人一定要历史清楚，拥护革命，拥护共产党，决不能 让坏人混进去。”我经过慎重思考将南门大桥边万寿合茶叶店的龚得明和冻青树街尹长发茶叶店的王洪寿推荐到“革大”。这两人在“斗争”陆羽春邹老板时表现得 特别勇敢极积，在我离开茶叶业工会后仍经常向我反映情况，好像是我的门徒一样，去到“革大”后每周休息都要专程来看望我。我觉得自已不但有了同伴，还为壮 大革命队伍出了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态，喜欢培植自已势力，团伙帮派就是这样形成的。

1950 年 9 月，区工委派我到纱帽街一带组建居 民委会，作法是首先摸清情况，发现积极分子，居民委员会委员一定是拥护共产党拥护革命的。这一个地段我作小孩时就混得烂熟，其中有个极积分子竟是当年成德 小学高四班大我三岁的女生邬邦顺。她不认识我，我可知道她。她家是开设织绫厂的有钱人，父亲算是开明人士。他家住在一个大院子里，房子宽大凡开会总是在这 里。她父亲很支持我们的工作，一见开会就忙着摆桌椅板凳烧茶送水，邬便担任义务招待员。有次在她家闲聊，她父亲笑容可掬地说：“我是信上帝的，喜欢共产 党，他一来地方上的恶人收拾了，现在做生意再不受气罗!过去常常遇上买了东西不给钱的人，今天谁敢？”

那时政治运动打击的对象主要是国 民党“反动派”和地方上的“恶势力”，城市里只有“管制分子”，没有“地、富、反、坏”一说。何谓“管制分子”就是指在国民政府时代，参加过“中统”、 “调统”、“军统”组织的“特工”人员。这些人里面好些都是小老百姓，临解放时国民党招马买马，一些做生意的小商小贩为了不受欺悔，花上几个小钱就可以买 个“公事人”的护身符，还有持枪证，谁知一下子竟成了臭名招着的“特务”。

中共建政后公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号召有历史污点的人应 主动向公安机关“坦白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这些人纷纷去自首登记，因罪恶不大或根本没有罪恶，不属于逮捕对象，只需定期去派出所汇报思想，接受“特口干 事”（专门管理特种户口的户藉）的训示，这些人通称为“管制分子”。

由于不以政治立场划线，人和人的相处十分团结，广大的工商者还是保护对象。根据政策在居民委员人选上，我认为她父亲是最好的对象。

有次我去邬邦顺家找她父亲商量工作，谈话中透露出我和她原有的同学关系，她惊喜得叫了出来：“黄同志，你是成德的！你怎么一下成了共产党干部？你不是党员也一定是团员，对吗？”

我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因为那时党团还未公开，属于保密范围，共产党“组织纪律”特别严格，凡不准说的事纵是面对妻子、父母也不能说，如说了一经查出，便是违反“组织纪律”，会受到很严厉的处分。

她 见我不明确表态便把话题转到一边说：“同学，哦，黄同志，我好想像你一样‘参加革命’哟，当个共产党干部，成天跑跑颠颠啊。”我成竹在胸笑笑道：“欢迎！ 欢迎！但首先要接受‘组织对你的考验’，对革命对党要有认识，当前就是要协助政府建立居民委员会。”接着，我把王孝纯同志对我讲的那翻大道理，依样划葫芦 地告诉了她。她也听得来如痴如醉飘飘然起来，不停地自言自语说：“共产主义社会真好，我一定革命一辈子！”

不几天“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了。“反美”、“抗美”立即成为建立居民委负会的中心工作。用“抗美”来推动居委会的建立，用“援朝”来“揭发美帝国主义侵华罪恶”。我们没日没夜的成天 开会，发动群众深入揭美帝侵华的罪恶材料。哪怕是捕风捉影到的一星半点，就立即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控。


仇视、鄙视、蔑视美国侵略者的抗美援朝宣传教育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比如一个老太婆说平安桥街天主教堂育婴堂修女如何虐待孤儿，打骂孤儿，我们如获至宝根本不去调查核实，立即动员老太婆去会上揭发，我便代表政府给予充分肯定和表扬。揭发控诉会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热烈，越来越邪门。

一 个妇女立即站起来说：“美帝国主义在平安桥开办的育婴堂不是做好事，是在残酷地‘剥削压迫’中国人。我亲眼看见他们不给孩子吃饱，很小就叫他们做苦活，生 了病不给治，一个个瘦得像骷髅，死了没棺材装，在北门磨盘山上挖几个大坑，几十个几十个的窖在一起，有的还未死便撒石炭、塞棉花，呜呜呜，好惨啊！”她话 刚完又一个在街头卖青菜白菜的小贩说：“天主堂内有个圣母军组织，它们专门刺探中国的各种情报，还把中国人骗进去取血、抠眼睛，送回美国去作人体试验，还 破肚子砍脑袋……”会场顿时群情激奋，一遍怒吼的口号声：“打倒美帝国主义！”、“揭露美帝国主义的罪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接着又有人站起来揭 露说：“美国大兵一个个都是衣冠禽兽，打着帮助中国抗日的旗号，实际是侵略中国，压迫中国，剥削中国，更可恶是强奸中国妇女。一次在福兴街我亲眼看见几个 美国鬼子强奸一个中国妇女，那个被奸的中国妇女全身都是血……”

这些控诉者一个个绘声绘色，声泪俱下，说得有鼻子有眼睛，令人相信无 疑。第二天共产党的喉舌《川西日报》大版大版地，把全市各街道揭发出来的事情不分真假如数刊登出来，相互渲染，来回传播，很快使人民反美情绪达到高潮，而抗美援朝的歌曲“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遍及街街巷巷，家家户

户，曾支持过中国抗日的美国政府，成了过街老鼠鼠人人喊打。

谎言改变了历史，造谣污染了良心。

一 天夜里我回区工委，邬邦顺顺道同我走了一段路程，在没人的地方她突然问我："黄同志，我觉得会上揭发出的那些事情有点不实在，美国人不会有那样坏吧？帮我 们抗日可是真的啊！你还记得不，在抗日胜利后的第二年，我们高年级学生没花一分钱，一人领了一套罗斯福呢的卡叽布童子军衣服……"

我想 了想说："这又是美帝国主义一桩侵略的罪恶，送衣服是，是……"我拍着脑门搜索枯肠，竭力找出一个适合的词儿，搜索半天终于找了出来"是，拉拢收买腐蚀我 们中国儿童，比杀人放火还毒，你明天赶紧站出来揭发，这是你投身革命最好的表现。"邬邦顺显得碍难，我不住打气道："你只看到表面，没有看到美帝国主义实 质。现在正是你献身革命的时候，一定要站出来控诉。"第二天开会她没有来，我去问她父亲，她父亲客客气气躲躲闪闪说："她外婆病了，回乡下去了。"我心里 很不满，认为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临阵脱逃，自然把她父亲那个候选居民委员的资格取消了

在我们不断煽动、启发、诱导下，一些人不再是善良的人，一个个全成了制造虚假事实的"作家"。我们才不管这些，要的是群众反美情绪。

这个情绪达到沸点的时候，我们立即趁热打铁，发动大家捐献和动员参军，使得"抗美援朝"的高潮一个接一个。那生动的捐献场面真使人热泪盈眶，感同身受，捐献出来的金子银子，珍珠玛瑙，就像倒豆子样的哗哗哗地往捐献木箱里倒。

我 发现当人的感情被欺骗左右，什么愚蠢的事情都会做得出来。我们供给制干部没有什么捐献的，主动将每月薪贴的一半（旧币 6500 元）作为长期"抗美援朝"。在居委会成立后又逐家逐户发动群众订立"爱国公约"，内容主要是"防奸（细）防特（务），向政府检举揭发各种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增产节约计划"。

斗转星移，岁月沧桑。五十多年后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发展，资讯的畅通，历史的解密，我们才获得所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场战争的全部真相：这场战争不是美国侵略朝鲜，是北韩寻衅侵略南韩，挑起了这场血腥的战争。

二 十世纪初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在二次大战后，被沿着北纬 38 度线一分为二，南边驻扎美国军队，北边驻扎苏联军队。1949 年 3 月，北朝鲜首相金日成看见 中共军队就要夺取全中国了，着急了，到苏联去想说服史达林帮他打南朝鲜(南韩)，可是被史达林拒绝。于是金转求于毛，毛明确表态支援，说等他拿下全中国再 开战。毛说北朝鲜"最好是在 1950 年上半年举行全面进攻。"毛着重说："如果必要，我们可以悄悄派些中国部队给你们。"中、朝两国人肤色一样，美国人 "认不出来"。

不久毛有了改变，他要公开同美国作战，目的是想从史达林那里拿到最先进的武

器：我帮你打败你的敌人美国，你给我军事工业 和势力范围。毛之所以敢打，因为他拥有千百万可充当炮灰的中国人。他相信美国不可能跟他比赛死人，他不会被打败。打朝鲜战争还给他提供了一个处理上百万在 国共内战后期投降的国民党部队的办法：把他们大量派去朝鲜。

史达林获悉金、毛之间的联系后，苏联驻平壤大使什特科夫(TerentiiShtykov)又于 1950 年 1 月 19 日电告史达林：金日成很激动地请求允许他发动进攻，强调说，毛曾向他许下诺言，中国战争一旦结束就来帮他的忙。

１ 月３０日，史达林叫什特科夫告诉金日成说“可以帮助他。”这是第一份史达林同意发动朝鲜战争的文献，史达林改变主意是因为毛要参战。两个月后，史达林把金 日成召来莫斯科，对他说：“中国人现在可以专心对付朝鲜问题了，我们有了成败攸关的条件-——北京的支持，我们可以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统一朝鲜了。”

从 50 多年后所解密的材料中我们还获悉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卡里约(SantiagoCarrillo)的讲话：金日成曾对他说，朝鲜战争是金发起的，毛比史达林更早、更坚决地支持他。

金 日成同史达林制定的计划得到毛的认可，史达林 5 月１６日来电最后点头。6 月 25 日，北朝鲜的军队越过 38 度线，侵入南朝鲜。美国总统杜鲁门迫于形势 27 日 宣布派兵入朝。同时他增加了对正同越共打仗的法国人的援助，改变了对台湾的“不干预”政策。由于这一政策改变，毛和他的后继者们都只能对台湾隔海兴叹。

8 月初，北朝鲜军攻占了百分之九十的南朝鲜。美军增援迅速赶到，9 月 15 日在 38 度线以南的仁川登陆，把北朝鲜军截为两半，紧接着准备向北进攻。29 日，金 日成急电史达林，请大老板叫中国派“志愿军”。10 月 1 日，史达林告诉毛：履行诺言的时刻到了。他委婉而客气地下命令：“据我看，如果您认为可能派兵援朝 的话，您应该起码派五、六个师向 38 度线进发，他们可以称为‘志愿军’。”

毛马上作出反应。10 月 2 日凌晨 2 时，他要已经派到中朝边界 的部队，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10 月 2 日，毛起草了一封给史达林的电报，说他“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这之后他意识 到自己一向对出兵显得太积极，从未谈过困难，不利于同史达林讨价还价。毛压下已起草的电报，发给史达林另外一封，故意表现得犹豫不决，说：“中国出兵多半 会带来极严重的后果”，“多数同志认为对此持慎重态度是必要的。”“因此，目前最好暂时不派出军队。”毛又怕史达林把他的话当真了，特地说：“我们尚未作 最后决定，希望能同您商量。”

10 月 5 日，联合国军队已经推进到了朝鲜北部，史达林对毛感到有些不耐烦了。他回答毛那封“暂不出兵”的 电报说：“我上次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的中国志愿军，是因为我很了解，中国领导同志作出过一系列声明，说他们准备好了派

几个军去支援朝鲜同志。”毛只是想 抬高身价。收到史达林的这封电报时，他已经指定了入朝总司令彭德怀。10 月 8 日，他下令组成“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当天电告金日成：“我们 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他同时派周恩来，林彪到苏联，向史达林要武器。派强烈反对出兵的林彪去见史达林，毛有他的用心。他想让林彪对史 达林多说，说够出兵的困难，以便从史达林那里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

周、林于十月十日到达史达林在黑海畔的别墅，当晚谈了一夜，直到黎明 五点钟。史达林答应卖给中国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周恩来连价格也没问，不管多少都非买不可。史达林曾许诺派“一个空军师，124 架飞机，提供空中 掩护。”可现在他忽然说派不出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要等两个月。没有空军掩护，志愿军只好在地面上等着挨美国飞机炸。周恩来、林彪坚持说苏联空军掩护 决不可少，争来争去史达林也不松口。最后，史达林打电报给毛说：中国不必出兵。史达林这是在将毛的军，明知毛想出兵，非出兵不可。果然，毛马上就不争了， 说：“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10 月 13 日，他打电报给周恩来：“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周恩来看完电报后，一言 未发，双手抱着头，陷入深深的沉思。毛怕周不把他的意图传达透彻，双管齐下，通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中国一定出兵。

中国，就这样在 1950 年 10 月 19 日被毛投进了朝鲜战争。中国“志愿军”入朝参战时，金日成正败得一塌糊涂。两个月后，“志愿军”把联合国军赶出了北朝鲜。金现在说话 不算数了，毛在朝鲜有 45 万人，是他 75000 残兵败将的六倍。12 月 7 日，“志愿军”收复平壤，金把战争指挥权交给了中国人。“志愿军”不久攻占南朝鲜 首都汉城(首尔)。史达林给毛贺电的热度远远高过对毛夺取中国的祝贺。史达林还特意指出，毛的胜利是“针对美国人的。”

中国的胜仗代价 沉重。彭德怀 12 月 19 日报告毛说：“大衣和棉鞋多数未运到，棉衣、被毯，多被敌机燃烧弹烧掉，不少战士穿单鞋，甚至还有部分人打赤脚。……目前正值大 雪，气温已降至零下 30 度，战士在体力削弱，冻坏脚者无法走和沿途露营情况下，可能发生不可想像之损失。”1951 年 1 月 2 日，中共负责“志愿军”后勤供 应的李富春告诉苏联人，有的整支部队死于严寒。“志愿军”打仗靠“人海战术”，用他们的唯一优势——人多，去跟西方的炮火拚。英国名演员麦可·凯恩 (MichaelCaine)曾在朝鲜战场作战。他告诉我们，他出身穷困家庭，刚去朝鲜时对共产主义颇带同情，但战场的经历使他从此厌恶这个制度。他亲眼 目睹中国士兵像大海波浪般一潮一潮地往前冲，用身体消耗西方的子弹。他当时就想：他们连自己人的生命都不顾惜，我怎么能指望他们关心我呢？

中 国军队的胜利没能持久，1 月 25 日，联合国军队发动反攻，形势逆转，中方的伤亡极其惨重。2 月 21 日，忧心似焚的彭德怀赶回北京去见毛，向毛讲述朝鲜局势 如何严重。毛听后说：“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几天后的 3 月 1 日，毛泽东向史达林陈述了他的作战方针：他准备用中国的人 力来跟美国拚消耗。“在过去四个战役中，中国‘志愿军’战斗的和非战斗的伤亡及减员已超过 10 万人，正将补充老兵新兵 12 万人；今明两年

准备再有伤亡 30 万人，再补充 30 万人。”“总之，”毛说，“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

中国军队一入朝， 毛马上行动起来，向史达林要军事工业。他派他的海军司令去莫斯科谈海军建设问题。跟着去的是谈判建立航空工业的代表团。在航空工业方面，毛相当成功，莫斯 科签订了协定，帮中国建工厂，先修理、维修飞机，再在三到五年内过渡到制造，届时年产 3600 架歼击机。轰炸机的制造也在讨论之中。中国在朝鲜战争结束时 拥有世界上第三大空军，有大约 3000 架飞机，包括先进的米格机。

1951 年 5 月，毛派总参谋长徐向前率“兵工代表团”到苏联去索要中 国在朝使用的各种兵器弹药的制造蓝图，要求苏联帮助建设军事工业。代表团提出买 60 个师的武器装备，对此史达林满口答应。但建兵工厂就不一样了。徐向前 说：一连数月，“兵工生产问题迟迟不见复，我着急得很，左催右催，没有结果。”徐发电报问毛怎么办，毛复电说：不管怎样，耐心等待。最后，苏联只同意转让几种兵工技术资料，其他的一概不谈。

这时朝鲜战争已经打了一年，美国空军把北朝鲜炸得千疮百孔。金日成眼看着他将来统治的会是一片废 墟，面积可能比当初的还小，他急于结束战争。1951 年 6 月 3 日，他秘密到中国，建议同意联合国早已提出的停战谈判。毛不想停战，史达林还远远没有满足他 对军事工业的要求。但他不反对临时停火。“志愿军”这时正吃败仗，急需喘口气。毛派东北负责人高岗同金日成一道去见史达林，既谈临时停火，也催帮助建设军 事工业。史达林谈完后打电报给毛，避而不提军工，只说了句让毛开心的话，把金日成视为毛的部下：“今天见到了您在东北和朝鲜的代表。”史达林同意临时停 火。朝鲜停战谈判在 7 月 10 日举行。

几个月内，大多数问题都很快解决了，毛和史达林扭住一个问题不放：战俘遣返问题。当时联合国军手上 有两万中国战俘，大部分是原国民党官兵，不愿意回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去。美国基于二战结束后战俘遣返带来的悲剧（当时西方送归史达林的许多战俘，后来均 被史达林杀害或监禁），故坚持自愿遣返，毛要全部遣返，命令谈判代表：“一个也不能放！”这一句冷酷的话使朝鲜战争多打了一年半，中国多死了几十万人，朝 鲜死的人更多。

边谈边打一年以后，1952 年 7 月 14 日，一度信心百倍要征服南朝鲜的金日成，给毛发电报，哀求毛接受妥协，结束战争。 美国轰炸下的北朝鲜，就像美国国务卿腊斯克(DeanRusk)说的：“再没什么东西可炸了。”北朝鲜人口降到生存线之下，大约三分之一的成年男子死亡。 毛当即给金日成回电拒绝。“不接受敌人（自愿遣返）的提议只有一个害处，”毛说，“就是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多死些人。但是……”毛接下去在“但是” 后面大做文章，说死人有好处：“锻练了人民，使他们获得了与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经验。”回电结尾处，毛说他要向史达林报告，看大老板怎么说。金日成怕大老 板看出他不坚定，不等毛通知他史达林如何作答，即刻给毛回电，说毛当然是“正确的”，他自己也决心打到底，只请求再给他些军援。金同时主动发电报给史达 林，可怜巴巴地解释他为什么动摇。史达林在 17 日给毛回了封两行字的电报：“我们认为您对停战

谈判采取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们接到平壤的报告，金 日成同志也赞成您的立场。”

战争，就这样继续了下去。然而，当史达林一死，苏共新领导人上台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53 年 3 月 21 日，以马林科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人与周恩来开了一夜的会，对周说他们决定结束朝鲜战争，要是毛合作的话，他们愿意卖给毛 91 座大型军工企业。这些都是史达 林迄今拒绝出售的。但毛不停战，他想要的一样东西还没得到：原子弹。

5 月，苏共新领导人给毛发了“最后通牒”，因为这时的苏共领导人一 心要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毛知道他得不到原子弹了，答应了苏联的条件，无可奈何地通知停战谈判代表接受美国方面坚持了 18 个月之久的自愿遣返战俘的方 案。1953 年 7 月 27 日，朝鲜停战协议签字。这场历时三年、导致数百万人死亡、不计其数的人伤残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这场大战打下 来，金日成一寸土地也没拿到，他的国家反而变成一片焦土。毛泽东得到什么？势力范围的扩大，航空工业的起步，和苏联签了几十个军工项目。然而，可悲的是却 付出了上百万条中国人的生命（据苏联官方档统计）。一贯只图目的，不择手段、视中国人民的生命如草芥的毛泽东不惜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推到朝鲜的土地上，去 做了异国他乡的野鬼孤魂。

历史的真相无可置疑地告诉我们：一、挑起这场战争的元凶不是“美国野心狼”，而是北朝鲜头目金日成。（金之所 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与大老板和二老板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二、这是由中共出钱出人，苏联出枪出炮出飞机合伙进行的一场战争。也是在二战后，以苏联为首 的共产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一场较量。三、史达林和毛泽东都想通过这场战争来攫取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从史达林的角度看，第一他可以 做军火商。第二他可以试验自己的新式装备，特别是米格飞机，还可能获得某些美国军事技术。第三他可以摸摸美国的底，在跟共产主义阵营对垒上，美国到底能走 多远。但最使史达林动心的还是中国人能消灭并牵制大量美国部队，使世界权力平衡倒向对苏联有利的一边。史达林的全球梦包括在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若干欧 州国家夺权。毛泽东则想通过这场战争从苏联那里获取大量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先进军事装备，并引进军事工业专案，甚至原子弹；另外，当一当亚洲共产党国家 的老板。为此，他们之间既相互勾结，又相互利用；既相互狼狈为奸，又相互尔虞我诈。在这场战争中，虽然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获得的东西并不多。因为，史达林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尽管他口头上说了不少的漂亮话，什么“中国一定要很好地武装起来，”“中国一定要成为亚洲的旗舰。”但一直到死时，也没有对周 恩来交给他要求援建 147 个军工专案的单子点头。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八）

第三章 新的世界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新的世界里，一部分人欢欣鼓舞，一部份人愁眉苦脸；一部份人趾高气扬；一部份人胆战心惊；一部份人饮泣吞声，一部份人高歌猛进！这就是马列主义丶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

一、成都大逮捕之夜

“朝鲜战争”爆发后，祥和安定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一时谣言骤起，人心惶惶，说“美国要从朝鲜打到中国来” 、“国民党借朝鲜战争反攻大陆”丶“在东北牡丹江已挂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等等，何况在四川的川西北边远地区，仍有小股土匪武装在负隅顽抗。因此要 “抗美”就必须镇压国内残余的反动势力。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国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１９５１年3月的一天，区里接到紧急通知，要抽调十多名党团员去市公安局开会。开什么会未作说明，只说有重要任务。开会地点是一座地主的大公馆里，我们去时已有下少人，大家分散在几间办公室里待命，思想显点极度紧张。

午饭后两点，公馆关上大门，不准任何人进出，到了下午四点公安局的人和其他单位一些不认识的人陆续来到，门前和窗台边堆放许多麻绳，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窒息的压力。大家表情各异，脸上互呈猜测，可又不敢打听，只能屏心静气耐着性子打扑克等候。

到 了晚上10点后，所有人员集中到大会议室开会，人齐后便将门窗关闭，各处还有人把岗。不一会儿戴局长披着棉军大衣，嘴上叼着香烟，一脸严肃拉长声音向大家 宣布开会，他首先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说：“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打垮了国民党蒋介石八百万匪军，解放了全中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可是 失败了的敌人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借着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的机会，一些潜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伺机作乱。为了保卫我们的红色政权，支援‘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战争，今晚全市要进行大逮捕，你们就是参加执行大逮捕任务的同志。对反革命分子我们决不能手软心慈，对他们手软心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所以要 坚决打击，全面镇压。”

接着，公安局另一个头儿讲话，他除了讲今晚开展大逮捕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外，还讲了逮捕人的一些具体技术问题，以及如何处理紧急情况。然后宣布纪律和编组，还说，“如有反革命分子敢于公开反抗，立即开枪击毙。但一般情况，不准开枪。”

我 听后心里好激动，为党和毛主席立功的时候到了！但又有几分恐惧，万一敌人开枪打死我怎么办？管他的，为革命牺牲很光荣，不然怎么叫革命？下夜两点，我们按 临时编定的小组出发。每个行动组为三人，配备一名公安户籍（现叫片警），被逮捕的人都有资料，如姓名、性别、年龄、特征，所住街道的门牌号。我们每人袖口 上扎上白布条为行动记号，口令是“胜利”。

初春的成都还有点寒意浸骨，冷风嗖嗖，街灯昏暗，熟睡中的城市没一点声音，各个街口都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执勤，杀气腾腾，一片肃然。街头巷尾的流浪狗，一见有人就唁唁的叫个不停，好象要把这秘密告诉第三者。我忍不住骂：“叫什么，再叫老子给你一枪。”

我们行动小组的任务要逮捕 11 名反革命分子，8 个国民党伪军官，三个蒋介石特务，据说特务藏有枪枝，大家紧张极了，怀着一拼的牺牲精神。我们人人提着枪，拿着绳索，按户籍资料逐门搜捕。

先由派出所户籍以查户口名义赚开门，我们再持枪冲进屋，拉亮灯大声喊：“不准动、举起手。”真顺利，竟无一人反抗，就像笼子里抓小鸡那么轻而易举。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一个个反缚双手，五花大绑地押到所在地派出所集中，凌晨 5 点由指挥部派汽车来收取猎物。

这 些人规矩极了，灰脸低头一付狼狈样，连眼睛也不敢乱看。但在逮捕一个国民党军官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他们夫妇两人，一直跟随国民党从南京逃到广州，又从 广州逃到重庆，再逃到成都，本来要逃到台湾，但他太太挺着大肚子无办法再跑，只好留了下来待产。我们去抓他时，他跪在地上不停磕头求饶，大喊长官手下留 情，宽限几天，等太太临盆了再抓，或到时候他到指定地点投案。我犹豫了，一个老区来的姓王的老革命、也是我们行动组的组长，横看一付吊角眼，大骂道：“妈 的，就是马上生也要抓你，看着干什么，给我捆起来！”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可这是革命啊！我们走了好远，还听到那女人的哭叫声：“共产党！毛主席！宽大宽大 我们吧？我们不敢反对你们哟！”

完成任务后我们来到集中地，将这些五花大绑的反革命分子像装卸货物样塞上汽车，送到宁夏街四大监关了起 来。直到凌晨 7 点全市才解除戒严。第二天《川西日报》上登出消息：“成都一夜抓捕反革命分子 1687 人，彻底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我们郑重告诉 一切潜藏下来的反革命份子，只有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则将遭到严厉的打击。”

三天后，姐夫张贵武悄悄来到住地找我，在 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他小声问我：“小弟，你二师傅被抓了，你知道不？”我有点诧异：“他不是起义军官吗，为

什么抓他？”姐夫看着我眼睛说：“无论怎样说， 他总是师傅，磕过头的师傅啊！俗话说：一日之师，终生不忘。你没有检举他嘛，要没有更好，今天你师傅张叔奇托我找找你，看他关在什么地方？好送送东西，这 点小事，你是公家人能帮吧？”我一时语塞，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但我能说，我没检举过师傅，但想到一年前王同志问过他的情况，难道就是那几句不满的话么？这 一想心里有点不安，骤感两腮发热，不知是出于内疚还是敷衍，即忙说：“二哥，我一定去打听打听，但不晓得打听得到不。”

那晚区工委开会 研究下一步如何深入发动群众，继续揭发检举反革命分子，保护革命胜利果实。会议结束时，区工委书记王成同志特别提醒大家，说：“现在情况复杂，敌人通过各 种方式和管道搞破坏活动，大家注意：一是安全，一是保密，不该接近的人不要接近。”我觉得这话好象针对我说的，背上直冒冷汗，第二天不敢去打听二师傅的下 落，纵然打听又能打听出什么呢？

二丶大镇压大屠杀的日子

毛泽东说：不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社会基础，革命不会巩固。不 杀反革命分子不足以平民愤。大逮捕的十天后开始大镇压。，第一批杀了 148 人；第二批杀了 56 人。此后，隔三五天杀一批，均在 10 至 20 人以上。那一批批 杀人的布告贴满大街小巷，整个城市处在从未有过的恐怖气氛中。夜里小孩若不听话老是哭，父母只要说一声“拿枪的解放军来了”，孩子立刻收泪止声，连哼也不 敢哼一下。在这大镇压大屠杀的日子里，人人循规蹈矩，成都市面上连个吵筋闹架的人都没有，谁不怕掉脑袋？

被杀的人多是国民党时期的军政人员（军丶警丶宪丶特）和地方上的“恶势力”（乡丶保丶甲长以及哥老会的头目），故根本无审讯起诉一说，全是根据事先 搞好的材料，用手写出的布告，把他们从监狱里拉出来对上名字丶照片，也不脱衣服，也不赏酒饭，立刻五花大绑，插上死标，甩上刑车（不是押上，因为一部刑车 要装 20 余人，四周还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只能人重人的堆放着），即向成都市北门外 20 里之遥的磨盘山驶去。

磨盘山是个乱葬坟，树林茅 草一眼看不透，选这地方作刑场纵然杀个几千几万

也好处理。两天前这里就挖了许多土坑，一个土坑可以埋上十多具尸体。刑车到了磨盘山一字儿排开停下，众多的 解放军在四周围已早早地布下警界线，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寒森森的刺刀，冷毖毖的枪筒，架在高处的机枪，在警界线外是农村武装。囚犯从刑车上一个个被甩下 来，然后由两个解放军提着胳膊飞快地跑向指定地点。

20 人为一批，齐崭崭地跪在地上，站在他们身后不足五尺远的解放军，端着步枪瞄准着 射击的脑袋。监刑官一声哨音：预备；二声哨音：瞄准；三声哨音：扣动扳机，嘣的一声，被杀者脑袋开花。杀人的子弹均是开花弹，一枪一个真利索，死者虽属痛 快，但半截脑壳不见了。有的还没有脑袋了，人变成了一个木桩桩。共产党来前就有人说，“共产党来了要开红山（指大肆杀人）”，谁也不相信，现在我算亲眼看 见了！杀第一批 148 人时，我执内勤距刑场最近，那没头没脑的尸体一大片一大片，白白的脑花，红红的血水，流成一条条的小河，半匹山的山坡看不到绿草，泥 土变了一个颜色，难闻的血腥味直冲鼻孔，令人目昏头眩，真叫惨不忍睹！惨不忍睹。

批量性的大屠杀之后，变为小批量的屠杀。这种小批量的 屠杀在于“打击敌人，教育群众”起到杀一儆百的警示作用。其不同之处是每杀次人就要召开上千上万人的公审大会，地点多在少城公园。被公审的人均是五花大绑 的捆着，那捆在身上的绳索快勒进肉里，每人胸前挂着块写有本人名字、画上红×××的大纸牌，低头弯腰一排排地站在公审台前，受害的苦主站在台上一声声一字 字，揭发控诉他们有过的罪行。被激怒的参会群众不断地呼喊口号，内容多是“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捍卫革命胜利果实，支援抗 美援朝！”、“坚持要求政府镇压反革命 xxx！”，然后是“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记得最清楚的是公审前国民党某地区专员冷寅冬， 因发动暴乱，不归顺共产党，俘后不认罪。公审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组织发动暴乱？”他说：“共产党是乱党，用暴力颠覆了合法的国民政府，所以 我要反对他。”又问：“你当伪专员期间贪了多少污？”他说：“我不是伪专员，是中央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我贪不贪污你们管不着，今后你们共产党比国民党会 更贪污。”他侃侃而谈，显得很从容。

还有西门同兴社总舵把徐子昌，东门青龙公总舵子黄亚光，两人是上通官府下拥几千条枪的黑势力把头， 解放后拒不与共产党合作，支持兄弟伙打解放军。公审他们时昂头挺胸不倒威，一副好汉样子。再就是何本初与夏斗枢。何是茂县专员，解放初宣布起义，1950 年 4 月为首成立“反共救国军指挥部”，率众举事被捕，公审杀他时也是威风不倒，还说“为党国就义死得光荣。”夏斗枢当过杨森部队的副军长，是川西地区组织 指挥起事的主要头头，和共产党周旋了几个月，先后打死上千个解放军，公审枪毙他时表情从容，没叫喊一声，显得极为镇静，说：“两军交战各为其主，人生天地 死而无怨”。

对大杀特杀反革命分子，我没有半点同情或怜恤，认为该杀、非杀不可，似乎还觉得杀得不够，应该再多杀一些，才能保卫我们的红色政权。

不 过有件事却使我感到置疑。1949 年中共进城前夕，我姐夫与四人合股在安乐寺对面（今成都人民商场）开了一家很大的茶馆叫“大北茶厅”，其中一位合股人姓 胡，我叫他胡先生，住在少城一带。胡先生一生好色，为保护生意不受人骚扰，临解放花钱买了个国民党调查员的头衔（简称调统，解放后共产党将它列为特务组 织）。解放后共产党为瓦解国民党残余势力，采取了一手软一手硬的政策：硬，公开抓捕；软，号召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主动向人民政府登记自首，坦白交待 罪行。胡先生率先响应号召，第一个跑到派出所登记，时称“自新人员”，属于管制对象。可是胡先生并不知道此身份的严重危险性。仍我行我素过他逍遥自在生 活，拈花惹草的坏德性仍不改，没事上街去“吊膀子”（即在街上调戏勾引不认识的女人）。在镇反阶段，一个晚上他在祠堂街闲逛，突然看见一位漂亮女人，即上 前搭讪调情。那女人不反抗以笑相迎，叫跟她走。胡先生以为找到了便宜货，喜出望外地尾追于后，结果进了公安局。原来这位漂亮女人是军管会的特勤人员，认为 他不是“吊膀子”，是在搞暗杀，加上身份特殊，便成了“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三天后即五花大绑地拉出去，毙在昭觉寺后面的树林里。他家人不 敢去收尸，托我去看一看。在一丛楠木树下，我看见他老兄长伸伸地躺在树下，身上还穿着毛料长衫，腕上还戴着手表，只半边脑袋不见了，那铁丝勒过手腕的痕印 深深可见。按说这是错杀，谁敢去伸冤？在那特定环境，杀个人象杀只鸡。

在农村，工作组长就有批准的权力，后来逐步收上去，到土改时杀人 权力控制在县上，但工作组仍可抓捕人，只需动过嘴，武装（即民兵）就去执行。我听得这么个近似笑话的故事。那时宁夏街关的人太多太多，来来去去像赶场一 样。走的去了杀场，来的新抓的反革命。监狱里不准看报纸（当时每杀次人或开公审会，报纸上登有消息），封锁了大镇压的消息。监舍里每走一个人，大家都拱手恭贺，以为得到宽大。那天也是这样，一个姓李的被叫出去，同舍人免不了恭贺一番，托这托那忙得不可开交。可没两个小时他又被押了回来，一脸煞白，浑身软得 像块糍粑，四肢不停哆嗦颤抖，裤裆全尿湿了。他无声无语地躺了三天，后才告诉同监舍人，他一出去即被两个解放军五花大绑捆上，背上插上死标。他吓昏了，屎 尿流了出来。约莫过了一个多小时，有当官的（可能是监刑官）拿着照片叫名字对，原不是一个人，才把他放回来。自此大家才知道，关在这里是一群送宰的猪，凡 叫出去的都去了昭觉寺（当时成都杀人的地方）。自此吓得茶饭不思，但仍逃不了死亡命运。

三、毛泽东的“杀人指标”和杀人策略

毛 泽东为什么要大张旗鼓搞这个大镇压，是否是为了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巩固红色政权？六十年后一个月明风清之夜，翻读了毛泽东有关历史文稿，才知道事情的实 质，他说“当杀者，应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监禁，加以改造。对于这些案件的执行，必须公布判决，在报纸上发布消息（登在显着地位），并采 取其他方法，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所以说“镇反”既有胜利者复仇因素存在，但更主要是为了独裁政权的建立，需要铁血统治。所 谓的镇反，根本不是被动的防御，更不是为了政权的巩固，是

中共在取得政权打垮了国民党后进一步打击民主力量。用他的话说“矛盾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建政后 中共的主要敌人已经不是国民党，而已经是第三条道路者，独立知识份子和所有普通的人民了。毛泽东相当了解，这种大规模镇压行动，不仅对反共的旧势力会有强 大的震慑力，而且会对广大基层民众起到一种相当形象化的政治教育的作用，会极大地树立起新政权的政治权威。对于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一点特 别重要。所以他硬性规定了全国的“杀人指标”：“农村千分之一，城市千分之零点五。”

1951 年 1 月 21 日他要求上海“在今年一年内， 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文稿》第二卷第 47 页）1 月 23 日他又在电报称：广西省“三个月中，正确地杀了匪首惯 匪及其它首要反动分子三千余人，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第 62 、63 页）1 月 24 日毛泽东给各中央局书记电报，指示“应当放手杀几批”。（第 70 页）2 月 8 日电报指示：“应杀者均杀之。”（第 112 页）2 月 25 日指示北京市“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第 139 页）3 月 18 日，毛泽东在《转发黄敬关于天津镇反补充计划的批语》中说：“各大中城市的镇反工作，过去几个月一般劲头很小。这主要是由于领导机关对反革命的严重性及镇 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而来。从二月起，先有北京市，现在又有天津、重庆两市动起来了，这是好现象。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及其领导机关潜藏的最主要的巢 穴，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对付，必须认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杀几批，才能初步地解决问题。下面是天津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正确的。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 五百人(已杀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它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 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第 168 、169 页）3 月 24 日又指示“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杀几批”。（第 192 页）

为什么全国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不放在解放之初却要放在“抗 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呢？有的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做任何事都讲权谋，早在 1950 年 6 月他还极力劝告党内同志不要急躁，切忌四面出击。然而几个月后，随着 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人民军很快失利，中国方面不得不准备出兵，他马上就改变了此前对镇压反革命问题不甚积极的态度。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千载难逢之机。因此，中共中央 10 月 8 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他两天后就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在 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利用朝鲜战争“对外树敌，对内镇压”。

他曾向公安部长罗瑞卿有过清楚的解释说：“在此之前为什 么不能大量地镇压反革命？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我们的财经问题还没有解决，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提出大量镇压反革命，是不合适 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你们要好好 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这里他表白得十分清楚，“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是“发动群众”。这里的发动，应

该解释为压服群众，更精确的说是杀服群众。

在杀人的技术上毛泽东又作了研究，他说“杀得太多，会不会引起资产阶级的不满呢？只要我们 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就不怕他们叫唤。因为现当反美土改两个高潮的时机，只要善为处理就不会有问题。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各地务必要抓紧照此办 理。”因此毛泽东一直格外关注上海的镇反问题，再三督促。上海终于放开手脚。他说“如果你们能逮捕万余，杀掉三千，将对各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 用。你们注意在逮捕之后迅速审讯，大约在半个月内就应杀掉第一批，然后每隔若干天判处一批。群众才会相信我们肯杀反革命，积极起来帮助我们。对引导广大人 民群众各界民主人士参加镇反工作，真正与闻其事，各地做得太少。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北京天津两市最近两星 期来大有进步，对镇反大张旗鼓，广泛宣传，普遍揭露，利用几十人，百余人，几百人，几千人乃至万余人的会议，利用报纸和广播电台，利用展览会，大肆宣传， 使家喻户晓，使全体人民及各界民主人士均参加镇反工作，粉碎了神秘主义，小手小脚，畏首畏尾的作风，收获非常之大，处决人犯的规模也一波胜过一波。”

在 3 月 18 日他表扬“天津一个半月准备先处决 500 个反革命，这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之后，他进而又于 4 月 22 日借公安部的报告，公开表扬“北京一天处决 200 个反革命”说“这是正确执行毛主席关于人民政府要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的第一次”。

上 海在被毛泽东批评后，仅 4 月 30 日一天就枪毙了 285 人，……6 月 15 日又一天枪毙了 284 人。不到 5 月，两广地区就已捕了 188679 人，处决了 57032 人，其中广东 4 月份即处决 10488 名。至这年 4 月底止，华东共捕反革命罪犯 35 万 8000 余人，共杀反革命罪犯 10 万零 8400 余人，占人口 的千分之零点七八。中南地区更是惊人，不到 5 月中旬杀人已近 20 万，距人口千分之一点五只差五万左右，远超出处决人犯一般不超过人口千分之一的原则规定。 而根据中南地区还要在 7000 万人口的地区进行土改，还没有消灭会道门，城市镇反也才开始进入高潮，还有一大批人要杀。从千分之零点五，变成千分之一，也 仍然是原则。倒下的死尸多了一倍，也是原则。有的地方还要比着革命，邀功请赏。要求杀千分之五。

毛泽东这个时候对杀人失控，而各地还一 个劲儿地想要大杀特杀的情况，也感到不妥了。4 月 20 日，他专门致电各中央局书记称：“虽然 2 月中央会议决定先规定杀人数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为准”，但 “现在西南已达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区亦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方且已超过。一般地看来，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区似乎均须超过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解 决问题。但是，超过太多似乎不妥。柳州专区要求杀千分之五，显然是错误的。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

毛说，“我有这样一种想法，即可 以超过千分之一，但不要超过得太多，不要规定一般以千分之二为标准。而（应）将许多犯人列入为无期徒刑，离开本县，由国家分批集中，从事筑路、修河、垦荒 、造屋等生产事业。例如西南区准备

再杀的六万人，杀掉三万左右以平民愤，而将其余的三万人左右各省区负责分批集中生产……如果以人口千分之点五计算，西南 、中南、华东三区就有十五万人以上，是一批很大的生产力。贵州省认为不杀千分之三就不符合准和狠的原则，我倒觉得按贵州人口一千万已杀一万三，省委要求再 杀二万二千至二万五千，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再杀一万多一点，留下一万多不杀，已经超过千分之二的比例，已是按照贵州这样的特殊情况办事，已经算得准和狠了。 上述意见的缺点就是执行起来很麻烦，不如杀掉好，爽快。其好处就在经济方面有利益，政治方面也有某一方面的利益，使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好说话。 苏联过去对许多重罪犯就是这样处理的。此事是否可行，请你们和一些同志商量一下。”

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也就是尔后“劳改政策”的正式出 笼。从这些历史档资料看出，不是基层发现了多少反革命。而是上级要求下面发现，或制造多少反革命。不是有多少罪行需要惩罚，需要处死。而是有多少人必须被 杀死的任务，下级必须完成。如同生产指标一样，上面给数字，下面按计划办。只许超额完成。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同的是：这个任务指标，不要产品，只要人头。

如果说 49 年前是两军对峙，成王败寇。还可以不深究。但 49 年后的血腥镇压就没有任何理由辩解。不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而是为了建立 独裁统治的需要。镇反杀的 70 万人，不是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残余力量，而是为了杀服中国的人民。毛泽东大开杀戒，故意摆出一副草菅人命、无法无天的凶像。他 不但强迫人民去看他杀人，还强迫那些脸上被溅满鲜血的人民给他叫好。随之的一波又一波运动，人民看见他手里的屠刀不断滴着鲜血，望着那些一批又一批地人被 不断地送上革命的祭坛，刘少奇随后的解释更为形象。他说：“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为什么能够大张旗鼓地搞起来，关键在于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很有好处， 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 好搞了。”

总之，可以说 1951 年是杀人年，而且是有计划地有比例的大规模地杀人。“大杀几批”成了毛泽东用来指示“镇反”的主题词。 毛泽东以杀人为“痛快”，觉得“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活脱脱地暴露出一个杀人狂的变态心理！但直到现在，中共还极力回避镇反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反人权 的杀人运动。至于镇反运动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错杀了多少无辜，就成了永久的机密。

我在洞子口乡十三村登记“杀、关、管、斗”的户数 时，才知道这个总人口不足三百人的村子，只是枪毙的就有 19 人之多。其中有户叫边洪恩的一家父子三人全被杀掉。边是哥老会的三哥，解放前当过棒客，开过赌 场。另外这个村叛乱过，除被杀的人外，还关押劳改了不少人。所以 1957 年的反右运动，没有见到中共使用过多的暴力，因为在这之前镇反，肃反，土改，已经 打断了知识份子的脊梁骨，他们早已魂飞天外，根本用不着再去动刀动枪了，使社会治安一度出现了空前的安定。城市和农村不仅无土匪。、小偷。、流氓、妓女， 大街小巷连打架的人都没有。好似真的进入了“夜不闭户，路不失遗”的“太平盛世”。其实在这杀人如麻的时代，谁又敢去闹事？不怕脑袋搬家么！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九）

四，为革命而学的校园生活

国民政府打倒了，国民党撵跑了、留下人员关的关，杀的杀、管的管， 纵不关不杀不管也不能用。共产党要坐好天下、管理好城市，需要大批干部。干部从哪里来?就地取材，就地培养。从 1950 年 3 、 4 月起，川西、川南、川北、 川东行署和各地（市）县，相继开办了许多短期的革命学校、革命干训班，不断为革命培养干部，输送干部。培训对象多是十八九岁高中毕业弃考大学，不谙世事、单纯幼稚的热血青年。

川南五通桥市盐商的女儿丁佑君女士，就是高中毕业后不去上大学，毅然决然参加西干校（西南干部学校）学习，培训三个月后即开赴西昌，半途被土匪劫持 誓死不降，在就义前还高喊："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牺牲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成为我们四川青年一代的楷模，至今五通桥市的中心地段还有她的塑 像。当时我也想做丁佑君烈士，可阎王爷不给我这个机会。当了烈士虽然不再吃人间烟火，至少不会当"右派"被关押二十三年，累及父母儿女。

由 于我文化水准低，缺乏革命理论，不久组织决定送我到新开办的中共成都市委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规格与西干校一模一样，全是十八九岁的年青人，经过短期培训 后，即分派到全市各部委、局处和区级政府单位担任一定职务。用今天的话说这种临时性的"培训斑"近似"速成干部孵化器"。

中共成都市青 年干部培训班校址设在西城吉祥街五号，一座从前旧官僚的大公馆。这座大公馆原有主人是谁？不得而知。有说是潘文华，有说是田颂尧，反正很大，很气派，占地 至少有两千多平米。它由两种不同风格的建筑组成，左边是欧式建筑，右边是中式布局。西式建筑这边有一幢小洋楼，白色的罗马柱，落地的玻璃窗，阳光屋，搂顶 花园，四周是茂密的树林，一派法国风光。中式这边是古朴典雅的黑漆双扇铁皮包裹的大门，大门上钉着发亮的铜钉，门前有对大石狮，还有上马磴、下马石和栓马 的石环，大门后是雕花楠木屏风，穿过屏风两侧是厢房，正中是空旷的花园，然后是客厅、正房、后院、大花园。现在全是学员的住地，听课学习和讨论的地方。

学 员全是应届毕业的高中生，十七八岁的男女娃娃。他（她）们为了追求革命真理，建设新中国，献身伟大的共产主义解放事业，纷纷放弃就读大学和出国的机会，来 到这里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洗礼。一个个生龙活虎，热情激扬，单纯洁白，心地无私，对未来充满憧憬。这个培训班有两百多人，没有党员，团员也超不过 二十人。我和其他七八个人属于调干生（即已有工作单位，又称带薪培训），分编为四个中队十六个小队（即学习小组）每个小队有十二三人，设小队长和学习组长 各一人。小队长管思想、管生活，组长管学习、管组织。我是小队长，管着十多个人，有说不出的荣誉感。

青年干部培训班直接由中共成都市委 办公室（那时还不叫厅）直接领导，具体管理我们的干部是市委组织部派来的林主任，年约三十多岁，瘦长瘦高的个子，尖尖削削的脸，不喜欢多说话，每天总是不 停地走、不停地看，不停地听、不停地记，不足半月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据他介绍，远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地下党，当过一所大学的学生头头。从他身穿的细呢制 服和伙食标准判断，应是厅局级干部。另外是三个年轻干事，清一色的党字型大小。学员互称同学，睡地铺，吃锣锅饭，菜是一锅煮的粉丝、木耳、猪肉、萝卜，时 称"解放菜"。十人一盆，蹲成圆圈，吃完了再加。

我们每天早晨七点起床，用冷水洗脸、刷牙之后，拿上特制的小木凳，三人一排的长队伍， 个个精神饱满英姿焕发，挺着胸昂着头大声唱着："走，跟着毛泽东走！我们要的是民族的独立，不能给美国当洋奴。走，跟着毛泽东走，我们要的是民主和自由， 不能把生命当粪土。走，跟着毛泽东走！五万万万个人，十万万万只手。走，走，走，跟着毛泽东走！"歌声激越，情绪沸腾，唱得血管里的血不停往外冒，心里充 满着荣誉感和胜利感。除此还唱《我们是民主青年》、《蒋介石的家谱翻开来》我们穿街过市，最老来到中共成都市委所在地多子巷，一间铺着红地毯的很漂亮的大 办公室，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时事讲座艾思奇的《中国社会发展史》。大家一边听，一边记笔记，我记不下，就坐在两人之中接受同学们的帮助。学习的固定教材 是三本书，陈伯达写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和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

在培训班里不分等级，不分出身，也 不论高低贵贱，大家都是革命同志，关系平等，，亲如兄妹，相融似水，没有尔虞我诈的争斗。学习上人人上进，个个努力，争相发言，惟恐落后，不存在嫉妒，更 无一丝间隙，都是你帮助我，我帮助你，团结得象一个人。我喜欢出力气，比如打扫卫生，早晨从井里汲水洗漱，我抢着干，几乎全部包干，为此多次受到林主任的 表扬："工人出身的黄泽荣同志，热爱劳动，乐于助人，大家应向他学习！"

由于学员多是学生，干训班自始至终沉浸着校园风气活泼、愉快、 轻松、乐观，每个人都要有绰号。绰号根据各人爱好、性格、长相来定。我所在小队副姓罗，是个瘦长精明的高个子，说话老是眨着两个大眼睛，一有空闲便用两个 硬币夹胡子，大家便叫他"罗铁夹"；学习组长是华美女子中学的费丽丽，唱歌唱得特好有付天生的金嗓子、大家便叫她"百灵鸟"；建国中学的孟和长得五大三 粗，像个运动健将，大家取其谐音叫他"梦觉"；、另一个是益州女子中学姓崔女生，

个子修长腰细如柳，是个天生丽质的美人胎，自称“玉观音”；那个川大肆业 姓陈的有点耳背，大家便叫他“陈聋子”；还有省职高一个身材蛮好只是脸上有几颗白麻子的胡姓女生，大家戏称为“满天星”；还有个来自成诚中学的矮个子、瘦 身材的叫姜海天，大家为叫得顺口改为“姜海鲜”。我取不出绰号请大家帮忙，“百灵鸟”眨眨眼说：“你不是姓黄吗?又是工人阶级出身，就叫黄牛吧！”自此干 训班的人无论干事还是同学都叫我“黄牛”。每天学习的上下午时间有半个小时的工间操，在这个时候大家就唱歌跳舞、做游戏，诸如击鼓传花、丢手帕、瞎子捉跛 子等。

学习主要是听广播、听报告、看书，除此就是讨论，大家坐在矮板凳上谈自已的心得体会，谈得十分认真，就像西藏小喇吗在辩论佛经。 每周听一次大报告，作报告的是市委几名主要领导干部，。计有组织部长马识途，宣传部长叶石，秘书长曹振之。马识途胖胖的，看去像个大资本家，是地下党的老 党员，解放前在锣锅巷开家俱店，对人态度和霭，没有官架子；秘书长曹振子之矮矮个子，脚短手短，成天戴副黑眼镜，不苟言笑，一脸严肃，谁都怕他；宣传部长 叶石有一米八的身材，风度翩翩，讲究修饰，满口京腔，讲话很有水准，大家对他崇拜，特别是女同学。他一来作报告。同学们就要欢迎他唱歌，如不唱，就鼓掌或 拉起啦啦队，他拗不过只好唱。他们三位都是第一流的宣传家，所作报告深入浅出，有理有据，使你不得不信服共产党必胜的道理，国民党必败的原因，人类未来一定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学习的中心主题是认清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从猿变人的氏族社会进入到原始共产主义社 会，再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说，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是顺应历史发展，所以必然取得胜利；国民党 蒋介石代表反动的封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必然失败垮台。在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的前提下，再分为四个阶段重点学习。第一阶段端正学习态度，提高认识，了解 社会发展规律；第二阶段理论联系实际，揭发批判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的罪恶本质；第三阶段告别旧世界拥抱新中国，把人生有过的不好思想和行为自觉地向党和组 织交待；第四阶段巩固学习成绩，自我捡查总结收获。第一阶段学习轻松，没有压力，泛泛谈些认识上的问题，上下午工间操大家快快活活地跳舞、唱歌、做游戏， 不知人世间什么叫忧，什么叫愁，成天嘻嘻哈哈像群小麻雀，每天晚饭后总是三三俩俩、沿着吉祥街穿过马道街，越过垮坍的城墙漫无目的地在郊野走来走去，谈天 说地互道人生理想。

一次我们团坐在锦江河边的草坪地上，望着千里田畴，万顷绿波，鹰施碧空，燕舞长天，大有“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 三千里”的凌云壮志。罗夹子面对满目春光，不停地拾起小石块打水飘，只见一石投去水面即刻散出层层水圈，由小及大最后大得不再看见。他情不自禁说：“我们 生活在一个十分幸福的时代，自由民主，美丽灿烂，我一定要十倍努力，百倍奋斗去拥抱这个时代，建设这个时代。”玉观音则诗兴大发，字字珠玑地说：“一个人 是一滴水珠，一条生命是团火球。千万滴水珠汇聚在一起，便是波涛滚滚的长江；千万团火球燃在一起，便会烧灼黑暗的世界！我永远是革命一个小卒，忠于共产主 义事业的小兵，目标不变，信念不移，纵是上刀山下火海也无所惧。”满天星自幼是个才女，用她

的话说美丽不在外壳而在内在，只要一开口就是一首诗，她说：“青春之所以绚丽是因为有了党，生命之所以发热是毛主在教导，我们今天之所以走在一起，是因为有一条共同的理想的大道，奔向伟大的共产主义！”梦觉自来声 粗音大，语调高昂，他说：“从我自进入干训班那天起，就一个劲地想，如何把一切献给党！我真想去朝鲜打美帝国主义，更想学习邱少云在烈火中永生。”

我 听着想着，整个内心在在燃烧，当梦觉一住口我立即冲上说：“旧社会我是奴隶，新社会我是主人，今天能和大家坐在一起全是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我只能用努力学 习作为回报，今后听广播、听报告自已能记下笔记。”陈聋子是川大法律系的肆业生，也是我们中最年长的人，说话总是斯斯文文，他说：“我读过国民党的‘六法 全书’在民主的词汇里看不见民主，在自由的字眼中找不到自由，解放后的今天，全中国何处不是民主？哪儿不是自由？我们不爱这个国家谁爱，我们不拥护这个党 谁拥护！”姜海鲜平时在学习会上发言极少，此时像受到大家的感染和冲击，忍不住说道：“人有良心天有眼，革命到底不回头，杀身取义我甘愿，誓将热血写丹 青。”百灵鸟高兴地拍手叫道：“有眼不识秦（泰）山，我们小队里还隐藏着一个诗人，姜海鲜真正鲜，不用海椒不放盐。”大家被逗得哈哈大笑，气得姜海鲜低低 笑骂道：“百灵鸟说缺德话说多了，你会找个哑巴做老公。”百灵鸟嘟着嘴不依不饶道：“你坏你坏，看我……”我笑着阻止，换个话题，提议百灵鸟指挥大家唱支 歌。我的提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好！”百灵鸟便站起身，挥手打着拍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

大家随着她的手势放声唱了起 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人民的解放道路，他领导人民走向光明，他坚持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人民生活，他 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现民主好处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声在绿草地上翻滚，歌声在树梢上荡漾，歌声伴着锦江河潺潺流水，飘洒得很远很远。但 它留给历史的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谁能想到这些放弃学业追随革命的小青年，在六年后的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运动中，竟有三分之一的是 “右派分子”，判刑的判刑，劳教的劳教，监督劳动，发回原藉，上吊自杀，穷困一生，这是为什么？用“伟人”的话说“阶级斗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竟然 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物件”，历史啊你该怎么评说？

五，人人都得过关“洗脑”

学习 第二阶段是“揭发批判半封建地、半殖民地社会的罪恶本质”。这个阶段一开始，林主任一再强调，要思想见面，理论联系实际，不能只讲空话。市委办公室亲自组 织了几次“吐苦水”的控诉会。控诉会的苦主全是受压迫受剥削最深的贫下中农，多是些妇女。记得西城乡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说：她家三代贫农，爷爷交不起地主 地租，大年三十天被迫上吊自杀，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拉去修飞机场炸掉双腿，后死于乞讨之中。她十二岁给人当童养媳受尽苦难，生娃儿没有吃的喝的用的，全咽 的谷壳糠饼。另外一个妇女就更苦了，她说她冬天从来没穿过棉衣，不知肉是什么味道，长年住在猪圈里与猪狗同食同住，地主还要打她。说着，她亮开胳膊指着上 面那黑糊糊的疤痕说，这就是地主用火烙铁烙的。

除此，干训班还找来了被大地主刘文彩关过水牢的冷月英。她说，她家三代都是刘家佃农，刘是一方恶霸，养着不 少打手和狗腿子，谁个佃户没有交够租子就捉来关在水牢里。水牢不见阳光黑咕咚咚，水冷得轧骨透心里面还放得有蛇。她在里面关了三年，自今腰酸背疼，看见水 就打颤。

这些苦主一说一哭，一诉一泪，在场听的男女学员莫不义愤填膺，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万恶的封建主义！""打倒地 主阶级！为死去的农民弟兄报仇！"（五十年后的今天，才知道冷月英何曾坐过水牢，那地方是刘文彩放大烟的仓库。原来他是开明士绅，办的安仁中学自今还是全 省重点中学，先后培养出不少国家栋梁之材。共产党用作秀"洗脑"的办法，改变青年人故有的思想模式，把我们一个一个制造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就像兵工 厂用最好的钢铁制造枪炮一样，然后去为新生政权拚杀，消灭前进道路上的敌人。所谓"联系实际，刺刀见红"，就是要和养育过自已的父母划清界线，揭发他们剥 削工农、压迫人民的罪恶行为，向富有家庭开战。要做到这些真需要勇气。我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三代贫穷祖辈受苦，对旧社会没有什么留恋，可那些学生哥、学生妹就不行了。他们出生在有钱人家，自幼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剥削生活，父母不是地主便是资本家，不是官僚便是豪绅，有着说不清的原罪。于是，人人都得 把自已家庭。父母、亲戚痛駡一番，不然就没有划清界线，如果骂得越狠就越划清界线。

"罗铁夹"首先带头检查，语调极其诚恳悲痛地说："我家三世富有，自我生下地就有奶妈，全家十几口人都过着穿金戴银的糜烂生活，吃的用的那一样不是劳动人民的血汗?现在我才知道，我真正父母是劳动人民， 没有他们我怎么能读书上学，今天怎么能坐在这里，今后我决心跟党走，回报劳动人民，把一切献给革命。"

"百灵鸟"更是煞有介事抹着眼泪 说："我爸爸比周剥皮还狠，，妈妈比黄世仁还毒，他们只管自已赚钱，成天逼着工人没日没夜地干活，可笑的是她还吃斋信佛呢！我现在才知道，家里每个铜板都 沾满劳动人民的血汗，我的每个毛孔都烙下剥削二字，恩谢党使我明白了做人的真理，感谢毛主席给了我们金色的前程。"

"陈聋子"老爸当过 国民党团长，他的批判更为彻底：说"我出身在一个反动军官家庭，父亲先后取了三个老婆，他仍不满足，后来又去霸占一个良家妇女，还不准别人生小孩，他参加 过进攻革命圣地延安，犯有滔天罪恶。现在他随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我一定追随毛主席打到台湾去，把他捉拿归案，交给人民公审。如果党同意，我一定亲手毙了 他。"

最高潮最感人也是最精彩的一幕，是"玉观音"的揭发控诉。她一字一泪泣不成声地说："我父亲是遂甯县一个乡长，还是这个乡的袍哥 大爷。他一生一世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想抓谁就抓谁，想杀谁就杀谁，先后霸占了十多个良家妇女当老婆，我妈也是霸占来的。我十七岁那年的一个晚上，妈回娘 家去了，我一人在家，想不到他喝醉了酒竟然跑到房间里强奸了我……"说到这里用手绢捂住脸，呜呜呜哭过不停，会场也是一遍哇哇哇的哭叫声。于是，旧有的道 德礼教

全成了虚伪东西，人们不再相信崇敬，代之而起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即所谓世界观、人生观来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牢牢扎根在我们脑海里。

我听了这些检查、揭发、控诉的发言，十分迷惘，怎么过去不知道有这些事情呢？有钱人的家竟这么糟糕龉龊，不讲天 理，于是庆幸自己出身穷人家庭，难怪我们是领导阶级啊！从此，有了优越感，对出身有钱人家的子弟有了天生的看不起，认为他们不如我们劳动人民清白洁净，从 头到脚都是血污。在那个学习阶段，大家茶不思，饭不吃，不唱歌跳舞，连走路也没精神。现如今才知道，这是共产党的“洗脑”工作。用狼奶哺乳我们年青的生 命，掏走了原有的思想情感，把我们变成了一条一条的恶狼，扑向社会，扑向人类……

六、自查历史找问题

哭 过了，嚎过了，伤心过了，大家感情逐渐逐渐平静下来。花园、厅房、绿地又有了歌声、笑声、欢乐声，不几天学习进入最后一个阶段：检查总结收获，向党和组织 交待自己的一切，也叫“刺刀见红”的阶段，即人人必须从八岁起，如实向党和毛主席作交待检查：在什么地方上小学、中学、大学，证明人是谁？参加过什么组织 （进步的和反动的）没有？家庭情况（主要是经济收入）和社会关系（父母和主要亲属以及兄、姊、妹、弟）他们现在的生活、工作情况，细致明白，滴水不漏。

在 这之前干训班林主任亲自出马向我们作动员报告，他极其平静地说：“同学们，现在是你们向党和毛主席交心的时候了，也是你们靠近组织的时候。正因为你们相信 党相信毛主席才投身革命，献身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那么就必须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交给毛主席，决不能隐瞒埋伏或者说小不说大，说现象不说本质，一定要痛痛 快快洗个澡，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不要怕？又有什么怕的？纵然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甚至做过对不起人民对不起革命的事情，也与你们无关呀！那全是国民党 反动派的罪恶，旧社会的罪恶。从那个黑色肮脏污浊染缸里爬出来的人，有什么清白可言？有，不怪，没有，才怪哩！我就参加过国民党，还在蒋介石反动派手下做 过事，可我参加革命后主动向党和毛主席作了交待，组织不是照样相信我吗？不照样是你们的林主任吗！”

他的动员报告十分生动精彩，使不少 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听众的学员中有人突然喊出：“向林主任学习！向党和毛主席交出一切。”散会回到组上，大家用了三天时间讨论林主任的动员报告，纷纷表示 要向党和毛主席交待自己的一切：不怕脏、不怕丑、不怕坏，只要主动坦白交待，就是光荣。办法是各人先在会上自我坦白交待，然写成书面材料经小组讨论通过后 再交给组织。五花八门，真精彩！

“罗铁夹”在检查中说：“由于我出身剥削阶级，自幼受着不良影响，在高中一年级时就常犯手淫。”我年纪 小不知道什么叫“手淫”，便大着一双眼睛问陈聋子：“水银？是不是那倒在地上，一颗一颗的象钢珠球？”大家听后前仰后合地笑起来，我越发莫明其妙说：“水 银与剥削阶级什么关系？”

"陈聋子"不得不出面制止我："黄牛，我下来告诉你好么。"也许，这样的事在今天不会有人相信，但那时的我们，就是单纯得像一张白纸，涂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

如 果说"罗铁夹"的检查交待接触到"灵魂"，"百灵鸟"的交待就更神了，她低头红脸极不好意思地说："其实我们女生比男生更坏，我们七八个女同学同住一间校 舍，晚上下了自习，校监把门一锁，这下便是我们的天地了。那个比我大一岁的王姐，便跑到我床上来摸我，先是胸部，后是下面，开初我拒绝，后来觉得挺舒服， 我也这样去摸人家……"

"陈聋子"悄悄地告诉我这叫"同性恋"。也许"同性恋"在今天并不是一种耻辱，可在那时真是丢人现眼的事。这些 又脏、又丑、又坏的事，放在当今决定没有一个男女青年会主动地在众目睽睽下告诉第三者或向领导交待，我想纵是爹妈也不会说吧？现在若有这样坦诚的人，不被 骂成是疯子也是神经病。可那时却有许许多多的疯子、神经病！你相信吗？这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年轻人有过的历史。

梦觉、玉观音、 满天星虽未谈出这些脏东西，却另有别开生面的奇文。梦觉说他父亲是个医院院长，母亲没生育，因家里有钱是借别人肚子生下的他，他从未见过生母只知是个农村 姑娘。玉观音说他妈是个妓女，所以自幼受欺负，在家里没有地位。满天星交待她自幼悲观，偷吸过家里的鸦片烟。陈聋子还交待他偷看过家里了了环洗澡。奇奇怪 怪，闻所未闻。

五十年代前的青年，所接受的教育，都是传统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个个纯洁得像块水晶玻璃，玲珑剔透，光洁 无瑕，从不知社会的险恶与卑鄙，更不知毛泽东为我们设下了一个一个的陷阱。当共产党掌握到这些钢鞭材料后，今后在工作中只要发现你不听话，便从挡案中翻出 这些材料来打击你，致你于死地。后来听说"百灵鸟"所在单位，因不喜欢自已的顶头上司（一个晋区来的又丑又粗的老干部）死追，因而在 1957 年反右中被划 成右派，她不服，组织上便祭起这历史材料，说她自幼就是个"女流氓"，而含羞自杀。

大家除了交待检查这些生活作风问题外，干训班领导更 需要的当然是与政治有关的历史问题。姜海鲜在这方面作了突破。他说他在诚成中学时，在进步人士的带领下参加过共产党发动的"4。27 反饥饿，反内战"的学 生运动。他在人群中呼口号声音特大，与宪兵、员警抗争吵得最厉害，引起国民党特务注意，不久被秘密逮捕囚于将军衙门政治犯监狱。到了 1949 年 12 月，国 民党撤退成都前夕，蒋介石下令把囚在将军衙门的 40 多个政治犯全部处决。他因年龄还不足 20 岁，那个执行的特务又认识他教书的父亲便偷偷地将他放跑。这本 来是段光荣历史，可他在自我检查的交待中却把那个放他逃跑的特务和他的关系说得过于好，于是引起林主任注意，怀疑他是潜伏下来的特务，把我和几个极积分子 叫到办公室去作了专门的布置说："据我们掌握到的情况，凡关在将军衙门的政治犯设有不被杀掉的，那活埋在十二桥的四十二位烈士全是将军衙门关的。奇怪就他 一个人跑脱了？这里面肯定有重大政治问题。"我认真思考了一阵后亮出观

点："他说那个特务认识他父亲，他年龄也不大，我想不会是潜伏下来的特务吧？"林主 任凝目一笑说："我是搞地下工作的，潜伏不在年龄大小而在手段，还有小到十六七岁的人，同志们呀！我们要提高警惕啊。依我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按 照领导指示，我大大坚定了信心，组织班里男女同学加强火力猛攻。搞得他吃不好睡不宁，矛盾痛苦极了，加上我奉命关心做他工作，成天找他谈心动员他放下包 袱，一定要他相信组织，向林主任学习，并欺骗他说："只要你交待了问题，照样毕业分配工作。"后来他哭着承认自己是潜伏下来的特务，当然就没有分配工作， 留在干训班继续交待问题，结局不得而知。

十多年后，我因"马盟"一案流浪天涯，一次在成都一条小街的面食摊上碰见了他。此时他是这面摊 的老板，在我吃完面付钱时，他突然认出了我："同志，你姓黄吧，叫黄泽荣对吗？"我吓得一身冷汗支吾其词，语无伦次地道："老板，你，你，这是钱……"他 哈哈一笑说："是你，没认错，老同志，老朋友，还要什么钱？我请。"他把我付钱的手推回去，看看左右，突然压低声音问："你不要多心，好像是 1957 年 7 月一天，我在《成都日报》上看见你的大名，还有一张照片，你怎么成了大右派？我真有点不相信，我们黄牛，哦，对不起，我们的分队长，大字不识的老粗，怎么 能是右派？后来我专门向人打听，老天！真是你啊！弄到山上（泛指劳改劳教）去了吧？肯定吃了不少苦，怎样，再来一碗肉丝面。"他不由我分说，立即叫掌勺的 一个与他年龄相近的女人（可能是他妻子）吩咐道："二嫂，再煮一碗，油放大点。"他的真诚，他的热情，使我想起当年在中共市委干训班所作所为，感到羞愧难 当啊！于是我不迭地说："谢谢，谢谢！"

"谢什么啊！"他坐在我身边陪着我吃面，一边叙说他那当年的过程："说实在话，我还得感谢你。当年要是我也像你们一样穿上灰马褂（指当上干部），可能挨整得更惨。后来他们把我弄到公安局关了一个星期，一调查全是胡说……"

"怎么是胡说？"我望他那一张变化莫测的脸，有点云里雾里。

他哈哈纵声大笑道："黄牛呀我当时真被他们搞糊涂了，都讲了自已的丑事脏事，我不讲行吗？可我家又没有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只好生拉活扯编出这挡事，谁知他们竟认真了。"

"那为什么没给你分配工作？"

"给 了我工作，可我死个舅子不干"姜海鲜吸着烟，斜倚木凳悠悠然然地吐着烟圈，怡然自得像个世外神仙，慢斯斯说："我觉得共产党那碗饭不好吃，当干部还不如当 自由民。这十多年来，我什么没看见，肃反、反右、反右倾、文革，要是我在里头肯定比你挨得还惨。阶级斗争，我家不像你家是真资格的劳动人民，你还不知我老 爸很早以前当过国民政府县长，我哥还参加过调统（一种特务组织），加上我性格怪又喜欢打胡乱说，他们不杀我才怪！说一千道一万，你总算自由了。据我知，当 年干训班那批学生娃娃，后来好多都成了右派和反革命，

服毒的、上吊的、跳楼的、数都数不清。你总算好，活出来了，活出来了……”

但我一直没有告诉他，我是逃犯。倒不是怕他报告公安局，主要怕影响他。我不告诉他实际是保护他。历史印证了老子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谁叫我走错了房间……

七、阶级立场重于情感

在 干训班结业分配工作前林主任向我说：“小黄同志，你在干训班表现不错，立场坚定，爱恨分明，工作上任劳任怨，也吃得苦，不愧是工人出身的干部。本来可以解 决你组织问题（指入党），但干训班是临时机构，不过你的表现，我们会告诉你的原单位。市委指示我们还要办第二期、第三期，如果今后你在工作中发现有知识、 有文化的年轻人，只要他（她）们是拥护共产党的，想追随革命的，可向组织介绍推荐，但所推荐的人一定要对党负责！不能把阶级异已分子塞进来。”

第 二天是休息日，我刚一出门，就见宝宜站在一株泡桐树的后面，样子焦灼，眼神忧虑。我心里有点紧张，生怕别人看见，急忙向她递眼色，意思让她快到前面去。那 时我一心扑在追求政治进步上，最怕沾上“男女关系”。我和她仅是朦朦胧胧一种说不清的情感，我何苦裁到里面去呢？所以我们有“默契”，非万不得已不要来单 位找我。

“宝宜，有什么事吗？”我们进入一条没人的巷子后，我才大着胆子问。她没有回答，把修长的眉毛皱了皱，无声地继续向前走。

巷 子很静，少有店铺，多是住户人家。路面用青石板铺砌的。石板经多年雨淋水冲，光滑得发亮，脚步叩在上面，发出清脆的响声。走出巷子，前面便是城墙，城墙边 长了许多丝茅草，风一吹不停地摇曳。我们站在一个大池塘的石栏杆前，望着浑浊的、长满浮萍的塘水。这口塘是前清开造的，传说里面有金鸭子，但谁也没有看 见。而今有不少红鲫鱼，在水塘里游去游来。她神情抑郁，心事重重。我猜想着她不快的原因，哦，未必是夏湛的事？她曾向我讲过，在她八岁的时候，爸爸的银行 面临倒闭危险，存户纷纷提款，一个姓夏的师长拿出军饷解了这个急。为感谢恩人，爸爸将她许给了师长的儿子夏湛。她高中还未毕业，夏师长就要给儿子完婚，她 坚决反对，藉口说大学不毕业不结婚，爸爸为难，但拗不过她。1949 年解放前夕，夏师长又来信催，她还是不同意。

“宝宜，你说话呀！” 我有些急了，心里惦记着回单位解决入党的事。她脸色阴沉，叹口气后才缓缓说：“我要走了，妈已经买好去重庆的汽车票。我想不去，家里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 该卖的东西全卖了。夏湛在重庆一家百货公司当会计，来信要我去，不去，此地又没工作……”这话太明白了，只要此地有工作她就不走，我虽然不是个什么负责干 部，但介绍个工作倒也容易，何况领导上有过交待，可我又不敢把她贸然介绍给单位，组织问到我怎么说？我们两人是什么关系？其实一点关系也没有啊！可她是地 主成份呀，阶级敌人的儿子，万一真有什么问题我怎么说？我准备入党啊！我犹豫着，思考着对策。

他见我不说话终于忍不住提了出来：“你能不能暂时给我找个工作？”。我不敢正面回答，故意转换话题，“重庆是个不错的地方，川东行署也在那里，能看到许多大干部……”

“你！”她喉头硬结了，眼眶骤然红润，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在闪动。天空渐渐黑下来，街灯一盏盏地亮了，塘水变成了一块铅板，隐约现出月亮和星星。晚风把她的长发吹得飘起，乍看似幅轻柔的纱巾。我转开脸狠着心肠，拔下口袋上的金星笔：“带上，作为我们相识的纪念。”

她 愣了，把牙一咬，抓过笔，向黑沉沉的街巷跑去。她的脚步零乱，沉重，跑得歪歪斜斜，像一个醉汉，又像受了惊吓的梦中人。一句话，她的心碎了，散了。我长久 地望着黑洞洞的街巷，心中有不可言状的惨痛和惆怅。呵，她走了，走了，今后能重逢吗？于是，我又有些懊悔，觉得应该答应她的要求，何况这种要求是那样低 微，只不过是举手之劳。我想追去，脚却拔不动：不行呵，我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干部……

她走后不久，她家原住的公馆作了退押交给政府，父 母搬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我也没有时间和心思去打听。好长一段时间，我脑海里都跳动着她黑长黑长的眉毛，明亮清澈的大眼睛，轮廓分明的鼻子，红得发湿的嘴 唇以及纤细的腰肢，洁白如玉的脖子……每当经过她原来住所公馆门前时，我都要收住脚，默默地站上几分钟。公馆门上的铜环由于没人揩整已失去光泽，两旁的青 石狮子已毁去了一只，二门上的花窗也拆去，园里花草不再鲜艳，这景象不禁使人想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 家。”。

此时我方注意到，不仅她家换了主人好些公馆皆换了主人。特别是那些大公馆都成了共产党机关办公的地方，但也有一些并不怎样有钱 的家庭也遭到灭顶之灾。我姐夫的一个叫喻时民的朋友，原是安岳县一户地主家庭出身的子弟，自幼刻苦好学毕业于川大法律系，1948 年前在一个市的地方法院 当推事（即审判长）和三青团干事长，后见国民党吏治腐败便辞官回到成都在打金街开了一家青年茶社过着平淡的日子。他很有学问，说说总是轻声细语，对人客客 气气，我一直尊称他为喻先生，称他妻子为喻太太，想不到在“镇反运动”中遭到打击，关押在宁夏街市大监。很快茶社转卖给他人，在高琦中学读书的儿子喻潮弟 因交不上学费被迫在街道上拉架架车。为了活命求生喻太太将家里细软全部变卖掉度日，类似这样的家庭何止百家千家？我心里忽然明白：这个时代是富人倒楣，穷 人扬眉吐气的时代。是我们的时代。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十）

第四章土改岁月

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莫过于暴力，它的利润大过任何营生，且赚不赔。只要你

手中有了枪 杆子，而这枪杆又变成强大的权力后，天下无论什么再贵重的东西——黄金、白银、玉器、珍宝、田地、房屋、美女、奴婢，都是你的了。要什么有什么，谁敢不 给？不给，就抓起来。轻则坐监，重则杀头。所以千百年来在我们中国，有的是“起义英雄”，“造反好汉”，如果成不了，当个山寨王也不错。我所历经的伟大的 “土地改革”运动，最清楚不过了……

一、奔赴斗争第一线

经过为时两个多月的紧张学习，中共成都市委青干班在歌声笑声 中正式宣布结业，除七八个人在自我检查交待中，不承认有历史问题外，二百多号学员都分配了工作，成了成都市第一批中坚的干部力量。官小的当上了科长、处 长，官大的当上局长、厅长，甚至还有人爬上了副省级的宝座。这叫“膏药一张，各人的熬法不同。”不过也有的人什么也没有捞上，还成了“反革命”或“右 派”。我虽然是右派，有幸活到了今天。那位与我交好的毕业于建国中学的“梦觉”老兄，1957 年 12 月因划成右派“想不通，自杀于金牛区农委，连个收尸的 人都没有，还说他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

根据中央指示：也是革命形势的需要，为了巩固红色政权，全国新解放的地区立即实行土地改 革，只要把土地分给农民，红色政权便固若金汤。于是，中共川西区党委（四川省的前身）立即成立川西区土地改革工作团，由区党委常委郝德青任团长，各地市设 立分团。先搞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开。成都市土改分团长由中共市委秘书长曹振之出任，团员主要是从市委干训班中精选一批立场坚定，有工作能力的学员 （我是其中一名），然后再增调一批老区来的干部组成，总人数约 120 人，选择近郊青龙乡作为试点。人员配备好后，立马进行新的一轮培训，主要是学习土地改 革法大纲，以及如何做发动群众，划清阶级成份，斗争地主，分田分地等一系列政策性与实际工作手段。

在工作开展前，全区（川西区）二千多 位参加土改工作的干部，集中在总府街区党委大礼堂，听取郝德青团长的动员报告。郝团长约莫四十岁，大个子大块头，戴付茶色眼镜，口若悬河大讲特讲“土改是 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地主不会轻易地交出田产必然抗拒到底”，他特别强调“对那些罪大恶极，作恶多端欠有农民血债的地主，必须坚决予以镇压。当杀的 杀，当关的关，对他们决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站稳立场，打好这一场无硝烟的战役！”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我们团一行百余人在成都北门大 桥，第八区区委的大院子里集中待命，先由曹振之团长训话，然后背上被卷、戴上草帽、项上扎着白毛巾，男女一色的灰制服，一行两人排成长队，浩浩荡荡地向土 改试点的青龙场开去。青龙场距成都市中心不足 15 华里，却是地地道道的农村。那里的人情世故和生活习惯，几乎和城里有天壤之别，当地人说的是客家话（称土 广东）我们根本听不懂。全场有近百家商店，分布在宽不足五尺、长不过六七百米窄窄街道的两旁。穿街是一条光滑的石板路，石板路上留有鸡公车（即独轮车）和 钉鞋的痕印，与石板路交相辉映的吊角屋檐檐口上挂着各式长短不齐、颜色各异的吊牌和纱纸灯笼。商店开间大小不一，但却是一色的木门木柱木柜台，黑色额匾上 多是“童叟无欺”“言不二价”的朱红大字。纱纸灯笼老是在风中摇拽，场

头场尾几株老态隆钟的古树，又给古镇频添一派秋色，来到这里就像来到了中世纪。

当我们进入青龙乡地界，早在那里等候的农民欢迎队伍一下向我们拥来，又是送茶水又是抢背包，热情似火，真感动人，还不停呼口号：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土改团万岁！”

那阵势，就象一年前解放军进城的感人场面。我心里在想：革命真伟大！我也真走运，碰上了这么好的一个岁月，怎的不卖命为党工作？为毛主席献身啊！

青 龙场乡农会（未建政前均叫农会）在场口田坝里用十几张拌桶塔起了一个台子，作为欢迎土改工作团大会临时的主席台，参加群众有两三千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小红纸旗，伸着长长的脖子，眼里闪着企盼之光，恨不得立即就拿到梦寐以求的土地。欢迎会先由乡农会李主席，代表全乡农民对土改团的到来 表示热烈欢迎，其后由我们曹团长讲话。他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土改团，来的目的就是帮助千千万万的贫苦农民翻身，就是要把地主手中的田地没收过来分给 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彻底根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万恶的封建社会制度！”他的讲话赢得阵阵掌声和口号声。会后，土改团按事先分配好的名单下到全乡二十四个 自然村。

全团下设四个分团，每个分团下有五到六个工作组，每个工作组有三至四名组员，组长是老区来的干部和市委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全是 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我们属三分团，团长叫朱震，中共成都市委农工部部长，分团部设在三村百公堰旁边一座地主的大院子里。我和“百灵鸟”以及另外两个人组成 一个工作组，负责小地名叫回龙寺的第七村土改工作。这儿是个土地贫脊，人烟稀少的丘陵村落，一条长长的土山头把村子分为两半，一边与天回乡接壤、一边和龙 潭寺乡交界。解放前这里是土匪出没的地方，一年前发生过激烈的叛乱，曾是“四大运动”（指减租、退押、清匪、反霸）重点清查的村子，先后“杀、关、管、 斗”近二十人。据所掌握的材料表明，现村农会干部不纯，大权仍为坏人把持。

我们小组组长叫叶青，团市工委组织部部长，一个沉默少言原则 性很强，成天老是皱着眉头想问题的人。组员除我和“百灵鸟”外，还有一人是刚从乡农会提上来的干部邓大泉。他是本村本地人，解放前曾给地主当过放牛娃，对 村里情况十分熟悉。村农会主席是个 40 多岁的精瘦女人，头缠青纱帕，腰系一块围布，虽是小脚走起路来却轻快麻利，大家叫她罗大娘。她带着我们回村，一路上 十分热情，主动介绍村里请况，谁是地主，谁是富农，谁当过保甲长，谁参加过叛乱，一五一十如数家珍。“百灵鸟”听后很激动，悄悄向我说：“黄牛，这罗大娘 觉悟好高，不愧是村农会主席。”我未及回答，邓大泉却对我耳语道：“她是一贯道点传师，当然会说。”

“百灵鸟”吓得打个颤，睁着双大眼睛不知说什么好。

从 青龙场到回龙寺虽说不足十里，全是一溜坡的黄泥巴上山路。这路真难走，遍是鸡公车的軲辘印，坡坡坑坑，弯弯曲曲，累得人一身大汗。罗大娘见“百灵鸟”走得 气喘吁吁，便要抢着帮她背行李，她死活不干生怕沾上眼前这位“一贯道”点传师。罗大娘笑笑也不强行，指着远处坡坎上几间瓦房说：“快到了，那就是有名的马 家店，又高又陡，推车挑担的人最怕。当地有句顺口溜：“马家店，磨盘山，上面悬个药罐罐。我们村农会就装在药罐罐里。”叶青站个立马式，望望马家店又看看 罗大娘，自言自语道：“药罐罐？”

进了村，我们安排住在一户张姓的农民家里，成份下中农。他一家三口，两夫妻和一个十七八岁叫英英的女 儿。他家是个独立小农院、正屋、厢房共五间，房外一圈黄泥巴土墙，上面长满茅草。土墙外是竹林，门前有个小水塘，用来洗衣洗菜。我们三个男的住在厢房里， “百灵鸟”和英英同住右侧厅房，原放农具的地方临时作工作组办公室。我们和他家同吃同住、每天交纳 24 两米票和一毛钱的莱金。他家三餐白米饭。菜是从地里 新摘下来的，又嫩又鲜好吃极了！那时农村没有电灯更无电话，基本上过的是中世纪自耕自足生活，唯一要买的是盐巴。他们全家穿的衣服是自织的家居布（一种土 制窄篷木机，自纺自织出的土布），吃的油、肉是自已种的菜籽榨的油和喂的猪。张大爷约五十出头、蓄着大清的半边头（前顶剃光后顶蓄发），腰上栓着搭琏，搭 琏里装着烟丝和打火石。他女儿英英留着过腰长辫，手腕上戴着发亮的银镯子，见人说话就脸红。张大娘成天有做不完的活、不是煮饭、喂猪、喂鸡、喂鸭，便是缝 缝补补或者摇纱纺线。全家和和融融，过着妻贤子孝，没有忧愁没有痛苦，几百年、几千年都是这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日子。

那 天晚饭后，我们团聚在办公室里紧闭双门，研究村里情况，叶青首先把团部得到的资讯向大家通报说：“根据乡农会和县公安局提供的材，全乡百分之九十五村农会 成员不纯，有土匪、有地痞、有帮会头目、有‘一贯道’骨干和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这个村的农会主席罗大娘一贯伪装积极，正是我们开展工作首先要打击的物件， 今天你们注意没有？她说马家店是个‘药罐罐’，要把我们装进去。”

其实马家店是个山头么店子，一条直端端的路通到将军碑连接川陕大道。 这条路是黄泥巴山路又陡又直，为肩挑役夫和推车大汉所怯，多是三步一歇五步一停，躬腰贴地气喘呼呼吃力极了。若谁能一气登顶不死也得大病一场，故有“药罐鐀”之称。可是叶青口中之药罐完全是另种意思，所以吓得“百灵鸟”惊叫：“真的呀？”

叶青把指头立在嘴上，意思要她小声一点，然后继续说道：“看来斗争很复杂，我们要打开局面，首先得把罗大娘抓起来。但是现在群众对她很信任，我们得做大量的工作，首先要收集她的材料。”

“把她抓起来不就行了吗？”百灵鸟有点接受不了，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

“对， 首先得把她抓起来！但不是由我们去抓，要等群众发动起来后让他的自已去抓。”叶青肯定地说：“斗争是无情的，减租退押中的极积分子到了清匪反霸时，他们中 很多人成了绊脚石，现在搞土改，清匪反霸中的极积分子也就跟不上了。这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破不立，不止不行啊！。如果我们没有新的依靠物件，土改工 作就无法搞下去，当前最重要的是发动群众，通过斗争发现积极分子，尽快建立起新的农会。”

叶青的讲话似乎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共产党用人是一批代替一批，有点近似老百姓说的“推完磨子杀驴吃”。我们这些人是不是驴呢？会不会到后来也把我们杀来吃了？无数历史证明，共产党的干部几乎都是“驴子”，常常有被“杀”的可能性。

确 定好工作目标后，我们立即分头下村了解情况，每晚忙到十一二点鈡才回家，吃罢饭马上又聚集在一起研究情况。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基本上掌握到罗大娘一些情 况，比如一家农户娃儿病了她去烧过蛋还收了钱，又如土匪叛乱时有个土匪在她家喝过茶，还有一年干旱她组织大家去庙里点过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目前问题 是以何种名义抓她？用何种手段打击她？最后决定先开斗争会再捕人。叶青布置邓大泉向一个姓彭的贫农嘘信说：“斗倒罗大娘你就是村农会主席。”姓彭的高兴极 了，除向我们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外，还串了一大帮人。斗争会在回龙寺小学的操场坝里召开，有一百多人参加。可是士气不旺，几乎斗不起来。发言人不多，好在那 个想当村农会主席姓彭的贫农，在会上大叫大嚷，才把罗大娘威风打下去。后又由他出手捆扎，以“一贯道”罪名，把罗大娘抓了起来。可罗大娘不服大叫冤枉，说 她当“一贯道”点传师在“四大运动”建立农会时就主动向工作组说过，工作组还是要她担任，现在却说她隐瞒历史太不公平。当然她的叫屈毫无一点作用，因为纯 洁阶级队伍和提纯海洛因一样，由粗而细而精，同时也必须要有彭姓贫农这样的粗料，有工作组这样的催化剂，这过程才会如此快速打开局面。

第二步工作，拿那个地主开刀祭旗？这是一个穷村没有大富人家，只有一个叫黄和尚的还有点家产，可是口碑极好。一天吃早饭，叶青突然问张大爷：“你们村地主黄和尚怎样？”张大爷想也不想地说：“那可是个好人啊！”

邓大泉闻言脸色骤变，立把筷子一撂道：“你这是什么立场?像贫下中农吗？地主还是好人！”

叶青不动声色继续问道：“他怎么是好人?”

张大爷放下碗，拈着下巴上几根胡须沉思半响说：”民国二十八年，村里闹瘟疫死了不少人、好些人家买不起板板（即棺材），还是他捐的哩！”

我忍不住了道：“那是伪装善人啊！”

张大爷是个大老实人，没注意大家脸色仍实打实道：“是善人，是善人。”

英英毕竟是年轻人，知道我们的意思，冲着他爸道：”天底下哪个地主是善人?爸，你真落后。”

张大爷一下变了脸，几乎叫喊起来：”你要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我可不能当着工作组乱说，去害人啊！”

这顿饭闹得大家不欢而散，晚上研究工作时叶青提醒大家说：“看来发动群众是件很细致的工作，不能急燥，要深入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地主阶级的伪善面目。”

一 天我们去分团部开会，正碰上北京来的土改参观团，团长是当时通俗文艺负责人王亚平，团员均是文化界的民流，个个斯斯文文，人人西装革履，好些都戴着眼镜。 他们不参加实际工作，每天到各村去听农民的诉苦。一天王亚平将他新写的诗念给农民听：“土改风雷卷狂涛，农民弟兄站起来！”那些听念诗的农民全从凳子上站 了起来，王亚平即招手说：“坐下，坐下，我是在念诗，不是叫你们站起来。”这事成了个笑话，长时间在我们中流传“农民弟兄站起来”。

正 当我们进一步深入访穷问苦，发动群众的时候，川西区党委来了新的指示：要加快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土改工作。我们土改团立即分成若干分团全面铺开此一工作。我 调到驷马乡分团部去，并担任双水碾村工作组的组长。后来听说黄和尚等六户有钱农民被划成地主，没收了全部土地、农具、房屋和生活用品，以及桌椅、板凳和睡 的床铺、穿的衣服。

在斗争会上黄和尚喊天哭地地叫屈：“我是什么地主呀！新衣没穿一件，肉没有放开肚皮吃一顿，成天起五更睡半夜，一背太阳 一背雨的、累了几十年挣了几十年，才买下点田买下点地，就成了地主。这叫啥世道啊！？”结果被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打得皮青脸肿，最后还送到乡农会去关了三 个月。还在一分通报的

材料中看到：青龙乡农会干部基本不纯，先后有十二人被逮捕，其中两人被枪决（一人是七村武装队长，一人是十三村农会主席）罗大娘还算 万幸，只判了五年有期徒刑。另外全乡被杀的地主、恶霸、叛匪共有六人，被关被抓的有二十五人。土改，血染的风彩。

二丶忙中有乐儿女情

小 桥流水，竹林石道，花香鸟语，满眼翠绿，这是川西平原农村特有的景色。驷马乡之名，缘于西汉司马相如赴京求官，与才女卓文君别离时留下此言："如不高车驷 马，决不过此桥"驷马乡距成都北大门约五华里，是座石拱桥，现已不存在，掩盖于高楼大厦之中。当年它是川陕大道枢纽，来往车辆均由经此桥，从早至晚响着鞭 捎的载运棉花和粮食的骡车，以及"咯吱咯吱"推货的鸡公车，偶尔也有一二辆鸣着喇叭的卡车，扬起片片尘灰呼啸而过。街道两旁是零零落落的店铺，其中茶房、 旅店、饭馆居多，便于南来北往的客人休息下塌。大概这儿距成都很近，故不赶场。全乡除街村外还有十八个自然村，土改团团部设在石桥左边一个绅粮（指有钱 人）的院子里。此时乡农会已没有什么权力，我们来后就搬到街村一间一楼一底的房子里办公，乡长、武装队长、文书都是待审人员，留给土改结束建政处理。这大 概是种既定政策，新的运动不用老的运动留下的人，近似一朝天子一朝臣。

土改工作团长叫李捷，成都市三区的区长，山西人，抗日时期打游击 的干部，瘦高个儿，对人和霭，从不发脾气，腰上常插只不足拳头大的美式白朗宁小手枪。团部下设两个中心大组，各管九个村的土改工作组。李捷对我有点偏爱， 不知是我年纪小还是出身成份好的原因，他常向我说："我参加革命和你一般大，还没有扛的步枪高。"所以一去就指定我是双水碾村工作组的组长。

双 水碾村位于川（四川）陕"陕西"道和成"成都"彭（彭县）道之间，深藏在翠竹绿水环绕之中。村子的中心地带有一个很大的碾房，碾房被一条石板路一分为二： 一边碾米磨面，一边榨油压枯。那两条奔腾不息的碾河水，从远远的西边直奔而下，昼夜发出轰鸣声，似万马千军。对着碾房是三间瓦屋么店子，终日售酒卖茶， 人 来人去显出静中的热闹。碾房老板姓李，为人厚道谦和，生意上十分诚信，故这里碾出的米又白又净，榨出的油又黄又澄，好得不得了，深为四乡八里的人称赞。由 于日夜碾米榨油，水碾石砣从未停止转动，一年四季不分昼夜远远就能听到它有节奏的"吭唧，吭唧"声音。那推动石砣的奔流，卷着浪花，发着狂吼，一泻千里， 流经驷马桥，再汇集上千百条小溪倾入锦江河，然后汇入滚滚长江。

我们工作组驻扎在钟家大院子，这是座百年老院子，青砖灰瓦黑木柱，一看 就知是书香大户人家。红漆大门的院子前，有上马磴下马石，三重院门的门楣上，都挂有金字匾额和楹联，巍峩雄踞一派昔日风光。院子主人姓钟，弟兄三人，各住 一座大院。我们来前村农会早已把他们撵在最后一座院子里，一、二重院子全归了土改工作组。钟家三弟兄无论老小男女，打从我们面前经过时，总是低着头，不敢 正面看我们一眼，就像监狱里的犯人看到狱警一样，只差没喊报告。那时他家种着百多亩上等的田地，还雇着两个一老一壮的长工。老的叫郭师，壮

的叫马师。郭师 一见着我们就回避，背地向人说："怎么能去分有钱人家的田，那是人家出汗出力挣来的呀！我帮了他们家几十年，没骂过我也没克扣过我一年一担（十斗米计量， 约合三百斤）六斗米的工钱，我为啥去闹？下辈子会遭报应的。"马师和他恰恰相反，经常找着我们反映情况，说钟家三兄弟一个比一个狠，一个比一个恶，不给他 吃好穿好，年底还扣他的工钱，应该好好斗一斗。后来有人私下向我说，马师经常去么店子茶馆里掷骰子、玩牌九，有时还去嫖女人，知道他德性的都不请他，钟家 弟兄看他找不到事，两年前才请了他。没想到现在却恩将仇报，老是说别人坏话。看来农村也是个复杂天地，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事也有人干。

钟 家大院既是工作组的办公地方，也是土改团中心工作组的指挥部。中心工作组相当于一个工作队，管着四个村的工作组有点权力。组长叫文理阳，市长米建书的秘 书，一个很厉害的女强人。凡她决定的事休想改动，在她说话时休想插嘴，大家都有点怕，背地里叫她"文主观"。工作组加中心指挥组有近十二个人，故有伙食 团，炊事员叫夏得海，一个国民党的老兵。由于工作组和中心指挥组在一起办法，实际领导权在大组长文理阳手里，我是个聋子的耳朵--摆式。文大组长很会用人， 叫我身兼伙食团团长，可指挥炊食员夏德海干这干那。不过文大组长我很器重，经常差我去团部领送材料，还专门给我一只"可尔特"手枪防身，总是"黄牛"前 "黄牛"后地叫个不停。我们每天上午汇报研究完工作，午饭后下村发动群众，收集地主材料。农民不叫我们名字，统称土改队。男女着装一律是四个篼的灰制服， 灰布帽，元宝胶鞋。女同志全剪短发，帽子罩着额头，要不是胸前鼓鼓胀胀，会全视为男娃娃。

土改工作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访贫问苦，发动群 众；划分成份，分清敌我；斗争地主，没收财产；查田评产，分田到户。斗争策略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还在工作的第一个阶段，钟家 三弟兄就多次找到中心工作组长文理阳要交田契、房屋，表示向农民弟兄请罪。文大组长立着眉毛，大声呵斥道："你们急什么，没那么便宜就过关，农民还得评你 们是不是守法地主哩？不守法还得赔退。"钟家三弟兄吓得浑身发抖，不断低声下气说："我们有罪，我们有罪，请工作队宽大。"

我每天办完 伙食，向夏德海安排好生活后，便下村串户了解情况去，一有时间便到村农会办公室坐一坐。村农会办公室设在双水碾一间么店子的旁边，这里经常有男女武装（即 民兵）值班，查问过往行人。我一去他（她）们便要和我聊天，或背着枪陪我下户，说这是保护工作队以防不测。不论到任何一家农户，被访问的对象都十分热情， 送茶、打洗脸水，有的还煮荷包蛋，你若不吃，他们便拿话激你："工作队，我们又不是地主，是贫下中农呀！毛主席派你们来帮我翻身，我们真心诚意煮碗鸡蛋都 不吃，难道有毒药么？"我们只好笑着说："这是纪律，土改队不能拿农民一针一线。"他们听后哈哈大笑："这不是针线是鸡蛋。"面对如此盛情，我真拗不过有 时只好吃。

下村送我的多是武装班长蓝秀琼，她和我的年铃一般大。她家是贫农，两个哥哥参了军，是军属。她满头浓密的黑发，分扎成两条小 辫，辫稍上还系有一对红蝴蝶结，老是不停地在胸前脑后飞去飞来。她有圆盘脸，脸上有双又大又亮水汪

汪的眼睛，胸脯高高的显出少女成熟的美。她总是紧跟在我 后面，警惕地注视着四周一切，生怕有人对我下黑手。时间长了，难免不搭讪，只要说话我一看她就脸红，立即把视线移开，惟恐碰上我的眼睛。一次她十分感慨 说：“黄工作队，我真羡慕你，这么小就参加革命了，将来一定是个官。”我笑道：“傻姑娘，我们共产党只讲为人民服务，不讲做官。”她突然愣了半天问我：“我傻吗？”我不好意思笑了，真不知该怎么回答？

在青龙乡回龙寺村有“百灵鸟”教青年农民唱歌跳舞，在双水碾村工作组其他两人都是比我 还土的土包子，一个是老区来的“土八路”叫杜兵，吃橘子连皮吞的角色，甚至看电影不知把立着的椅板放平，“还说电影好看，椅子难坐”整整让人笑了三天；另 一个是位姓罗的姑娘，成天吱吱喳喳像只麻雀，可又说不到正事上，喉咙左得撕声撕气，没说唱歌说话也得塞住耳，不然吃不下饭。于是教歌教舞任务落在了我的头 上，不过蓝秀琼最乐意帮助我，更喜欢拉着我的手跳“二呀二郎山”的集体舞。这些时候，我心中既惬意又迷茫，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一天她悄悄塞了两个煮熟 的热鸡蛋给我，说是她妈叫她给我的，弄得我要不要都不是，心里老犯嘀咕。第二天汇报工作，我发现文理阳大组长老是看着我笑，我紧张极了，心想这下完了，肯 定她知道了，不记过也得挨批评，别人定说我乱搞男女关系。土改纪律极严格，决不允许任何人与农民有私人关系，特别是男女关系。散会后，我鼓足勇气找到她 说：“文大组长，我犯错误了。”她莫明其妙地看着我，愣愣地问：“你犯了什么错误？”我本想说我和村武装班长蓝秀琼有男女关系，到口的话却变成了“两个熟 鸡蛋”。她听后哈哈大笑，笑得眼眶呛出泪水，说：“黄牛，你真有趣。”但没有想到五年后，我被划成右派分子时，在省市召开的千多人揭发批判我的斗争会上， 她却义愤填膺地说：“黄泽荣，晓枫，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 1951 年搞土改时就违犯纪律，乱搞男女关系，可恨不可恨？”弄得我哭笑不得，有口 说不清。其实我和蓝秀琼两情相悦的发展并不在土改，而是我回到机关以后的事情。1952 年成都市组建公共汽车公司需要售票员，因她合乎招工条件，我用街道 办事处主任的职权，把她介绍了去，但后来条件发生变化，有比她更漂亮的姑娘闯入我的视线，我们仅仅成为一般的友谊，不过我永远忘不了她的纯贞与憨厚。

在 工作进入到划成分阶段，我和“文主观”发生了意见分歧。她指示我一定要把碾房李老板定为地主并要组织群众斗争，我认为过火了一点。因为我花了几天时间去调 查李的劣行，可连一颗芝麻也抓不出。她却批评我“思想右倾，立场有问题”我不服，说她“太主观，逼着牯牛下儿”于是，矛盾闹到团部去。李捷团长解决办法是 第二天调我回团部负责成渝铁路修建的折迁工作。驷马乡三个村都在成渝铁路占地范围内，特别是街村要修交叉道，需得拆不少民房。工作务任重时间又紧迫，李捷 区长不知为什么觉得我能胜任，便借此把我留在了他的身边。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十一）

三、风雨为民夜三更

占地拆房动员搬迁，是一项新的工作。那时共产党做任何事没有强迫命令一 说，总是不厌其烦地向老百姓作宣传说服，哪象今天的干部趾高气场，一骂三瞪眼，又吃回扣又贪污，不搬家用推土机推，你敢反抗老子有防暴队，用皮带打用电捧揍，再不抓到监狱关起来。哪是共产党比法西斯还不如，所以老百姓说，共产党哪在为人民服务，全在为自已造金窝！变味了，变味了，早早地变味了。

我 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对占地拆迁的五百多户人家逐个征求意见，有什么要求和打算。老百姓真好，人人支持修筑成渝铁路，纷纷表态配合政府工作。一有时间我还叫 他们唱歌：“成呀成渝路有话说从头，四十年来说修路派欵又拉夫，人民血汗化流水，不见铁路只听哭。共产党好领导，立即动工把路铺！军民合力修铁路，火车奔 跑笑呼呼……”

尽管折迁任务大时间紧，工作组的我组长是我，组员也是我；丈地是我，记录还是我；出纳是我，会计也是我，成天忙得不亦乐 乎。白天忙完工作，夜里李捷团长还要我学习文化，有时还背着卡宾枪送他下村，当义务警卫员。他总是一路走，一路向我讲革命理：“黄牛呀！革命没有文化可不 行，打天下靠枪杆子，坐天下就要靠笔杆子了。坐天下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你对党忠心耿耿，工作能力也不错，立场又坚定，但还不能象潘清雍、袁忠智那样独当一 面。尽管他们出身不如你，但他们是大学生，搞建设就需要大学生。”

他说的潘清雍、袁忠智，和我参加工作的时间差不多：一是川大学生，一 是华西大学的学生，一直在他手下工作，很受他的相信和器重。现在两人一个是红花村土改工作组组长，一个是团部秘书。由于李捷区长对我器重，两人对我挺不 错，像大哥哥对待小弟弟。这时我才知道，他为什么把我放在中心工作组所在的双水碾村，原来觉得我文化低了挑不起担子，实际让文理阳领导那里工作。于是，我决定学习文化，赶上潘清雍、袁忠智。自此只要一有空闲时间就拼命看书写字，不浪费丁点时光。一次，我在油灯下看书学习到深夜，被他发现忍不住笑着夸我一 句：“黄牛呀，不错，现在正是你人生发奋的时候。记住‘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发奋时’一个没有知识文化的人不能受到党的重用！”

成 渝铁路进度很快，不到一个月时间，筑路大军就开到占地的村子，任务迫着人跑得翻脚板。拆房搬家，首先从街村开始，事前得搞清楚，拆多大面积的房、是木结构 还是砖砌房？不仅要标出补助金额，还要为他们找到搬迁的房子，里里外外我一人真够累，不过干得特欢。李捷区长几次要给我配备助手，都为我婉拒。我说：“李 区长，你不是说为革命要勇挑重担吗？现在我能挑下又何必多占一个人呢？”他听后点点头，高兴兴地说：“这样也好，更能锻炼你。”

那天我坐镇现场指挥老百姓搬家，干到下午七点才回团部，累得浑身没一丝力气，仍点亮煤油灯看书，不会儿老天吹起风下起雨来，我便倚床迷迷糊糊睡去。突然，在睡梦中听得有人叫：“黄同志，黄同志，不得了，房子垮了，周裱褙一家埋在墙下……”

我 一惊，慌忙跳下床，抓起斗笠蓑衣，拉起街村农会周主席没命地向出事地点跑去。此时，天黑不见五指，风刮得尘土狂飞，豆大伪雨点打得人睁不开眼。到

了出事地 点一看，原来是他家那堵封火墙因紧邻的房屋被拆去，它便孤立无援地裸露在风雨中，又因封火墙是泥坯垒砌的，被雨水一泡，大风一刮，就轰然坍塌了，把熟睡中 的周裱褙夫妇深深埋在地下。此时我全身没个干的地方，雨水顺着下巴流，屏住呼吸听去，只听得从泥土的隙缝中发出一种求救的微弱呼喊：“救命呀！救命呀！”

“救人救命”是无声的命令，是争分夺秒刻不容缓的大事。此时若再去组织人或有半点怯懦与犹疑，都是对人命的不负责，也是良心上的最大犯 罪。我立即扑上前蹲下身，不顾个人安危，不停地用双手扒抓泥土。街村农会周主席在旁提醒我：“黄同志，太危险了，封火墙还在坍塌啊！”未待我回答，又一堵 封火墙坍了下来，所幸距我不远未伤着。

我的临危不惧与勇敢精神，深深打动了周围群众，他们迅速挤身上前用双手扒抓泥土。人多力量大，大 约花了三个多小时，才把埋在泥土下的两夫妇扒了出来。但他们一身是伤，多处骨折，人已经昏迷过去。我当机立断：“赶快送医院抢救。”我和七八个群众，临时 找来两付滑竿，轻轻地把夫妇两人放上去，抬起就往成都市青龙街省医院旋风似地跑。街上没一个人，静得来只有我们的呼吸声和脚板声，到了省医院送到急诊室， 经医生检查，须立即开刀抢救，但开刀须要有亲人签字。哪有亲人？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在签字人的关系上填上“儿子”二字。医生看着抢救单上的签字又注目地 望我一眼，喃喃地说：“儿子，你是他们儿子？”我认真地点着头道：“对，我是他们儿子！”

周裱褙夫妇两人保住了性命，我十个指头有八个 没指甲盖了，充血红肿像萝卜头，整整疼我了半个多月。李捷区长知道后心疼地批评我说：“黄牛，怎么不叫团里同志？下次可不行啊。”我笑笑不好意思道：“这 是我的工作没做好，造成此意外事故。”他拍拍我肩头，深深地动了情感，说：“不错，小小年纪敢一肩挑责任。”

我想今日的国家干部能这样吗？当年是我傻，还是追求革命的理念左右了我，可后来革命又给了我什么呢？

四、也算欠下的血债

我 在土改团部是个招人喜爱的小孩，见事做事，喜欢做事，知道我绰号的叫我“黄牛”，不知道我绰号的叫我“小鬼”，有些女同志还叫我“小弟弟”。我不知道什么 叫愁？什么叫忧？快活得象只小麻雀，纯洁得象块白玉。我一个心思在革命上，在工作上，对共产党、毛主席感恩戴德。记得当朝鲜战场传来黄继光以自已胸口，堵 住美国大兵的机枪光荣牺牲的消息时，我几个夜晚不成眠，多次向李捷区长提出请求：“我要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为黄继光报仇，请组织批准我！”李捷区长批评 道：“黄牛，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需要。现土改工作需要你，你就一心一意搞好土改工作。上朝鲜打美国鬼子想法好，但当前革命不需要你这样做，你报仇的决心 就是搞好现在的工作。”

征地拆迁工作告一段落，土地改革也进入尾声分田分地分财产的建政工作。为了

让农民放心分到的土地不会被地主夺 走，在这个时候都要召开公审大会，杀一批有血债的恶霸地主和反革命以资“庆祝土地还家”。那时杀人很简单，不需任何法律程式，只要土改团团长点个头就行 了，布告也是用手写的，只需识字的人当众念一遍，便把杀的人插上死标拉出去毙了就是。在召开公审大会前一周，李捷区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关上门极秘密地 说：“黄牛，给你一个特别任务，从现在起搬去和看守犯人的武装住在一起，一天要去仓里查看几遍，决不准许跑掉一人，如出了问题我会重重处罚你。”不用问他 的谈话意味着什么。

土地改革在发动群众的阶段，各村都要召开几次斗争大会，每次斗争大会都要抓几个人，不是恶霸地主便是反革命，以及会道门头目、保长甲长等。 驷马乡一共抓了三十几个，加大“四大运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遗留下来的未决犯我们土改团一共关押了五十多个人。这五十多个人全关押在距团部不远 的几个谷仓里，一日三餐均由家里人送，看守他们的则是各村派来的武装（民兵）。那时人特老实，不知道逃跑，如想逃跑易如反掌，那关人的谷仓用拳头就能打开一个洞，可他们不跑一天老老实实地等死。

我去了后，立即召集武装开会，把李捷区长压我头上的任务转压到他们身上，说：“为了庆祝土地改 革工作的胜利，防止敌人的破坏活动，从现在起对他们要加强看管，这是革命任务！你们一完要做到仓里飞不出一只蚊子，爬不进一只蚂蚁。”武装全是贫下中农子 弟，同声应着：“请土改团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我不敢掉以轻心，白天晚上提着枪不停地查看巡示，以防万一。听说在“四大运动”中就因为不注意防范， 杀前竟有人听到风声开了小差，至今还没有抓回来。如果这些人放在今天，判两三年徒刑可能都不够条件。为了“革命需要”，他们只能作“替死鬼”。应了老百姓 一句话“阎王叫尔三更死，怎能留你到五更。”

在公审大会三天前，我才知道他们中有四个人要枪毙：一个姓刘的棒老二（即土匪），解放前多 次拉过“肥猪”（即绑架），1950 年又参加叛乱；一个姓李的袍哥大爷（哥老会头目），是驷马桥乡的舵把子，很吃得开，并无什么血债；一个姓何的恶霸地 主，天生怪脾气，解放前逼死过佃户；还有一个姓王的年轻人，

他在 1950 年 3 月参加过土匪暴乱，打死两个解放军，后混入一家新津机场当防空兵，新近才被抓 回来。

公审大会会场设在场背后一块收罢庄稼的田坝子里，主席台是用十五张方桌搭成的，左、右、后面三方用晒垫遮盖住，前方上首挂有一条 红布长幅，上面写着“驷马乡群众公审大会”七个大字。公审会由土改团秘书袁忠智主持，李捷区长讲话之后叫带犯人，区公安局的武装小队，押着三十多个被关押 的人犯，五花大绑走进会场。每个犯人胸前都挂有一块纸牌，上面写着各自名字，名字上用红笔划了 XX。当人犯鱼贯而入地来到公审会，全场群众立即高呼口号：“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坚决镇压恶霸地主，为死去的农民弟兄报仇！”

跪在主席面前的一干人犯，个个吓得屁滚尿流，低着头不敢正眼看会场，只那个何姓恶霸地主，几次爬在地上向群众磕头，不停地说：“农民弟兄，宽大宽大，我有罪，我有罪……”

公 审会先由受害苦主上台面对面的揭发控诉，控诉到激动处苦主上面挥手便打，举脚就踢，打得人犯鼻青脸肿，以示自己立场坚定。还有些不是控诉苦主也跳上台来打 欺头，要不是有武装拦着当场定会打死几个摆起。这就是“阶级斗争”，其实都是我们在掌控，为怕冷场，三天前便分头向群众作了布置。另外在这种场伙，一些人 也喜欢表现自已，当了极积分子可以入党入团当干部，特别是年轻人，谁愿失去机会。控诉结束后，即由红花村工作组长潘清雍代表土改工作团，向临时组成的人民 法庭提起公诉，并要求给予下列罪大恶极，怙恶不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刘、李、何、王等四犯，给以严惩。接下来是双水碾村土改工作团中心组长 文理阳，代表临时人民审判法庭宣判，实际上全是土改工作团在唱自编自演的独脚戏。

宣判完被判处死刑的犯人，背上立即插上死标，由区公安 武装押下去等候，待公安局长李云成讲话完后执行。李局长是个大胖子，讲话的主要内容不外乎是，农民弟兄不要怕地主反攻倒算，有共产党撑腰，江山永远是贫下 中农的，蒋介石八百多万匪军都被解放军消灭了，几个小毛贼地主还怕他们吗？他反反复复讲了近两个小时，我提着手枪和区公安武装也就守候了两个多小时。

这 四个判处死刑的人犯表现各不一样，那个姓何的恶霸地主，早瘫痪在地上像散了架的一堆肉；姓刘的那个棒老二，一付无所谓的样子说“二十年后又是一个小伙 子”；那个袍哥大爷说人总得死，唯一是死前没有看见儿女；姓王的那个年轻人直直站着，象在想什么心事。他突然冲我一笑说：“小同志，请你把我头上帽子摘 去。”我准备上前去摘，一位区公安的武装却叫他先蹲下，以防他用足踢我。我想，临死的人还会这样凶恶吗？多此一举吧。看来我自幼属于那种阶级斗争觉悟不高 的人，怎不犯错误嘛？

区公安局李局长讲完话，便是最后一出戏：枪毙人。参加公审会的群众，人挤人的往前挤，都想揍热闹。有的人还用线麻 线吊块铜钱，用来沾人血，说挂在家里门上可以驱邪；有个别的还用馒头来醮血，说吃了可以治痨病。杀人的地方在

河边不远的乱坟坝里，由区公安武装扎成人墙划 成警界线，警界线外是农会武装。这四名被执行死刑的人犯由区公安武警押提着，依次进入刑场。我威风凛凛地提着那支“可尔特”，紧跟在区公安武警后面，俨然 是个监斩官。到了刑场，武警叫犯人跪下，那刘丶李丶张，都乖乖跪下，王却不跪，一个武警上前飞起一腿踢在他的足弯上，王一个跄踉倒了下去。一声口哨，枪栓 哗拉一声，再一声口哨瞄准，第三口哨四只步枪同时“呯丶呯丶呯丶呯”地射出一团绿茵茵的火，呼啸的子弹一触到人体人犯即应声倒地。区公安武警不打回头枪， 见人犯倒下转头就走，由我和团部另一位同志逐个检查被枪毙的人是否已经毙命？刘丶李丶张全没有了恼袋，躺在血泊里一动不动，只有那个姓王的足手还在动。我 立即扣动手中“可尔特”，对着他胸口“叭，叭，趴”三声，他再也不动了。警戒解除后，围观群众一涌而上，用铜钱醮血的醮血，用馒头沾血的沾血，有的人还用石头砸尸体以示仇恨。乱哄哄的，煞是热闹。

待围观群众散尽后，家属便备上香烛丶纸钱丶棺木前来收尸，有的哭，有的嚎，有的一边哭一边 嚎，一边数落死者生前的功与过。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背上背个小娃娃，手里牵个半大子，头缠孝布，跪在地上给那个何姓的恶霸地主烧纸帛，一边长声呜呜哭 说：“死人呀，谁叫你活着不听话，上前年张家交不出租子，我说算了，你却偏要去追，追得别人上了吊，欠下命债，这下成了恶霸地主，把老命都丢了。你倒走 了，丢下我们娘娘母母，怎么活啊！呜，呜，呜……”

在土改团离开驷马乡前，不少翻身农民前来送行，依依不舍，难分难解。在人群中我看见 了马师，他穿着一身不合体的阴丹士林长杉，头戴一顶青绒瓜皮帽，不伦不类，满脸红光，腰间还别着支二十响手枪，笑嘻嘻走上前向我说：“黄工作队，真感谢你 们，这下我们穷光蛋翻身了，我分了钟家大瓦房，你看还穿上了钟老大的衣服，我还选上村农会武装队队长。对了对了，不再穷了，睡到吃三年也饿不死。”他说得 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我无言，心里在想：这就是农民翻了身，他们还会穷吗

五丶干革命站稳立场

李 捷回区政府前悄悄告诉我，说：“黄牛，你的人事关系已经从土改团转到了区政府，等洞子口乡土改工作结束后便回到区政府来。”他还说，洞子口乡土改团长是三 区区委书记张烈夫同志，张区委已同意我担任九里堤村工作组组长。我心里好高兴：这下我可以露一手了！年轻人谁不想逞能？谁又不想节节高升？但那时想高升不 是为的得到更多的工资或享受，而是能更多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工作。也许这是新中国建国初期欣欣向荣的原因吧，因为它拥有大批一心为革命，不计个人得失的 青春财宝。

土改团的团部驻扎在肖家碾，一个叫陈国栋的公馆里。陈国栋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孙中山先生讨袁护法战争，作战娆勇，号称“威 武将军”。听说张烈夫区委书记看上这座公馆，立即以土改团没收“官僚地主财产”的名义，予以没收。当天就派人把陈国栋全家大小七口，撵到村里三间茅草房里 去了，这里就成了土改团的团部，也就是后来中共成都市第三区的区委会的办公地址。

这座公馆很气派，占地不少于三亩，院墙外是一条宽约一 公尺的小河沟，四年四季清澈见底的溪流不停地绕着院墙奔跑，汨汨潺潺发出琴一般的声音。粉白的院墙笼罩在冬不枯夏不黄的竹林里，院内各种树木四时常禾鸟语 花香，近似篷莱仙境，难怪张区委爱上了它。公馆距通往洞子口乡的大道约一公里，门前是座精巧的红楠木小桥，小桥和一条乡村泥土小路相连，就像一条洁净的彩 带把公馆系在田野上。小路两旁垂柳依依，常年吐秀。相对小桥是两扇嵌在高墙中黑漆大门，门上钉有黄灿灿的铜钉，进入大门是个花草繁茂古木扶疏的庭园，园里 种了不少果树，一条用宽窄均等的石板铺小道把庭园分成两瓣，它弯弯曲曲通白客厅。客厅雕龙画凰古色古香，摆着八张紫檀木的太师椅，椅上放着红锦坐垫。客厅 两旁有四个小间，是书房丶茶室丶与休息的地方。客厅后是厢房，再后是主人起居室。穿过起居室是花园，楼台亭阁丶敞轩水榭，花台盆景，错落有致。

在 客厅各房门的门楣上挂有大小不等的金字悬匾，那块悬在客厅正中最大的悬匾足有一丈二尺长，五尺宽，尤为显眼。匾额上有四个“恩泽乡里”的金色大字，上款是 “威武大将军陈国栋大人六旬寿庆”，下款是送匾乡亲的名字，时间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从这块黑漆金匾里，我们窥测到了这家主人昔日曾有过的辉煌与风光。按 此推算，陈国栋被逐出公馆，正好是六十五岁。我去团部汇报工作，见过他几次。他总是穿着厚厚的棉袍，戴一顶压着眉眼的破毡窝帽，柱着一根拐杖，迈着蹒跚碎 步，不停地绕着他那座原先属于他丶现在是土改团的公馆走去走来，有时还驻脚长望或凝目沉思，看着他那一副失落而又无可奈何的样子，真有点令人可怜心酸……

我们工作组所在的九里堤村位于成都西外十余里，其名来于村北边府河的九里堤。此堤像一条长龙，把奔腾咆哮直向成都市区冲去的锦江迎兴拦 截住，使它平静下来不再发怒，慢慢地唱着歌迈着平稳的步阀穿城而过。传说这堤是当年诸葛亮出任蜀相修筑的。那时成都常被淹在汪洋中，他率民众筑起此九里长 堤护城，故又承相堤。锦江河的水来于灌县都江垫，水清而冽，无一丝尘垢，喝进嘴里甘甜甘甜，沁脾润心，哪象现在浑噩污浊。我们去时江里常有打鱼的船，船头站着鱼老鸹，它根据主人的指挥钻到水中，把一条一条的鱼叼上船，待主人喂它一点鱼肉后，又钻到水中叼鱼，周而复始不停劳作，我突然觉得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呢？

我们工作组加我共三人，一人姓张，是个初参加工作不久的农民，笨拙拙的什么都不懂，可还摆架子；一个是区妇联姓曾的女同志，人生得 漂亮，喜欢穿件洗得发白的灰制服，以示革命资格老道。她年长我两岁，我仍直呼其名。我们住在一个傅姓的中农家，也是一座独幢的院子，两排厢房，三间正房， 中间院坝，下面是三间不隔断的长屋，东边喂牛，西边堆柴火，院子四周是川西平原特有的土坯泥墙，后院是大片竹林，老百姓叫“林盘”。傅姓中农在我们面前决 不多说一句话，客客气气惟恐有什么过失。

这个村十三组有个叫边洪恩的农民，是个出了名的“棒客”，与洞子口原乡长曾志清是拜把兄弟，五零年初聚众叛乱，在“四大运动”（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中这个村一共枪毙了十六个人，边家一家就杀了三个（父亲和两个儿子），农民一谈起此事就咋舌。

洞 子口乡田肥土沃，农民富有，读书人不少。我怕他们小视我，处处都学老八路的样子，棉衣不穿披在肩上，板凳不坐蹲在上面。只要开会讲话就端着一个茶缸，嘴巴 上还叼着根纸烟，说话一声长一声短南腔北调，开口我们共产党，闭口我们毛主席，一副“假老练”的样子。今天回头看去，真是个十足的小混混。可那时我手中有 权力呀，每次召开“地富反坏”训话会，我可以趾高气扬骂它个狗血淋头。被训的一个个低头抱膝，不敢正面看我一眼，要是那天我情绪不好，对谁看不顺眼只需嘴 一歪，村农会武装就会把这个人绑起来。什么是政策？我就是政策！什么叫专政？，我就是专政！这是体制的残暴，理论的悲哀，这悲哀残暴，最后落在了我的身 上，叫报应。

这个村共有 240 多户，1300 多口人，四家地主，六家富农，为了挖净地主钱财，查田评产分地前夕，我们先搞赔退。就是先 把确定赔退的物件定成不法地主，然后确定赔退金额，多的十几万少的几万。根据群众反映和我们调查掌握到的材料，住在九里堤上的地主何之媛家里窝藏得有金 银。因何的老公是国民党一位军官，临解放前去了台湾，现家里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何琳琳其夫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49 年秋去了香港；小女儿何娟娟在成都近郊 一个城镇小学校教书。我先初很耐心向何之媛讲政策，动员她赔退。她赌咒发誓说：家里没有金银。无论我软硬兼施，就是没有。事情闹成胶着状态，进不是退不 是，搞得脸上没点光彩，不知该怎么办？

这时有个姓丁的武装班长神秘兮兮地向我反映说：何最爱他么女儿何娟娟，只要把她抓起来。何之媛疼 女儿定会交出匿藏的金银。这个武装班长很坏，是个兵痞，除了讨好我外还可以对何娟娟动手动脚，满足某种渴望。我年轻幼稚，认为是个好主意，立刻写张条子压 上村农会大章，派两个武装当夜把何娟娟押了回来。先初，我耐心向她交待政策、动员她站稳革命立场与地主家庭划清界线。可她一口咬定说家里没有窝藏金银，并 向我保证。气得我咬牙、骂她顽固不化，存心作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便把她交给武装处理。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自幼没吃过苦，长得白白净净，色秀楚楚的学生 女娃娃，就在那批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粗鲁无比所谓贫下中农的武装中掀去推来，这个拧一把那个扭一下，快把人扯成八块。最后那个丁班长使出更坏的主意，叫她 光脚光腿跪在炭花碴上。她那白嫩嫩细脚细腿的肉，一压上炭花疼得钻心的叫。她实在受不住，突然哭着叫着，披头散发地跑进我办公室，抱着我双腿哭喊：“黄同 志，饶命呀！黄组长，救命呀！”

在这个骨节眼上，正是考验一个革命者立场的时候，也是我忠不忠于毛主席的时候。房门前站着一群农民武 装，几十双眼睛盯着我，那个丁斑长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我该怎么办？在前途与立场面前，我只能“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了，立即飞起一腿向她当心踢去。 何娟娟啊哟一声惨叫，仰面长伸伸地躺在地上。我把嘴上烟头扔去，手一挥，恶狠狠地大声吩咐道：“给我拉出去，狠狠斗！”

寒冷的夜，凄凉 的风，痛苦的叫声不时传入我的耳际，我久久地站着，心里不断在问：我这样做对吗？我是不是太过了一点？但我终究没有去制止武装们的暴行。后来团部通报表扬 我，说我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唉，伟大的革

命，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已经将我这只山羊灌饱狼奶，当然只有狼性了。在追讨地主赔退上我没有获得全 胜，但在追缴地主浮财上却有了意外的收获。

临解放前国民党在成都西门十二桥活埋了四十二位烈士，其中一位叫于渊的烈士遗孀就住在村里， 于太太为了表示进步主动交出放在城里的几十箱衣服。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我们不相信于太太，认为没有交完竟然开会批斗她。她伤心地在会上哭了起来说："你们 也太不讲理，我放在城里东西不交出未别你们敢去搜么？我既然主动交出还留什么，要相信人呀！"我自知理亏便草草收兵。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十二）

第五章"三、五"运动风暴

建设社会主义要钱，"抗美援朝"要钱，钱从哪里来？向有钱人要。谁是有钱人？开工厂、开商店的资本家。他们不给怎么办？这还不容易，发动个运动，把他们打趴在地上，敢不给吗？除非不要老命差不多。

一、未解鞍马再征战

1951 年 11 月，川西地区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我们还来不及解马下鞍，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又在全国开展起来。这个运动也是毛泽东一手发动和领导 的。12 月 1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中心任务的"三 反"运动在全国机关、党派、团体、部队、学校、企业相继展开。说句天地良心话，当时的机关干部（无论是新参加工作的还是老区来的），大体上保持着艰苦朴素 本色，过着供给制的生活。穿的是蓝色、灰色的干部服，住的是从官僚资本手中接收过来的房屋（单身汉全住的集体宿舍），吃的是按级别规定的大灶、中灶、小 灶，一般干部每月一万二仟元薪贴（旧币，折合新币为一元二角，还得拿出百分之五十捐献"抗美援朝"），处级干部不足五万，地司级约十万元左右。难道还不艰 苦吗？毛泽东就是这个德性，不搞政治运动就过不了日子。

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又在全国开展起来

12 月 8 日他代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中有说“应把这一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一样的重要……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到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1 月 23 日毛泽东不作任何调查了解，发出《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的指示，主观硬性地圈定老虎范围和打虎指标，他说“凡属大批 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有些人以为党的机关，宣传和文化教育机关，民众团体， 用钱不多，必无大老虎，这是不正确的。早几天还以为中央文教机关一个老虎也没有，经过最近两天的寻找研究，就发现至少可以捉到十五个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大老 虎。因此，请你们注意，在每一部门、每一地区三反斗争激烈展开之后，就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他还指示“在 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例如中央一级，在 1 月 18 日以前查出的一万名贪污分子（其中有很多人款数甚少，情节甚轻，迹近贪污，实际不能叫作 贪污）中，只有十八名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至 1 月 18 日，认为可以再查出 50 名。最近两天又有增加。估计将来还有增加。”以上引文见毛泽东（《文 稿》第三册第 87 页）“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必定藏有贪污分子，这样的有罪推定，应是中国的特产。

1 月 24 日，在军队一份报告中 他又作如下批示：“每个大军区系统(包括各级军区和各军)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地方上每个大省也可能有几百只，每个大城市可能有 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八十多只，今天汇报就有一百五十只，可能达到二百只。”

他的“打虎预算”与 日俱增。2 月 11 日《转发华东局打虎预算的批语》说，“华东局指示全区须打大老虎五千只，中小老虎二万只。这是全国各大行政区打虎预

算最高数位”。“华东 军区打一千只大老虎的计划，也是全国各军区中预算最高的。”（《文稿》第 193 页）然后他就要求各区必须大致和华东看齐。这是 2 月 11 日，过了两天 13 日，他又批转华东军区的报告，因为华东军区的打虎预算翻了一番，增为大老虎二千余，中小虎六千余。于是他要求“各大军区按照自己和华东军区人数和经费的比 例，酌情增加自己的打虎预算”（《文稿》第 206 页）。到了 17 日，中南局又把预算提高为“大老虎八千小老虎四万二千余的新计划”（第 221 页）18 日， 他又指示说，中南军区打虎预算为大虎八百只及华东军区的一半，而且华东军区将来大虎可能打至二千五百至三千。因此批评中南军区“勇气不旺”。（第 228 页）毛泽东还规定对揪出来的老虎的处理标准：“只要贪污的情节严重，并有了确实的证据，不管他本人怎样拒不承认，满一亿元或者不满一亿元，都可以定其为大 贪污犯，判处死刑。”这话登上了 1952 年 2 月 2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上。其中还有一句“他本人怎样拒不承认，都可以处以死刑。”接着，张子善丶刘青山被 枭首示众。

就在这个时候，我回到三区区政府，李捷区长看着我即说：“回来啦，现工作特忙，明天就要开揭发会，你帮着去布置下会场。”

我问：“揭发谁？”

李捷区长抬起头，把一双看档的眼睛移向我说：“公安局的李志强。”

“他？”我吃了一惊。

“他怎样？一个侦察科长嘛！”李捷燃上只烟，若有所思，静静地说：“黄牛呀，干革命和行舟一样，不进则退。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说：我们一些同志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面前是英雄，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却是狗熊。李志强挺能干，可他管着公安局的那个秘密商店出了问题……”

“什么问题？”我仍惊疑不定。

“据有人揭发，说他有贪污。”他吸着烟，慢慢吐着烟圈儿说：“张区委和我都同意，只好拿他来开刀，有什么办法！革命是不讲情的啊！今后你得注意这些小事。”

记 得两月前，李志强风尘扑扑来村里找我，拿出张照片叫我看，照片上是个西装革履风度翩翩，长相十分英俊中年人。他说：“这人叫周迅予，当过成都稽查处处长， 后来还当了成都市警备司令。就是他下命令活埋四十二个烈士在十二桥。临解放时跑掉了，从西边跑的。有人说他潜伏在农村，你们这里原是土匪窝窝，现在我们正 在搜捕，如发现什么线索，要立即报告。”说完话就要走，我挽留他说：“急什么李科长，今晚我们加餐，我请你怎样？”

“谢谢你了”他快步如飞，拍着挎包里的干粮说：“我这里面装着比你肉还好吃的东西。”
难道这样的人是贪污分子？回到宿舍我还在想这个问题。

第 二天的揭发会在簸箕街文化馆如期召开，李志强科长披着黄军棉大衣无所谓地笑着说：“同志们，我会贪污吗？我搞侦察，金子、银元见得多，我光棍一个要它有何 用？”尽管他把自已说得清清白白，一尘不染，但与会的同志们不同意，有的吼有的叫：“态度放老实点，别在这里打马虎眼。”接着有人站起来揭发检举，说出许 许多多芝麻蒜皮的事，比如吸烟、喝酒的钱是哪里来的？身上穿的毛衣是用的什么钱买的？无论他怎样解释，大家都不听，非要他承认自已是贪污分子不可。北方人 性格硬，他又是个自幼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出入枪林弹雨一身是伤，突然圆睁两眼火辣辣地冲着大家吼：“老子没有贪污，你们非迫着我认，到底是什么意思？纵然 贪污了，又怎样？”

他这一吼，惹恼了大家，会场乱起来，人们纷纷发言端正他态度，有个公安局的年轻人，虎地跳上台动起手来，他突然拔出 身上的左轮枪，扣动板机，“呯，呯，呯”几下，好在未伤着人，他却被大家制伏后当场抓捕了。他不服，仍大声吼：“老子犯了什么？十几年南征北战，没有功劳 总有苦劳嘛！我要到毛主席那里去告你们，告你们！……”

我心里在想：你告谁去，这不是毛主席一手发动领导的吗？

第二 个挨斗争的是管生活的事务长老王，他是留用人员，没有“本钱”，态度极好，别人叫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叫他跪下他就跪下，大家反斗不起来了。不知为什么， 正当机关“三反”运动向纵深发展的时候，1951 年 1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倡狂进攻的指 示》。过了二十一天的 1 月 26 日，毛泽东下达了《中央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于是“三反运动”套上“五反运动”，一环扣一环，环环相 连，这就是新中国史上的“伟大三五反运动”。

成都市闻风而动，成立了旨在领导“五反运动”的“成都市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我奉命调入了这个委员会。

二、抓“不法资本家”

成都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叫彭塞，中共成都市委的一个头头。办公地点在骡马市街成都市供销合作总社，一个特制的长木牌挂在机关大门上。各方抽调来的人员到齐后，彭塞即向参加此一工作的全体干部，作了一个十分精彩的动员报告。他说：

“一 场大规模的暴风骤雨般的五反运动，即将在全国展开。这个运动是我们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重点是打击‘五毒’俱全的资本家，要把他们行贿干部，偷税漏 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不法行为，予以坚决彻底的揭露，毫不手软地给以打击，配合党、政、军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 的斗争。对于他们各种犯罪行为，不仅要在经济上追赔，还要在政治上搞臭。为使这个运动取得胜利，我们在工作中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出精密 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对资本家要实行分

化瓦解，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 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判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大约反动资本家约占资本家 总数百分之六，其中有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是最反动的资本家，他们就是逮捕，判刑，枪决，没收的对象……”

他的报告，体现了毛泽东的思 想战略战术和具体的方针策略，以及运动开展的方式方法。毛泽东就是这么样一个人，不论做任何事或决定国家命运时，从不作任何的调查论证，更不需要采取任何 的民主程序，也不需要事先对运动作出进程的安排，反正是只要能够做到有罪推定，师出有名，放手发动，大轰大嗡就可以了。至于怎样具体开展运动，政策界限， 后果估量，他从来是不事前讨论安排。其特点是不讲科学，不讲民主，不讲法制，而是发动了再说，反正最后总是会取得“伟大的胜利”。这种领导政治运动的方 法，从“镇反”到“肃反”，从“土地改革”到“三反五反”运动，及至后来的“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对私改造”的“公私合营”、“反右斗争”、 “文化大革命”，直到他 1976 年命归西天，他从不害怕造成天下大乱，也不害怕杀多少人和死多少人，反正我手里有枪杆子，你敢怎样？

这个五反运动到底会对国计民生会造成什么影响，他也是不考虑的。在领导政治运动方面，他总一厢情愿的主观唯心主义，而中央政治局的那些委员们，从来都是充当他的应声虫。由于他固执疯狂，好大喜功，头脑发热，在他执政的 27 个春秋，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万劫不复的苦难。

参 加节俭会的两百多个干部，经过几天的短暂学习，按成都市工商行业的分布情况，编成二十多个“打虎队”，我当然编入成都市茶叶行业的“打虎队”。队长车毅英 （车耀先烈士的女儿），二十五六岁，精精干干，虎气十足。我是成都市茶叶工会的青工委员现又是打虎队队员，便成了她相信和依靠的物件，几乎无事不找我商 量。按照上级的布置，我们首先将茶叶行业一百三十八家茶叶店，按大、中、小三个不同的等级排队，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违法户、严重违 法户等五大类。

凡是生意做得大又有钱的茶叶店老板，都是违法户或严重违法户，那些中不溜的茶叶店，大都划入半违法半守法户的范围，那些 雇一两个工人的茶叶店，绝大部份是基本守法户和守法户。开初我不明白这划分的标准根据是什么？我问车毅英队长，她笑笑十分坦然地说：“不违法怎么能赚大 钱？我们把他们列为违法户或严重违法户，就是要向他们追索赔款，罚他个精光，罚他个倾家荡产。”

“哦”我似乎明白了“五反运动”的目 的，就是通过赔退罚款等手段，把资本家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钱财收归国家，再通过政治上的严酷打击，使他们服服帖帖、永远归顺共产党。为了党和毛主席的伟大 革命事业，我义不容辞率先站出来向全市茶叶业工人，作现身说法的动员报告。在报告中我再强调：“我们是翻身的工人阶级，国家的主人，不要怕打击报复，不要 怕被老板开除，如果哪个老板敢于打击报复，开除工人弟兄，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有共产党撑腰，有毛主席支持，什么也不要怕，一 定要勇敢地站出来

揭发检举‘五毒’俱全的资本家，特别是检举揭发自已朝夕相处的老板。”说到这里我还大声问一句：“敢不敢？”

“敢！”会场山呼海啸，情绪激昂。

我讲完话，车队长接过头说：“黄泽荣同志过去和你们一样，也是个受压迫受剥削的工人，由于他敢站出来跟着共产党走，现在不是和我一样都是国家的干部了吗？你们为什么不赶快站出来，跟资本家作斗争，跟老板作斗争，争取当国家干部呀！”

谁 不想翻身？谁不想当国家干部？我们首先从青年工人入手，他们总想改变自已没钱没势的地位，易于鼓噪易于发动。现在机会来了，怎能轻易放过？我们先封他们为 “打虎队员”，许以这样和那样的承诺。不几天就把他们发动起来，大家争着表决心，提保证，在此情况下，再将我们事先拟好的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半守户半违 法户的名单，拿出来交给他们讨论。他们竟然比我们还左，把全行的老板都定为违法户和严重违法户。我们只好笑着耐心作工作，强调要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能通通 斩尽杀绝，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在排队分类名单落实后，然后再分人头包干揪要揪的“老虎”。

在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后，揭发“不法资本家”的斗争大会先在几家最大的茶叶商店召开，被斗的老板站在工人当中，任工人吼任工人骂，任工人推过去拉过来，搞得这些被斗的资本家头昏眼花，骨头散架。一天 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三天，直到被斗的资本家承认交待自己的违法事实为止。如遇上顽固的资本家，不承认自己违法事实，我们除坚持天天斗争外，还罚跪罚站顶板 凳，再不，几天几夜不准睡觉，还在商店周围主要街道的每根电线杆上，安装了高音大喇叭，每天从早到晚不间断地呼喊口号，或是指名道姓地点他名字，并叫工人 宣读揭发他的材料，要他立刻交代问题。除此就是宣读中央和省市委档，一再交待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抗拒交代，死路一条”这类软硬兼施的语言， 一句话空气中全是浓浓的火药味，每个分子都是致人于死地的子弹。我发现只要喇叭一响，那些大小商店的老板无不侧身站在店门口竖起耳朵专心静听。他们时时刻 刻准备被点名，只图侥幸度过每一个白天，即使听到点名点的是别人，也没有了幸灾乐祸的轻松或窃笑。至于大幅的漫画，招贴，标语，当然更是随处可见。翻开每 天的《川西日报》（四川日报的前身）和中央各报，每版皆是揭发声讨不法资本家的文章，字字句句全是某省某市不法资本家被捕被判的消息，风声鹤唳，草木皆 兵，谁不为之怵悚惊心啊！

打虎队员个个干劲十足，意气风发，威风八面，颐指气使，只要在哪家商店门前一站，那里的老板立刻吓得魂飞魄 散，身子骨抖得来象筛米糠一般。不几天，全市便出现被批斗的资本家自杀事件，有的跳楼、有的上吊、有的抹喉、有的投水……开始我们有些犹疑，不知如何是 好？市里节俭会得知情况后说，死几个违法犯罪的资本家有什么了不起，这是他们存心和党和人民作对，这叫“畏罪自杀”。

茶叶业陆羽春的邹 老板，因不满批判斗争全家六口服毒，经抢救救活四人，他

和老伴死了。尽管上面说不怕资本家自杀，实际也怕，认为这样会影响不好。节检会暗地叫我们注意方 法，尽可能不要发生自杀事件，对紧张过度的资本家要作思想安抚工作。我们三师傅张叔奇被定为“严重违法户”，怕遭到逮捕，全家大小吓得啼啼哭哭夜里睡不 好，白天吃不好，有想死的打算。车队长得知此一情况后，叫我去做思想工作。我一去到店里师婆就语无伦次地说：“黄，黄，师兄，不，黄政府，呵，呵…黄，工 作队，过去有什对不起你的事，不要放在心上，都是我的错，你是知道的，我们做生意从没有偷过工，减过料啊！更没有偷过税，你和我们师徒一场，要说说公道话 啊！”

我感到十分骄傲，过去低眉下气的地方，今天却高出他们一头，连当年对我恶狠狠的师婆也不得不笑脸相迎。时代变了，地位变了，我真 成国家主人。但师傅总是师傅，不能太过分，既然求到我，我也不能太刁难别人，便态度十分和霭地说：“师婆，你要相信党，相信政府政策，我们工作队不会宽枉 一个好人，只要赔退了就没有事”

师婆抹着眼泪道：“怎么赔退得出几十亿啊！”

我只好坦露心曲道：“师婆，到这个时候了，你是保钱还是保人？”

在一旁的三师傅，明白我话中意思，急忙说：“妈，师兄说了，只要赔退，就不会逮捕。钱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退，砸锅卖铁都退！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在我离开时，三师傅一再感谢说：“只要不斗争，不逮捕，什么事都好办。”

这 时我似乎明白“赔退”是“五反”的根本目的。“五反”反什么？就是要资本家把钱拿出，拿得越多越好！从市节俭会传来一个消息，说南门大桥外那个被定为“严 重违法户”的万里香海椒面商店，退出了九百多两黄金，成为成都市“五反”运动特大喜讯。谁也不相信，一个做海椒面生意的小店老板，怎么能退出这么多的黄金 子，但确实退了这么多。原来在 1949 年前夕，国民党退守西昌，准备再从西昌退到缅甸或泰国。兵荒马乱的一天下午，从一辆南去宾士的军车上掉下一个木箱， 正好在万里香海椒面商店门前的街面上，当时人们以为箱子里面装的是枪支子弹，谁也不敢拾起。因它妨碍交通，有人将它翻在路边，到了晚上没人的时候，万里香 海椒面老板将木箱搬回屋里，撬开一看，呀！里面全装的是亮闪闪黄灿灿的黄金，有一百条，每条十两，整整一千两啊！每条上面还烙有中央银行印记。后来，万里 香海椒面生意越做越大，成了成都市最大的海椒面大王，声名在外。由于生意大名声大，“五反”时当然被列为“严重违法户”。在赔退阶段被追得没有办法，便拿 出几两黄金交给工作组，却发现上面有中央银行烙印。工作组再加大力度穷退，事情原尾露了馅，万里香老板不得不将此箱黄金退还国家。

不几 天，1952 年 4 月初，成都市召开各行各业不法资本家赔退大会，地点在成都军区北较场的大操场坝子里。那天，中共川西区党委书记李井泉亲临大会。大会主席 台前放了几十张长条桌，桌上摆满金条、金砖、金元宝，银元、银锭、银撬宝，黄灿灿白晃晃一大片，在阳光下耀得人眼睛都睁不开。这是我平生已来

看见这么多的 金子银子。那些被定为违法户和严重违法户的不法资本家，排着长队，抱着人民币、美钞、金银财宝、珍珠玉器，依次上台向人民请罪，向政府认罪，然后低头弯腰 把手中财宝恭恭敬敬放在桌上，然后退着身子走下来。那天，三师傅张叔奇也在这个行列里，我十分高兴他终于“幡然悔悟”走了“坦白从宽”的“光明大道”。

事 过六十年后，我们才得知当年“五反运动”的真实情况。据山东大学附中李昌玉先生在他所着的《五反运动谜面与谜底》一文中写道：据一份《内参》（见《重庆 “五反”转入处理阶段以来自杀案件增多》记载：１９５２年5月重庆市“五反”运动转入处理中小户，复查四、五类违法户以来，自杀案件日益增多。截至九日 止，自杀总数达一百二十多起，死者七十多人，未死者四十六人。其中除一部分为情节严重的大盗窃犯外，有一部分系中小工商业者，本身违法不大，有的才几十万 元，有的还是职员。一般多是问题严重或与政治问题有联系的畏罪自杀；个别的是由于检查人员逼供。造成中小户自杀者多是由于检查人员工作方式简单，政策交代 不够，未安定其情绪；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坏分子恐吓，造成自杀。二、三区均发现有定中小户为“大虎”逼死的严重事件，群众影响极不好，对死者多表 同情，坏分子并乘机造谣，情节恶劣的奸商甚至借此反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集体自杀的现象出现。牙刷业有几个奸商被管制后，互相递条子商量自杀。大美绸 布店股东之一的翟大庆４月８日晚与妻子、母亲一同自杀而死，原因尚未查明。对此问题有的单位已引起注意。

“五反”运动自杀的规模在中国 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更上一层楼。谢泳先生写道：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 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

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尸 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人满为 患。其他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渖阳、广州各处商埠，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

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 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么！我经 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当年，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曾戏谑跳楼自杀者为“空降部队”。上海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 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僻静之处，均派兵巡逻，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筑上竹芭，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 不准人行近江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 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藉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随行相跟， 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

谢泳的文章《1949——1976 年间中国知识份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说：“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 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駡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正是这种自杀哲学的现象：连自杀也要叫你恐惧！”五 反运动的自杀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逼迫交代“五毒”的钱数，每个资本家当然心知肚明，交代之后是要如数“退赔”的。你并没有偷税，没有偷那么多税，为 了“过关”，你交代了多少多少，以后怎么办？那只有一死了之。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十三）

三、在市税局抓“老虎”

到了 1952 年 4 月，“五反运动”突然降温。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重庆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自杀的 原因。民生轮船公司 59 岁的卢作孚先生，是周恩来亲自说服动员，才从香港率四十多条轮船回大陆的资本家，他为中共的新中国恢复发展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他 却在毛泽东《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之后 13 天，亦该公司开展运动的第一天（1952 年 3 月 8 日）服毒自杀，有人说 这是作为中国“船王”卢作孚先生以死对毛泽东发动五反运动的“尸谏”，在国内外以至共产党的高层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再加上上海、北京等地不少资本家的自 杀，运动才逐步缓冲下来。

也就在此之后茶叶业的“五反运动”进入尾声，我又调到成都市税务局去揪“大老虎”。行前领导向我们布置工作时 说：市税局是和资本家打交道的机关，干部有一半是留用人员，有很多是被资产阶级拉下水的贪污分子，因此是运动的重中之重，有很多“老虎”，调你们去就是揪 出“大老虎”。在我们去前市税局就揪了一个姓邱的“大老虎”，贪污数额高达六十多亿（旧币）。

递交“坦白书”

成都市税务局在提督街，下辖八个分局近 50 多个稽征组，此时已基本不办公，人员集中在鼓楼街一处大院子宿舍里学习，人员分编为 12 个小组，吃住一 起，行动统一，大门有卫兵守护，外出得有门条。表面上是学习，实际是集训追查问题。每天从早到晚依次逐个检查交待，然后由大家帮助分析找问题，再根据各人的检查交待由打虎办确定追查物件。

我这个组共有 16 名组员，有 12 人是留用人员（国民党时代的税工），他们精通业务，曾是各基层单位的 股长或稽征组长，均直接和工商业主打交道，均列为是重点的审查对象。另外一人是延安来的老革命，大家叫他老耿。老耿没有文化，几十年不是当事务长便是当伙 夫头，来成都后安排在市税务局后当总务，负责操办伙食。俗话说“久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因此也作为怀疑对象编入这个小组。但领导却再三向我交待，老耿 的问题靠他自我提高，不能追打。除此我和另外两人是“打虎手”。根据市委的估计，大小贪污的人要占市税局总人数的 ４０%，其中“大老虎”要占一半，那么我 们这个 13 人的小组至少有六个“老虎”。

这样多的“老虎”任务真够大！经过多次研究，决定十六字的工作方法：“大胆怀疑，找出重点，抓 住老虎，穷追不舍”。作法是先学习中央和省市档，然后对照检查，大家帮助分析批判，人人过关提高。记得印象最深的一个姓王的小税官，他原是三分局地税科科 长。他为人老实但交的二杆子，有天生的表现欲，在一次自我检查中说：“感谢党和毛主席及时开展了伟大的‘三反’运动，不然我会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 中”。接着，他举了个例子说：“有个电器行的资本家有偷税漏税行为，被我发现后立即抓住不放。这个资本家很狡猾，先是认罪认错，痛哭流涕地骂自己。后来却 非得请我吃饭，叫我高抬贵手，放他一马……”

其实他在表功，想显示自己能力强革命立场坚定。我们却认为他是不经意地暴露了问题，立即抓住空隙猛追下去。我不动声色地笑笑问：“去了吗？”

他眉毛一扬，嘿嘿一笑道：“当然去了，怕什么，吃就吃。我心里想，吃了你的饭该罚的照罚……”

“不对吧，”一位同我调来的刘姓打虎队员岔断道：“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软，你怎么还会罚人家呢？这太不合乎道理了吧？”

“罚啦”他得意洋洋，还用竹棍剔着牙。

“罚了多少？”我跟上一句。

“两百万（指旧币，一万元折合现人民一元，即 200 元）。”他笑着伸出两个指头。

“应该罚多少呢，不只两百万吧？他那么大一个电器行，一月进出业务几百亿，就是偷一个亿的税，也该罚二千万啊！你才罚他两百万，这顿饭的代价未免太昂

贵了吧？”另一位姓张的打虎队员分析道。

他 语塞，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发现自己钻进了一个自编自织的套子，出不来了。我趁势进逼说：“王同志，态度是真诚的，思想动机是好的，能主动检查出自己的问 题是进步的表现，靠近组织的表现，我们表示欢迎。但是，看得出你还有顾虑，大大留了一手。我希望你要拿出勇气来，一定要脱光裤子割尾巴，才能轻装上阵。” 于是，大家跟着我的调子，你一句我一句分析批判起来，积极向纵深发展。在猛烈炮火的围攻下，他节节败退，逐步走上了不能自圆其说的绝境，开始承认，他不仅 吃了饭，还接受资本家送的烟和酒。大家又帮他分析提高，既收了礼没有不收钱的道理。我便进一步动员他坦白交待，立功受奖，相信领导，靠扰组织，不要有任何 顾虑。分析批判到晚上，他终于承认从资本家手里接过八万元的红包（那时我们供给制干部每月是一万二千元人民币，处局长是五万元人民币）。

猎 物出现，我甚为高兴，立即向领导汇报。领导作了研究后指示：这仅仅是开始，他决不是几万元的问题，是几十万几百万、上亿的问题，要集中力量穷追猛打，不获 全胜决不收兵！根据领导的布置，我们集中力量马不停蹄，日夜追击。为了以逸待劳，分成三个小班用“车轮战术”对付他。并一再向他交待党“坦白从宽，抗拒从 严”的政策。在引和诱的策略与强打猛攻、双管齐下手段的重击下，他从八万元的红包，节节上升八十万、八百万、八千万、八个亿、八十个亿，成了全局全市打出 的一只最大的“大老虎”，很快隔离单关，消息见报。

我所在的组一共揪出大小“老虎”七只，在整个“打虎队”中名列前茅，多次受到局领导 的表扬。我对自己的诱骗行为，一点不感到脸红，反认为自己工作能力强，在忠实执行党和毛主席的政策，做着有益于革命和人民的事情，对揪出的“老虎”毫不怀 疑他们的虚假性，不是变相的逼供信，是他们主动的坦白交待。当时市税局关押的“大老虎”有十七八个之多，这些人全关在机关后一排的房子里，日夜有人监守， 只能吃饭解便才准外出。一个个篷头垢面像叫化子，走路躬背弯腰一付惨兮兮样子。其中还有一位是我姐姐“姻亲姊妹”的丈夫唐先生，他是大学生，解放前就在市 税局作课长，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精神极了！现在倒楣透顶，关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房子里，天天反省，天天交待，一身脏臭，人不人鬼不鬼，不敢正面看我一 眼，我也不正面看他，相互就像不认识。我心里在想：“这是个人，怎么也成了‘大老虎’？”

一个晚上老耿没事和我闲聊，他一边叭哒叹哒吸 着北方特有的旱烟杆问我：“小黄，老虎揪得差不多了吧?只要完成任务就行了，不要再追下去了。人呀，得放手时且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迷惘地望着他， 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听他继续说：“这十几年我看得多了，从延安整风到大生产运动、那次不揪十个八个、可运动一结束大家又一锅吃饭了。小伙子，你才跨进这个 门槛，今后的路还长啊！”

我虽不同意他的观点，可不敢回顶他，别人是老八路啊！我想了一下，便岔开这件事问他：“过去说的大生产运动是不是开垦南泥湾?”他一下来劲了，满脸红光，精神显得异常兴奋，说：“可热闹了，白天开荒，晚上纳军鞋，我老耿有的

是力气，手又巧，得过全师模范。”

我又问：“粮食收得多吗？水稻还是小麦”他愣愣说：“什么水稻、小麦，那是个厕屎不生蛆的地方，根本长不出庄稼。全种的是鸦片。”我瞪双大眼睛惊得说不出话来：“那不是犯法吗？”

他 哈哈地笑起来说：“闹革命干什么都不犯法，小伙子你知道不-——”，他环顾左右压低声音说：“一亩地种粮食，收三百斤棒子顶上天，可一亩地种上鸦片，就能 换回一百亩地所产的粮食，那可是黄金啊！把鸦片换成钱买布料、药品、枪枝弹药，闹革命呀管它干什么，只要有利。”我哑了，心里在问：“南泥湾竟然是种鸦片 的地方吗？这不是坑人害人么？”不过我从不敢向任何人说起这事，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但几十年从不间断问自己：“南泥湾是种鸦片的地方吗？”

“三 反”最后一个阶段是追赃，谁知这成了大问题，那些打出的“大小老虎”一个子儿也拿不出，无论怎样逼也逼不出，于是自杀事件成了运动的主轴戏。有天，一个山 东汉子、原六分局稽征所的张姓所长，被打成“老虎”后爱人向他提出离婚，加之来去有人跟着，没有点自由，觉得很没面子，那天吃午饭趁跟他的人不注意，悄悄 跑进厨房，抓起一把锋利无比的菜刀，就像吹口琴样对着喉咙来去抹，顿时鲜红的血喷了几公尺远，吓得饭堂里的人鸡飞狗跳。另一个是姓苏的女士，是南京中央大 学学生，打成“老虎”后退不出赃，一个晚上借大家熟睡之机用根绳子吊死在梁上；还有一个姓陈的年轻姑娘也跳在井里淹死了。所幸运动很快结束，好些问题不了 了之，不然还会屈死多少人哩！

不几天局党委召开中心积极分子会议，研究贪污分子的退赃问题。主持会议的郝局长是个老八路，特别喜欢我， 常夸我工作积极，立场坚定，对党忠诚。会议正开到关键时，传达刘老头推门伸进脑袋向我说：“黄同志，有人找。”我眼也不看道：“没时间，叫他等一下。”刘 老头不肯离去：“我说啦，她说一定要见你。”我嘟哝一声：“乱弹琴。”正在思索问题的郝局长扔掉烟头笑嘻嘻问道：“什么事这么重要啊！喂，刘老头，是男还 是女？”刘老头应道：“一个姑娘。”

“姑娘？”郝局长咧开大嘴催着我说：“快去，快去，媳妇都找上门来了。”他一句玩笑话，逗得参加会 的同志纵喉大笑，弄得我一副窘态，脸红得像个番茄。我出得会场，穿厅过院，一边走一边想：是哪个姑娘不揣冒昧来找我呢？想来想去没个结果，步入会客室，我 一下愣住了，眼前这位短头发，身穿花哔叽棉袄，胸脯高耸，脸儿红润的姑娘好面熟，是谁呢一时想不起来。

她笑盈盈地从木椅上站立起，很有礼貌地招呼：“当官了，连我也认不出来了。”“哦，宝宜！”我冲口而出，但马上觉得话不妥，立即更正：“你好，王宝宜同志，几时回来的？”
我们相视对坐，久久没有说话，我一边打量她，一边心里在嘀咕：“变了，变了，已经不是一个姑娘了……”

“昨天才回来，一下车就打听你，问了好些人，才知你在这里。”她说，声音还

是那么圆润，那么好听，但我却不舒服。“妈妈听人说你，您调到税务局来工作了，工作很有成绩。”对她的称赞我并不在意，觉得勉强、做作，随即打断话头问：“这次回来要住多久？”

“不走啦。”她说，低下了头，发光的脸上浮起两片乌云：“唉，真倒楣，他是贪污分子，一月前畏罪自杀了。在重庆我住不下去了，只好回来。”我屏住呼吸听着，无声地玩着手中的茶杯，她那高耸的胸脯像压迫人的山峰，老是在我眼前转，使人有点喘不过气。

“妈 妈老了，爸爸没有工作，家里生活困难，听说成都不少单位要招人，你能不能帮我一下忙？”她的话象低沉的琴弦，一声声，一字字，酸得人心痛。我虽然同情她不 幸的遭遇，然而绝没有勇气为她作牺牲。有什么办法，在这个讲“阶级斗争”和“政治立场”的年代，谁叫我过早的成熟，一个人做什么事不能不权衡利害得失啊！ 我淡淡一笑，用那种既不是推诿也不是肯定的官场口吻说：“这样，你留个通讯位址，我和领导研究一下，回头告诉你，如何？”她无可奈何地点点头，留下通讯位 址悄然走了。

我没有去，一直没有去，几乎遗忘了这件事，半个月后接到她一封从重庆发来的信：

“泽荣：你好。

我 又回到了我所不喜欢的地方。这地方没有亲人，没有我熟悉的面孔，一草一木都十分陌生，可有什么办法呢？要活下去呀？虽然我们相识偶然，可那一瓢水，却在我 无尘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拂拭去的痕迹。解放前是贫富悬殊使我们不能接近，解放后一个新的悬殊把我们隔得更远。这不怨你，只怨我不该出生在这个家庭里，同时 也怨我缺乏勇气，如果当初不离开，也不会演出这样一出悲剧。所以此次返归故里，并不抱什么奢望，我明白，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只想找个工作在故乡住下 来，使受伤的心能得到一丝抚慰，一点温暖。然而，就连这一点也难办到，我只好又走了……”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十四）

第六章和平的岁月

毛泽东是一个不喜欢休息的人，他也讨厌别人休息。纵是在极短极短的和平岁月，他也要想些道道出来折磨老百姓。共产党也是一个喜欢折腾人的党，也难怪了它，因为它教育培养出来的干部只会搞运动，对其余事既不懂也不喜欢，我也是这样一个“运动迷”。

一、在区政府的日子

“土 地改革”结束，“三反”、“五反”落下帷幕，战争给经济带来的创伤正在恢复，社会秩序一天一天安稳好转，全省以至全国呈现出一派祥和气氛。三街六市笑语缤 纷，商店林立生意火红；餐馆茶肆高朋满座，猜拳行令谈笑风生。姑娘们不再穿清一色的灰制服，只要逢星期日和节假天便打扮起来，连衣裙。花衬衫，蝴蝶结，红 裤衩，千姿百态，光彩照人；小伙子也可着便装和穿自已喜欢的衣服，有个别人还穿上了西装结上了领带。城市乡村再看不见乞丐、妓女，大街小巷更没有小偷、扒 手，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市税局方秘书长要把我留下来，说税务工作重要，有发展前途。我不愿意，认为作税工没有党政机关干部吃香，何况李捷区长又那样看重我，一天几次电话要方秘书长放人。市税务局无法留住只好放行，1952 年夏我回到了成都市第三区人民政府李捷区长的身边。

第 三区人民政府位于北门外簸箕下街李家巷口，正对梁家巷。原是一个李姓大商人、大地主的公馆，土改赔退收归政府。公馆面向大街，占地三四亩，黑漆大门，院落 深深，大小房屋不下二十多间。第一重是敞厅，两侧是厢房，当中是条长形的天井，有几株石榴树，冬季枝茂叶密，夏来榴花似火。第二重是个十分典雅的雕花堂 厅，两侧是书房茶室，红木地板红木墙裙， 一派富丽堂皇。客厅后是个玲珑剔透的小花园，种着昔日主人喜爱的葡萄柑桔，还有一个紫藤花棚，空气里老飘着清香。 与小花园对称的是两间耳房，可能是用于摆放古董或藏书的地方。再后是几三幢只有两层的小洋楼，由一条弯曲的甬道相连，但互不失独立风格，每幢错落有致，各 有千秋。小洋楼三面是个开阔的大花园，有假山有亭榭，种了不少树木。花园尽头的墙外面是条清澈的小溪，水深过人四季流淌，夜来蛙声一遍，白日千鳞跃水。每 到大热天便成了我们天然的游泳地，使人有重返大自然界的奇趣。小溪连着青青的田畴，四周散落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户，它归属马鞍乡管辖。这座公馆 自变成政府机关后，一下残落不全，分割成小块小块的办公室，显得零乱，不禁使人想起李后主的词“雕栏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颜改。”

我暂时 分配在生产建设科，负责人是老相识潘清雍。他还是那个样子黑黑瘦瘦，一身灰制服，只脚下元宝胶鞋换成了黄色翻毛半统皮鞋，这是五十年代的奢侈品，买这样一 双皮鞋得花三个月供给制的工资。他老家是安岳人，川大肄业生，家庭地主，从不与父母通信，界线划得清楚。在驷马乡土改团时我俩关系不错，我叫他老潘，他叫 我黄牛，近似弟兄无话不谈，心与心不存芥蒂。他一见面我就高兴地拍打着我的肩头说：“黄牛，想死你了，我向李区长催要你好多次，现在终于回来了，今后就坐 机关啦，不再当‘万金油’干部罗（指专搞运动的干部）。”

我望着他傻傻地笑了会儿道：“‘万金油’干部有什么不好，挺锻炼人的。”他坐 在藤椅上，呷上茶吸上烟，踌躅满志说：“现在国家一切工作转向建设，哪还有运动搞，所以才叫你回生产建设科。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个很重要的科？喂，你想干 什么？科里事可多了，分工也细，有乡村建设，修路修桥；有水利工程，淘河筑坝；有畜牧饲养，发展家禽；还有良种推广，推广科学种田的农技站，我正愁忙不过 来，科里才五个人怎么打开局面？你来了，我就放心了哟。”

五十年代初的政府机构，人精干责任心强，办起事来从不拖垃，没有“研究研究”的毛病，当然更不会要人“红包”。一个管着近二十多万人口的区人民政府，加上公安、法院、检查院也不超过百人。区政府下面只有民政、地政、文教、工商、建 设、秘书等六大科室，哪像现在重床架屋的官僚衙门。

老潘把工作情况介绍完后，特别提到人事问题，他神秘兮兮压低声音说：“科里六个人里只有你我两人是团员，组织上调你来是有目的的，今后工作拿不起来打板子可不是我一人了。”语毕哈哈大笑。

那 四人一叫陈崇阳，分工管水利；一叫徐泽昆，分工管乡村建设。另外两个人，一姓张的管畜牧，一姓王的女同管良种；我顶上无人管的“推广科学种田”。因团员身 份特殊，老潘不在时就由我负责科里事，别人戏称我为“二号”。这些人文化水准都比我高，常常表现出不服气的情绪。但我是从运动中拼杀出来的又深得领导信任 的干部，谁也不敢当面与我叫板。一次，那个姓张的工作上不服从安排，我便当众尅了他一顿：“你别翘尾巴，比你有本事的人多，你要搞清楚，我是代表组织在给 你安排工作，你不服从，就等于不服从老潘。”这招还真灵，大家都支持我，他不得不认错。接着我又被推选为机关团支部宣教委员，可以代表团组织找人谈话，应 了老百姓说的“人在走运的时候，喝凉水都是甜的。”

为了适应革命发展形势，区政府圈了四五亩农田修建一楼办公二楼开会的简易办公楼，但 经费不够，李捷区长决定全部土石方工程由机关干部承担，挖房基和挑土填方，机关男女干部全参予，一个不拉。李捷区长身先士卒，戴着一顶草帽，脖子上搭条毛 巾，肩挑泥土跑得风快，我紧跟在他后面一步不拉。毕竟他年长我十岁，没干多少长时间就不行了，放下挑子不停喘气，向大家说：“同志们，你们要向黄牛学习 呀！你看他多卖力，劳动人民出身的子弟就是热爱劳动。”他这一鼓励，不但我劲头更大，其他想歇的人也不敢歇了，只是苦了那些出身富有家庭的公子小姐，一个 个累得气喘吁吁，腰都直不起来，暗地骂我：“只图个人表现，不怕别人肋巴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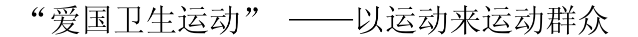
一天下午李捷区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说：“黄牛，今晚全 市要逮捕烟毒犯，你去公安局协助工作，抓了人后组织游街示众，大概要一周时间。”我立即去公安局向李运成局长报到，大约有二十多人组成一个肃毒专门机构， 市局戴星樵副局长正在培训大家搜查技术。他说：“烟毒犯都是一批狡诈之徒，又亡命又阴险，如果抓不到证据他们不会承认自己犯罪。因此搜查是项很重要的工 作，怎么搜？这不仅是个技术问题，更重要是个观察分析的问题。毒品放置有时不是在秘密地方，而是在十分明显之处，又常常不为人们注意的地方……”我对他的 讲话听得入迷，特别是后面两句“毒品放置有时不是在秘密地方，而是在十分明显之处，又常常不为人们注意的地方”牢牢地记在心里。

抓捕行 动从下夜一点开始，凌晨四点结束。我分配的任务是在金华街抓一个开酱园铺的烟毒犯，这家酱园铺后面临近府河，家里有四个人。派出所户籍带着我们来到这个酱 园铺，我首先布置武装截住后门，以防抓捕的物件逃跑。想不到这个烟毒犯很镇静，大大方方拉亮电灯，冲着我们问：“同志，这半夜深更叫我

起来有什么事？”随 来的公安局同志掏出枪对准他说：“不准动，你是烟毒犯，被逮捕了。”他笑笑道：“你们搞错了吧，我可是个老老实实的生意人啊！”我手一挥，两个武装即上前 将他捆上，我们一行人立即翻箱倒柜进行搜查，可是查个底朝天却一无所获。捆在一旁的烟毒犯却得意地说：“咋样，我早说过我是老老实实生意人，搞错了吧？” 那个公安局的同志气得打了他一个巴掌，狠狠骂道：“妈屁，牙巴骨才错了，老子要搜出毒品今晚非毙了你不可。”烟毒犯把头一昂道：“那你们就搜吧！”大家又 搜了遍仍一无所获，我用眼扫扫四周发现货柜上有不少瓶瓶罐罐，突然想起戴局长讲的话“毒品放置有时不是在秘密地方，而是在十分明显之处又常常不为人们注意 的地方”该不会放在那里面吧？我立刻下令搜查货架，一下查出了许多毒品。我拿着搜出的毒品问烟毒犯：“你是老老实实的生意人吗？”他脸色顿时变成灰土，浑 身不住地罗嗦，低下头不停地认错说：“我有罪，我有罪，该枪毙！该枪毙！”

第二天五辆大卡车装者十多个捆得像肥猪样的烟毒犯，胸前挂着 有自己名字的大纸牌，在武装押解下周游全区。我和公安局的同志坐在司机台里，一路上用大喇叭喊叫：“坚决取缔毒品！坚决打击烟毒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全区人民行动起来，检举揭发烟毒犯！立功受奨！立大功受大奨！”

二、才华能力的展现



“爱国卫生运动” ——以运动来运动群众

为了迎接“亚州地区和平代表大会”全国发起开展移风易俗的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共产党无论干什么事，不论好事还是坏事，都以发动群众来开展运动，以运动来运动群众，故来时一股风，去时不见踪。运动运动，不运就不动。

为使工作出迅速开展起来，李捷区长亲自点将派我去簸箕街街道办事处主抓此项工 作。行前区委书记张烈夫，特地语重心长地向我说：“小黄（他不叫我黄牛），爱国卫生运动是当前全市的中心工作，也是全区的中心工作。这是个移风易俗的工 作，中央十分重视，全成都市搞得最好的是牛市口全心巷，报上多次作了宣传介绍，市里也有表扬。这次李区长和我决定调你去簸箕街街道办事处去，相信你会做出 成绩，超过其他办事处，甚至超过牛市口的全心巷。去后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即时汇报，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

我心里很激动，激动的不单是领导对我相信，是自已有机会独挑一面。我信心十足，立即表示道：“请张区委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簸 箕街街道办事处和簸箕街派出所在一起办公，紧挨成都市中，主任加办事员一共三人。两个助手都是新从“革大”分来不久的女同志，做什么事都摸头不知脑，那个 叫姚红菊的长得矮胖胖像个冬瓜，脸蛋儿也不怎么好看，加上性格死板说话词不达意，思想上又不追求进步，我有点看不起；另一个叫王琴玉，原是裕华纱厂挡车 工，身段修长窈窕，长得白白净净，一双丹凤眼光泽照人，脸颊上两个小酒窝笑起来十分迷人。她比我长一岁，表面看却比我小。她对我特好、生活上十分关照，人 前叫我主任人后叫我弟娃，什么话都向我谈，包括谁想追她爱她。一次她悄悄向我说：“弟娃，好怪呵，那个小白脸‘特口’（负责特种户口的员警），几次给我写 条子说这说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听后不知为什么有点醋意，便不满意地回道：“有什么怎么办，还不明白这叫老鼠带枪---有打猫心肠。”

她 哧哧哧地笑个不停，然后道：“不过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蛋，想昏了头。爱他还不如爱你哩！”她语气极为挑逗，说完望着我痴痴一笑。她说的是真话，但我不能爱 她，中国有句谚语“男大十不算大，女大一就成妈”。我不敢看她眼睛，忙用话支开说：“王姐，全心巷你去看过没有，他们怎么搞得那么好？”她显得有点不高 兴，冷冷地说：“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把门板洗得干净，表面文章谁做不来。”

“好嘛，”我装着生气的样子说：“你这个当姐的，就这样支援弟娃的工作？星期六请你看电影的事吹了。”

“不要吹，不要吹，我的好弟娃”她猛抓住我的手，不停地哀求道：“我最支持黄主任的工作，压过全心巷，在我们张家巷插上红旗！”

“张 家巷，我们办事处有张家巷？”一个闪光的浪花从我思想上滚过。经过深入调查了解，发现张家巷有很好的卫生群众基础。美国一家收养弃儿的育婴堂就在那里，居 民自来爱卫生。重点选定后，我便亲自前往坐阵指挥，首先激发大家求上好胜的热情，然后和居民一起洗门窗、擦地板，用扫帚把一个一个死角打扫干净，再后组织 检查评选，做得好的表扬，不好的批评。这就是我学到的群众运动的方法，这是任何运动都离不开的方法。我又如法炮制全心巷的经验，做一杆流动红旗作为全办事 处八个居委会争评的奖品，谁个居委会评上，就把红旗挂在这个居委会，当然红旗挂在了张家巷。

巧好川西日报记者来采访，我立即热情地陪着 记者前往参观，并主动介绍情况，做到有问必答，有究必应，想看哪一家就看哪一家。我态度诚恳，办事认真，很为记者赞赏。不几天川西日报发表了通讯报导《红 旗飘扬在张家巷》。接着，我又选择了第二个重点，组织城隍庙屠宰场一百多位工人，把一个百年的臭水塘填平，报纸竟然把它同北京的龙须沟相提并论。

原 成都四个城门都有城隍庙，北门城隍庙是其中最大的一个，特别是那个阎罗地狱里一比一的彩色泥塑像，什么“下油锅”、“铡刀铡”、“磨子推”、“钉钉板”、 “雷打张继保”等塑得惟妙惟肖生动逼真，它用流传在民间的故事起到掸恶扬善的作用，藉以警示世：生前行善做好事，来生必然做官当富人，若做多了恶事坏事， 死后到阴间必定受罪受磨。

在城埕庙后面一片田地，曾是满清年间杀人砍头的刑场。由于尸骨物化原因，在上面种出的芋儿又大、又白、又嫩、 又绵好吃极了，很受主妇们的欢迎。不知从何时起，这里又建起一个大的屠宰场，每天要杀百多头猪，供应城里人吃肉；那些洗猪的废水便流到一个低洼地方，天长 日久形成了一个臭水塘，苍蝇、蚊虫在上面飞去飞来，很远很远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周边的人从不打从这里经过，老远就捏着鼻子走。于是成了爱国卫生运动的 一个大障碍，必须填平这个臭不可闻的污水塘，要不簸箕街办事处就不能在市上有位置。填平这口臭水塘，意义大于张家巷。怎么填？办事处没钱没人，唯一办法是 发动群众。我是搞运动的行家，立即深入到屠宰场工人中去宣讲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意义，以及与自身健康的关系。经过多次动员宣讲，他们行动起来了，从远远的 地方找来泥土填这个臭水塘。为了鼓舞士气，我又动员学校组织学生去工地慰问，把填臭水塘的事搞得热火朝天，《川西日报》和当时的《工商导报》先后发了消息 与通讯，称为成都的“龙须沟工程”。

这两项工作在全市遥遥领先，受到市领导的肯定，在全区干部大会上张烈夫区委书记和李捷区长，先后表 扬了我。听人讲，李捷区长多次私下向人说：“黄牛就是能干，不论干什么工作，都给我拿脸。”王琴玉对我更殷勤示好，她说：“弟娃，我们工人阶级就是比知识 份子能干，我真喜欢你啊！”那晚，她主动请我看电影，在黑黑的电影院里紧紧抓住我的手，搞得我心快跳出喉管，回办事处一晚失眠。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十五）

三、申请参入“先锋队”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参加共产党才能去领导革命！在一切工作走上正规道路，按步就斑后，机关开始建党 、建团。目的是把各种政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极积份子，吸收到党团内来，以壮大发展革命有生力量。在建党前，区政府各科局室没有科长、局长，通称称负责人。 同志间直呼其名，没有地位与权势之分。建党后一批新入党的走上了领导工作岗

位，称呼也就随之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也变了，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告诉人们："要当官就要入党，不入党就休想当官。"

爱国卫生运动使我一炮走红，派出所张所长和我的关系越来越好。我们两人本住一个寝室，现在就更 无话不谈了。一天，他直白地向我说："小黄，我真羡慕领导对你这么相信，有次开会张区委还提到你，要我们学习你雷历风行的工作作风，认真负责工作精神。看 样子你的进步会比我快，我一九四三年参加革命到现在才混个营级，你不出三年定是个县团级干部。不过，你要尽快解决入党问题，这次机关建党我第一个推荐你， 今后你跑到我前面去了，别忘拉我一把啊！"我谦虚地笑笑说："张所长，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做官，全是为了报告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没有他们哪有我今天？"

"是呀、是呀！我和你一样都是贫苦人出身，为报恩才来革命，但如果能凭工作能力当上官，又为什么不当哩？"张所长是个直率人，说话做事从不遮遮掩掩。

我笑笑，无言以对。

隔 不了几天，区委通知我回机关、组织部长肖柳和我谈话，于是我正式写了入党申请书。接着，潘清雍、袁忠智、王琴玉等十三、四个人都写了。为了审查每个人历史 和工作中的表现，机关团支部出面邀请各科室代表人员，对每个申请入党的人进行认真严格的鉴定。办法是先由申请人在会上作自我介绍，介绍内容包括家庭出身、 个人经历、社会关系、工作表现、优缺点，以及为什么要入党等。最使我感到震惊的王琴玉在介绍中说：她在裕华纱厂当女工时，曾被工头奸污过。我一下木然了， 对她有过的美好印象顿时消逝净尽、她在我脑海里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尽管我们两人都在会上一致得到通过，但自此再没有以前良好的亲密关系，好像友谊平添了一 层隔膜，又像飘起一层薄雾，甚至工作上也有了别扭。她多次找我意见，我总是说工作忙、没时间想其他事，其实这是中国大男人的封建主义思想在作祟，女人的贞 洁是择偶的一个重要价码，同时我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在入党会上公开自己的隐私，谈这些与入党不相关的事？于人于己又有什么好处？在我迷惑中，姚红菊向我耳 语道："黄主任，她编的，你怎么相信了？"我不解问："她为什么编这些脏事？"姚红菊神秘兮兮一笑："想表明自己苦大仇深嘛！叫组织相信。"我哦了声，再 没说什么。人啊，难道为了入党什么廉耻也不要了吗？

全区一共批准了 12 名党员，都有候补期，有的一年有的半年（大约六十年代后才改为预 备期）。这批新入党的党员很快提拨到领导岗位，大则局长小则科长，不知什么原因我原封不动？那些提了干的同志有的工资连升两级，有的换上呢料制服，说话做 事都有了架子，显得一副当官的样子。我思想上有了压力，表现得不自然。李捷区长发现了苗头及时对我进行教育说："黄牛，你还小，目前最需要加强锻炼，再有 你文化水准低，怕你占在位子上挑不起，组织上是有考虑的"。我口上应着心里却不痛快，认为对我不公平。巧好，我要好的朋友陈智远当上民政科长后（街道办事 处归口在民政科），老在我面前指手划脚，惹得我顶他一次："你别给我摆谱，老子至少出身比你好。"弄得他在人前下不了台，反映给李捷区长，说我不好管。李 捷区长为缓和矛盾，又把我调回生产建设科，再次与老熟人潘清雍搭挡。

四、指挥农民种庄稼

成都平原田地多是油沙土，黑 黝黝的用手一捏都会流出油。再加上两千多年前蜀太守李冰

父子凿开玉垒山，使泯江之水流入内河，干旱的西蜀一下成为富庶之乡，宝瓶口的都江堰千秋万世造福子 孙，自此沟渠纵横，沃土千里，稻花麦浪，无饥无寒。庄户人家若需用水，只稍在堰坎上放上几块木板，不一会儿清清甘冽的流水便窜进了田畴，潺潺汩汩奔流不 息，有诗章的美有管乐的声，故川西平原自古无旱涝之灾，家家户户无断炊之虑。农民世代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勤劳耕种，繁衍生，谁去管过他们？谁去领导过他 们？他们是最务实的人，最讲实事求是的百姓。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土地改革使千家万户农民按人口分到了土地，自 此再没有农户雇请长短工，也再没有吃栽秧酒一说。过去栽秧子一天吃五顿（两顿么台汤元或面食，中午晚上有酒有肉），薅秧子吃四顿（么台面皮稀饭），打谷子 也是吃五顿（两顿么台稀饭胡豆，晚上有酒有肉）。故农村有句谚语"栽秧子是女婿，薅秧子是舅子，打谷子是老丈人"。现在这一切习俗没有了，各家各户守着自 已分到的那几亩田土过日子，但农业上的活路又是集中在春秋两季的栽秧打谷，抢种抢收上。

已前每到这些日子，东山一带（指简阳、资阳、乐 至、安岳等县）农民，便成群结队来到成都各乡镇出卖劳动力，站在桥头仍雇主择选（俗称桥市砣砣肉）。现在没人来了，农村便出现传统与习惯的"换工"。可共 产党总喜欢管闲事，非要学习老区的办法，宣导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非要成立农业互助组。农民不接受，喜欢一家一户的单干。为了让农民走"组织起来" 互助合作的道路，推广有计划性的生产和科学种田，区里抽出大批干部奔赴农村，指挥农民干这种"脱了裤子打屁"的事，我也扛着行李与生产建设科的陈崇阳、徐 泽昆，区委的老朋友"梦觉"和绰号"干豇豆"的女同志刘家惠等六七个人，去到凤凰乡蹲点抓秋收冬播。工作组全是年轻人，大家相互了解，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凤凰乡政府设在凤凰山坡口赖家店街上。这是一条老街，十多家店铺三十多户人家，凤凰山机场距它不足两里路。成都人所叫的山不过是个黄泥 巴土坡坡，无树无林满是冬水田和垫塘，泥土泛红只长玉麦和地瓜，一下雨泥巴粘脚，天晴又是坑坑洼洼。乡政府有五名脱产干部，乡长、副乡长兼党支部书记、民 兵队长、民政干事、财粮干事和一名在编的炊食员。工作组加乡干部共十一二人，很是热闹。

我是驻乡组长，代表区委、区政府工作，有点近似 "钦差大臣"，什么事都得向我清示汇报。我当时不足 19 岁是个黄毛未蜕乳臭未干的孩子，管的事却不少，大到全乡播种计划，小到农户向银行贷款买农具、肥 料，田里栽种什么作物、使用什么种籽以及庄稼的窝行距等。工作组每天早晨起床自学，十点吃早饭，十二点后汇报工作研究情况，布置第二天工作任务，下午四点 吃午晚饭（两餐并在一起），饭后戴上草帽拿上电筒雨伞和一根打狗棍，各人下到所分管的村子串户找人开会了解情况，直到下夜一两点钟回来。我们这些吃公家饭 拿政府钱，回家可以睡到第二天八、九点，可农民鸡一叫就得下田干活。我们辛苦，农民比我们更辛苦，为了革命辛苦点又算得什么？

老百姓说 "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共产党做任何工作都是靠开会。这办法还真灵，无论宣讲政策还是贯彻什么新措施，从上至下都是靠开会解决，这叫"走群众路 线"，又叫"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凡是会上定了的事情有谁再去反对，就是反对群众。其实会上定什么，全是我们工作组在作决定。国家做什么事讲 计划，不仅工业生产要讲计划，农业生产也要讲计划，到后来生儿育女也有计划，不然怎么叫社会主义！计划来计划去，计划得没点个人空间。中央每年向各省下达 各项生产指标：诸如播种什么庄稼？用什么种籽？

施用什么肥料？行距、窝距多少？都有规定。省又将这要求下达到地市，地市再下达到区县，一层一层，一级一 级，周密详细，无懈可击，这就是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先进经验的关键所在。

说实话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对农民无丝毫帮助，因为他们世世代代都是 与土地共生共长的农民，懂得农活的规律和庄稼的变数，用得着别人去管吗？党和毛主席为什么喜欢管这些不该管的事？派我们这些不懂农业生产的年轻娃娃去领导 吃黄牙齿（四川话：年长牙齿都变黄经验丰富）的农民种庄稼？真不可思议！可认为在献身革命，还骂农民自私、落后、保守，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要把上级所制定的生产计划贯彻下去，离不开天天、夜夜召集农民开会，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总是无休止地开下去，开得农民捶腰杆，打 哈欠，闭眼睛，直开到他们同意政府计划为止。有次，高风村生产委员陈太山私下向我说：“黄同志，我真不明白，我们世世代代种庄稼，锄把把都磨光了，难道还 不知怎样犁地、耙田、下种、施肥么？你们操这些闲心干什么？地里没收成，我们一家大小吃什么？”

这话再实在不过了，可我认为他思想保 守，没有科学观点，只相信几千年的老套路，听后耐心地笑着解释道：“我们共产党不仅要领导农民起来推翻头上三座大山，还要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富裕道路。就 拿种田来说，你们现在一亩田顶多产八百斤水稻，如果接照我们推广的密植法，亩产可以翻一番。”他睁着两个风霜扑打出来的大眼睛，饶有兴趣地问：“怎么个密 植法？”我道：“你们一亩田才插五千棵秧，要是插上一万棵秧，产量不就上去了。”他听后哈哈大笑道：“黄同志呀，发动群众斗地主，你比我内行，插秧打谷、 驾牛犁田，我比你就内行。俗话说，稀插穗满浆，密栽一包糠。种庄稼就象女人生娃娃，不能凭想当然啊！”我没有办法说服他，心里却暗暗骂道：“老保守。”

农 民不敢公开抗拒开会，便采取软拖办法。土改时晚饭后一敲钟，无论刮风下雨，他们总是打着火把、灯笼，或披蓑衣戴斗笠，牵群打荡，嘻嘻哈哈，不出一袋烟工 夫，就全集合到指定地点。现在钟敲烂了也不来，如果来了就打瞌睡。你有什么办法？常言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立即改变方式，不再开村民大会，下到组 里开会，你总得来。有天晚上，我和陈崇阳去到落凤村十组开会，等了两个多小时人还到不齐，我便去到一户姓刘的农民家去催喊。在我记忆里这是一家贫农，土改 中很积极。一次我去访贫，他又送茶又拧毛巾热情极了，老伴还煮碗荷包蛋非得要我吃，现在不知是什么原因老不来开会。我来到他家门外篱笆前，见双门紧扣房里 没有灯火，便高声喊：“刘大爸，刘大爸……”没人应，几条野狗却狺狺扑来，我只好挥着竹棍亮着电筒，左右防范疲于应付。大约十多分钟后他才亮着马灯，从篱 笆里伸出一张没有表情的脸问：“黄同志，什么事啊？半夜三更，有公事明天说吧。”不待我表明意思就把篱笆门掩上了，气得我跺脚骂“忘本变质，好了疮疤丢了 疼。”

在回归乡政府的路上我向老陈谈及此事，他想了半天才说：“他们白天下地，晚上又开会，真够苦的。”我道：“土改时，几个通宵通宵地开会不苦么？”

老 陈的父亲是教书匠，他自幼读了不少书肚里有墨水，听我这么一说先是笑笑，然后他才揭穿谜底道：“我没有搞过土改，不知道情况，不过土改不停地开会农民可以 分到土地，现在不停地开会他们能得到什么？”我急了说：“科学种田呀！”他摇摇头说：“我父亲讲，农民比谁都精，也比谁更现实。”

在此 天天开会的岁月，我却得到了人生意想不到的收获。自当了工作组长后，每周有项雷打不动的任务"向区委。丶区政府写工作总结报告"。我文化低怕提笔，可身为 组长不能不写。当时有句流行语"干部怕总，女人怕坐月"，为了对党对革命负责，也是为了组长的尊严与面子，我决心学习文化。为了学好文化，起五更睡半夜， 无论在办公桌前的油灯下，还是在来去的田间小道上，也无论晨曦初露的早晨或是寒冷彻骨的冬夜，我都不停地看书写字，不停地抄誊诗词，还给自己定下一个死任 务：每天必须认识二十个生字。怎么识？笨人有笨法，我把《新华字典》从第一页依次写在纸片上，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一路诵。记住的放在一边，记不住的再重 复。如此反反复复坚持不懈，不到半年时间我竟能认识两千多个生字，终于摘掉文盲帽子，能写出一手流畅的合格的总结报告，有时还向川西日报投寄稿件，被聘为 党报通讯员

五丶惊动全市的"投毒案"

1952 年岁末，工作组一边继续向广大农民灌输科学种田，强调密植增产的新思想 新观念，还对土改中一些遗留问题进行处理，重点在漏划成份上，此项工作叫"土改复查"。比如一些本属地主成份的却划成了富农；又一些本属富农的却划为中 农。经过几天来的调查了解，确定全乡有三户应划为地主的划成了富农，本来地主和富农之间界限就很模糊，关键在干部掌握的分寸上。

用句老话说"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但在那个"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阶级斗争"年代，我们这些小年轻人，恨不得把农村中所有的有钱人都划成地主才够劲！

有 个姓王的自耕富农是乡里出了名的"恨铜匠"，一辈子省吃省用，赶场天不上茅房，把大便拉在一片荷叶上带回家扔在自己田里；家里一年四季很少吃次肉，老婆娃 儿穿得像讨口子，他挑谷子可以肩挑四五百斤没个长工干得过他。这样的人应不应该划成地主，在全乡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争议。我力排众议，坚决支持个别人的意见 说："说他穿得破呀，不吃肉呀，这些都是表面现象，不是问题的本质。地主的本质是用土地雇请长工剥削农民，他占有二十五亩好田好土，又长年请着长工，栽秧 打谷还雇月合（短工），他不是地主谁才是地主?"陈崇阳看了看大家，终于忍不住发表意见说："据我了解，他那二十多亩土地，是临解放前才买的，还不到三年 啊！"一场争论就要拉开，巧好李捷区长来检查工作，听了汇报后表态支援我的意见，他正色道："同志，别忘了我们是革命干部，革命干部首要的是立场问题。我 们宁肯左一点也不能右啊！右是立场，左是方法。"结果王姓富农递升为地主，在没收他家财产那天，全家呼天号地悲情动天。家里什么也没有，破衣服，烂棉絮， 分给农民农民都不要。

后来年终工作总结中，老陈在鉴定里有一条"思想右倾，立场不稳"，写了几次入团申请也没被批准，听说在反右斗争中 他几乎划成右派，不过平安一生活到老死。于是我才发现党和组织为什么这样相信我，就是在任何时候都站在左的一边，立场是干革命的关健啊！如果一个人一旦同 "右"字沾上边这一辈子就完了。但做梦没有想到，我这么"根红苗正"的"左派"不但和"右"字沾上了边，还成了一个十足的"大右派"，不知该怎么解释。

就 在那个争论的当晚，我们下村归来已是下夜一点大家喊肚子饿，炊事员因急事回家去了，大家便自立更生烧火炒饭。男男女女嘻嘻哈哈七手八脚在厨房忙碌起来。没 有菜怎么办？

老陈提议吃油炒饭。"梦觉"嘴馋肚子大立即回应，在柜里找了半天没找到油，老徐转眼看见案版上有一大盆油，他用鼻子一闻嘻得大声叫喊："我发 现新大陆了！好香的油，又稠又浓。"说着将半盆油倾在锅里，立即满屋油香透鼻大大刺激了胃觉。未等"干豇豆"刘家惠停住手中锅铲，大家一窝锋一前疯抢。 "梦觉"抢得最多吃得最多，饭后大家高高兴兴回房睡觉，"梦觉"和我睡一屋，他睡不着老在床上翻来复去，不到 10 分钟自个儿说："心里怎么这么难受？"我 笑着骂："谁叫你抢得最多，不撑才怪。""不对，不对，我难受死了……"话未完他哇的声张口呕吐。"好臭，好臭……"我仍笑着逗乐。不一会，隔壁屋的老陈 、老徐，也都呕吐起来，哇，哇，哇地叫过不停，我因吃得少是最后一个呕吐的人。

此时，我第一反映是中毒。哇哇的呕吐声惊醒了来乡检查工 作的李捷区长，他翻身跳下床查看现场，立即作出判断结论，说："定是阶级敌人投毒，马上封锁现场，向公安局报告，赶快叫卫生所派人来抢救！"真不愧是久经 革命烽火考验出来的老干部，他镇定自若指挥在场的乡干部，先调来附近村里民兵把乡政府团团围住，凡通往各处要道路口派武装把住，一面亲自摇电话向市里报 告："凤凰乡工组遭阶级敌人暗算，现有七八个人处在生命危险中……"

不到一个小时，区上、市上的公安人员，卫生医护人员，分乘汽车、摩 托车、自行车赶来。警笛呼啸，车灯晃动，人声哏哏，煞是热闹。经过简单的检查与化验分析，很快得出结论：食物中毒。再一查那炒饭的不是食用油是桐油。很快 查实清楚：原来下午五点炊食员从供销社买来桐油，准备用于油厨房用具，老婆突然生病便慌忙赶回家，将这碗桐油放在案板上，我们却当成菜油炒饭吃下肚子。这 下弄得在场的人笑不是 哭不是，气不是，怄不是，区长李捷更尴尬。为了不致让此事传为笑话，对外严格保密封锁消息，以利强化敌情观念。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十六）

六、白赔的眼泪

"阳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川西平原阳春景色远胜江南，黄灿灿菜花千里一色，绿油油麦苗万畴翻 波，黄鹂叫枝头，蝴蝶飞花间，溪流白似银，绿柳兰如丝。在这美丽的日子里，我喜欢骑着单车在田间地头奔跑，像只鸟像只鹰，这是多么美妙的享受！在这如诗如 画的岁月，我们更向往老大哥苏联。苏联是社会主义，听说那里工厂林立，烟囱如枉，城市遍街汽车奔跑，农村铁牛耕田，收割用康派因机，一切自动化。人民生活 幸福得不得了，牛奶面包仍吃仍喝，毛主席教育我们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明天是什么？农村，楼上搂下电灯电话；城市，鲜花盛开绿草茵茵。这就 是人们梦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我们视苏联领袖史达林为自已国家的领袖、导师，深深地热爱和尊敬。这认贼为父的理念，全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 教育和苏联文化的影响。那时苏联的电影、苏联的小说，比比皆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无脚飞将军》等书是年青人必读的文艺作品，特别 是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小说，人人看得如痴如醉，个个读得发疯发狂，书中主人翁保尔·柯察金那段"至理名

言”大家记得滚瓜烂熟，下少人还写在笔记本 上或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作为人生座右铭：“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而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当你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庸庸碌碌无为而感 到羞耻，在你临死的时候可以这样说:我的一生已经献给人类最壮丽的的事业---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除此，还有个时髦的事儿就是加入中苏友好同盟，在灰 制服的上衣口袋上佩戴着一枚有中苏两国国旗的小小纪念章，以显示自已是中苏友好协会会员。

就在这一年---1953 年 3 月 5 日的下午， 工作组全体人员在大厅学习和看书，“梦觉”突然惊惶失措，慌慌张张含着眼泪从寝室跑出来高声喊：“不得了，不得了，同志们，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全世 界共产主义的伟大领袖，我们敬爱的革命导师史达林大元帅逝世了！”大家听着这一喊，一时不知所措，怔怔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似信非信地急忙问：“真的 吗？真的吗？这消息是听谁说的？”

“梦觉”自参加革命就从家里带个半导体收音机，不论走到哪里都放在身边，经常免费为我们提供中央的决 策资讯,此时为了证实他报告的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即忙扭开收音声的按纽,立即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个女播音员哀婉、凄切、悲凉的声音：“全世界革命人民 的伟大领袖，苏维埃人民伟大的统帅，中国人民最忠实的朋友，史达林同志因病于今日上午北京时间八点四十五分，不幸在莫斯科国家医院逝世”……

接 着是沉重的哀乐，在场的人一下哭了起来，哭得比死爹死妈还伤心，我也莫明其妙地跟着哭。不一会儿大家自觉地在手臂上缠上青纱，胸前挂上小白纸花，心情悲 痛，颜面凄切。这伤伤心心地哭，有声有泪地泣，全是出自内心真情，决非装摸作样，更非虚假。但为什要哭？要流泪？到底他的死与我们有何关系？谁也说不清 楚，也无法说清楚。现在想起来也真笑话，一个外国人，还侵略过中国的外国人死了，却伤伤心心地去哭他，你说滑稽不滑稽？白赔眼泪，白焙情感么，想不到几年 后才知道他竟是世界上最残酷、最专横、杀人如麻的暴君。

在他死后的 1956 年 3 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苏共总书记赫鲁雪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以大量的无可置疑的事实，揭露了史达林在执政期间许多鲜为人知的罪恶，他首先公开列宁的遗嘱“他会不讲道理地滥用权力，列宁建议同志们想 个办法把史达林从党的总书记这个位置上调开”。1923 年 3 月 5 日列宁曾给史达林写过一封信，其中有这样的话，“我无意这样轻易地忘记你反对我的言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请你斟酌。”(见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与《给史达林的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36 卷第 618 页。)在 1924 年 5 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会之前，史达林十分紧张，意识到在代表大会上宣读列宁的遗嘱对自己十分不利，他积极进行幕 后活动，要求列宁生前的战友如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人助他一臂之力，结果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没有在代表大会上宣读，史达林得以继续在苏共十三次党代会上当 选总书记的职务。

在史达林执政期间死于非命的至少有二千万到六千万人之多

在他执政期间从 1936 年开始，对老布尔什维克发难。1936 年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审判案，几万人被卷进来，然后 37 年是皮达可夫和拉 狄克审判案，几十万人含冤而死，然后 38 年是布哈林审判案，几百万人牵扯进来。“列宁近卫军”领导了十月革命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中，约三分之二被处决或暗 杀；列宁最后一次出席的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的 27 名中央委员，约 20 名被处决或暗杀；列宁去世后党代会（十五大）的 7 名政治局委员，除史达林本人外，其余六 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基洛夫、李可夫和托洛茨基全部被处决或暗杀；以列宁为主席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 15 名人民委员中，除列宁、斯维尔德洛夫等 5 人过早故去外，其余 9 名人民委员全部被处决。

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1966 名代表中有 1108 人被捕，139 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 有 110 名被处决或自杀。在布哈林等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被清洗同时，以“红色拿破仑”、苏联国防人民委部第一副人民委员、杰出的战略军事家米•图哈切夫 斯基元帅、红军政治部主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加马尔尼克元帅、红军总参谋长、副国防人民委员亚•伊•叶戈罗夫元帅、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副国防 人民委员、列宁格勒卫戍区司令雅基尔元帅为首的红军将帅和卫国战争英雄被大批地处决了，他们包括：陆军 4 名一级指挥员中的 3 名、 16 名集团军司令中的 15 名、 12 名一级集团军司令中的 12 名、 57 名军长中的 50 名、 28 名军政委中的 25 名、 64 名师长中的 64 名、 97 名师政委中的 79 名、 397 名旅长中的 220 名、 456 名团长中的 401 名，以及几乎全部海军最高指挥员共 35000 多名红军高级指挥员。

德国军事当局曾提醒希特勒不要进攻苏联，这名纳粹领袖回答说，苏联高级军事干部最优秀的部分已于 1937 年被史达林消灭了。任何人都看得明白，无论哪一次战争，无论哪一国军队，都没有像苏联军队那样，在与法西斯德国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遭到如此惨重的打击。

不少资料表明，从 1928 年开始以“人民革命”、“历史真理”、“祖国安全”、“人类理想”的名义，一场整整持续了十年的政治镇压血腥屠杀，史达林 以各种“革命”的名义，把成千上万名的科学家、哲学家、发明家、工程师、艺术家、戏剧家、作家、画家、诗人、演员、电影导演，以及成千上万名区委书记、集 体农庄主席、拖拉机站站长、车间主任和普通教师、普通宗教信徒被关进集中营，死于非命的至少有二千万到六千万人之多。

中国古代臭名昭着 的首任暴君秦始皇曾经焚书坑儒，活埋了四百个儒生。古罗马的三个暴君，尼禄，提庇留和苏拉，曾经把两万罗马人杀死。据说最残酷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所长托马 斯•托尔奎马达曾活活烧死一万零二百二十人，并烧掉六千八百六十具逃亡的或已死去的异教徒的模拟像，此外还判处九万七千三百二十一人终身监禁、没收财產和 穿一种名叫"圣宾尼陀"的耻辱服。伊凡雷帝时沙皇特辖区制度使几十万人丧命，在这一制度最猖獗的时期，莫斯科每天有十至二十人被处死。法国雅各宾恐怖时 期，由革命法庭判决而上断头台的共一万七千人，大约还有同样数量的人未经法庭审讯即被定罪或屈死狱中。至于因"嫌疑"而被雅各宾派关到监狱中的人数就不知 多少了，最可靠的估计为七万人。

但在整个 19 世纪，因为政治原因被判死刑的俄罗斯人才不到 20 个人，被流放，被监狱关死的也就几百人， 顶多几千人。但是死于史达林之手的却高于此数的一千倍一万倍，1990 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了一个数字，从 1930 年到 1953 年期间，苏联有三百七 十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死于非命。1991 年苏联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宣布了一个数字，从 1928 年到 1953 年，史达林主掌大权的 25 年期间，苏联有 450 万人死于非命。历史的记录更为骇人，在史达林大权独揽的 25 年中，死于非命的俄国人总数，下限是 2，200 万，上限是 6，600 万。从 1937 年到 1938 年，即布哈林被捕入狱到审判处决的几百个日日夜夜中，仅在莫斯科一地，一天就有上千人被枪毙。莫斯科火葬场的焚尸炉烈焰滚滚，不分昼夜地火化掉源 源不断的血肉模糊的尸体。这已不是鲜血汇成的小溪，而是白骨皑皑的荒原了！历史上任何暴君都没有镇压和虐杀过如此衆多的自己的同胞、普通的公民、革命的精 英和国家的栋梁！

2003 年 11 月 7 日《文汇读书周报》向继东写的《1930 年代的肖霍洛夫》一文透露：1932—1933 年间史达林 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使近 700 万农民饿死。1933 年至 1940 年就有近千万人被捕，100 多万人处决或死在劳改营里。史学家认为，“史达林的宝座其实 是用千百万无辜者的血祭奠的。”据不完全统计，在 30-50 年代期间苏联全国的政治犯和判刑人数，多达 380 万人，其中近 80 万人被判死刑，死于劳动教养 营感化营、监狱（包括刑事犯）共 96 万人。当时全苏联人口仅有一点八亿，受害人数高达百分之三。

据了解当时参加大会的各国代表团都发有 报告文本，在各国代表团中立即引起强烈的反映，率团参加大会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贝鲁特就因过去完全按照史达林模式行事，惊惧万分，自知难逃波兰人民的 惩罚，不几天就猝死在莫斯科。当毛泽东得知《秘密报告》内容后，曾感慨地说：“苏联揭露史达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史达林 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呼吸这样的空气是不行的，他已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成

吉思汗。”“史达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 英、法、美这样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其实，比赫鲁雪夫作报告早十多年便有一个人深刻揭露史达林统治时期存在的问题，这个人就是诺贝尔 文学奖获得者，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1935 年 6 月他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苏联，曾两次见过史达林，经过近一个月的观察、调查，回到法国后他写了《莫斯科 日记》。罗曼·罗兰是一个进步作家，被誉为二十世纪人类伟大的良知，他担心《莫斯科日记》的发表会被扣上反苏反共的帽子，临终前他嘱咐自己的《日记》在 50 年之内不得发表。在《日记》中他列举苏联独裁专制过头，自由民主不足。并尖锐地提出如下几个问题：

(1)苏联正在出现一些自称为国 家和民族卫士的共产党员及其领导者们，他们不顾一切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这些人表面工资并不高，但享有金钱之外的种种特权(住房、食品、交通工具 等)，并有给亲朋带来方便的无形影响力。罗兰认为“这个党已经获得控制最高权力集团的权利，一个特殊的共产党人贵族很可能在党本身不知不觉的情形中形 成”。“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权力正在向腐败下滑”。

(2)个人迷信严重。史达林酷似罗马皇帝，他的肖像如山如海在人群中漂浮着。一切大小成就，功劳必须归于史达林一个人身上，其他的人只能把自己贬低到一钱不值的地步。罗兰称对史达林的崇拜已“成为一种宗教般的礼仪”，人们已被训练 成木偶，工具；罗曼·罗兰将列宁和史达林做过比较：当“列宁看到墙上自己的形象，便勃然大怒：‘这使我感到厌恶。到处我都看见自己的猪脑袋。’而史达林则 相反，他有自我欣赏、自我欢呼的癖好。”；

(3)肃反扩大化，排除异己，乱抓滥杀。罗曼·罗兰问：“为什么你们对政治犯是那样残酷无情，对冤假错案却幸灾乐祸不足挂齿?”

(4)不民主，人们不敢说心里话，在苏联“谁要是坦露心灵，谁就等于出卖自己；”

(5)相当多出身不好的青年感到没有前途，处于半麻木状态，无形中就不人道地形成一个为社会所遗弃的阶级。罗兰认为苏联的个人迷信并非真的来自群众，而是领导自己制造出来并加以维护的。最后，他写道：“苏联那样干下去，肯定是干不好的，一定要出大乱子，要崩溃的。……”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十七）

第七章农业合作化运动

农合作化运动是毛泽东用“组织起来”强制性的手段，剥夺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使中国刚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农业社会又回到土地公有制的奴隶社会，自耕农又成了戴着“镣铐”的农奴。

合作化运动

一、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3 年 6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 10 年到 15 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 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这个“灯塔”的核心就是“一化三改造”。什么是“一化三改造”？

“一 化”，把千千万万分到土地的农户组织起来，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三改造”，就是对“私营工商企业、手工业者、个体劳动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说得明白一 点，就是要通过强有力的权力导向，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要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范畴，“成为共产党所能指挥控制的财富”。于是，全国工作重心转向了 “党的总路线‘一化三改造’”。我们区是成都市农业区，“一化”便是我们工作重中之重。共产党开展任何一项新的工作，首先是组织全体干部学习档、吃透档、 领会文件，在思想统一的前题下再逐步推开，先搞“点”，在“点”上取得经验后再扩大到面，这叫“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

千百年来中国农 民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一家一户分散的个体的小农经济作业，现在却要把他几十家上几百家地联在一起共同生产劳作，他们实难以接受。但是共产党、毛 泽东是个强势政权，决定了的政策必须贯彻始终，不惜花一切代价去实现。这个繁重困难“组织起来”的工作，就是由我们这些千千万万的基层干部去执行去完成。

“军令如山”区委、区政府闻风而动，立即抽调出大批能力强水准高奔赴农村第一线。我们工作队队长是生产建设科科长潘清雍，组员有我、“梦觉”、“干豇豆”和陈崇阳、徐泽昆等，选定群众基础较好的、有党团组织的，站东乡红花村作为建立农业合作社的试点村。
农 业合作社分初级和高级两种，说是农民弟兄平等互利的经济组织，地、富、反、坏分子不能参加，贫下中农才有资格；又说农民有参加和退出的自由，不能强迫，坚 持说服政策。初级社一般规摸不大，约二十余户农家，参加者只是土地交到社里，由社里统一安排播种和调配劳作，每晚一起评工分农具、耕牛作为投资入股，分配 时折合成工分。高级社不但要把土地交给社里，农具、耕牛全作为集体财产，各家各户在屋前屋后只留少许自留地（每人不足一分地，约 60 平米），种点瓜瓜菜 菜。自此，农民做什么干什么由社长、队长指派，白天统一劳作，晚上集中一处开会评工分。工分关系到年终分粮分钱，由于劳动力不均和有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所 评工分实难公平，故纠纷不断，你攻我击，大伤和气，互为仇敌，使千百年来和和融融的邻里关系彻底丧失。“组织起来”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实际把老实巴焦的 农民推向互相厮杀的仇恨道路，中国再难以有和谐。

我们天天开会夜夜开会，宣传农业合作社的好处，说它就是苏联未来的集体农庄，是毛主席 、共产党领导大家走集体富裕道路，不让农民弟兄“再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纵然我们把口说干、把嘴讲烂，农民就是死过舅子不参加农业合作社。他们说：“树 大分椏，儿大分家。莫说外姓人，就是一个祖宗传下的崽也捏合不到一块，几十家人搞到一起，不打烂脑壳才怪”。

农民说的大实话，“一口一 个味，百人难同睡”。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建设富饶美丽的新中国”，我们一个个像金刚钻，非得把“死脑筋”的农民钻个孔，总是不厌其烦地批评他们 “思想保守落后”，是刘介梅“三十亩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翻身忘本的资本主义思想，是不愿“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单干思想。（刘介梅湖南农 民，解放前是个乞丐，土改中翻了身分得土地和耕牛，但不愿走“组织起来”共同富裕的道路，成了农民翻身忘本的典型。“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 他惊人之语，故全国报刊公开讨论批评此事）其实我们和农民都不知道毛泽东肚里的真正打算，他是要通过走“组织起来”的“农业合作化道路”，把土地改革分给 农民的土地收回来归国家所有，回到两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临天下”一统大业的宏愿。

农 民太热爱土地了！“土地”是他们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救命草”，是繁衍子孙的“护身符”，现在要叫他们交出土地，等于是拿刀子割他们的心啊！潘清雍科长有 的是办法，他毕竟比我老练，拿出了最厉害的一手“党团员必须带头参加农业社，服从组织决定”。在土改结束时农村就建立了党团组织，一批在斗争中表现得最好 贫下中农，被吸收入团入党。

他近似下命令地向农村党团说：“建立农业合作社是毛主席的号召，是党中央的决定，是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分 水岭，是党团员带不带领广大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试金石，既然你们是党团员，应无条件服从这个决定。”再有便是向

农民强调说，“农业合作社是农民弟兄互 利互惠的经济组织，地、富、反、坏想参加也参加不了，今后政府要大力扶持农业合作社，银行货款、子女读书，入了社的都优先。”

农民终因 经受不住我们的打压，更抗拒不了我们的诱惑，在半说服半强制下参加了农业合作社。他们流着眼泪怀着难舍之情，把土地、耕牛、农具集中到一起，走上了“组织 起来”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过那时农民手中仍拥有生活资料和少量的自留地，留有“资本主义尾巴”。记得，为了说服一家姓阮的中农加入农业社，我们学习“诸葛 亮三顾茅庐”的办法，大道理，小道理，比过去、看将来，家庭会、夫妻会、老少会、谈心会，整整花了一周时间，带推带拉又骗又哄，终把他搞进了农业合作社， 只是在牵耕牛搬农具那天，全家竟然哭的哭吭的吭，呼天抢地折腾大半天。有什从办法“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不入也得入啊！

站东乡的“经 验”很快作为典型，在全区“三级干部”（区、乡、村）会议上进行推广，介绍经验的除队长潘清雍外，还有站东乡党支部书记和红花村党团员，很快全区各乡村都 有了农业合作社。此后共产党逐步逐步地通过互助组、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把几千年海洋似的个体农民纳入了集体化道路。到了1958 年公社化后，农 民一切财产无论生产资料还是生产资料全归集体所有了，又回到那“仰起睡还有条球，俯着睡连球都没一条”的赤贫时代。

二、合省并区引起的波动

1953 年 4 月，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实施，为了集中权力，中央撤销了原华东、中南、华北、东北、西南五大行政区，四川则把川东、川南、川北和西康并入川西 行署，恢复四川省原有建制，省长为李大章，省委书记为李井泉。原川西行署所管辖的成都、华阳两县并入成都市，人口从原来的六十万一下增为一百多万。我所在 的第三区人民政府更名为龙潭区人民政府，管辖二十多个乡镇。区委书记张烈夫、区长李捷双双调离。张烈夫去市委任农委主任，李捷到省里工业办管大型工矿企 业，并带走干将潘清雍和袁忠智。不久两人分别到十五中和十二中当中学校长。我仍留在生产建设科，新来的区委书记崔绍夫是成都县的县委书记，区公安局长李云 成提升为区长。

中国有句俗话“一朝天子一朝臣”。新提升起来的区长李云成，是红军干部，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一身枪眼，多处负伤，胸 前挂满奖章，共和国的有功之臣。但他行事主观，唯我独尊，工作方法生硬，心胸狭窄，很难听取意见，做事又不讲策略，干什么都是直来直去。应该说这样的人是 个忠于革命事业的好干部，却不是好领导。他来不几天，即把一个为他看重的叫李德明的人提起来负责。此人原是青龙乡乡长，土改建政后不宜再当乡长才调到区上 总务科管总务。他虽然工作平平，却善于察言观色，一说一笑，喜欢向领导汇报思想，深为李运成区长看中。按潘清雍调走时的暗示，我应该是生产建设科负责人， 现却变成了他。为了回避矛盾我主动要求调到新成立的调研室去工作。调研室都是各方干员，主抓全区中心工作。个个能力强，行政级别都在二十一级以上，人人皆 是干将，只要运动一来全是驻乡工作组的组长。但我情绪上仍有波动，总认为新来的领导对我不相信，便与李云成区长有了距离。此时农业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不 几

天我又带着原班人马去到远郊区金马乡蹲点，整顿健全提高农业合作社，为向高级农业合作社发展取得经验。

金马乡在成都市郊北面紧挨着新 都县，它的得名是因为那里有座寺庙叫金马寺。寺里原有百多个比丘尼，解放后产党说宗教是迷信，故再没人敢到庙里来烧香布施，不过庙子还保存得十分完好，金 身泥塑，匾额吊牌，佛灯帷幔，戏台殿堂，仍使人感到肃穆。虽然不少的比丘尼还俗的还俗出走的出走，剩下十来个不走的人和农民一样下田干活，抛粮撒种，栽秧 打谷无所不会，虽然累得贼死，早晚仍要敲木鱼诵经书，使人不得不佩服她们对佛的虔诚。我们大凡开村民会都选在这里，一是这儿坝子大，二是这些出家人特殷 勤，烧茶送水摆桌放凳无句怨言，百般讨好我们工作组，生怕再像土改样拉出去斗争。

穿草鞋，戴斗篷，披蓑衣，不知苦，不知累，在农村折腾 了半个多月回到机关汇报工作，到寝室一看大家傻眼了！三天前宿舍来了个大调整，把我们派到乡下去工作的十多个同志的衣服、鞋袜、用具，乱扔一地，分不出是 谁的东西。“梦觉”嚷开了：“我们下乡日晒雨淋，家里还把东西给我们丢了，领导这样不看重我们，以后还有什么心情干好工作啊！”没想工作汇报完后已到夜 晚，总务室又没留饭，上街找餐馆餐馆多半关了门，大家只好饿着肚皮在板凳上过夜。我去向区长李运成反映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好，要影响工作。”他想也不想 反批评我说：“这些小事情也要我管，我可不是千手观音，长有三头六臂，再说牺牲点个人利益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我感到十分生气，便信手写了一首打油诗交给机关壁报编辑组。打油诗是这样写的：“下乡干部苦，天晴晒太阳，下雨路难走。这些苦不算苦，最苦的怕回到区政府，吃饭难找主，睡觉难找铺。去向领导 提意见，反用大话来吓唬……”

这事儿不知怎么被陈崇阳知道了，他特地跑来劝我说：“老黄呀，我们相处了近一年多时间，彼此了解，你有热 情有干劲，就象一匹活蹦蹦的马驹，不论前面是岩是坎也要跳过去。这是好的，我应该向你学习。记得两年前我也和你一样提意见像打炮，不怕老虎不怕豹，结果犯 了对抗领导的错误，要不然我今天早已入了党也许是局长、科长了。我诚恳劝你，把打油诗毁了吧！不然会惹出麻烦对你进步不利后”。我在兴头上，认为下级向上 级反映意见是国家机关干部的权利，不存在利不利的问题，笑笑回道：“我不能对不对的事情保持沉默，做人应坚持原则啊！”陈崇阳苦笑一下不再吭声了。

打 油诗交给了机关黑板报后一直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没登出来。又过了一周，区里召开干部大会，布置总结农业合作化运动工作。会上先由区长李运成作报告，他在报 告里讲了一般工作上常用的套话官话外，语气一转着重批判目前在机关干部中有怕吃苦和工作上不任劳任怨、目无组织目无领导等思想，并不提名地公布了我的打油 诗，说这是落后思想的代表，希望大家对这种思想展开批评。在座的百多号人傻了眼不知是谁干的，会场静悄悄连咳嗽的声音都没有。我却热血沸腾脑门冲起阵阵浪 花，待他讲话告一段落，我笃地蓦然站立起来举手发言，情绪激动语不成声道：“打——油——诗——是——我写的，是投给机关壁报的，本意是向领导建议，关心 同志们生活福利，不想今天得到个落后思想的批评。”

我这突如其来的反弹使得会场静极了，大家拉长脸孔，几百双眼睛一时看看台上脸青眉竖 的区长李运成，一时又看看红脖子胀脸的我。谁都没有发表意见，只有台梁上大圆钟滴滴嗒嗒的响过不停。忽然李德明的脑袋伸出人群，不快不慢地说：“我发表两 句意见，我认为今天黄泽荣同志的态度极端蛮横无理，竟敢在几百人的大会上公开反抗领导的批评，这是极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我建议组织上暂行停止他的工 作，让他好好检查反省”。

区长李运成用眼扫扫台下希望有人发言跟进，可大家知道我工作上一贯表现不错，曾是张烈夫书记和李捷区长手下的 红人，故没有一人应声，会就这样不欢而散。我没有到食堂吃饭心里非常沉重，两条腿像有百十斤重走动一步也吃力，我决定去找区长李运成说说道理，推开他的办 公室的门正在吃饭的他见我进来，余怒未息地冲着我问：“你来干什么？”

我情绪还未平静便带气回道：“找你讲道理，我哪点目无组织目无领导？你凭什么在会上批评我是落后分子？”

“嗯！你写打油诗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想挑起全区干部来进攻拆我台吗？这难道是有组织有领导的行为？”说着，余怒未息在桌上一拍道：“我批评你是落后的分子，你若不服到市上告我去！”

“好！ 我是落后分子。”我冲出门气冲冲地向漫无边际的田野走去。田野，被黯淡的云层笼罩着，呼啦啦的秋风吹得禾苗低头、大树弯腰，黄叶儿，白叶儿遍地乱飞。我呆 立在一棵古柏下，望着太阳落下的西方，心里象不平静的江水，起伏地翻滚着：我为什么要去写打油诗，为什么要去向领导提意见，是不是为了自己？不，不！不是 为了我自己！那为什么又会得这样的批评呢？唉，悔不该当初太盲动，不听陈崇阳的劝阻，才闹到这境地。现在我入党候补期转眼就满了，如果此时能吸取教训还来 得及，不然转正通不过，不转正今后休想当科长、局长什么的……难道跟着共产党、毛主席闹革命是为了当官吗？我决心不再找李运成区长交换意见，把心一横后补 期停就停，干革命是凭工作能力吃饭，不是凭党员吃饭。果不其然，到了转正时间支部通知我：后补期暂时停止。不过那个时候机关风气还很正常，决不会因为你和 领导上的关系不好便可以把你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因为革命的枪口还未对着人民，无“言论”与“思想”定罪一说，机关里仍充溢着自由民主的空气，做 领导的不敢贸然行事，不仅李云成区长做不到纵是市长省长也做不到。只有当毛泽东把“阶级斗争”的魔火烧向革命阵营时，中共各级领导才将杀灭仇敌的刀枪用来 诛灭异己，制造出一个一个惊天冤案。因此后补期的取消并不影响我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何况调研室里党团员还不多，我仍是个领军人物。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十八）

三、少年初识愁之味

人处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不知什么叫忧愁更不知何谓痛苦，当我和李云成区长发生矛盾入党后补期又被暂行停止的时候心里顿 感空虚，眼前似乎一片茫然不知今后路该怎么走？深感自

已是个鸡蛋他是个石头，如硬要去碰只有壳碎黄破它却完好无损。但作人又不能放弃原则去顺从屈服自已不 认同的东西，这样还能是一个革命者吗？这些埋藏在心里的东西好想向人诉说啊，可向谁去诉说呢？，骤感孤独寂寞，开始羡慕那些有女朋友的同志。逢周六休息两人就可以聚在一起说悄悄话，倾诉工作与生活上所遇到的不平；或漫步公园碎语柳溪，摇船小河击浪轻舟，形影相伴互送温暖。爱会使一切变得美好，爱又是巨一的 力量，我开始发现，不，深深地感觉我生活中缺少了什么？想去想来就是一种生命与事业所需要的爱！哪去寻找爱何处才有爱，爱到底为何物？

可 农村工作男的居多，想找个女朋友聊天都难，工作组那个叫“豇豆”的刘家惠一张瘦削没肉的长脸，说话硬枝硬杆，笑的时候比哭的时候难看。没着爱看看着都烦， 还不如金华寺那个没有头发的小尼姑，人家毕竟还有点女人的柔态。“干豇豆”虽然对我百般殷勤，但我宁肯当一辈子和尚也不愿找她去倾吐自己的心声。恋爱无 望，工作不顺心，要不回茶厂当工人去？想东想西，思想变得复杂起来。好在我们工作组的“梦觉”、陈崇阳、徐泽昆十分了解我，心里为我抱不平只是言语上未表 露而已，认为我是为大家说话才招来的麻烦的。在这苦闷徬徨中，我不停默诵保尔。柯察金那段人生座右铭，以缓解心烦和痛苦。再有一个办法就是读书，读赵树理 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读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西戎的《吕梁英雄传》，以及《人民文学》《西南文艺》等杂志上一些写农村的小说。说也奇怪，书不但带走我的烦恼，还给予我一种巨大的力量。通过这些书与刊物我不但提高了文化水准，不长了不少见识，似乎书上写的那些东西就在我身边，好熟悉好 新鲜，何不把自已眼见目睹的事情写一写？，但很快又觉得这个想法可笑，大字认不得一斗，能写出东西吗？正因为五十年是这样一批追求理想的年轻人支持共产 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在最短时间里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谁不在用生命去开创与捍卫这个事

五十年代初期的年轻一代，充满朝气、希望、事 业、理想，人人像团火，个个像块钢，谁也不愿意虚掷生命与春青，决不甘愿庸庸碌碌生活，总想为党和革命的事业燃烧，为人民发光发热，纵是抛头颅洒热血都毫 不崽畏退缩！记得我曾在日记上写道：“青春是团火，欢腾光灼灼；凌雪斗风雨，送热暖心窝。青春是把琴，弹唱才发声；若要音中切，就得理想真。青春是杆号， 有谱才出调；谱由党抒写，吹得群山笑。青春是朵花，浴日笑哈哈；为党洒鲜血，何惜献年华。”

正因为五十年是这样一批追求理想的年轻人支 持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在最短时间里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那时谁不在用生命去开创与捍卫这个事业！所以才英雄辈出，视死如归，丁佑君、黄继光、邱少 云、罗盛教等烈士的事迹何以能惊天地泣鬼神，在人民中回荡流传！可惜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与残酷的“阶级斗争”歪理邪说毁之尽净，留下的是欺骗、不满、 仇恨！

我们的金马乡工作组的年轻人更是这样，每天上午 10 点前各人自学和锻炼身体，从不虚度分秒，把时间看得比金子还重要。那天早晨 “梦觉”拿着一份新出版的《中国青年报》走到我面前说：“黄牛，你看，团中央向全国青年发出向科学文化进军号召，为了建设好社会主义，要求我们学习各种专 业知识，未来都能成家成长。我知道这几天你心里不痛快，管他的，学好本领才是大事，不能长期当‘万金油’干部啊。”我笑笑，问：“你想学什么？”他早已成 竹在胸地说：“我爷我爸都是学医的，将来我也准备当个大夫。”我不以为然天真地问道：“当医生有什么好处，成天和病人打交道。”他一本正经道：“我爷说， 不做良相便做良医。看来我这辈子走做不了良相罗，做个良医不成问题。人世阎谁不生疮患病，谁不吃药打针？

任何时代和社会都需要医生，反正我不走仕途，这不 是我之长。”

在一旁看报的陈崇阳一直埋头不语，我便问他：“老陈，你呢，向什么进军？”他抠着脑袋想了老半天后才说：“我还没有怎么考虑，不知道国家到底怎么发展？社会到底怎么前进？一句话：车到山前自有路。”说到这里，他笑迷迷地把头一抬：“你呢？”

“我？”我思忖了半天，也拿不出一个主意：“我不像你们两人，要文化没文化，要本事没本事，这几年只学着一张宣传政策的嘴巴，我想过实在不行回茶厂当工人去。”

“想不到我们的黄大组长也有闹情绪的时候，”那个讨厌的“干豇豆”刘家惠不知什从时候站到我身后，突然冒出那难听死了的干瘪瘪的声音：“受了领导几句批评就泄气了？”

我很不自在地盯她一眼，装出一副无所谓地样子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领导批评是爱护我。”

“好， 我也想找领导爱护爱护我怎样？”她是个天生刀子嘴，一点不让人，闪着一双狡黠的眼神望着我说：“你还真挺得住，是我早躺下了。李区长也太过份了，要遇上我 顶得会更历害。”她的同情与支持，一下使我感到她再没有那么丑了，反倒有点不好意思，便竭力掩盖自已曾经有过的冲动说：“家惠同志，我们不能那样对待领导 的批评，我同意梦觉的观点：‘多作自我检查’。”

“黄牛，你对别人都不加同志对我却加上，这是什么意思？”她有点伤心了。我也是个嘴巴不饶人的人，便哈哈一笑道：“好，从今后不叫同志，叫亲爱的家惠好吗？”

梦觉、陈崇阳哈哈地拍手大笑，弄得“豇豆”一张长长没肉的瘦脸面红到耳根，忍不住骂道：“黄牛，你这个死鬼，欺负人。”说着做出要揍我的样子，我便更进一步逼她：“打吧，你舍得吗？”

“你这个调皮鬼，真拿你没办法。”她握起的拳头收了回去。梦觉敛住笑，回到原来的话题，问：“豇豆，你打算学什么？”

“我没有什么打算，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她就是这么一个没头脑没思想的人，开口组织闭口组织，也是我最反感的地方。我马上又觉得其丑无比，没有肌肉的脸，扁平的胸，白鹤样的腿，浑身没点女人味，谁要？我故意赞同道：“向党的好干部刘家惠同志学习！”

梦觉是个不太喜欢开玩笑的人，他岔断我的话以征求意见的口吻向刘家惠说：“豇豆，我们都是好朋友，我觉得黄牛悟性不错人也聪明，有点文艺创作天才，未来当作家怎样？”

我 慌忙摇手道：“你们别拿我寻开心，我要能当上作家，天底下全是作家了。”陈崇阳和豇豆竭力支持梦觉的提议，豇豆首先表态说：“我同意梦觉的意见，你虽然文 化没有我高，写的东西却比我写得好。当作家倒是一条路子，前天我看报，高玉宝先初一字不识苦练几年，现在不就是工农作家了，那篇《半夜鸡叫》我读过，写得 真棒！”

我们说得正起劲，红星农业社的李社长来了。他一脸愁容，说话有气无力道：“好，你们都

在，今晚评工分，我看陈同志得亲自去一下，闹不好龙五嫂会咬人的。”

他 说的龙五嫂，是他们社里也是远近闻名的一个最横最泼的女人，为工分事已闹了几回场了，弄得大家没点办法，搞得老陈有点怯她。其实这都是共产党自找的麻烦， 一家一户干活何尝有这么多屁事，成立了农业社大家一起干活，劳动力有强有弱，干活有出力不出力，为了解决这些矛盾，社里每晚都要开会评工分。工分就是粮 食，工分就是钞票，也难评得公平，评得人人没意见，哪天晚上不闹到半夜三更。陈崇阳听他一说显得迟疑，我便壮胆道：“老陈我陪你去。”

当 夜，我和陈崇阳去到红星农业社评工分的地方，二十多个男女社员团坐在李社长的堂屋里。堂屋正中方桌上放着盏煤油灯，一闪一闪的火苗侧射出劳动一天社员疲备 不堪的脸孔，一个个蜷缩在四周暗处，似睡非睡地在那里磨时间，男的吸烟或打瞌睡的、女的纳鞋底或拉家常，千恣百态应有尽有。待人到齐后李社长主持开始评工 分，先由各人自报，内容包括出工做了什么，完成多少任务，品质怎样，干活出力没有，然后大家发言评议，通过后由会计记在本本上，通不过按大家意见裁定。开 初还很顺利，到了龙五嫂名下卡壳了。她自报九分大家只评七分，相持不下，便闹了起来。龙五嫂说：“你们不要‘半夜吃桃子按着软的捏，每次都欺负我妇道人 家。”一个年轻社员回道：“谁叫你出工不出力，担尿水我们桶桶满，你只有一大半桶，评你七分都多了，要我说六分。”龙五嫂勃然大怒，张口骂道：“狗日的私娃子，你把老娘马干了！”那个年轻社员也不服气回骂道：“你家三娃才是私娃子，只有你那个烂屁才生得出。”龙五嫂借势发泼：“好，我是烂屁，我是烂屁，今 天老娘就要你看一看我的烂屁。”说着解开裤带就脱，会场立即大乱。老陈慌张得不知所措，我立刻参上前，“噗”的声吹灭煤油灯，整个堂屋一遍黑暗，才按熄了 这场闹剧。

在回乡政府的路上老陈摇着头说：“我看这农业社想要办好，太难太难！敢肯定迟早得砸锅。喂，黄牛，把今晚这幕写成小说该多精彩？ 。”我不知在想什么，便顺口回道：“写，我一定写！”

四、误入“岐途”终不悔

政 治上的失望不等于追求失望，一个希望的泯灭另一个希望又会燃烧。豇豆那天说的话老在我心里回绕：“高玉宝先初不识字，苦练几年，现在不就是工农作家了 吗！”我一生很羡慕作家，曾听潘清雍讲过，他在中学时就读过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所以在学生时代就参加“民青”组织，一解放便投身 革命。还说，文艺作品是战斗武器不仅要文化，更要自身的聪明才智。团中央号召年轻人向科学文化进军，提倡我们将来当“家”当“长”，也许走文学创作道路是 个很好的选择。在我热切考虑未果的时候，梦觉推门而入，指着《四川日报》上一则通知说：“黄牛，四川省文联创作辅导班正招收学员，我建议你报名去参加学习 怎样？”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第二是星期天即骑着单车风风火火去到省文联所在的布后街报了名，参加学习的大约有一百多人，都是省市机关年 轻干部，也许和我一样怀着未来的作家梦。创作辅导斑每周日上午开课学习，主要以听讲再辅小组讨论。讲课的人有李累、方刚、黄丹、还有流沙河。其他人不但不 认识连名字也不知道，流沙河虽不认识但在土改中却从《川西日报》上看过他和茜子合写的连载小说《牛角湾》。已前只知其名不见其人，现在能见到当然感到高 兴，但做梦也没有想到四年后竟成为一个“小集团”的“战友”，均是“注册”在案的

"大右派"。时也命也！

参加学习的市级机关干部分编为 三个小组，我们这个小组里有卫生局的蒋莹小姐，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女孩子。记得，一次在省人艺礼堂看歌剧《丁佑君》，千多人的剧场又闹又嚷，嘈杂的轰鸣声 把人的耳膜都快刺破了。突然，整个剧场一下哑了，脑袋来了个自然的九十度大转弯，几百双眼睛全落在一个身穿洁白连衣裙的姑娘身上。她年约二十岁，秀脸长 辫，步履轻盈，红唇皓齿，似笑非笑，两眸顾盼楚楚动人，像天仙样地飘了进来。我问身边一个同志："这是谁？"对方低声道："卫生局的蒋莹。"想不到现在竟 然同在一个小组，近距离地让我饱餐秀色。我们坐在一起研讨文学创作的技巧与方法，发言踊跃各抒已见。我很想接近蒋莹，可她十分冷淡。她呢，有意想去巴结流 沙河，流沙河却又远距于她。这时我似乎发现了一个人生秘密：女孩子都喜欢有本事和有名气的男人。于是我暗暗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做有本事和有名气的男人，不 然没有漂亮姑娘爱我。

省文联创作辅导班培训了一个多月，在结业时每个学员都要写一篇习作。我写的那篇习作引起了讲课老师方刚的注意。方 刚老师是个老作家，解放前就从事笔耕生涯，常向报刊撰稿，有点小名气，此时正在赶写长篇小说《黄继光》。他不仅热衷于文学创作，更热衷于培养年青的作家， 特别像我这样一个工农出身又战斗在斗争第一线的热爱文学创作的年轻人，他把我作为创作新秀浇灌。详细地看了我的习作后约我面谈，我按时去到既是家又是他搞 写作的办公室。他家里什么也没有一间简的床，一张用来写作的办公木桌，几本破椅子，身边还有个叫他爸爸的不足三岁小女孩。见面后他十分客气地说：'你的习 作我看了，文字功底和表现技巧不怎样好，但很有生活气息，如果你继续坚持不懈地写下去，定会写出很好的作品。"他除了建议我多读书外，还就我习作中存在的 具体问题提出很中肯的修改意见，还特别强调文学创作一定要有典型，语言要个性化，什么身分说什么话，什么年龄唱什么歌，张三就是张三，李四就是李四，还例 举了许多例子。事后我根据他的意见，把习作反反复复地修改了好几次，直到他满意为止。不久习作在《四川文艺》上以晓枫署名发表了出来。题目叫《蓝二爸》， 这是我在创作辅导班学习的习作，也是我步入文坛的处女作。

这叫什么文艺作品啊！完全是一篇政策图解，公式化概念化的说教的东西，也是共 产党中心工作的再现，地地道道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宣传品。但共产党需要这样的宣传品，正如枪炮需要子弹。它的内容写的是一个保守落后的老农，不参加互助组， 如何通过干部作工作和儿媳的帮助以及客观事实教育：单干不能抗拒天灾，只有走农业合作化的集体道路，才能克服困难丰衣足食。狗屁！想不到这篇生编乱造的"小说"，竟然得到一些人的好评，你说怪不怪？此后我又接连发表了几篇习作，不久重庆作协主办的《西南文艺》也发表了我的的短篇小说，晓枫名字渐次为人熟 识。

为什么我要取晓枫这个笔名呢？记得在发表习作前，方刚老师问我用真名还是用署名？我不懂问："真名好还是假名好？"方刚老师笑笑 说："一般作家发表文章都用笔名，比如茅盾叫沈雁冰，巴金叫李芾甘，我也不叫方刚叫方长青。"我想了下说："用假名吧。"方刚老师问："用什么假名？"此 时我正在阅读柳永的《声声慢》，词中的两句"杨柳岸晓风残月，今宵酒醒何处？"。方刚老师笑笑："我建议你风字左面加个木旁怎样？不然太软了。杜牧有诗云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枫叶是红色，你是工人出身，共产党喜欢红色，从阶级属性和强烈的时代感情，用枫叶的枫比较好。"我晓枫的署名就这么 取下的。谁知一年后"机关肃反运动"又和胡风标上了，说我是"小胡风"，被批被斗整整一个月，生活与我开了一个大玩笑。

文学创作有着强 大的魅力，就像一个美丽的姑娘使你眷恋不舍，有无穷无尽的乐趣。它既可展现你人生的聪明才智，也可表述你人生的追求与理想，爱恨情仇是是非非无限无限的深远！是清冽甘泉使你饮而再饮，又像是鸦片使你再也扔弃不下。自此，我迷恋上了它，只要一有时间就写就看书，收集词汇学着写人物笔记，注意观察生活动态，不 放过每个稀微细节，并喜欢听人讲故事和编故事。在机关里开始有人称我是“工农作家”。一次，我在省文联碰上蒋莹，她和他新认识不久的男朋友在一起，我故意 走过去把我发表过的作品的刊物送给她，一边客客气气假惺惺地说：“蒋莹同志，谢谢我们同组学习时你对我的帮助，这是我几篇不成熟的习作，请你提提意见。” 她翻着我的作品睁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有点近似不相信地惊愕地问：“你写的？”我笑笑点头道：“不好意思，习作，习作。”我心里自在极了，感到是种极大的 报复：现在你想喜欢我吗？迟了！好在别人没有爱上我，要是爱上我，共和国就多了一个漂亮的右派老婆。听说，后来她嫁了一个当官的，一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十九）

五、去做管肚皮的事

什么是管肚皮的事？粮食统购统销。1953 年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中规定：“生 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农民在缴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外的余粮，可以自由存储和自由使用，可 以继续售给国家粮食部门或合作社，或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并可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易。”但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具体执行中却不准 许农民在市场上销售或互通有无的交易，只能卖给国家，自此农村再无存粮，一遇歉收或青黄不接便出现饥饿。

共产党为什么要实行这个政策？不少专家认为：中共建政伊始，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一方面城镇人口数量大幅度增长，粮食需求量大增；另一方面由 于私营粮商与国家争夺粮食市场以及农民的惜售心理导致的粮食征收困难局面。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政务院才发布了以上命令：为了保证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所需要 的粮食，稳定粮价，消灭粮食投机，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特根据共同纲领第二十八条“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 的规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

由统购统销出台的背景及所要实 现的目标来看，有两个特点：一是农村粮食征购中的强制性；二是统销对城镇粮食供应的保障性。农村粮食征购中的强制性主要表现在国家不断加强对农村粮食的控 制，农民逐渐丧失对粮食的自由处置权，农村粮食被国家最大限度的掌控。换句话说，统购统销体制的确立，事实上确立了一种城乡粮食分配中的不平等机制。在这 种带有偏向性的体制安排下，农村作为粮食的供应地却缺少必要的粮食保障，城镇在国家的粮食供应中明显居于优势地位。为此，才有 1959 年至 1961 年的饥 荒，说得明白一点那场大饥荒固然有“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客观诱因，而根本问题是这一政策把农村存粮洗劫一空，也就是说饿死的几千多万中国人，是毛泽 东从根本上否定了原有的行之有效的存粮于民的传统优良的制度。

翻开历史画卷，历朝历代农民所收下的粮食除自食外，均能将余下的粮食积存 起来。民间有句成语“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由于民间粮食富裕，纵是天干三年也不会出现饥谨。农民是最现实的保守主义者，从不轻易卖掉自己库存的粮食，在 遇上红白喜事或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忍痛出售一点粮食。纵是如此，他们也要多次地权衡价格后才拿到市场去销售，一当难关过去有了钱又去把它买回来。故粮价总 是随行就市，自由销售交易，不受权力或政府掌控与制约。

当时成都四城门都有米市，各条街有米店，价格一天一个行情，无论买米或是卖米， 都是以斗、升、合计算。一斗米重量为 30 斤，十升为一斗，十合为一升，把米盛在斗、升、合里面，用一个特制的木刮一刮，天公地道皆无二言。卖米的米贩子多 是四乡农民，他们每天从集市（四川叫赶场）上零星收来，然后再装成袋用黄牛驮到米市上去卖，买主多是米店的老板。他们谈论价格均是双方的手放在袖笼里面捏 指拇，什么“拐、么、叉、筒子”近似黑话。生意成交后，米贩按照成交的价格、品质，又用黄牛或板车把米送到米商开设的店铺去，米商再卖给需要买米的各家各 户。千百年来市场就这样运转，大家都习以为常。可是共产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把这一切良好的供销关系全部粉碎，认为这样会造成不法奸商屯积居奇，抬 高粮价，坑害百姓，破坏国家建设。他们总是说“我们做一切事情都是从老百姓利益出发”，偏巧老百姓却不买帐，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拼死抵抗，因而产生不少悲 剧。粮食“统购统销”便发生了不少这样的悲剧。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这项新的创举，区委、区政府又向各乡派出工作组，我是站东乡工作组的 组长。统购是有任务数位的，数位由中央分配到省，省分配到市，市分配到区，区分配到乡，一级一级压下去滴水不漏。这些任务数字从何而来？

是田亩产量，扣去 应交的公粮，全家人的口粮、饲料粮，余下叫的余粮。田亩产量又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说起来既简单又“科学”，简单的小学生都能计算，“科学”得连华罗庚都 信服。比如一亩田栽多少棵秧，每棵秧有多少棵谷穗，每穗有多少粒水稻，用秤一称求出约数，再乘以棵、乘以亩的总数，便是田亩产量。这种“科学的换算法”无 懈可击，但实际中却远非如此，常常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悬殊，可又无法反驳说它是错误的。

工作的开展办法仍然是学习档，统一思想认识， 召开全区乡、村、区三级干部会议。层层加码分配任务，村组包干落实到人头。我所在站东乡的“统购任务”是３４０万斤。老天，一个人口不足两万，田土不满八 千，平均每亩要向国家卖出三百多斤余粮，公粮还另计。大家听着都咋舌，纷纷叫喊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坐下来一边学习有关文件，一边算粮食的收入支出帐，这 一算还余有十几万斤粮食，叫卖不出那么多的嘴巴全闭口了。区长李运成在三级干部会上说：“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关系到国家大政方针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也 考验每个干部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因此必须完成，一定要保证完成！哪个乡不完成，工作组长要负责，乡长要负责，参与此项工作的每个干部要负责……” 压得大家喘不过气，背上直冒冷汗，谁敢说完不成？参会人员迫于形势只好纷纷表态：“保证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一定超额完成任务！”有的乡还向党写了决心 书，表示一定听领导的话，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回到乡里周龙联乡长私下向我诉苦道：“黄组长，按算帐的办法我家五亩多田也该卖一千 七百多斤，咋卖得够啊！把口粮贴进去都完不成。你叫我婆娘娃儿吃什么？”我想也不想回说：“那算帐的办法不是很科学合理吗？你怎么当时不说呢，下来叫 苦。”他狡黠地笑笑：“那场合能说完不成吗？除非我不要这顶乡长的乌纱帽了。”我也感到事情蕀手，是个“炭圆活”（四川话：手里捏着火团）便问：“你说该 怎么办？”他想了会儿，不动声色地咬咬牙说：“卖！，把口粮贴进去都要完成任务。哪个狗日的敢不卖，老子开会组织人斗争他。”我道：“还是要坚持说服工作 啊！”他阴不阴阳不阳地补一句：“说服？我说黄组长呀，没有生过娃儿的婆娘怎么晓得屁疼，我是农民，哪个农民不存点隔夜粮啊！”。我沉默了好一阵，环顾左 右压低声音说：“临行前李区长向我作了个别交待，先全力组织农民卖，完成任务后再说下文。如果实在卖多了还可返销。”他一下眉开眼笑立即拍手道：“有李区 长这句话，我们就不怕了。”我感到有点失言，即忙纠正说：“周乡长，这可是秘密，你可不能对外讲哟！”他卷上叶子烟悠悠然然抽起来，说：“放心，黄组长， 我又不是傻蛋。”

我配备好各村干部，也采取按人头包干的办法，一层一层压了下去，有的村还加了码。我督战建设村，用以点带面的办法逐步 推开。建设村村长夏雨祥是个风风火火的人，此时正在争取入党，对工作十分配合支持，在村干部会上带头表态卖余粮，数额远远超过他家应卖的余粮数。会后，我 心里不踏实，惴惴不安地问：“你卖了这样多，过年后吃什么？”他朗朗一笑道：“黄组长，干革命死都不怕、还愁我没饭吃么？”我十分感动，紧紧握住他的手。 当夜将他带头卖余粮的先进事迹写成通报发到各村，号召大家向他学习。然后用这个例子在各村推广，组织党团员带头表态，积极分子跟进，给超报余粮数的农民戴 红花、拍巴掌等激励手段。经过几天几夜的工作成绩斐然，各家所报出来卖余粮的数字远远

超过区里所下达的任务指标。区长李运成来乡检查工作听完我的汇报后， 十分高兴地说："小黄，干得不错，你很有工作能力，对党的事业忠诚老实，上次对你处理看来重了一点，等适当时机我建议支部恢复你的候补期。"我很受感动，表示今后更要努力工作。

超额完成任务的数字仅仅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到入仓时候却兑不了现，怎么办？乡长周龙联把大腿一拍说："派民兵给 我挨家挨户搜，我看哪个龟儿子敢不卖？"。我认为这做法不妥，思考了会儿提出一个新的设想，说："这样吧，我们以检查卫生的名，派积极分子到那些说卖不出 余粮家先去看一看，如果真有粮食不卖，再派民兵去。"他同意我这"两条腿走路"的方法，经过极积分子现场勘察发现，真有十多户农民匿粮不卖，其中最典型的 一户是姓柳的富裕中农，他把粮食藏在一副寿木里，我们立即派武装先看住粮食，立马召开现场批斗会把这个柳姓富裕中农斗了好半天，然后把这事情作为活材料拿 出教育全乡农民。

在骗、逼、压三管齐下的胁迫下，总算完全了粮食统购入仓任务数，可是不足一月全乡各村出现缺粮现象，其他乡村和周边县 区也相继出现，情况比我们乡还严重。这些缺粮农民，成群集队涌进城里去抢购锅魁、面食、点心，有的还到餐馆去买饭，好在那时虽有粮食定量，但买熟食品还不 要粮票，人心比较稳定，可是抢购风越来越严重，引起上面不安。一次我去建设村了解情况，正听到夏雨祥和老婆吵架。他妻子一边哭一边叫着骂他，道："你狗日 的显屁儿白装假积极，搞得一家人没米下锅，卖他妈屁余粮，咋不把你屁股卖了，还卖不卖老婆、儿女？"夏雨祥急得跳脚说："你这是什么话?什么话?还给不给 我留张脸。"我心里深感歉意，即忙上前劝解，他老婆拉着我衣襟哭："黄同志呀、你不说统购统销只统购农民的余粮嘛、为啥共产党把我们的口粮都统购去了呀！ 呜呜。。。。。。"我无言以对，只好竭力安慰："放心，夏大嫂，只要共产党在就不会叫你们饿饭。"于是我骑着单车赶回区上，向李区长作了反映，建议是否根 据实际情况批准返销一点口粮？他听后两眼圆睁，粗声粗气的气急败坏说："才入仓几天就返销，有这政策吗？你向市委说去。"我回敬一句道："未必看着农民饿 死不成？"他道："那个乡死了人那个乡负责。"

我一气之下向市委反映了全区统购统销的真实情况，这等于是告了领导的一状，当然那恢复候补期的许诺也就泡汤了。自此，我们的关系更加矛盾白热化，可他奈何我不得，那时上级想整倒一个下级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机关里还没有"阶级斗争"。

六、初识中国民主 1

有 人说毛泽东统治下的二十八年，中国只有两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会 通过的，但仅是写在纸上的文字符号，从来也没有实行过。"婚姻法"倒帮助了不少南下的老干部离去了家里黄脸老婆的忙，使他们心满意足地与城市姑娘结了婚。 其实毛泽东最讨厌法律，认为那东西碍了手脚，所以他说他是"和尚打伞"。他曾说，干什么事有《人民日报》就行了，社论一发号召，全国就动了起来，法律有鸟 用！不过既然叫"国家"就得有法法，尽管那是写在纸上的

文字符号，也得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手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应由人民选举产生，可是中国太大不能由 人民直选代表，便来了个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史称"普选"。本人便是此次"普选"基层工作委员会的主席，故此节叫"初识中国民主"。

可 别看我们中国只有"四大发明"，这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也是个重大的发明呀！遗憾的是那些"伟大发明者"至今没有去申请诺贝尔大奖，真可惜。什么是自下 而上的民主选举？即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市（地）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市（地）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省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且农、工、兵、学、商、宗（教）、科（学）、教（育）、文（艺），方方面面全有。就像计划经济一 样，各级人民代表的产生也有严格的计划，不然何以叫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就是这样选举产生的；我们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就是这样举手表决通过的。多神圣！多庄严！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假自由能比吗？为了搞好这次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普选工作，国家又抽出大批干部，投入巨大 的财力物力做好此件大事。我有幸被派往成都市龙潭区站东乡普选工作委员会担任主席。这主席，是成都市普选工作委员会委任的，而且还有盖有大红章的委任书， 一点不马虎。

我们站东乡普选工作委员会有 30 多位工作人员，一半机关干部，一半小学教师。干部叫普选工作指导员，教师叫普选工作技术 员；前者管大方向的政策宣讲，后者管一家一户的登记填表。全乡以 16 个自然村为单一选区，每个选区要公布三次选民资格榜，还要公布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人员的名单和理由，以及只有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的人员原因。当然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是地、富、反、坏分子，所幸还没有右（派）、资（产阶级）、修 （正主义）、托（派）、叛（徒）等分子，不然还得增加一半登记填表的技术员。如当你当了"分子"就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他们的子女却只有选举权而无被选 举权，分明别类十分复杂。那时人们还十分看重此事，感到有选举权十分光荣，是当家作主的表现，可以按自己的意志选出代表，向政府提出能代表自己意见的代表 治理国家。但在内部却有不成文的规定（共产党做任何事都有内部文件，那外部文件只是给人看）：被提名为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一，必须是拥护共产党和社会 主义的；二，必须是大公无私，能带领广大农民走集体富裕社会主义光明大道路的；三，有阶级觉悟，能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的。

代表候选人选举 产生的办法是：由乡普选工作委员会邀请所在选区的青、工、妇和党团员，以及其他有代表性的人物，酝酿提出名单，交由选民讨论通过，然后再由选民公开投票。 其实这些代表候选人名单，都是我们乡普选工作委员会事先拟定好后报区委审核，待区委同意后我们才能拿出来交选民们酝酿、提名、通过，投票选举仅仅是走过场 的一种形式而已。所以我作为普选工作委员会主席在乡里威信很高，权力很大，谁都要买我的账否则休想当代表，正如我要听区委书记和区长的话一样。特别是那些 要想当代表和村长、乡长的人，对我更是毕恭毕敬热情周详。乡长周龙联是土改建政选出来的，此次生怕选不上，成天主席前主席后的拍我马屁。一天，他笑嘻嘻走 进我的办公室，求情似地低声下气说："黄主席，你一直领导我，相处时间也很久了，你看我有什么缺点和错误？

有没有不尊敬你的地方？请你大胆批评教育我，今 后我才能改正。”当时，我心里真有点看不起他，不就是为了那 32 元乡长的工资嘛！32 元钱虽不多，却比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收入却多了好几 倍到十倍。我是个碍于情面又心慈手软的人，尽一切办法保住了他的位置。想不到在 1957 年 7 月，我被打成右派分子揪出来批判斗争时，他却作为市郊农民代表 上台揭露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我想，不是为着那 32 元的工资吧？

村民代表选举是用举手通过的，基本上是极积分子和清一色的的党 团员，然后由他们选出乡代表，再选出区代表。区代表全是上面圈定的，党团员多少、妇女多少，军队、学校、农村、工矿各多少？都是有不成文的比例。此套路直 至市、省、中央，你要当代表，首先要取悦领导对你的好感与信任，没有此前题休想。毫不过份地说：人民代表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是共产党的花瓶，它的最大 作用仅是一个表决机器，它的产生与存在不过是愚弄人民的作秀而已，今天还有谁关心此事？连他们也不感兴趣了。这就是中国的民主，这就是中国的普选。但无论 怎样说，那次的普选总算是由下而上的选举，所选代表总要和选民见面，而今天连此形式都没有了，变成了赤裸棵的权钱交易。啊，中国，你何时才有真正的民主？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二十）

第八章 爱情闯入生活

记得莎士比亚说过：“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国家恰好打了一个颠倒：幸福家庭是不相似的，不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中国千千万万的幸福家庭都毁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所以说中国爱情的悲剧是相似的。

一、站东乡碰撞的火花

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有句名言“哪个男子不善锺情，哪个女子不善怀春。”

五 十年代的年轻人是早熟的一代，思想早熟，追求早熟，事业早熟，似乎情感也早熟。1952 年全国大张旗鼓地宣传《婚姻法》，提倡男女自由恋爱，反对父母包 办，视中间人为“千夫所指”的媒婆。我心里在想：没有介绍人怎么恋爱呢？未必向女方说我爱你，此言怎好启口？而不知道感情的交往、磨合、相爱，不是突然的 事件，总是默默地、无声地，通过双方无言的眼神和某种潜在表情在交换，就如水到渠成的自然道理。虽然我是个工作狂，强烈的事业追求者，也活得充实，但每当 工作之余或放下书本闲暇的短暂时间，突然有种空虚感，似乎生活中缺少点什么？总想和女的、漂亮年轻的女的谈天，不知女人是否也这样？男人在一起喜欢谈论女 人，女人在一起也喜欢谈论男人吧？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谈论的形式与内容，决不会千篇一律。当几个男人凑在一起时，便给机关里的姑娘打分，六十分及格，七十 分中等，八十分中偏上，九十分以上为美人，没有对象称之为“单干户”，有了物件称之为“互助组”，结了婚叫“初级社”，

有了孩子叫“高级社”，这不是无 聊，也是男人一种生活世界。

我是个“老单干户”，使陈崇阳、梦觉等朋友十分为我操心。他们两人都早有了女朋友。梦觉女朋友是高中同 学，1950 年 12 月参军去了朝鲜，现在还在志愿军部队作战地军医，俩人常有书信来信，说回国就结婚；陈崇阳女朋友是他父亲的学生，在省上一家银行里工 作，每周都有约会。我到底该找什么样的女朋友呢？梦觉意见是：第一人要漂亮，第二要有文化，三要品格好；陈崇阳说漂亮不漂亮没关系，关键要性格好会做家务 事。我的标准是漂亮，像冬妮亚一样走在一起也光彩；再有兴趣相投爱好文学。但漂亮姑娘要找的多是当官的，或叫有发展前途的。机关里几个漂亮姑娘我看得上 眼，已为科长处长“号了”难以沾边。说到“兴趣相投爱好文学”就更难了，很少有女孩子热爱文学献身写作，多半是读读小说消磨时间而已。

中 国人相信缘份，婚姻更是如此。说什么“百日修来同船渡，千日修来共枕眠。”1953 年夏，也就是我在站东乡担任普选工作委员会主席的日子，一天周龙联乡长 敲开我办公室的门，拿着一张介绍信走进来说：“黄组长，市上来了位同志，说是奉命来建立图书室的，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我正埋头看文件，头也不抬地说： “你处理就行了。”周乡长笑笑道：‘这是女同志，她说非要见驻乡工作组组长。”我合上档，接过介绍信看也未看地扔在桌上说：“真烦，叫她来吧。”

不 一会儿周乡长引着个姑娘来到我面前，怯生生地站在那里显得手足无措。我随眼看去，哦，一个漂亮的女孩！她年约二十岁出头，生得白白净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 嵌在红喷喷的鹅蛋脸儿上，小小的嘴唇像颗熟透的樱桃，两条细细的长辫拖在青呢短大衣上，甩去甩来好似一对蝴蝶在欢快地飞翔，唯一缺点是身材矮一点，不过矮 得适中匀称。从她那怯生生手足无措的样子判断，就知是个新参加工作不久的菜鸟。

我示意叫她在椅子上坐下，才重新拿起介绍信认真看了一遍 后，说：“肖同志，你是市图书馆的，谈谈你的打算，我们怎样配合你？”她翻开随身所带的笔记本，把事先写好的工作计划，一字不漏地像朗读诗歌一样地照着读 下去。我心里暗自窃笑，好机械，一副学生腔。交过一翻交谈后按我的意见，初步确定图书阅览站的试点放在建设村，一来那里群众基础好，二来顺大路来去方便。 几天后她也搬着行李住在乡上，说是为了开展工作方便，自然也就成了工作组的一员。乡上工作既宁静而又繁忙，每天上午除研究汇报工作外，便是各人根据自已的 爱好与人生选向自学，我当然是看小说或做人物笔记。一个早晨我在乡政府横厅桌上赶写报告讲稿，因那儿地方大视野宽人又少，她却不揣冒昧走过来拿起讲稿就看，那是什么讲稿啊，正像高玉宝写《半夜鸡叫》在纸上面画人人马马一样。有什么办法呢，我的文化超过了水准。尽管我夜以继日不停地学习，但时间基础差仍然 别字连篇。她看了会儿，竟然不客气地指出我文稿语法上不通之处和错别字，说：“把青春献‘及’党，把生命交‘与’毛主席，有两个字是错的，是‘献给’而不 是‘献及’，是‘交于’而不是‘交与’……”我不好意地红着一张脸说：“肖同志，谢谢你的帮助。”她笑笑说：“今后不要叫我肖同志，就叫我名字好了，要不 就叫我地瓜……”

“地瓜？”我望着她白白净净地脸蛋，有点困惑不解。“地瓜是我的绰号，同学都这样叫我，就像别人叫你‘黄牛’一样。” 我笑起来问：“你怎么知道我叫黄牛？”她一点不掩饰地说：“这又不是什么秘密，大家背后都这样叫你。”我“哦”了声表示认同。自此，只要一有时间或见我一 人学习看书，她便主动上前向我不厌其烦地讲解每个字的出处，比如看报时看到“颇”这个字卡壳了，她便抿嘴一笑，柔声细语地说：“这个字读“PO”，有两种 意思：一丶偏，不正，如：偏颇；二丶副词，很，相当地，如：颇久，颇不易，颇负盛名等等。”说也怪，经她这一讲解，这个字就像烙铁一样地烙在了我的心上再 也忘不掉。

一天夜里，我们一同下村归来，默默走了好一段路，我打破沉默道：“肖同志，你对我帮助太大了，不知该怎样感谢你。”

“感 谢？”她的身子微微一怔，随即轻盈娇憨咯咯地一笑：“随你便，你认为哪种方式最好，就用那种方式……”我低头细心品味着她的话，脚步更慢了，月光下拖出的 两个长影儿，一时在泛白的小石桥上，一时在染着露水的秧苗上，忽闪忽闪飘忽不定。水田里的青蛙呱呱地叫个不停，不时有寻爱的游鱼蹦出水面以示美丽的身姿。 在这万籁俱寂甜美的夜，两个身子像只游船在墨绿的田野里浪荡飘逸。“黄组长，今后你可不要再叫我肖同志了，听来多别扭。”她说，语音柔得似水，两只洁白的 细手不停地扯拉着头上的辫子。

“那叫什么？”我老老实实问：“你不是在会上发言说么，‘同志是集体的代名词，是阶级友爱的化身。你倒下 了，它来接过你手中的枪；你掉队了，它能帮助你前进’……”“好啦，好啦，你还有点教条哩！”她把辫子往背后一抛，扯片秧叶轻轻地放在嘴里咬着，那水灵灵 的黑眼睛里像有两朵燃烧的火焰，我骤然感到一阵紧张，听她继续说：“那是会上，现在什么时候——谑，你看，流星。”一颗流星划过夜天，坠落在远处。这时蛙 鼓奏得更欢了，把溪流的潺潺声都掩盖去。一阵凉风吹来，她身上的香脂味钻进了我的鼻孔。我虽是个还未成熟的男人，但此时也禁不住有了爱的冲动情的狂澜，加 之近来又在看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正巧看到保尔跳进冬妮娅屋里那一章。也许是故意还是调皮，我靠前一步挑衅性地问：“那喊什么？”

她 似乎有点慌乱，但很快镇静下来，把声音压得极低说：“小肖丶俊华丶地瓜都行……”说也巧，她在说话时忘了看路，一脚踩下了秧田的过水渠，“哦唷”地叫了 声，身子几乎跌下去，我即一把扶着她轻盈的腰肢，感到一股强烈的电流从心上涌过。她不挣扎久久地倚偎着我。我们相互呼吸变得急促，一动不动静静地享受那初 恋的甜密。爱，无声无言的爱，悄悄地爬入了我们的心灵，自此拔也拔不出来。

在我们爱情发展到了白热化的时候，一个晚上在人民公园的花丛 中，她如痴如醉地躺在我怀里，接受我轻柔的抚弄。“荣，你得到我满足了吗？”我点点头，看着她那双柔柔的眼睛道：“满足了，完全满足了。”我说，仍轻轻地 不停地抚弄着她细细的眉毛丶红红的嘴唇丶冷冷的鼻尖丶白白的脖子……

“你对我的爱不会变心吧？”她张开两臂抱着我的脖子，甜蜜蜜地说。 我吻着她焦灼的嘴唇，醉意朦朦地道“傻姑娘，说些什么，我倒担心你把我扔了。”她灿然一笑，把我手捉住放在她柔软的胸脯上，“做人得讲良心，我又不是‘杯 水主义’者。爱情的可贵在于一生一世，忠贞不渝，同甘共苦，共患共难……我最恨那种朝三暮四，水性杨花的女人，把爱情当成市场上的商品交易。”

自 此我精神百倍朝气十足，再没有烦恼与忧愁，更无生命的孤单，浑身是力量，有时情不自禁地挥臂高喊：“伟大的时代，美丽的生活，我爱你！”十年后我羁押在省 公安厅看守所，这里距初恋的人民公园只有咫尺之地，想起往事曾泫然写道：“花有意，物有情，夜色吞去两个人。竹丛深处语窃窃，笑声一串铃。雨儿凉，风儿 轻。沙平路软脚印深。麦穗重重影绰绰，暗中好偷吻。草无言，虫有声，清清溪流白如银。翠竹朦胧藏睡鸟。相偎看流星。情迁变，岁月奔。泪水千行湿眼睛。留得 勤奋文章苦，狱中一孤魂。”

二丶荷塘夜色浓浓情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当人的情感坠入爱河常有不同的燥动，见 时相偎不忍离，不见狂恋心不定。一次相约看捷克影片《明朗的天空》，我大约开映前半个多小时就去到电影院傻等，一等不见人、二等不见身、三等不见影，于是心里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幻觉：她是否病了？是否发生了车祸？是否临时有工作任务？是否突然变心？一个个假设，一个个否定，焦急的情绪使任何一个旁观者都会 暗暗窃笑：这个失魂落魄的年青人，肯定在等他女朋友。在来去的观众中终不见她婀娜身姿，我灰心丧气，待第三遍入场铃声响起，绝望中她姗姗来了，使人又怨又 喜，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

我们又整整一周没有见面了，在工作上我显得心神不灵情绪上意外烦燥，梦觉和陈崇阳竭力怂恿我去市图书馆找她， 还鼓励说爱需要勇敢，不要放弃任何的追求机会。恰好这时她来电话说有事，要我去图书馆找她。实际是她们同毕业于省女职高的三个女孩子，为了对她人生负责， 策划了一场共同“审查”我的闹剧。她们省女职高也和我们市委干训斑一样，每人都有一个绰号，那三位“审查”我的女孩子一个叫“灯影”的赵素华，因她瘦而且 高，一身没有什么肉，像个皮灯影；一个叫“春芽”的李春蓉，长得嫩气模样儿好看，赛过一朵初绽的迎春花；一个叫“蝴蝶”的胡德华，因谐音而定其名。可她事 前没有告诉我这个“内幕”，只说某天某日去。我没做任何准备仍然是土里土气一身行装，便骑着辆自行车飞也似地去了。在 1953 年前国家机关干部绝大部是供 给制，每月是一万二千元（旧币，合新币一元二角），后改为每月五元人民币的包干制，虽然其他费用仍由国家负担，五元人民币又能做什么呢？好在那时的年轻人 不讲究穿戴，也不上酒店坐茶馆，除缴纳党团员应交的费用外，便是买几本书。我热天通常的打扮是上下灰布制服外加草帽草鞋；冬天的是蓝布棉衣兰布裤，圆口胶 鞋粗线袜，典型的廷安老土。我去图书馆的那天，也是这么个打扮，只足下的胶鞋换成了当时极为新潮高挡的丶翻皮半统皮鞋。

图书馆在祠堂街 人民公园旁边，和公园一样隶属市文化局。它前面大街后通公园，三栋平房一眼穿透，借书室丶阅览室丶藏书室，紧埃公园荷花池那一楼一底

的砖木结构房是她们工 作人员住室。到了图书馆进门有个小桌算是传达室，坐在桌前的一位年轻俊秀的女子挡住问：“同志，你找谁？”

“找肖俊华同志。”我怯生生的回答。

“哦！”她两个眼儿在我身上溜了几转，似笑非笑地问：“公事还是私事？请填会客单。”

我难住了，该怎么回答：说公事吧，是什么公事？说私事吧，又是什么私事？使我更为发愁的是填写会客单。我的天，我写出的那几个字还不如小学生啊！她见我迟疑，便进迫道：“同志，你说呀！是公事还是私事？……”

我难以正面回答，只好红着脸支吾：“没什么，她大概不在吧？我改天来。”我推车慌忙往门外走，听见她爆发出一阵笑声：“地瓜快来，你女婿走了。”

她从藏书室冲出来，一边叫我，一边笑骂道：“春芽，你别高兴，到时候我才和你算账。”

我进得她们的寝室还未看明白眼前一切，一串女孩子银铃般的笑声推前拥后地挤了进来。这些姑娘也没有一个羞字，嘻里乐啦地说开了：“不错嘛，老里老实的，像个工人样子。”

“打个空手来，糖也不买一点。”

“还怕羞吗？低着头……”

我 一时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对答。她呢，无所谓的笑着，似乎向她同伴说：我找这个物件不错吧？好一阵后我发言了：“同志，你们的机关枪、迫击炮轰够了吧？现 在该我反击了。不怕你们嘴利舌尖，今后可不要找个傻女婿，唱‘驼子回门’啊！”（驼子回门是一出川剧，讽喻一个漂亮女孩找又丑又呆的女婿）

春芽、蝴蝶、灯影尖叫起来：“可不得了，地瓜，将来你准不是他的下饭菜，跑在我们娘屋来撒野了。”

她扬着眉得意地笑道：“你们以为别人是一张嘴巴，说不过你们三张嘴么。”

灯影把脸一刮：“地瓜，羞不羞啊，门都没有过，就帮起腔了。”

蝴蝶道：“我们走吧，别打扰人家说知心话，惹横了‘牛’，谨防用角来擂你。”

在格格地笑声中她们飞了出去。她瞟我一眼道：“对她们就得轰，装老实会缠个不休。”
我笑，看了看四周说：“这儿不错，好读书。”

“你真是个书迷，走到哪里都想着它。”她虚掩上门，在我对面坐下来说：“一个人要正确使用时间，注意大脑休息，书过于看多了，不利于健康。”

我说：“我又不打球，也不喜欢跳舞唱歌，除了看书就觉得没什么事可做。”

“现在也是这样？”她明媚一笑，提议说：“今晚去划船，划船挺好玩，不仅能锻炼身体，还充满了诗情画意，我们把船划到荷花池中心去摘莲籽吃。新莲籽又香又脆，好吃极了。”

我笑着点头问：“就是我们两人？”

她道：“未必你要请春芽、灯影、蝴蝶参加？”

我故意道：“她们是你的同学和同志，请不请关我什么事。”

“你以为别人没约会，她们都早有了物件，上周灯影和她爱人跑到华西坝去耍了大半夜，回来时，头发都乱成了一个鸡窝，见着我只是不好意思的笑。”她小声说：“你想，她们会不会来？”

我 一阵心热想上前吻她，她推开我道：“你不是想看书吗，我给你取几本来。”她转身出去，不一会儿取来几本书说：“这是新出版的苏联小说《收获》，写的是一对 恋人因战争而分别，后来男的负了伤因消息之误，女的以为死了便和另一个人结了婚，不久男的回来了，三人之间形成个矛盾重重的三角恋真不好解决，”我听着深 皱眉头由不得关切地问：“后来呢，后来她（他）们怎么解决？”她望着我灿然一笑：“感情的事说不清楚，你看了就知道。”她说，随手送来第二本书“这是《远 离莫斯科的地方》，也是才出版的新书，你看这有一首诗……”我顺着她手指卡住的地方看去，并轻轻诵读道：“……爱情不是秋天的泥泞，也不是冬天的雪，爱情 是一支歌，然而这支歌是不容易编好的……”

“写得好不好！”她抬起发亮的眼睛问。

“好，”我说：“我们现在不正在编这支歌吗？我想我们会编得好。”

她合上书拢拢头发道：“你准备怎样编？”我一下抱着她：“我们不正在编吗？”

“去你的，”她逃开我的手：“要这样编就太简单了。”

“你说该怎样编？”我笑，有点不好意思。

她想了想，摸着发红的脸颊：“爱情莫过于相互的帮助和体贴，要把感情建立在忠实的基础上，不能欺骗不能说谎，不知怎么我总担心今后你是否永远对我这么好？会不会去爱上其他女同志？”

我 沉默了一下想了想，认真地道："我是个学徒，旧社会受尽了苦，你能看上我，我便感到最大满足。只要你对我不变心，我还会变心吗？何况我们俩人兴趣一致，爱 好相投，会胜历史上与现实中任何一对恋人。"说着我背诵了新读到《长恨歌》中四句："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 期。"

"真的这样？"她扑到我的怀里用手抱着我的肩头，偏着脸道："你还不知一个女孩子的心，当她决定爱上一个人后，便再难以转向。因为她人不能出卖自己的清白与情操，把少女的骄傲给了这个又给那个。荣，希望你能永远爱我，我们生生死死不相离！"

我紧紧地抱着她，狂热地吻；她舍不得松开手，舌蕾在我口中旋转。

夜幕降临了，黑暗渐渐吞去了房中的轮廓，她好一阵才说："我们走吧，该去划船了。"我挽着她的手，从图书馆后门一条绿绿的小径，缓步向人民公园荷花池走去。

周 末的人民公园，浸沉在欢乐中，灯光闪烁歌声悠悠；楠木林里人群熙攘，笑脸张张；假山后面情侣对对，携手揽腰；舞池里，成双成对的靓男美女在霓虹灯下翩翩起 舞……时代是这样的欢乐，社会是这样的祥和，岁月是这样的谧静，叫我们怎么不歌怎么不唱啊！我们沿着窄窄的石板小路逶迤而行。石板路深深地藏在树丛中，脚 下的绿草小花透出阵阵清香，碧水绿波里只只游船在桨桡的划动下轻轻前行。我们租了一条小舟相偎而坐，然后挥着木桨一前一后的划起来。夜静云黯，星稀月淡， 蓝蓝的水带像条深灰色的长缎，紧紧缠绕着两岸花草和柳树，四周甜无声，头上星儿眨着眼狡黠地看着我们，只有两片划动的桨桡与溪水细语。小船沿着小溪驶进荷 塘，荷塘在月光下像一幅水墨画，硕大的荷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塘水中沉着一弯新月，新月像只小船在水底游弋。我们没有说话，心里溢满人世间最好的甜言密 语。人们常常议论幸福，可什么是幸福？我以为幸福就是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谈论事业丶理想丶前途……。

船划进荷花池深处远离岸畔，早已避 开人们的视线，只有当头的星光和月亮，偶尔有几声鱼跃和断续的蛙声。她深情地望我一眼说："就在这里玩一会儿吧？"我点头同收桨，她放下桡板停住小船。我 俩紧紧地拥在一起，无语胜有语，有语是多余。她软软的身躯灼热逼人，那柔肢细体紧偎于我的怀中，一股强大的电流立即透过我的全身直冲脑门，我浑身发颤，语 不成声地说："华，亲爱的，我爱你，爱死你了……"这时的她已完全陶醉在爱的天河中，连回话的力气也没有了。渐次渐次我们再没有话语，只有相互的心跳与急 促的呼吸，似乎再甜再密再柔的语言，都难以表达此时的缠绵。爱是酒，爱是蜜，爱是狂，爱是醉，在蜜与酒中的我们忘记了世界，忘记了荷塘，在偌大的环宇中似 乎只有她和我。一阵微风使我们苏醒，她轻轻推我耳语地道："亲爱的，有船来了"。我睁开醉眼，一阵满足的微笑，举着木桨划动起来。她一边划桨一边把手浸在 水中，说："好暖的水啊！"

我从池里捞起一柄莲蓬递给她："你不是喜欢吃吗？"她接过莲蓬，剥去籽壳放

一颗在我手掌里，说：“你也吃， 好香好脆。”我轻轻嚼着说：“真的，又香又脆，好吃极了。”她笑了笑，向四周看了一眼说：“那船见我们在这里又划走了，嘿，好清静，一个人影都没有了。” 我闻言移身又去搂她可一扭动，小船就剧烈荡动。她抓着我的手道：“轻一点，别把船弄翻了。”我附着她耳朵小声地说：“翻了船，洗过澡不更好么？”她道：“我又不会泅水，淹死了怎么办？”我说：“有我一起，再深的水池淹不死。《收获》上不是说，水不沉人的。”她道：“不沉人的水是重盐水，这水要沉的。”我 借势推推她：“走，我们试试。”她死死偎着我，以告饶的口吻说：“哪个星期天，我们到城外小河去游泳，你好好教我。好久以前我就想学游泳，一则找不到老师 教，二则怕羞，鼓不起勇气。”我拍着手掌道：“好好好，你教我文化，我教你游泳，同等互利。”

“才不互利哩！——”她戳我一下，笑着把 头低下。这话包含着什么意思，我是不清楚的，我也没有去思索它。她见我并不注意，才继续说：“读书的时候我也去过游泳池，可一见有些男的不怀好意，一双双 眼睛都掉在别人身上，从此我再不去了。”我气愤地说：“旧社会当然是这样，到处是流氓阿飞，他们调戏女人，无恶不作。可现在敢……”她同意支持我的观点 说：“所以我觉得社会主义制度好，女同志不再是男人的花瓶。爱情建立在平等基础上，谁也不压迫谁。不过有一个时候，我总觉得不恋爱的好，恋爱要消耗掉人的 精力、时间，常常弄得人六神无主，什么事也做不成，所以约里奥·居里夫人就发誓不结婚，决心把毕生精力献给科学。我呢，决心把毕生精力献给社会主义的图书 事业，不知怎么一碰到你这决心就改变了。”我哈哈地笑起来打趣道：“我倒成了罪魁祸首。”

“谁怨你，我是说我的意志太不坚定。”她说：“我倒觉得我影响了你，要不是我，这时你又坐在灯下学习了。真的，我并不希望你来陪我玩，可我总想和你在一起，我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荣，你说说是你影响我，还是我影响你？”

“这个公案我断不清，只有请包公来。”我划着木桨回说。她嘿嘿笑道：“你呀真有趣，包公怎么会来断这个案子。”她说娇憨地伏在我怀中哧哧地笑，我用手为她梳理着头发，静静地听着蛙声鱼跃。

她 猛然抬起问我：“现在团中央号召青年开发边疆，我们报名去，那儿虽然艰苦，可我认为挺好。”我表示赞同道：“我早有这个打算，就怕组织不同意。1950 年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就申请去当志愿军，说我年龄太小，批不准；后来 1952 年我又申请进藏，还是没有实现愿望。我一直都在想，如何把自己青春全部献给祖 国，把生命献给党，让年华爆出绚丽的火花。现在我尽管热爱农村工作，我总觉得使不出力量。……”此时，又有只船向我们停泊的地方划来，船上也是一对情人， 她深情望我一眼，拢拢头发说：“走吧，我们换过地方。”我会意，挥动木桨把船儿向另一处划去。她坐在船头，用手分开荷叶，轻轻哼起歌来：“生活是这样灿 烂，时代是这样美好，亲爱的祖国呵！让我把您紧紧地拥抱。献上我们炽热的心，为把社会主义大厦建造。……

优美的歌声在水上滚，在风中 飘。夜天明净如洗，雾露洒向大地催化生物的成长。明天，花更红，草更绿，生活将会更加美好。可是谁也没有料到，明天给予

我的却是巨大的灾难，28 年后我 “改正”归来寻旧到此写下了一首回忆的诗：“萧萧华发步不娇，含泪依稀上小桥，当日春花秋月事，至今遥遥未全消。曾驾小舟桥下过，她挥桨楫我扳挠，轻歌浪 里拍水笑，细语柔情挂柳梢。夜多静，月多好，轻轻推，慢慢摇，摇到荷塘深处去，躲在莲篷语悄悄。谁到人间有恨事？请君瞧，满塘红鲤跳多高。二十三年牢狱， 情已去，人已老，是谁之咎？此恨此情，总难销。”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二十一）

三丶吃斋把素的丈母娘

春节的第二天，约定去拜见她的母亲。听她介绍：她父亲很能干，在走马街 有一个前门开店后门设厂的皮鞋作坊，雇有七八个工人。中共建政前家境不错，她读书上学有专车（黄包）接送，一直过着近似小姐的生活，1948 年父亲因病去 世家道中落。她们有五姊妹，一个姐姐三个哥哥。姐姐早已出阁，做了资本家的太太；三个哥哥，大哥是棉纺业的一个小老板，二哥在乐山中学任教，三哥在剧团当 司鼓，她是么女，自幼受着父母的溺爱，书读得最多。她妈妈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吃斋把素成天往庙子里跑，接交的人多是尼姑和尚，对女儿寄托着无限的希望，企 图用她的美丽与学识换取有钱或有地位的乘龙快婿。

现在的家就是当年父亲做皮鞋生意的那间面铺带作坊，一幢临街三进一楼一底上下的六间住房，一家三代挤在这不足八十平米的天地里。现在同住在一起的是大哥，大哥的妻子在一处小学教书，加上两个读书的侄儿侄女一面一层全占了去。虽然住在一起却早已分炊不一同吃饭。

按 照她写的门牌号数，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她的家，未及家，她早已在门前等候，见我来了笑着迎上前道：“快十点了。”我道：“今早我六点起床，和乡干部赶 着去给烈军属拜年，拜了年骑着车就来。”我把自行车架在街沿锁上，取下后座上的礼品，掸掸身上尘土说：“一路上不要命的跑，在天迴镇街上几乎把人撞着。” 她把我衣肩上的黄泥拭去，接过手中礼品说：“你怎么一下变俗气了，还买东西？”我笑着做个鬼脸道：“第一次上门不买点东西，怎么叫女婿。”她捅我一拳低低 笑骂道：“去你的，谁封你是我家女婿。”我道：“当然是你啊！”

进得屋她把礼品放在桌上，注目扫了一眼原店铺已变成堂屋，摆有一张方 桌，四把木椅，正中是个神龛，却没有神主牌或天地君亲师位的牌位。堂屋后面有个小天井，一边是厨房和厕所，一边上搂的木楼梯。她母亲住在楼上靠天井旁的那个大间里，另外两个小间，一间是她远在乐山当司鼓三哥的住室，一间是她原拉车车夫老陈的住处。主仆关系可能不错，现间或还来住一住。她指指屋后冒着热气的 厨房说：“妈听说你喜欢吃甜的，特地蒸了几大碗甜烧白，又炖了一只板栗鸡，还问我你吃酒不，我说可以喝一点，她又跑去买了一瓶竹叶青。”说着，转头向里 喊：“妈，他来了。”

“稀客，黄同志，快请坐。”她妈妈从厨房里走出来，笑着招呼。这是一个精瘦矮小的老女人，年约六十，神情矍铄，两眼炯炯有光，皱纹满布干瘦的脸上洒满老年斑，显得精明干炼老于世故。我急忙站起来有礼貌地招呼：“伯母，你老人家好。”

她满脸堆笑注目打量我一翻，即吩咐女儿：“小华，快给黄同志倒茶，你去厨房把火看倒，尝尝鸡炖熟没有。”

我 品着茶拘束地坐着，等待丈母娘对未来女婿的审判。她抱着水烟袋，咕咕地抽了几口，然后文不对题地说：“黄同志，今年多大了，是成都人吧？家里老人还在不？ 有无兄弟姊妹，哪个学校毕业的？”她吐着烟雾，翻动着薄薄的嘴唇，向我提出一大串问题。我慢条斯理地一一作了答复，在说到读书上，我笑笑道：“大学。”她 一下十分惊喜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问：“哪个大学？川大、华大、还是成华？”

我摆摆头，一本正经地回道：“铺板大学。”

“你是学徒弟的？！”她惊愕地拉长声音，脸上的笑容消逝了一半。

“伯母，我是个穷人，共产党来了才翻身参加工作，父亲是堂倌，妈妈又死得早，你想我怎么能读到书？”我诚实回答不要花枪。

“哦！——”她点点头，又咕咕地抽起水烟，转过话题皮笑肉不笑又问：“现在担任什么职务呢？。”

“农村工作组组长。”

“农作工作处处长？”她的脸上又浮起了笑容。

“不是处长，是组长。”我作了纠正。

“组长？——”她的眼儿定了，手上的纸捻也像灭了样，不再冒烟：“就像我们居民委员会的居民组长么？”

我 笑笑不便解释，只好“嗯”一声，屋里陷入一阵难堪的沉默，空气都像凝因了。我正琢磨该怎样转个话题缓和这难堪的局面，此时她从厨房走出来笑着说：“妈，你 净唠叨这些干什么？我向你说了千百次，现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不讲长不长，官不官，只讲为人民服务，掏大粪，擦地板，也是革命。”

她不好意思地笑笑道：“我看，当官总比当百姓好，任何时候坐车坐轿的总是头头。”

“那是工作的需要呀！”她急了，向我递个眼色，意思是别和她罗嗦，我黙黙点点头表示知道。“好啦，吃饭吧？”说着，她摆开筷子端来饭菜，我先为她母亲

斟酒，再给自已斟，她突然抢过我酒杯说：“吃饭吧，还要回乡上，醉了骑车会出事。”

她 妈妈从表情言谈看出我们感情已非一般了，似乎木已成舟难已挽回，便强着脸劝我饭菜。对她这种虚与委蛇的情感我淡淡地应付着，心里却在想：母亲和女儿的思想 、性格、观念为什么这样不同？这大概是达尔文进化论上所说的，“任何生物都有它的遗传性和变异性”吧？可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悬殊啊！最后我的答案是：社会制 度的巨大变化年轻人跟上了，老一代人的思维方式仍留在旧有的世界里，仍用陈腐的金钱等级观点在区分社会。饭后，她妈妈藉故走了，目的让我们叙一点儿女之 情。她俩一同抹桌收拾碗筷，做完这一切后她引我到她妈妈住室小坐。这间住室里有在一床和一把长木躺椅，临窗方桌上摆有小巧的泥塑菩萨，铜香炉，经书，木 鱼。我在木躺椅上坐下来，问道：“你妈妈是佛教徒？”“念了几十年经，改不了封建思想。”她放下窗帘掩上门，说：“你喜欢她吗？”我毫不掩饰情感：“不太 喜欢。”

“为什么？”她身子一怔坐在我旁边急促地问：“是不是她思想太可笑，老想着当官和有钱的是吗？”我想了想毫不掩饰地说：“她和 我过去当学徒时所见的老板娘一模一样，一切从利益出发，对儿女婚姻也是如此。”她点点头表示赞同我的观点，但却宽慰道：“让我们今后慢慢帮助她，人上岁数 了总跟不上社会的发展。——呵，我给你两本好书看。”

“什么书？”说到书，我立刻来了兴致，她弯身从床下木箱中取出两本书给我看，一本 是小仲马欲《茶花女》，一本是《唐诗三百首》。她指着满是尘灰的书页说：“《茶花女》是世界名着，四大悲剧之一，是法国作家小仲马写的，写得好极了，准会 把你吸引住，我在读初中时就看了，看得来流了眼泪。听老师讲，小仲马是大仲马的儿子，一个花花公子，不知怎么他后来想到要写书了，便不再出门，成天呆在屋 里写。写呀写呀，写了几个月写出这个剧本，给他父亲大仲马看。大仲马不相信儿子能写出东西，随手扔在桌上，可晚上拿着一翻，入迷了，一口气把它读完，喜得 拍着桌子说：‘奇迹！奇迹！’当《茶花女》在巴黎国家剧院公演时，整个法国轰动起来。在演完谢幕，观众把小仲马从台上举起来，连续向空中高抛，他穿的燕尾 服被狂热的观众扯成条条。当时法国男女青年得到小仲马一条布片，视为无上的骄傲和光荣。”

我听得入迷岔断问：“真写得这样好？是什么内容？”她说：“爱情，两个人的爱情，最悲最悲的爱情。”我感到一阵糊涂，进一步问：“爱情又怎么是最悲最悲？”

“世界上最大的悲剧就是爱情。”她按照她的理解与想像说：“当爱情爱得最深最真的时候发生了误解，便会出现最痛最痛的悲剧。记不得哪本书上有这样两句话：爱之深而悲，爱之真而痛。所以说最悲的爱情是双方的误解，最感人的爱是两颗心的碰撞。”

我不太理解这近似哲学的道理，笑了笑翻翻手上的《茶花女》，道：“对于这东西还没有尝试过。”

“未必你想尝试？”她把头靠在我的肩上，调皮地道：“那我们就闹一架好不？”

“怎么闹得起来，我一看着你喜欢都喜欢不完哩！”我亲了亲她的脸蛋儿，说：“你要闹闹去，反正我是不会闹的。”

“呵，我再送你一件礼物，还是我小时玩的。”她跳起来，又从床下木箱中取出一叠洋画（过去每包香烟盒中都有一张洋画）说：“你看，这前面是画，后面是唐诗，带在身上方便，好学习。”我珍惜地看了看道：“好东西，我收下了。一直收藏到——”

“收藏到什么？你说出来。”她也知道我下面的话是什么意思，却非迫着我说。我作好防范准备，笑着一字一语道：“直收藏到我们有了……”她扑到我身上用手塞住我嘴，说：“不准你再往下说，不准你再往下说。”

在 笑声中我们抱在一起，吻在一起。谁个姑娘不喜欢爱她意中人的甜言蜜语，但又怕这些甜言密语烧昏了她，便故意矜持作态做出扭捏表情，这最能体现出一个少女的 天真烂漫，更能得到男性的怜爱珍惜。她们多么希望男性用炽热的爱去揭起那神秘爱的面纱，用炽热狂情去刺激爱的花朵啊！可当你的手快触到这花朵时她又急忙收 敛起来，只留你耐沙寻味的猜测，使你难以捕捉她的想法？

四、诚实带来的惩罚

生活 的彩带绚丽多姿，时代的洪流奔腾向前。我比其他人似乎更幸福，因为我正畅游在爱情的海洋里。爱呵，炽热的爱！她给予我愉悦，动力，希望。自此，我们经常在 一起，不是去公园划船，就是去草堂拜杜；不是去武侯祠欣赏石碣，便是骑着自行车在田野上飞驰。我们谈论的题目多是人生、未来、事业、理想，讨论的中心又常 是文艺创作。一次，我们带着外甥女居敏去人民公园划船，她问我：“我发现你和你姐姐关系特好？”我道：“小时候妈妈就死了，是她把带我带大的。”她对我身 世来了兴趣，提出要求：“你能不能讲讲你童年的故事。”于是，我们一边划着小船我一边向她讲述童年有过的辛酸：

我家三代都是穷人，爷爷 是成都同兴公烟店的管帐先生，给陈姓老板管了 20 多年的帐，忠心耿耿，巴心巴肝。可陈家老板的儿子不争气，又赌钱又抽鸦片烟，一年春节赌输了钱，偷偷回烟 店来偷，巧好我爷爷睡在钱柜上，他便拿着铡烟刀，活活将我爷爷砍死，是清朝末年轰动成都的一件大案。陈家老板还有慈善心肠，赔了我们不少钱，我爸爸三弟兄 和两个姑母才活了下来。大概是我出生不久，我家才从新繁县崇义桥乡高家巷搬到成都市打金街，父亲用分家得到的钱开了家杂货店，雇有两个店员管理生意。我生 母姓杨是苏坡桥乡人，一个道道地地的农村妇女，爱儿疼夫十分厚道。我出生时家道不错，父亲爱得不得了，还未开步走就买下了红头大耳的木马车；发音还不准就 教我看图识字；第一件新衣还未上身，第二件新衣就给我准备好了。有次我调皮打碎了邻家窗上的玻璃，邻家大婶尖着嗓子：“短命的，死挨刀的……”父亲黑脸跳 出：“你咒什么，莫

说打碎了你一块玻璃，就是打碎你家的象牙壶，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赔就是。”谁知妈妈死后不久继母温氏一过门，父亲的脸忽然像霜打的泥 团，又冷又硬，哪天不是一打三骂。我和姐姐被撵到一间又湿又黑的小房子，睡在一张又破又烂的木板床上，被套是妈妈原先结婚时的蓝花白底家居窄蓬布的陪奁， 由于年久到处都是洞。棉絮不仅黑而且硬，盖在身上象一幅门板，枕头似城墙砖，还有一股难闻的汗酸味。房子没有望板和地板，四根立柱经常长出灰扑扑的霉菌； 两侧的顶窗早破了，风来雨往钻云透月，睡在床上也能数清天上的星星。房子后边是家用厕所。厕所连着邻院的葡萄架，一开春四足蛇、青竹标（青颜色的蛇）就打 这里溜进屋。一个晚上，有条蛇爬上了床，吓得姐姐“哇哇”地叫，划燃火柴一看，是条酒杯粗的菜花蛇盘在枕头边，还吐着红红的舌头。被吵醒的父亲捏着条马鞭 子走来，一看是蛇退了三步，跟在后面的继母嘴一撇说：“蛇怎么会上床，肯定你俩捉来的。”未等我们姊妹分辨，雨点般的马鞭子落了下来。父亲一边打还一边粗 鲁地骂：“狗日的，杂种，逮些蛇回来……”我和姐姐跪在地上不断流泪求饶，但失去爱心的父亲恨不得打死这双无母的姐弟。站在一旁的继母并不劝架，搂着怀里 奶娃摇哄着。由于父亲的咒骂与鞭子呼啦声，蓦地奶娃吓哭了后母把眼一瞪道：“拿出去打，莫把我乖乖么儿吓掉魂了。”

父亲像执行圣旨的武 士。立即恶狠狠地把我们姐弟扭到另一间屋去再重新打。我姐姐怕爸爸伤着我，一下扑在我身上，用双臂紧紧抱住我，哭着说：“爸爸，你打我吧，妈妈只留下一个 弟弟呀！打我呀！打我呀！”不知是我爸爸打累了手，还是被此情此景感动终于停住。温氏后母不仅对我们姐弟不好，还特顾娘家，经常拿钱回去，再加上父亲不会 经营，在继母死那年，杂货店也就垮了。父亲又找个姓周的二婚填房，此时我已十二岁，不久经姐夫介绍出门作学徒了。我的一生都是姐姐在关照，她就象我母亲一 样。现在我参加革命工作，日子比她好过，我可不能忘记她啊！

她被我童年辛酸的往事难过得流出眼泪，久久地凝目长天不言不语，好一阵后才说：“还真不知你小时有这么苦，现在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热爱党和毛主席。”说到这里她话锋一转问：“你爸爸现在情况怎样？你恨他不?”我停下木桨，抚着身 边小外甥女说：“我为什么要恨？他毕竟是我爸爸呀！他一生也不幸，杂货店垮了后也去帮人，在大北茶厅坐柜靠工资吃饭，也受了不少气。去年他参加茶水铺工会 成立，喝酒过量得了中风后遗症偏瘫在家，我每月拿回工资一半养活他和继母。”

“你真有孝心，不恨你父亲。要我可能办不到。唉哟不好……”她一声惊叫，出手去抓外甥女居敏，居敏已经掉在小河中，拼命哭喊：“舅舅，舅舅……”

原来河边花丛中突然跃出只蝴蝶，她站起来用手去抓，不慎掉在了小溪中。好在溪水不深，未淹过她头，我一把把她抓上了船。外甥女不依不饶叫赔她花衣服。她和我都笑着答应：“赔，舅舅，赔……”

我们回到图书馆，找来衣服给外甥女换上后，便带着她在春熙路一家布店里买了一段花布料算是赔偿，也是我参加工作后作舅舅的对小辈的一点表示。人在尽兴中却忘了三天前党团员会上宣布的“组织纪律”，险些丢掉了青年团的团籍。

原来三天前全区召开党团员大会宣布：国家继粮食“统购统销”之后，再对棉花、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在此期间任何人不准私自购买布料。如去购买便是严重 违纪，将受到严重的纪律制裁。一周后机关非党团员干部也作了宣布，她立即来电话问我：“买布前知不知道此事？”我诚实爽快地回答：“知道。”她又问：“既然知道为什么要违犯？”我一下紧张得不知该怎么回应，电话里传来她那不可抗拒的声音：“立刻向组织交待，争取从宽处理。”我未作过多考虑，认为作为一个革 命干部应忠诚老实，不能隐瞒任何错误，便立即找到机关团委负责人主动作了坦白交待。由于我和区长李云成的矛盾关系，团支部书记又是我讨厌恶心的李德明，在 支部生活讨论处理我的会上，他竟提出要开除我团籍，后报到团市委备查，巧好原青龙乡土改工作组组长叶青分管纪律，特地来找我谈话问清此事的前因后果，最后 给予我警告处分三个月。她得知后百般安慰我，宽解我，鼓励我说：“没有风浪的爱情不是爱情，没有波折的人生不是人生。列宁说：‘教训使人变得聪明’。荣， 我会更爱你。”言毕，不停地狂吻我。

发生此事不几天，全国第一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传来毛泽东当选为国家主席的消息，坐在收音机旁的我 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即兴奋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使在座的全体机关同志跟着我狂呼欢叫起来，大家一边喊一边高兴的跳跃，真情实意没有丝毫矫 揉造作。五十年代反右前的毛泽东，在我们心中就是一轮太阳，红彤彤的太阳，救国救民的太阳！谁能想到他竟是……

五丶跳舞引出的风波

我 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心灵深处有大男子主义的思想。在“以俄为师后”我们国家学得最好的就是跳交际舞。在中共建政前成都人也跳，但跳舞的多是上层社会的有 钱人或王孙公子，舞伴也多是职业舞女，故称交际花。一九五二年“三五反”后，跳舞陡然风靡全国全市，不但各机关跳，各单位跳，上面跳，下面跳，

领导跳，一 般干部跳，普通老百姓也跳。成都文化宫（原名中山公园）、人民公园都有廉价舞场，大约花五分钱就可晚上六点跳到十二点。侭管我身为机关团委宣传委员却竭力 反对跳舞，理由是俩个男女扭到一起脸贴脸，胸擦胸像什个么样子。其实心里最不满意的是每逢星期六或星期天，上面总以组织名义把机关里一些最漂亮的女同志选 出来，专门去陪领导跳舞，陪外国专家跳舞（主要是苏联专家）。我心里有不说的反感，认为这是一种不公正的“特权”。她喜欢跳舞，是个舞迷。

初 秋的一个周末，我们相约晚上六点在青年宫看匈牙利影片《废品的报复》。我早早地骑着车从三十里外的金马乡赶到她的机关，且不说“远征”的辛苦跋涉，沿途道 路的坎坷颠簸，单那跑出的汗水也足有一大碗。三十里崎岖小道未花上三十分钟，车速之快有如闪电，恨不得立刻见着热恋中的她。我们看完电影，再挽臂街市，漫 步林荫，然后藏在花丛中谈天说笑，数天上星星，静听秋虫鸣唱，这是多么令人迷醉的想往……

谁知到了市图市馆接待我的不是她，而是她的好 友春芽。春芽见着我笑嘻嘻地把黑黑修长的眉毛一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你的‘地瓜’跳舞去了，叫我陪你。拿去，这是给你的电影票。”一盆凉水当头泼 来，我坐下把电影票揣在口袋里，闷声不响地看画报，投入脑海的却不是视象，是烦燥难以忍耐的等待。春芽窥出我内心的秘密，哈哈一笑打趣道：“怎么，难坐 吧，有我陪还不行么？”我装着无所谓的样子说：“难坐什么，有画报看，有茶喝，还有你陪着我。”春芽又是一笑，诡秘地瞟了我一眼说：“好吧，那你就乖乖坐 着，我一定当好阿姨。”我毕竟不老练，没性子耐下去，终于把画报一合，问道：“她到底到哪里去了？”“跳舞去了。”春芽静静地不动声色地笑嘻嘻回答：“跳 舞？交际处接走了。”我的心像骤然掉进了五味瓶的冰水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近于失态地再问：“和谁跳？”春芽格格笑起来，拖长嗓门道：“和谁跳？当然 是男同志——怎么啦，吃醋了？”我立起身，吸烟的手微微颤抖，血液跑得很快，像个要炸的石灰坛。不过，我忍耐着。“你的脸怎么白了，额头在出汗，生病了吧？”春芽惊叫起来。“没什么”我回身坐在桌边不再说话，一个劲地吸烟，由于吸得过于猛烈，烟味钻透支气管引起一阵剧烈的呛咳。春芽慌忙地给我换杯热茶， 又解释又安慰道：“不要误会，她不是和一般男同志跳，是交际处车子接去的，和外国专家跳。”

“和外国专家？”我的头像被什么东西重击了 一下，嗡嗡地叫。在很早前就听说，交际处常在市里请一些漂亮的女同志去和外国专家跳舞，她也曾被邀过两三次。我听说后虽然有些不舒服，但未怎样计较，因为 我们的约会并未受到妨碍。想不到现在竟然这样“侵犯”了我的利益，无名火骤然而生，笃地站起将口袋里的电影票撕成两段用纸包上，抑制痛苦的情感强作平静交 给春芽说：“我走了，她回来请你交给她。”春芽接过纸包不知内情，看了下腕上的表说：“八点五十了，你再坐一下，她很快就回来了。”我冷冷一笑道：“我还 有工作，今晚十点有个急会。”

夜色朦胧，灯光依稀，我浑身乏力，两腿发软，费了很大的力气把车蹬回乡政府。心里想些什么也说不清，恨不 得向柱头重击。进屋点上煤油灯，临窗伏案学习

起来，但哪里学得进，思绪如涛不平静极了。约莫十一点左右，听见乡政府大门被自行车撞得“冬”一声，我知道她 来了，即关上门把灯吹灭倒上床装着睡去，自行车随着脚步声来到了门前，她先是叫我名字，我不理；后又敲门，我还是不理。她急了，低低地啜泣起来：“开门 呀！有什么说清楚嘛。呜呜，呜呜……”我仍然不出声，心里感到报复的快意。她见我不搭理带着哭声走了。我于是内疚觉得似乎有点过分，跳下去准备开门追去。 但当手一触门框便缩了回来。我想她不会走肯定找“救兵”去了。果不出所料李乡长陪着她来了，我又急忙装着睡去。“小黄，小黄，开门！又不是小孩哩，还耍脾 气。”我应着点燃灯开了门，假意打呵欠：“这么夜了找我有什么事？”李乡长戳我一下鼻子，笑扯扯地说：“戏莫在我面前演了，闹意见啦是不？”说着回头向她 道：“小肖，我的‘任务’完成了，现在该你登台了。”他狡黠地一笑，掩门退了出去。

在灯光照射下见她一双红肿的眼睛，脸上的胭脂被泪水 冲出两条小沟。她卷着连衣裙，直直地对着我坐下来，因激动而鼓胀的胸脯还在剧烈起伏。屋里好一阵沉默。我闷头闷脑装着无事的样子，大口小口地抽着烟，噘着 嘴把烟圈儿吐的又长又细。她终于耐不住说话了：“你说说，为什么要把电影票撕成两半，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我慢悠悠地道：“这得 问你自己！”她极其平静，话声里充满委屈地说：“问我自己？我有什么好问的，今晚就是去交际处跳了下舞。”我把烟头一扔，“呼”地站起来余怒未息近说： “我是中国人，有中国的生活习惯，对来自西洋的那一套东西不喜欢！告诉你，要么你就和外国人跳舞去，要么我们就好下来”

她听着又哭起 来，而且越哭越伤心，我怕惊扰其他同志，便和她走出乡政府，跨上石桥倚着栏杆“谈判”。谈判的结果：她不再去交际处跳舞，我必须戒烟。我问为什么，她红脸 羞怯地白我一眼：“吃烟，把一个嘴巴吃的‘喷臭’，怪难闻。”我放声笑起来，爽朗地大声说：“好，上有青天，下有流水，我从今以后不再吸烟……”，她岔断 我的话问：“如果再吸呢？”。我调皮地把肩一耸：“除非你不爱我。”

“去你的！”她捅我一拳，随即倒在我的怀中。

平 原的秋夜清风徐徐，湛蓝的天上缀着稀疏的星斗，一弯上弦月沉浸在波光粼粼的江流里，睡鸟藏在飘飞的嫩柳丛里欢快地打着鸣儿。青蒙蒙的水田浮着葱茏的麦苗， 蛙鼓敲打着宁静的田野，为激越沸腾的时代唱着颂歌！啊，岁月是这样的美好！生活是这样的甜蜜！我们紧紧地偎搂着、偎搂着，忘记黎明的晨曦已悄悄地来到我们 身边……

我没有“食誓”，她也没有“毁言”，一个不吸烟，一个不跳舞，可是并未保守住这段纯真的爱情。因为，在一个充塞政治的社会里，一切取舍都是为了“需要”。为了“需要”，她后来还是舍弃了我，不过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也没有再吸烟，不是遵守誓言，而是为了健康长寿。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二十二）

第九章，在市人委机关的日子

我从一个基层政权机构进入一个副省级的政权机构，无疑拓宽了视 野，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东西。不过任何一级政权都是共产党的的机器，都是毛泽东的意志化身，没有独立的思想，一切都是唯命是从，心目中根本没有人民。所谓 的“为人民服务”，只不过是保住官位的代名词，所以我们的国家是毛泽东一人的国家。

一，调离区政府

为 粮食统购统销的事情，我和区长李运行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他没有办法整治我，我除向市委反映外也没有其他办法来捣腾他。在这期间他也想找我谈谈改善关系， 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陈崇阳几次来劝我说：“老黄，李区长再不对，总是你顶头上司，‘县官不如现管’啊！我还是那句话，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 梦觉是个饱读诗书、满腹经伦、知今通古的人，接过话头鞭辟入里地分析说：“黄牛，我佩服你敢闯敢冲的性格，依我看无论新旧社会，当爸的谁不喜欢听话的孩 子。领导，是革命的长官；组织，是我们衣食父母。士兵怎么能去反对长官？儿子怎么能去反对父母？中国是个小生产的国家，几千年来都是封建专制的社会，这个 国家的特点：老百姓对官长，儿女对父母，妻子对丈夫，幼辈对长辈，必须恭恭敬敬地服从。澎湃同志说得好：顺从是中华美德，反抗是神州罪恶。古语云‘直如 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他们的话十分有道理，但我是个喜欢坚持已见，好钻牛角尖的人，而且一钻进去就很难退得出来。我放下手 中的书，想了想很平静地说：“你们的意见都不错，但我总想不通，我和李区长之间的矛盾总有个谁是谁非的问题，他不关心干部疾苦，我向机关黑板报写稿错了 吗？他不顾实际情况把农民口粮统购去，我向上级反映情况又错了吗？真理只有一个：要么他对，要么我错。他错了就道歉，我对了就坚持。我不会用革命的原则去 作交易，宁肯不入党不提干。”他们两人知道说服不了我，只好一笑，转个话题讨论其他事情去了。

新来的区委崔书记也几次找我谈话，希望能 够化解我和李区长之间的矛盾，可我却坚持自已观点：“他太主观，不承担责任，明明是他压下的任务，却说别人是强迫命令。”崔书记笑着道：“小黄呀，他是领 导，领导总得有威信呀！这事又没有处分你，你为什么老钻牛角尖？”我不依不饶说：“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做工作要认真负责，处理问题要实事求是，李区长为 什么不实事求是。”崔书记只好苦笑不停地摇着头。不久全市编制调整龙潭区与金牛区合并，不知何种原因我上调到市人委办公厅秘书处作秘书，掌管人委大印。

成 都市建制沿用中国传统叫政府，后来毛泽东强调“以俄为师”和“一边倒”的政策，于是去政府为“委员会”，但首脑人物仍称市长，机关还是叫政府，只是挂在 “小天安门”（老成都政府在皇城里面办公，皇城与北京天安门一样，有高高的城墙，有威严森森的门洞，故有此称）门洞前的大木牌是“成都市人民

委员会”。当 时成都市市长叫李宗林，常务副市长叫米建书，另外还有两个“摆设”副市长（指民主人士没有实权，我们私下如此称呼），一叫李劼人、一叫黄渔门，他们两人都 是非党人士，一个是文化界名流，一个是裕华纱厂老板。



成都的老皇城

明远楼

人民委员会座落在市中心的老皇城内（俗称皇城坝）。是当年蜀汉刘备的都城，有点类似北京的故宫。它的四周是高大的城墙，虽然不少地方已经坍垮和拆 除，但正南方向仍有三座巍峨坚实的拱门，拱门外约五百米处有条环绕城墙的小溪叫御河，河上有三座拱梁石桥，叫三洞桥，其形状格调近似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故成都皇城又有小天安门之称。穿过拱门直行登高，有两幢宽敞的木质结构的大殿，一叫明远楼，一叫忠义楼。忠义楼废弃未用，明远搂是当时市上召开干部大会唯一 的会址。在明远楼的左下侧，有五排一通的老式平房，这些老式平房的特点是屋高、墙厚、中空、隔音、窗棂结实、冬暖夏凉，不失为机关办公的最好地方。可惜的 是后来逐步逐步拆除改建，早已没有古式建筑的影子，“文革”时

为大树特权“毛主席的权威”，又建成了毛泽东思想万岁展览馆，不伦不类，真可惜啊！

这 五排老式平房办公厅占去两排，一排市长办公室和会议厅，第二排工作人员办公区。办公厅下设两头处：，一叫行政处、一叫秘书处。秘书处主任叫傅杰，是个女强 人；行政处主任叫高兴德，当兵出身的武棒棒。那时共产党讲节约讲勤俭，机构垂直，人员精干，从勤杂到干部不足百人（现在有两千多人）。除李宗林、米建书有 专用汽车外，局长、处长、主任一级的均是自行车。机关干部吃饭分小灶。中灶、大灶，穿衣服分灰制服、。粗呢制服、细呢制服。凡是吃小灶和穿细呢制服的称高 干，行政级别在十三级以上；吃中灶和穿粗呢制服的是县团级，行政级别十四级以上；十七级以下称为一般干部，穿灰布制服和吃大灶。我是二十一级干部属主办科 员，正处于上升阶段。

秘书处下设市长办公室、秘书室、保卫室、文印室，我在秘书室。我们这个室有五个人，都在一间大办公室办公，互不通 气，各干各的事。我的工作就是盖市府大印和卡市府钢印。我只认主任签字盖章，工作轻松极了。有时一周不开张，多半时间在自学看书。上午下午都做工间操，干 部大食堂设在烟袋巷口的一个大院子里，各人用菜饭票买，住宿在市府机关大宿舍。宿舍共有五幢，一幢司局级领导干部住，均是大小不等的单独院落，一幢局处级 干部住的地方，为单房或双房，均无卫生洗浴间，另三幢是单人宿舍，每舍四人，厕所、洗浴均为公用。每天早晨七点起床洗刷完毕即到门外大街上列队做广操，一 派生龙活虎的气象。

那时大家心态平衡，职务无论大小，不觉得有什么不公。个个朝气勃勃，单纯热情朴实，相互无利害冲突，更无检举揭发一说。人人象姊妹，个个象弟兄，十分团结亲善，和睦无隙相处。
我 们秘书处每到周末常有个特殊任务，为首长（也就是高干）举办小型舞会，将各局各委中最漂亮的姑娘通知来和领导跳舞。常来跳舞的有贺龙、李井泉、米建书、郭 实夫、叶石等大干部。舞会是保密的，不准外人进去，我的任务是把门，因此和保卫室的王承锐交好。他是西藏转业回来的军官，长得很帅气，喜欢打球，两人常在 一起聊天。他送过我一柄西藏带回的印度牙刷，我还送一册日记本，并在首页上写了四句打油诗：“不信鬼来不信神，千锤百炼钢火纯。大师笔雄出砥砺，巧匠工精 在奋勤。土肥苗壮花自艳，水丰籽满果压林。若问人生成功路？刻苦求知创光明。”想不到这首五十六个字的打油诗，两年后竟然连累他成了右派，开除公职送回老 家监督劳动，致使新婚不久的妻子离异，毁了一生啊！。

闲时，主任也找我聊天，除了向我讲叙革命道理外，便是鼓励我进步，多为革命作贡 献。而我总是请缨，希望领导上多给我点工作，一天太轻松了有点对不起党和毛主席。她听后总是笑笑说：“小黄呀！你太年轻了，这是个很重要的位置，不是你出 身和政治条件好的原因，根本是不可能坐到这里的，好好锻炼几年，待你成熟后，提拔起来作点什么？”

我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老缠着领导要工作，对坐着拿钱的差事还不安心，你说该不该当右派？。

二，两次特殊任务

在 中国人民的记忆里，在 1971 年“9。13”林彪事件前，全国各大城市每逢“五一”和“十一”，都要举办盛大的游行活动，一是显示人民的团结，二是表达群众对党的热爱。此风沿于“老大哥”苏联，凡是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如此。每逢这一天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和各企事业单位的干部，以及厂矿团体的工人、农民，都要穿戴整齐，打扮得漂漂亮亮，手执红旗，肩扛领袖肖像，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大呼口号，高叫万岁，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地方便是接受省市委书 记的检阅。对统治者是权力的享受，对老百是劳役的付出。同时也是身份的检验，因为地、富、反、坏、右和无产阶级专政视为“贱民”的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的。 当然成都也不例外，每次我都是参加者，也曾想过：要是有一天我也能站在城楼上该多棒！机会终于来了。

1954 年的“五一”劳动节与往年 的劳动节不一样，因为这次游行检阅的不只有省市委领导，还有西藏头人达赖喇嘛参加。在此之前，领导上就作了精细的布置，他们说：达赖是西藏最大头人，要去 北京晋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四川成都是他第一站。我们一定要做好保卫工作，不能出任何问题，这事关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和稳定西藏大局的大事。其真实目的是让达 赖看看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力量和人民群众怎样拥护热爱共产党。传说达赖十分夜郎自大，认为西藏很不得了，有枪有炮有藏军，出藏时坐汽车要坐车头，说从来没 有人和他平起平坐，怎能和司机坐在一起？通司向他解释半天，后来虽不坐车头了却封了司机为四品官，这样才同意坐上汽车。此传说是真是假不得而知，反正他来 到了成都。

为了做好达赖的接待保卫工作，办公厅专们成立了一个五人接待保卫小组，我作为工作员名列其中。这个组主要负责达赖当天在城楼 上检阅的安全，包括送茶水、毛巾等服务事宜。那天游行有 30 多万人，把巨大宽阔的人民南路挤得水泄不通，站在检阅城楼往下看去，全是黑压压的人头和五彩翻 飞的旗帜，无边无际蔚为壮观，歌声鼎沸十分感人，真是波澜壮阔好一派景色，无怪当官的喜欢如此。你想几十万人打从面前经过，又是欢呼又是喊口号，还有什么 比这荣耀！？此时我才终于明白，为什么每年都要举办两次大游行，目的是为了满足权力的欲望。

在游行前半小时，达赖和他的家人以及经师、 随从，分乘五辆小车来到城楼下，早守候在那里的市长李宗林、副市长米建书，即恭身上前拉开车门，毕恭毕敬等候达赖下车。达赖昂着头直着身走出轿车，既不与 两位市长寒喧，也不向四周迎接他的人挥手，目不斜视，若无旁人，气宇轩昂，迈着大步，挺胸前行。他那时还不足 18 岁，清清瘦瘦，高挑个儿，头戴金丝编织的 盆帽，身着玄黄长袍，在那白净的脸颊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长长的袈裟拖在地上，由他姐姐牵在手中，一大群随从紧跟身后。李宗林、米建书两位市长紧跟左右， 态度极为谦卑恭顺，一脸是笑殷勤至极，弯着身躯陪同达赖活佛一步一步，拾级登阶城楼。我心里在想：“共产党真伟大，为了国家的利益，西藏的和平，对他竟如 此礼遇。”

达赖踩着红地毯，上得城楼，高高地坐在一张黄梨木椅子上，极其骄傲地向四周

环顾一眼，然后凝目端庄，像尊菩萨一动不动地定在那里。我们送去茶水，他仅仅礼貌性地含首示谢，并不取用。后来才知道，他从不轻易地服用民间食品。

三 声礼炮后游行开始，两位市长恭请达赖移步城楼检阅。他在经师、家人的搀扶下来到城垛，细细地观看了半个多小时后才退身回去，依然坐在那张黄梨木椅上，黙默 无语仰视天穹，一副尊贵气度。我们一直屏立在左右伺候，距活佛不足两公尺，却不敢上前求他赐福。因为我们都是共产主义的信徒，彻彻底底的无神论者，从不相 信鬼神与因果，只是在完成一项工作任务。不过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却没有征服这位宗教领袖独立的人格，四年后他率众去了印度，此后一直在国外流亡。我遗憾当时 为什么没有上前向他致意，错过了人生中最难得的机遇。

另一次是这年 10 月吧？准确日子记不清了，日内瓦会议结束，周恩来总理取道昆明回 北京，路经成都住在金牛坝招待所休息，这个消息大家是不知道的。大概是星期五上午 10 点，廖家岷秘书长召集政法系统党团员开紧急会，说："今上午提前一小 时下班，下午去人民公园游园，男女同志都要穿上最好最漂亮的衣服，如果能化桩那更好。"大家听后，一阵欢呼雀跃。待人们情绪平静后廖家岷秘书长又说："同 志们，今天游园可有个政治任务，保卫中央首长安全，我们政法系统负责的地段是从十二桥到保路纪念碑，在这一地段里，凡有不认识的人就要卡起来。"

回 到宿舍后，大家急急忙忙的换衣服，王承锐和我暗地猜测，他压低声音问我："老黄你估计今天是哪个中央首长？"我擦亮皮鞋神秘一笑，反问道："你说哩，是哪 个中央首长？"他结上领带对着镜子照了照想了会儿，摇摇头说："我要知道，还问你么。"我们走下楼梯，我想了想说："不是一号，也是二号，最起码也是三号 首长……"共产党等级制度十分严格，无论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凡出现于公共场所或报刊杂志，都按职务排定的顺序，五十年代中央是毛、刘、周、朱、陈，地方是第 一书记、第二书记或书记。顺序的变动意味着权力职务的变动，所以决不能错号的。

"何以见得呢？"我们沿着人民南路一边走一边说，大街上人来人往很是热闹，深秋的阳光穿过梧桐树，把柔和的光点洒在行人脸上，使你沉浸在生活的样和中。最后来到集合的指定地点。
"贺 老总我们是常见的，陈毅副总理也来过成都，都没有组织专人游园保卫。现在组织专人游园保卫，不是毛主席，就是刘委员长，或是周总理、朱总司令。"到了目的 地，我们两人按分配的地点守住岗位，我巡视四周继续说完自已没有说完的话。王承瑞点点头表示同意道："你分析得比较正确，难怪同志们夸你是科学脑袋。那我 再问你，这一二三四号首长中，今天来的又是那一位首长？"

"那位？——"我揣摸着："说不一定是毛主席哩！"

"毛主席！"他高得跳起来叫一声，引得行人注目，我即忙提醒道："你怎么啦？这是公共地方啊！"他看看左右，把声音压得极低说："今天要是毛主席真来游园，我一定要上前去和他老人家握手，跳起来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 怎么行，不能违犯纪律啊！廖秘书长不是说，我们的任务是政治保卫，如果都跑上前去和毛主席握手，几千几万的同志能握得完么？那会把毛主席的手都握肿，要是 真的有坏人，他们就会借机捣乱。”我这样说，心里何曾不是这样想：要真能握上毛主席的手，我这辈子死了也不会忘记……

从翻身那天起，我 就对毛主席怀着巨大的情感，正如领导同志讲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我们一切成就的 取得都要归功于毛主席，人民的幸福来源于毛主席。那时毛主席在我们心目中是何等崇高伟大啊！但愿今天能见到毛主席。不过我清楚知道，今天不可能是毛主席来 游园，我这样说仅是一种希望而已。

人民公园位于市中心，过去叫少城公园，在它腹心地带有座高大的石碑，是为了纪念在 50 多年前，四川同 盟会发起反对清政府把民间集资准备动工修建的成渝铁路收归国有的事件中牺牲的仁人志士而修建的。石碑上有“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十个大字，成都人都叫” 保路纪念碑”。此时正是初秋季节，绿柳红花争奇斗艳，莺飞燕舞百鸟欢鸣，我们两人横坐在小河的石栏杆上，望着近处的鸟园。“你最喜欢那种鸟？”我问。他想 也不想地道：“鹦哥，你呢？”我摇摇头道：“鹦哥有什么喜欢的，鸟语人言，没有自己的风格，事事学舌，我倒喜欢百灵，它叫得脆，叫得响，叫得好，声音动人 极了。还有就是杜宇……”“杜宇叫得怪可怜的，”他岔断道：“听说这个鸟直叫得嘴巴流血，才飞走是不？”

“是这样，文天祥有首诗就写 道：‘从今别却江南路，化着啼鹃带血归。’杜鹃又叫‘杜宇’、‘子规’，这鸟遭遇最苦了。”我叹口气说：“它原本是个皇帝，后因宠听爱妃之言，弄得国破家 亡，饿死在逃难路上。为怀念它的臣民，便化为一只鸟飞回来，叫着‘我太对不起，我太对不起……”他笑着道：“历代的统治者都是压迫人民的，那会说对不起， 这些全是你们写书人编造的。”正说着，公园门前传来轿车的喇叭声，同志们不约而同地叫起来：“来啦！”大家的视线迎着下车的人，不一会儿桥头出现了矮小微 胖的李井泉政委，精瘦高长的郭沫若副委员长，在他们中间走着一个精神奕奕，笑容可掬，左手半握曲肘与胸线呈平行的人。他步履矫健，一边和李政委、郭沫若说 着话，一边审视着园林秋色，我一下认出来，不由得高兴地叫出声：“周总理！”

“周总理！”一片欢呼声此起彼伏，在花间树丛中荡去荡来，在溪波流水里滚去滚来，顿时四周响起一片掌声。当他从我们身旁经过时，我们秩序井然，只热烈鼓着掌道：“迎欢周总理！向总理问好！”

周 恩来频频点头，笑着挥手致意道：“同志们好！”周在人们心目中是个风流倜傥，忠于爱情的明星形象，享有很高的威信。随着岁月的迁变，时间的飞逝，以及不少 资料显示，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是毛泽东暴政的帮凶。无论“反右”或是“文革”都做了不少坏事，为了讨好江青，他亲笔签批了逮捕干女儿孙维世的逮 捕令，在私人生活上也不干净，很早就有外遇。那本《叫父亲太沉重》的作者蓓蓓，据说就是他的亲生女儿。总之他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做了不少对不起中国 人民的事情。

一直待总理一行离开公园后，政法党委才发出自由活动的命令。当天我们看见了周总理，可有的人连影儿也不见，纵是见着也远远 地不能朝前一步。在回归的路上我问王承瑞：“你说，今天周总理知不知道这么多游园的人，全是国家机关干部？”王承瑞道：“当然不知道。我在办公厅快两年 了，只要首长一出去，四周围全是便衣保卫，如要问什么事，找什么人，事前都有安排，不是你想接近就能接近的。”原来是这样，由此可想而知，共产党无论做任 何事情都善于作假，纵是对他们自已的领导也如此。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二十三）

三，资本家敢不公私合营

中共在 1953 年所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提出：为了要把我国 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要在最短时期内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即通过公私合营的道路，把私营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轨道——即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允许资本家在赢利中提取一定股息，其他则作为企业的再生产和工人的工资与福利事业。这项工作在 1952 年后就开始着手，如裕华、中新、宝元通等，国家就派出干部到这些单位去作公方代表。先前还支付定息，反右斗争后就再也不支付了，私营企业全成了国家财产，等于一切没收充公。

对私营工商企业的改造工作，远在 1954 年前就在上海开始试点，在取得经验后向全国推开。按照中央布置，1955 年是对私改造的高潮年重点 年。为了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四川省委成立了对私改造办公室，在成渝两市试点。由于我不习惯办公厅清闲的工作，多次向领导要求，不知是领导出于厌烦还是相 信，1955 年 2 月，调我进入中共四川省委对私改造学习训练班学习。这个训练班有两百多人，清一色的党团员，以专市区为单位编成学习小组，由省委统战部直 接领导。在学习中，省委统战部程子华部长多次来训练班讲课，讨论多是中央文件，其中主要是陈毅同志的讲话和周总理的指示，档都印有“绝密”二字。学习结束 后，

我被分配到成都市工业局对私改造办公室，负责砖瓦行业的对私改造工作。

成都市有上百家砖瓦制造业，均在近郊，集中点在东边的三瓦窑 一带。这是个传统的手工业，带有封建把头性质，利润虽然丰厚但劳动强度大，一个窑主雇有几名或几十名工人，老板有时也参与劳动。经过几代人的辛苦，好不容 易盘攒下这份家业，现在叫他们交出来，不等于要命么！工作开展起来确有困难。但我们这些共产党培养出来的运动干部，哪有做不到的事，有的是办法。我们首先 发动工人，大讲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然后再通过具体事证，揭露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血腥事实。在工人群众发动起来后，立即组织力量清理老板（资本家）的 财产。对资本家则是大讲公私合营的好处，国家发展形势，以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道理。动员他们放下财产包袱，轻装前进，通过赎买和领取利息的办法逐步变 成工人阶级一分子。但老板们仍“爱钱重产”安然不动，谁也不愿把财产白白交给共产党。怎么办？于是我们便采取贯用的杀一儆百的手段，找出一个坚不走公私合 营道路的老板，作为打击斗争的对象。

共产党拥有权力，找一个人的岔还不容易。老板们都来自旧社会，谁个屁股上没有“把把”（大便的意 思），只要花丁点时间就会找出一大把问题。有个唐姓老板（名字记不清了），几代人都做砖瓦，有十分过硬的烧窑技术，是一把汗一把血苦挣出来的“资本家”， 自然爱钱如命，加之对工匠和学徒要求严格，在产品上又讲求品质，不合乎规格的砖瓦宁可毁碎也不出厂。我们主要抓住他在中共建政前当过袍哥与一个工匠女人不 清不白的关系，把他定为封建把头，罪恶是殴打工人，强霸别人妻子，以及其他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无限地上纲上线。经过几次的批判斗争，他不仅不认错不认 罪，还是不愿意公私合营。我们只好发动和支使工人写检举材料，然后通过公安局将其逮捕。

在公捕那天，由工作组出面召开全行业的大会，先 由参会的工人揭发他的“历史罪恶”和“破坏抗拒公私合营的反动言论”，然后由公安机关当众执行逮捕，雪亮亮的手铐，冷冰冰的铁环，谁个不怕？这一招真灵， 起到了杀鸡给猴看的作用，会后老板们纷纷表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告别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于是自动写出申请，要求公私合营。我们却不急，还要对申请逐 户审查，看是否合乎条件？这种作秀的手段，应了杜甫一句古诗“盘马挽弓故不发”。待我们所谓的审查后，再将这些申请材料交给工人评议。经过多次来回折腾， 才十分慎重地批准几家。这些被批准“公私合营”的企业业主，胸前载上大红花，厂门上的招牌也挂上红绸，还燃放鞭炮，敲锣打鼓以示庆祝，光荣得不得了。

“一 石激起千层浪”。资本家全被热浪狂飙煽动起来，纷纷拿着申请排着长队，向工作组要求走“社会主义光明大道路”。到了 1955 年 5 月，不仅砖瓦业的业主要求 公私合营，成都市各行各业的大小老板，纵是街头巷口卖汤元。、烧腊以及卖葱葱蒜苗的小商小贩，也插上了小红纸旗，宣布自已已经公私合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 路。只听满城锣鼓叮咚，遍街人声鼎沸，大家喜笑颜开，人人庆祝社会主义取得伟大的胜利！街道办事处向区政府报喜，区向市报喜，市向省报喜，省向中央报喜。 1956 年 1 月，北京市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有 20 万人参加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报纸上也竭力宣扬中国已经“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公 私合营”的实质，是实现毛泽东对社会生产资料剥夺和占有，也是一场对私营工商企业资产彻底的剥夺与抢劫，体现了中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霸道与威力。我 是这次集团性的抢窃犯，五十年后的今天特地向那些失去财产的老板们说一声“对不起！”今天的中国又有了不少资本家和有钱人，是否再被共产党暴力抢劫就赖于 法律的保护了！但愿共和国的宪法上早日写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四，一首小诗引出的麻烦

1955 年在我们人民共和国土地上庆祝“三化三改”胜利的同时，另一件不幸的悲剧发生了，这就是毛泽东一手制造和发起的、震惊中外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以及 由此在全国开展的“肃反运动”。我这个不足二十岁的小青年，为一首小诗也牵连其中。为了说明这个冤案始末，须先作一个背景介绍。

胡风本 名张光年，著名的诗人、作家与文艺评论家，早年参加革命，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坚强的支持人与盟友。他一直从事进步的 文艺创作活动，写过不少十分激进的作品，鲁迅先生十分赏识他，说他是有正气的知识份子。中共建政前他主编的《泥土》、《七月》等刊物，为共产党培养了不少 作家和诗人，同时也写过不少讴歌革命的诗。那首讴歌新中国诞生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诵，脍炙人口，曾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四九年后他是 全国文联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国际国内享有盛誉。但他是个狷狂之士，“性格鲠直，易于招怨”（鲁迅语）。不懂得迎奉与献媚，不 屑于明哲保身的哲学。他在创作上不仅拥有实力，而有一帮志同道合趣味相投的朋友，这却犯了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大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讲政治，只讲斗争， 不允许任何人有真心和共事的朋友，谁要有谁就是小圈子或小集团。

自 1942 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中国文学创 作便失去鲜活力，广大文艺工作者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歌功颂德的吹鼓手，文艺作品变得千篇一律，再没有人性与个性的色彩，全是公式化、概念化为政服务政治 运动的宣传品。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与创作，胡风先生于 1955 年 2 月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毛泽东主席写了三十万言的上书。于是惹怒了毛泽东，开启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逐步逐步从“文艺思想”上升到“政治领域”，其后到搜查私人信件，并由毛泽东亲自加批加注公布于《人民日报》上，在 5 月 13 日 毛泽东定性胡风为“反党集团”，接着胡风好友舒芜先生迫于政治压力，“主动交出”四九年前后与胡风先生的几十封通信的信件，于是毛泽东再以《人民日报》编 者按的名义，将这些信件斩头去尾的摘录公布，并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 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全国立即掀起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

5 月 18 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等人以 “现行反革命罪”先后被捕入狱。接着《人民日报》又将胡风同一些人的来往信件分类摘录，以“胡风反革命

集团"的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予以公布。之后，这三批 材料又汇编成书，在国内外广为发行，置胡风先生于死地。不难看出一国之君毛泽东，为了扼杀不同观点与见解的知识份子，竟然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加害一个有良 心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胡风反革命集团"宽案遍及全国，使 2100 多位无辜的知识份子受到株连，其中 92 人被捕，62 人被隔离审查，73 人被停职反省。胡 风一案完全是歪曲原意，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行政干预，直至逮捕入狱，给中国共产党执政春秋写下可耻的一页。

胡风被监禁了 10 年之 后，1965 年 11 月 26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 14 年。10 年已经过去，还有 4 年监外执行。12 月底，胡风走出秦城监狱，全家团聚过了一 个春节。春节过后，胡风夫妇被通知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去。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1967 年 11 月，胡风被四川省公安厅押至成都，再度入狱。1970 年 1 月，以胡风"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 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他被戴上手铐，押至地处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服刑。

粉碎"四人帮"后，1978 年，胡风被释 放出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 年 9 月，中共中央做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胡风在平反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 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1985 年 6 月 8 日，这位中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 家，因病逝世，终年 83 岁。他在最后五年中，"给我们写了几十万字，这里没有一点个人恩怨，有的只是一篇历史的证言。一场悲剧落幕了，这不是个人的，而是 时代的历史的悲剧。

在声讨胡风运动的高潮中，我们们这些不明白真相的青年一代，认为报上所说的都是事实，一个个义愤填膺，人人摩拳擦 掌，认为胡风很坏很反动，胆敢咒骂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革命事业，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狼子野心何其毒也，多么的可恶可恨啊！记得在四川省文联组织召开 的省市文艺界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大会"上，我还争着上台发言，以表示自已立场坚定和对党的热爱。

大约三个月后，在毛泽东亲自指示和领 导下。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上海最先揪出了隐藏在党内达三十年之久的"反革命份子"、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公安局局长杨帆。又在三十年后才知道，潘汉 年和杨帆均是共产党的老特工，在抗日战争时期由毛泽东亲自指派去和大汉奸汪精卫联系，商量如何联日倒蒋，现在为了灭口才将他们逮捕下狱迫害致死。历史啊总 是被权力不断歪曲不断改写，作为一个中国人常常不了解真像，太可悲了。

为了保证"肃反运动"的顺利开展，所有国家机关一律停止办公，集 中吃、住、行包括在一起的学习。我们对私改造工作队也不例外，全部人员归入工业局党办统管。由于我出身和政治条件好，历史清白年龄又小的原因，当然是审干 小组一员，最受领导信用和依靠的对像。"肃反"主要清查三种人：一、历史比较复杂的人（以留用人员为主要对象）；二、平时喜欢说二话，对党对领导有情绪不 满的人；三、喜欢写写画画与文艺机关有联系的人。方法是：在学习小组会

上，人人检查交待，从 8 岁谈到参加工作，然后大家帮助分析提出怀疑点。其实这是一个 走过场的形式，在这之前党委就根据个人挡案与所掌握的情况早有了重点。

我是运动冲锋陷阵的打手，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领导说谁有问题 我就去揪谁，因此在小范围内研究审查物件都有我参加。经过多次研究，最后确定重点审查两人：一个是办公室主任詹大丰，他是华西大学学生，四九年以前就参加 地下党，多次发动反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示威游行，曾被捕出狱，领导上怀疑他有变节行为，便作为“老虎”交积极分子看管起来。他的夫人叫贺惠君，也是地 下党的，四九年后曾任省团委学生部部长，我们叫她贺大姐。他十分乐意接受“审查”，成日蜷缩在办公室里不言不语，态度好极了。虽然“肃反”这一关闯了过 去，1957 年“反右”夫妻双双却成了右派，“十年文革”贺大姐经受不住批斗竟然服毒自杀，听说詹大丰至今还一人生活。

第二个叫蕴英， 他是《四川日报》的通讯员，经常向报社写消息通讯，笔头硬，工作上很有能力，生性傲慢，对领导不恭，常说一些“二话”（即不满言论）。当时，竭力主张揪他 的是秘书室秘书刘善成，一个小白脸，参加工作不久，处处想表现的人。他是高中生，能说会写，善于察言观色，看领导表情行事。他和蕴英同个寝室，平时两人关 系较好，无话不谈。可是在“肃反运动”中，他最早站出来划清界线揭发检举了蕴英的“反动”言行，并把这些言行和胡风的“反革命言行”联系起来，加之蕴英态 度不好，很快走上了全局的批判斗争大会。我对蕴英是不了解的，可是我根据大家揭发出来的言行，和某些读书读报时所说过的话，我也认为他可能是一个暗藏在革 命阵营里的“反革命分子”。在全局几次揭发批判的大会上，我与刘善成都引经据典率先发言，很受领导的重视。但谁也没有想到在揭发批判蕴英后的第三天，我却 变成了重点审查的对象，并作为“老虎”交由专人看管起来。

白云变苍狗，万事随转烛。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引发和暴露 全是文字，1955 年 7 月的一天夜晚，全市各机关根据中共成都市委的指示：进行了一次所谓的突击“保密大检查”，所有人的箱柜、被卷、衣服、办公桌都搜查 过遍。当然搜查的重点也是文字，除了来往的书信外还有私人日记。在搜查我时发现了两个材料，一是中共中央关于对私改造的 14 号档。此档是我在省委“对私改 造训练班”学习时领发的，按规定应在离开时归还，可我大意走的时候忘了，一直放在皮箱中；另一个是老朋友梦觉为支持我的文艺创作，将成都市郊区委每月编写 的“工作简报”寄一份给我，要我看后归还，巧好新寄来的《成都市郊地主、富农破坏活动的情况》我还放着未归还，便有了盗窃“国家机密”的嫌疑。不过最说不 清楚的是写在日记本上那首打油诗：“菊花开放雀鸟鸣，年少心灵志向高。有朝一日风云起，平步飞上九霄云”。

刘善成为了显示他的才能，又 将我日记所记的一些日记，学着《人民日报》摘取胡风书信来往的办法，加上他的注释予以公布。这下问题大了，纵有九张嘴巴也说不清楚。在学习小组会上，大家 要我谈清几个问题。一、为什么要保存这两个档？二、日记上为什么要写这首变天幻想的诗？三、写文章的别名为什么叫晓枫，与胡风的“风”有何关系？四、发表 在刊物上的文章是否有人代笔？

在重点审查我之前，党委先进行过一场辩论。在辩论中刘善成的意见却占了上风。他振振有词地说：“黄泽荣年 龄虽然只有 18 岁，在历史上还暂时找不出问题，可是这几件事却令人想不通，无法去解释：一，他为什么要私藏中央绝密档？二，他日记上为什么写下变天幻想的 诗？三，他为什么把别名取叫晓枫？是否和胡风的‘风’字有联系？四，根据他的文化程度，不可能写出那些小说，是否有人在背后代笔？五，为什么在斗争蕴英中 表现得那样积极？由此推论：我可能有重大政治问题。”

机关肃反的目的，是清查暗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可是毛泽东在做任何事情都先定 调子，比如“镇反”城市要杀千分之零点五，农村要杀千分之一，机关“肃反”百分之九十五是好人，百分之五是怀疑对象。为了印证“伟大领袖”的“英明”论 断，各单位就得按图索骥完成此任务“指标”。在领导者的思想中，认为本单位一定有潜伏下来的“反革命”。而一些为了讨好领导以求得攀升的人，便有意无意地 陷害同志出卖朋友，以此表现自己工作能力和极积靠近组织，刘善成就是这样的人。他告密出卖了蕴英，现在又揪出了我，怎么不算立功表现呢？在政治斗争中人们 不怕认真，怕就怕卑劣的个人私恩以正确的态度出现，即披着红色的袈裟干着个人发财的生意。应该说这种卑劣的行径在“肃反”中就已经大大地凸现出来了，可是 却没有引起任何一级领导的重视，相反，还把这些人当成革命的珍宝，甚至把他们提拔到重要的领导岗位，导致以后接连不断的悲剧发生。应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历 史教训，可是共产党没有吸取这个教训，还逐步加以发展扩大，以至才有后来 1957 年的“整风反右”，1959 年的“反右倾”，以及 1966 年——1976 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一切全因毛泽东好整人好恶斗，不断搞伤天害理的“阶级斗争”，给中华民族带来如此重大的灾难。可痛也夫，可耻也夫！

在 这场斗争中，事先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共产党要审查我，我有什么值得审查呢？可是，“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刘善成以微笑的脸孔，得胜者的姿 态，在工业局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我有政治问题时，我气得跳了起来，怒目拍桌而起，大声问道：“我有什么政治问题？中共建政前我十二岁当资本家童工，受尽压 迫剥削，中共建政后 15 岁追党参加革命，我历史不仅清楚，而且清白，一家三代没有人当过保甲长……”

事情竟这样微妙，他们不去查证我的 历史问题，却一直纠缠那关键的“四点”，我暴燥，我狂吼，可有什么办法呢？一群恶狗咬着你，你又是赤手空拳，又无打狗伎俩，只能蹲着身子左右防范保着安 全。在这些时候我痛苦极了，我恨刘善成不顾实际，飞扬跋扈，把一个简单问题弄得这样复杂，促使矛盾激化，另方面感到人格和尊严受了莫大的污辱，来去行动受 人监视。在情感波动的情况下，我做了两种打算：一是打胡乱说地谈些莫须有的东西，让他们查去；二是用自杀来表明清白。但反一想觉得不妥当，乱说不仅给组织 增加麻烦，也给自己带来不利，使问题更复杂化；自杀，是叛变革命自绝于人民，我没有问题为什么要去自杀？可是刘善成并不放松我，步步紧逼，似乎搞不出我的 政治问题决不甘休。牯牛怎能下犊，硬逼所得的结果又是什么？

在我们“革命阵营”里，当一个人受着不公平的待遇或处于被怀疑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敢于站出来为你辩诬和鸣不平，或伸来同情的手拉拉你，而送来的只是无情斗争和众叛亲离的划清界线。原因在哪里？运动是毛主席发动的，各级党委领导 的，难道能和组织唱对台戏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何曾对被斗争批判的物件有过同情？前几天在揭发批判蕴英的会上，我不是那么慷慨激昂没有任何犹豫任何同情 么，现在却希望别人来理解和信赖我，这是否不太公正？完啦，一切都完啦，组织不相信，同志看不起，还有什么前途？一个星期天，我拉把椅子，坐在一株楠木树 下冥思苦想，取出笔悄悄地写着自杀绝命书，我希望有同志来发现，借此向组织陈述冤屈，可是一个人也不来，我写了几页看一遍，苦笑一下便撕个粉碎。快到开饭 时候，机械设计科的王工程师，走来和我聊天。他是个留用人员，在机关里从不树敌，成天客客气气笑嘻嘻，在这之前我对这类人既无好感也无恶感，认为他们不是 革命者，是靠拿工资养家活口的雇用人员，对革命没有热情，哪象我们有崇高的理想有上进心，此时他端来张木椅，在我对面坐下说：“小黄，你怎么啦，这几天瘦 得象猴儿了，有什么想不通的？年轻人呀要乐观愉快。”

我道：“我有什么问题，审查了半个多月还没有作结论。”

“就为 这不吃不喝？”他哈哈一笑说：“这算什么，三反运动时把我打成大贪污犯，批呀斗呀几十次，说我贪污了好多好多亿。各人的事自己最清楚，我是搞工程设计的， 怎么能贪污，但他们不依我说，分析去分析来，分析得硬像贪污了。开初我也背过包袱，后来想通了，我没有贪污你总定不上。于是我高兴起来，成天照旧吃肉喝 酒，嘻嘻！运动结束了，我的问题也结束了。这次他们也审查我，我就不像你，又扳又跳。你审查你的，我睡我的，不信能把我搞成胡风分子？你有什么，胡子没长 一根，又是工人出身，怪了，还会有政治问题？冷静点，让他们审查去。”

我为他开朗和达和人世间的真情所感动，点点头道：“我自知问题早晚会结论，可一天来去总有人跟着你，看起多不光彩。”

“小 黄呀，这是领导上保护你的安全啊！”他明亮深沉的眼儿，狡黠地一闪说：“你们年轻人脸皮薄，认为栽过尾巴就是了不得的大事，我才不管它，别说尾巴，就是来 两个背枪的我也照常唱歌说笑。哦，我知道了，你怕你小肖不爱你是么？这才是个好机会，考验爱情的好机会。要是她认为你受审查就变心了，这样的姑娘干脆早砍 断，人生的路长啊，一辈子要爬多少坡下多少坎，爱情也是这样，我想她不会罢？”

他的谈话，解除了我的忧虑，此后我便按照他的办法办，再不把“审查”放在心上，更不当成包袱来背。刘善成不肯甘休，用出各种哄骗手段希望我能上套，我不理睬他只好将注意力转到詹大丰主任身上。借这个空闲我每天大量看书，外国的中国的名著，没事便和钟工程师谈天说地。

钟 工程师的名字记不得了，只记得他一生有过的不平凡的历史和经历，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他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中坚，

辛亥革命 失败后他怀着救国救民的热情，远涉重洋去到法国勤工俭学，专攻纺织，搞“工业救国”。在法国他曾和周恩来总理和张东荪同住在一个公寓里，相交甚笃。周恩来 向他宣传共产主义，张东荪向他宣传三民主义。他对两者都不感到兴趣，用他的话说：共产主义是乌托邦的幻想，三民主义是不西不洋的东西，在中国很难做到，他 认为拯救中华民族的良方只有发展科学，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准，改变愚昧落后的状态，才是中国人民应走的道路。所以，他致力于科学，十分勤奋 的学习。大学毕业后，曾在里昂一家纺织厂工作，并和法国一位女郎结了婚，生下了一个孩子，1935 年回国，在上海申新九厂作工程师，“八·一三”抗战爆 发，申新厂遭日寇火焚，他十多年的书籍和笔记全化为乌有，法国女人避难也返回了巴黎，于是他只身归川，东飘西荡，在成都立了家，进入裕华纱厂，前年上调市 工业局任总工。

我最喜欢打听的还是法国的风土人情和政治体制，常常提出一些问题问他，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一天我这样问他：“钟工，你在法国住了七八年，留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他 取下老光眼镜，搔搔斑白的头发想了想说：“当然是这个国家的民主自由。法国民主极了，它是多党制共和国，任何政党都是公开存在，公开工作，各自宣传自己的 政治主张。它们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是议会，议会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议会制定国家法律，选举总统。总统如在任职期间不称职，议员可以罢免，议员不代表 公意，选民可以罢免。总统任期五年，议员也是五年。我在法国，亲眼两次看见他们选议员，那场面可闹热了。在选举议员前，各党派出动宣传机器，通过报纸、广 播车、报告会，在工厂、学校、企业、农村，大势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争取选票。最有趣的是议员们在国会开会，常常为某一个问题争执起来互不让步，甚至在国 会里大吵大闹，有时还闹得掀桌子扔板凳，打成一团，然后又各自检讨。在巴黎经常看到工人罢工。罢工队伍在大街上游行，向政府提出各项要求，政府如不答应他 们就静坐不上班。这时员警开来警车，用高压水龙头冲，冲得工人四处跑。罢工的头头政府从来不追捕，但工厂可以除名开除。今天在这个工厂开除除名，明天又到 那个工厂去上班……”

我听得很有兴趣，又提出一个新问题问：“法国人民的生活怎样？”

他道：“法国人最讲享受，就连 最穷的家庭每天都有腊肠、黄油、面包、水果吃，人人有牛奶、咖啡喝。他们一般吃五顿，最讲究的是晚餐，一周总得吃一只火鸡。法国的女人喜欢打扮，平常都涂 脂抹粉，穿高跟鞋，腰杆紧得细细的。他们讨厌生孩子，认为生孩子会影响人生快乐，所以人口一直没有增长，有几年还下降，最后迫使政府提倡生育。人们不喜欢 生孩子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社会结构和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不同，我们国家的最小细胞是家庭，法国却是个人。在他们的宪法上规定，父母对子女必须承担抚养 的权利，但子女对父母没有赡养的义务，人老了有养老金和社会救济。这一切决定法国社会的民主，自由……”

我又问：“你怎么到法国，什么又叫‘勤工俭学’？”

他 布满皱纹的脸上飞起笑容，欢快的往事使他年轻了许多。他说：“‘五四’运动后，中国青年觉醒了，都为民族的命运担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怀着这样的 希望，决心到西方去看看。可是我家庭穷，根本没有这笔经费。那时法国的劳动力非常紧张，特别是一般笨重的体力劳动根本没有人去做。我们通过外交途径，决定 派一部分留学生去法国学习，这部分留学生大多数是穷苦家庭，不能负担这笔经费，便采用以工代账的办法解决。‘勤工俭学’就是现在的半工半读。我们是坐邮船 出国的，住在巴黎华侨公寓，上午时间去餐馆帮人洗餐具、擦地板、抹门窗，下午去大学听课，晚上在公寓自习。生活基本上过得去，不低于法国一般人民的生 活。”

“巴黎美不美啊？”静一会儿，我再问。

“巴黎美极了，称为世界花都。它一年四季温暖如春【绝不是！】，到处繁 花似锦，简直像一座玉雕珠嵌的城市，不愧为世界八大城市之一。”钟工说到这里，怕我不知道世界有哪八大城市，即竖着指头说：“这八大城市是，美国的纽约，苏联的莫斯科，英国的伦敦，日本的东京，中国的上海，印度的加尔各答，德国的柏林，法国的巴黎，但最美的最漂亮的还是巴黎。所以巴黎又称欧洲的文化中心。 它城市的建筑结构不像我国，我国是铺面相连的街道，它全是一幢一幢的高大建筑，街道就由这一幢一幢的建筑组成。它的街中心是花园，几乎都有喷泉；在街的两 侧是绿树，小食店就张伞设在绿树下，便利行人。一到晚上，男女恋人都手挽手，在绿树下谈情说爱，或唱歌跳舞，充满着和平安宁的景象。巴黎最有名的是六大建 筑，卢浮宫、协和广场、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巴黎圣母院、凡尔赛宫。单说卢浮宫，它是欧洲的艺术之宫，收有四万多件历代大师们的珍品，像米开朗基罗的《胜 利女神》、《恋爱之神》、《奴隶》，达·芬奇的《蒙娜莉沙》、《岩间圣母》，看几天几夜都看不完。”

我听得入了迷又问：“听说还有什么埃菲尔铁塔，凡尔赛宫吗？”

他稍作回忆，继续往下讲：“埃菲尔铁塔又称巴黎的标志，高三〇〇米，塔分三层，分别在离地面三十七米、一百一十五米、二百七十六米处建有平台，塔上设有酒吧间和餐馆，供游人用膳、休息、观赏，上下有电梯，登上最高处，整个巴黎尽收眼底。”

我不明白地问：“怎么叫埃菲尔铁塔？”

他 说：“听我法国爱人讲，为庆祝法国革命一百周年，法国人民提议建修此塔，由工程师古斯塔夫·拉菲尔设计监造，花了两年时间才建成。铁塔重达七千吨，由一万 二千个金属构件焊接而成。你想想，在七十年前，法国的建筑已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在我国建一幢十层高的楼房都感到困难啊！不学习别人的经济怎么行。”接着他 又谈到凡尔赛宫。凡尔赛宫的名字我是知道，只知它是 1870 年资产阶级共和党头目梯也尔镇压巴黎公社革命的指挥部，而不知道它是法国人民的财富结果。

他 说，1932 年我去参观过凡尔赛宫，它在巴黎西南 18 公里的凡尔赛。这里原

是一个小镇，在 1642 年路易十三建筑城堡，作为狩猎场，后经路易十四和十六的 扩建，才变得金碧辉煌，富丽豪华。它有色彩鲜明的庭院，金光闪闪的大厅，精美绝伦的雕像，典雅宁静的花园，地面光滑照见人影，简直看得我眼花缭乱，好像到 了水晶宫和瑶池园，不相信还在人世间。

我对他的记忆感到惊讶，不禁叫出声来："钟工，你是一个'活法国'。"他淡淡一笑道："不行呀小 黄，比起我好些同学还差劲，他们才是真正的'活法国'。人生最能记住的是悲惨和幸福，而在幸福的时候常常忘记悲惨，而在悲惨的时候却常常记住幸福，我喜欢 法国，我热爱法国，这倒不是我在他国土上生活了八年，或与法国女郎有过恋爱，不是这些，是法国民主自由的国家政体和人民主高度的文化物质生活吸引着我。我 经常常梦想着那一天能重新到法国去，看来不行了，只有等死后去收脚板印。"

这番谈话在我思想上印象很深，震动很大，一方面感到自己晓得的事情太少，知识太贫乏，学习对于我太重要，于是自此我开始涉猎外国的现状、历史和文学，大量翻阅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品；另一方面觉得西方社会民主自由，人民生活的十分美满幸福，并不是在资本剥削的重扼下挣扎。

共 产党的运动总是来时气汹汹，去时一股风。十月国庆日后，市工业局党委对我的审查不告而结束，解除了"安全"的监护人。可我想不通，多次找着党委严书记问： "你们为什么要审查我？凭什么审查我？"严书记说不出任何理由，可又不承认错误，用所谓的原则来搪塞我："革命的要求，也是对你的负责。"我冷冷地一笑 道："这个要求应该打上引号，负责应该加上损害。"两个月后才知道，我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省文联创作辅导部的方刚同志在"肃反"审查中可能与胡风案件有 关，在一个风雨之夜服毒自杀。哦，我骤然明白是株连关系引起。两年后我调入成都日报社文艺组认识邱原、茜子后才知道，方刚和胡风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 四九年前向胡风主办的《七月杂志》投过稿挣了点稿费，而被省文联"肃反领导小组"认定为胡风分子故自杀，可怜身后丢下一个五岁小女孩没人管教流浪社会，写 下人间又一曲悲歌。

解除"隔离审查"当我和肖俊华重见时，我笑着问她："两月前你怎样想的？"她不以为然说："我相信你没有任何问题， 看我们不是见面了吗。"我道："如果我那时真的有了问题呢？"她很爽快地回答："那当然要中断关系。"我没有多说，心里却在想：在我们的时代没有忠贞单纯 之爱，爱要稳固必须有政治前提。似乎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政治取代一切，根本没有个人空间。"阶级斗争"如影随形，是个可怕的恶魔！

1955 年"肃反"虽然扩大化，审查了好些不应该审查的人，伤害了不少同志的情感，但它毕竟面积小，在处理阶段又较慎重，基本上都做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故后遗症 较少。但是，它却开创了国家机关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之先例，为市侩小人提供了一条升官获荣的捷径，使一些阿谀奉迎者找到了出卖灵魂的上升阶梯，埋下了许多祸 根。另外，使我在情感上不能接受的是我父亲从 1953 年中风偏瘫后，一直卧床在家，恰好在"肃反"中病逝。我姐夫来机关告知，由于我是审查物件工业局党委 竟然不准回家，入土时也未见老人一面，使我成了不孝之

子，为此抱恨终身。

出于对生活的敏感，我发现经过 1955 年的“机关肃反”，人和 人的关系开始变得不正常，审干中那批所谓靠近党和组织的“极积分子”，莫不纷纷入党和提干，那位死揪我不放的刘善成秘书，竟一跃而为市工业局办公室主任， 取代了詹大丰的职务且一路攀升。现实生活似乎告诉人们一个不宣的秘密：要当官就得整人，要入党就得搞出卖。自此人们开始警觉：做人谨言慎行，说话环顾左 右。机关原有的那种真诚、直率、热情的和谐氛围不见了，人和人变得虚与委蛇，过早的冷静和成熟。

出于对党的爱护，我不断向中共成都市委 写信控告市工业局在“肃反运动”中发生的偏差，而且措词越来越激烈，甚至说如果市委不重视我的意见，我将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反映。这一招真灵，在 1955 年岁末，市纪委张书记亲自接见我，花了近三个小时认真听取了我的意见。他是南下老干部，参加过 1942 年的“延安整风”，为人和善，不摆架子。他 十分耐心地听完我的陈述后却哈哈一笑道：“我的小黄同志呀！你这叫受了委屈吗？告诉你，我在‘延安整风’中被斗了三个多月，还关了我半年多的牢房，要你遇 上了该怎么办？反抗还是自杀？什么叫‘干革命’？组织相信不相信都要照干革命，由其受屈、受诬，更应好好干革命。我们共产党从来都是如此，对每个干部相信 又不相信。因为世界是变化的，人也是变化的，今天可能是革命的，明天可能是反革命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搞运动，才能把那些变节分子、各种隐藏下来的反革命 分子，清洗出革命阵营。这次‘机关肃反’全国就揪出了不少反革命分子，仅‘胡风集团’就几千人。虽然把你审查错了，但不能抹煞我们工作中的成绩。你虽然受 了一些委屈，但对你来说何尝又不是好事。比如今后提干，组织上就不会再审查你了。怎样，想通了吧？”。

共产党真会做思想政治工作，经他这么一说，我原来的满腹忿忿不平，竟涣然冰释。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二十四）

五，故纸堆里看到司法的公正

我们国家在 1954 年秋才正式建立国家档案局，地市专区一级稍后一点。这项工作开始并不引人重视，认 为是可有可无的。后来随着政治运动不断开展，中共建政前国民党留下的档案藏着不少玄机。据说胡风分子阿垄、绿原等人的所谓历史问题，就是从故纸堆中找出的 根据。于是，历史档案也就成了“奇货可居”的材料。机关肃反告一段落后，根据党中央指示，全国开展了对敌伪档案的清理工作。为什么要开展这一工作，我们是 不得而知的，现在回过头来分析，可能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发现和定罪，除了舒芜交出的几十多封信件和胡风的自投罗网的《我对文艺问题意见》（（三十万言 的上书）外，可能都是通过敌伪档案发现胡风集团某些人复杂的历史与有过的蛛丝马迹。似乎共产党有了警觉：历史挡案是革命的一笔财富，通过它可以挖出很多很 多的“反革命”。

事实上，我们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诸如镇压反革命、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城市的民主改革，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已基 本肃清，漏网反革命极其个别。从 1952 年后到 1957 年“反右”前，全国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政治性的集团案。固然公安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根本的关键是敌人 基本肃清了，在高涨的革命和建设大好形势面前，有谁愿意去逆历史潮流而动？人们都希望早日建成社会主义，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在胡风事件后，我们各级 领导增强了“敌情观念”，认为还存在着国民党复辟的可能，这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断。如果社会再出现动乱，多是新的势力，也说明这个政权不受人民拥护。解决的 办法应该是革新和变革，或者是退出历史。黑格尔说得好：“凡不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是不合理的。”

清理敌伪档案，就是想从死亡 的尸体上找出反抗革命的势力，这未免有点杞人忧天。不知是党组织为了照顾我的情绪还是对我的相信，把我调到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去清理中共建政前所有遗留下 来的民事和刑事的诉讼与审判档案。参加此一工作的有 12 人，也是清一色的党团员。市公安局戴星樵局长向我们讲：“国民党和他的军、警、宪、特人员，并没有 想到他们会如此之快的垮台，在他们的亲戚朋友吃了官司时候，常常会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向推事（现称审判长）、检察官（现在叫检察员）写信，从中疏通斡旋。 我们清理的重点就是找出这些人，看他们现在是否已经落网，如未落网，便要跟踪追击。所以你们任务重大，工作艰巨。”。

我们 12 人每天上 班，就是分头看卷案，寻找暴露在纸上的国民党敌特工人员，然后将这些人的名字（包括他们的住址和担任过的职务）摘录下来，每天送到公安局去归档查实。工作 是很清闲的，各人看多少卷宗没有定量，一切听凭自觉。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如法律的诉讼程式，罪与非罪的界线以反法律的专门术语，留给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关张昆冤案一案的原委。透过此案，也使我看到了国民政府司法的公正和审判的独立，以及法律和法官的良心。他们竟然不屈于权贵，不为金钱和 利禄所动，使人久久难忘。

此案发生于 1947 年成都，轰动全川波及全国。张昆是国民党监察院院要员张继的儿子，又是蒋介石先生的干儿。 张昆自幼放荡，寻花问柳，不求上进，其父难以管教，便送来成都一位姓陈的老朋友家寄读。这位老朋友也是有钱人，便安排张昆住在北门珠市街他的一位姨太太家 中。这位姨太颇有姿色，正是“三十如狼”的饥渴岁月，干柴烈火相遇，自然一触即发。那位老友并非不知，一则碍于情面，二则也是家丑，便睁只眼闭只眼。除姨 太外，家中还有位十八九岁的丫头春香，当然不甘寂寞也渗入其中，于是三人缠绵，同床同寝，白昼宣淫。那张昆本来就有肾虚疾病，怎经得住两个女人的折腾吸 吮，不到半年时间，在一次交媾中突然脱阳休克而死。姨太太和春香不敢声张，乘夜将张昆丢弃在驷马桥边的坟坝里。一个扒鬼皮的乞丐便将张昆所穿绸衣和所戴手 表脱去，然后卖给一个王姓的收荒匠，收荒匠又将这些东西卖给一家刘姓旧货店。

这位陈姓老朋友得知此事后，为掩家丑和推诿责任，便向警局 报张昆失踪。警局不敢马虎，立即派出侦探，四处寻觅查访。不出十天便在旧货店发现张昆遗物，

即按物追查，寻迹进逼，于是收荒匠、扒鬼皮的乞丐，皆成谋杀张 昆的凶手。警局遂将此案定成抢劫杀人案，移送到成都地方法院，要求对凶手判处死刑。但是法官（那时叫推事）以证据不足，疑点太多，不是它杀为理由，迟迟不 加判决。为督办此案，省府主席王陵基、南京国府主席蒋介石先生，均有严惩凶手的手谕，也有张昆父亲张继给推事的信件，但法官还是顶着不办，故成了一个既不放也不杀的悬案。在此期间，成都各大小报刊，连篇累牍，跟踪报导，为受害者鸣冤伸屈，闹得沸沸扬扬，妇孺皆知。

我目审了全案四十多卷卷 宗后抚案沉思："国民党反动派"并非书上所写的那么黑暗，那么腐朽，那么反动，那么横蛮，纵然面对至高无尚的权力，司法仍有它的独立与公正。和今日共产党 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啊！在今天的中国，莫说最高权力者有手谕，就一个七品芝麻官的局长和县长歪个嘴巴，一般老百姓也休想活命。我们国家根本无司法公正、 审判独立一说，更无舆论监督一词，无论公安、检察、法院，统统归各级政法委领导，试想共产党怎么判处共产党，正如一个人患了盲肠炎能自己拿刀割去吗？由于 司法不公正审判不独立，社会的公义是非便难以存在，法官也就没有良心，媒体自然不能监督。为此公平、正义、是非，统统死了！它们死于政治运动，死于阶级斗 争，死于专横，死于独裁，死于腐朽的一党专政的制度！

六，古庙旧事总难忘

我不喜欢成天坐在机关里，过着一张报一杯茶 平静而死亡的生活。我希望我的生命永远充满活力，闪着青春的光。清理敌伪档案工作告一段落后，新中国要招收第一批飞行员，省上委托成都市人委办公厅负责此 批飞行员入学前的政审和体检等项工作。这些由地市县推荐来的飞行员，是清一色的高中毕业生和清一色的党团员，他们一个个虎气生生活泼可爱，那时成都还没有 一家招待所能解决这么多人的吃住问题，市委便指定北门外的昭觉寺作为集中地。我负责这些人的住宿、吃饭、调车，也就住在寺里。

昭觉寺

昭觉寺是成都平原最大一座古庙，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殿堂弘大，古拍森森，金刚罗汉，暮鼓晨钟，香火袅袅，僧众多达千人。庙里那三口大铜锅，直径一丈 二尺，深约三米，每口可煮上百斤大米，纵是条大牯牛也可整煮。昭觉寺的油炸锅魁闻名里巷，为酒客首选。中共建政前每逢初一十五，来这里烧香拜佛的居士，多 达上万。庙里有几件镇山之宝，一是释迦牟尼的舍利子；二是一尊用头发编织的观音；三是陈圆圆送给果亲王的一双黄绫僧鞋；四是果亲王出家前所穿的黄袍马挂。 除此以外，这座古寺还有许多近似神话的传说，传得最家喻户晓的便

是那首民谣：“树包碑，摇钵飞，柱头落地，长老归。”其实也就是昭觉寺的“广告”，通过民 谣的传播，使它更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让古寺更有诱人之色。

所谓“树包碑”，就是大殿前一株巨大的黄桷树，把一尊石碑紧紧包裹住；“摇钵飞”，就是佛堂横梁上铁索悬着一个斗大的摇钵；“柱头落地”，就是一间偏殿有根中柱悬空可摇动；“长老归”，就是寺庙开山祖师慧空，自乾隆年间出走后再未回来。前面三事又是长老慧空引出的故事。

传 说风流皇帝乾隆，在年轻时喜欢上了一个姓胡的宫女，生下一个儿子，由其母养大成人。此子聪明过人，在宫里充当太监，经常给来宫里作法的慧空和尚端茶送水， 故心里十分忌恨，暗自发誓：“当我有朝一日威镇一方，定把这些秃头杀净。”后来他长大成人，被乾隆皇帝放到成都作知府，官虽四品，却享有一品待遇，比如衙 门有紫阳鉡，进出有黄罗伞，威风八面，权似巡抚，被人尊为中堂。他从北京起身，慧空大师即紧紧尾随而来到昭觉寺。胡中堂坐定成都后，闻说最大庙宇是昭觉 寺，便作好准备前去寻衅。那天他无声无息带着一帮衙皂前去，远运地便有僧众前来迎接，他甚为奇怪，一问，众僧问答是奉师父慧空之命。他度之：此秃头怎么知 我行程？看来不能小觑佛法。到庙后他即布施，每人发三个包子放斋。他眼见众僧把包子吞下肚后，才问慧空长老：你们出家人是吃荤还是吃素？慧空答：“出家人 以慈悲为本，当然素食。”胡中堂闻言哈哈大笑道：“今日本官所放斋，可全是狗肉包子啊！”慧空道：“大人所赏肉包众僧未动，我们吃的是自备素食”。言毕从 袖中取出狗肉包还给胡中堂。胡二难未凑效，又出三难，问：“禅师，北京大道每天有几人行走？”慧空神态自若一笑：“中堂，只有两人行走。”胡以为抓住了把 柄，突然脸色一变，勃然大怒道：“胆大狂僧，谁人不知北京大道，每日来千去万，何止两人乎？”慧僧静静一笑道：“请中堂息怒，大人为名，小人为利，故只有 名利二人行走。”胡中堂被打哑了，说：“好，我问你。”说着从袖内抓出一只活物问：“我手中握的什么？”慧空见梁上有燕，燕飞而鸣，便知所以，回道：“大 人手握者乳燕也。”胡再问：“是活燕还是死燕？”如说活燕，他只需用力一捏；说死燕，他张指放行。真难！慧空不愧是高僧，捋须闭目，回道：“大人！书云： 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生与死全在大人掌中。”胡中堂哈哈一笑，再无话可说，五指一张，乳燕凌空而去。自此胡中堂拜慧空为师，皈依佛门。

由 于有这些极富智慧的传说，所以昭觉寺成为蜀中名寺，不但香火旺，还有四五百亩庙产，甚为富有。中共建政后一样成为打击对象，减租退押还田于农，六世主持慧 智作为地主，照样被农民批斗打吊，只好将庙中所存金银全数交出，但仍不够赔退。最后拿出镇山之宝“舍利子”。减租退押工作组组长雷洪是个大字不识几斗的武 棒棒，他拿过“舍利子”看了看，嗅了嗅，居然将其扔到窗外草丛丛中，骂骂咧咧道：“妈屁，什么镇山之宝？别骗老子，我要的是金银财宝！拿不出，要你命。” 可怜六世慧智就这样被逼死。到了 1952 年，中国在北京发起召开了亚洲和平代表大会，会毕，参会代表来成都参观，指名要到昭觉寺看“舍利子”。可一问，才 知被队长雷洪扔了，气得时任川西区委书记的李井泉擂桌大骂、叫人告知时任中共成都县委书记的雷洪：三天之内必须找回，找不回枪毙你。吓得雷洪屁滚尿流，带 着百多名干部连夜排查草坪，花了整整三天时间，终于从乱草丛中找回了那颗险些被扔掉了的舍利子。

1956 年的昭觉寺乃空庙一座，上百间 禅房不见和尚，也无居士前来烧香，第七世主持慧能年近五十，我两人还很投缘，有点无话不说。他白天带着还未还俗的 20 多个弟子下田劳动，早晚又带着他们诵 经念佛，从不间歇。一次我悄悄问他：“慧能大师，你又种田又诵经不累么？”他盘腿坐在蒲团上静如止水地回答“黄同志，佛法行天，天道永存，存之在心，心之 佛在，阿弥陀佛。”

共产党口口声声说要保护宗教，宗教何曾被保护过？又说信教自由，何人又敢去信教？土地改革已使蜀中第一禅林的昭觉寺萧条破败、冷寂如冰，十年文革又将这冷寂如冰的寺庙化为乌有，那庙中的四宝已不复存在，但“存之在心，心之佛在”的昭觉寺，却是永远毁不了的。我相信终有一天会见“柱头落地，长老归”的 日子。慧空禅师会回来，一定会回来的！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二十五）

第十章，杀机四伏的一九五六年

人们说 1956 年是人民共和国最美丽、最明朗、最恬静的一年。不错，这一年没有运动，没有斗争，从表面看确是如此。但美丽下隐藏着罪恶，明朗里暗 含阴霾，恬静中波涛汹涌。毛泽东在这一年十一月已经决定要大抓特抓“右派分子”，只是善良的中国人还被他蒙在鼓里。所以我说：这一年是杀机四伏的一年。

一、明媚日子里的暗流

1956 年是人民共和国的黄金岁月，政治宽松，经济繁荣，没有运动，没有斗争，没有怨恨，没有呻吟，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 明确提出：中国知识份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年 4 月，北京市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有 20 万人参加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大会。7 月 21 日周 恩来又在上海市第一次党代会上，明确指出：“从苏联犯错误的经验看来，扩大民主具有更本质的意义。”。

记得，在成都人民南路新华书店的大 楼上，有两幅大红色宣传标语：一幅是“向科学文化进军，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另一幅是“年轻人快活起来，为伟大的祖国尽情歌唱！”。从农村到城 市，从边疆到内地，何处不是笑语欢歌，一派祥和气氛！这是毛泽东治下，共产党最鼎盛的时期。

但是，这一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两件大 事。一是波兹南事件。1956 年 6 月 28 日，一个令波兰波兹南居民刻骨铭心的日子。这天，斯达林机车厂和重型机械厂的工人派出 8 名代表到省委请愿，要求提 高工资，但是遭到当权者的扣压。被激怒的工人们走出工厂，举行示威。很快，游行人数便增加到数万人。他们打出了“提高工资”、“打倒共产主义”、“与苏联 断交”、“要民主要自由”等标语。游行的人群冲击省委、省政府、市法院、检察院和监狱。他们解除门警的武装，焚烧法院档案，释放政治犯。统治者突然下令开 枪，“哒、哒、哒”一阵枪响，公安局前的人群有数人饮弹身亡。几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冲到民警面前，向民警要枪。不知所措的民警竟将枪交给了工人。拿到武器的 工人向公安局射出了一串串仇恨的子弹，公安局里也不断向外射击。事件震撼了最高统治者当局，他们调来 14 万全副武装的军人，浩浩荡荡开进波兹南，坦克在大 街上巡逻，飞机在低空盘旋。一时间，这里好似进入了战争。持续两天的冲突造成 53 人死亡，300 多人受伤，323 人被捕。写下了一页共产主义屠杀人民血淋 淋的历史。

二是匈牙利悲剧。“波兹南事件”波及匈牙利，一时间匈牙利人民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1956 年 10 月 23 日，布达佩斯约 20 万人走上街头，声援波兰人民，要求让纳吉回到党政领导岗位，苏联从匈牙利撤军，调整匈苏关系。游行队伍焚烧红旗、摘下红星和国徽。当 晚，匈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恢复了纳吉的政治局委员和总理职务。纳吉复职后，起义者仍不肯停火和交出武器，并不断提出“苏军撤离匈牙利”，“匈牙利是匈牙 利人民的匈牙利”，“匈牙利回归西方不再作苏联暴政的狗”。从 30 日起，起义者围攻布达佩斯市委大楼、处决了民愤极大的市委书记伊姆雷。事件进入第二阶 段。匈牙利各地出现了反对共产党统治的人民组织，支援纳吉政府的革命运动。11 月 1 日，纳吉宣布废除华约、匈牙利中立并呼吁联合国保卫匈牙利中立。匈牙利 共产党领导人卡达尔等人宣布退出纳吉政府成立工农革命政府投靠苏联，并请求苏联出兵“镇压反革命”。于是苏联的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大肆屠杀起义的工人和 知识份子，血洗匈牙利。这次事件中共有 2500—2700 人丧生，近 2 万人受伤，15 万人出逃。这两件大事发生后，使中国祥和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大逆转。

一 般中国人只看见《人民日报》上两篇评论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不知毛泽东已暗藏杀机。

也 是这一年的 9 月 15 日至 27 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会受到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的瞩目和关注。由于苏共二十大对史达林的批评与 对个人崇拜的批判，自然人们关注中共对苏共二十大的态度。在大会期间，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相继在大会上作了讲话：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苏联共产党在 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刘少奇在政治报告 中说："今年 2 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世界意义的重要政治事件。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迷信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 到的重大成就。"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说："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 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后，在全体代表通过的决议中写道："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关于 史达林的迷信、揭露史达林错误的严重性、消除史达林错误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都支援苏联 共产党纠正错误的努力，希望苏联同志的努力得到完满的成功。"同时还宣称"国内的主要矛盾已发生根本变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谁战胜谁的问题已基 本解决，党在今后的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并强调"扩大民主、健全法制。党内要加强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禁止为个人歌功颂 德"等一系列方针政策。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共"八大"所制定和通过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并提出许多新的方针，如：关于任务问题，大会决定 "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大会指出："虽然还有阶级斗争，我国无产 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关于国家工作方面：大会要求"继续加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制定完备的法律，健全法制，使党 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其他，在经济建设、党的建设方面都作了重要的决议。历史证明，中共"八大"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也是 全党集体智能的结晶。它是中国共产党针对当时世界大潮流和国内新形势作出的全新的、正确的决定，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与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可以说它是中 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最成功的一次大会。只可惜正当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八大"胜利闭幕欢呼庆祝的时候，仅仅 25 天，党的政治路线却暗中来了个大变化，以后二 十多年的政治潮流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奔流而去。为什么有此重大的逆转？

中共"八大"代表会不足一月，共产国际又发生了与波兰情况相类似的匈牙利事件，在首都布达佩斯有 30 多万党员、工人、知识份子上街游行，要求政府为过去被清洗而死去的 4 个党和国家领导人恢复名誉并举行国葬，匈牙利政府悍然武装镇压，酿成近半月的动乱，是名"匈牙利事件"。

针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云变幻，中国共产党表明了鲜明态度。4 月 25 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以苏联经验为鉴戒"，《人民日报》编辑部先 后发表一论、再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提出要分清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也就在这段时期，共产党提出与民主党派"长期共 存，互相监督"，文化科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毛泽东却力排众议认为这是共产国际运动的一股"逆流"。

三十年后，薄一波 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 575 页中写道：“波、匈事件引起了我党的极大注意。仅仅从 1956 年 10 月 21 日到 11 月 9 日的 20 天时间内，中央常 委和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十三、四次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及有关问题。11 月 10 日至 15 日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其中心议题之一也是讨论波、匈事件及其教 训。全会后，仍多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波、匈问题……当时，中央的工作日程排得很紧，往往是通宵达旦，不分昼夜。”

有 人统计，在此期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高层会议上，提到苏共“二十大”、赫鲁雪夫的名字 45 次，哥莫尔卡 11 次，匈牙利事件 32 次，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他 声嘶力竭说：“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莫 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你说有没有这种事呀？我看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的。”

“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 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 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我 们天安门前挂史达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表示我们同赫鲁雪夫的基本分歧。史达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史达林的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它三 分。这也未必见得准确，错误也许只有两分，也许只有一分，也许还稍微多一点。总而言之，史达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一点，我同赫鲁雪夫 有不同意见。”

此时的毛泽东已对苏共二十大和党的“八大”产生了极大的反抗心理，并下定决心要在中国搞一次大的政治运动，“就是把我们中 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当然，他的心路历程没说，一般党团员干部和编辑、记者根本不知道，纵是共产党内九级以下的高级干部也无有所闻。就是说，全中国知 道毛泽东打算的只有出席“八大”十三、四次常委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不足一百名党政要员。全国数千万国家干部和知识份子同我一样，虔诚地相信中共“八大”党 报上的言论，沉浸在无比美妙的向往中，当然难逃罗网啊！

二、陶醉在幸福中的青年人

成 都的春天繁花似锦，垂柳依依，蝴蝶在花间飞来飞去，不知名的鸟儿在树丛中叫个不停，锦江河的水碧得像绸缎，潺潺地不停日夜兼程地向东流淌。她像个无私的母 亲，把乳汁哺润那片黑色的土地，使沉甸甸的小麦叮咚作响，使黄灿灿的稻谷粒粒饱满，使菜花千里金黄。我爱故乡，爱这片生我养我的热土。为了回答党对我的培 养，毛主席的大恩大德，我夜以继日地学习和不辞辛苦的伏案写作，直到晨曦初露的黎明。除此，一有时间我就大量阅读中外各种名着，视野有了很大的拓展。在这 如花似蜜的日子里，我每次与她见面多是探讨文学和文学创作。这条红色的人生之线，成了爱与情交融的河流，也是五十年代年轻人的共同向往。

那 天，我们在人民公园林荫道上散步，我望着身边挽臂相偕，走来走去的对对情侣，情不

自禁地说："我们生活的时代是首伟大的诗，在这个伟大的诗行里，我们就是 诗的标点、符号、音节、旋律。"她望望西下的夕阳，十分同意我的观点，有点如醉如痴地说："尽管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自幼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姐 生活，但我却恨那个制度。在那个罪恶的制度里，女同志没有一点政治地位，她们仅是男人的消遣品和赏玩的花瓶。所以，我自幼担心受人侮辱，平常一人不敢上 街，来去都得哥哥作伴。你知道吗，北京大学女大学生沈崇，就是因为一人在校园里行走，被美国兽兵奸污。"我挽着她柔软的腰肢点点头道："在市委干训班学习 时，为此事我们讨论了三天，美帝国主义实在可恶，我曾向组织申请赴朝但不批准，组织上说这里更需要你。"她紧紧地依偎着我，生怕我飞走似的说："要你走了我怎么办？"我轻轻吻下她额头道："那时我们相互还不认识哩，我去了朝鲜关你什么事？"她格格地笑弯了腰强辩说："人家是说现在，你走了，不就不能在一起 了吗？"

年轻人就是天真纯洁，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四十年后才知道"沈崇事件"，纯属子虚乌有，是共产党一手制造出来的一场反美闹剧。

我们来到一处僻静的树丛，择一块草地相偎坐下，我望着天上星斗说："一想到过去我们国家民族那些受压的事，我就更热爱今天，更热爱党和毛主席！所以更要拼命学习"她借势躺在我的怀中，深情而又激动地说："祝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早一天成为我们新中国第一代工农作家。"

我调皮地一笑说："最好的祝贺，就是我们快点结婚。"

"不，我们还不能结婚。"她扭扭身躯，认真地说："不是我拒绝你这个爱的要求，我是怕结婚后有碍我们对前途的追寻。我还想读大学哩，你能同意吗？"

"读大学？"我抱着她不相信地说："革命阵营就是一所最好的大学，何必一定要进入学校。你不是常说自学也能成为专家吗？"

"我 说过，但是我还是希望能读大学。大学正规，精力集中，学的东西系统，我将能更好地为祖国服务。"夜幕已笼罩城市，灯火在楼房里闪烁，四周的物体渐渐看不清 轮廓了。我听她说完，急忙道："我也去读大学。"她轻轻地笑起来，推开我向她胸脯伸去的手说："大学是要考的，现在你还缺乏系统知识。我的意见，你最好是 安心工作，在实践中学习。因为你热爱文学，创作所需要的是生活，生活越丰富写出的作品就越好。"

"我不读大学可以，但你也不要读大学。"我把手伸回来抓着她的辫子玩，把两条辫子绞成疙瘩，一边说："你读了大学我不就成了和尚，今后读书碰到认不得的字问谁去。"

她偏着脸蛋抓住我的两手说："你是不是怕我读了大学会变心？我不会，我永远也不会，我的心早属于你了，你不相信吗！你应该支持我读大学，让我大学毕业后再结婚。"

其 实，我不急于结婚，结婚仅仅是爱的一个阶梯，用法律去把情感固定下来，但自此再没有爱的神秘了，一切将变得平平淡淡，失去吸引双方的东西。再者，我年纪还 轻，生理上对性还没有强烈的要求。我喜欢保持一周一聚的爱，这一聚的爱，多么使人醉心呵！这时我不表态，她催促道："你说话呀！到底同不同意？"

我搂着她腰肢，让她依偎在我的怀中。她像个婴儿一动不动的蜷缩着，那双渴求的眼睛在树丛中一闪一闪，久久地望着我。好半天后我才拉长声音道："我——同——意！"

"真的？"她一下用两手圈住我的脖子，主动地狂吻我，然后附着我耳朵小声说："除了结婚一条外，我什么都同意你。"

我抚弄着她，把手向她胸口上移去她再不拒绝，那柔柔的海绵状圆球让我狂醉，好一阵后我问道："你的心为什么跳得这样激烈？"她推开我的手声音有点打颤，说："不知为什么，我一见到你就感到紧张，有时还怕得很，现在更怕……"

"怕什么？"我吻着她的脸蛋，又把手放在原处，不知怎么，我的手也颤动起来。她咏咏一笑，把头钻在我的腋窝中道："你也怕，手在抖。"

我 们相互都不再呆下去，站起身，偏偏倒倒地向一条小溪走去。小溪的水涓涓细细，在星光的伴送下，潺潺地为爱弹奏着轻快的乐曲向绿草深处流去，把我们的甜情密 意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地方是糖的海，蜜的窝，使你销魂，使你融化。你纵然生活在孤岛上，也不会感到寂寞；你纵然陷在冰窖中，也不会觉得寒冷。我们静默 地呆着，她悄悄问我："你冷不？"我摇摇头："你呢？"她不好意思地一笑道："我热得心都会炸了。这些时候真不想离开你，坐一天坐一年不感到时间长，我突 然想，要是真考上了大学该怎么办？"

"那你把我带在身边。"

"尽说傻话"她轻轻推我一掌，忽然用手抓住我："我们结婚吧！"

"不，你应该去读大学，"我发现她失去了自持能力，两个脸蛋红得像团火，嘴唇焦灼而干燥，浑身筋舒骨软，再不能站立起来。"你不是说，等你读完大学再结婚吗，怎么一下就变了？"

她 喃喃地道："我早晚都属于你的了，那还是先结婚吧！"我们又默默地站了一会，想着明天还要上班工作，便毅然道："走吧。"她留恋不舍地依着我说："时间还 早哩！再找个地方坐一坐好吗？""再坐，再坐三天也不想走。"我扶着她，往公园外走去说："还要去读大学吗？……"她轻轻捅我一拳道："就是你害人家。" 我格格地笑，笑声在夜空里和着清凉的风，飘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这夜我伏案桌上，展开日记写道："我还年轻，是只正在起飞的鹰。建设社会主 义祖国需要文化、知识、科学，我不应该过早去想结婚。我发现爱情耗去了我不少精力，她像一片深沉的大海，当你陷下去后就再难拔起。我应该勇敢一点，拿出毅 力，把整个心用在学习上。可是一和她见面后，我就瘫痪了，被她热情所裹胁。她呢也是这样，甚至比我还要痴醉，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赶快分开，而分开后 是否又不想念呢？可能想得更厉害，更影响相互的工作和学习。唉，爱情啊！你真是魔鬼。人最好是不要爱，可是谁又不爱呢？"

当一个男人用纯 真的爱把一个姑娘征服，她的矜持和傲慢就再没有了。你要求什么她会答应什么。难怪有人说，在热恋中的女人智商是最低的。但是，爱情绝不是性欲，更不是兽 欲；爱是关怀、是体贴，是相互的尊重。只有关怀、体贴、尊重，人世间才有真正的爱情！性仅是爱的一个表现，热的一个迸发。

男人的热是冲 动，女人的热是渴求。她的渴求越来越炽热，像个燃烧的火球快融化自己。自此我们每一见面，她便有点不能自持，不是伏在我的身上，便是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躯 干，最后昏昏然地倚着我似睡非睡，想移动半步都没有力量似的。我总是搂着她，让她甜蜜地睡在我的手腕上，我无声地吮着她额头、脸颊、脖子、胸脯……透过昏 暗的夜色，我看见她那双醉朦朦的双眼略呈红色，因兴奋而光泽湿润的肌肤张弛得十分厉害，浑身滚烫发热，软软地没有丁点抗击力。她被我融化了，融化成了一汪 柔柔的水。我把她抱在怀里，然后又平躺地把她放下。她转过脸，等待着，可是能等到的仅仅是长长地一吻。她狂热地吸吮着我，渐次地沉沉睡去。在昏昏沉沉的睡 意里，她喃喃的不停地说："我们结婚吧！我们结婚吧！求求你……"

爱情的魅力是这样大，我彻底征服了她，她也彻底征服了我。两颗心跳在一起了，不结婚真是一种难受和痛苦！。渐次渐次地，两个身躯合二为一了。爱，再也无法抗拒……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二十六）

三、是事业的添加剂

"有情人终成眷属"。1956 年元旦之夜，我们结婚了！

这一天和我们一起结婚的有她女职高的同学市图 书馆负责人之一的赵素华，一个高挑个儿，脸儿俊美，绰号叫灯影的女同志。她的男朋友叫罗永光，市文化局电影科的科长，也是高高的个子，一脸胡须渣渣，歌唱 得特别好。婚礼在她们图书馆阅览室举行，来参加仪式的多为相好的同志，那时不时兴送礼，主人也不准备酒宴，几十人聚在一起，笑一笑，闹一闹，唱一唱，吃几 颗喜糖就算是结了婚。不过在去扯结婚证前双方都要向各自单位领导打报告请求批准，经批准后拿着单位介绍信才能去所在地区政府的民政科办理结婚手续。由于她 和灯影是同学又是好朋友，在结婚前我们就商议好在距市人委不远的地方光华路口合租了三间民房住家。还商量一起开伙煮饭，由我继母充当炊事员，伙食费平均 算，继母的由两家负担。我们的新房近 30 平方米，屋里有张楠木藤编大床，是姐姐送的；其余东西是一张写字台，一张方桌，一个衣框，几张椅子，简单极了。但 感到温馨满意。结婚没有婚假，星期一便照常上班，一点也不讲究，一切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当时，我们两人月工资加在一起有 110 多元，除此，每月我还有 稿费，有时稿费还超过工资，经济收入较一般人优越，小家庭日子自然过得十分舒畅。一日三餐不再在机关食堂吃饭，除上班外都在一起。我们每晚睡得很迟，不是 看书便是谈论人生，如果我夜里伏案写作，她就在一旁织毛衣相伴，不时送来杯杯热茶或是依偎在我怀里睡去。我常常向继母说："我们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全是 毛主席的恩情，共产党的领导。"继母点着头高兴地回答："是呀，是呀，你要加倍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拼命啊！这辈子、下辈子，都不能忘记毛主席和共产党 呀！"我说："怎能忘记啊！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这表露这倾吐，决非虚情假意，完全是一个翻身者出自内心的声音。但这真情的 声音，却为不断的阶级斗争所摧毁所埋葬，这是谁之过啊！

王之涣有诗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建立家庭并不是人生 的终结，正确地说是个新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责任！丈夫的责任，就是用勤劳奋斗，使这个家越来越富有；妻子的责任，就是柔情蜜意，使这个家充满温暖。我们 经济上不但要支付房租、水电，还必须有更多的积累，为明天来到的孩子作好打算。再有，一个决心从事文学创作笔耕的作家，要想写出有份量、有价值的作品，肚 里必须有货。货从哪里来？那就是拼命地读书学习，获取更多更多的知识和养份。婚前我们有不少时间，都浪费在公园河边或花前柳下，现在全用来读书学习了。每 到休息或星期日，我们都是一边看书一边探讨争论各种问题，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使爱情变成了人生成功的动力。一次，我看了赵树理新出版的小说《三里湾》 后，感到不太满意，凝目沉思一会向她说："现在的小说老是一个调子，中间、落后、先进三种人物。写农民不外乎是保守，不相信先进经验，不相信组织起来的优 越性；写工人不外乎是爱护国家财产，或创造发明了什么先进的工具。读起来总不吸引人，读了开头就知道结尾，看了一篇就不再想看第二篇。比起过去巴金、茅盾 等人的作品来就太差劲了。我读巴金的《家》读了三遍，茅盾的《子夜》连续看了两遍，有时读得来连饭也忘记了吃，就像自己的命运和小说的主人公连在了一 起。"

她听后皱皱眉头说："这个问题我也有所同感，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是写人和研究人的艺术。写人就必须写得活，就是鲁迅所说的写眼 睛。作家艺术才能的高下，就在于在作品中能否画出人物眼睛来，写出人物独特的精神世界，以及人物的不同性格和思想，不同的生活道路和不同的命运。"

我 认真地把她说的话思考了一遍，于是将长时期在脑海中形成的见解表述出来，说："你看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尽管他笔下人物众多，但面形雷同却极少。他写的哈姆 莱特、奥瑟罗那样出色的典型固然各有鲜明的面影，就以他的戏剧中出现的不少阴谋家的形象来说，面目也有不同。《奥瑟罗》中的伊阿古，诡计多端，善于伪装；《麦克佩斯》中的麦克佩斯，凶残贪婪又心怀恐惧；《哈姆莱特》中的克劳狄斯，貌似平和但心狠手毒。再说曹雪芹《红楼梦》中的钗黛之异，袭人平儿之别，自不 消说。就是被迫害而死的丫环如晴雯、鸳鸯、司祺，也各有其不同的心灵和身影。《儒林外史》写了不少知识份子，他们的身世际遇，人物面影几乎无一相像。《水 浒》中写了不少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各个英雄人物都有不同的性格、思想、面貌。鲁智深粗而细，武松粗而有谋，李逵粗而豪爽。人物是时代的印记。一个时代的 社会生活是丰富多样、生动变幻和庞大复杂的。生活中的欢乐、悲苦、正义、邪恶、抗争、虐杀等等，在文学作品中都须通过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表现出来。"

"好 啦，好啦，你累不累啊？"她心疼地捂住我嘴巴叫起来："休息会儿，喝口茶好不？"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当思想闸门被打开，那奔腾的急流便难止住，我一把将她 搂在怀中继续说："等一等，听我说完。怎样才能写好作品，归根到底应取决于作家对生活与人物的熟悉程度。只有对具体人物的思想、性格、面貌、身影了解得愈 深，反映现实的深度也就愈生动。有些人写的东西，不是来自于生活的素材，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当前文艺理论家把这种创作倾向称之为公式化、概念化，实际这 是一种变相的抄袭。艺术是不能重复的，重复就不叫艺术。社会生活色调各异，客观世界五彩缤纷，新的东西总是层出不穷，哪能是一个样子呢！根据达尔文的生物 进化论，在生物界是找不出完全相同的两种东西来的。比如说你能找出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或两朵完全相同的花吗？人就更不用说了，不仅他外貌形象不一样，性格 、爱好、思想、言行、习惯就更不一样了。典型就是一个。"

"典型就是一个"她望着闪烁的灯光，重复着我说的话。"对，典型就是一个"我举 例解释道："你看过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在这部著作里，他写了一群各具特征的贪婪的典型人物，

如高布富克、老葛朗台和纽沁根，这三人不但各有各的个 性，还各有各的敛财致富的手法。其中，高布富克攫取财富的目的，特别是他的手段，都说明他是一个带有浓厚的原始积累色彩的老式金融资本家，不是十拿九稳的 买卖，他决不沾边，可是只要有利可图，那怕只是拔下别人一根毫毛的蝇头小利，他都不放过。他的人生目的，就是他常说的那句老话：‘生活不过是一部由金钱开 动的机器。’可是他一生精心盘剥下来的财富，从不花错一个。在他死后汪尔卫打开二楼和三楼的密室，发现里面不光是堆着棉花、糖、甜酒、咖啡等舶来货，还堆 满了物主未能赎回而留在他手里的各种贵重抵押品，从家俱、银器到古画和古董，甚至还有各种长满蛆虫的食物。另一个箍桶匠出身的葛朗台，八面玲珑，长袖善 舞，政治风云的变幻，给他造成了追逐财富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他借资产阶级革命风暴，投身共和党，俨然是个新潮流的人物。他当了区长，得了十字勋章，后 来拿破仑称帝丢官转于商业，我说得对不，老婆？”

她笑起来推开我，做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道：“好难听，老婆”我道：“老婆不好听，以下几 个称谓任你选。你认为哪个好听，我今后就用哪个叫好吗？”我屈起指头，挨个数着说：“内人、堂客、娃娃妈、屋里头、婆娘、太太、娘子，还有……”她笑弯了 腰，追问道：“还有什么？你几时收集了这么多名词，真是个作家料。”

我在屋里走了一圈，把刚才中断的话题续上说：“老葛朗台跟高布富克不 同，除了放高利贷之外，还经营葡萄园，作酿酒生意，在巴黎金融市场上买卖公债。他的财富不是商品而是黄金。为了黄金，他可以不管老伴的死活，以及独身女儿 的终身之托，唯一生活情趣就是独自躲在密室里欣赏那些黄澄澄的东西。而银行家纽沁根却又是另一资产阶级人物，他挥金如土，生活豪华，惟恐别人不知道他是个 大财神。他用各种手段来炫耀富有，甚至把他那个标致的老婆尽量装扮得珠光宝气，把她作宣传他财富活动的广告，他的目的是给他的银行招揽大批的存款，这样就 可以利用别人的腰包来做更大的生意。他既不象高布富克，只知一味堆积商品；也不象老葛朗台，把黄金当作贮藏的物件。他的办法是尽量使他的全部资本处于不停 的流动和周转的过程中。地产利息大，他就买卖地产；开矿赚钱多，他就设矿局。纽沁根做交易的手脚跟高布赛克迥然不同。他象赌场里的赌徒那样，喜欢孤注一 掷，要么输光，要么通吃！他的信念是：‘有了一千万，就得捞他三千万。’高布富克只是躲在巴黎一条陋街上捕食，象条老鼠，老葛朗台也只是在外省逞能，而纽 沁根却想把整个法兰西当成一块肥肉独自吞到肚子里去。尽管这三个资本家，具有不同的思想、品质、性格、手段，但他们共同的特点却是拼命的想发财，都是金钱 组成的细胞。我们现在作家笔下的人物，就只抓住共性，而放弃了对个性的发掘，所以人物立不起来，给读者留不下印象。”

我这一番有理有据的 谈吐，使她感到惊讶：“你几时读了这么多的书？谁能相信你是个文盲，是个老粗？”我笑笑说：“勤奋，使我获得了知识，知识又把我变得聪明和有智慧。难道你 不知道，丰富渊博的知识，是作家进行创作不可少的要素啊！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但我认为对作家更重的东西却是敢于创新！不走别人走过的路， 不写别人写过的书。世界上第一个用花来形容女人的人，是最聪明的人；，第二个用花来形容女人的人，是最笨蛋的人；第三个再用花来形容女人的人，是个混蛋。 被誉为‘文起八代之初”的韩愈说过‘言必已出’。《桃花扇》作者孔尚任也提出‘词必新警，不袭人牙后一字。’可是我们好些作者包括我自已在内，总喜欢重复 为别人发掘过千百次的题材，其原因是对生活没有独特的认识，囿于陈见，不敢打破框框。”

她望着我妩媚一笑，送来杯热腾腾的茶，并热烈吻我 一下，鼓励似地说：“那你就勇敢地去

打破框框吧！”我接过茶呷了口说：“对生活，对创作，我有自己的看法，可还没有想到怎样通过小说去把它表现出来？自我 读了不少书后，似乎脑袋里多了一个自我，不再是别人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好像知识文化给了我一双眼睛，过去不能认识的问题现在认识了。比如常听见领导说，‘我们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但具体到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一个区、一个乡，情况就不一定是这样。也许在一些省、市、县、区、乡的工 作，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了。前年国家搞统购统销，我们区就多统购了农民粮食，结果弄得一些乡镇缺粮，大批农民拥进城市抢购锅魁、点心，给生产造成 损失，可是在总结工作时，我们李区长仍然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这就不合乎实际，看来这是种病态。”我越说越激动，立起身在屋里走动，用手比划 道：“一根直立的线，从上面划下来，尽管线没有歪，但越往下划，墨就越淡越细。对于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人们承认，在具体上却持否定态度。文学艺术是党的事 业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去写了这些事情，是否合乎客观实际情况？现在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没有解决，认识上没有统一，所以创作上就必然是公式化和概念 化……”

她未及搭话，继母在厨房里叫我们吃饭了。在饭桌上罗永光笑着问我们争论什么，我便重述了自已的观点。他听后似乎同意说：“电影也 近似一样，雷同的片子太多，所以大家喜欢外国片。这次我们举办的‘印度电影周’火爆极了，《流浪者》场场客满，现在全城的人都在唱《拉兹之歌》：流浪，流 浪，我到处流浪……”

四、难忘的那一个夜晚

那一夜的月光是这样的美好，那一夜的空气是这样甜密，那一夜的星斗是这样闪 灼，那一夜的风儿是这样轻微，我们静静无声地躺在床上，没有说话，没有声音，只有两人的呼吸，和小桌上闹钟的嘀滴答塔的摇摆。屋里朦朦胧胧，窗前树影荡来 荡去。她枕着我手臂似睡非睡，我用手为她梳理着额前那一束蓬松的柔发，不时用灼热的嘴唇去亲吻那光洁的脸蛋。她柔顺极了，默默地承受着我对她的爱，不时还 羞涩地婀娜一笑，忽然她把小嘴放到我耳边低低地道：“不知怎么，近来我老想吃酸的东西，怕是……”

“生病了？”我不懂生理学，文不对题地填上这个空白。

“我才不会生病哩！我比春芽、蝴蝶、她们几个人的身体都好。”她柔柔一笑，将头贴在我怀里：“医生说，是有……”

“真的！”我狂喜地坐起来拉亮灯，羞得她把脸藏在被窝里近似央求道：“快快把灯熄了，躺下，不要着凉。”

“咋不早告诉我，几个月了？”我熄了灯重新躺下，打颤的手在她细腻的皮肤上滑动，最后停在右侧小腹上：“这里吧？里面像有个圆东西。”

她不回答，捅他一拳道：“都是你，坏！”

我 笑了，敞开喉咙大笑道：“好快，我就要当爸爸了！”于是，很多奇奇怪怪的联想，浮上我的脑际：孩子怎么来到世界上？第一声啼哭是怎么叫出来？他（她）迸出 娘胎是个什么模样？她见我思忖不语提出新话题问：“你想过没有，给他取个什么名？”我道：“孩子是爱

情的结晶，婚姻的硕果，不论是男是女都叫晓琦怎样？” 她黙黙地重复一遍：“这个名字多难听啊！”我立即明白，她还完全不懂我的意思，便解释道：“晓，天晓的晓；我的别名不是叫晓枫吗？琦，美丽的玉，你还有个 名字不是叫肖琦吗？用我的晓，你的琦，组成一个名字，意义有多好，我们相爱有多深！”她喜得拍着双手道：“好，我拥护！我拥护！那他未来选择什么职业？”

我 嘿嘿一笑说：“你比我还急，名字取了还不够，还要安排好职业。我觉得人世间有三个职业最好……”她迫及待问：“哪三个职业？”我不慌不忙说：“医生，教 师，演员。医生，救死扶伤，为人解除痛苦；教师，传播知识文化，给人以聪明才智；演员，用歌声带走世间忧伤悲愁，为尘世留下高兴欢乐。”

如 果说共产党讲世界观，人生观，这就是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我们这极低微簿的企冀，毛泽东也视为威胁他政权存在的危险品，用极其专制横暴的手段，把我 们青春的希望与人生的爱火，全部扑灭绞杀尽净，这就是中国反右的悲剧！二十世纪人类的悲剧！记得七年后的 1963 年，我因“马盟”一案被关押在距人民公园 市图书馆仅千米之地的四川省公安厅梓橦宫看守所，在一组《一束没有寄出的情诗》中有首《历史老人快请评说》写道：“写给你的不是爱歌，是眼泪的河；寄给你 的不是情笺，是苦涩的药！记那年，月光下，忘不了，麦草垛；我把赤诚献，你把终身托。自此，像一个分不开的影子，自此，像一团炽热燃烧的火。多少晨的惬 意？多少夜的欢乐？……一场风暴袭来，倒了芭蕉，折了芍药。几多岁月，南北你和我。孤灯丶冷衾，劳累，饥饿……唉，聪明勤奋，竟换来无边的折磨。是时代之 咎，还是我辈之错？历史老人，快请评说！”

在这感谢，激动，幸福的日子里，一天办公厅傅杰主任突然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喜滋滋地对我说： “小黄，市委宣传部来了通知，决定调你去新创刊的《成都日报》”去，你有什么意见？”我一下喜欢得跳了起来：“真的呀？”傅杰主任静静地说：“这是党对你 的信任，也是你努力勤奋学习的结果。还有，总编辑是你的老上级张烈夫同志！”

“是他”我高兴得几乎叫出声来：“张区委？！”

他是我和平乡土改工作团的团长，后来又是我的顶头上司---三区区委书记，曾手把手教过我文化也曾带我到各乡去检查工作，穿树林，闯荒山，越溪涧。想不到五年后的今天，又回到他身边工作了。怎不激动？怎不兴奋啊！

第十一章，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

知识份子是国家的财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知识份子便不能创新发展，社会便不会进步。可是毛泽东却仇恨知识份子，他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他不断发动运动，不断肃整知识份子，恨不得把知识杀过精光。我拼命学习知识，也就成为事打击对象。

一，成都日报社

中共建政前成都除国民党的官办报纸《新新新闻》外，还有七八家民办报纸，计有《华西日报》、《新民晚报》、《东方日报》、《工商导报》，还有不少杂志。这些报纸杂志的存亡与否不在政府，而在读者多寡和自身财力。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骂谁就骂谁，如果当局不同意，可以“开天窗”（就是空版面，读者一看就知稿件遭扣压）。这些报刊杂志除《新新新闻》外，皆是民主自由人士所办，都倾向进步支持共产党。中共建政后共产党对舆论实行监管，任何一张报纸一本刊物都得经批准，否则为非法。此后越来越严格，纵是复印文本也得报批备案，稍不注意便会引来杀头之罪。

1950 年初，《新新新闻》由官方接管更名为《川西日报》，原有采编人员逐步逐步淘汰，不久全换成南下干部和新参加工作的学生。《工商导报》本来就是共产党办的报纸，仅不过以非党人士面孔出现，社长张若愚就是地下党党员。到了 1956 年初，随着经济发展，政府机构不断扩大，公有制企业日益增多，出于客观需要和权力考量，中共成都市委需要一张自已的机关报，便公布政令和宣传达各项方针政策，故借公私合营社会主义高潮来了个一锅端，把《工商导报》全部一口吞下更名为成都日报。本来这是消灭自由言论之举，可是报社人员欢喜若狂，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以示庆贺，就像孤儿有了母亲。

经过一段时间醞酿，《成都日报》于 1956 年 4 月出刊。它的人员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原有《工商导报》的留下来的老报人；二是从《四川日报》调来的人员；三是从市级党政机关选调出来的、有一定写作能力的党团员。我就属于第三种人员。! 三方面人员加在一起不足五十人，分为政法、财贸、文教、美术、文艺五个组，另有一个主编室，那时做什么事都提倡节俭，成都日报社也一样，它的办公位址在布后街，是借用四川日报社一幢库房上的二层楼，作为编辑人员办公室，一切因陋就简，所有办公桌椅全是旧的。除总编张烈夫和总编室主任王畋有单独办公室外，其他人员都是在各自部门的办公室里办公。

我拿着调令到报社行政办公室报到，党办主任阎凯竟是老一区的战友，故人相见分外亲热。他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小黄，六年不见，没想到你成了省里的青年作家，张区委出任总编辑后第一个向市委宣传部指名要你。好呀，这下英雄更有用武之地了。”我笑着，无不感

激地说：“这全是党和毛主席的培养，我一定好好工作报答组织。”正说着，张烈夫总编把我叫到他办 公室去。他说话还是那个老样子，不停地抽烟，不停地抽鼻子，看了我老一阵才说：“小黄，报社是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可不能放松思想改造啊！还有赶快解决入 党问题，要吸取教训，不能再和领导顶牛，你在三区与李区长关系搞得多坏，他是长征干部，文化水准低一点，性子暴一点，但你能顶得过他吗？他代表组织啊！组 织是什么？衣食父母。”他说到这里，深深地吸口烟又长长地喷口雾，再用力抽抽鼻，怔怔地注目看我一眼，然后十分关切地说：“你知道不，我为什么要调你 来？”我迷茫不知所措，他见我回答不出，笑笑说：“我了解你，你是我身边成长起来的干部，用起来放心。”我“哦”了一声，似乎有所明白，但又不全明白。听 得他继续说：“你是工农干部，会无条件的拥护党，不会像出身有钱人家的少爷小姐，和党总是三心二意。你到文艺组去，很对你路，只有组长肖青一人是团员，四川日报调来的，其他全工商导报的人。”

我去到文艺组见了组长肖青，她是个年近三十岁的女人，胖胖的中等个儿，戴付深度眼镜。老公苏定生南 下干部，也是四川日报调来的，现是政法组组长。她本姓刘，叔父是地下党的，临“解放”被国民党活埋于成都十二桥。她自幼受叔父影响，思想就很“进步”，视 共产主义为人类社会天堂，学生时代便办刊物、搞油印小报，为避抓捕，发表文章用笔名肖青。文艺组除她外另三人是，杨蓓《工商导报》老报人，华西大学的高材 生，人长得很漂亮，当年有校花之称。她文笔不错，负责影评、散文，对小说特别偏爱，可从不动笔写；负责杂文、游记的陈泽昆，快四十岁了，头发已经花白，仪 表堂堂很有风度，中共建政前当过《工商导报》一任总编，知识面特广，天文地理、中外古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外号人称“多宝道人”；负责戏曲的胡克由， 也是《工商导报》老报人，成天少言寡语，虚着一双眼睛，说话走路对人处事极其低调，似乎从无主见，对组长肖青唯唯诺诺，言听计从，是个典型的“驯服工 具”。由于我身份特殊，又是张总的老下级，加上年龄幼小笔头快，不仅在组里以至在全报社的人都叫我“小黄”，算个明星人物，有时还列席编委会。不几天报社 在中新街 50 号原《工商导报》宿舍，给我分了两间约 40 多平方米的有望板与红木地面的住房，有点空前绝后，惹得不少人羡慕。

主管文组组版 面的叫孙文石，民主人士。在《工商导报》改为《成都日报》前他是总编辑，现叫主笔，快五十岁了，对人客客气气一脸是笑，一付大家风范的知识份子。他刚续 弦，妻子姓马是教育局长。他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因是三代人，故多我一间房子。常来我们组上的是总编室主任王畋，高高个子，喜欢戴付茶镜，一身细呢面料制 服，天冷时穿付长统马靴。他是山西人，１９３８年就参加共产党，比总编张烈夫资格老，不知为什么官运不佳，现才行政十五级。他喜欢抽烟，在看清样时从来没 断过。他喜欢和杨蓓聊天，对我也偏爱，认为我有创作天才。

“春风得意马蹄急”。人处在上升时期，喝凉水也是甜的。我很快选为团支部委员， 市委机关团委副书记，每周都要去中共市委机共团委开一次会，商讨如何开展机关团委的工作。我自然得意洋洋，走路一阵风，真是人生的黄金年华啊！记得在一首 自述诗中写道：“尘敛珠光云遮星，受压奴隶最聪明；休言报社是禁地，翻身老粗敢破门：笔底涌出知慧水，化着纸上万朵春；琳琅满目东风里，一代记者是工 人。”

文艺组每天有看不完的电影和戏剧，凡新片公演前市文化局都要送票，看了后要写影评。每上演一台新戏也要请我们去提意见，目的希望吹 捧一下。当时全国正在搞戏改，报上成天都有讨论文章。为此演艺界的名角都要买我们的帐，鞍前马后惟恐有不周到之处。先初我还

喜欢看这不花钱的电影戏剧，后 来看腻了拉也拉不去。有不少时候把票给她妈妈，她妈妈兴奋极了，认为女儿找了个好女婿。只要报上一有我文章，她就拿着报纸看半天，还向她认识的人介绍，说 到我一脸是笑，眉飞色舞。

报社工作文化范围大，轻轻松松，除看稿改稿写稿外，没一件体力活，一切自觉。每天一上斑先砌盅茶，坐在藤椅上慢 悠悠地看报；报看完后聊天，然后上厕所，再后处理收发室每天送来的稿件。在来稿中诗歌小说最多，作者多是中学生和一般爱好文学的青年工人。如果要一篇一篇 的从头看到尾，根本没那个时间。一般是看过头或三四行字，便能判断可用不可用，不用的用红笔划个叉丢在字篓里，由读者来信组退给作者。编辑最烦的是字迹潦 草的稿件，常常是看都不看就扔在一边。不过好的编辑不仅是编发稿件，更重要的是发现人才。文学创作是脑力劳动，不但要功底，更重要的是作者天分。没有天分 的作家写不出好作品，纵是硬撑写出来，作品决没有灵性灵气，读起来没点味道。作家文豪巨匠，皆是天生啊！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二十七）

二，难忘的一餐佳肴

报社是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人和人谈论的事多与知识有关，几乎没有什么庸 俗低级的东西，就是说吃讲穿也不同于一般。一天，陈泽昆牵头，约上王畋、杨蓓和财贸组的范今一等六人，去到春熙路耀华餐厅品尝荣乐园开山徒弟兰光鉴做的佳 肴。荣乐园是个百多年的老店，号称川菜开山祖师。能去这个地方吃饭的人，不是达官显宦也是富足一方的豪绅，一般百姓从不敢问津。据说店里的噐皿多为银制， 杯盘碗碟皆是江西上等好瓷，所用食筷全是鸟木。兰光鉴是传宗弟子，年己八十有余，早已不理厨。、因为我们副刊《锦水》上有个栏目“珍品菜系”，每期都请他 介绍两三道川菜的烹调技术，故十分高兴。陈泽昆是这个栏目的主管人，自然与兰的关系亲密友好。由于交往太深，决定亲自临厨给我们做餐佳肴。除我是个地道的 草根外，他们都是美食家，对任何上桌的菜都能说出过一二三来。那天我跟着他们去别耀华餐厅里屋的小间，距厨房三步之地。兰光鉴安排我们好后，即坐在厨房临 窗的一张高脚木椅上，指挥起他的徒弟来，如何选料、动刀、抛锅、煎炒。不一会儿几碗很精致的菜肴摆上了桌面，一股特有的美味激惹着人的鼻孔，肠胃蠕动的反 射使得人满口津液，强烈的食欲感传遍全身。其实摆在桌上菜肴的名称极其普通，诸如白油肝片、爆炒腰花、公保鸡丁、红闷海参、脆皮猪头、冬笋烧肉、魔芋煨鸭 、子姜煎肉、玉液菜汤，等等。可是吃在嘴里，那鲜嫩清脆的美味无以伦比，色香味适度，回嚼无穷，不由人拍案称绝，恍如御宴琼浆，不由人感慨万千，大有“此 食缘为天上有，人间几人能品尝？”

饭后，兰光鉴师傅叫人送来一壶茉莉花茶，一边品茗一边闲聊。他问：“今天菜味怎样，欢迎大家提提意 见。”范今一是出了名的美食家，早在《工商导报》时就吃遍成都餐馆，谁优谁劣常在报社发表评论。凡他认定的好酒好菜总是走红蓉城，凡他认为差的不出三月便 关门大吉。但他的评论从不含个人意气，公公正正清如泉水。此时，酒酣饭足，一边用牙签剔着牙，一边呷口茶，笑笑说：“兰师傅，今天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香最 好的一餐饭，是种莫大的口福与享受。过

去常听人说，你是川菜鼻祖，我还有点不相信。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今天算是领教了。单说那爆炒腰花，又脆又嫩又爽口， 放在嘴里不动牙就化到肠子里去了，没有炉火纯青功夫断难有此绝技。那公保鸡丁更是一绝，脆嫩得象油酥饼，舌头一卷就化成香汁，奇特！奇特！”王畋是老区来 的，对烹调技术比我还门外汉，待范今一表白完感想后，他对玉液白菜汤推祟备至，说：“你那汤是怎么熬出的那么好吃，看着是盆清水，喝到口里浑身都酥了，那 味道真有说不出的美，不知是怎么做出来的？”杨蓓静静地摇着手中小小的檀香扇，脸颊上永远泛着浅浅的微笑，天生的一付大家闺秀样子。待王畋话音落定后，她 才张开细细的嘴唇，柔声缓语说：“川菜是我们国家四大菜系之一，都认为是麻辣，其实只见了表。兰老师今天作出的这一桌川菜堪称正宗。它微辣而香润，似麻而 爽口，既有越菜之清爽，又有鲁菜之厚重，还有粤菜之鲜嫩，不错不错，大家大家。”陈泽昆听后转头问我：“小黄，你觉得怎样？”我张口结舌有点对答不上，便 灵机地转过话题道：“兰老师手下做出的川菜简直是艺术，是艺术就要发扬光大，赶快出成书传承后代。”王畋十分赞同我的观点，接过话岔道：“艺术不仅是诗歌 美术，人世间绝技也是艺术。不过靠文字难以传承，得手把手的教，口对口的说，我建议兰老师赶快办个学习斑，招大批徒弟教。”

兰光鉴叭着 叶子烟，认真地听着大家对他的称赞，显得兴奋一脸红光，笑笑地道：“诸位老师太过誉了，兰某仅是个厨师而已，既然请大家来品尝手艺，我就得认真做。做我们 这行有句行话：三分刀工，三分选料，三分火候，一分手艺。再好的手艺如料不好，刀工跟不上，火候拿不起来，再好的手艺也白搭。”他呷口茶后继续说：“你们 只知公保鸡丁又脆又嫩，爆炒腰花进口即化，却不知你们吃多少子鸡，多少猪腰？”大家面面相嘘，不知该怎么回答。他笑笑，用指头比划着，十只子鸡，二十个猪 腰子……”大家听后，不约而同地叫出：“吃了那么多呀？！”他认真地点点头说：“十只子鸡脖子上汤圆那么大一团肉，二十个猪腰子的两端尖尖，不然怎么那样 鲜嫩？这就叫料。除此，还得爆火。”大家听得信服地点头颔首，表示认同。

“那玉液菜汤又是怎么烧出来的呢？”王畋未忘清水汤的鲜味，似 乎至今还在口里回荡，忍不住提出问过究竟。兰光鉴叭叭地吸完最后一口叶子烟，将烟杆在鞋帮上敲了敲，待烟蒂落在地上后才神秘一笑道：“这是我一家三代的单 传，是从不告诉人的。今天大家都是报社的编辑、记者老师们，我就公开吧。这汤先选只又肥又大的子母鸡，杀后去头去尾去足，放在沙罐里用炆火久炖，至至炖三四个小时，然后用沙布过滤三遍放在一边。白菜是那种卷心白，剥去外皮只留个小芯芯，放在碗里用竹片划成四片，再把过滤后的鸡汤烧滚，然后淋下去，放少许盐 巴。看起来像清水汤，喝进嘴像玉液琼浆，功夫一点不能马虎啊！”大家听得入神入迷，此时方理解到此餐的豪华珍贵。世间好吃的东西都来自于千选万拣啊！

三，灵魂在潜移默化

知 识是清泉，润人心田；知识是长风，给人肩生双翼；知识是力量，使人坚强。知识把人变得聪明，使你不再愚钝，让你明白人世间的非非是是，真真假假，善善恶 恶，美美丑丑，不再做出愚蠢的事情。报社是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无论

走道和办公室都弥漫着知识的细胞。人与人客客气气，交谈轻声细语，连走路的脚步都没有 声音。文艺组更是雅客名士之处，无市井习气，谈论的是音乐、绘画、诗歌、电影、戏剧，无油盐柴米之事。环境改变人，人须适应环境。我发现自已成了另外一个 人，无论谈吐、性格、习惯、爱好，逐渐知识化起来。过去觉得与妻还有差异，现在不但感到平行，某些方面还前位一些。那时全国正热火如荼的搞戏剧改革，几乎 每周都有观尝票，全是贾培之、袁玉昆、蔡如雷、竞华、竞艳、小洞鳳、陈书舫等名角的演出。川剧有许多优秀的传统节目，如“大劈棺”、“杀子报”、“情探” 及京剧的“梅龙镇”、“四郎探母”等，根据阶级斗争的观点都列为禁戏。认为这些戏宣扬了封建迷信，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一次我和她去悦来戏院（现锦江剧 场），观看了审查剧码，在回家途中我说：“我不主张这样改下去，川剧有近百年传统，戏好不好，主要看有没有观众，不能由我们去定它。比如，去了川戏的大锣 大鼓还叫什么川戏，再去了帮腔就更四不象了。”她似解非解地道：“你几时对川剧有了兴趣，我不知那帮腔起过什么作用？”我道：“在电影上称话外音，在戏曲 上近似心里描写，这也是一种艺术的表现手法。”她怔怔地长久的望着我说：“士隔三日刮目相看，你的进步使人吃惊。”其实是客观的环境在影响我，中国有句古 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生活在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自然受着知识的濡染。因为这些知识不是写在书本上，是渗透于生活的细节里，使你不知不觉受到薰陶。 记的最深的一次和陈泽昆、杨蓓去人民园参观盆景展览，通过实地交谈，我发现他们知识真渊博，无论什么客观物体一到他们眼里，就变得有血有肉，成了活的东 西。

我们一边走，一边听他们评说盆景，此时方知那些看来不起眼的盆盆钵钵，却有天大的学问。陈泽昆惟恐我文化低看不下去，便耐心地向我讲解道：“小黄， 你知道不，盆景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远在唐代就盛行了。它是以盆为纸，以树石为画，通过艺术处理，集中典型地再现大自然。它应用咫尺千里，缩龙成寸的手法，给人以‘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的艺术感染。它把诗情画意融合于盆中，被称为‘无声的科学上的纯艺术产物，而 是艺术和技术的结晶。”

我似明白又不明白地问：“什么是无声的科学上的纯艺术产物，而是艺术和技术的结晶啊？”杨蓓道：“盆景是人工塑造的，首先你必须懂得塑造盆景植物的特性，不是任何树木都可以作盆景的。它的成型是人工和自然的合成，所以是艺术

和技术的结晶。”

我 根据他们的解释，细致地观赏着那千奇百怪的盆景，有的大到丈余，有的小到方寸，其间立着山，飞着峰，悬着崖，在这些山、峰、崖上长着奇花异草，古柏劲松， 老梅翠竹。其形状更是千姿百态，有的盘根错节；有的三弯九拐；有的滚龙抱柱；有的老妇梳妆；有的状如少女披发和雄狮戏球，好看极了。我立在一盆垂直海棠的 水渍盆景面前，不住叫绝称赞道：“你看这一盆多奇多艳，简直可称鬼斧神工之作了。”

“是呀！这是我国劳动人民的独创。造一盆像样的盆景，有的要花上几代人的功夫，时间长达数十百年。所以宋朝大诗人王安石说：‘看似寻常还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陈泽昆点点头道：“此叫桩头盆景。……”

我不明白问：“什么叫桩头盆景？”

他 说：“根据盆景的造型艺术和盆景的主从关系，花工把它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展现孤树姿态的叫桩头盆景；一类是再现林泉山川的叫山水盆景。桩头盆景又分自然型 和规则型。规则型桩有棹拐法、方拐法、对拐法、滚龙抱柱法、三弯九拐法等十种；自然型桩头有立式、卧式、俯式等五种。山水盆景，以水园的，有无水园的，分 为水盆、旱盆、半旱盆。”

我笑道：“那么这盆垂直海棠的盆景就叫桩头规则型的对拐法了？”

“你说对了，看来你真聪明。”他笑着夸我，接着他又说道：“欣赏盆景不仅是一种美的艺术享受，更重要的是从中会学到许多新的东西。”

最后我们来到一巨幅高巍的彩异石壁盆景前，上面画着一匹奔腾的骏马，它迈开四蹄、凌空而起，象征着社会主义祖国一日千里的前进步伐，陈泽昆注目地看了看，笑着问我：“这马画得如何？”

我对国画没有研究，也缺乏欣赏能力，粗略地望一眼，顺口答道：“就像真的一样，是徐悲鸿手笔的临摹吧？”

“徐 悲鸿的手笔不会这样拙劣。”他以手指点画工的不足之处说：“马在跑的时候，尾巴是直的，颈脖是高昂的。这匹奔马的尾巴却下垂，头也没有昂起。说明画家在观 察生活时，忽略了这个细节。再有，这匹马画得没有特色，蒙古马又不像蒙古马，伊犁马又不像伊犁马，河曲马又不像河曲马，说它是川马吧更不像。河曲马高大雄 伟，背部略凹，头颈细而低垂，四肢瘦而蹄大，其特点是善于吃苦耐劳，灵捷勇敢，耳聪性敏，它和蒙古马、伊犁马号称我国三大名马。徐悲鸿的《八骏图》是根据 周穆王西巡时，乘骑的骅骝、绿耳、盗骊、天驹而来，从马的形状看多半是蒙古马体形。”

他振振有词地回答我的提问。我听后仍不满足，又提出新问题：“项羽骑的乌骓马又是什么种类的马？”

“乌 骓是指马的颜色，不是马的种类。”他想了想，以右手叉着腰板说：“照古时的说法，浑身纯黑的叫骊，赤身黑鬃的叫骝，苍白杂黑毛的叫骓，黄色间白斑的叫骠， 黑白相间呈铁青色的叫骢，白马黑脊的称为麟。项羽骑的那匹就是苍白色杂黑毛的，相传这是一匹性情野暴的烈马，虽在营中服役，但放肆起来，将校们都不敢接近 它身边。一天乌骓野性大发，项羽一见走过去，一把抓住长鬃，身子一纵跨上马背，乌骓猛叫一声。撒开蹄子狂跑，一林穿一林，一山过一山，跑得汗水如注，精疲 力竭。这时，乌骓从一棵大树边跑过，项羽一地将树杆抱住，满想把马锁住，谁知鸟骓使力挣扎，人马两不相让，结果是大树让步了，连带一座小山土包，一起被拔 了起来……”

他说到这里，我看见身旁的杨蓓一直笑着默默无言，便突然想到一个听来的故事，立即转个题目问她：“杨姐，有个考试的题目叫 《论项羽和拿破仑》，是怎么回事？”，她脸上荡起一串涟漪一笑说：“我知道了，一个迂腐的举人的笑话，答案是‘项羽有拔山盖世之力，岂有破轮而不能拿乎！ 对不？这个故事讽刺了那些闭关自守，不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国碎派，连赫赫一时，横跨欧亚的绝世英雄拿破仑都不知道。”

说到拿破仑，正好 我新近在图书馆借到了一本《拿破仑传》，想借此考考她的真才实学，便问：“你对拿破仑这个人怎么看？”她想也不想，静静回答道：“马克思说，拿破仑是个伟 人，英雄。现今世界上研究拿破仑的著作有一千多种，几千万字之多。在短短几年的戎马生涯中，他竟从一个炮兵上尉跃居到统率法兰西全军的最高统帅，却使人震 惊！他成功的主要之点，是他毫不讳言地宣称：军事上的独裁，政治上的垄断。对付请愿示威者的最好办法‘是刺刀加大炮。’他对待他的征服者和反抗者，唯一办 法是杀，成百的杀，成千的杀，成万的杀。但是，他却十分爱他的军队和人民，把用战争掠夺到的珠宝和黄金，毫不吝惜地分给他们。所以士兵们都愿意为他卖命， 为他打仗，人民都拥护他，喊皇帝万岁！所以他造就了极盛的法国，给法兰西民族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光荣和战功。”

杨蓓的回答不紧不慢，娓娓道来，举重若轻。对她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我不得不感到由衷的钦佩。

还 有一次，我和杨蓓两人一起，探讨小说的有关写人的一些细节问题，她告诉我：“要想得到好的东西，就要善于能够发掘出来的地方，再进行更深的发掘。虽然每个 人都有耳朵，可是所有的人并不一定会使用耳朵。巴尔扎克一生有句名言：‘拿破仑用剑没有惩服的，我要用笔去征服它。’不过，搞文学的人易于在文字上出差 错，正如会泗水的人，易为水淹死一样。”
我听后，十分敏感地知道她话中的玄机，笑了笑道：“杨姐，你这些顾虑是不必要的，在旧时代写书的人是这 样，易受文字狱之害，可我们现在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人民当家，最民主最自由，怎么会有文字狱呢？出现文字狱的时代，已经为我们党和毛主席 埋葬了，我希望能看到你写的东西？”

她嫣然一笑，摇摇头道：“我不会动笔，胡风的事已使我伤了心，我不想再去招惹麻烦。你知道不，清朝 雍正时，查嗣庭御史去江南主考，出了一句《四书》

上的题：‘维民所止’。有人向雍正报告，说他要杀万岁的头。‘雍’去了头，便是‘维’，“正”去了头，便 是止。雍正信以为真，要将这位御史斩首，幸得文武保驾，免去死刑，黜官回乡务农。还有一个叫徐骏的学士成天饮酒看书，以醉为乐。一天，他正在看书，风吹来 翻了书页，他信笔写道：清风不识字，何以乱翻书？有人告诉雍正，说他骂了大清帝国，说你们满人认不得汉字，却要嚼文咬字。于是雍正大怒，将这位学士诛其九 族。你看，多么吓人！文字太可怕了，当权者要找你麻烦非常容易。小黄，有时我真想改行，可我又喜欢文学，真矛盾。”

看来她可能在“肃 反”中因文字事吃过苦头，直到今日还有那么多的怨恨，而我却忘得一干二净了。对共产党我毕竟比她有情感，便坦露胸怀道：“杨姐，是呀，历代统治阶级，总是 用高压的手段杀戮知识份子，杀戮写文章的人，结果呢？是加速他们的灭亡。这些惨痛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们国家正在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批的作家、 艺术家，决不会出现文字狱。”

她无声地笑笑算是回答。

通过和他（她）们的交往，我深感自己的浅薄与无知，自此更拼命地读书学习。

说 也怪，这时候我开始对政治思想上的进步越来越冷淡，甚至觉得过团组织生活都是负担。党办主任阎凯同志找我谈话，直截了当问：“小黄，我几次催你写入党申请 书，为什么拖着老不写，政治上不想要求进步么？不入党怎么能出任部门负责人？张总十分关心你啊！”我笑着不置可否地回答：“我觉得自己条件还不够。”

“够不够不是你说了算，组织和领导最清楚。”阎凯同志显然不满意了，此后就没有找过我。我也不放在心上，认为做人不是靠党吃饭，有没有本事才重要。我所谓的本事，就是当作家，能把生活中所见所闻写出来告诉读者，以表现自己的爱憎。

此 时，我不断在地方报刊上发表小说、诗歌，影响越来越大，接触的人也越来越多。同年七月《草地》文艺月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风水树》。因它很 有生活气息，国内几家刊物作了转载，上海一家出版社还将它改编成连环画在全国发行，省内一家剧院将它改成戏曲搬上舞台。《草地》文艺月刊编辑部还专门召开 了几次讨论会，就小说《风水树》的主题思想、表现手法、艺术价值作了研讨。年轻人面对荣誉，不可能不产生骄傲。肖青一次认真问我：“小黄，我怎么写不出东 西来？”我笑了笑，不假思索地回答：“你的眼镜还得增加四百度。”从内心说我不是有意刺伤她，认为作家要想写出好的作品，除眼界要宽，思想要活跃，还要善 于在生活中捕捉到闪光的东西。而她总是教条似地看待生活、对待生活，当然写不出东西。没想到我这个回答，却把相互间的关系蒙上一层阴影，想不到一年后，我 回答的那句话竟成了她揭发斗争我的材料：“晓枫，你这个右派分子可恶至极，说我眼镜再加四百度也写不出东西。”

四，麻烦事接踵而来

中 国是个封建一统的家长制独裁国家，大到社会小到家庭，是君权父权占居着统治地位，不存在着什么民主自由。大家长小家长爱的是听话顺从的乖孩子，决不喜欢有 独立思想与人格的捣蛋娃娃。对不起，你想要当官或提拔或仕途一路风顺吗？首先得做百依百顺的小孩。不知怎么搞的，我有了文化知识后开始我行我素的不听话 了，人生麻烦事也就来了。不知是食品公司在调拨上出了差错，还是供应本身就不足，成都市买肉出现了排长队的现象。我作为党的喉舌向市委发声了，在内部“每 日评报”栏上写道：“老百姓站在寒风中买肉排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作为党的报纸不去过问一下。为人民服务不能只是一句口号，应该是具体行动。”

当 日下午，总编辑张烈夫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谈话。我推开门，他从办公桌上的档堆里抬起头，久久地盯了我一眼，似笑非笑有点冷峻地说：“小黄，不要骄傲啊，尾 巴是翘不得的，你说说，你写这个意见的动机是什么？”我道：“很简单，过去买肉从不见老百姓排队，现在排起了长龙你不觉得人民辛苦吗？”他哈哈地笑出声， 说：“你真幼稚，排队买肉是好事嘛！正说明人民收入增多了，购买力提高了，生活改善了，吃肉的人多起来。过去为什么不排队？因为没有钱，买不起肉。”我想 也不想地回顶道：“人民生活提高了，物资供也应该跟上去……”他吐口烟圈，皱皱眉头，打断我的话道：“物资供应为什么跟不上？原因是现在农村生产方式太落 后，要是我们农村像苏联的集体农庄，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提出农业合作化运动。只有改变了生产关系，才能提高 生产力。生产力不提高，物资的紧缺问题就解决不了。”

他是个小知识份子，又是“三八式”干部，讲起大道理来一套一套，你只有听讲的份没 有回嘴的地方。说到这里，他略微沉思片刻，把话锋一转道：“你也承认党报是党的喉舌，那我们一言一行就要代表党的利益说话。纵然我们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工 作上出了偏差，报纸也不能去瞎批评。你要记住，我们党和毛主席说的一句话：‘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任何时候都是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要看 到光明，不要只看到阴暗。你是工人出身，调你到知识份子成堆的报社来，就是要你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意识，怎么你却有点变调了？”

面对他的这些说教，我能说什么呢？真难以挑出他话中的漏洞与瑕疵，也许这就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概念化与公式化的定论模式。可它一直起到主导作用，成了驳不倒的“真理”。我难以反驳也无法反驳，只能在思想上不予认同。

不 久毛主席的《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开始层层往下传达，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同志多次在省府礼堂举行报告会，宣讲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 针。他在报告中多次批评指责文艺界在创作上所存在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问题，以及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不正之风。省文联也多次召开座谈会，就如何 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作为青年作家和成都日报文艺组编辑、记者的双重身份，多次参加了这些会议。到会者无不对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 概念化”表示反感和厌恶，主张要无限地扩大写作题材，

文学艺术不是政治图解，人物要有多面性，切忌歌功颂德与高、大、全的形式主义的东西。此时，苏联作家 奥维奇金的报告文学“在区委平常的日子里”和小说《拖垃机站长与总农艺师》等作品，不断涌向中国，使年轻的读者眼界为之一新。接着从北京掀起一场“文艺作 品要干预生活”，“揭示生活阴暗面”的主张，常见于报章杂志，成为一个时髦的词语。

中国作协机关刊物《人民文学》主编秦兆阳在《人民文 学》杂上上发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创作的广阔道路》一文，在文学创作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与主张。1956 年夏，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刘白羽同志也 来到四川，号召作家要走出“公式化、概念化的框框条条，笔下要有强烈的时代感”。4 月，《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刘宾雁有震撼力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 上》，7 月又发表了他的《本报内部消息》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举国上下一片叫好声！

政治气氛越来越宽松，阶级斗争越来越被淡化，科学界、文化界、艺术界出现了空前的活跃。通过有影响的《译文》杂志，苏联大作家爱伦堡的《解冻》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传播。这一切态势表明：沉闷多年的中国的文艺界，正在复苏，正在解冻，预示着一个百花盛开的春天即将莅临。

此 时我已和省文联一批青年作家、诗人混得烂热,有的还成了相交至深的文友。《草地》文艺月刊的编辑茜子、遥攀，《星星》诗刊编辑流沙河，创作辅导部电影组的 丘原，均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同时，也结织了储一天、石天河、李伍丁、方赫和业余作者沈镇、华剑、万家骏等人。我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聊天或探讨文学的未来。 在这股强大的思想解放潮流的冲击下，茜子、瑶攀几次向我提议能否写一篇“干预生活的作品”？当时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反党的行为，相反认定是响应党和毛主席 的号召，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经过短时间的酝酿思考，把过去有过的生活串联起来，赶写了一篇以第一人称为主体的近似写实的小说《给省团委的一封信》。小说 发表在《草地》文艺月刊 1956 年的 10 月号上，很快得到了一片喝采声，被不少读者誉为“省内《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有人把这篇文 章送给了张烈夫，他看后找我作了一次很认真交谈。他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不停地抽着烟，呼呼地抽着鼻子，想了想说：“小黄，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我也知道 你所写的是事实，但那是极个别的事实，怎能普遍化？我们党的干部政策是‘是用人唯贤，决不是用人唯亲’。比如，你有能力不是调来报社工作了吗？不能颠倒是 非啊！”

我平静地回答道：“张总编，干预生活可是党中央提倡的嘛！我作为报社的编辑、记者应该回应呀！”他楞楞地望着我问：“党中央提 倡的，红头文件在哪里，我怎么没有看见？”我笑了，举出报刊上一些文章，他听后也不坚持仍好意提醒我说：“我不干预你创作自由，我还是建议你写过去那些文 章为好，像《风水树》啦，《生活在前进》啦……”我不同意道：“那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政治图解”张总编显得有些不耐烦说：“好啦好啦，我不和你争论这些问 题，谈点其他的吧。”

恰好，此时报社因一封群众来信，反映成都市某个小学一位女教师，因与校长在

工作上发生顶撞，这位校长自恃姐夫是位 官员，便私自组织斗争批判会，斗这位女教师。女教师想不通在一个晚上吊死在寝室里，有人写成稿件分别投给川报和我们报纸。可是我们报纸负责处理此事的记 者，因调查失误未予登载，川报却抢先登了。于是，引起全报社哗然，我一时冲动，在“每日评报”栏上，写出直问总编辑火辣辣的文章：“一个小学教师被迫自 杀，为什么我们不敢披露，川报却刊登了。请问：成都日报社报纸的党性在哪里？怕什么，有什么怕的？这是不关心群众疾苦，典型的官僚主义！”

在 我开炮后不少人跟进，各种意见贴满了几大版。我感到十分扬眉吐气，一些支持我的人，私下竖起指拇说：“小黄，你真勇敢，是个闯将！不愧是工人阶级。”但我 发现张烈夫总编对我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突然严峻森冷，满脸秋霜，见着我再没有一点笑容，像个路人。应该说这是个危险警讯，可我不在意，认为 自己做得对，是在按毛主席的话办事，是忠于党忠于革命的表现，有什么怕的？不知道中国是个传统的封建社会国家，新中国仍然是个旧瓶装新酒的独裁帝王体制， 单位领导仍是你的衣食父母，一个敢于反抗父母的“儿女”，当然会触霉头。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二十八）

第十二章不平静的四川文坛

忠诚不等于忠心，傲气自然不是傲骨。自古文坛有才华的年轻人，没有 不狂妄的。如果生逢明君，顶多被申斥几句，或贬官戍边，几年后又回归朝廷效劳；如果遇上暴君，恶君，不死也得脱层皮。二十世纪中国知识份子的不幸，就在于 他们没有遇上好皇帝。尽管他们忠诚于统治者，傲气于世人，但仅因为恃才狂妄，结果埋葬了一生。

一，文学创作只能歌功

小 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发表不久，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生活在前进》，收到了一笔近五百元人民币的稿费。１９５６年的五百元人民币 是笔巨款，那时大米每市斤大约五分钱，猪肉每市斤不足八毛钱，一间二三十平米的住房也就五六百元，可没人去买，认为那东西是累赘丶把柄，共产党治下的国家 拥有房屋田产是罪恶，社会主义社会讲平均，操那份心干什么？我心里最羡慕的是手腕上有只好表，罗马表时兴贷，便花了一百八十元钱买了一只。四川出版社编辑 杨干廷没有表，借去两百元也买了一只。他比我年长几岁，长于编写连环画脚本，在市郊西城乡体验生活认识，自此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后来也成了老右，送到西昌 会理改造，１９６１年偷跑回成都曾和继母来旺苍劳改队看望过我，１９８０年落实政策回到机关后，又是我婚姻介绍人，不知为什么后来暴死在大街上。

由 于我有了短篇小说集问世，又有《给团省委的一封信》的名声，很快成了省里有点小名气的青年作家，常常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大多数是求教寄稿件征求意

见，真实 目的是希望帮助他能在报上发表。五十年代青年热衷于出名，不太看重金钱与物质享受，总想为这个社会、国家做点什么？是理想的一代，狂热的一代，也是幼稚不 成熟的一代。共产党说什么就信什么，毛泽东叫什么就做什么，纯洁无尘没有自我，更无鉴别与判断能力，故为后来的人生构筑了悲剧的色彩。另还有不少来信关心 小说主人公刘小云的命运：他上诉后团藉得到恢复没有？官僚主义李运区长受到上级批评没有？投机专营的方顺风假面具被揭穿没有？不难看出他们把小说中的人和 事视为真实的事情，不知是艺术的虚构，才那样关心结果。出于读者和自身名利的意识，我开始考虑写续篇。

这一年十一月，四川省文联召开了 第二次文代会，我作为成都市正式代表应邀出席。在这个会上，四川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川省优秀短篇小说集《深山初雪》，我的《给团省委的一封信》被收其 中。省文联党委负责人之一、创作辅导部长李累同志，在代表省文联党组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不但肯定了我的创作思路，还将《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列为四川 解放以来最好的一篇小说。为此，我成了会议的明星人物，也成了争论的焦点人物。在大会分组讨论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是不同意我创作的思维与所写 的题材，他们认为文学创作必须遵循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应以颂党之功、歌党之德为主，要大写特写社会主义建设中主流的东西。主流是什 么？英雄人物、模范人物和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刘小云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存在，是它是非本质、非主流的东西，不能去表现它。党永远是伟大的、正确的、光荣 的，如果有缺点错误仅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支持我的人认为文学是人学，不是政治宣传品，作家要面对生活、面对现实，主张打破条条框框，写真写实， 注重人性，既不歪曲生活也不能粉饰生活，社会生活中有什么就写什么，不能回避。这两种意见在会上各不相让，有时争得面红耳赤。

我自然是 第二种意见的代表，认为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是文艺工作者的天职，是对人民的负责，对党对革命的忠诚，回避矛盾，粉饰生活，是不敢面对生活的伪君子！我还 说，人有多重性格，纵是胸前戴满奖章的英雄不等于灵魂品质是高尚的。另外，在文学的典型性上争论也很激烈。一种意见认为，典型就是一个，在特殊环境里的人 与事就是典型。反对者认为典型是集中的表现，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没有普遍性和广泛性就不是典型。所以在现实中存在的某些缺点、错误是非本质的东西，不具 有典型意义，作家、艺术家不应该去揭示，如要坚持发掘表现，就是有意地歪曲生活。不过这些争论，当时仅停留在学术思想的理论上，没有上纲上限，不属于阶级 立场问题。后来毛泽东才定调说“百家争鸣只有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自此“反对歌功颂德，打破条条框框的人”成了万劫不复的“老右”。

我 坚持主张写自己熟悉和看见的东西，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管它什么主流与非流，只要有冲动就写，走苏联报告文学家奥维奇金的路。于是着手思考《给团省委的一 封信》的续篇：刘小云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的结论是：当一个国家体制构建在党的一元领导之下，必然造就成千千万万的官僚主义者。而这些占据着一个单位、 地区领导权的官僚主义者，在决定任何一件事情时决不会按制度或法律去行事，总是以自己好恶、爱憎去处理。因此，在官僚主义体制下的刘小云式人物，永远是个 失败者的悲剧性人物。事实也是如此，任何上一级党委

与政府在处理下一级党委与政府管辖范围内人民的申诉，都是层层下转人民来信，这等于把申诉人交到老虎的 口头。团省委在收到刘小云的申诉来信后，也必然按此程式如法炮制。为此，刘小云的问题不仅未获得解决，反更一步激化了他和李云成的矛盾，当然带来的只是更 大的打击。于是，他不得不寄希望于中央写，但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了起来。一夜，他翻窗潜逃，跑向北京，告状去了……

在两个续篇《向党反映》和《上北京》落笔前夕，时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著名女作家丁玲和她先生陈明乘火车经宝成铁路来成都检查工作，李累部长把我作为四川有前途的青年作家介绍给她。丁玲女士看了第十期《草地》文艺月刊上我的那篇小说后，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

丁 玲，原名蒋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1923 年进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1927 年 发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1930 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这时期她创作 的《水》、《母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实绩，1933 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逃离南京转赴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在陕北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 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并先后创作《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等解放区文学优秀作品。1948 年写 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被译成多种外文。1951 年获史达林文学奖金。中共建政后，丁玲先后担任文艺界多种重要领导职务，并在繁忙工作之余， 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和评论文章。

我能为她召见当然感到荣幸。那天，她穿着一身浅灰毛料连衣裙，略施粉黛，足下丝光袜、高跟鞋，使年近 五十的她，显得容光焕发，光彩照人，要不是身段矮胖，还以为才三十多岁哩。她注目地打量我一番后，便毫不掩饰地说：“你有生活功底，文笔也流畅，在文学创 作上有发展前途，但你的文化知识和艺术技巧还很不够。你要大量读书，加强学习，不过……”说到这里她有些迟疑，祥和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似乎心中有什么难 言之隐，沉默会儿后才继续说：“我建议你暂不要写这种题材，写什么，看看再说……”她欲言又忍的表情，使我猜测好久好久。半年后她和文坛另一名宿将冯雪峰 成为右派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1958 年又受到“再批判”。并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受迫害并被投入监狱。自此我才明白：中共的文 学艺术创作只能歌功颂德，决不准你说三道四，要么闭上你的嘴巴。

回家后，我把受丁玲接见的事告诉身怀六甲、即将分娩的妻子，她听后很是高兴，说：“你不要骄傲，按照前辈的话去做不会错。”

这一夜，我在日记上写道：“青春，不只是秀美的发辫和五色的衣裙，在青春的世界里，沙粒会变成珍珠，石头会化作黄金。为什么青春有这样大的力量？是人民把我栽培，是党把我开掘。我在想，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二，小楼相聚之祸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千古皆然。

在 省文代会由于我表现得特别活跃，又是持“文学作品要干预生活，敢于揭露生活阴暗面”的实践者，自然结识了与我观点相一致的文友。第一个是刚从北京学成归来 的流沙河，他在会上作了有关创作的专题发言。远在 1951 年在驷马乡水碾河村土改时，就在《川西农民报》上读到他和茜子合写的连载小说《牛角湾》，后又知 道这个小说在报上受批判，说它“不真实，歪曲生活，丑化了农民形象，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去年我还在《四川文艺》上读过他新写的一个短篇《窗》， 认为这篇小说构思新颖奇巧，给人不少想像空间。现在我们再不是读者和作者的关系，是平等身份的文友。另外，他和我都是团员，在政治上倾向进步，不象丘原、 茜子、遥攀见着面就火冲冲的骂娘、骂文联领导。后来才知道他们在“肃反”中被重点审查，“隔离单关”达半年之久，心中积怨太多太多。此时茜子已结婚，爱人 叫陈秉先，很漂亮，是一所中学的校花。他们家住在距文联和报社交叉地带的宽巷子街，一座小院的楼上有两间房子。茜子和丘原关系特好近似兄弟，我去茜子家作 客每次他都在场，后又加入了流沙河，形成了一个“文艺小沙龙”。

茜子，本名黄狮威，四川内江人，出身于书香世家，母亲是地方上有名的书 法家，父亲曾任过国民党军官训练团的团长，后迁居金堂县城关镇，自幼与流沙河要好，1949 年两人攻读于四川大学，与邱原是同学。三人思想“激进左倾”， 常在报上写文章嘲骂国民党。茜子曾嘲骂国民党反动派独裁专横下的中国是“家家朱门，户户饿殍”。1950 年春三人均投笔从戎献身革命，离开攻读的四川大 学，率先参加解放军，后被西戎（《吕梁英雄传》作者）发现了他们的创作才华，纷纷调入川西区军管会文艺处（四川文联前身）。茜子先后与西戎、流沙河等合写了较有影响的作品《秀女翻身记》和《牛角湾》。1953 年并省，三人同时转入四川省文联，邱原、流沙河在创作辅导部，茜子出任《草地》文艺月刊编辑。

三 人长相各异，性格也各异，茜子高高大大结结实实，说话时老喜欢看着别人眼睛，烟瘾特别大，一杆接一杆下停地抽。他生性直率，情感多于理智，嘴上从不加锁，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是个典型的“文人风流大不拘”的风流子弟，爱人陈秉先称他是“莽子”。邱原身材魁悟，大头大脸，两目闪烁有神，似乎能看到地下所埋藏的 东西，那直达耳腮青乎乎的胡楂，又显示出男人特有的阳刚之气，乍看去像个东北汉子，其实是个道道地地的成都人。他有独立见解，从不人云亦云，言谈举止虽比 茜子理智，但也是个性情中人。他是文联创作辅导部电影组组长，很有创作才华，无论小说、诗歌、散文都在行。他的电影文学剧本《青蛙少年》正在《草地》上连 载，文笔十分不错。流沙河长得清清秀秀，肢细褪长，小头小脸，无论行与坐总是钩着头，像有思考下完的问题。他是个天生的作家诗人胎坯，喜欢读书、喜欢聊天 、喜欢吸烟，说话幽默风趣，写出东西清隽流畅，读起来有韵味，但性格怯懦易于冲动，有点瞻前顾后胆小怕事。

他们三人不仅是同窗好友，还 是趣味相投的至交，但在共产党阶级斗争的熔炉里一个时候却互为仇敌。主要是在 1955 年“机关肃反”中流沙河曾作为“打虎”极积分子，揭发过两人的“反党 言论”并审查看管，直到去年底省文代会

后才和解，当然是流沙河一句“对不起”的致歉。这些恩恩怨怨的往事都是茜子告诉我的。

那天开完座 谈会天色已晚，我在街上随便吃了点小食，便直径去茜子家串门。他住在距我们报社不远的一条叫宽巷子街一座小独院的二接上，上楼未进门，就听得茜子莽声莽气 地在说：“现在文艺界风气很不正，不论写什么先得讲党性主题，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把艺术变成说教的东西，妈的，连国民党都不如，哪里还有点创作自由 啊！”邱原接过话头道：“文学艺术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始于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活》，如果不打破这个框框中国永远不会有创作自由和真正 的文学作品。文学根本没有党性不党性的问题，它只有人性。党性强化教条，人性润育艺术。《三国》《水浒》《红楼梦》是靠党性写出来的吗？是‘讲话’能解释 得清楚的吗？再有，文联和作协本应是作家艺术家的群团组织，不是上下级关系，更不是埋葬思想自由的地方。而现在的作协、文联是共产党的衙门，是整人和强制 改造人思想的地方。思想是不能改造的，是越改造越坏的。思想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就像天赋人权一样。”

人熟了，用不着客气，我推门而 入找个板凳坐下，他们见我并不回避继续侃侃而谈。茜子突然想起什从转头问我道：“晓枫，听说肃反你也被审查过是么？我就想不通，我和邱原被审查是骄傲自 满，爱发牢骚，你可是工人啊！”我笑笑道：“可能是受方刚老师的牵连吧？”茜子说：“方刚可是个好人，根本与胡风没有关系，一个老实人，活活被他们整死 了。我与邱原被搞了半年，流沙河还看管过我们。现在他觉悟了，所以才和好。”

“说人人到，说神神到”流沙河同遥攀笑嘻嘻进来了。“好热 闹，真是客走旺家门啊！”遥攀穿着身土里土气的衣服，不停地吸着手里香烟，一坐下冲着大家说“正好，我准备筹办一本同仁刊物，名称叫《笑》。笑是幽默，笑 是投枪，笑是匕首，鞭挞丑恶，揭示黑黯，在位诸位都是发起人和撰稿人，不过没有稿费。”接着他当众把我写的一篇小稿念了出来：“笑，这是人真挚的感情流 露，是不可非议的东西。但虚伪的笑使人憎恶，真诚的笑使人感到温暖。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借笑来掩盖愚昧，有的人用笑来附和世态，有的人借笑来表示自己有 学问，有的人用笑来掩盖内心的空虚，这是对笑的亵渎，对笑的伤害！笑是什么？笑是生活的浪花，时代的旋律；笑是青春的涟漪，生命的幽默……怎样，不错吧？”

流沙河不轻易表露自己的观点，对什么事都要权衡一翻利弊得失，他不冷不热淡淡地道：“我估计宣传部不会批准你《笑》的刋物吧？” 茜子陡然站起身关上门窗，火冲冲地道：“管他批不批，办起来再说。沙河，我们在川大读书时，学校里那么多油印刋物谁批过？大不了再来个肃反关过三月半 载！”邱原道：“事情没那么容易了，胡风问题就已经搞少错，抓了那么多人，现在放不是关不是，听说有点难办。共产党不是讲民主吗，胡风公开写出对文艺创作 的公开意见有什么错？什么罪？”遥攀审慎地插上一句：“听说公布胡风那三批材料上的编者按，都是毛主席亲自写的，我看这个案翻不了。”

屋 里突然一遍沉默，大家心里像了块石头，重重的沉沉的，不知如何回答？稍

停片刻，邱原十分认真和有信心地说：“不管哪个写的，事实就是事实，真理就是真理， 我敢肯定，四十年后胡风反革命一案定会翻过来。这是一个冤案，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是无产阶级专政体制所致，也是毛主席帝王的作风，他老人家听不得一点不 同意见。”茜子不仅附和邱原的观点，还作了新的补充：“对，毛主席就是个帝王，他自己写的《沁园春》就表白得十分清楚。他独断专横，指鹿为马，说高饶是反 党集团就是反党集团，说胡风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我认为党报上刊登的那些光明面全是假的，阴暗面才是今天整个社会的真实。领导无论作什么报告总是说‘成绩 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的关系’。1955 年肃反整错了那么多好人，成绩还是主要的。共产党最大毛病是错了不认错，耍霸道，党权、军权 、文权全都管完了，作家、记者、编辑，全都是傀儡。”

我静静地听着他们的对话，感到又新鲜又惊奇。新鲜，从来没有听说过；惊奇，似乎有 点过头。当时我对毛泽东还很迷信，认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全是下面执行政策人所发生的偏差，正如俗话说“经是好的，只是念经的和尚念歪了”。我虽不完全 赞同，却又不好出面阻止，听得邱原继续说：“听说共产党明年要开展整风运动，主要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我认为官僚主义产生于无产阶级专政制度 本身，不是作风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都是终身制度，必然造成个人崇拜。西方国家为什么没有个人崇拜，因为总统不但是民选还有任期。领袖终身制会造成许 多悲剧，匈牙利的悲剧就是例子，那些上街的人都是受历次政治运动迫害的人。我们中共建政后不断搞政治运动，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反胡风，仅反胡风一案 全国就有几百万人挨斗争受审查，谁心里不是一肚子气？布达佩斯的知识份子上裴多菲俱乐部原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在拉科西统治下知识界一片荒凉，又不准自由讨 论任何问题，逼得他们去那里，因为只有那一小块地方有民主自由。”

匈牙利事件，布达佩斯市中心的斯大林像被拉倒

在一侧旁听的陈秉先不知道这些天下大事，便仰面好奇地问他老公：“什么是裴多芬俱乐部？”茜子毫不思量，脱口而 出道：“我们家就是裴多芬俱乐部，如果中国也发生匈牙利事件，我第一个举着旗子上街！”他的话有点语惊四座，大家愣住了。流沙河即忙岔开话题问我：“晓 枫，听说你写了《给团省委的一封信》两个续篇？”我点头承认。遥攀道：“我建议你把‘肃反’如何整人也写进去，这会更有代表性。写好后立即给我，争取发在 五七年第三期《草地》月刊上。”我道：“别急，润润色再说。”流沙河虽然年龄小于茜子、邱原，在言谈举止上不那么冲动，此时他极为平静地说：“晓枫，你说 得对，一篇好文章总是千改万改，我倒同意文艺不过问政治的观点，一个作家写什么党不要去多管，文学就是文学，政治就是政治，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我 认为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是我们国家当前最根本的问题。巴金、茅盾，四九年前写了那么多好作品，现在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如果共产党再继续管文艺，领导 文艺，到时中国只有口号，书架上没有作家的书了。”丘原喜形于色立刻表态道：“我同意沙河观点，文人应该自己管自己，全国作协、四川作协的领导，应实行民 主选举，把党棍、打手赶出文坛。”

烟浓浓雾蒙蒙，小楼春风祸重重。中国不少民谣深含哲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四十多年后才知道，这 一夜的瞎侃经一个“觉悟者”的告发后，竟成为茜子为首组织“裴多芬俱乐反革命”的铁证，先后两次判处徒刑二十年，致使邱原于 1969 年惨死在成都市大监的 监狱，使我被“开除公职，强制劳教”引发二十三年的牢狱岁月，这里不得不作一个“特别介绍”。首先看一看茜子 1980 年的两张“平反”《判决书》：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80）刑申字第 165 号

陈谦。原名黄狮威，男，四十九岁，四川省内江市人。原任四川省文联《草地》编辑部编辑。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成都市西城区第二人民法庭 1957 年度法庭刑二字第 011 号刑事判决书以反革命罪判处陈谦徒刑五年。宣判后本人不服。提出上诉，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经本院 1958 年度刑上字第 11 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现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陈谦参加文艺界反革命集团，组织“裴多菲俱乐部”。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行不能成立。据此，本院依法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西城区第二人民法庭 1957 年度法庭刑二字第 011 号刑事判决书

和本院 1958 年度刑上字第 11 号刑事判决书；

二、对陈谦宣告无罪。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章）

一九八 0 年六月十四日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80）刑申字第 055 号

陈谦，原名黄狮威，男，四十九岁，四川省内江市人，家住本市西安路一巷十号，原系四川省磨床厂就业人员，现在阿坝监狱劳改。

刘汉鼎，男，三十六岁，陕西省汉中市人，家住本市西安路一巷八号，原系成都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临时工，现在芙蓉煤矿就业。

缪文裕，男，三十六岁，四川省灌县人，家住本市小南街一百七十五号，原系成都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临时工，现已刑满释放。

一 九七二年二月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金牛区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成都市金牛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以（72）成金人保刑字第 4 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邱漾 （已自杀死亡）、陈谦等人犯叛国投敌罪，分别判处首犯陈谦徒刑十五年；刘汉鼎、缪文裕各徒刑八年，此外还认定张天秀、陈秉先、白翼、张雯、缪文华、肖维刚 等人参与犯罪活动，但因罪行轻微，分别予以训斥和批评教育。判处后，陈谦、刘汉鼎、缪文裕等人不服，曾先后提出申诉。

现经我院复查审理，原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属不当。据此，本院依法判决如下。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金牛区公安机关军事管管制小组，成都市金牛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72）成金人保刑字第 4 号刑事判决书；

二、对陈谦、邱漾、刘汉鼎、缪文裕及张天秀、陈秉先、白、翼、张雯、缪文华、肖维刚宣告无罪。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章）
一九八 0 年六月五日

茜 子被判刑劳动改造五年刑满后仍不准回家，强制留场就业“继续改造”，他实在忍受不住那非人生活，于 1968 年趁“文化革命”大乱的时候，准备逃跑出

国另寻 人生出路。他从劳改队跑出来找上当时被开除公职、自谋职业度日的邱原想办法，恰好半年前有位邱原任编辑时改发过稿件的一位老相识，在“文革”中举旗造反， 一下成了新疆某造反兵团头目。发迹后从新疆回成都探亲得知邱不幸的遭遇，邀邱原去新疆被婉拒，于是留下两张空白介绍信说：“只要你愿意来新疆，我们任何时 候都欢迎。”现在茜子想逃亡，出于友谊和同情，邱原将其中一张空白介绍信给了茜子，另送一百多斤粮票和几百元人民币的路费。茜子企图到新疆后出境未果，又 转到上海想泅渡到公海上爬上外国商轮，当然更是痴心妄想，最后潜入山西在一处煤窑挖煤度日。不久全国对茜子发出了红色通缉令，很快将他抓捕归案，邱原作为 支持“叛国集团”的策划人也啷当入狱。公安部门立即对他采取刑讯逼供和诱供，邱据理抗辩。只好将它单囚一室，并经常侮辱其人格。邱原是个天生的斗士，有 “勿自由毋宁死”的风范。狱吏曾胁迫他说“只要你交待出同伙，我们可以立即释放你，如抗拒不交待只有死路一条。”在生与死的两条路面前，邱原选择了护卫朋 友死的绝路。

在小监里你想死也死不了，没有毒药，没有利器，没有绳索，连裤带也被狱吏收去，防范极严，每隔两三个小时就有人巡视。为了 保护朋友，他立意翻新将吃饭用的一只竹筷在地上磨尖，然后在一个风雨如磐的夜晚，他盖着被子躺在床用手摸着股动脉，咬牙对准跳动的血管举起磨尖的竹筷用力 插去，插进去后再用力不停搅动，直到鲜血汩汩外流时才蒙头睡去。第二天早晨待狱吏发现时，他仰睡血泊中已悄然长逝。后监狱通知他妻子张天秀来领取遗物，那 床血迹浸透的被盖重达几十斤。张天秀拿着血被去锦江河冲洗（因家里没有自来水），使半河水都染成了红色。这样的死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一个意志怯懦的人 决难以做到，不禁使人想起宋李清照的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二十九）

三，不是时候的降生

春节前夕报社工作特别忙，赶发《锦水》两期稿件，给重点作者写信约稿。省 文联有开不完的座谈会，我是记者与作者的双重身分，几乎每次会都在场，晓枫两个字频频出现在报刊上。仅管妻子临产日近，也没有抽出时照护，好在继母帮了我 不少忙，几时送她到包家巷妇产科医院去的时间也不清楚。一天我开毕会回到报社，坐在桌边忙着改稿，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使我放下了手中红笔，即拿起听筒问： “喂，哪里？我就是。……”

话筒里传来一个清晰的姑娘声音：“向你报告个好消息，你爱人为你生了一个千金，九磅重，胖极了，好乖啊！……”我放下话筒，桌上日历标明的时间是：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１日，手腕上表的指针是十六点正。隔桌的组长肖青，向我祝贺道：“小黄，做爸爸啦？”

我点头，笑着应声：“是的，一个女孩。

“男女一样，切不要有重男轻女的封建主义思想。”她见我仍在处理稿件，马上发布命令道：“还改什么稿，马上到产院去，这时你妻子多么需要你。”

我 向总编室告了假，登上自行车，喜滋滋地向妇产科医院奔去。冬天的寒风扑打着我的面额，冷溲溲的细雨直灌衣领，我只感到车速太慢，可双腿的运动已到了最高的 极限。对一个 20 多岁年轻人来说，做爸爸似乎为时过早了一点，感到自己还没有脱孩子气哩！一月前我曾问到妻子：“她落了地是不是就会叫爸爸？”妻咯咯一 笑，捅我一拳道：“哪儿那样快，至少一岁后才会叫爸爸、妈妈。”我搔搔头，想了想，望着她那圆滚的腰肢又问：“他怎么知道我是他爸爸哩？”妻瞪我一眼，憨 嗔地道：“傻瓜，说些什么，别人的吗！”我大笑起来，捧着她的头热烈地吻。疯狂的爱，疯狂的情，欲张臂紧紧搂住她。妻爱怜地推我一掌道：“还是那样轻狂， 二天孩子会笑话你。”她嘴上虽这样说，却柔顺地倒在我怀里，红着脸悄声道：“近来没满足你，怨我吗？”我把嘴唇留在她光洁的脸蛋上，轻轻摇摇头说：“我使 你受累了，你才该怨我。”她深情地咘咘一笑：“快啦，孩子生下来就好了。”

我架上车进了产院，见妻安稳地睡在洁白的床褥上，脸色潮红， 微闭双眼，疲倦极了。我不愿惊动她，进门后悄悄地坐在床前木椅上。她一下敏感地睁开眼，见是我，笑了，兴奋的泪水落了出来，从被窝里伸出无力的手。我把她 的手举起放到嘴边轻轻地吻了吻，安慰地道：“好好休息，我每天都会来看你。”她笑了笑眼里全是泪花，但这是幸福的泪花，爱情的泪花……

自此，我每天按时到产院探视，每次来都把继母熬好的仔母鸡汤盛在个瓦罐里，惟怕鸡汤冷却再用厚厚的绵布包裹着瓦罐，然后坐在床边将热腾腾的鸡汤，一勺一勺地喂给她吃。这真诚地关爱，常使护士小姐们羡慕不已，偷偷夸我说：“你真好，典型的模范丈夫。”

按 照产院规定：初生婴儿七天内不能接触院外人员，以免引起感染。每到婴儿喂奶时间，便响起电铃，催离探视家属。我连续三天也没有看到孩子，心里痒滋滋的，妻 子看出我的心思，给出了个主意，叫我听到电铃响时暂时离开，待一刻钟后再来到产房，如果护士问就说忘了钥匙。这个办法终于使我看到了孩子。那是什么孩子 啊！既不会叫爸爸，也不会叫妈妈，裹在雪白的围布中，两眼紧闭，头和脸红红的像个血球。对孩子未来，我没有过多的考虑，因为一切有党和毛主席早为我们安 排，一定比我生活得更幸福，不会去做学徒当童工，更不会忍饥埃饿受人期凌，她们是祖国未来的花朵呀！一路阳光，一生温暖，因为有党和毛主席呀！

当夜，我在日记中写道：“生活是这样的美妙，社会是这样的和谐，国家是这样的光明，领袖是这样的伟大，我们孩子的命运，我们孩子的前途，党巳经给她安排好了，用不着我们做父母的去操心。”

半 月后她离开产院回到家里休养，家一下热闹起来，也一下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奶嘴、奶瓶，尿布、尿片，哭声、笑声，把屋子装得满满的。我一天跑进跑出，累得 满头是汗。要不是有继母调教，不知乱成什么样。在这段时间里我根

本无法写小说，连文联的会也很少去参加。我每天下了班就往家里跑，家像块磁石，深深地吸住 我。她不但给我欢乐，还给我充实。此时，我才知道人为什么要有家？家是力量，责任，港湾，绿地，缺什么她就是什么！当孩子刚睁开眼，我就跑到百货公司去买 玩具，东挑西选，买回一个当时最时兴、价格最昂贵的机械爬娃。妻一看笑着批评道：“你这个当爸的，连玩具也不会买，这是一两岁孩子玩的。”

我咧咧嘴辩解说：“我和她一起玩。”妻无可奈何地一笑说：“我又多了一个大孩子啊！”

孩子满月后，我抱着她逗玩，只要把爬娃发条一扭，爬娃便吱吱地蹶着屁股，在桌上爬来爬去，吓得孩子又哭又叫。妻在一旁道：“怎样？你这个大孩子一人玩吧。”

我佯装生气道：“不，我要和她一起玩，玩到她长大成人！”

妻咯咯笑了，笑得好开心。可我没有陪着孩子玩，更没有陪她玩到长大成人，还不到一年时间就负系离蓉，去到魂飘万里的天涯海角，自此东西南北，天各一方，仅留下一个一个带血带泪的回忆，“梦里不尽怜儿意，多少春来没泪痕。”

十 年后（1966 年）一天，我被关押在四川省第四监狱，忽然看见分队长吴家恒，带着孩子经监门，突有所感，信笔写成此诗：“你是我生命的火花，你是我留下的 希望；你是情的凝结，你是爱的奔放……屈指算，年已近 10 岁，还没有见过爸爸的模样。不是我忍心把你割舍，是命运要这样强作主张！不知你现在在哪里？农村 、城市、学校、工厂……你不要自暴自弃，你不要悲观失望；你应该刻苦求知，你应该发奋图强！没有知识——愚昧昏沉，没有知识——难把帆扬！尽管我被知识毁 灭，罪在所谓反党文章；但我仍然热爱知识，仍坚持学习，不负流光！那管千百次批斗打击，那怕遍体的绳痕鞭伤。决不向专横强暴低头，生命呵！多么需要知识的 雨露、阳光……因为历史奖励的是勤奋，公正的法律是保护善良！我不相信恶棍们逍遥永远，更不相信自己终身禁锢铁窗！孩子，希望你好好学习，孩子，希望你天 天向上！你是革命新的血液，你是祖国未来栋梁！飞吧，迎着暴风骤雨，管它千尺狂澜还是万丈恶浪！只要插上知识的金色翅膀，就会在宇宙中自由地飞翔，飞 翔……”

四，访问巴金笔下事

位于成都总府街的省府大礼堂，解放前叫紫罗兰花园， 是当时黄金和外币市场。中共建政后一段时间叫五一茶社，因公开播放美国之音，被人民政府取缔收归国家，后改成四川省人民政府招待所，作为接待外宾和重要人 物之用（现名皇冠假日饭店）1957 年 3 月，开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著名作家巴金和浙江省副省长宋云彬先生来成都视察就住在这 个招待所里。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去采访他。

这是巴金幼年时的全家照。左三是外婆抱着巴金。右三是巴金的母亲。

在去前我去省图书馆查阅了有关资料：巴金，原名李尧棠，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自幼在家延师读书。1920 年至 1923 年在成都 外语专门学校攻读英语，参加进步刊物《半月》的工作，进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1923 年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7 年赴法国，翌年在巴 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8 年冬回国，居上海，数年间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着“爱情三部曲”《雾》、 《雨》、《电》。1931 年在《时报》上连载“激流三部曲”之一《家》，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1934 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同 年秋天东渡日本。次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 年与靳以创办《文季月刊》，同 年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 庆，曾任《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发行人、主编，担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1938 年和 1940 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和 《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1940 年至 1945 年写作了“抗战三部曲”《火》。抗战后期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1946 年完成长篇 小说《寒夜》。短篇小说以《神》、《鬼》为著名。抗战胜利后主要从事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1949 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曾两次赴朝鲜 前线访问，辑有《生活在英雄们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两本散文通讯集。

我知道他的名字是１９５３年步入文坛后，最先读的作品是 《家》，在我心中留有很深的印象，想不到现在竟然作为记者竟然去采访他，心里很是高兴。三月的成都还有点春寒料梢，特别在早晨仍冻手冻足。上午九点，我们 按预约的时间来到这里，看见巴金先生穿着厚厚的花麻呢大衣、头戴鸭舌帽，手里拿着哥德原着，一个人在走廊上走去走来地背诵。

我第一印象 是，巴金真勤奋。他个儿中等，大头、大脸、阔嘴巴，说话略带口吃，有点象《家》中的觉慧。我们坐在招待所一间小会客室里，漫无天际的闲聊，巴山蜀水、成都 变迁、风味小吃、街道今夕、朝鲜战争等，以及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团圆》（后改为电影《英谁儿女》）。他很健谈，问什么回答什么，没点大作 家的架子。突然，我提出个十分怪异的话题问："巴老，你中共建政前写了那么多有名的长篇，什么《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怎么现在一曲也不曲了，见 不到你的长篇了呢？"巴金一下愣了，一双犀利的大眼睛在我身上扫视一遍，然后不经意的笑笑说："生活是文学作品的创作源泉，我熟习旧社会的人和事，对解放 后的新人新事还很陌生，不太熟悉，我正在努力地积累和体验新的生活，但是……"

他嘎然止，呆好一会儿换成另个话题："成都不错，天气还 是那样好，变化真大呀！怎么也找不到儿时记忆了？听说，我老家那幢院子，是什么文工团了？"他的家指在东通顺街那憧老房子，是座很大的公馆，一圈高大的封 火墙，两扇厚厚的黑漆大门，花园、凉亭、水榭、搂阁，与小说《家》的家近似。杨蓓姐立即回道："叫战旗文工团，成都军区的。"巴老"哦"了声，脸上闪过一 丝怜惜留恋的阴影，再没说什么，屋里好久一阵沉默……

短暂的记者职业使我变得十分敏鋭，觉得巴金先生心中有难言之处，过去、现在、将来，一个自由的写作人，从一个自由的写作社会突然走入一个不自由的铁屋，他该怎样去想这一切？

在回归的路上，我突然提出一个问题问杨蓓："杨姐，他怎么起这么一个怪怪的名字，巴金？"杨蓓道："这个名字一点也不怪，代表着他的信仰。"

"信仰？"我感到莫明奇妙，睁着一双大眼睛听她的下文。杨蓓是个装有一肚皮知识的大小姐，读了不少书，对每件事都能说出一个道道来，还喜欢把自已的知识告诉后来无知者，就像普罗米修士乐意把窃来的火种分给别人，让黑暗的世界更光明。

"巴 金，是两个人的名字。巴，是巴枯甯，金，是克鲁泡特金，这两个人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听说，巴老年轻时崇向无政府主义，追求个性上的解放和创作 上的极端自由，不愿意受任何约束，这思想在他早年作品中表现得淋漓致尽。"她启开微涂唇膏的小口，娓娓地吐出一串串闪光的珠玑，说，："正因为他崇尚自 由，追求个性解放，所以才能写出那么多有震憾人心的好作品，我读中学时就是他的读者，而且读得入痴入迷。"我静静地听着，待她稍息时才插话问："搞创作的 人是不是都喜欢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不是创作上的自由？"她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只好灿灿一笑。

我们默默走了段路，拐过商业场进入福 兴街口时，杨蓓豁然想起在采访时我不当的提问，近似批评地说："小黄，今天怎么突然冒冒失失地提出这个不该出的问题去问巴老，这样别人会怕记者，说不定会 生气？"我笑笑道："有什么气生，我真不明白，中共建政后这么些年了，怎么就写不出东西来，是他思想跟不上形势，还是别的原因？"杨蓓认真地把我的话思索 了一遍，才发表感叹道：

“他过去生活在知识群体中，熟悉的是知识群体生活。现在是工农兵的天下，上层建筑的文学作品，必须去表现反映工农兵中的英雄劳模， 你叫他怎么写？纵写出来也四不象。”

我仔细想了想她说的话，点头道：“可惜他的才华了，就这么浪费下去多可惜。”杨蓓脸上闪过一丝忧 郁，无不感慨地说：“时代变了，一切都变了，不写少麻烦，写了易惹事，巴老很识时务。”我似乎不太理解她话中的意思，十分直率地表露自己观点道：“写东西 惹什么事？”她怔怔地望着我说：“你不见最近报纸上在批评流沙河的《草木篇》吗？”

这事我知道，也在川报上读了几篇批评《草木篇》的文 章，但没有怎么介意，认为是一般学术讨论。现经她一提开始有点注意，便问：“《草木篇》怎么了？不就一组散文诗嘛，在报上公开争论一下也有好处。那些批评 流沙河的文章我没有认真地去读，因我从来就不喜欢文艺理论，那东西学多了会写不出作品。”杨蓓听后浅浅一笑，似解释似提醒地说：“我看这次批评有点来头， 省委宣传部几次出面布置叫报社组织文章批评《草木篇》，我看来势有点大啊！”

我哦了声，深深陷入沉思中。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三十）

第十三章，反右前奏曲《草木篇》事件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句话有人说是出自诸葛亮之口，但难以考证。反正四川是个一当国家有事，总是最先闹起来的省份。推翻满清的第一枪，保路同志会就始于此，之后才有武昌起义。想不到毛“伟人”反右斗争也是在这里初见端倪。

一、《草木篇》出台的前前后后

为 贯彻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文学艺术创作，四川省文联早在五六年文代会期间，就着手创办一个纯诗歌性的刊物。四川是个有七千万人口（指五七年）的 大省，自古以来就是文人荟萃，名人云集的地方。成都外西外五里之地的草堂寺，曾是诗圣杜甫的住地，历来写诗的人特别多。几经研究筹组，后经中共省委宣传部 批准，一个面目全新的《星星》诗刊，于 1957 年 1 月正式创刊问世。诗刊有四位工作人员，主编白航，一位老区来的文艺工作者，而且是个原则性很强的党员， 负责撑握诗刊的发展方向；第二位叫白峡，南下的文艺工作者，也是党字型大小人物，和蔼大度，人际关系不错，负责诗刊组稿等日常事务；第三位是石天河，本名 周天哲，听说他原是中共川南行署文艺处长，后不知犯了什么错误，党藉、职务全抹。他专事文艺理论研究，对现代诗歌有独道见解。我们从无来往，仅与白航、白 峡一样，见面点头而已。他不苟言笑，十次相遇九次昂头直腰，给人印象是骄横傲慢，故不太理搭。第四位就是流沙河，早有结识但当时关系一般。

没 有想到《星星》诗刊刚一问世，就在全省引起了轩然大波。陕西作者曰白写的“吻”，遭到不少读者的批评，说它黄色、低级、庸俗，宣扬了资产阶级腐朽的人生观 和恋爱观。不几天转向对流沙河《草木篇》的批评，不但火力猛，批评还节节升温，说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作者有政治立场问题。文章一篇接一篇，铺天盖 地来势汹汹。从 1957 年 1 月到 3 月末，不足两个月的时间，仅《四川日报》《成都日报》《草地》文艺月刊，就发表了 24 篇评文章。开始我没有注意，原因是 自已不写诗，对文艺理论不感兴趣，成日埋头写小说。再者，家里有了孩子杂事多，顾不上看那些与自已创作无关的文章，认为那是文人吃饱肚子没事干，闲不住的 “笔墨官司”。可是这个批评讨论的架势越来越大，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采访巴金回来的路上杨蓓又谈及此事，才开始注意起来。接着，有人告诉我，我的 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的两个续篇《向党反映》、《上北京》，省文联作辅导部已铅印出来偷偷地发到全省宣传文化部门，在内部进行讨论，可能是《草木篇》 第二。由于命运与自已有了关连，自然和流沙河的关系就近了，才有茜子家的那夜聚会。

一位哲人曾说：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不仅和时代、社会 相关，更重要的是“决定于他的性格”。性格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比如毛老人家一生喜欢搞运动整人，整人越多就越高兴；周恩来喜欢为毛服务，服务得越好就越舒 服。我们和胡风先生一样，生性骨鲠，直言立世，所以就得当“反革命”。

又一晚我去茜子家打探，他告沂我说这组散文诗根本不是批评者所说 的那回事，完全是人与人之间矛盾引起。他说，1956 年 7 月流沙河被文联派往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青年文学创作讲习班”轮训，10 月学成归来。在回成 都的火车上写成的这组诗。当时他心情特别好，怎么会对社会主义不满？这只是一首以物寓情，以情言志，直抒胸意的诗。写好一直弃置未予理睬，1957 年 1 月 《星星》创刊，恰好有一空白，白航叫他选一稿作为补白。他翻遍来稿，找不到合适的文章，便将这篇弃置的《草木篇》填了空格。我道：“既如此，为何闹成现在 这个状态？”茜子坐在饭桌前的木椅上，望了望一旁默默无语的邱原，说：“流沙河比我还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什么事都是阴沟里撑船直来直去（四川土语，阴沟即 下水道），别人不整你才怪。”

邱原淡淡一笑，讲了这么一件往事。他说，文联是文人成堆的地方，诗人、作家、评论家象蚊子一样的多，粗劣 同室，薰莸一器，加之文人相轻，难免没有嫉妒，没有争宠。共产党老搞政治运动，不断地对知识份子进行所谓的“思想改造”。这思想改造不只是学档读马列，还 得对照检查，人人过关，相互提意见。为了表现进步，靠近组织，难免不伤筋动骨，结下怨恨。流沙河年轻气盛，又有点恃才傲物，加之性格较为坦诚直率，不知不 觉地伤害了一些人。比如 1955 年“机关肃反”，他曾作为“打虎队员”看管过我和茜子，结下宿怨，后来他发觉做得过火，主动公开向我们两人道歉，才言归于 好。去年省文联团支部改选支委，他在会上公然这样说：“今天选出的五个支委我不同意，首先要反对四个人。第一个是我，因我不够条件作支委；第二个是傅仇 （诗人），因为他是国民党的警犬（傅中共建政前为生活所迫，当过国民党水上员警）；第三个我反对席向，因为他是国民党打手（席中共建政前参加过三青团，并 出任区分队长）。

还有杨树青（曾充当过地主还乡团的队员），他杀过人……”

一时搞得会场僵持，使大家下不了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而 他说的又是事实，无法反驳，被指责的人当然只好将不满深埋心里，寻求报复机会。怎样报复？经过历次政治运动“锻炼过的中国人”，变得十分聪明，越来越懂得 共产党的脾气：“上纲上线，政治入手。”毛泽东一再强调“革命是立场，打仗是勇气”。只要你在政治运动中立场坚定，不管对手有没有问题，只要你按照党的指 示去穷追猛打，一定稳操胜卷。他如果坦白交待承认，是你的功劳；他如果抗拒或者自杀，是他自绝于人民。无数事例告诉我们，凡是思想改造的标兵，运动前瞻的勇士，哪一个没有升官？哪一位没有提拔？“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所以林彪当“副统帅”，彭老总饿死牢房。

诗人流沙河

当《草木篇》在《星星》创刊号上发表后，读者并不怎么看重，却引起仇人们的眼红与注意。认为流沙河是用诗骂人，用诗发泄，当然怒火中烧。骂 张三骂李四或骂王二麻子，大不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如果是骂领导骂党，性质就不一样了。在那个政治充塞一切、取代一切的魔鬼岁月，纵是傻瓜都知道，打倒对 手和报复对手的最好办法，就是说他“诬蔑社会主义”、“谩骂党和组织”，没有木击中要害的。《草木篇》一下就拔高到立场和政治问题，纵他有百张嘴也说不清，千张口也辩不过。于是，那些被他骂过的、嘲弄过的、不满与忌恨他的人，纷纷向文联领导反映情况，向省委宣传部写信揭发检举。共产党的官儿吃饱了喝足 了，想干想管的事儿当然是“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对于鸡毛蒜皮小事，诸如老妈偷人，婆娘勾引上司，他们是从来不过问的。什么是“大是大非”？什么 是“原则问题”？当然，“诬蔑社会主义”是“大是大非”，“谩

骂党和组织”是“原则问题”。经过层层组织动员，领导授意，不几天省内报刊杂志纷纷发表批判 《草木篇》的文章。说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仇恨人民仇恨革命的反动作品”。

在一次讨论座谈会上，一位很有地位的文艺理 论权威煞有介事地说：“那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的白扬，当然是流沙河的自拟，显示自己英雄与骨气；那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 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的藤，是他在谩骂历次运动中靠近党和组织、追求进步的积极分子；那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 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仍活着繁殖着儿女的仙人掌，是用来比拟反党分子的顽强与不屈服的精神；那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 天的白雪的梅，用以比拟一切反动文人和知识份子，决不会把自已的能力才华献给新中国，宁愿悄悄地许给反动派国民党（冬天的白雪；）那在阳光照不到的河岸” 的毒菌，正是一切反党反人民的自我写照，他们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暗绿的篝火，诱惑人类。然而，连三岁孩子也不去采他，只能“石头城上，看天低吴楚了！ 这是一首极其反动的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彻头彻尾地表现了作者的反革命立场，必须坚持批倒批臭！”

说到这里邱原愤怒得叫了起来：“四川没有丁点创作自由，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已经结成神圣同盟，看来只能和他们拼死一战了！”我心里感到一阵热，回到家当夜即找来《草木篇》，认真地读了几遍，可读不出有什么问题：“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唐：白居易

白杨

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藤

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仙人掌

她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梅

在姐姐妹妹里，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妹里，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

毒菌

在阳光照不到的河岸，他出现了。白天，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暗绿的篝火，诱惑人类。然而，连三岁孩子也不去采他。因为，妈妈说过，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妻 子看到我嘴巴不停地蠕动，忍不住笑起来问：“今晚怎么了？把一本《星星》翻过去看过来，还像和尚念经念了起来。”我道：“报上不少文章说它是反党反社会主 义作品，我看了几遍也看不出来，它到底反在哪里？”妻搂着快要睡去的孩子回说：“是不是反党作品不知道，反正上面已布置叫我们收集读者反映是事实。”我略 为吃惊地问：“读者怎么说？”她想也不想说：“这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诗，好多人看都未看，怎么会有反映。”

是夜，我轻度失眠，老想着《草木篇》的事。

二、批评讨论天天升级

写完巴金访问记，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来到报社照例是沏茶、上厕所，然 后是坐下来看当天的川报、成报，当眼睛落在二版上又看见几篇批评《草木篇》的文章，作者署名是曦波、春生、陈欣。曦波文章标题叫《白杨的抗辩》，我细细一 读，不竟拍桌而起，杨蓓放下手中报纸惊讶地问：“小黄，怎么了？”我气愤地说：“这哪里是‘百家争鸣’的讨论，简直是人身攻击和政治恐吓。你看，这篇文章 从流沙河的身材说到他的手臂，‘蛇样的身材，丝样的手臂’，还说别人有媚态，缺乏脂肪。还有‘假若你仇视这个世界，最好离开地球。’最后还提出要追查作者 的历史和家庭出身。春生的文章更露骨了，《百花齐备放与死鼠乱抛》，仅这个标题就火药味十足，我不同意，一定写文章反击”坐在我对面的肖青即忙提醒道： “小黄，不要情绪激动，你知道曦波是谁不？告诉你曦波就是李友欣！”

李友欣，省文联负责人之一，有名的左派“棍子”。未待我表态，新从 市话剧团调来的编辑邱干坤抢先说：“，管它什么人，文艺批评应与人为善，不能以势压人，动不动给人扣帽子我不赞成。我觉得这次对《草木篇》的批评，不是自 下而上，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有点宗派主义的霸气。”杨蓓负责处理文艺理论稿件，当即补一句：“春生就是省委宣传部李亚群副部长……”肖青自来原则性很 强，怕将内幕通出去，立即提醒大家道：“我们是党报，要注意组织原则和保密问题，切不能把作者身份告诉别人。”胡克由马上附和：“肖青说得对，肖青说得 对。”号称“多宝道人”的陈泽昆，似调笑似讥刺地补一句：“党怎样说我们就怎么做，党报嘛就得坚持这个原则。”我扫了大家一眼，冲着肖青故意反话正说： “昨天我在文汇报看见思裳写的一篇通讯，题目叫《解冻》，他说‘诗歌的春天来到了，整个文学正在解冻’，我们四川却在结冰。”肖青极不满意地瞪我一眼，近 似制止地道：“小黄，你太偏激。”

上午九点，我作为报社编辑和作者的双重身分，准时去到文联会议室参加由省委宣传部付副部长主持召开的 “《草木篇》座淡会”。这个会已经连续开了十多

次，我很少参加。几天前听说流沙河要发言，所以来的人比往常多。文联的会议室在小院一侧，是个条型长屋，面 南背西，四周摆着一排木椅，上首坐的是领导，其余三方是参会人员。流沙河坐在不太显眼的角落，默默独一人低头吸烟，翻阅着准备的发言稿。李累宣布开会后， 他欠欠身说："前几天开会没有来，因为象惊弓之鸟，要看天气。我的发言有顾虑，怕调子不合某种规格，如有说得不妥当的地方，请善意批评。"接着，他细声细 气，首先谈到对'草木篇'的评价问题。他说，"前几天看了李亚群同志的发言，尽管个别论点有出入，但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非常好的。其中有好些情况可以理解， 李亚群同志来成都不久，和文联的同志接触不多，虽然有些了解，但都通过间接的汇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草木篇'的批评就出了些毛病。我认为'草木篇'是 不好的。最初我抵蠲，原因有二：一是主观点的，我写了一首诗，每字的意思是否如何如何，象报纸上说的仇视人民，仇视现实。我觉得生活中有某种东西我看不 惯，我要用笔来刺它一下，说它不好，当然想不通。二是客观方面，一开始那种棍子式的批评，有好多东西超出文学批评范围，当然引起人的反感。在比较长的时期 以后，同志们说我写得不好，要不得，我同意。但也必须说明一点，我说应受到批评，并非说应受到棍子式的教条式的批评。关于我的作品与错误性质，直到现在我 仍不同意很多说法。"

他说得很诚恳，听者无不动容。在他打顿的时候我插一句："流沙河同志不要顾虑，请把《草木篇》被批评的内幕告诉大 家。"茜子跟上说："不要再窝了，有什么说什么，'百家争鸣'又不是一家争鸣。"在与会者的支持鼓励下，流沙河兴奋起来，语言的表达显得直率无忌。他说： "我不同意说我在诗里宣扬对社会的不情情绪，我觉得有解释的必要。这里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一种是对现实社会中某些东西，某些人不同 意。如果属于前一种解释，不同意；属于后一种解释，同意。同样，李亚群同志在政协发言中谈到'草木篇'一节，我也不能同意。这一节说：'草木篇是反映了仇 视现实，否定现实，宣扬孤傲思想的作品'，理由也象我在前面说的一样。另外，有好多文章，动辄加我以毒草的帽子。我觉得，界限应划一下，是否所有犯错误的 作品都叫毒草。我觉得，在文艺作品中并非只有鲜花毒草，有些有错误的作品不算毒草。反社会主义的、反人民的、反祖国的才算毒草。我觉得'草木篇'中有孤傲 万群情绪，应受批评。但直到现在，我不承认'草木篇'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说它是毒草，为时过早。"流沙河不快不慢，吐字用词极为清析说："前天看见成都 日报上张默生写的短文，我同意他说的对'草木篇'的批评'跃跃欲试地'把文艺思想问题引渡到政治边缘。不少人感到这次批评，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发 展的。我不同意有人说的批评是基本上对的，只是方式有点粗暴。我认为这一批评不仅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宗派主义，仅仅是教条主义，行之不远。教条主义所以有 力，宗派主义撑腰；教条主义是理论派，宗派主义是实力派；教条主义在前面，宗派主义作后盾；教条主义冲锋，宗派主义供给子弹。在没有被批评前，我做梦也想 不到人们会对我如此敌视，我也不能够看出我的作品的毛病。当然，'草木篇'被批评的前几天捱了一顿，这就是向成都日报记者晓枫谈整个文学正解冻的问题。我 的话是："要不是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刊物是办不起来的。诗歌的春天来到了！不单是诗，整个文学也一样，正在解冻。以后，常苏民同 志听有关方面说我这话不对，把过去否定了。我说，话没有错，对任何一字负责。但随后四川日报就抛出两篇文章，一篇是春生写的'百

花齐备放与死鼠乱抛’，说 这是对现实的歪曲，认为象‘吻’这类东西应冻结；另一篇是金川写的‘从坟场和解冻想到的’，认为这是把过去成绩一笔抹杀。我写了反批评文章，报社未发，但 打了若干小样，内部发行。石天河、储一天也写了文章。请常苏民同志找伍陵同志把搞件刊出，在一天内找伍陵同志三次，终于碰壁。据统计，‘四川日报’、‘成 都日报’、‘草地’上共发批评‘草木篇’文章二十四篇。发展到‘草地’2 月份上刊出的黄鹿鸣写的‘草木篇书后’是高峰，这篇文章是声讨宣言，提出了很多问 题，可以看成要组织更大规模的第二期围剿。为什么整个批评这样发展，这与曦波写的第一篇批评文章‘白杨的抗辩’有关。这篇文章不能叫诗歌批评，而是人身攻 击和政治恐吓。起初不知道是李友欣写的，后来才知道。这篇文章从我的身材说到手臂，说我是蛇样的身材，丝样的手臂。还说我有媚态。我缺乏脂肪，说身材还有 所凭，说媚态查无实据，我在文联因为缺少媚态，因此捱了很多的打击。至今也无媚态，还有一句，从小看见我如何，我与李友欣同志 1952 才认识。这话暗示， 我有政治问题。这篇文章后面更不象话，说‘假若你仇视这个世界，最好离开地球。’翻出来就是叫我自杀。‘不想活，你去死’。因此以后的批评文章敢于给我带 政治性帽子，如敌视人民，仇视现实，不满社会主义，自取灭亡，自绝于人民。最后要追查我的历史。追查我的家庭出身。我出身封建家庭，是我的不幸，把我的不 幸列为罪过之一，能批评到如此，很残酷。

1951 年我就在川西日报上受过批评，那时是十八篇批评文章，那些文章赶不上这次倡狂，那时的 教条主义给我戴三顶帽子，说我污蔑农民，因为我描写的农民中有李逵式性格的人；说我污蔑解放军，因为小说中有解放军剿土匪未剿着；说我污蔑工作干部，因为 小说中有工作干部不工作，只教群众扭秧歌。而且那时没有一篇文章敢于要追查我的政治历史。‘草地’三月号发表田原的‘在争论中所想到的’那篇文章，不知文 章怎样发出来了。象田原，1951 年打了我一棒，那时他未成为‘理论家’，写的是‘读者来信’。我不知谁授权田原在文章中追查别人的政治历史面貌，但田原 要如此说也非偶然的。这使我联想到契诃夫笔下的普希里别叶夫中士。不仅如此，为‘草木篇’辩护的人全受了打击，邱漾、黄泽荣（即晓枫）、沈镇，还有自贡市 文联的李加建，这不仅排斥异端，而且排斥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文联召开的第一次讨论‘草木篇’的会议，李累说为反动腐朽的作品辩护，站在什么立场。第二次 讨论会上有肖长睿认为‘草木篇’宣扬个人孤傲，但对作者未保护，一棍子打死。李累站出来说，对待这些东西就要一棍子打死。这就是不仅排斥异端，而且排斥异 已。如何给‘草木篇’辩护者以打击，难道能昧着良心说仅系理论思想上的教条主义。我看系连坐法，九族皆诛，为‘草木篇’辩护的人都脱不倒手，捱了打不许叫 痛。曦波发表‘白杨的抗辩’的当天，我给四川日报写了一封信去，六百字，第一点，指出曦波文章系人身攻击，我对这表示抗议；第二‘草木篇’是好是坏，让群 众展开实事求是的讨论。这封信没有登，也没有退，最近又去信问。说找到后即退，是否这信作为流沙河材料往上交了。如何现在还不退信，捱了打不准人叫痛。‘草木篇’受了批评，好象一错之后，千错万错。甚至远在上海的姚文元也写文章批评……”

他越说越激动，情绪化的字眼越来越多，对指责的人不回避名姓，大有一死相拼的气度。我心里感到很痛快，希望他更激烈一点把那些棍子骂个够。在场的邱原、遥攀、储一天、华剑、沈镇，一个个喜形于色，好像教条主义被打败了，再无

还手之力。

我 听得他继续往下说："其所以如此，与李累有最密切的关系，李累说过，'草木篇'有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气味，过了不久，成都果然出现了一个作者写的这样的 文章，把'草木篇'与王实味、胡风相提并论。李累不但这样对待我，而且在内部搞我。团内开会批评我，而且外加反苏、反共、反人民，会上有党员，有常苏民同 志在，不加制止，为何如此颠倒黑白，叫人痛心。发到别地的信被追回，李累叫我把读者写给的信交出，这是剥夺我的通信自由。李累在团内开的会议上，大喊大叫 斗说，你退团，退吧，退了在群众中搞，而且把你的言行公诸报端。我的包袱不去掉，不敢往外走，请看宗派主义倡狂到什么程度。张默生说："诗无达诂"，一首 诗不可能有一种固定的解释，最好让作者自己去加注解，任何时代的诗也是如此。如诗经"关关雎鸠"那一首诗，有人把它当成是赞美贵族爱情的诗，有人又把它当 成是赞美平民爱情的诗。诗人写诗的时候，是不可能把他的思想用意具体地表现出来的，不然就不能成为诗了。他是用"比"兴"的手法去表达思想感情的，只有他 本人才懂。别人看了可以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本来报纸篇幅有限，纸张缺乏，四川日报、成都日报，除了象报导"八大"那样的任务是不轻易加篇幅的，所以平 常有一定价值的文章尚因篇幅有限而不能刊戴，为什么在批评《草木篇》上又不惜浪费纸张刊出许多堵塞文艺方针的批评文章呢？这从精神、物质方面来讲都是一种 浪费。如果批评真正的意义，真正繁荣了文艺，则不叫浪费。如果不正确，方式方法粗暴，而且又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从精简节约的原则看，则是浪费，小题大 做。'草木篇'是在"星星"创刊号刊出的，"星星"是文联刊物之一，而且得到党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订户很踊跃；为什么刚刚出土的幼芽，领导上就给他一个 无情的摧残？听说批评后，有的订户马上要求退订，这一影响很不好。听说，除'草木篇'的作者受到斗争外，"星星"的编辑之一石天河也受到严重处分，其中具 体原因我不清楚，但从这些地方看，是在让百花齐放呢？还是使寸草不生？我想，无论怎样解释，是不符合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因为批评 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上而下，而且超过了文艺批评的界限。假如今天领导上再不明确表示，就会使我们的文学艺术长此堵塞，使青年作家灰心丧气。我对李亚群副 部长的发言非常拥护，但还希望今后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深深加以体会，然后再坚决贯彻下去。"

流沙河的发言使李亚群、李累、李友欣等左派 如坐针毡，脸红一阵白一阵很不好看，那心里难受味可想而知。待他的发言结束后，我们这些支持他的人一个一个抢着轮翻发言。我首先开炮说："在中央提出"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后，全省确实有新兴气象，但教条主义者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争夺阵地。例如，老作家段可情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谈他对'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感触，立即受到履冰同志的一篇文章的狠狠批评。到陈其通等四同志文章发表后，教条主义更气势汹汹举刀乱杀乱砍，使人毛骨悚然，寒气森 森。文汇报上载的一条新闻，说四川艺界谈心里话与事实不符，四川文艺界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愤慨尚未谈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同的意见以及对'草木 篇'的不同意见也未谈出，这与李亚群同志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在四川地区机会主义较为突出这一点有关系。四川日报上发表'放'和'鸣'的文章，拍巴掌的多，感叹的多；谈远不谈近，只谈今后，不谈过去，好象'抬起城皇老爷出驾，

大家敲锣鼓’。四川地区没有很好的‘鸣’起来，‘放’起来，其原因是领导上不放 手，四川日报对‘草木篇’的批评用运动式，但到现在没有客观地承认缺点，四川日报缺乏自我批评。前次文联开座谈会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许多同志对批评‘草木篇’的方式提了意见，四川日报和成都日报写的消息只字不提。这些都给文艺界带来了顾虑，害怕挨整，据我看， 四川仍是教条主义占居着统治地位。文艺部门的领导应亮出底牌来，到底是“放”还是“收”。‘草木篇’不是一篇作品不好，但我不同意一些人所作的结论：对现 实不满。分析这篇作品应从具体情况出发，不能笼而统之。据我知作者是从文联几个人出发写的，不能把小圈子划成大圈子，说它对人民不满，它的最大毛病是作者 的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之间发生了矛盾。在对待这个问题上，省委如遇大敌，调兵遣将，进行围剿，意图就是一棍子打死。我认为批评‘草木篇’从开始就进行了党 内动员的，可以说是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搞的。那些写文章的人不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为了保护几个教条主义者。”

会后，上海 《文汇报》记者范琰先生，将流沙河的发言作为特稿在《文汇报》上登了出来，全国其他大报相继作了转载，于是《草木篇》变成了全国一桩大的事件，也使四川省 文艺界分成两大阵营：支持者与反对者。支持者多为无权无势的文艺工作者和爱好文学的年青人，反对者多为文艺文化界的领导，胜负优劣也就铁定了，悲剧也就注 定了。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三十一）

三，争论转向政治问题

流沙河的发言使我们闷在心里的 恶气渲泄一空，一个星期天，茜子、邱原、遥攀、流沙河和我聚在人民公园茶馆里闲聊，茜子得意洋洋道：“沙河这回的发言击中了要害，打得他们昏头转向。李亚 群像乱了阵脚，到散会时也没说一个字，李累也一付垂头丧气的样子，听说李友欣准备找你交换意见。”邱原不乐观，有点忧忧忡忡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教条 主义在党内存在多年，决不可能退却，我认为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遥攀总是秋秋的，对前景显得信心不足地说：“李亚群我不清楚，对李累我知道。别见他平时 嘻哈哈，可他的报复心超过勾践，我看得提高警惕啊！”流沙河没有发言，一直像在想着心事。我咕噜噜吞下一口茶，说：“下一个埃批的可能是我了，不知他们会 说些什么？”流沙河淡淡一笑说：“总不敢说你仇恨革命嘛！”邱原似乎有点未卜先知：“很难说，思想划线才不管你出身成分，纵是三代赤贫也可能打成反党分子 哩！”

无风无浪平静了几天，似乎左派们退却了。但没有想到一周后，《四川日报》突然在一版上以题为“工人，农民，知识份子写信写稿给本报 对流沙河的发言进行驳斥”发表文章说：“遂宁小东街 43 号店员工人税梅 5 月 21 日来信：人们都知道，批评我批评是推动工作，增强团结的工具，但是，有些人 却不这么看。最近我在报上看到流沙河等一些人把批评说成侵犯了人身自由，把批评者说得来似乎是犯法似的，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对批评这样特殊反感？我 是一个读书很少的店员工人，我看到大小知识份子中，很多是爱国者，但也有些知识毛病很严重的人物，他们消极，牢骚，看不惯新社会，如流沙河就是一个，对他 们进行一点批评有何不可？他们把批评者态度方式的一些缺点抓到后加以扩大，说别人不讲道

理，究竟谁不讲道理？中国究竟谁领导？是否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 想的墙拆了，把沟填起来搞成一家人？按照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来“改造”中国人民。有的人一定说我是共产党，我是一个不愿意把旧的枷锁套在身上的中国人，也许 ‘草木篇’的流沙河会把我比喻成“藤”，我要说，时代不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了，流沙河在‘草木篇’里提倡的思想是不利于人民的思想。硬骨头可以拿在 美，蒋面前去，不要拿到工人农民面前来。也许还有人会说我同情官僚主义，为官僚主义作掩护，或者我就是官僚主义者的化身。老实说我要反对官僚主义，帮助党 通过整风把那些害人的思想，搞得干干净净，使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完成。”

一封农民的来信写道：“编辑同志：前些日子，看见报上批评流沙河 “草不篇”，说他仇恨新社会；最近又看见他自己也承认他说过“宁愿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当个自由的贫困儿”的气愤话，这是有来头的。说起流沙河有些人不晓得， 说是余勋坦，那我们金堂老城的人，都晓得那个金堂城槐树街那个“吃人骨头钱”的兵役科长余营成就是他的老子。余勋坦在本乡人都称他是“九老少”。他家原是 九百多亩地的大地主，余营成四兄弟分家，一人分二百三十多亩，余营成四川大学毕业后，在成都上海等地“ 玩戏班子”，进赌场，以后从成都伪县长训练班出来就在广元，德阳，金堂等县当了多年的兵役科长。靠着“吃人骨头钱”，生活过得好派头。大老婆和三个子女居 住在成都，他和小老婆（原是丫头，被强奸后收上房的）与六个子女住在一起，雇了四个人：一个伙房，一个老妈子，两个奶妈。子女都在上高中大学。他哪里来的 钱呢？就是买卖壮丁，敲诈勒索，吃人骨头的钱。1945 年，他回金堂来当了兵役科长后，害得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 1946 年，上面分配金堂县壮丁 三千名，他就私自多派两百名，每名卖三十石，共贪污六百石。1946 到 1947 两年的壮丁安家费，全部被他们吞没了，反而还去敲诈壮丁家属。他搞了钱交不 出壮丁时就到处乱拉，拉的金堂路断人稀，独子罗货娃也被拉去了，逼死了罗的父亲，气死了罗的母亲，罗本人也死在国民党部队，一家人都死完了。被余营成搞得 这样凄惨的，金堂又何止一家！

余营成不但是青帮，袍哥的头子，民社党县党部政务委员会主任，中共建政前夕，还和王从周（已被镇压）等同谋 组织‘反共救国军’准备‘誓死抵抗’。解放后，仍不向人民低头，还千方百计地剥削佃户，在减租退押前夕还强行收小妾，逼着佃户何先照给他推去两石菜籽，把耕牛卖了来给他钱。1949 年的公粮到 1951 年还未交。应退押六千多斤大米，应赔罚五千多斤大米，他颗粒不退，经过了群众的控诉历数其残害人民，反抗解 放军和国家法令的罪状，一致要求人民政府依法把他镇压了。流沙河生长在这个官僚地主家庭里，娇生惯养，在学校和街坊上处处仗势欺人，“打三个擒五个 ”的，同街的都称他“九老少”，连那个帮他家二十多年的老妈子李王氏，也常常挨这位少爷的拳头。他过惯了这种剥削腐朽的生活，又有杀父之仇，当然对现在人 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要仇恨的。镇压了他父亲以后，我们到川西农民报把他找回来，动员家庭退押，他满口答应“保证退清，不欠农民一文”，哪晓得他挽了几个圈圈，订了一个骗人的计划就溜了，一文也未退出来。当时大家都很气愤，要去把他找回来，后来又想到他参加了革命，让他好好去工作吧！就原谅了他。叫他想想是 谁把他养大的？不是他罪大恶极的父亲，而是我们金堂人民的血汗，他不该把我们当仇人！阳关大路他不走，那才坏得没底底呢！

金堂县绣水乡马鞍农业社主任李元清，红旗农业社主任王栋成，绣川农业社社员毛正兴，红旗农业社社员何光照等十一人”

这 些所谓的工人、农民来信全是有组织的行为，是共产党搞人的贯用手法。不难看出，中共四川省领导对《草木篇》的批判已转向政治，不再是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学术 争论，下一

步可能是追查历史，作出处理。紧接着有人告知省委宣传部向各地（市）委发了红头文件，决定对《草木篇》要组织更大的力量进行围剿，认为这是"两 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一时间党棍、打手、喽罗以及那些一贯奴颜媚骨的文人和天生讨好上司的文痞，磨拳擦掌，勒袖张臂，操刀握笔杀上阵来。不几天全省 所有报刊几乎都是声讨《草木篇》的文章，多如垃圾堆里的绿头苍蝇。《草木篇》的事情越闹越大波及全国，引起各方人士的关注，对四川省如此过火作法反映较为 强烈，使省委宣传部有点进退维谷。据说，李亚群副部长曾向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请示"应该怎么办？"李井泉是个一心往上爬巴结讨好毛泽东的极左分子，在半年 前就知道毛泽东的打算招数，认为《草木篇》是"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的政治斗争信号，于是大笔一挥：坚决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草不篇》批臭"（笔者曾于 1974 年逃亡中，去李亚群家探视，当时他已被打倒卧病在床，谈及往事后悔不迭，说："过去我们对年轻人处理太重了，把人家送到公安局去，现在 要都要不回来。我管文艺，事事得听李书记的，他叫批谁，我敢不批么？当然我也有责任啊！"

在新的一轮轰击下，流沙河经受不住了，思想快到 了崩溃的地步。不知是利益的共同，还是"臭味相投"，或者是"惺惺惜惺惺"，再不就是同情，此时我隔不上两三天去文联看望他，安慰他，鼓励他。记得就在金 堂农民揭露他家世的第二天晚上，我在他和方赫同住的宿舍，看他独自一人（当时方赫不在）在流泪哭泣。我惊愕地问：" 沙河，怎么了？"他说："晓枫，我申请退团了。"说着，将早已写好的退团书给我看："亲爱的团组织，当我举手向你宣誓时，我没有想过要离开你，但我现在不 能不离开你。我受不了，真的受不了啊！我到底有什么错？那样的批我整我……"

"沙河，在这个时候你不能退团啊，天大的事也会说得清楚，何 况一首诗嘛。没有攻击诬蔑党就没有攻击诬蔑党，怕什么？何况对你的批判好多人也不同意。"我冷静地劝导他和开导他，他从悲愤中回思过来说："晓枫，报上天 天批判，文联大小会批判，团内还要开会斗争我，叫我交待这样那样，要我不是团员至少能少一层批判斗争。我想拒绝但拒绝不了，我退团主要想求点安静。"

"你这想法就是错误的，不能为了逃避斗争就采取退团的办法，这是多么愚蠢的办法。"我进一步帮他分析利害得失："这样别人更会找你岔子，说你存心对抗党对抗组织。"

这 本是人与人的正常往来和同情，到"反右斗争"时全成了罪恶，我们文艺组长肖青以刘岩的笔名在成报上写文章揭露说："右派分子晓枫和流沙河是怎么和为什么勾 搭上的？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问题。其实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难，我们只消从他们的往返中随手拣出几件事、几封信，就可以一清二楚。

据 流沙河在确凿的事实面前的交代说，晓枫和他往来频繁始于'草木篇'受批评。那时，晓枫常常去看他、安慰他，而且在 2 月 2 日首次邀他到自己家里吃饭。饭后， 晓枫问流沙河是否要为'草木篇'检讨？听见流沙河说不检讨，他就鼓励流沙河说："你如果检讨了，我就决不和你往来。"此后，晓枫便给流沙河充当了一名忠实 的坐探，把他在成都日报内部听到的、或者借着采访时挖空心思搜罗到的有关'草木篇'或流沙河的情况，及时地向流沙河汇报了。这不仅使流沙河能够早早准备应 战，而且使流沙河能够更加妙巧、更加恶毒地在鸣放期中有计划、有策略地向党进攻。

为什么晓枫会如此死心塌地为流沙河服务呢？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早已对党、对社会主义

仇视的晓枫从‘草木篇’中看出了流沙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由来已久；流沙河在‘草木篇’被批评时期暴出来的反骨比起别 人来，更是又臭又硬。晓枫在我们这个社会是早有“知心能几人”的“痛苦”的（他在成都日报文艺组公开说过： “全编辑部我没有一个知心朋友。”又说：“有时候，有些话是向自己爱人也不能说的，却可以给知心朋友讲”。）所以他能一眼看中流沙河。另一个原因是早在今 年初，晓枫把他的黑色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及其续篇“向党反映”和“上北京”揉成一篇略加增删，更名“五年的岁月，拿给流沙河看。流沙河看后，“激 动”得在深夜“11 点 54 分”给晓枫写了一封信，一开头就说：“谢谢你的‘五年的岁月’，它确实使我明白了好些事情。不，应该说它证实了我长久以来的许许 多多的想法，它说出了我想说的话。”晓枫的黑色小说在群众面前揭露后，正直的公民都愤怒地说：这是抓住我们伟大的政治运动（肃反）和伟大的经济措施（统购 统销），恶毒阴险地攻击我们的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向党进攻的毒箭、是丧心病狂的恶毒叫嚣。可是流沙河却说它使他“明白了好些事情”，说出了他“想说 的话”。流沙河在晓枫那里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从此，流沙河对晓枫关心备至，当晓枫为了能把稿费骗到手，就是挨批评也愿意“草地”刊发他的黑色小说“向 党反映”和“上北京”时，流沙河着急地向他说：小说千万发表不得，你缺钱用，可以从这里拿去。后来果然把钱借给了晓枫（这简直是天方夜谈的编造）。从这 里，我们已经可以清楚是什么黑线把晓枫和流沙河这两个右派分子联串起来的-——是他们长期以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愿 ”的一致；是他们都采取了运用文艺形式向党进攻这一“武器”把他紧紧联串起来的。”

三天后，我大着胆子去文联找李累要回我的两个续篇《向 党反映》《上北京》，在过道里碰上一脸喜气洋洋的茜子，未待我问，他便自个儿说开了：“晓枫，告诉你一个天大喜讯，毛主席《在全国最高国务会上的讲话》听 说为《草木篇》说话了。”“真的！”我有点激动地问：“你怎么知道？”茜子道：“有人参加了全国最高国务会议，听毛主席亲口讲的。”他所说的，就是舒芜先 生在回忆录中写的那几句话：“四川还有个流沙河，写了个《草木篇》，那是有杀父之仇的人……我们要团结一切人，包括有杀父之仇的流沙河，也是我们的团结的 物件。”毛泽东为什么要讲这几句安抚人心的话？他是怕四川围剿《草木篇》而影响到他“引蛇出洞”的“反右”大局，逼不得已随个口而已，可是我们却视为毛泽 东在为我们说话，于是才有更多人钻进“反右 ”套套，到明白明已经晚了。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三十二）

四，“伟人”亮出“阳谋”底牌

很快，毛泽东《在全国最高国务会上的讲活》从中央传达到地方，而且原汁原味不作一点改动，听后真是大快人心，可是后来见诸于报端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却大相径庭，变成了两个不同的文本。此时不少人大叫上当受骗却已来不及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灾难降临头上。用中共的话说叫“错估形势”，用我们的话 说叫“太相信党和毛主席”。太相信

必然盲从，盲从必然导致悲
剧。为了帮助共产党整顿“三风 ”（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中共各级领导一下软下身段，态度变得极其和霭大度。李亚群、李累、李友欣等一帮头人，数度在座谈会上致歉和作检查， 承认对《草木篇》的批评有过火行为，方式方法粗暴等，一再号召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他们决不打棍子揪辫子，保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 者足戒” 。也许连他们也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诱饵，而我们却认为共产党真的要反教条主义了，纷纷“跳出来”向党建言，把心中积怨一吐为快。报刊也一改斩头去尾的毛 病，做到了有音必录，有话必登的全方位开放。记得 957 年 5 月 16 日省文联召开的“鸣放”座谈会上，因有文汇报记者范琰在场，已不发言的流沙河作了长篇发 言。他发言的中心是阐述他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极为不满，反对文学创作艺术与政治等同起来，反对用行政手段干预文学创作。第二天上海《文汇 报》以题为“流沙河谈《草木篇》”，发表了他的发言全文。我们很受鼓舞，纷纷写文章支持流沙河与《文汇报》。在“四川省文艺界大鸣大争集”中有这么一段记 载，现引用如下：

作者蓝庭彬说：对‘草木篇’的粗暴批评是宗派主义的具体表现。一些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以马列主义者自居，对自己看不贯的 东西就排斥，田原就在去年文联举办的除夕茶会上说，同情‘草木篇’的人的父母亲一定是镇压的，或者他本人在“三反”“ 五反”中挨过整。‘草木篇’讨论中之所以产生一棍子打死的批评和轰轰烈烈的搞法，是和领导上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特别和省文联、省委宣传部分不开。

西 南民族学院教授何剑熏说：‘草木篇’反映了一部分知识份子在历次运动、尤其在肃反运动以后的痛苦、失望和一定程式的恐怖的情绪。尤其在肃反运动以后，一部 分知识份子，是怀着一定的痛苦、失望，甚至恐怖的情绪的，和党有了一定的距离。现在党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想要消除这种距离。同时，就说明这种 现实的存在。

作家王吾说：晓枫同志的三篇小说，我也收到文联寄来的铅印稿，参加了讨论。但是从四川大学的一位女同志发言开始，我就觉得气 氛沉重。以后是川大一位同志指斥为反动思想，再后就是部队的一位同志激忿地斥责，让人有一种斗争会的感觉。的确是不利于百花齐放，不利于百家争鸣，不利于 文艺事业的发展。

一位署名言无罪的人在四川日报上写文章说：从今年 1 月对‘草木篇’的批评开始，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草木篇’这篇诗 作的思想倾向是否真如绝大部分批评文章中所指出的，是散布了反社会主义的情绪？作者写作的动机是否出于反人民的动机？从批评一开始我就抓住了每一篇文章仔 细的阅读，认真研究着其中的论据。遗憾的是，尽管篇数不少，但真正是从理论上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分析得透彻精辟，令人完全折服的文章实在不多。我们都相信 “持之成理、言之有故”这句老话，但可惜的是，差不多这些批评文章中的“理”和“故”都脱离了作品本身，而转向到作者本人。尤有甚者，到后来干脆变成了政 治审讯。当时我想说话。但是，在那一片讨伐声中，看看自己人微言轻，话到嘴边，依然压了回去。但天下事竟有出人意外者，时至今日，对‘草木篇’的批评，居 然还有拿出来重行探讨的一天。我实在又高兴，又兴奋，这不是为了流沙河（附带作一个说明我并不认识流沙河），个人是非究竟是小事，我只是忍不住要为我们的 文学事业心喜悦。我认为整个文艺批评的正常现象重新出现而振臂欢呼：我们渴望得太久了。回过头来，我们要看看几个月来对‘草木篇’的批评究竟表现了一种什 么风气，它在文艺界和读者中间又发生了一种什么样的不良后果，假如我们不是存心欺骗自己，我们可以看得出，这种用政治恐吓来代文艺批评的野蛮方法，不但

没 有说服流沙河本人，而且在文艺界和读者中间已经起了反感（文联召开的会议上有些人的发言可以证明）。我不愿说批评‘草木篇’某些同志是从对人出发，但客观 上却已经起到了这种坏的效果。人们有理由这样信：文学这个领域，看来还并不是那么民主。特别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之后。严重的就在这里。那 些批评‘草木篇’的同志，最初也许是抱着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愿望而执笔的。但由于他们硬要把笔的功用变为刀的功用，因而有意无意的违背了应该保持的“与 人为善”的愿望，把一桩并不需要用那种恐怖的方法而可以得到更好解决的事，弄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这倒是恰恰砍伤了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 可怕的就在这里。

当然，好在今天事情还可以收拾。但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对一篇文艺作品，动不动就要提到政治问题上来？毫无疑问，积极的 主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倾向，应该是我们文艺创作中永远列为首要的东西；可是，生活难道真是如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样，光明，光明，永远是光明。难道就没有 个别的人，要在这个光明的社会里做出一些不光明的事？如果不是那样，一个作者，为什么不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把它揭露出来？冷嘲热讽，嘻笑怒骂，又有什么不 可以？把这些毛病揭露出来，应该说是为了解决矛盾，而不是跟谁过不去。更不该说是跟全体人民过不去。纵使他的动机果然掺杂有对人的成分，那也是对那些并不 光明的个别的人，而事实上，它的社会作用恐怕也并非作者那对人的动机所限制得了。退一步说，即使这种揭露由于作者的手法不当，不能收到警世骇俗之效，甚至 起到某些副作用，也只能用坚持说理的方式来进行纠正，使他自己，使千千万万读者和群众明辨是非，甄别利害，这会对于我们现在和将来的矛盾都更有利于解决 些。但令人惋惜的是，有些同志偏偏看不得玫瑰花上的刺，听不得逆 “我”者之言，不合已意，便“磨利以须”，拼命进击，不是要把这篇文章，而是要把作者这个人一棍子打死。质问这，质问那，捕风捉影，制造口实，追查历史， 根究出身，“跃跃欲试地把文艺创作过渡到政治边缘”。这种现象，发生在文学这块神圣的土地上，令人心寒。话说错了，可以批评，但言者无罪，为什么明明是创 作思想上的问题，硬要扯到反革命的罪行上去？这种员警式的文艺批评，实在比什么样的“毒草 ”都可怕。有病的人只会被他们弄得把病加深，无病的人也会被他们吓出一身病，这就是这些“率尔操刀”的同志们所梦想不到的恶果！

四川大学 中文系副教授陈思苓说：‘草木篇’是有问题的，但问题的性质只是反映在文艺思想与创作方法上，主要是不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是不同意把‘草木篇 ’的问题提到政治原则上来，这样作未免提太高，小题大做，文不对题。‘草木篇’ 的抵触情绪与政治上的表白是有区别的，只有就作品论作品，从理论上对作品作具体分析，才能解决问题，一棍子打死是教条主义的粗暴行为，做起来固然省事，但 却暴露了教条主义的浅薄与无能。

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李华飞说：‘草木篇’这组诗并不是全部都是坏诗，“白杨”说的 “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在教条主义、官僚主义面前不轻易弯一弯腰是可以的。为什么流沙河要写这样的诗，应从他所处的周围环境去进行具体 分析，不要一棍子打死，更不能涉及人身攻击。对“星星”的批评也不对，由于“星星” 发表了‘草木篇’和“吻”，好多文章都采取一笔抹煞态度，认为整个倾向不良，甚至“星星”的编辑也有问题，一人犯罪，牵连九族，当然这个比喻是否恰当还可 考虑。总之，这是不公正的。影响了我们的创作，个人感受不敢写了，认为没有符合社会主义的内容，对社会中存在的缺点也不敢轻易提，只好歌诵。

西 南音专文学课讲师施幼贻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坚持‘草木篇’的错误在于作者把暂时的、个别的东西代替了永久的共同的东西，以一点概括了全面。反映了一种 小资产阶级的

偏激情绪。但对‘草木篇’的批评，我不同意那种极其粗暴的、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尽管往别人头上戴帽子，不能以理服人、不能解决问题。至于人身 攻击，政治恐吓那就更不对了，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文艺的批评的范围，把文艺问题当成政治事件处理了。假如说在批评‘草木篇’的时候火气太大，那么我们现在就 应该冷静下来，实事求是地分析对‘草木篇’的批评。对待批评‘草木篇’的文章，也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不能“以暴易暴”的办法，事实上那些文章中，除了不 适当地扣帽子的以外，其中也不乏言之成理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尽管流沙河自己已承认‘草木篇’ 不是一篇好作品，但却有些人最近看到报纸上关于‘草木篇’问题的讨论，以及前些日子“文艺学习”第四期上孟凡写的“由对于‘草木篇’和‘吻’的批评想到 的”一文后，便又觉得‘草木篇’是一篇好作品了。这需要进一步从马列主义美学来加以分析，把是非弄清楚。

作家袁珂在会上发言说，我觉得 ‘草木篇’是一首不好的诗，坏诗，情绪不健康，调子低沉，作为“百花齐放”放出来，是有危害的，应该批评。但是批评应掌握分寸，应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不能当成敌我矛盾。批评文章中，我不赞成余辅之的批评方式，把流沙河说成是对人民的挑战，是站在反革命立场，并且作了些主观的设想，用自己的心思去推度作 者的心思。作者写诗时可能有不健康的情绪，但是否就是指的具体领导，指的共产党员，我是怀疑的。批评应抱与人为善、治病救人态度，还应允许反批评文章出 现。

四川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陈志宪说：‘草木篇’和“吻”是不好的，但它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我对‘草木篇’的批评 是不同意的，是小题大做。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首先就要纠正粗暴的批评现象，提倡从真理出发的批评，反对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命令式的围 剿式的批评。其次要放手，要相信群众。对毒草不要怕，不要捏得太死，领导上对群众要放心，大家都在马列主义 毛主席方针指导之下，不要认为马列主义只有那 些人独有，是鲜花，是毒草，群众是会辨别的，如果捏得太死，不相信群众智慧就会助长教条主义宗派主义。

文艺理论家肖长睿说：‘草木篇’的 讨论，在态度上、作法上都存在粗暴，与“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符的，目前在群众中是存在着是非不明的情况，认为那是一阵风，这又是一阵风。我们 的文艺批评，现在应该做的工作是认真对‘草木篇’ 作一次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分析。对艺术作品进行美学分析才能是文艺批评。诗人的思想感情，是通过艺术形象来传达的。形象的表达，又常是曲折复杂的。这就要我 们细心体会。‘草木篇’既然通过的是比喻的表现形式，这就有其复杂曲折性。

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张默生说：四川地区没有很好地贯彻“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左”的教条主义占着上风。“星星”诗刊第一期发表的‘草木篇’和“吻” ，这两篇作品应该受批评，但批评的方式粗暴，当时我们就觉得过分；其中有的文章缺乏说服力，气势汹汹，甚至把‘草木篇’几首诗排列的次序也加以追索，认为 作者别有居心，跃跃欲试地把文艺思想问题渡引到政治边缘。不少人感到这次批评，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发动。这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当然是有阻碍的。自古以来就有“诗无达诂”之说，对一首诗各有各的解释，如比杜甫诗中有一首“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 几回闻。”有人认为是写成都人民喜歌乐曲，有的人认为是写宫迁靡烂的生活。千百年来相持不下，争论不休。

正当人们昏昏然，懵懵然，冒冒 然，兴兴然的时候，中共中央喉舌《人民日报》，于１９５

7 年 6 月 8 日，秉承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臭后昭着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全国报刊刊一夜变脸，势如暴 风骤雨，摧枯拉朽的“反右斗争”正式登场，凡是支持赞成《草木篇》的人，无论你是党员还是干部，是专家还是学者，是年过七旬的白发老人，还是黄毛未褪的十 五岁少年，也无论是男是女，是妮姑还是和尚，均被划成右派分子，据有关方面粗略统计，为《草木篇》而沦为右派的，全省以至全国不少于一万人。老天，一万 人，一万条美丽的生命，一万个幸福的家庭，全被毛泽东的“阳谋” （其实是阴谋）撕成粉碎，化为乌有。自此中国进入了最黑暗、最野蛮、最荒唐的时代，留下亘古绝唱。

在强大权力面前，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 海中”，五十多万知识精英不堪一击，全成了“纸老虎”，纷纷举手投降，噬脐莫及，相互嘶咬，相互残杀，没有脊梁，没有骨头，不顾及任何脸面向中共低头认 罪，纵如此也沦为万劫不复的贱民。不久，人民日报记者姚丹《在‘草木篇’的背后”，揭露‘草木篇’事件真相》的长篇通讯中写道：

“流沙河 所写的‘草木篇’虽然早已臭名远扬，但右派分子们却极力为它搽脂抹粉，说它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而放出来的一朵“香花”。在四川文艺界中，以石天河（即周期 性天哲、“星星”编辑）为首，包括流沙河（团员、“星星”编辑）白航（党员、“星星”编辑部主任）丘原（即丘漾、省文联干部）、储一天（团员、“草地”编 辑）陈谦（即茜子、“草地”编辑）、遥攀（“草地”编辑）、白堤（“歌词创作” 编辑）、晓枫（即黄泽荣、成都日报编辑）、徐航（即徐荣忠、成都第二师范学校学生）等一大群右派分子，确实是在那里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努力实行百 “花 ”齐放哩！‘草木篇’不过是其中一朵而已。

“星星”创刊于今年 1 月。早在创刊以前，石天河、流沙河和白航就秘密策划好了通过“星 星”进行反党的阴谋。他们给“星星”规定的方向是：不走“名人路线”，藉以排斥进步诗人，要按照他们的反党意图，另外培植一批“作者”，“稿件不要机械配 合政治”，从而企图大登其反社会主义的作品。石天河又据此写了公然排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稿约。在这种露骨的反党纲领指导下，“星星”的第一期就出现 了 ‘草木篇’和另一首坏诗“吻”。

今年春季，‘草木篇’受到批评以后，他们又密谋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向党发动倡狂的进攻。这一大群右派 分子差不多都写了充满谩骂攻击的“反批评“文章，投到各报刊。其中有的文章甚至写道：“虚假的王冠快被摘下来了，虎皮交椅快要坐不稳了！ ”又骂批评者是“妓院的老嫖客”。这些文章未被刊登，他们又打算秘密印刷，散发到全国。他们另一个恶毒的办法就是在“星星”上继续放毒。决定以后更要多发 表反党的讽刺和宣扬颓废、哀愁的诗。流沙河扬言还要写“昆虫篇”，他叫嚣：“你怕，老子二天（即以后的意思）还要干！”

这时候，他们唯一恐惧的是怕失去“星星”这块反党的地盘。所以大放谣言：“‘星星’受到围剿哪！”“天下未乱蜀先乱！”白航还和流沙河商量，向各地朋友写信，要他们在报刊上为“星星”和‘草木篇’辩解、吹捧。

这一群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决不止于“星星“，也决不是从‘草木篇’受到批评以后才开始的。

去 年匈牙利事件以后，这个反党集团的活动特别嚣张。有的公开说：“我们这里就是裴多菲俱乐部”。石天河嚷出：“要杀人！”“要是我在匈牙利，也会拿起枪杆来 的！”又骂：“现在共产党员个个做官、人人娇妻美妾，有一天天下大乱，狐群狗党一下应付到过去了！”流沙河也叫喊：“现在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生活多好啊！” 丘原（过去被开除出共青团）甚至诬蔑“毛

主席是个人英雄主义”。

除了这种露骨的攻击外，他们还把自己打扮成“马列主义的信奉者”，在反教条主义的“义旗”下来攻击党。从中央宣传部、省委宣传部到省文联的负责人，从许多中国作家到苏联作家，以及所有批评过‘草木篇’和他们的人，都一律被他们诬指为“教条主义者”，而一一加以攻击。

白 航是这个反党集团在党内的忠实坐探。“星星”创刊出版后，省文联党支部书记李累将自己对‘草木篇’的看法同省委宣传部负责人对“吻”的意见告诉他，提醒这 位 “星星”的党员注意。他却将这一情况向石、流等人密报，还数次将党内情况歪曲地在石、流等人中散播，供给他们反党的材料。当石、流等的反党活动激起人们的 愤怒，纷纷给以批驳时，白航却在会上说他们“工作努力”、“是为了搞好工作”。当流沙河威胁地叫嚣：“干涉老子，老子就罢工！老子就造反！”时，白航地向 领导强硬提出：“再批评下去就不干了！”有人写了揭发石天河反动言行的材料，叫他供党组织参考，他却私自扣下，一直不交出来。

在群众的正义反击下，反动气焰表面上是下降了。魁首石天河也退避到峨眉山去“埋头搞创作”去了。但这正如右派分子徐航所说：“缄默并非消沉，缄默是弹药正在装进炮膛和枪膛！”

果 然，今年五月，在省文联召开整风座谈会期间，流沙河就出面为“星星”‘草木篇 ’，为反党集团喊冤。把对‘草木篇’的批评说成受到“围剿”，把对他们反动言行的批判说成受到“内外夹攻”。又含血喷人地说遭到“政治陷害”，“通信自由 也被限制了”。丘原、储一天、晓枫等也在座谈会上异口同声地指责四川文艺界中有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相结合的统治，而且根源于省委。

原来石天河在走前就布置说：现在可以沉默，时候到了再说。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捧谁？打击谁？何时参加或不参加座谈会等问题，事先流沙河、丘原、晓枫等都暗地商量好了。

这 时候，一直躲在阴暗处的徐航，不断给流沙河写信。信上他自称：“未识石先生（石天河）之前，我的射击是盲目的，分散的，今后，我将有计划有目的地集中射 击。 ”流沙河在座谈会上发言后，徐航大为高兴，给流沙河来信说：“他的反击已经知悉。这一炮打得还好，猛烈而且泼辣。”但他立即告诫流沙河：“如果你得步进 尺，忘记‘适可而止’的战略，你一定会中‘诱敌深入’之计。”

已经深藏在峨眉山中的石天河，也在山上搭好了“司令台”。他一面写文章给文 汇报，大喊“锦城春晚”；一面又纠集别地的右派分子给报纸写文章、给四川省文联座谈会写发言稿的谩骂攻击；同时还根据流沙河等人的#报指挥反党集团的活 动。他见到丘原发言中未遵循他的“不要扯宽了”的指示而攻击了党外人士。即写信给流沙河说：“切忌只追求泄情，失去群众同情。”又指示：“应多提建设性意 见，把揭露矛盾结合在提建设性意见里面，这样就可以使阻力少些。”同时他写来了万言书，要流沙河在座谈会上宣读。

他的万言书是一个从党的 根本原则、政策上加以攻击的反党纲领。流沙河看了不敢宣读。回信给石说：“你远在白云深处，太不了解凡区间的气候……你那一颗震天地的炸弹如果爆了，会产 生什么结果？……。他们会以比打丘原更猛三倍的棍子打你。因为你那颗炸弹比他的原子弹更有威力，是氢弹。”而石天河却认为流沙石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 风，又来信说：“不能相信暴君的仁慈和恩典，厕人能相信斗争的力量。”他仍然要流沙河赶快放出那

颗“氢弹”。

直到全国人民开始对右派言论进行驳斥时，石天河才认为大势不“好”，立即烧毁了一批信件，叫流沙市把万言书寄回，拟重新改写。他又指示流沙河等说：“斗争是必须继续的……希望你保持乐观，……不要完全采取退出的态度。”

在这个反党集团的背后，站着两个赫赫有名的右派将军，其中一个就是张默生（盟员、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

提 起张默生人们倒不是陌生的。二十几年前，他在济南中学当校长时，就打击过革命作家胡也频，逼他离开学校。以后又开除过进步学生。他是“厚黑学”教主李宗吾 传记的作者，也为“武训画传”写过序言。中共建政后就成为民盟右派的得龙分子，罗隆基、费孝通来成都找他谈过话，潘大逵一到四川大学就首先要去他家拜访。

整 风开始后，被石天河称为富有“正义感”的张默生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一面在四川大学放火，说：“这次整风对毛主席等人都是一个考验。整不好，国际间一有风 吹草动，共产党就完了。”一面又在文联的认谈会上，为流沙河、石天河大鸣不平，首先弹出“诗无达诂”的烂调，说诗不能有一种固定的解释，最好让作者注解， 为‘草木篇’作辩护。接着他就向党大兴问罪之师，恶意地质问：“为什么要刊载那么多阻塞文艺方针的文章（指批评草木篇的文章）？”“为什么要把流沙河一连 斗争几天？ ”“是要让百花齐放呢？还是让寸草不生？”“星星”诗刊是刚出土的幼芽，为什么领导上要给以无情的摧毁？”

另一个就是范琰（又名宣邦显，盟员、文汇报驻四川记者）。

整 风刚开始，当流沙河、丘原等人根据事先约定，没有参加座谈会，还在一旁翘首望天，等待“气候好转”的时候，范琰前来拜访流沙河。写了那篇臭名昭着的“流沙 河谈‘草木篇’”。接着范琰又通过流沙河去找白航，而且向白航明白地提出访问他是要从他口中探听一些“内部消息”作为“内部参考”。他问白航：“批评草木 篇是好作用多？坏作用多？”白答：“坏作用多，……没有看出草木篇有什么问题……”范接着说：“我看了草木篇也没有看出什么来！”

当人们开始追击右派分子反动言行时，范琰又和张默生、流沙河等勾结一起进行反扑。范琰对于李累揭穿流沙河诬蔑的“政治陷害”真象的发言，流沙河采取了拒不 出席座谈会的新战

术，除又作了歪曲报导外，并以此打电报给文汇报，诬指“草木篇座谈会流沙河不愿出席，故一边倒，李累发言对某些问题避而不谈，形成新的围 攻。”到后来反党集团阴谋逐渐暴露，石天河、流沙河等人都感到“大势已去”，范琰却仍然在成都叫嚣，并威胁地说：“文联常苏民、李累等人不是没有见不得人 的事，要真干下去，就把材料端出来！”

以石天河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阴谋诡计，已经昭然若揭。流沙河、白航等已被迫作了一些技术，但却很不彻底，尤其是石天河，仍未老老实实地很好交代。四川省文艺界对这些右派分子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中”云云。

形 势的逆转在一夜之间，大家都惊了，这是为什么？流沙河先生经受不住前所未有的压力，我建议他去西安老诗人戈壁舟处避风。他接受我的建议星夜奔逊，于 6 月中 旬乘火车去了西安，行前留给我一首小诗：“今夕复何夕，亡命走关西。曲悲遭千指，心冷横双眉。狂风摧草木，暴雨打蝼蚁。逃死奔生去，焉敢料归期。”我也曾 回过一首：“霜重压百卉，狂风吹雁行。淫雪不恤竹，刀剑岂怜英。文章千古事，自有后人评，无语云天望，长安有故人”。

为了证实这段历史， 以广视听（因为有的人成为名人后拼命抹煞这个事实，不知何故？）我不得不引用成都日报文艺组长肖青以刘岩本名，公开发表在报上，题为《晓枫、流沙河之间的 罪恶联系》一文中的原版：“我们看一看流沙河在他制造的所谓“政治陷害”、“人身攻击”事件败露后，接受了晓枫的献策走避西安时晓枫给他的去信，当更清楚 这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家伙是如何“相沫以濡”地鼓励“斗志”，并且是如何蠢蠢欲动地妄想有所作为的了。流沙河到西安后，立即给晓枫写信来感谢他的“指 引”。晓枫在 6 月 24 日收到信后，在 25 日去信，用“黑话”和他们才懂的“行话”汇报了成都鸣放情况，并鼓励流沙河的“斗志”。信上说：“这几天成都气候 还温和，给人有春凉之感’，这句话看起来是在谈成都气候，实际是在报告成都鸣放情况，而且诬蔑鸣放“有春凉之感”。这不是如某些右派分子所辱骂我们的“神 经过敏 ”，或者在从他的“微言”中察“大义”，因为晓枫自己在下面下了注解：“两家报纸（指四川日报和成都日报）主要锋芒转向反右派斗争……可以说成都对你的问 题还是平风静浪（按：一般说法是风平浪静）”，而且晓枫还对这一形势作了估计，他写道：“这也许是力量分配不过来。”不过，右派分子之所以蠢动，正是由于 他们站在反动立场上，无法正确“估计”形势，总是那么唯心地认定“胜利必属于我”。所以在这里，晓枫不仅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且对流沙河的前途也未免 “乐观”的太早了一些，他甚至在信中向流沙河发出甜蜜的估计：“古语云：‘是非自有公论’，你勿用担心……谁非谁是历史会作出正确的结论。我再一千个的诚 告你：“脑子要想得宽，想得美，眼睛要看得远，看得高。”紧接着语重心长地流沙河“一个人要有耐性”。为什么晓枫要鼓动流沙河“要有耐性”，“耐”下去的 目的又是什么？这在晓枫的黑信中也能找到答案：一个是他对形势估计得太乐观，一个是他们还没有实现——应该说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野心。这里，让我们照抄一段晓枫的黑信里的话：“这几天我估计你情绪波动很大，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报导（道）的有关‘草木篇 是非问题，可能都看了。沙河，想开点，这没什么。记得吧？55 年的肃反也有过这样的例子。群众运动时，初时，难免没有一些偏颇。人，要经得起屈委、风浪。 ‘草木篇’ 虽不可取，但白扬志却可嘉，这点你应学习……在这个狂风骤雨的时刻，你千万不要选择最轻便的道路——自杀。马雅可夫斯基写过：死，并不困难，活着才难困。 你不是懦夫，我相信决不会将这可怕的悲剧重演。你是聪明人，应该比我懂得更多。现在你唯一的是珍惜你的才能，文学事业，也是人们对你的要求，和我对你的要 求。因为我和你的交往，不只是‘士为知已者死’，而更重要的是：希望你在文学艺术上有造诣，弥补同代的不足。”两月后他回到成都，不但向文联党组织交出了 我写给他的信，还“憣然悔悟”，写了两万余字的“我的交待”，堪称奇文。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三十三）

五，两个“反党集团”的真相

由于李井泉书记治省有方，安邦有策，在他领导下的四川“反右斗争”取得了辉煌伟大的胜利，不但揪出十余万个“右派分子”，还揪出了不少“反党集团”和“反革命集团”，其有较为有名的是“四川省文艺界七人反党集团”（又称“七君子集团”）、“四川省文艺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四川省农学院反革命集团”、“四川成都二师反革命集团”等等，仅这四个“集团”被定为“右派”和“反革命”的人数竟高达 15000 多名右派（材料省委挡案），这里仅将与我有关系的“七人反党集团”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团”作一个反思与回顾。

回忆是痛苦的，带血的回忆更为痛苦。在 1957 年反右斗争中，单位多次叫我交待“七君子反党集团”和有无“裴多芬俱乐部”一事，我一直矢口否认，大叫寃枉。但后来在开除我公职送劳动教养的处分决定中，却有这一条“罪恶。”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杨干庭先生曾告诉我：“晓枫，你知道不，你是钦定的右派？石天河、流沙河、丘原、茜子、瑶攀、储一天和你被称为‘七君子集团’，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点了名的，省文联党委有红头文件。”我不仅当时不知，就是在后来“改正”归来时也不知，一直认为是共产党的揑造，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想当然。不过在我 1980 年回到报社去省文联《星星》诗刊看望流沙河先生时，他当着他妻子何洁的面却说了句：“晓枫，我对不起你”。当时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今年（2006 年）5 月我去江津师专看望石天河先生，才知道事情的原委。说来也许不会有人相信，四十九年后的今天，我才第一次和“小集团”领军人物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评说历史，闲话沧桑，笑言那段荒唐的岁月。他在尘封的故纸堆中找出流沙河先生当年写的那份“我的交待”时，看后方如梦初醒。现摘抄部分如下：

去年，我在北京时就和石天河勾结上了。我最先给他去信，谩骂反教条主义的批评家，说他们昨天还是教条主义者，今天摇身一变，要“投机“了，明天也许他们又会去“吻概公先生的脚”。石天河的回信中，发泄了他对文联领导上的怨恨，说他“真想搽皮鞋去”。并说，“很长时间内没有注意到你”现在“喜欢你”了，还说了一些吹捧我的话。也就是这时候，储一天和石天河也取得了“谅解”，勾结上了。以后，储一天来北京时，主动向我“认错”，全盘推翻了团组织一两年来对我的批评。他和我也取得了“谅解”，勾结上了。一个反党的三角同盟就这样形成了。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在反教条主义的旗帜下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从右派的立场去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为今后大有可为，可以明目张胆地反党了。于是，我写了用算旧帐的方法推翻以往对我的小说的批评的文章。回成都的途中，又写了‘草木篇’的初稿。石天河和储一天也写了一些文章。为了进一步拉拢我，石天河还写了一篇捧我的文章。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反党活动主要还限于写文章方面。

去年秋天，我回来后，和石天河的关系更密切了，常在一起冷嘲热讽“教条主义”，抹杀成绩，储一天则喊着要长出角来碰“官僚主义”。我和储一天往来较少。他有事总向石天河“请教”。我也如是。这就形成了石天河作为三角同盟首脑的地位。我和石天河常常交流某些道听途説的情况，如“肃反扩大化了”“知识份子对党产生了离心力”之类。我们对时局的估计是“党在蜕化”“早晚要闹出一场事来”。

波匈事件发生后，我们想着：“看我国的党怎么办吧。”期待党退却，开放资产阶级的民主

自由。我们对国外国内的修正主义思潮有着狂热的兴趣。偶有所见所闻。则奔相走告。我们认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危机”，只有 修正主义才是救星。我把一些保密的消息，如群众的“不满”之类，告诉了石天河。石天河则告诉我“某某诗人被逼跳水”“某某诗人不是胡风分子”之类，还说他 自己在肃反时就被便衣公安人员钉梢。我们认为党报上刊登的光明面是假的，只有这一些阴暗面才是今天整个社会的“真实”。为了明了阴暗面，石天河和储一天偷 听“美国之音”。遥攀也偷听过，因为有一次他痛心地告诉我：“布达佩斯还在杀人（指暴乱分子），又杀了一个二十一岁的少女！”几次以后，报上果然出现了一 条可以印证此事的消息。我们三人，除了在下面散播反党言论，还多次地在时事座谈会上公开散播反党言论。其中以我最猖獗。我对向我征询意见的同志说：我知道 你们要拿去汇报。现在我不说。我要在会上全盘吐出来，便于你们汇报！”还自鸣得意地向别人说：“在文联团内，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在会上， 我诋毁史达林，咒骂拉科西和格罗，把苏联的外交政策一概斥之为“大国沙文主义”，并捧铁托为“当代英雄”，还宣称：“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我用爱伦堡的小说“解冻”中的阴暗面的描写作为“事实”，用来攻击苏联的制度。我公开说：“官僚主义产生于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本身，不是作风问题。” 当时，沙汀为了帮助我，找我谈了两次波匈事件问题，我都碰回去了。石天河和储一天在会上和我一唱一和。每次时事座谈会上，只听见我们三人在吼叫，闹得乌烟 瘴气。石天河说：“我要是在匈牙利，也会拿起枪来干！”还说：“匈牙利的作家（暴乱分子）值不得。拉科（西——编者）统治时，他们受迫害，为了反对拉科 西。他们也落得了一个反革命的名。这是悲剧！”我们三人中，石天河长于制造修正主义论点，供应给我和储一天，作为打冲锋之用。我还在团小组会上脱衣大骂： “你们用行政压力配合思想改造。结果是一些老实人被压服了，而象我这样的人，却给你们压反了！”“回想几年来的思想改造，好象做了一场恶梦。现在我才醒了！”“你们改造我，越改越坏！”“哪个敢用行政压力，老子就反他！”我们三人抓住个人崇拜问题，发了许多谬论。石天河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终身领袖制不 好，容易产生个人崇拜。”我说：“美国没有个人崇拜，因为总统四年选一次，要崇拜也崇拜不起来。”储一天则热心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中间找空子钻， 常向石天河请教。他用抬高列宁的手法来毁谤史达林。为了掌握修正主义的武器，石天河多次要我“学习理论”。我们有共同的手法：借波匈事件之名，行攻击中国 共产党之实，借反教条主义之名，行反马克思主义之实。我们在多次座谈会上向党进攻，得到了文联内部其他右派分子的回应，使三角同盟向小集团的方向发展。首 先，我的反党言论使陈谦和丘原信任我了。一个夜晚，陈谦来找我。我向他“认错”，说肃反时我看守他诃责他原是出于不得不如此，要他谅解。他果然谅解了。他 爱人原先恨我，见面不理睬，现在却笑嘻嘻地了。通过陈谦，我和自从肃反后就断绝了交谈的丘原也往来了。这一条线，石天河——我——陈谦——丘原，就形成 了。又由于我和晓枫早就熟识，而晓枫那时又和丘陈二人缠得很紧，于是这一条线又串上了晓枫。这中间，我起了最恶劣的联系作用，因为石天河和丘陈晓三人是一 贯极少往来的。另一条线：石天河——储一天——陈谦——遥攀，主要在“草地”活动。最初的小集团就是这样：以石天河为首脑，以我和储一天为核心，共有七个 成员的。

小集团形成后，从三方面向党作了攻击：①夺取“星星”；②扰乱“草地”；③在创作会议上兴风作浪。

早在创作会议 召开前，我就准备闹一场。我最先提出在大会上以个人身份分问题发言，用意是限定领导上只能作一个大报告，而分问题的发言则不受任何拘束，以便自由地散播资 产阶级文艺思想。为此，我准备诗歌问题的发言。这个发言攻击了工农兵方向，摆出了胡风文艺思想中的“题材无差别论”和唯心主义的“灵感论”。石天河夸耀这 个发言是“一次暴动”。

我并煽动黄丹作一个“算旧帐”的文艺批评问题的发言。在会议中，我，储一天，晓枫，丘原，闹得最凶。由于邪气上升，我的发言没有受 到应有的批判，散播敢毒草。储一天和晓枫等人抓住李仑的小说问题攻击了宣传部。我们利用了“自由讨论”“思想解放”等口号来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当时，石 天河说他不善于和这些辩论，所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却利用这次机会和自贡市的一些勾结，并和我商量怎样攻击李累的大报告。他是准备写文章的。同时，他 向我和别人放出空气，说李累故意不叫他参加会议，因为怕他到会上来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小集团是以李累作为攻击对象的。这个策 略出自石天河之手。早在三角同盟形成前，他就恨李累了。他说：“李累在肃反时存心害死他。要不是还有个李友欣，我的性命都完了！”去年冬天，石天河又借着 捧我的文章没有发表一事，反咬李累，并挑起我对李累的怨恨。石天河向我列举了李累的许多“罪状”：“包庇文幸”“喜欢别人捧承”“排斥李友欣”“不学无术”“搞宗派主义”之类。这些毁谤和我自己对李累的不满一拍即合。因此，我也向石天河毁谤李累对我是“一打一拉”“一顿棍子一块糖 ”。我向石天河表示忠诚：“他们无论如何也把我拉不过去的！”石天河为了攻击李累，还采用了讨好常主任和分化李友欣的手法，并将此点传授给我。储一天攻击 李累，则和白航的唆使有关系（储一天向我说过他从白航那里知道李累很“阴险”）。至于丘原和陈谦，早就是不满李累的，因为过去受的批评。

小集团以石天河为首脑。首先是因为他有“学问”，有反党经验，为众所不及。但他也有“缺陷”：一是历史问题，二是脾气凶猛，使得某些右派分子不敢和他直接深交。我则内通储一天，外通晓枫，下通丘原和陈谦。

小 集团以开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文学圈子为目的。我们策画过办同人刊物“笑”，夺取了“星星”，扰乱了“草地”。我们要使文联变质。还在去年，石天河就向我 透露过“改组”文联的纲领：①大大小小的领导人都由文艺界“自由选举”（他说这样李累就要下台）；②取消人事科；③向外“大开门”。这个反党纲领并不是完 整地提出的，而是开谈之间简短地提出的。我是完全支持的。至于丘原和陈谦，他们早就厌倦了机关生活（丘原计划过到新南门外修房子脱离文联）。丘原说：“什 么都是假的。我只崇拜自由！”他和陈谦都劝我搬出文联。晓枫也有过“回乡下搞创作”的打算，并和我商量可否。石天河的主张和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

流 沙河先生的检查交待使“七人反党小集团”成了铁定不改的事实，成了共产党重拳出击处理我们的依据。除流沙河先生一人留机关监督劳动享受干部的待遇外，我们 六个人，一个比一个惨，一个比一个酷：储一天被判处死缓囚于大竹监狱，1982 年才获平反；石天河被判处 15 年有期徒刑长期关押在雷马坪农场，1979 年 才得到昭雪；丘原被开除公职后关押于成都宁夏街市大监用竹筷戳破股动脉自杀而死；瑶攀开除公职送回老家管制，后死于狱中；茜子先后被判处 20 年徒刑关押于 成都劳改队和石棉矿山， 1980 年平反回到单位；我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因不认罪反改造被判刑整整 20 年，受尽酷刑和折磨，1980 年“平反”和“改正”，回归报社。

除 了“七人反党小集团”外，还有“四川省文艺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团”。他们是自贡市文联主席张宇高、诗人李加建、王志杰，川大的学生华剑、成都二师学生徐航 、四川印刷厂工人沈镇、乐山市磷肥厂宣传干事万家骏、星星诗刊主编白航、编辑白堤、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杨干廷、红领巾杂志社编辑罗有年，还有我连名字都不 知道的李远弟、孙遐龄、张望、许君权、李明隽、杨光裕等，再加我们七人。这些人都是当时在四川文坛刚露头角的文学

精英，只因为对《草木篇》批判持不同的声 音，就成了万劫不复的罪人，埋葬了一生。就这么一组不足 400 字的散文诗，毛泽东竟用了一万多条年轻、美丽、潇洒、活泼的生命去陪葬。历史啊，你该怎么评 说？

不过最有趣的是，当时一些在报刊上写文章批判我们的"极积分子"后来也被划成" 右派"送到四川省劳改局（415）筑路支队一起"劳教"。其中一位省文化局南下干部叫高潮的先生，在一篇题为《右派分子群相》的小诗中（见 1957 年 8 月 3 日《成都日报》）是这样写的：

"《流沙河》提起老九少，金堂人人恨！玷辱文坛！还妄想翻云覆雨。借草木而抒情，句句不忘本。翻开农民账簿一看：是个阶级敌人。"

"《晓枫》专门招摇撞骗，毫无文人良心；偷，拿，吓，诈，手艺精---是个流氓出身。青年作家自命，记者招牌蒙人；三个短篇现原形，原来别有用心！"在云南盐津黄桷槽修筑内昆铁路时，竟住在一起，我山上他山下，真有点"风景这边独好"！

第十四章，《成都日报》反右斗争

一个新创刊不足一年半的市级机关报，竟抓了 12 名右派，占全报社 50 名采编人员百分之二十以上。说话是右派，不说话也是右派；拥护运动是右派，不拥护运动也是右派，反正你就是右派。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要想不当右派闭嘴也不行，只能去当咬人的狗。

一，在劫难逃

"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

中 国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唐末，皇帝昏庸无道，贪官污吏横行，诸候拥兵自重，天下大乱。落榜状元黄巢，得仙人指点，说他面相极贵，有九五之尊，将来定是南面 称孤之人。赐天剑一把，叫他日夜演习，到功夫成就，须把天下作恶的八百万人杀绝。黄巢来到一座深山寺庙，日夜苦练本领，所有吃住全由寺庙主持老和尚惮空负 责。大约苦练三年后，已完成神仙剑术九九八十一功，能百步斩敌首级如探囊取物。按照仙人规定日期，立马准备举事。在举事前一夜他向主持老和尚惮空说："师 父，三年来感谢你对我的关照，明天我就要替天行道，兴兵举事开刀杀人。你和庙里僧众，都得去躲一躲。你是知道的，开刀日，我会见人就杀，不分好坏亲疏。今 夜我先告知，也是我对你的报答。"惮空立即将黄巢话告诉僧众，

第二天一早，大家便跑到远远的地方躲起来。惮空是主持，安排好大家后，便寻到山门前一棵千年 老树，见此树枝茂叶密，有一线空心，便钻将进去，藏躲在里面。到了举事时辰，黄巢提剑四处觅人，不见踪影，便来到庙外古树前向天地禀告："苍天在上，今日 乃我黄巢举事之日，寻遍四周不见人影，只好拿此树祭剑。"话毕，举剑一挥，千年古树立刻劈为两段，惮空血头却滚将在地。他失色大呼曰："黄巢杀人八百万， 在劫难逃。"

1957 年毛泽东一手策划发动的"反右"斗争，大概我也属于"在劫难逃"的一个。记得六月五日，省委宣传部组织省市报刊一批 年轻的编辑、记者去参观四川大学学生在鸣放中贴出的大字报和生物系女生冯元春的鸣放大会。在那个大操场的四面墙壁上贴满了学生们所写的各式各样内容的大字 报，火力都集中在学校党委的各种人和事，用词犀利，观点尖鋭，有的甚至是质问口气，总之火气十足。记得有张大字报上这样写着："我们不能再容忍专横无知的 校党委，继续统治管理学校，还我川大民主圣地！我们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大学生要有讲话的权利，过问国家命运的权利，我们决不是盲从！我们有自己的头 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爱憎与是非。用不着强行我们这样和那样。"我读了这些大字报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总觉得前面有雷雨风暴。然后我和同行的四川人民出 版社编辑吴若萍（后划为右派），去到大礼堂参加学生鸣放的公开辩论会。那天是生物系四年级女生冯元春鸣放的辩论会。

冯元春时年 22 岁，四 川青神县人，家里是农民，读书成绩不错，每年都有助学金朴助。她人材中等，穿着朴实，口才不怎样好。那天听她鸣放的人特别多，校内校外至少有两三千人。她 鸣放的题目是"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剥削集团。"她在主席台上面对广大听众不惊不吓极其平静地说：

"所谓无产阶级专 政，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后的革命阶层，也就是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组成政府，借用军队、员警、监狱去专老百姓的政，专全中国人民的政！这个特权阶层从不给人民任何的民主的权利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办事，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关押谁就关押谁，这决不是马列主义者。再有现在工人、农民还比中共建 政前还苦，工厂的利润共产党全搜刮去，地里产的粮食农民不能自由支配… …"她的发言引起一片哗然，既有赞成的掌声，也有反对的怒吼，会场乱成一团。我有点接受不了，认为太反动，向身旁的吴若萍说："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言 论吗？我看公安局肯定会抓她。"吴若萍是南下服务团的大学生，见的世面比我多，现又在省人民出版社当编辑，资讯管道也比我广阔，他想了想说："鸣放是毛主 席提出来的，他老人家说过，纵然说过了头也不关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看抓倒不会抓，批判斗争是逃不过的。"

冯 元春很镇静，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内容继续往下说，她接着提出几个不可辩驳的事实，使全场听众安静了下来。第一个是"高饶事件"她说："根据已发表的材料 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我们请问，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对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是什么？，高饶没有反人民，他也没有和 暴力集团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诉呢？因此，毛主 席是犯了错误，是史达林思想在作祟。"

对于胡风事件，也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她认为，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1 、反党。2 、上书三十万言。3 、组织反革命集团。他说："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诫'。为什么胡风先生公开向共产党中央上书三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我 听得提心吊胆，心里为冯元春捏了一把汗，又暗自佩服她的勇敢，担心会场上会突然跳出个公安把她抓走。据我知，自 1955 年毛泽东把胡风等人定成“反革命” 后，广大知识份子心中是不服气的，但却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来，只是背后私下嘀咕暗潮汹涌而已。而她却敢挺身而出，面对数千听众讲出自己观点，不能不使人赞 叹！

她继续说：“毛泽东主席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模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因此共产党这个剥削集团是巧妙 的，残酷是空前的。它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上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是说我是 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

会场有赞成的 鼓掌，有反对的吼叫，但掌声很快席卷整个会场，掩去了那些反对的吼叫，显然冯元春的鸣放征服了大多数人，那有过的汹涌暗潮，一下从地壳下迸放出来，有点摧 枯拉朽、势不可阻挡之势。在掌声平静后，她接着说：我们学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 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他曾经对我说，美国工人生活水准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 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于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却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而汤教授忠于事 实，却受到迫害。我们党和毛主席没有一点民族气节，却瞎说苏联如何如何好，其实只希望从那里多拿到几个卢布而已。”此时，有人跳上台抢走了她手中的麦克 风，使冯元春再难以讲下去。后来，听说反右结束前，冯元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1972 年被杀于四川南充监狱。其言行精神与林昭相 似，只不过是最早反对毛泽东恶政的女英雄。

二，序幕是这样拉开的

19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派斗争正式在全国登场。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以及费孝通、钱伟长等， 一个一个被揪出来定为右派分子；接着文艺界的冯雪峰、丁玲、陈企霞、秦兆阳等。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自己会成为右派，更未意识到全国 50 多万知识精英会成为 右派，私下和妻子说：“这些对革命有功的人，怎么会去反对共产党呢？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长篇小说，还获得过史达林文学奖呀！”妻子紧紧地搂着孩子 说：“我也搞不清楚，毛主席是怎么想的，不知右派今后的命运怎样？”我平静一笑，无所谓地说：“有什么怎样？运动不就一阵风，完了就完了。”妻子想了多一 阵道：“但愿如此。你不要忘了，孩子满半岁时照像的事啊！”我抱过孩子亲了亲：“乖乖，爸爸忘不了。”

反右烽火如火如荼，报社渐渐开始紧 张起来。突破口是文教组的记者梁正兴。他是四川日报社调来的，瘦高个儿，戴副眼镜，平时少有接触。他的女朋友工作在雅安地委宣传部，两地相思，书信频频。 谈爱情就谈爱情，此兄却将政治掺合进去。他不同意中央把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丁玲、冯雪峰等人划为右派，认为这是以言治罪，剿杀对民主革命有 贡献的人，是专制独裁行为。他的女朋友从“革命大局” 出发，把这些信件寄给了报社党组织。党组织加上按语，又将它贴墙公布。于是群情激愤，梁正兴被揪了出来。不几天又有一位中学女生来信检举他，说他借采访和 她讲恋爱，现在突然变心不理睬她，请报社领

导给予帮助。报社为了弄清问题，立即派出一个姓杨、一个姓彭的记者去调查了解此事。很快查清问题，他已和那个女 学生睡了觉。梁正兴的问题立刻上升为奸污少女的刑事犯罪，很快整成材料上报。五天后，报社在川报大礼堂召开公捕大会。为了起到教育打击的作用，显示无产阶 级专政的强大威力，那天川报员工也全体参加。三四百人坐在一起，神态严肃，同仇敌忾，当党办主任阎凯宣布完梁正兴罪恶事实，两位头戴钢盔的员警，甩着手走 着正步来到主席台，然后取出副鋥亮的手铐，咔嚓一声，把梁正兴两手铐在一起，押了下去。接着是参会人员表态，当然均是事先布置好的极积分子，内容不外乎是 "感谢党、感谢政府，为民除害"之类的套词。后来，听说梁以思想反动和奸污少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一直未予"平反"。另一件事更使我震惊，成都建国 中学党总支书部记兼校长潘清雍，土改时我们在一个工作组，被该校右派体育教师×××行凶砍伤，不久这个教师即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毙掉。我听到这消息后打电 话去慰问潘清雍，但电话里传来老朋友的声音不太友善，他这样提醒我："小黄，要认请形势，主动向组织交待自己的问题。"听后，我有点莫名奇妙："我有什么 问题？"23 年后我"改正"归来去看望他，才告诉我："市委宣传部在我去电话前的三天，就已经找他了解我的言行。" 他只说我"骄傲狂妄，目中无人"，未想到会把我打成"大右派分子"，因为他毕竟了解我："一个学徒娃娃反什么党呵？"

这个时候我没有任何预感自己会被划起为右派，而且会是个大右派！一是认为自己出身好，热爱党和毛主席；二是认为自己没有右派言论，对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人的言论并不苟同；三是自己还参予了对冯元春的批判斗争大会。

中 国的事情说变就变。1957 年 7 月 6 日，中共成都市委派出以副书长张静之先生为首的反右工作组，带领五个干员进驻报社。张是个大麻子，山西人，官运不佳， 传说他曾是国民党还乡团的成员，肃反中被审查过几天。1951 年当过我们土改团的副团长，他知道我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工农干部，有过短暂的接触，对我印象不 错。但"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竟是他手下第一个猎物。很快报社走道、视窗、楼梯，架起了扩音器，成天不停地叫喊："揪出大右派黄泽荣（晓 枫）！""剥下他工人伪装的画皮！""黄泽荣（晓枫）向党和社会主义射出了三支毒箭！"（所谓毒箭就是我所写的三篇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向党反 映》、《上北京》）。

不到半天时间，全报社的过道、走廊、楼梯口，只要是空余的地方全是丑化我的大字报、漫画。这些大字报、漫画，用词之 恶毒，选句之下流，歪曲事实之荒诞，纵是戈培尔先生也望尘莫及。不过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执政者尽皆视为"精品"，就象中国人先初把西方避孕套当成气球 吹玩一样。

我是个天生的不怕权、不怕势的人，一辈子认定事实与死理，不是就是不是。在一次报社召开全体编采人员的定性大会上，不少事先布 置的极积份子们，大声叫我站出来，交待检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不仅不检查交待，还质问那些极积分子："我反了什么党？你们这些地主、资本 家出身的少爷、小姐，才是真正反党的右派分子！"气得这些人拍桌大喊大叫大骂："你为什么要写反党小说？你早就背叛工人阶级了。"我说："是党提倡干预生 活！既然是反党，《草地》为什么要发表它？"打手们底气不足，占不了辩论上风，气得干吼，会场一片混乱，在这个时候编委王畋（1938 年参加革命的老知识 份子，四川日报调来的老报人），突然把桌一拍，挺身而立道："吵什么？你们说小黄是右派，我是五人领导小组的，还没举手同意。" 会议嘎然而止。

想 不到两个小时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出来："王畋老右派！""决不准许王畋包庇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王畋必须向党低头认罪，交待自已反党罪 行！"" ……"此后，他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从行政十五级降为十九级。最后，送到草堂寺去终身相伴"老杜"，一生未娶，直到寿终正寝。

五 人领导小组铁定我为右派分子后，不再处理稿件，每天上班一人坐在办公桌前面壁反省，没人与我说话，没人与我亲善，昨日朋友皆成路人，都是一双双仇恨的眼睛 瞪着我，好似借了他们谷子还了糠。组长肖青再没笑脸，恨恨的好象我挖了她的祖坟。胡克由这个《工商导报》的留用人员，过去对我毕恭毕敬，总是小黄前小黄后 笑咪咪地叫个不停，现在却要我打扫清洁卫生了。陈泽昆、杨蓓、邱干坤三人虽不和我交谈，却以眼神问候。不几天美术组的谭大同悄悄告诉我说："小黄，市上要 开你的斗争大会，势头有点凶，我建议你跑出去躲几天。"平时我和他来往不多，想不到此时却冒着风险透露消息，暗中为我出谋划策。

那天下班 回到家里，妻子见我脸色不好，便哄着襁褓中孩子说："乖，快向爸爸笑一个"。半岁该子已咿呀能语，见着我小脸蛋绽成一朵花，张着手要我抱。我默默地把孩子 抱在手中，说不出是高兴还是凄凉，为了掩饰内心的忐忑与不安，久久地吻着孩子，待情绪稍稍安定后，才将此事告诉妻子。妻听后，为我壮胆说："跑什么？又没 有杀人放火，未必说你反党就反党，斗争会也得讲理呀！"我笑笑硬挺道："不跑！不跑！"心里却在说：我是吃运动饭长大的，要斗争你有什么理不理？不过当时 任何一个人，都对反右斗争严重性认识不足，以为和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 "一样，过上三、五个月，就万事大吉。谁知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决心要把有独立见解的知识份子赶尽杀绝啊！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三十 四）

三，千人斗争我的大会

1957 年 7 月 19 日早晨，我起床洗漱完毕，第一件事就是去街头一家鲜奶店，给女儿取牛奶。当我一跨出房门，报社两个反右极积分子就跟上我。此两 人就是调查核实梁正兴案的杨、彭两人，尽管长期来他们写不出消息、通讯，可追踪盯梢、检举揭发却很在行。我心里咯噔

一下，准备甩掉他们一走了之，但想到头 一天晚上，已向妻说过“ 不跑”的话，便打消了念头。到了牛奶店，我故意闪进路边公厕，急得杨、彭两人一头大汗，象苍蝇样满街乱窜。我心里好笑，暗暗骂：“你们也想盯梢？两个笨 蛋！”

我取完牛奶回到家，不慌不忙地吃罢继母给我作的早点汤圆，然后骑上自行车，穿街走巷，从从容容向报社飞驰而去。进了报社大门，我架 上车，沿着之字拐的铁楼梯爬上二搂，阎凯即将我叫到办公室，向我作思想安定工作。他开门见山说：“小黄，今天市上要开你的批斗会，有不少领导在场，你可要 冷静啊！一定要好好接受大家批判。我希望你要向党低头认罪，千万不要耍牛脾气，切不可冲动。只要你能好好承认错误，今后仍是好同志。”我无表情地点头，然 后下得楼梯，跟着全报社人排队结合，向总府街省府礼堂走去。

我一走进省府招待所大门，空场上大坝子和两面墙壁上，全是五彩缤纷的大字报与 漫画。这些大字报、漫画是挂在临时牵起的长棕绳上，呼啦啦的在风中摇曳，象一排乐队演唱什么好听的音乐，迎接勇士的到来。我侧目四看，那些大字报、漫画全 是揭露丑化我的东西，有点像贴在厕所、粪坑旁边的小广告，自无事实可言，要想怎么写就么写，要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只需想像和捏造，用不着求证和核实，真造 就了不少扯谎“英雄”，刷新了党八股纪录，为十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可资的样板。我缓步登上石阶，进得大礼堂黑压压的全是人，楼上楼下近两千个 座位全无虚席，数百双说不清表情的眼睛向我投来。我不惊不诧坐到第八排居中的位置上，心里在想：劲仗有点大，会不会逮捕我？管它妈的，躲脱不是祸，是祸躲 不脱，要怎样也由不得自已了。我放眼看去，主席台前面上首，悬着巨幅红底白字的横额，斗大一行字： “揭发批判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斗争大会”。台上坐着不少省市领导，有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省文联创作辅导部部长李累、中共市委书记郭实夫 、副秘书长张静山等。揭发批判大会由我们报社总编张烈夫主持，当他宣布揭发批判会正式开始，会场上响起了怒吼的狂涛：“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站起来！” 我佯装未听见，直直地坐着不动。人们再次狂叫，我仍然不动。于是有几个外单位的极积分子上前来拉我，我仍拒不站起来。在争执中，我一件新光日本府绸衬衫被 撕裂条大口，会场秩序开始有点乱。主持会议的张烈夫总编辑，知道我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便转个圈子说：“同志们，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不站起来，说明 他坚持反动立场，我们现在就开始揭发他，看他低头不低头。”

我一生写过不少打油诗，其中有首《无题》，非常适用于此种场合。诗云：“白银 耀眼金发光，珍馐美味最安肠。高官诱惑真君子，一点偿赐奴才忙。墙倒众推不费力，长听鹦鹉骂梅香。安全莫过猎死虎，杀了肥猪好分赃。”那些揭发批判我的 人，有的是当年土改团的战友，有的是经我培养入党而当上乡长的农民。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各自为着一个目的：紧跟形势，抓住机遇，捞点油水，得点利益。当 然，一个个锐不可当，说假话面不改色，放狗屁仍像人样。我坐着，静静地听着他们的揭发，他们的批判，就象看戏样地有趣。难道这些说得口沫四溅，语无伦次的 人真正恨我吗？我既未从他们口袋里扒走一个铜版，更未把他们三代单传的儿子扔进池塘，更未戏弄过他们的老婆，哪来这样大的仇恨？哪来这样大的劲头？只有一 个解释：毛伟人的“阶级斗争”学说，把人变成了疯子和魔鬼，什么胡活、屁话，都能登上大雅之堂。

批斗会自始至终开得热火朝天，但被批斗的 我始终未站起来，大家没有目睹风彩总是遗憾。大约两个多小时后会场又卷起一阵狂涛：“叫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站起来接受批判！”我仍然不站，于是有几 个像公安局的彪形大汉，上前来拉我。我脑袋嗡嗡地发热，竟和出

手的人推拉起来，眼看就要发生想不到的意外事情。党办主任阎凯急忙上前，架开拉扯我的人，然 后低声向我说："小黄，听我话站起一下。"我顺从地站了一分鈡，然后又坐下去。

揭发批判斗争会开了整整一天，可能是发言的人说累了，参会 听的人听腻了，到散会前夕，张烈夫总编辑叫我上台表态。在千百双眼睛的期待下，我走上主席台，面对麦克风说了三句话。我说："我对共产党既无杀父之仇，更 无倒楣之怨；我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我不是右派，历史会给我作出公正结论。"参会的人不依不饶，我以飘然走下主席台，在一遍嘶裂的叫喊 声中我坐在原位上巍然不动。

第二天（1957 年 7 月 20 日），省市各报刊均以显着位置，刋登了批判斗争我的消息。《成都日报》在一版上，用了这样赫然的通栏标题："成都市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及新闻界、文艺界人士举行大会，声讨右派分子晓枫的反动言行"

成 都日报 20 日讯："在省人民委员会礼堂反驳右派分子、流氓晓枫（即黄泽荣成都日报文艺组编辑）大会，除该报全体工作人员外，还有成都市新闻界、文艺界人 士、工人代表、市郊农民代表以及省市区级党政机关干部 1400 余人，大会开了一整天，与会者一致严正斥责右派分子、流氓晓枫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晓枫 在会上作了两次狡辩，态度蛮横，耍尽了各种无耻的流氓手段，丝毫没有悔罪的表现，激起了全体与会者的愤怒。大会还将继续举行。"以下分为六个部分，约 15000 字，整整三大版。在此，不想再累赘那些疯话屁话，免污染环境。不过有一点应说清楚的，他们为什么要在"右派分子"后给我加上一个"流氓"二字？ 按说文解字：流者水也，涉川谥山，终日不停，是谓流；氓者亡民也，无固定职业，飘忽不定是谓氓。现代词语中的流氓，便是成天无所事是，不是混迹赌场，便是 浪荡花街，不是调戏妇女，便是聚众滋事。本人何曾有此劣行？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细思再三，终于找出原委：记得在 1951 年参加农村土改工作时，我是双水碾村工作组组长。那时，一位贫农的女儿、武装班班长蓝秀琼经常陪我一道深入乡村，访贫问苦，了解情况。由于长时间的接触，她对我产生了好感。一次，她悄悄塞了两个煮熟的鸡蛋给我，说是她妈妈给的，一时弄得我很为难。那时候的青年人很单纯，他们的心透明得简直就像一汪 清澈的泉水，收了两个熟鸡蛋，内心当然会感到忐忑不安。于是，主动向土改工作组大组长文理阳 "坦白"了自己的"错误"。当时，文大组长还笑我"真有趣"。想不到在五年后，这位文大组长却又把这件事作为"钢鞭材料"送到报社，这又给我增加一条莫须 有的 "罪状"，并且还在千人斗争大会上揭发批判我"早在 1951 年搞土改时就违犯纪律，乱搞男女关系，可恨不可恨……"呵，原来如此！"流氓"这顶帽子当然非 我莫属。

我在组诗《风波万里》中曾写道："百家争鸣不是鸣，党同伐异才是真。琳琅满目大字报，举国上下同一文。我辈吃若缘笃信，上当被骗在于诚。斗争会上敢较劲，蜀中右派我有名。

四，覆巢之下无完卵

挨 了一天的斗争批判，人搞得很疲倦，心里极度愤怒与不满，可有什么办法，你能抱起石头砸天吗？好在妻子早早回到家，搂着我心疼地问："怎样，他们打了你 吗？" 女儿不知人世迁变，仍然张着胖嘟嘟的小手要我抱。我上前抱起孩子爱怜地亲吻着，心里愤懑似乎平静了许多。妻子发现我撕烂的衬衣，细细地检查我身上有无伤 痕，在确定没有伤痕后才放心说："还好，只是衣服撕烂了，怎么撕烂的？"我本想大声说出事情原委，突见窗前有人影幌动，探头望去，原是彭、杨两位积极分子 奉命前来监督我的行动，三双眼睛相对显得很尴

尬。

“小黄，没什么，我们来看看你，怕你想不通。”姓彭的矮个子皮笑肉不笑，还是相沿旧有的称呼，笨嘴笨舌作解释。我也礼貌性地表示说：“谢谢你们的关心”。

继母像示威似的特别做了一大桌菜，还买了瓶白酒摆在桌上，大声故意地说给远远监视我的彭、杨两人听：“天底下有这样的怪事，一个三代受苦的徒弟娃，还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不断安慰继母说：“婶婶，相信党和毛主席，不会冤枉好人的。”

那晚妻子紧紧搂着我，不断吻、不断亲，深怕失去我。我也睡得不好，想去想来想了很多。透过朦朦月色，长望窗外石榴树出神。那两位元监视我的人，半夜也不睡，老在窗前走去走来，真烦人啊！我静静看着熟睡中的妻子和孩子，想着半月前允诺的全家照相的事，不会成为泡影吧？

第 二天去到办公室，像往常一样翻阅着桌上的报纸，《四川日报》、《成都日报》、《四川工人报》、《四川青年报》，全是有关斗争批判我的消息、特写、通讯和读 者来信。我心里想，共产党用得着花这么大的力气来对付一个小青年么？这不是在用大炮打蚊子吗！再细读那些揭发批判我的内容，不是编造便是夸大，甚至好些是 无中生有。我凝目深深沉思：共产党的报纸难道是说假话的报纸，对其他右派也这样吗？看来这场反右斗争有点瞎搞，不是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于是，更坚定了 我不是右派的决心。杨蓓、陈泽昆、邱干坤沉默看报无语，不时投来关注的目光。通过对我声势浩大的斗争、揭发、批判，似乎这团火会延烧到他们身上，表情略呈 紧张。肖青、胡克山一边看报，一边注意我的行为，使平日宁静、和谐的办公室，一下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报社反右斗争五人领导小组乘胜追击，楼道走廊里的扩 音器总是在不停地叫，每叫一次，就揪出一个右派，战果辉煌，敌人众多啊！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伟人”的英明指示下， 报社编辑、记者中的精英们，一个个纷纷中箭落马。最先揪出的是杨蓓和邱干坤，因两人在一个半月前奉命去采访老作家李劼人（《死水微烂》作者），写了篇通讯 《棱窝访劼老》，文中有“流沙河、丘原、晓枫，是省内有才华、有希望、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作者，虽有错误，党要爱护他们、关怀他们……”成了为右派壮胆打气 的反党文章。开初，杨蓓置之一哂，没有怎样去理睬，来去上班依然装束清丽，谈吐自如，没当成一回事。小组几次开她批判斗争会，会场冷冷落落开不起来。一则 她人缘好，二则大家找不出批她的材料。市委张静山副秘书长，不愧是抗日时期老干部，拿出了“挖地三尺”的硬功，指示说：“她是华西大学校花，校花有什么好 东西？从她人品上去找！”主人吩咐，奴才们敢不执行，经过几天外调，美术组一位画师立即泡制出一幅别开生面的漫画大字报：画面上杨蓓，浓装艳抹，坦胸露 怀，修长大腿赤裸到臂部，站在一部吉普车上兜风，两个大鼻子老美紧紧地搂着她。画上一行大字：校花杨蓓丑态。

中国是一个封建国家，自古有 句俗话“男怕背盗，女怕背娼。”谁个女人一和娼沾上边，这个女人就完了。是姑娘嫁不出去，是妻子丈夫会马上与你离婚。贞洁贵于生命啊！当杨蓓一看到这幅漫 画时，微笑消失了，清丽不见了，勾着脸再抬不起头，好像在人前矮了半个身子。没过多久时间，她十三中教书的老公，向她提出离婚，她没说一句话，含泪在离婚 书上签了字，自此终生未嫁直到老死。

邱干坤新从成都市话剧团调来，连报社“地皮子都还没有踩热活”（成都话不久的意思），即

成为右派，你说冤不冤？他刚新婚，窗户上喜花仍在，老婆即与他离婚，后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饿死于三年“自然灾害”。

号 称“多宝道人”的陈泽昆，尽管他深悉世态，知进知退，报社内和报社外召开的各种“鸣放”会，连屁也没有放一个，也被定为右派。他私下说：“中共建政前我是 《工商导报》总编辑，说话是右派，不说话也是右派，我不当右派谁人当右派？”所幸他很“认罪”，无论各种会都把自已臭骂一顿，后来获得“从宽处理”，行政 降职三级，调到人民银行去打杂。接着，组长肖青的老公苏定生先生（南下服务团学生、从四川日报社调来报社，出任政法组长），因主张“报纸要关心人民群众生 活，向不良行为作斗争”，也沦为右派。当我看到他是右派的大字报后，心里很高兴，暗自说： “肖大姐，你反去反来反到你老公头上了，还积极不？”我观察几天，并未影响她的极积性，对我还是那样厉害。一天我百无聊赖，信笔在纸上写下“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十个大字，被她发现，一手抢过去大叫：“快来看，右派分子晓枫又在恶毒攻击诬蔑我们社会主义，倡狂向党进攻！”当然引来一场新的批斗。不过她 并未和苏定生离婚（他们已有两个小孩），却用了种新的划清界限办法，对老公实施“家庭专政”，即家里一切杂活诸如洗衣、做饭、清洁卫生、刷地板、倒马桶之 类，均由老公包干，若想做爱，得事先打报告经批准。这位十分有新闻才华的南下青年干部，不足四十岁就便郁郁而死，可惜啊可惜！

文教组的孙 文元也中箭落马，他也是（《工商导报》）的业务尖子，平时对人态度极好，对领导更是唯唯诺诺，就因为他是老报人，必也难逃此劫，有什么办法，名气在那里 了。新从市农委调到财贸组的宋德贵，听说因工作上问题和张烈夫总编辑顶了下嘴，也被抛出打入另册。西藏军区转业军人摄影师美术组的张蜀华，在斗争我时他还 上台作过精采发言，现在也成了右派。据说因他和组长王平关系不协调，王怕他太积极太超前拿走组长，不知怎么向张秘书长一汇报，就戴上这顶挥之不去的“铁 帽”。财务组的周俊修因不是知识份子，却逃不脱坏分子的帽子。一个不足五十名编采人员的成都日报社右派分子多过 12 人。1958 年又补了一次课，编委段星 樵、党办主任阎凯被“补了进去”，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啊！邻近的四川日报社战果更为辉煌，150 多人的编采队竟然有 50 几个右派；省文联《星星》编辑部从主 编白航，到编辑石天河、流沙河、白峡等四人无一幸免，全成了牛鬼蛇神。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三十五）

五，我要活到“共产主义”

那 两只讨厌的“苍蝇”成天都跟着我飞，挥也挥不去。每天晚上他们都守在我的门前，要不要还在窗户上幌动下脑袋。我发现他们不是防我跑，是担心我受不住压力自 杀。我想了很久该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话挑明。三天后的一个早晨，我穿戴好衣服，刮净胡子，容光换发，一身精神，笑嘻嘻地向他们说：“不好意思，你们 守了我几个晚上，真辛苦，连茶也没有喝一杯。我知道你们怕我想不通自杀，不会的！我要活到共产主义，要过一过‘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 话’的共产主义日子。请你们告诉张秘书长，我问候他。”

这一招还真灵，守候我的人第二天就撤走了，批判斗争却升了温，隔三差五一次大小 会，

逼令交待与流沙河、石天河、丘原、茜子等人的关系，说些什么？密谋些什么？渐次渐次迫我交出来往信件，我怕牵连他人，一个晚上，我将不少读者对我小说 《给团省委的一封信》读后的称赞书简，一火烧掉。妻子看见问：“烧它干什么？”我回道：“别留着害人。”妻无言，脸色越来越忧郁。市委张静山副秘书长和他 领导的反右五人小组，发现从我口里抠不出什么东西，又见我态度仍然强硬，便组织人拼命写大报，竟然将大字报贴到我住家街道门前的宿舍走道两旁，花花绿绿有 百多张。只要我上下班一经过，便有小孩子追着喊：“右派、右派，晓枫，黄泽荣……”我心里不是滋味，但又无法表述与回击，这些孩子并不明白事理，受政治空 气在操控，就像污浊河沟里没一个干净的蝌蚪。一天，我在家吃饭，一群孩子竟然追进院子来喊，我继母动气了，认为欺人太甚，一边骂这些不懂事的孩子，一边动 手撕扯这些大字报，并边撕边骂：“你们做事也太欺人了，贴大字报贴在单位就够了嘛，哪有贴到别人家里来的道理？我儿子是右派我总不是右派嘛！……”妻子有 点担心，怕这一撕惹出麻烦。我不言声，心里特高兴：撕，撕，撕，撕个精光，连报社的一下撕才好哩！可能他们也认为此做法理亏，那两个监视我的彭、杨极积分 子也不敢上前阻止，无声无息地溜回报社汇报去了，不过此后再没人敢把大字报贴到家里来，看来做人还得勇敢一点。

报社反右斗争搞得轰轰烈 烈，批判斗争火力转向新揪出来的右派杨蓓、陈泽昆、邱干坤、苏定生等人身上，倒把我闲置起来。我便借这闲暇时间，大读特读各种名着，如《契可夫短篇小说全 集》和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书陪伴着我苦闷的日子，知识填补着我空虚的心灵，它给我启迪，它给我力量。通过这些名着，使我更认识了眼 前这是非颠倒的世界，人性的真善美丑也在这里受到检验。想不到财贸组的王传生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扔来一个小小的纸团，我溜进厕所打开一看，上面写着这么 一首诗：“不要气馁，不要失望，是金子永远闪光，是脓疱一撅不振！”我心里一热，险些流出眼泪来。想不到这位平时从无交往的同志，能冒风险送来关怀支持。又一天中午我去厨房取饭，一位姓刘的炊食员见四下无人，竟然给我一大 勺红烧肉，笑着小声说：“吃好吃饱身体好，放宽心想开点，”我默默点头，以示感谢。

我独坐椅上，抱着高尔基的《人世间》冥冥地沉思苦 想：整个中国无处不充塞着利与害，升和沉的格杀，善与恶，美和丑的争斗。在这无情的格杀争斗中，胜和败往往取决于人的良知和灵魂的洁净。可是政治运动一个 接一个，它不但污染了社会环境也扭曲了人性，造就出一个一个的变态的“英雄”，又伤害了一个一个活脱脱的纯洁生命。这些“英雄”，这些生命，全是在这不见 硝烟战斗中拚杀的结果。因此，每个人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变成了一颗杀伤力极强的子弹，自己若要晋升提拔，就必须踩着对方的肩头或射穿他的心脏，不然什么也得 不到。生与死，荣与衰，常常是一念之间。人，有生命有渴求的人，谁不趋利避害，谁又不为利禄奔忙？正因为如此，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学说，才把人的一切最 卑劣、最无耻、最邪恶、最残忍、最下流、最暴虐、最冷酷、最丑陋的灵魂调动起来，并贯以全新的、生动的、美妙的革命词藻，让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大胆作恶。于 是，卖友求荣成了“追求进步”，落井下石成了“站稳立场”，捏造陷害成了“靠近组织”，告密检举成了“追求进步”，一切被亵渎，一切被颠倒，人世间再没有 宽容、怜恤、同情、仁慈。于是整个社会、国家、民族全沉论堕落在你死我活的格斗中。我曾经是这个堕落的追随者，沉沦的营造者，但在这个时候仍有人关怀我， 看来人世间任有未被腐蚀泯灭的良心，怎不使我动容！

八月初的一个星期日，我和妻往带着孩子去人民公园游园，突然发现几个面熟的人在我身后指指点点。我搜索枯肠想了会儿，原来是 1952 年“三反运动”我在市税务局打过的“老虎”。那场近似玩笑式的运动早已结束，他们也再不是“老虎”了，我却 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

派”，一下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回避还是面对？我思虑片刻，大大方方走过去向他们深深一鞠躬，说：“同志，对不起，我当年把你 们搞错了，特向你们致歉。”这几只当年的“老虎”有些蒙了，静了会儿，内中一人开怀大笑地说“晓枫同志，稳住，也许他们把你也搞错了。”不待我回答，他们 一闪身加快脚步离开了。我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喃喃自语：“也许他们把你也搞错了……”

全国反右斗争在“伟人”的亲自领导布署下，取得 了可喜的局面，除一些民主人士、名专家、名学者纷纷落马外，运动忽然转向党内。一天，张烈夫总编辑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态度极好地教育我一番说：“小 黄，对错误认识得怎样？不要悲观嘛，只要能下定决心改就是好同志，照样会有前途。”

>张总编辑是我１９５１年在市郊和平乡土改工作 团的团长，后又是我在三区工作的区委书记，他曾在煤油灯下手把手地教过我的识字，我也曾扛着枪保护他下村的安全，一年前他出任日报总编辑又调我来文艺组作 编辑。用他的话说，我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干部”，可他没有保护我，照样把我定为“右派”。后听人说，他想保，保不了，上面早早发下话：“晓枫支持流沙河 《草木篇》，又参予茜子‘贝多芬俱乐部’，是个‘极右分子’！”有什么办法，到哪座山唱哪支歌，别人也有儿有女啊！

“我天天在思考，为什么自已会成为右派？”我低低回答，望着他那张似笑非笑深不可测，刮得光光的脸。“这就对了”他拍了拍我的肩头，突然话锋一转说：“你和叶石部长关系不错，他召开的几次鸣放座谈会，你是参加者。他在会上是怎样动员大家发言的，说了些什么？怎么说的？”

我 骤然感到：上面要揪叶石了。叶石是是中共成都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宣传部部长，主管全市教育、卫生、文化艺术口，不但有文化水准，还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对人 不拿架子，是我最尊敬的一个领导干部。我不能落井下石，便支吾其词说：“叶部长没说什么呀！叫大家鸣放不能远离‘双百’方针。”他见我口风紧，只淡淡一笑 说：“ 也没什么，上面叫问一问。”

>当夜回家，我把这一情况告诉妻子。妻不相信说：“不可能啊！昨天叶部长还在市府大礼堂，向全 市小学教师作报告，动员反右斗争。”果不出所料，一周后，叶石部长在全省党代表会上，被省委书记李井泉亲点为党内“大右派分子”。40 年后才知道有两个原 因把他打成右派。一是，他自来和省委一把手李井泉书记关系不好，1957 年 3 月上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后去看望中央一位老领导，出门恰遇李井泉也上门来拜望。李心虚，怀疑叶石向中央领导反映了他的问题；二是，他说李井泉未 原原本本传达毛主席反右斗争的指示，只有六条划右派的标准，而没有不划右派的六条标准。提供这个材料的人是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守愚，也就是《鲜为人知 毛泽东故事》作者张戎的父亲。当然，这些都是共产党内部狗咬狗的争斗，但也可以说明一点，反右是在整人，整那些不听领导话的人。

全国不断 抓右派，右派也在不断升级，从人民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从思想意识形态变成了反动分子。我们逐步感觉到它不同于过去的政治运动，看来结果会不妙。因此单 位对我们一步一步的加温，开始还一边工作一边反省，后来只反省不再工作，再后赶到报社印刷厂去撤铅版打杂，再再后是集中学习不准回家。有什么办法，应了古 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既然是圈进铁笼子里的牲口，就等着屠夫的宰杀吧！

六，轻轻松松失去自由

1954 年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 ”。但是，这部宪法从来没有实行过，任何公民从来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纵观历史，横看世界，古今中外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任何政党都不具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 分的权力和职能。即使执政党，也绝不例外。执政党不等于党执政。党是党，政是政，党、政必须泾渭分明。不得党政不分，不得党政合一，不得以党代政，不得一 党专政。党的信仰、主张、纲领和方针、政策、策略，不是通过党的直接执政、而是通过全体党员的共同努力和辛勤工作来实施的。即使公民犯了罪错，政党只能建 议政府职能部门依法查处，不得擅自直接给犯有罪错的公民以处分的。再有，任何政党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都是非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未曾授予中国共产党、 中国也没有哪部法律赋予中国共产党可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非党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处分，是无法可依、违背宪法的，是非法的。

再 看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对党员的最高处分是开除党籍，党章并无书载党具有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的职能，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非党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处分． 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无章可循、违背党章的。还有世界上任何政党都无权直接给另一政党成员以处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应该是政治上平等、组织上独立 的政党，彼此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各民主党派成员以戴右派帽子的处分，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违背组织原则的， 开创了国际玩笑的先河。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先生在他《依法治国的一些思考》一文中写道：“ 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未经任何法定程式，就凭中共中央一个通知，《人民日报》的一篇名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就搞起来了，结果把大批知识份子，机关 干部和民主人士打成‘右派分子’，造成严重后果，使党内‘左’倾错误和骄傲情绪日益发展起来”。胡平在《一九五七•苦难的祭坛》中指 出：“……从现代法理上讲，反右运动实际上是一次由国家实施的犯罪，由国家有组织诬陷公民、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直至非法拘禁，滥用刑罚等等。‘改正’反 右运动，首先就必须涉及国家罪错问题。但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所谓国家罪错，从来就是一个巨大的理所当然的空白，更不会有任何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历次罪错承 担半点责任…”

在中国，根本无自由和人权可言，不要说“地、富、反、坏、右”纵是清清白白的平民百姓或国家的机关干部以及党团员又怎样？ “三反”一来，领导动下嘴：全部集中学习，不准外出，吃住行统一行动，谁敢说这是违犯法律；“肃反”一夜之间翻箱倒柜，把所有人的来往书信与日记查个遍看 个遍，谁敢吱一声？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在 “一言而为天下法尊崇“人治”的中国，尽管有 1949 年的“共同纲领”和 1954 年的宪法，实际上仍是一个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国家，毛泽东自诩是“和尚打 伞，无发（法）无天”。在 1959 年他在一个批示中明白申言：“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实行，何必要什么法律……”

尽 管反右斗争始于 1957 年 6 月，但中共只有划“右派的任务数”，却无划“右派的标准”，直到 1957 年 10 月 15 日，毛泽东才羞羞答答的通过中共中央下发 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通知说：“自反右派斗争开始以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分别拟定了一些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要求中央予以审查批准。考虑到 斗争中的实际需要，中央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以免各单位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有畸轻畸重的地方。现在将经过中央讨论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 准》“标准”有六条：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

否 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 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 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 动和组织原则。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 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 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通 知”还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 这种意见的分子。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又说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于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1）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 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2）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 过，而且已经认为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3）对 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4） 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杜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 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5）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着的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6）凡是界乎 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对待他们。”

从 这些历史档不难看出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反“反右斗争运动”，完全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运动，也是违反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运动，可是党内党外各级领导 干部却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对他，相反大唱赞歌，鼓掌拥护，而这些被划为右派的分子还相互揭发，俯首就范，竟没一个人说“不！”。我想，如果当时右派们敢联合 起来说 “不”，决不会有二十多年的悲惨命运。直到今天已耄耋之年老右们，仍然逆来顺受，不敢签名，不敢联合起来向中共讨回公道。我在我诗集《风波万里》扉页上写 道： “中国知识份子最大的悲哀，天生的软弱；中国人民最大的不幸，迷信皇帝。”祖国啊亲爱的祖国，你何时才真正给予你儿孙自由与民主？

有 了这把“上方宝剑”，于是在 1957 年“十·一”前夕，党办主任阎凯把我们 12 名“ 分子”召集一起宣布：“根据市委通知，从现在起，你们要集中在单位学习，统一食宿，听候处理，想

得通要执行，想不通也要执行。这是规定，这是纪律！”大家 面面相觑，敢说个不字吗？静了好半天，邱干坤低声地提出个请求了：“阎主任，我妻子马上临产了，她母亲不在成都，能否过了中秋，我又不会……”阎主任一脸 严肃，想也不想回答道：“恐怕不好办，这是市委的规定，哪个人没点特殊情况，集中再说吧。”本来还有几个人也想诉诉苦衷，一见这情况谁还讨没趣呢！

宣 布完毕，每人给半天时间回家取行李。我回到家妻还未下班，继母见问：“怎么这么早就回来，有什么事吧？”我没正面回答，从继母手中抱过孩子，不停在她小脸 蛋上亲吻。孩子两只小手搂着我的脖子，咿呀咿呀吐词不清地叫个不停“爸爸，爸爸” 。我取出为她出生时买的玩具爬娃，扭上发条放在桌上，爬娃“喀咔喀咔”的扭动屁股在桌上爬来爬去。孩子看见突然动起来的爬娃很惊诧，但没有哭，只紧紧抱着 我看，咯咯地笑。不知为什么，我快活不起来，心坎上像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一种不祥的阴影总追随着我，对家眷恋的情感越来越浓，生怕失去她似的。这是一个 普通的家，每一件物品都是一个故事，姐姐在我结婚前将自用的楠木藤床送给我时深含感情地说：“荣弟，你总算苦出了头，不容易啊！你十二岁当学徒，十五岁参 加革命，十七岁就养活爸爸、婶婶，帮姐姐担了责任。现在结婚了，我和你二哥没什么送的，送你们这张楠木藤床，伴你们一生一世，百头偕老，恩恩爱爱，幸幸福 福，永远跟着毛主席走，把工作干得更好，为黄家争光。”她母亲虽然对这桩婚姻不甚满意，也送了家里唯一值钱的一张红色木桌，一再叮咛我说：“我把女儿交给 你了，一要对她好，二不要叫他累，三你要进步快一点，不能老是个组长。”

我立刻趴在地上向她磕了三个头说：“妈，你放心吧，我会努力 的。”当我去年调入报社，在创作上获点小名气，她常拿着发了我文章的报刊，在认识的人中炫耀说：“ 我那女婿读书不多，你们看他文章写得多好，有点鬼聪明。”现在我成了大右派，她又该怎样向人们说呢？桌上小圆钟敲过六下，告诉我妻要回来了。我每晚伏案写 稿，她特地买回这架钟，作出硬性规定：每晚不能超过下夜两点。我谨守规定，到了下夜两点就乖乖上床睡觉，唯怕惊动熟睡中的她，动作总是轻轻地惟恐打扰了她 的睡眠。正想着，房门轻轻启开，妻抱着一束晚香玉笑盈盈地走进来，见我在家喜得上前一吻，尔后又吻孩子。晚香玉的香味弥漫一室，她一边插花一边说：“时间 过的真快，转眼就是元旦了。今年元旦正赶上礼拜有两天假，我们带着孩子去新都桂湖玩怎样？桂湖的金桂真香啊！我记得杨升庵有两句诗：‘月色染碧水，香飘十 里闻’。你去了也写它一首怎样？”我静静地没有说话眼角挂着悲伤，妻一下发现我表情阴沉不禁大声问：“有什么事，你今天怎么不高兴？”我把孩子交给她，习 惯性地在屋中踱了几步说：“今晚我就要搬到机关去住。”她一下惊了：“为什么？”我望着窗外黑下来的天，一字一板说：“市-委-决-定-必-须-服- 从！”她没言串，默默地抱着孩子出神。孩子在她怀中叫爸叫妈，手舞足蹈，高兴极了，可她怎知爱她的爸爸就要离开了啊！

我吃罢晚饭，匆匆忙 忙收拾行礼，继母在一旁无语相伴，从脸上表情看，有种说不出的难过。我知道此时我的情感表情影响着全家，纵然未来灾难巨大，作儿子、做丈夫、当爸爸的我， 也不能让她们不高兴啊！我调整下情绪，强装笑脸高高兴兴地说：“ 没什么，集中学习几天，地点在报社，我三天两头会回来的，又不是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充军。”妻子笑了：“要你去西伯利亚，我和孩子来陪你。”

 从 住家中新街去报社布后街，步行约十分钟，妻坚持要送我只好同意。我们两人踏着夜色头顶星光，她手抱孩子我肩扛行李，沿着总府街、商业场、华新街、藩署街， 一步一步向集中地报社食堂走去。我们走得很沉重，双脚像灌了铅铁，每向前挪动一步都十分艰难，但

又不得不往前走。在这个组织决定大于一切的社会里，我们的 命运，我们的幸福，都牢牢控制在党的手里。党是我们的母亲，党是我们的归宿地，像水和空气一分一秒也离不开，纵然叫我们去死，我们敢说不死吗？！到了目的 地，党办和保卫科的人，已经在那里清点人数。妻子住脚重重地握着我的手，又叫我亲吻一下孩子，然后我便跨入那深深的青砖大门砌起的门洞，想不到此去便再未 回家了。

这种监禁有如现在的"双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双规"规的是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那时"规"的是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在"整风"中向领导提意见的人。当夜我们集中住在食堂旁边的两大间集体宿舍，白天劳动拔草打扫清洁卫生，晚上各自看书学习互不说话，默默地考虑和审视着明 天：明天是什么？命运之舟将驶向何处？

这些时侯我仍然惜时如金，集中精力阅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普希金的抒情诗集。当我读到苏俄十二月党人的命运时，感到与眼前我们命运十分近似。但他们作为反对沙皇的囚徒，却能与家人在一起，我们还未放逐便天各一方了。历史啊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部什么历史？

北京倪艮山 2006 年 12 月 17 日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三十六）

第十五章 劳教收容

"劳教"是中共反人道反法治的一大创造，开人类无需任何国家法律行为，仅凭单位头头一句话即可治人于死地。自此一个单位就是一个王国，一位领导就是一个皇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中国哪还有民主自由？

一、仓惶匆忙辞家

翻开每天报纸有关反右斗争的消息渐渐少了，不再是今天揪出谁明天揪出谁的报道，多是某某单位、工厂、农业社，如何通过"反右斗争"带来了新气象、新 面貌，以及某某反右派积极分子入党入团走上领导工作岗位，也就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总结性语言，所谓"抓革命，促生产"。在人民群众在分享"革命"的胜 利果实的"大好形势"下，我等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臭不可闻的东西。没人敢和我们说话，纵是再好的亲戚朋友如在街上相遇顶多从眼神里传达出一个示意 问候的信息。我们被社会遗弃了，在人世间绝对地被孤立了。大街小巷成日播放着紧跟时代的革命歌曲："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 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右派分子反也反不了……"

听到这些歌，看到这些张张陌生的眼神，纵是意志再坚强的人， 也开始怀疑自已是否错了？于是不少顽固的右派分子开始低头向人民"请罪"，主动写检查写交待，我仍坚持"别人是右派，我不是右派"的观点，还是我行我素一 付不倒威的样子。每天吃罢早餐集体去报社印刷厂劳动，但走路从不敢抬头，脚步快得

如飞，惟恐被街上认识的小朋友看见尾追不舍高喊：“右派右派，是个妖 怪”。不过印刷厂工人也不为难我们，更不呵叱我们，但绝对不会同我们说话聊天，那界线是划得十分清楚的，不得不使我怀念起工人阶级的生活来，有点失悔“误 无岐途”。

印刷厂在中新街，是《工商导报》的老地址，一楼一底宽宽大大。在无人的时候陈泽昆便偷偷向我讲述一下他当年做总编辑的荣光。 他说：“解放前我们办了两张报纸，日报和晚报，你猜多少人？不到二十个编辑、记者，可消息全是抓回来的，很少用中央社的稿件。经理、主任和我都有单独办公 室，杨蓓也有一间……”我见没人注意我们，低低问一句：“工资够生活吗？”他把折下的铅字归好位送到字架上，回到原处坐下后才说：“够啊，一般编辑、记者 四五十个银元，我一百出头，养活全家四口绰绰有余。”我惊得张着一个大嘴：“这样多呀！”我又问：“你们那时报上登的东西都是事实吗？听说还敢骂国民 党？”他道：“当然是事实，其实工商导报有几个共产党员，常常把解放区的事情拿到报上登，国民党控制不了新闻，它虽然有检查制度，那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一 不对我们就［开天窗］以示抗议。那时一个记者有无本事，就是能不能抓到新闻，这可是个学问。”虽然我在报社呆了一年多从无有人讲过这方面的事情，现经他这 么一说来了兴趣，便刨根挖底问一句：“到底什么是新闻？”他想了会儿说：“这很难讲明白，这样吧我们这职业有句行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 新闻就是新奇的、刚刚发生的、为大众关心的事情，决不是上面的指示和命令。”我竟然忘记处境与忧愁，哈哈地笑出声来：“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 闻。”此言一直嵌刻在心，受用一辈子。新闻决不是人民喉舌，革命的工具，新闻就是新闻，发生在生活中真真实实的东西。1980 年“改正”回归后，我应邀去 盐道街中学向高中毕业班讲新闻，不仅照搬了此次交谈，还作了发挥“中国媒体是党的喉舌，西方媒体是社会的眼睛。两者的区别是喉舌与眼睛。”

在 印刷厂劳动一晃就是近一个月时间，我不仅习惯而且有了感情，还学到铅字排版的一些基本技术，甚至愿此生此世就当个印刷工人。但好景不长，一天我在折一个打 乱的铅板时发现，在零星杂乱的铅字里有“处分”、“黄泽荣”、“右派”等字样，但还是揣摸不出一个结果。不过有个预感，我的问题即将有个结果了。什么结 果？总有个不祥的预感。一天在厕所里解手，邱乾坤悄悄问我：“小黄，你看元旦会不会准许我们回家？我老耽心爱人产后情况。”我想了想道：“可能会准许我们 回家吧？，我们毕竟没犯法嘛。”他信心不足地摇摇头说：“你没见《人民日报》社论说‘右派就是反动派’，反动派是专政的对象啊！”我听后有点生气地说： “反动派？我们反了谁，不就是说点错话，写错几篇文章，也不能太过分了。”外面传来脚步声，邱乾坤不敢再往下说，倖倖地走了。在距离 1958 年元旦还有四 天（即 1957 年 12 月 27 日）的一个上午，我和集中的 12 名右派份子作完印刷厂的清洁卫生，未等坐下来喘气，人事保卫科姓傅的科员走来向我说：“黄泽 荣，阎主任叫你去他办公室，现在就跟我走。”

傅是个矮胖子，宽皮大脸，一身是肉，反右前一见着我总是笑嘻嘻的客气极了，老当着面向人夸 赞我：“小黄是我们报社最有才华的笔杆子，写出的文章有劳动人民气息，不愧是工人阶级。”现在不但没笑，反一脸都是仇恨，好像我把他

九世单传的儿子扔在尿 缸里似的。不过他没有为难我，不是那种一味挣表现的坏人，后来官至成都红旗拖拉机厂的党委书记。我没有犹豫也没有去细想，即忙洗净手跟着他去到有一个多月 未跨进报社大门的编辑部。

编辑部一切依旧，树绿草碧，安静无声，自行车架得一马整齐，楼梯过道干净无尘，只是昔日墙壁上“反右斗争”的 大字报换成了“庆祝我社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办好党报为社会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标语。在楼梯口碰上不少熟人，别人一见我早杷脸转过去，纵是迎面相撞也不认 识似的。过去我不懂得什么叫“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现在才有点明白。进得办公室，阎凯主任示意叫我坐下，态度和往常一样和霭安詳。他笑着打量我一眼，然 后静静地说：“小黄，今天组织上决定对你的问题要作出处理决定，本来处理可以轻一些，主要是你态度不好造成。你太牛，不听党的话，如果你在斗争会上能低头 认罪，也不会有现在这个结果。今后只要你能听党的话，好好改造思想，走社会主义道路，仍然可以回到报社……”

他在说我在想：“到底是什么处分？开除回家或是回到茶厂，反正不是逮捕。听党话，改造思想，仍然会回到报社，难道是下放农村？”

“给你处分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阎凯主任说出处分的结果，大概担心我接受不了，又把劳教的前景讲了一番：“劳动教养有工资，被教养的人享有公 民权，还有通讯自由，属于最高行政处分，给你留有后路。”他说到这里，突然转头问我：“小黄，你对组织上的处分有什么意见？”

我有什么意见，案板上的肉，想怎么砍就怎么砍，能怎样？何况当时人们对劳教闹不明白，以为像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所写的《教育的诗篇》一样，其中有 “劳教”一词，大意是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孤儿，生活无着，流浪街头，政府把他们收容集中起来，送到特有的工厂、农庄去劳动，对他们实行一边干活、一边学习的“劳动教养”政策，使他们很快成为自食其力有利于国家建设的人材。在劳动教养场所里，工作人员对教养的孩子从不打不骂，生活上关怀备至亲如父 母。劳动教养场所里有电灯、电话、食堂、图书馆、宿舍、澡堂，劳动轻轻松松，周末还有文娱演出等。谁知道中国的劳教比监狱还监狱，比地牢还地牢，不知道对 右派分子实行“劳教”就等于判处无期徒刑！如果早知道劳教是这么霸道，没有一个人去就范。天真是五十年热血代青年的特色，忠于共产党是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 最伟大的悲剧。

反右运动使近一半中国知识份子菁英被打成了右派。（法新社）

经过他一番细致的思想工作，我居然对自己的处分十分满意，认为只是暂时离开机关一年半戴，劳动锻炼一个时候便会回到报社重新拿起笔来写东西。所以，便高高兴兴地点点头说：“我接受组织处理，一定好好改造思想，争取早日回到报社。”阎凯主任对我的回答很是满意，接着说：“现在就去会议室，开完会你就回 家收拾东西，然后报社派人送你去收容站。”

出得办公室，我跟着阎凯主任来到编辑部会议室。会议室里早已坐满了人，一双双不可明状的眼光 向我投来，是惋惜、同情、怜恤，还是幸灾乐祸？说不清，看不明，反正机关经过这场运动后，人和人的关系变得深下可测。我像往常一样，缓步微笑地走进会议 室，在一张设定的空椅上安祥地坐下来，接着阎凯代表报社党委宣读了我的处分决定。决定有三条：一，书写反党反社会主义作品《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和续篇《向 党反映》《上北京》，影响很坏，流毒极广；二，支持流沙河大毒草《草木篇》，并与石天河、邱原、茜子、瑶攀、储一天等人结成“七人反党小集团”；三，在运 动中态度恶劣，拒不认罪，坚持反动立场等。宣读完毕也不征求谁的意见，在座的人们报以一阵热烈鼓掌表示拥护。会后，去食堂吃报社最后一餐饭，那天中午菜饭 特别好，有昙子肉、红烧肉、宫保鸡丁，可我仍很节省，只花一毛钱买了两个稍晕和二两粮的米饭后，把余剩的饭菜票退成钱粮拿回家交给了妻子。如果早知道劳教 吃不饱，我定会全买成馒头至少饱胀一顿，后来悔了好久好久。

吃完饭，报社除人事保卫科的老傅外，另增加了一个给张烈夫总编开车的崔司机，护送“保卫”我一同回家。这个崔司机是部队转业军人，任务是开车，我一次去外地采访也坐过他的车，服务十分殷勤，自始至终一付笑脸，生怕得罪我而丢了 饭碗。现在革命立场陡然坚定，自我一成为右派后不论在何处见着我都鼓着双牛眼睛，恨不砍我三刀方解胸中之恨。现在他奉命送我去劳教场所，更显得立场坚定几 乎是步步紧贴，惟恐我跑了似的。回到家妻已在屋里等候，想毕是组织上已告知了她，眼睛红红地抱着还有七天才满一岁的女儿。女儿不知爸爸即将走入地狱，仍然 欢欢蹦蹦吐词不清地叫着“爸爸抱，爸爸抱。”我从妻手中接过孩子，无言默默长吻，凄然一笑，似向女儿又像面对妻子说：“放心，我会好好改造思想，很快会回 来，短三月长半年。”妻无语，一脸愁云，无法释去

压在心里的石头，紧紧攥着我的手不忍离去。

生离死别乃人世间最大的悲苦，何况年少夫妻 外加幼女咿呀，更频添离愁千层，别绪万端。女人谁不为自己丈夫担忧，而此时我安慰她的最好办法就是紧紧一抱，热热一吻，我欲掩上房门，那押送我的崔姓司机 却双手叉腰站在门边一动不动，还恶狠狠地说一句：“关门干啥？”我也不客气地回一句：“干啥？两个月没在一起了，想吻吻她。”妻白我一眼，显得很不好意 思，忙用话岔开说：“你要带些什么，？我给你收拾。”我瞪了这个混帐一眼，心里骂道：“狗仗人势，欺老子太过份了”只好故意提高嗓门，既是说给妻听也是说 给押送的人听：“不是去了就不回来，阎主任说劳教是公民，有选举权，改造好了还可以回报社工作。” 这招还灵，不但崔司机泄了气，妻脸上也绽出了笑，他不再贴门站着。我把行李捆扎好，再在挎包里装上不少书，然后摸出衣兜里钱粮和解下腕上罗马进手表，交在 妻子手里说：“这些东西全留在家里，万一缺钱卖了就是，回来再买。”妻推回我的手道：“带上吧，你不是说短三个月长半年吗，怎么会差钱去卖东西呢？放心， 你走时家是什么样，回来家还是什么样。”虽如此说，我还是把东西留给了她。

正说着，继母买菜回到家，放下菜篮即生火做饭。我向她说： “婶婶，饭不吃了，你抱上琦儿，我要和俊华说几句话。”继母知趣地抱走孩子，我再次关上房门上了闩，一把抱住妻不停地狂吻。妻胆怯地望着门外，生怕押送者 再次推开房门，一边害羞地说：“什么时候了，还想这个”。我道：“怎么不想，两个月了，你怕什么，他再敢来推老子就骂。”妻顺从地倒在床上让我抚爱。之 后，我打开房门，扛上行李，十分惬意地向着两位押送者说：“走吧，辛苦你们了。”此情此景我在一首诗中写道：

母伴征程妻送行，简装负荷步履轻。
无言胜有千万语，微笑却见泪水盈。
最是凄切情深处，怀里娇儿咿呀声。
强忍辛酸扬长去，隔街尤听叫我名。

二、何谓劳动教养

1957 年毛泽东巧施“引蛇出洞”的“阳谋”奸计，以号召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提意见的手段，在全国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大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 子”。据有关统计表明，从 1957 年 6 月到 1957 年 7 月末，全国就已经抓出四十多万右派分子，随着运动不断升级和伟人突发奇思的指示以及性质的不断变 化，右派已从人民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已从革命派变成反动派。既然如此，这些被戴上右派铁帽的“反动派”，必然要从革命阵营中清洗出去。去哪里呢？逮捕 法办投入监狱，于情理不服，因为中国法律历来无一条因言治罪的条款，何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明文写道“公民有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这些人绝大部分 是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为共产党夺取政权流过血、卖过命应是有功之臣，有的还是有影响、有地位的，何况他们的“落网”是响应领袖的“伟大号召”，不处理吧 运动就白搞了。今后便再难以管住他们的嘴巴，

那“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还有什么威信？

毛泽东身边有的是文胆，有的是谋士，很 快为他设计出了一套惩治右派两全齐美又万无一失的良策方案，这就是所谓的“劳动教养”。“劳动教养”就是不通过任何法定程序和法律手段，只需单位党委的一 个决定就把你一切自由与生存权利剥夺个精光，让你干着比劳改犯人还苦还累的活儿，过着比地主长工还饥还饿的日子，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绝大部分中青年知识分 子的苦难命运，自此造就了许许多多惨绝人寰的悲剧！

为了弄清什么是“劳动教养问题”，我在进入劳教收容站后曾把１９５７年８月１日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的１９５７年８月３日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反反复复地读了十多遍和研究了十多遍，才发现这部恶法是专为我们右派而设置的，现将全文引述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条的规定，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劳动教养问题，作如下决定：

一、对于下列几种人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

（１）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２）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３）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４）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二、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

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按照其劳动成果发给适当的工资；并且可以酌量扣出其一部分工资，作为其家属赡养费或者本人安家立业的储备金。

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期间，必须遵守劳动教养机关规定的纪律，违反纪律的，应当受到行政处分，违法犯罪的，应当依法处理。

在教育管理方面，应当采用劳动生产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并且规定他们必须遵守的纪律和制度，帮助他们建立爱国守法和劳动光荣的观念，学习劳动生产的技术，养成爱好劳动的习惯，使他们成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自食其力的劳动

者。

三、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或者它们委托的机关批准。

四、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期间，表现良好而有就业条件的，经劳动教养机关批准，可以另行就业；原送请劳动教养的单位、家长、监护人请求领回自行负责管教的，劳动教养机关也可以酌请批准。

五、劳动教养机关，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建立或者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建立。劳动教养机关的工作，由民政、公安部门共同负责领导和管理。”

这 部恶法的第一条“对于下列几种人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其中二、三、四欵都是对准右派的，它款款兑现，字字落实，可是在第二条“劳动教养，是对于被 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五个条款中，却欵款虚拟字字骗人。不难看出毛泽东从发动反右到对右派的处理， 全是一个一个的骗局，也是今日中国社会不讲诚信的根本原因。既然政府在骗人，国家领导人在骗人，为什么人民群众还要去讲诚信？翻遍中外历史，全世界最不讲 诚信的领袖和政党是毛泽东和共产党，没有丝毫的人性和人道可言。所以右派劳教的命运比任何国家犯人的命运还悲惨，还凄凉，还暴烈。

这部 “恶法”至今还存在，至今还在残害着中国人民。中共各级组织凭着这部恶法，就能把他们视为不顺眼的分子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便能送进监狱与劳改场所，真到 了“和高打伞无法（发）无天”的地步。再看，1954 年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 平等。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可是这部宪法从来没有实行过，任何公民从来没有受到法律的保障。不论过去和现在。再有，自有文字 記载以来，历史上任何政党都不具备直接给处分非党公民的权力和职能。即使是执政党也不例外。因为执政党不等于党执政，党是党，政是政，党、政必须泾渭分 明，不得党政不分，不得党政合一，不得以党代政，不得一党专政。纵是神权合一的宗教，也有宗教的裁判所，哪像共产党赤裸裸地挥刀舞剑吃人不吐骨头。

党 的信仰、主张、纲领和方针、政策、策略，不是通过党的直接执政，而是通过全体党员的共同努力和辛勤工作来实施的。即使公民犯了罪错，政党只能建议政府职能 部门依法查处，是不得擅自直接给犯有罪错的公民以处分的。中共对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处理，完全违宪违法，不但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根本就是毛 泽东一人说了算。他不但强奸了千千万万烈士们抛头颅，洒热血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强奸了“伟、光、正”的中国共产党。可是直到今天，中共也不愿意 扔去那条血污的裤子，仍穿在身上耀武扬威，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坚持走镇压人民的老路，还是轻车熟路准备再来表演一次！我们不禁要问：“恶法何时休？自由民 主何时来？”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三十七）

四、形形色色的“分子”

天涯石劳教收容站的任务，是把全市各党政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开除公 职的各种分子，送来劳动教养的人员集中起来，到一定数量后再送往正式设定的劳教场所实施劳教。在这里只要你不逃跑或不给他们找麻烦就行，它好像是一座保管 粮食的仓库，只要粮食不短斤少两，不霉不烂就算完成了“革命”任务。所以，在这短暂相聚的时间里互相可以私下打探情况，诸如怎样划成右派的，是什么分子， 有无管制等等。在一次饭后的闲谈中大家说我最划算，写了大毒草小说又上了千人斗争大会竟然没有判管制。我听后笑笑很有经验地道：“有什么奇怪，1951 年 镇压反革命，杀的都虾虾鱼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以上就很少了，军长几乎一个都没有。”李必登道：“晓枫说得有道理，北京那些挂帅人物，章伯均、章乃 器、罗隆基、储安平啦，我看一个都不会开除公职送来劳动教养，吃肉的照样吃肉，坐车的照样坐车，只有我们这些小人物真冤？又挨斗争又吃苦……”三十多岁的 王工是一家国防厂矿的工程师，不竟苦笑一下说：“你冤还有我冤，我才真的冤啊！”一旁凑热闹的人都想知个究竟，便催促道：“你说说怎么个冤法？”

王 工环顾四周一眼，清了清嗓子，确定没有打小报告的人在现场后，才不慌不慢说出他的冤情。他是西安人，1956 年调来成都一家国营工厂负责技术调配工作，为 人老实忠厚，是个地道的书呆子。共产党整风一开始，他历经风霜熟读中国历史的父亲就从老家发来信，叫他切忌不要在会上鸣放，告戒他历朝历代当皇帝的都喜欢 听好听的话顺耳的话，决不喜欢说他这不是那不是的人。于是他谨尊父命，无论会上会下一个字都不说。九月一天中午气候潮热，他想去取盆自来水冲凉，拿着脸盆 从党委书記办公室门前经过，听见里面有扑哧朴哧的响动。他一半警惕一半好奇，倚门向里一瞧，正看见书記搂着厂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技术员在乱来。不知是紧张 还是胆怯，他立即缩头往回走，不注意一个头却撞在棵大树上，脸盆咣当当在地上滚了老远，痛得捂头啊哟大叫。书記开门出来見是他，定定神没说什么，只是关切 地问了一句：“怎么，撞伤没有？”他以为书記发现了他的偷窥行为，极不自然停地抱歉说：“书记，实在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书記似明白不明白地 道：“你在说些什么啊，啥子有意无意？”他嗯嗯地不知该怎么回答，聪明的书記却明白是怎么回事，皮笑肉不笑道：“王工，多注意点，把心放在工作上吧，不该 管的事少去管他为好。”他诺诺点头：“我知道，我知道。”没过几天便是国庆节，在厂里召开的庆祝纪念会上，他是节目主持人，可不知怎么说溜了口还是有过的 习惯，把热烈庆祝“十一国庆节”，说成是热烈庆祝“双十国庆节”，当场被揪下主席台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还是书記说情没有送公安局，只将他打成右派开 除公职，判处管制劳教三年。

睡我铺前面两个位置的老朱，是税务局的干部，此君平时不看报不听广播，喜欢喝二两白干和哼几句川剧。当报上 登载出储安平“党天下”定为右派反动言论后，在学习会上有人进行批判反驳。他老兄只因刚喝了几杯全兴大曲头脑尚未清醒，就二昏昏（四川话：似醒非醒）地 说：“不……不对啊，我们国家是……是共产党领导的，当然……是‘党天下’。这，这怎么是右派反党言论呢？” 这还了得，公开支持赞同大右派储安平观点，当然难逃其咎。那个刚满二十岁叫陈正阳的是川大中文系学生，在报上大批特批流沙河《草不篇》时，不知是出于义愤 还是想借势扬名，梦觉觉地写了篇《向沙汀老师请教》的反批评文章寄给《四川日报》，文章虽未挨着报屁股，却成了“出师未捷死先死”的“烈士”。他成天垂头 叹气地说：“这

世道哪还有点民主自由？一篇文章就是罪，还没有登出来呀！”

李必登是统计局的团委书记，鸣放时连屁也没有放一个，却对报 刋上大肆反击右派言论深表不满，私下在日记上写道：“党和毛主席动员别人鸣放，还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现在怎么说别人是诬蔑攻 击，有点出尔反尔了吧？”那天他不在办公室，有个正在争取入党的极积分子无意中偷看了他的日記，当即交给领导，第二就被揪出划为全局极右分子。一位姓周的 小学校长听了这些稀奇古怪的言谈后笑笑说：“我比你们更冤哩，火烧眉毛的八月是反右关键时刻，我们中心校十八位教师，按毛主席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丈量，怎么 也揪不出一个右派，区文教局郑局长在会上问我：你们学校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抓出一个右派？我说局长呀，我们学校是全市拔尖学校，学生成绩不错，当然没有右 派。局长说，你说这话就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说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别人不是右派你就是右派。我就就样成了右派。”

相较之下我真比他们划算，庆幸报社还讲政策，要按照他们单位这样抓，不知报社还要抓出多少个右派？大约两天后又送来几个“分子”，其中一个姓王的是忠烈祠街派出所户藉，他扔下被卷便抱头痛哭，一边哭一边说：“再怎样也应让我住一宿嘛，堂都拜了呀！呜呜，呜呜……”

原 来今天是他结婚大喜庆日子，请了不少亲戚朋友，他高高兴兴把新娘接回家，红烛高照，鞭炮不断，拜天地拜爹娘，夫妻相拜入洞房。然后是大宴宾客觥筹交错，正 当酒还未过三巡之时，突然闯入几位不速之客，原来是单位整风小组的人，就这样以坏分子名义从席间把他押走送来收容所。大家听后觉得太违背人情有点过份，只 能愤愤然而已。我有点不理解，一个管段户籍怎么成了坏分子？原来他是一个前途看好的公安，有文化知识，有工作能力，人也长得伸展（成都话：英俊的意思）， 在这之前他和区公安分局局长女儿耍朋友，耍了一年多不知什么原因他不干了，无论所长怎样做工作他也不同意，并私底向人说：“那姑娘没女人味”。现在虽然找 到了有女人味的老婆，可未尝尝便来了这里。单位以他乱搞男女关系定他为坏分子，趁今天结婚揪了他终为局长出了一口恶气。与他同来姓范的是区粮站的站长，志 愿军转业军人，生来脾气古怪，性格倔强，一次为工作和局长吵起来，局长急了骂他混帐，他挥起一拳把局长打个狗吃屎。有人叫：“范站长，那是你领导，不能打 啊！”他正在气头上回一句：“老子专打领导。” 这还了得，一顶“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不歪不斜戴在了他的头上，现在后悔可为时已晚。

最有趣的是上山开拔前一晚，那位凶暴的蔡干事也扛着行李进了大殿，他无声无息耷拉着脑袋，那双狗熊眼再没有凶光，一言不发地低着头坐在草席上发呆，显得内疚与惶恐。大家也不难为他，也不好上前去打听。尹悄声咬着我耳朵说：“他妈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蛋—自找苦吃。”

原 来前一个晚上，他值夜斑借工作的方便，把陈茜茜叫到办公室个别谈话，，问东问西原形毕露，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动起手来。陈茜茜岂非下贱姑娘，开始还东藏西 躲叫他别乱来。他不听欲霸王硬上，茜茜立即大声呼救，这下老兄成了不折不扣的坏分子。我听后笑骂道：“无耻禽兽，捶他一顿！”

千奇又百怪，生活真精彩！

五、重兵押送去农场

在收容站呆了快六天，也就是 1958 年 1 月 2 日，晚饭后上面来了指示：今晚两点起床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去农场。什么农场？在何方何地？极度机密，没有明示，给大家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这晚同学们根本没睡，早早打好被盖卷，三个一堆五个一砣坐在被盖卷上瞎猜瞎想：

去 什么农场，方位在哪里？这个农场设施怎么样，有没有图 书馆、电灯、电话、拖拉机？农场生活又怎样，吃大米还是吃包谷？至少不会吃臭麦麸面吧，还会不会饿肚子？到了下夜两点，大组长尹从厨房领来几箩筐馒头，每 个二两一人三个，说是第二天路上口粮。有的人拿上就往嘴里送，恨不一口就吞下去。尹根据上面意思说："同学们，请不要现在吃，这是路上的干粮，要到明天晚 上才有饭吃。"有的人还是不听，继续放开肚子吃。紧挨着我身边的李必登说："晓枫，饿了你就吃吧，昨天我女朋友给我送了两斤夹心饼干和一听罐头，现在把罐 头敲开怎样？"我挡住说"我来得晚，肚皮里还有油水，你要吃就自个吃吧。"他敲开罐头不由分说硬塞几块给我。要在外面是极其平常的东西，在此时此刻却甚是 珍珠玛瑙。

到了下夜三点，上面发下指令：集合！我们近百人分成十人一排，站在坝子里点名清查人数，然后在收容站干事的引领下，次沿着弯 弯曲曲高低不平的庙宇小路，低着头挨着肩鱼贯向前而行。小路两旁全是持枪解放军警卫，个个凶神恶煞像十殿阎罗，那寒森森的刺刀就在眼前晃来晃去，冷光寒气 逼人心跳，数十只电筒光在天上地下不停摇拽，更显得气氛万分紧张。

"跟上！走快！跟上！"

"不要掉队，快，快，快！"

威 严的声音，威严的催促，发自那威严的解放军警卫。曾记五二年一个严冬，成都向新疆输出一批重刑犯就是这样押上车的，而今却是自己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 河西"人世错忤，谁能预料？革命，革命，可怕的暴力革命，今天在别人脖子上架上刺刀，明天自己脖子上也会有刺刀。你要想没有刺刀，就不要在别人脖子上架刺 刀！因果循环，历来如此。

我们有的扛着背包，有的挑着行李，不敢左顾右盼，一步一趋地迈着碎步不停地往前窜，往前窜。人影在黑夜中摇 晃，因过度紧张而流出的虚汗洒在不平的小道上。听不见声音，只有小跑的脚步敲击着沉睡的城市。在不前不见头后不瞧尾的黑夜笼罩的街道上，早停着几辆罩好篷 布的大卡车，每辆车头顶上架有机枪。按规定每辆车得坐二十四人，六人一排分四排；两排靠车厢，两排背靠背居中而坐。每车先上四人安排行李，然后再上车，一 车刚好二十四人。车头除架有机枪外，车尾还有两个手端冲锋枪的押送武装。各车装载好人后，押送的警干逐车检查再次核实人数，确定无误后吹起一声长哨，汽车 启动马达轰隆隆地转动了轱辘，车队鸣着喇叭，闪着车灯，穿街走巷绕过沉睡的城市，出得南门向新津方向急行驶去。

车上的人有的咽泣，有的 无言流泪，更多的人和我一样，默默地望着消失在车后的街道以及街市两旁的建筑物，渐次渐次留在眼底的是盏盏灯火，再后什么也不见了，只有黑黝黝的树，分不 出轮廓的地，混沌沌的天。故乡呵，再见了！远行的儿子几时才能回到您的怀抱？睡梦中的妻子，酣眠里的孩子，梦魂萦绕的继母，你们可知道，你的亲人正向黑暗 走去，

走去……

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南行公路上颠颠簸簸急驶，到新津渡时天刚放亮。新津是成都的门户，波涛汹涌的岷江紧紧地守护着它。初唐 王勃有诗云：“城阙辅三秦，风烟连五津”，五津中的一津就有新津。那时岷江没有桥，来往车辆全靠鉄皮渡船摆渡。过渡一要排队，二要下车，我们是特殊公民， 既不排队也不下车，连人带车抢先而过，这就是中国权力的威力，也是只有我们能享受到如此的“殊荣”。过了新津渡，借着渐明的天色，车前出现了陌生的山丘、乡镇，似乎距离故乡已有万里之遥了。在进入彭山一个拐角处车速减慢，正赶上一群上学的孩子，当时正值干部下放时期，他（她）们以为车上载的是“下放干 部”，便齐呼呼地鼓掌：“欢迎！欢迎！”可当看见车头有机枪车尾有武装，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便改口高喊：“打倒反革命！打倒反革命！”

一 种无可明状的羞辱感重重地压在心上，我们不但被共产党抛弃和社会抛弃，连不懂世的孩子也视我们为敌人，难道我们真的有罪吗？怀疑，踟蹰，肯定，推翻，在一 切以政治思想和阶级立场划线的中国，罪与非罪，善和恶，好和怀的分水岭，已彻底地打了个颠倒，全易位更迭了！未来的国家与民族将会是个什么面貌？

汽 车过了夹江县转入上山的路，人迹渐次稀少不见院落村镇，马达因上行吃力发出呜呜喘气的悲鸣。大家呆坐无语表情各异，车外是红红的山石，绿绿的古树，怪异的 崖壁；车内是无语的泪眼，愁态百结的面容，麻木僵硬的肢体。身旁的李必登老看着手里那个空空的罐头铁皮筒，舍不得扔去，似乎它还有无穷的开发价值；身右侧 的王工安祥地闭着双眼，不停地胸前划着十字，原来他是基督徒，希望上帝保佑他的未来。车速越来越慢，爬上山披又一个山披，一个山披比一个山披荒凉，没有 人，没有村，只有默默无言的树和普天下同一形的乌鸦，以及那弯弯曲曲愈来愈窄的黄泥土道，无穷无尽不见首尾。渐次渐次，我们在汽车的哭泣声中昏昏睡去，梦 里却还是成都的春熙路、人民公园的荷塘，慈母飘飞的白发，妻子花样的脸庞、女儿朝霞似的笑脸……哦，这些全没有了，全没有了，我低低地吟哦道：天涯不断相 思路，梦里归客蓉城心。少年初谙南冠味，千古文章写悲情。写悲情，泪沾襟，无语无语伤离分。但愿来日春来早，荷塘再沉双倩影。

身旁的王 工文学功底不错，在这离情惜家的此时此刻，他不禁放声低哦杜甫《新婚别》的诗句来：“菟丝附篷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妻子，席不 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劳教在何方］？”他将“守边赴河阳”一句改成“劳教在何方”到也贴切。我望着他默默点头表示同意，又听得 他继续往下念：“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想不到一千二百多年前的杜子美先生，这首《新婚别》竟是为我们而写。不仅我是“新婚 别”，车中好些同学都是“新婚别”啊！伤感噬心，别情盘肠，我由不得复诵品味末尾四句：“仰视百飞鸟，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妻（君）永相望。……”

下午 5 点汽车驶入峨边县沙坪镇，我们没有资格去镇里只能远远望它一眼。它在大渡河边，地处汉彝交处的凉山，大有边城风光异族情调，给人 凭添几分离愁。我们扛着行李步上索桥，索桥在空中晃荡，巨流在脚下奔跑，吼声如雷，浪击云天，惊心动魄，掠魂夺胆。我们小小翼翼抓住铁索，移着碎步来到大 渡江边空旷无人的沙坝里，在几幢帐篷前整队集合。先按小组请点人数，然后依次进入指定的帐篷。放下行李，打开被卷，今夜就与它同眠了。大渡河，历史的河， 荒凉的河，千百年来埋葬了多少英雄？又吞噬了多少豪杰？今天我们

来到你身边，你却不停地怒吼，不停地咆哮，是在为我们鸣不平？还是在?说人世间有过的冤 屈？你说呀！你说呀！

捎事休息后，一声夺命的哨音大家钻出帐篷集合，又是排队又是请点人数，在确定人数无误后，押送干警里的头头大声向 我们宣布道："今晚住在大渡河边帐蓬里，不准随意走动，晚上解手要先喊报告，经解放军同意后才能出来，否则后果自负。我再强调一句：枪子是不长眼睛的，谁 撞上谁活该！"话声冷涩无情，像把剑重重地戳在心窝里，又疼痛又苦楚不是股味道。好在肚子的嘀咕掩去了不快，队伍解散后大家即拿上碗筷，跟着大组长尹向开 饭地点扑去。我见几个穿着劳改衣服的大汉抬着重沉沉的几大锣锅走来，到目地后他们放下锣锅揭去木盖，里面全是黄金干色的不知名的东西，未别是蛋炒饭吗？一 问才知是包谷沙沙和大米混合煮出的饭，当地叫"金包银"，味道很香极了，引人嘴馋。
这一餐不定量尽肚皮装。不知是肚餓还是出于新鲜，我竟吃下三 大碗，嘿，真好吃啊！在吃饭时候我偷偷向送饭的犯人打听，才知他们原先都是乡保甲长，是"四大运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抓判的。我 心里嘀咕，不会遇上被我抓判过的人吧？说来真巧，竟有人主动上前招呼我："你是黄同志吗，我是双水碾村的陈志勇，还认识不？那年土改我被判了七年，今年底 就满刑回家了。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哦"了声，嘴巴张得大大的不知说什么好？真叫冤家路窄，竟在这里碰面了。人到此时还有隐瞒的， 就实话实说吧。我沉默片刻强装笑脸道："犯错误，当右派了，送到这里来劳教。"我把"劳教"二字加得重重的，似乎觉得我还是比他好，是"劳教"不是"劳 改"，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他不计较这些，也不提过去的事情，真诚地安慰我道："我们这儿是沙坪劳改农场的临时接待站，几天接待一批，记不清你们是十 一批还是十二批？队长向我们讲过，我们也问过，右派是说话上犯的事。不过山上冷，气候不好，现已是一遍雪。黄工作队（他仍接过去的口吻叫我），你要多带几 件衣服啊！要是到太阳坪就好了，那里暖和。"我真有点感动，一个曾被我损伤过而弄去判刑的人却如此关心我，没一点恨一点怨，真让人感动！我几次都想对他一 鞠躬说声对不起，但不知什么原因到口的话又咽了回去。他似乎看出我的尬尴，坦然一笑道："关你个人什么，那是公家事，再说我当过几年地方上的保队副，结了 不少仇，劳改劳改也好，总算把大烟忌掉了。"他这么一说我也就放心了，便压低声调提出我们一行人最关心的问题问他："山上怎样？劳动干什么？三顿吃得饱 不？"他诚实一笑道："我们原来人少，都集中在太阳坪，大堡两个中队，是种庄稼，现在一下增加了这么多人，干什么就不知道了。说到吃饱吧，那就看各人了， 国家粮食定量，填不满肚子山上野菜多，反正饿不着。"他不敢再多说，收拾起空锣锅一溜烟走了。

尽管长途坐车颠簸一天，人很疲劳腰也酸 胀，但再怎样都睡不觉，帐篷上首挂的那盏煤油马灯，老是不停摇曳摇曳，时明时暗昏昏的灯光照着表情各异的睡脸，偶尔还有两三声梦呓。呼啦啦的山风时不时地 叩击帐篷，使帐篷发出难听的怪叫。不知疲备的大渡河在夜静日深的此刻更是发狂的吼，那打在山崖上的狂涛巨浪更叫人惊心动魄，像是要把沙丘上的十多座小小帐 篷一口吞噬。同学们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我抱头久久无言地望着篷顶上悬着的马灯，它渐渐转化为妻子妩媚的脸庞，女儿天真无邪的伊呀，继母慈祥的眼神，她们 向我招手向我走来，我伸出双臂去拥抱，可怎么也抱不上，一层黑黑的光膜把我们分成两个世界，远远的远远的。突然，一位同学的小解"报告！"和执夜武装森冷 的呵斥"去！"一下使我省悟过来：我们再不是革命者，而己是一个彻头彻尾转徙天涯的囚徒，一个中共视为的"反动分子"的右派！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归故里？ 我无语在心里写道："奔雷咆哮百里闻，峰险

崖陡日月昏。昏灯照脸征客泪，风寒作伴离人魂。借问归期何是日？关山迢迢云沉沉；尘寰谁不伤离痛？两地凄切断肠 人！”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三十八）

第十六章 劳教的冻馁之乡“沙坪农场”

沙坪，峨边沙坪！成千上万的右派在这里“脱胎换骨”，走所谓“改恶从善”的道路。但是，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饥饿。共产党说“重新做人”要过好三个 关口，第一个关“生活关”；第二个关“劳动关”；第三个关“思想关”。可是好些右派同学第一个关就没过出来，别说第二关第三关了。

一、沙坪劳改农场的来历

峨边沙坪劳改农场位于成都西南 300 公里，地处小凉山。这里一年四季气候恶劣，阴风怒号，霜剑冰刀，野兽横行。它前有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后有 800 里莽莽的原始森林，是一座天造地设的监狱。关押在这里的人纵有双翅也逃不出这险恶的鬼门关。150 多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西征至此，也未逾越此天险 闹过全军覆没，拆戟沉沙，留下累累白骨。

这里原是荒无人烟，屙屎都不生蛆的地方。1949 年 4 月国共“分江而治”的谈判破裂，共军横渡 长江立即挥师南下，国军势如破竹节节败退。蒋介石先生本欲死守“北有秦岭之险，东有长江之阻，西与南皆为蛮荒之地”的巴蜀，可是在毛泽东强大的“文攻武 卫”打击下，守土将领刘文辉、潘文华、田颂尧、邓锡候等不战而降，使四川获得了“和平解放”的美称。共产党接手后并不按照“和平协议”办事，仍把放下枪的 敌人斩尽杀绝，关的关，毙的毙，这叫“矫枉必须过正” ，不彻底摧毁国民党残存势力红色政权焉能千万代！在这之后，又先后开展了各种政治运动，首先是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凡属国民党的军（排、连长以上）、警 （分局长以上）、宪（宪兵以上）、特（国和党调查统计局与军统组织人员）、政（县长以上）以及国民党与三青团的骨干（区分部书记和支队长以上>和乡 （镇）长、保长、保队附、帮会头目等，均属“杀、关、管、斗”的打击对象。

按照毛泽东的指令：农村要杀的反革命是千分之一，城市是千分 之零点五，四川有 7000 多万人口，应杀 35 万人，而判刑关押的人不少于 150 万之众。这些人关押在哪里？除监狱外，各地（市）县建立了不少劳改队和劳改 农场。中共堂党正正向世人宣布说：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无私无畏，以天为己任，发扬革命主义人道精神，要通过劳动改造把旧社会留下来的那些肩 不能抬，手不能挑的寄生虫和剥削者改变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因此，那时的大小监狱与劳改队关押的多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根本没有国家干部和普通老百姓,更没 有共产党员与共青团员。为此，那些被关押的犯人特别老实，深深觉得自已有罪有恶，应向人民低头认罪。叫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敢有半点反抗。一个两三百人 的劳改队只需两三个干警看管就行。

这百万之众的劳改大军不仅参加成渝、宝成铁路，川藏、青藏公路的修建，还到边远的马尔康砍伐森林，为 不少政府机关、学校、医院修建了办公大楼，就连时为中共西南局庄严巍峨的大礼堂锦江大楼也是劳改犯人打造的。其实劳改犯人是最廉价的劳动力，最好驱使的奴 役的奴隶。如果人员不够使用，当权者再来次政治运动，又有总人口 5%的人作为补充资源。所以毛泽东要不断搞“阶级斗争”，不断搞政治运动，它的效应既可驯 化臣民又可威慑“敌人”，所以“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不然 “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何以积累庞大的财富？

1957 年的反右斗争，四川省在毛泽东亲信李井泉的领导下，共揪出右派 64，724 人（见《当代四川省简史》，实际全省不少余 12 万右派，仅“草木篇”文坛一案就 有万人入围。全省抓了十万之众的右派，其中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人至少有六七万人之多。怎么解决这些“阶级敌人”的吃饭穿衣问题？重修监狱吧？耗时，耗 工，且时间不允许；放在城里工厂吧？难以管理。最好的办法是不花钱又省事省力，那就是扩充原有的劳改农场。据后来得知的消息，在 1957 年 8 月末四川省公 安厅召开的一次议事日程会议，省劳改局一位主事的头头说：“ 这还不好解决，四川有的是荒山荒地，办它几个像雷马坪一样的农场，别说四、五万，就是几十万人也能安置得下来。”

会议后不几天，省劳改 局立即派出局办秘书李志昂、赵功两位干员，去到四川偏远地区的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县进行实地勘察，最后选定了这个不足五百多名犯人生养的峨边沙坪劳 改农场。这里地广人稀到处是荒山野坡，前有天堑大渡河，后有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风雪迷漫，道路崎岖，与世隔绝，不通魏晋，且四周住户多是彝胞，风俗各异 情感难容。自 1957 年 10 月起，源源不断的右派大军在枪杆子的押解下，送来这里“脱胎换骨，改造思想”。他们中不泛有教授.教师、作家、画家、诗人、记 者、工程师、律师、技术员、干部、军官，均是民族精英国家栋梁，为着一个原因“整风反右”走到一起来了。想不到半年后那两位勘察定点广的李、赵先生，也 “殊途同归”来到了这里，与众多流放囚徒一样共同享受这大自然的“美景”。应了中国民间一句俗话：“木匠作枷，自作自受。”

二，艰难的登高望远

第 二天一大早起床吃罢金包银的早饭收拾好行李，集合站队核实清点人数，在人数确定无误后，再由成都收容所押解人员正式把我们交给沙坪农场的接收方，就像非洲 黑奴一样卖给了美洲的农场主，开始了人生的悲惨历程。农场干警接过人员名单，再逐个核实“猪仔”数目，确定无误后依照不同的情况分配到所去的各个中队。凡 判了管制的去太阳坪中队，没有判管制的大约有八十多人到白夹竹中队。

白夹林中队的接收大员也就是我们的中队长，一个年近三十岁的瘦长高 个儿，脸上有几颗白麻子，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背一顶草帽，手里拿着一条棍子。他接过猪仔后逐个认真地看了一遍，然后发布训令：“你们去的地方是峨边 沙

坪农场白夹林中队，我姓张，今后就叫我张队长。农场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也是你们改造思想的场所，不是享福的地方。你们要用劳动的汗水认真改造自己，将 功赎罪，争取早一天回到人民行列。”他言毕，用手里竹棍回头指了指远处的山峰，“白夹林中队就在那个山坡后面，不远，六七里，一袋烟工夫就走到了。现在各 人拿好自已东西跟我走。”

张队长说话到也客客气气，态度也不怎样凶暴，看得出是个老管犯人的队长。他提着竹棍轻飘飘地在走在队伍前面， 我们一行人扛着、挑着、背着行李紧紧跟在他身后，几个押送的解放军横担着枪走在最后。山道陡削，乱草丛生的小路满是坑坑洼洼，走起来很吃力，爬起来更费 劲。开初我们还能跟得上，渐次地距离越拉越远，再一会儿拉得更远了，他只好坐在山头上摇着竹棍等候。我们中走得快的已到了他身边，走得慢的相距半里之遥， 稀稀拉拉前前后后，早已溃不成军。四川保险公司姓吕的右派，箱子里装了好多好的书，加之是北方人不习惯走山路，爬起来更吃力。他一路走一路抹汗一路嘀咕： “谁叫你要去鸣放，谁叫你要去乱说，现在知道了吗，锅是铁打的，人是肉长的，累不累？苦不苦？还乱说不乱说？”成都市邮电局一个姓卢的跟在他后面，一边听 一边笑，向我说：“晓枫，这就是生活，有趣不？记下来，二天写在小说里。”我道：“我就一边来改造，一边来体验生活，当然要写成小说。”

山 道越爬越陡，路越走越直，好些地方根本没有路，别说有行李，就是打着甩手走也吃力。先初还有人唱歌说笑话，现在只听呼哧呼哧的风箱声，一身汗水，一脸愁， 一个个牙巴紧得紧紧的。大家一件一件地脱衣服、脱裤子，最后脱成尖身身，只穿条火窑裤，白白的肌肉斗尖生艳。一位教语文的老师，把屈原的《离骚》改了词儿 唱道：“路漫漫兮峰无边，坡直直兮山不尽。山不尽兮峰无边，何时才能把家还？……”邮电局的卢接口道：“日暖兮风不寒，草黄黄兮树不绿，脱光衣服兮爬呀 爬，快休息兮腿无力。”右派真是好样的，一个个能说会道出口成章，真是人才啊！

“队长，到底还有多远？我实在走不得了，就在这里睡一觉吧？”有几个体力差一点的，好不容易来到张队身旁提出要求，张队长默默笑着不答，问急了总是用手中竹棍往远处一指道：“不远了，翻过那个坡就是。”

我 是干过劳动的，不感到怎样累，却心事重重想着女儿周岁生日。记得三个月前曾经和妻商量，计划她生日那天先去大光明照相馆给照张相，再后去春熙路耀华食品厂 买个大蛋糕，然后去人民公园假山上的亭子里围集，一家大小四口边吃蛋糕边喝饮料，屈指一算洽洽今天就是女儿的一岁生日，可我此时此刻却在不停的爬山爬山。 她知道吗？会怨我吗？他一定会问：“妈妈，爸爸怎么不和我们过生日哩？”妻该怎么回答？也许会说“爸爸有事，出远门去了”或说“在报社忙写稿还没回来。” 是哦，我不在家这个生日还过不过哩？不，应该过！这是人生第一个生日呀！我想着有点心酸，忍不住低低说：琦儿，原谅爸爸，我对不起你，第二个生日一定和你 在一起！想到这些心里就沉甸甸重沉沉，脚下越来越没有劲儿，我借歇气时光放下行李选个高处回头向成都方向望去，什么也看不见，除了云层还是云层，穿过高山 还是高山，成都在哪里？哪里是成都？云层啊，请不要遮住我的视线；尚高山啊，请不要挡住我的眼睛，让我看看乖乖的

女儿，让我瞧一瞧睡梦中熟睡的妻子，还有 那不是亲生胜是亲生的继母……！“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如雪”，人生最是伤离别，此时此刻痛肝肠。请原谅我亲人，请宽恕我孩子，白云呀，快捎去我的 问候；阳光呀，快托去我的爱抚！让爸爸亲吻你，拥抱你，把无言的爱留在深深的心底。

走呀走呀，爬呀爬呀，流不尽的汗，喘不完的气，坐下 一歇，冷却的汗水立即凉透心窝难受极了；再往前走吧，双脚拖也拖不动像灌了铅一样，恨不马上躺在地上睡个大觉。好不容易才爬到张队长用竹棍指的那个山坡， 可一问，他说还在那个山坡后的那个山坡。我的天，那个山坡？一个坡更陡路更险的山坡，陡得来路埃着鼻孔，险得来崖悬在云中。这时，有人开始扔东西了，书 藉、衣服、被盖、脸盆，丢了一大片。张队长急忙站起来制止，痛心地大声说：“不要丢不要丢，山上冷风又寒，克服克服一下，累了多休息会儿再走。”谁听啊， 保险公司的吕将箱子中的书的去一半，纸屑书页白花花一片在风里飘去飘来，近似奠祭亡灵的纸钱。

队长好心谁人不知，可是扛不动，挑不走， 有什么办法？队伍中有人开玩笑说：“谁要把我行李扛上去，付 50 元工资。”另一个说“付一百”谁能扛？自己的还犯愁呢！所幸我不是富家子弟，还能咬牙坚 持。从山下到山上，不足 4 公里的山路，我们足足爬了四个多小时，才到归宿地白夹林中队。一看，我的妈，曾有过喜悦的心情化成一团凉水，大家异口同声叫出： “这就是农场？这就是白夾林中队？”

三、荒凉的白夹林中队

在穷山环抱荒岭拥崖之 间，有一块新平整出的土坝坝，长不过 200 米宽不过 50 米，除几憧不规则的新塔起来的草棚棚外，满眼全是光秃秃的长满山茅草的野地。草棚棚的墙壁是用树 枝、毛竹条编织成的，上面涂了些厚簿不均的黄泥土，龇牙咧嘴凹凸不平，工艺极其粗劣。且泥土还是湿漉漉的，一看就知是新近赶建起来的。草棚共四幢， 下首两 幢长短一致，既是工棚又是宿舍。这所谓的宿舍里面什么也没有，空空的像个大仓库，中间通道两边是上下两层的通铺。通铺是树条绑扎起来的，上面扔了些山茅 草，簿簿一层能掉下人。近百米长的宿舍没有一个窗孔，室内光线黯淡白天都要点灯才能看明白。正中过道挖有四个火坑，用来生火取暖，要不生火晚上大概难以入 睡。在过道两端是门，但没门框门扇，为御寒挡风吊有一个草栓。这儿就是改造我们思想的家，用句不客气的话说，还不如从前地主关牛关猪的圈。

张队长看我们心里疑窦，立即发表现讲话：“条件是差一些，当然不如你们过去的机关，但你们要知道，到这里来不是享福，而是要通过艰苦的磨炼，最后达到脱胎换骨改造思想的目的。如果条件好了，怎么能改造得好你们呢？一切得靠自力更生，创造丰衣足食的生活！”

队长讲完话立即重新编组，首先确定五个人做炊食员，十个人当搬运工，八个人上山打柴，我没有争取去干这些事，也未意识到这是“劳教”队里的“安胎”（四川话：轻松活路）后来想去也去不了啰。特别是炊食员，简直成了人心所向的美

差，纵是削尖脑袋也难以钻进去。

余 下的人由临时提定的图姓大组长统管。这人原是南充专区一个县的建设局长，大块头大脑袋大脸盘，属于精明能干型的人，从不向大家讲他的过去，一有时间就盘腿 坐在床上写汇报。用他话说“我们是有罪之人，只有好好改造才有前途”。他拉起绳丈量，每人平均铺位九十公分，这幢工棚刚好住下八十八人。接着按组分铺，依 尺寸整理自己的家，换洗衣服用来做枕头，书本杂物塞在铺下，脸盆洗漱用具一律放在过道中间排成一条直线。弄好这一切后已是晚饭时间，这餐饭不定量放开肚子 装。因没柴火晚上未烧火塘，不少人合衣钻进被盖呼呼睡去。第二天早起床地上的鞋子和冻土连在一起，用力才能扒开。张队长吹了几次集和哨人员都未到齐，天冷 风大一地是雪碴，大城市的人哪见过如此恶劣环境，冻得直跳。因人员未到齐未正式出工，所做的活儿都是些整理内务的杂活。在这闲暇时间大家和我一样，即忙取 出纸笔向家里写信报个平安。

我在信中写道：“亲爱的：我已到了农场，这儿没有拖拉机，也没有电灯，更没有图书馆，物质条件很差，但风景很美，草碧树绿，百鸟啾啾，四处开满野 花，星星点点五颜六色，好看极了。为了你和孩子，我什么苦也能吃，只有艰苦才能改造好人，何况我喜欢艰苦，喜欢劳动，我认为通过这次锻炼和生活的积累，我将为党和人民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这不仅是我的梦，也是大家的梦，谁也不知道“劳教” 比“劳改”还要酷烈，竟遥遥无期，它不仅骗了我们也骗了它的执行者，才会有如此惨绝人寰的悲剧。

我在信中没有把这里的实情告?妻子，一 是怕她担心，二是怕队部查信通不过，再铸就新的错误。面对如此简陋、原始、落后，空空如洗的所谓“农场”，尽管人人心存疑虑，但总认为劳教时间不会太长， 顶多一年半载便可回到人民的行列，重新为党为社会主义工作，苦点累点又何妨？纵是风刀霜剑也得挺过去！这些时侯我最接近的是李必登，两人常在一起谈论文 学，共同将大自然的风雪霜寒写成诗句。记得在一首中这样写道：彩霞铺道云作衣，星是标点月是诗，喜和严寒交朋友，只待欢笑播种时。情感与文字弥补了心灵的 空虚，浪漫的向往赶走了生活的忧愁。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环境的恶劣，思想的奔溃，痛苦向人步步逼进。

中队部除张中队长外，还有一个姓 曾的管教干事，一个管生产的陈姓队长，还有一个姓赵的事务长。曾是成都市公安局的，听说犯了点小错误调来沙坪，他说话对人还有点知识分子味道；陈队长是土 改中提拔起来的农村干部，没文化说话粗，但性情直耿无坏心眼；赵事务长是个“边花”（成都话：瞎了一只眼），喜欢管事，更喜欢训话，似乎這样才能显出他的 能耐与威风，而训话内容总是杀气腾腾、剑拔弩张。开口“分子”，闭口“改造”，听得心里很不舒服，背地里大家叫他“赵草包”。

第一个星 期作准备工作，割草，加厚床铺；通沟，从老山林里架管引水，解决生活问题；砍柴，为日常煮饭积薪水；平地，改善居住环境。生活虽然艰苦，没油、没肉、没 菜，但包谷糊糊还是能勉强装饱肚子，日子到显得无忧无虑。每天劳动之余，我便和李必登躲在一个避风的地方研讨文学创作，有时还写几句歪

诗。记得在一首中这 样写道：彩霞铺道云作衣，星是标点月是诗，喜和严寒交朋友，只待欢笑播种时。情感与文字弥补了心灵的空虚，浪漫的向往赶走了生活的忧愁。但是随着时间的消 逝，环境的恶劣，思想的奔溃，痛苦向人步步逼进。

一天，场部召开“两劳”人员大会（劳改、劳教），我因感冒没有去。下午开会回来李必登 悄声告?我：“晓枫，今天省厅王厅长来检查工作，在会上作改造思想的动员报告，提了你的名字，说你不认罪，要干部对你加强教育管理。”我听后没有吭声，在 心里琢磨：“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省厅头头都注意我了？”不久新来的人又告?我说：“在成都花会公安展览会上，看到我们七个人的大照片。”成都市每年春节 后都要举办一次花会，也就是北方的庙会。自１９５１年“镇反”开始，花会上增加了一个由省公安厅主办的节目“公安展览”。内容是介绍一年来，全省在镇压反 革命工作中所取得的各项伟大成就。想不到我们“七人反党小集团”也“荣登虎榜”！

我听后有点紧张，李必登安慰我道：“晓枫，人到这分上了还怕什么？我想展还展不上去呢！”到也是，死猪还怕开水烫么？爱展不展，管它干什么。

不 久天又来了一批新的“分子”。每来一批“分子”就会听到许多有趣的“新闻”，哪个中学搞“反右比赛”，谁个班抓得多谁先进；谁个家庭“一门四杰”，父亲、 母亲、儿子、女儿全是右派；还有谁个单位的右派集体服毒等。一天来了 20 多个人“分子”，年纪都在 30 岁左右，清一色的重庆口音。我去问他们：“同学，你 们是在哪个单位划的右派？”其中一个姓彭的大个子回答：“我们才不是反党右派哩，是重庆水上警察局的，现单位撤銷了来这里就业。”

大家听着哈哈大笑说：“就什么业？这儿是劳教农场。”他们也搞不清什么是劳教，彭大个子无所谓道：“管他妈的叫（教）不叫（教），既来之则安之。”

奇闻，“劳教”成了共产党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什么看不顺眼的人都可以送来“劳教”，而这些被“教”的人，以为是一种“就业”，你说滑稽不滑嵇？听说，这些人后来大部分都饿死在沙坪农场，真惨！。

不 几天久我又接触到一个新来的姓曾的右派，他原在达县地委宣传部工作，是个笔杆子，常以绿草的署名在报刊上发表散文，1956 年同我均是第二省文会代表，当 时不熟悉没有来往，这次重见成了故人。他个子不高，戴付深度近视眼镜，远在 1948 年就参加川东地下党与江姐江竹筠共过事。共产党夺得天下后，他一度很风 光，先是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再后官至地委副书记。1955 年机关肃反有人检举他是“胡风集团”分子，为此不明不白的关押一年。后来虽说没有事情但心中积 下不满，转而在报刊上写文章，其中有一篇发在报上的杂文《也说怀疑》被定为反党“大毒草”划为右派，故对全区反右事了如指掌。我们俩人常在一起谈文章与反 右事，他对达县地区反右如数家珍，加上他头脑灵，记忆好，又知道我不是“打小报告”的人，便讲了许多反右中一些古儿怪之的反右事情。

他 说 1957 年暑假，全区把所有教师集中在达县高中校学习，在一次汇报会上听

见一个中学教师曾私下表示，他参加这次整风学习决不鸣放，不会把自己的脑袋钻进 绞索，即使别人用铁锹也拗不开他的嘴巴。他这个态度被人反映到整风领导成员的耳朵里，地委领导当即拍板，此人态度极端恶劣，枪打出头鸟，指示用大字报点名 猛攻，强迫他把“毒”吐出来。万不想这个教师当夜趁大家睡觉时便离开学习班，天亮后学委会听说，立即派了几名积极分子去追找。当赶到农村他住家时，只见全 家老小围着尸体嚎啕大哭。原来这个老师跑回老家门前跳进水塘里，待家人发现时早自尽身亡了。

他又说，达县小学教师整风时，学习班集中了 千多人，地点在达县初级中学。进门就看见满墙贴满大字报，上千张大字报除署名不同外，多为相同的内容：“质问政府为什么不收回香港？” “坚决要求政府解放台湾！”有一个人写的，有几人联名写的，真可谓千篇一律，一看就知道上面规定每人必须写，教师们为完成任务，不得不写的，可又不敢乱 写，只能这样写。从大字报里揪不出右派，便强行叫人发言。大家不发言便集中男女教师在操场跑步，一个个跑得气喘吁吁但不敢停下步来，原来有监督者在一旁监 督，只有当跑步者实在熬不过了，举手表示愿意鸣放交待问题时才能停下来。为此，不少人迫得没有办法，便跑到距县城不远的地方通川桥去投河自尽，一天好个几 人。

他还说，1953 年他在达县地委工作期间，曾兼任过达县城区各中学联合党支部的支部书记，后又兼任过达县高校的党支部书记。对城区 几所中学的情况比较熟悉。1957 年底这几所中学的领导班子几乎都换人，原来的校长大都打成了右派。达县高中的校长姓王，是一个很有声望与党合作多年的老 知识分子，他被打为右派的原因是，1952 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上级号召向党交心，没想到这份交心材料在 1957 年被翻出来作了他企图复辟的罪证。还有达 县师范一个姓龚的校长，他的罪名是因为从该校毕业的学生不少人后来都是右派，他是校长难逃其咎。因为教育口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自然出右派。于是， 各县文教科长、中学校长，加上他们中不少人参加了民主党派的人士，自然都成了活靶子。由于打的右派太多原因，1957 年秋季开学，新校长多由政治教师、团 委书记或者由公安部门抽调的干部担任。一些中学的校长，连大学的门都未进过，又不懂教学，怎么能办好学校？说到这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唉，右派啊全是拥护 革命的人。

他说，除了文教系统，司法系统也来个大换班，达县地区法院的院长、刑庭庭长、民庭庭长都成了“分子”，最使他吃惊的是达县县 法院的刘院长，在地委三级干部会上提出：请求中央及早制定民法、刑法，以便下面有法可依，不想这也成了“滔天大罪”。还有，开江县法院一个姓谢的干部，仅 仅因为他向中央写过一封信，希望少铺张浪费，多宣传艰苦奋斗，增产节约，便遭到越级反映的罪名，也成为右派。还有一个曾参加过地下党，在大学学过经济学的 干部，因为说了一句中国和苏联解放初期曾签订联合开矿协定，决定在新疆合办的大型有色金属企业，对中方的权益不尊重，不平等，就得了个“反苏”的罪名。他 不认罪，便遭到积极分子们的毒打，冬天甚至用冷水淋他的头。地委办的报纸《通川报》右派更多，一个姓段的女编辑每次开开会被斗，总是强迫她跪在地上。她稍 不服气，就是拳脚交加，打得她遍体鳞伤。为了暴露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地、县都集中一批“秀才”编发《右派分子言论选辑》，把查抄右派分子的日记、

文章和大字报经过加工刊登示众。

在这些闲聊中使我记忆最深的是，更令人惊诧不已的是，原渠县县委宣传部理论教员、广播站副站长张炳阳被枪决一事。他说，一天他在达县街上偶然看见一张渠县法院的布告，上面写着：右派分子张炳阳公然对揭露其反动言行的革命群众进行阶级报复，经审查确实，判处极刑。

张 炳阳是北京人，读过高中，北京解放时只 16 岁，便告别父母参加军南下，后来转业到四川渠县宣传部工作。1954 年省委党校办理论教员培训班，我与他同属一 小组，他当时二十出头，喜欢运动，异常活跃，很讨人喜欢，大家都叫他“小张”，我是组长，年龄稍比他大一点，因此，把他当作弟弟看待。记得一次学习讨论 时，指名发言，他东拉西扯，思想很不集中。下来我找他个别谈话，原来他与渠县银行一个很漂亮的女干部正谈恋爱，来成都学习后只收到一封信，怕女方变心，因 而学习时思想开小差。我当即批评了他，后来他拿女方的相片给我看，果然风姿绰约，是一位俊俏的姑娘。1957 年整风期间我奉命下去“调查人民内部矛盾”， 到渠县还专门到他家去拜访，此时他已结婚，也没听说夫妻间有什么问题。反右开始按规定将干部分类排队，渠县县委宣传部报上来的表上，张炳阳属左派，怎么这 么奇怪，仅几个月光景，他竟落得被枪毙的下场呢？抱着这个疑团，我问过来地委开会的渠县干部，这个干部东张西望，欲言又止。在我追问下，他只说去年 8、9 月间，一天晚上张炳阳寝室突然传来“救命”的呼声，住在隔壁的几家人慌忙去救，原来两夫妻打架，女方的脸被抓伤，经过劝说也就相安无事了。据说，张炳阳因 怀疑爱人另有外遇，两人先是争吵，后来就抓扯起来。这位干部还好心告我，现在阶级斗争这么尖锐，张炳阳已经了结，相信法院是不会错判的。原来 ，张炳阳的妻子被县上一个负责干部看上了，关系暧昧。张知道后清查此事，他是北方人，脾气暴躁，夫妻为此打起来，女方的脸被抓伤是事实，这位领导干部后来 唆使女方向法院控告，声称她被打的原因是向组织揭发了张炳阳的右派言论，为此张扬言要打死她，于是张炳阳便落下一个可怕的罪名“阶级报复”，就这样被枪毙 了。我听后咋舌，不禁摇头叹气说：想不到天下有这等不平事！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三十九）

三，难友之间的恩恩怨怨

过了大年，峨边沙坪的气温仍在零下七八度，为了驱寒工棚里日夜生上四 个火堆，烧的全是从山上砍下来的树干。树干湿，含水量重，室内整日整夜都是浓浓的烟雾，呛得受不了，有支气管炎的人咳得快断气。不生火吧，实在冷得住不下去，人们只好在烟薰火烤中做什加板鸭（四川名吃，近似北京烤鸭）。

一个工休日下雪天，陈队长领着我们小组上山打柴，每人任务两百斤。打 柴要去十里外的老林（即原始森林），全是笔直的根本没有路的山崖陡坡，所谓的路只是有几个脚印而已。山道狭窄笔直，上面满是冻雪积成的冰凌，滑得像玻璃 板。我们穿着麻綫草鞋外套鉄脚马（铁皮下有四个防滑齿，用绳系在鞋帮上），腰里

缠着拖柴的拖绳，手持雪亮亮版斧，俯着身子喘着白白的粗气，一步一步往上爬行，费了老半天工夫才进得老林。老林一片银白，树桠上全是雪碴，寒气逼人，冷风叟叟，挥斧一触树干，纷纷下揚的雪碴从脖子里钻进背心，又冰又凉难受得要 死。一棵直径三四十厘米的树木，没有上百版斧砍不倒下，费了好半天的力气，湿了几身衣服，才把树砍倒在地，然后再用鉄锯把它分成几断，每段大约二三百斤， 再用鉄钉钉住树头，以肩扛绳从高处往低处拖。跟斗踉跄连爬带滚，好不容易把筒柴拖出老林，此时人以不是人，鬼亦不是鬼，一身泥水一身雪，张口吐出的气全是 自雾。一步一步地把柴筒拉到陡坡边即忙停住脚步，再坐在雪地上用脚把树木蹬下去，只听 “轰隆隆”一声巨响滚下坡去的树木，溅起高高的泥浆。人再攀着山崖两侧的荊藜借着坡势滑下去。人人累得像牛喘，可不敢歇气，一歇气背心上的汗水立即结成冰 块，那难受味非言可表。回到中队没有热水洗澡擦身，只能坐在火塘边烤干衣服鞋袜，不然第二天没有穿的东西。

记得一次大晴天上山打柴，远 远地看见女劳教队的姑娘也上山打柴，可能她们是第一次上山，认为这活儿好玩，一个个穿红着绿打扮得漂漂亮亮，嘻嘻哈哈歌声袅袅，就像在机关坐闷了外出郊 游。没想到这是要命的活儿，又苦又累又危险。砍什么柴，检点杈枝往回走，就这祥也是“浑身雪泥满体汗，气喘呼呼背湿完”。她们走一步停一步，一个跄跟一打 闪，再不见那绰约风姿，更不闻那婉转歌喉，一路是哭泣，一山是悲凉，跌得脸青鼻肿，肢破体砖伤痕瘢瘢，那押队的女管教还吼个不停，骂个不停，凶暴恶煞胜似 母夜叉。我们中有人想冲过去帮助，但队规森严自然迈不出步伐。她们中不少是城市长大的姑娘，花季年华的少女，别说拖柴，连走也走不回队里，只好坐在山坡上 长声悠悠的哭泣，哭累了又往回走一程，走一段路又坐下来哭泣，有什么办法谁叫你是右派？有些人熬到半夜还是完不成任务的十分之一，第二天一早还得上山，不 然得挨批挨斗。不久传来四圣医院陈茜茜吊死在老林里。女人美丽正如男人的金钱，不是灾难也是罪，她本可以去到场部医院重操旧业，但交唤条件是贞洁。自杀故 然是怯懦，于她这个黄花少女不能不是种解脱，总算保住了清白之躯！

半个月后各方“教民”陆续到齐，正式编为四个大組，每个大組下分设四 个小組，每个小組 12 至 13 个人，设組长和学习纪录各一人。李必登分到二大组一小组当解匠，我在一大组三小組身兼学习纪录。大组长除图外另增加一个姓曾 的，成都人，原市税局一个小干部，长期与做生意的人打交道，养成一副圆滑性格，江湖气极浓，为人处事分等分级，属于那种“提刀割肉，看人说话”的八面通，讲“摺平”、“落教”。“摺平”，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得看你是什么人？“落教”，为人处事不树敌不结仇，你好我好大家好。他被送劳教原因，是因为 喜欢跳舞，故女朋友多。一次却剪了局长的“眉毛”（四川话：夺人之爱，这里是指与局长相好的女朋友交往），整风中被打成“坏分子”。他对自已处理极为不 满，却不敢公开表露，私下向我发泄說：“妈的，有什么办法，官高一级大如山，有理没处说。晓枫，到这里来了，不能由着性子，聪明人不要吃眼前亏啊！我们都 是成都人，互相关照点，遇到事手膀子一定向里弯，不要给外人占便宜。”言下之意成都人要团结在一起，对非成都人绝不能让他称王耍霸。

有 次，重庆水上警察中有个姓甘的打我小报告，说我散布劳教队生活不好，有攻击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张中队长向他核实情况，他机灵的回道：“那人肚子

大去抢 饭，黄同学制止他，他不满，我看有点报复情绪。”为此，我得知情况后立即联合李必登和几个成都老右写他的检举，说他是旧警察，经常宣传国民党时代花天酒地 的日子。不几天他以大组名义把这个旧警察抓出来斗了三个晚上，使此人再不敢打小报告了。有天内江一位老右家里寄了些吃的东西来，未给曾大组长“上寿”，他 很不满意，骂此人是“老坎”（四川话吝啬的意思），准备搞别人，叫我向中队部写检举，说他好逸恶劳，逃避劳动。我感到很为难说：“事实呢？”他笑笑道： “你是个当记者的，要什么事实？随便编一个就行了。”我不好公开反对，只好拖时间。他追了几次见我不动，好不满地说：“晓枫，你有点不落教，不够哥们。” 我道：“曾大，我真有点下不起手。”他板着脸道：“你下不起手，别人会下手。”我怕把事闹大，想办法给那位内江老右虚信，叫他赶快拿点吃的东西出来去糊曾 大嘴巴，此事才算了结。

我所在小組长叶潘天冀，原涪陵日报文艺编輯，真叫无巧不成书。他被打成右派原因，是在 1956 年省文代会期间写 了一篇赞场我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的文章，成了“冤家狭路相逢”。第一次见面他深藏不露，十多天后在没人地方才现出此段隐情，不过严格封了口说： “晓枫，我们点到为止，在这里面可不能再犯错误了。”别的人不知有这岔事，只知我们关系不错。一次我当值日撑瓢，满满给了他一大瓢，相互会心一笑，算是 “惺惺惜惺惺。”右派与右派总能情感相通。有天我一人割草，聊得心慌，便自然而然背诵起白居易的《琵琶行》：“夜深忽闻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我闻琵琶 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另一个声音插了进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别曾相识。我从去年辞重庆，谪居劳教在沙坪……”我却不忍叫出声来：“改得好， 改得妙！”对方回道：“在下才疏学浅，在晓枫君前献丑了。”原来是二组组长梁重书，重庆九龙口区的老右，我俩对床而居，但无机会交谈，白乐天的诗却使我们 心曲相通了。今天他放单，一人拣牛粪，说着把粪筐一甩，坐在我身旁聊起天来。他说：“你发表在《草地》十月号上那篇《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和报上批评你的文 章我都看过，你有什么错，说了真话而已。”我对他了解还不深，不敢孟然附和，笑笑问：“你为什么打成右派？”他摸着下巴，看了下周边，确定没第三者后才 说：“我是四川工人报的通讯员，常和汪岗联系，他划成大右派，自然把我联出来。”我有点不理解问：“汪岗当右派关你什么事？”他说：“汪岗是工人日报总编 辑主任，他是重庆市委张文澄反党小集团的骨干，这叫‘城门失火殃及鱼池’，据我知道的情况，至少有几十个写稿的通讯员成了右派。”我心里仍疑孤，有人走来 不好再问。

右派也良莠不齐，有的人总幻想走“立功赎罪，捡举揭发”他人的“摘帽解教”道路，所以大家都处于相互戒备状态，不是知根知底的人，绝不轻易交谈。知根知底的人说话，也得看清周围身边有什么，人切不可惹出麻烦。劳教使人变得胆战心惊，谨小慎微，成天闭着嘴巴过日子。

二 月初的一个晚上，张中队长向全中队劳教人员作了题为“加速思想改造，极积投入春耕劳动生产”的动员报告，全中队立即投入大生产的开荒劳动。这活儿简单，只 要有力气就行。中队部发给每人一把五斤重的大鉄锄，开荒任务每人一天是 0.12 亩（折合 72 个平方米），完不成组长陪着挖。这些荒地全是老山土，数千万年 来没人动弹过，风吹雨打，雪压雷霹，再加日晒霜渍，硬得来像块铁

板。荒土的表层下面全是树蔸草根，一锄挖下去撬也撬不动，稍不注意便把锄把裂断，这样会惹 来破坏之嫌。为了完成任务挣表现，同学们一到工地上就脱去衣服，光着脖子不停的挥锄深挖。哪管山风刺骨，哪管腰酸背痛，为了早日“解教摘帽”，人人拼着老 命干。虽然天气那样冷，寒流那样烈，尽管满头热气蒸腾，浑身汗水如注，累得贼死也不会停锄歇气。到晚上收工浑身软软，走路乏力，两个手全是血泡，十个指头 僵硬得不听使唤。吃罢饭洗完脸，就坐在灯下咬紧牙关用針挑血泡，放出里面的黄水，挑一个“啊哟”地叫一声，火辣辣地疼得钻心透骨，再疼还得学习两个小时的 思想改造。内容是检查任务完成情况，再后是当天言行有无违规，最后是大家互评。所谓互评，就是你戳我鼻子，我挑你眼睛，相互埋下仇恨的种子，为日后斗争种 下祸根。在这种超强的劳动和超强的政治压力下，纵然你是一块钢胚铁板，也会在这个熔炉里挤压成碎片，这就是共产党劳改政策的“伟大”！

故 不幸的事情常有发生。二小组一个姓殷的老知识分子，一个名牌中学的语文教师，他被打成右派不是向党建言，是在授课中对杜诗的一翻发挥。一天他在课堂上对学 生说：“杜甫诗云：锦城丝管乐纷纷，半入江天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有人说这首诗写的是豪门晋绅的糜烂生活，有的说写的是成都人民爱好 音乐的风气，千百年来争论不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只有写诗人清楚。”巧好报刊上在批判流沙河的大毒草《草木篇》，有位政治教师得知后 告他一状，说他与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张默生的“诗无达话”同一烂调，当然便被打成极右，开除公职送来劳教，自此不再说话。可是同组人每晚拿他当靶子批判， 说他对党心怀不满，加上劳动强度大，家里妻子又来信划清界限提出离婚，突然一个晚上消失了。不少人说他是“脚板心擦油，开了小差”，但更多人说不可能，一 个教书匠又没有其它生存本事朝哪跑？再者沙坪农场是条独道，路口有警卫日夜守护，何况还有大渡河天堑。张中队长也认为要跑只能通过八百里老林，但自来没人 跑脱过，不是饿死便被老熊咬死，要不自已回来。但整整五天不归，中队派出人分几路去找，最后找到了不是活人，是一个褂在树上的吊死鬼，身上还有一封遗书 “生逢盛世，死于盛世，何悲何伤？去也去也。”

四，来得太早的饥饿

记得 1956 年我读过印度作家钱拉·菲德甫写的 1942 年孟加拉大荒的小 说《饥饿》。结尾时有这么一段震憾心灵的话：饥饿，可怕的饥饿。1942 年孟加拉的大饥饿，不仅夺去几万条孟加拉人的生命，还改变了孟加拉人固有的传统与 性格，母亲不再爱儿子，子女不再孝敬父母。饥饿，可怕的饥饿，它把孟加拉人变成了没有良知的野兽……

当时，我以为作家夸大其辞，故弄玄 虚，现在面临饥饿才深深明白它的真实所在。全国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是指的 1959 年至 1961 年，而我们所面临的饥饿却早此一年的 1958 年。多少年 来我都在思考，到底为什么共产党不给我们饱饭吃，要用饥饿来折腾我们，是没有粮食，还是既定政策？最后的答案是：毛泽东天生的性格就是仇恨有头脑有思想的 知识分子，仇恨有才华而又敢于说真话的右派，容不得任何人对他的政策有歧义和说三道四，如有，非得想尽一切办法

来杀灭你。怎样来杀灭？推上刑场抛尸旷野太 扎眼，最好的办法是杀人不见血归罪于病魔或自然界的新陈代谢，就是饥饿！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看不见血的杀人，故不愧为一代“伟人”，不然何以称为人类社会 几千年几万年才出现的“天才”。

沙坪农场的饥饿来得太突然。一天，事务长赵边花突然向我们宣布说：“粮食吃超了标准，从明天起要按国家 定量执行。”其实这之前的“超标”也不过是维持生命的半饱，现在按“定量”吃又是吃多少呢？大家没有闹明白，到了第二天早晨一看，才发现摆在坝子里的四个 盛包谷糊糊的大黄桶全变成了包谷汤汤。它清澈见底，映树照日，盛在碗里上可见“四海翻腾云水怒”，下可观“五洲震荡风雷激”，倒在石板上狗也追不上，真是 名符其实的“快餐”。没有经过饥饿的人也许不知道饥饿的可怕，更不会知道饥饿的滋味。原在机关，每月定量22 斤，天天有余剩，月月有积存。据说现在每人每 斤定量是二十四斤，因体力劳动多原来两斤。可是就是不够吃，每天饿得慌，甚而到头晕眼花地步。原因没有付食品，更没油和肉，就早那点吊命粮。每顿纵然肚皮 胀成皮鼓，饭菜装到喉管，心里还是饿，还是想吃东西，原来肠子上没点油啊！

在高压的专政面前，大家只能乖乖地抱着肚皮饿，不敢吭一声， 可也有勇士。不几天，有个不怕死敢说真话的陈某，原是重庆空压厂的一个技术工人，因对工资不满，常去纠缠厂长书记，“反右”中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开 除公职送来劳教。现过上这种非人生活更为不满，由不得叫喊出：“这哪是改造人，是活活折腾人，喝这样的水水汤汤怎么去干活？”当场挨了事务长一耳光，晚上 全中队立即召开批判斗争大会，说他诬蔑攻击国家粮食政策，继续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是严重的重新犯罪行为。

在斗争会上发言最积极的是曾 大组长和潘天翼同学。曾大组长在发言中煞有介事地说：“我认为陈同学对党和毛主席是恩将仇报，本来我们对社会主义犯下了严重罪行，人民政府本着宽大为怀， 没有判处徒刑送去劳改，只给以最高的行政处分劳动教养，可是他不好好改造思想，反而继续与人民为敌，叫嚣吃不饱。你到底要吃多少？粮食定量供应是国家政 策，决不因为你个人肚子大就取消这个政策，何况我们已经多了城市居民两斤，两斤，多少颗来啊！我认为一个人的思想改造好坏，就表现在对党和国家的具体政策 上。我们希望陈同学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不要一错再错地錯下去了。”

潘天翼不愧是知识分子，批判发言比曾大组长有水平。他说：“从表面上看是粮食问题，从深处追索是他反党反人民思想的继续，我们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什么？与他犯错误的根源一样：就是仇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 一边听一边想，就是吃不饱嘛，为什么大家睁着眼睛说瞎话。于是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右派是因为说了真话才当右派，要不当右派就只能说假话。现在大家争着说假 话，表示不再希望当右派。当我明白这个道理后，便跟着叫跟着吼，奇怪，一点也不感到愧心，几次举手要求发言，只是发言的人太多没轮上我。我想那些发言者的 心情一定与我一样，表示自已紧紧与党和政府站在一条战线上，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或是表明自己是接受改造的，对这些不接受改造的分子予

以遣责。现实改变了 黑白、是非、真假，难道你敢不改变吗？除非去死差不多。散会后李必登向我使个鬼眼，心里大不服气。在没人处我才低声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好在那时的批判斗争会还讲点文明礼貌，不轻易动手打人捆人，陈也就没吃什么大亏，只要认个错便草草收兵。为什么还“文明”呢？原因是大多刚离开机关，人性还未泯灭，未构成困兽犹斗的恶劣环，对打捆人不习惯。

大 家发言结束后，张中队长作总结，他一改平时笑脸，表情极为严肃地说：“我再一次告?大家，这里是什么地方？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峨边沙坪劳改农场。你们是什 么人？犯了错误的劳教分子。来这里干什么？接受专政，改造思想。改造思想第一关，就是生活关。政府给什么吃什么，给多少吃多少，谁不满意或敢于闹事，我们 决不心慈手软，对于那些胆敢公开跳出来的人，我们将严惩不贷！”说到这里，他目扫全场，威严地问一句：“大家听见没有？”

二百多号人众口一词：“听见了！”

吓得山打颤，地发抖。看来在原则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个个都是追命鬼，不然何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狱卒？良心与人性于他们是无用的词藻。善良的人是不能在这里工作的，只有恶狗才能当此重任。

批 判了批判，斗争了斗争。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每天到开饭（应该叫“开水”）时间，盛满苞谷汤汤的四个大木黄桶，在坝子里一字儿排 开，四个大组每组一黄桶，为怕装不下这些包包汤汤，同学们全更换了新式设备，饭碗改成洗臉盆，惟恐外滴一点，那是命那是血啊！

大家排成 长龙，依次走到掌勺的大组长面前像乞丐似的举起脸盆，接上一瓢便仓惶离去。但你若要接第二瓢，必须清空盆里的残汤剩水，否则白瞪眼。生命有惊人的适应能 力，大家很快训练出一种特殊的吃饭（应叫喝饭）技巧，一不用筷，二不怕烫，三是边走边吹。由此一来，饭场变成战场，四处一遍“呼哧呼哧”吹气声，喝饭声， 应了“伟人”千古绝唱：“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当大组長手上鉄勺再舀不上苞谷汤汤时，人们蜂涌而上围着黄桶争抢，有的用手抠，有的用勺刮，有的用指头醮，有的用舌根舔，你挤我，我推你，不停地往嘴里送，再没半分斯文。只见：帽子与围脖齐飞，嘴唇共包谷一色，胸襟上汤汤一遍， 两只眼不停搜索残疾。谁还有尊严？谁有斯文？餐毕省了洗碗工序，那灵巧的舌头比擦布好用，莫说不会溜掉一颗粮食，就连尘灰般的星点粮沫也逃不过搜查席卷。此时，我们才真正懂得了斯大林说过的一句话：“粮食是宝中之宝。”

吃这样几大盆包谷汤汤，却要完成７５平方米的开荒任务。７５平方米是 多大一遍，能摆下五辆大货车。挖不上几锄头就是一把尿，几把尿一冲肚皮就空空了。热能付出远远大于热能收入，填饱肚皮成了每天大家首要问题。先初还和李必 登談文学创作，把劳动感受写成诗篇，不出半月实在扛不住了，不得不提起笔向妻写信求援，但得到的却是严历的批评。她在回信中冷冷地说：“能克服就尽量克

服 吧，不是我不给你寄东西，是你资产阶级思想还在作祟。改造当然艰苦，不艰苦何言改造？我相信别人能过得去，你就能过得去，我不能支持你享乐腐化的思 想……”

她怎么变了，感情冷得像冰凌，这封信无疑是雪上加霜，气得我不再写信。李必登知道后劝我说：“晓枫，不要和你爱人赌气，她肯定不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就像我们先初不知道劳教一样，待她知道了会给你寄东西的。”我默然，第一次终断了和妻子的通讯关系。

在这困难的日子里，所幸他的女朋友不断给他寄吃的东西，出于友谊，每次他总给我一点点。虽然是一点点，却让人终身难忘，后来他调到乐山新建的五渡农场，自此再未见面，不知他现在是活着还是死去，但愿好人一生平安！

五，饥饿面前众生相

俗 话说：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面对难熬的饥饿，人们的思想、情操、品德发生了大大的变化。在这荒山野岭屙屎不生蛆的地方，前无村落，后无住户，左无鸡 鸣，右无犬吠，除了雪就是风，除了草就是树，泥鳅也抓不住一条，只有抱着肚子饿。好在此时肚里还有点油水，身上多多少少有点钱财粮票，沙坪镇街上还能买到 饼干糖果之类的东西，这得托搬运组的人帮忙，代价是四六或三七开（即托买十元钱的东西只能得到六元或七元钱的东西）。不过更多的人采取“就地取材”的办法 解决肚皮问题。我们每天开荒都要挖到很多折耳根（书名鱼腥草，俗名猪屁孔），这东西深埋在土中，一锄头挖下去白生生一大撮。药书上说：鱼腥草，味甘，功能 去毒开胃，健脾消结。也就是说，愈吃胃口愈好。大家也管不得那么多了，反正能填饱肚子管它药不药。于是大家借开荒机会，每天挖它一大抱，将其用水洗净带回 工棚，再用刀截碎放在盆中佐以盐渍，到了晚上九点下学习，各自取出脸盆中盐渍好的折耳根，盘腿坐在铺上，一撮一撮地不停往嘴里送，咀嚼生吞，一口草味。人 人如是，个个一样，那牙齿撕裂草根的“嚓嚓”之声，细听去就像蚕房的蚕宝宝在啃吃桑叶。感谢“英明领袖”毛主席，教育我们学到了牛羊吃草的本领，怎不终身 铭记，莫齿不忘。

大家除用这东西填肚外，就是学习神农遍尝百草，只要是块状植物便往嘴里送。泡参、天麻、山药，当然是好东西，若遇上半 夏、麻芋儿就只能叫天了。保险公子的吕过头大，身段高，干的是重劳动打柴，一次在老林里误食了麻芋儿，不到一小时脑壳肿得比箩筐大，眼睛、嘴巴都看不见 了，口大张，涎水顺着下巴牵线流，呼吸困难，所幸中队卫生员采取急救措施，又打針又灌药好不容易住了这条小命。同组一个姓陈的右派老兄，一天义务劳动林中 扳竹笋，发现层层落叶下有只早已冻得硬绑绑的死鸟，立即拾起拔去羽毛就往口里送，生吞活剥吃过干净，还一边嚼一边说：“真香，要有盐就好了。”

再 有就是盗窃。偷谁的？当然是偷有钱有粮票和有东西吃的同学。他们说偷吃的东西见官都不怕。于是中队里盗窃成风，防不胜防。一天邮电局的卢出工回来，发现头 一天他妈寄来的十个糖饼子不见了，气得他呼天叫地说：“心也太毒了，你吃一半给我留一半不行了？狗日的，连天良也不要。”谁偷？谁也不偷！是肚

皮饿了偷 的。自此出工，凡家里寄有东西的同学，都将包裹箱背在身上，惟恐不翼而飞。一晚睡在曾大身边的范站长突然叫喊起来：“有贼啊百贼啊！我裤裆里十斤粮票不见 了”大家睡眼惺松的坐起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法判断谁个是贼？同他一道来的户籍警察王，不阴不阳地说“床上不漏针，漏针一船人。”曾大认为他话中有 话，便挑明说：“你怀疑哪个就搜哪个？”能搜吗？一张纸又没写有字，谁是谁的？

为顾命，我不敢乱吃野生植物，只用猪屁孔加盐填肚，虽未 中毒，但不到一月两腿僵硬发直，重沉沉的像灌了铅，小腿肚一按一个窝。开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这是由于营养不良而导致水肿病的前期病兆，但在每 晚思想改造的学习会上，我还得感恩戴德地说：“我们是有罪之人，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共产党不仅宽大了我们，还给予我们改过自新的机会，有吃有住，，比资本主 义国家工人的生活还好。”谁都知道这是谎言，可谁都这样说，难道你敢说吃不饱吗？强权使是非巅倒，专横改变了人的良知，恐怖的生活必然带来恐怖的梦话，开 始不习惯，久而久之，不这样说不这样做，反而不习惯了。中国人变了，变得自己都不认识自己。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四十）

第十七章，比夾边沟还可怕的夹边

天津作家杨显惠写的《告别夹边沟》一书问世后，国内外广大读者才知道甘肃省武威地区夹边沟劳改农场，在那里劳教的 3200 多名右派分子仅 1959 年 1960 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被饿死的右派达 2400 多人，死亡数高达百分之八十。而四川峨边沙坪劳改农场关押了一万多名各类分子（右派占百分之七人），在 这两年时间里活活饿死五千多人。死人的比例虽没有夹边沟大，但其残暴酷烈却远远超过夹边沟。

一，死亡前的巧妙逃逸

根据有关资料表明，从 1959 年自 1961 年末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七千万之众，四川一省就饿死 1250 万人（见廖伯康《肖李廖事件回眸》）堪称全 国之最。在那个年代老百姓都吃不饱，饿死人是常见的事。作为我们入套改造的右派，悲惨景况便可而知了。历来的帝王有各式各样诛灭臣仆的办法，但都不如我们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杀灭右派的办法既”先进”又”高招”，且不动刀动枪，就是用慢性饥饿的手段把你活活折磨而死，就像猫在玩毙命前的老鼠一样。

有经历过死亡而未死的难友说：饥饿是慢性的扑杀，枪毙是快速的死亡，虽恐怖但不痛苦；饥饿之死其痛苦非言可表， 死者在断气前神智仍十分清楚，感到五脏六腑似痛非痛，肠肠肚肚在一寸一寸的断裂脱落，难受极了。有人又把饥饿之死比着抽血似的死亡，一点一滴地流尽生命最 后一滴滴液体，其惨状有如凌迟。又说饥饿之死如生命之舟正在沉没水下，种种恐惧也将随之而来。然而，饥饿却另有一种功能：它也能使恐惧消失。当饥饿到了一 定程度，人的大脑就失去了

思考能力，因为没有血去能供应它的转动。大脑由于缺血变得非常迟钝，渐次渐次就运转不起来，恐惧思维也就模糊淡漠，以至全部消失 了…… 生命虽然脆弱，却也相当顽强。如果无食物来维持生命，人体只要有一点点水，一点点阳光，也会自动地延续下去。起先是脂肪的燃烧、脏腑的燃烧、肌肉的燃烧， 尔后是骨骼、骨髓里有用部份一点点地转化为能量来支持生命的继续。为了免除浪费，人体会自动把一些不必要的器官关闭，来维持着生命的基本功能。人到了那时 体重慢慢减轻，骨头开始疏松，心跳速度缓慢，大脑作用休止。所以，在那时再听不到饥饿者的悲嚎和哭泣，一切都十分寂静。如果有了一点点食物，或是可以作为 食物的东西进入肠胃，它会被高度地消化和吸收，生命又开动起来。为什么人在一些时候会说出："只要给我一顿饱饭吃。枪毙都愿意。"多么痛心，美丽可贵的生 命竟可以用一顿饱饭去换取。

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为了扑杀知识精英，先设圈套把他们置于"贱民"，再发配到穷乡辟壤的地方去做苦役，然后 鋭减粮食供应，最后减到难以维持生命月定量的 19 斤，而劳动却日日加重。什么"大跃进"、"放卫星"，十天半月地战斗在山坡上，吃没吃的，住没住的，怎么 不死人！而老右们仍相信共产党说的话"劳教时间长短，由自已表现决定"。为了能重新工作与家人团聚，他们用希望安慰饥饿，用梦想对待凶残，结果到头来一个 个、一批批地走上了不归之路。在他们生命结束那一瞬间，还睁着那双无力的眼睛，长长地望着那没有米粒的空碗，嗫嚅地发出一丝丝如弦如缕极其细微地呐喊："我饿，我饿，饿……饿……饿……"最后阖上双目，无言难过地死去。

存在决定意识，环境造就性格的恶劣的条件下，人性会不经意地回归到 兽性。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变易性，古语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右派多数是知识份子，我是右派却不是知识分子。知识份子又傻又蠢，遇事不会变通，死守 着所谓的"道德底线"，宁肯饿死也不想法求活。在艰苦的环境繁重劳动与可怕的饥饿面前，我考虑的不是如何"摘帽"和"解教"问题，而是如何活出来。我虽不 去偷窃同学的现金、粮票、吃食，但又不能安然待毙。在这关键时刻，恰好我内兄所在的乐山川剧团来峨边县沙坪镇演出，听说上面人很饿，便托人给我带来一瓶猪 油。这不足三斤的猪油，不但使我守住了所谓的"道德底綫"，也一下使我成了拥有百万财产的"富翁"，讨好的、献媚的人都有，目的是希望得到一勺馈赠。由于 我有点小名气，现手里又拥有一瓶猪油的"财富"，便思考调离开荒组，去到劳动轻松又自由的杂工组。杂工组粮食定量也是二十四斤，劳动工种有拾肥、饲养、打 猪草等。要想进去，一是要有专长向中队部写报告申请，二是杂工组组长出面指名向中队要人。向中队打报告很难获得批准，最好的办法是打通杂工组组长的关系。 杂工组长姓冉，反右前是一个小学的校长，长像老实憨厚，与张中队长是同乡。于是我和他套近乎，老师前老师后地叫个不停，一有时间便帮他砍猪草，又悄悄地送 他一些猪油，不足三天时间他主动开口问我："晓枫，你想不想到杂工组来？"我笑笑，直率地说："不想我还会来巴结你吗？就怕来不了啊！"他抽了一口叶子 烟，想了想说："晓枫，我们都是文人，我教书你要笔杆，到一天回到机关定是朋友，我一定想办法把你要来。"我紧紧抓住他的手，极其真诚地感激道："放心， 我会永远记住你。"他接着说："要是张中队长问到你是不是能治猪病？你要一口咬定会治，故事怎么编我就不管了。"

大约两天后，张中队长在工地问我："黄泽荣，你会治猪病吗？"我停下手中锄头，拭去额头上汗水回说："我当记者前一直在农村工作，在兽防站工作过一 段时间，不过大病治不了，小病到没啥问题。"张中队长见我说得认真，点点头道："明天你就去杂工组上班，专们给我喂猪和打猪草。"

谢天谢地，我闯过了阎王殿，得到了一分轻松自由的劳动。打猪草不但可以来去自由行走，还有了看书的时间和写东西的功夫。由于劳动不跟组，能接触到更 多的人，对毛泽东一手发动的反右斗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小厨房炊食员盛大个，原是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搬运工，竟是个大字不识一箧的右派分子。他每次找我帮他 写家信，出于好奇，问他是怎么划成右派的？他说去年 9 月全国大揪右派的时候，站里主任找他谈话："老盛，现在有一个右派名额，组织经过考虑准备让给你。右 派是知识分子才能当的，属干部指标。"他十分高兴应承下来，还笑着深谢领导。过了一段时间主任又找他谈话说："老盛，现在我们准备送你去劳教，这样你可以 领到两份工资，单位的由你家里领，那里的你自已领。"

他立即签字画押，显得异常兴奋，就这样来到了白夹林中队。不过他不后悔，在小厨房煮饭饿不着肚子。他十分讲义气，每次我帮他写完家书，总悄悄地塞几 个小厨房的肉包子给我。我一边吃着小厨房的肉馅白面包子，一边心里骂娘："妈的，都是人，我们喝包谷汤汤都喝不饱，你们却白面大肉，老子不吃白不吃。"我 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由于肚子装得饱饱的，我又有兴趣写起诗来：身背竹筐步如凤，镰刀一把拿手中，来去山间花似锦，悠悠闲闲好轻松。

二，精英们的悲惨结局

在春播前，全农场进行一次人员大调整，一批同学调到新建的乐山五渡劳改农场去开辟新的基地，说那里比峨边沙坪还燥辣（四川话更艰苦意思），另外几个 中队的右派调来白夹林中队。新来的教民中有原重庆作协专业作家刘盛亚先生、中国美协副主席汪子美先生，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庆王匡时光生，西南师范学 院讲所董时光先生，还有其它一些名右派。这些都是名人，早在报上见过他们的"英勇"事迹。

其中刘盛亚先生和我曾有一面之交，那是 1957 年 5 月，他受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之邀，以高级知识分子身份来成都参加省委"整风鸣放"座谈会，一天来 到我们报社文艺组，他风度翩翩，身着细呢料制服，脚蹬发亮皮鞋，满脸红光，言谈举止一副大作家派头。想不到十个月后今日相聚沙坪白夹林中队时，竟一脸晦气，满嘴胡碴，两眼无神，显得呆滞。他穿着一身旧棉制服，腰上系着一条皮带，头上戴着一顶毛线帽，胸襟上全是包谷汤汤的残迹，看来也在领尝饥饿。他大约年 长我十多岁，是个大块头人，易于激动和坦露感情，但没有什么力气，不能承受担粪施肥等重活。他所在的大组长还算有点良心，专门安排他去守看播种在地里的包 谷。他每天戴着斗笠，披着簑衣，手拿一根系有布条的长竿，在地埂上走去走来赶麻雀驱老鸹，嘴里总是不停地吆吼着"鸣鸣——鸣鸣……"远看去就像草扎的稻草 人。谁能相信他就是当年反法西斯名震华夏的大作家！

早在 1953 年我就知其大名，因重庆作协机关刊物《西南文艺》常发表我的短篇小说， 作为作者每期有一册惠赠杂志。先刊有他长篇小说《再生记》的节选，

不久便有连篇累牍的猛批，说它是一篇有害的小说，全书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模糊敌我界 限，歪曲阶级斗争，丑化了人民群众形象，违背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方针。

出于好奇，我查问了他的相关历史资料，对他 有了一些了解。他出身仕家，自幼聪明，19 岁时即留学德国，尔后成为作家。在法西斯猖獗的欧洲，中国人还不知什么是法西斯时，他就以一部《在 5 字旗下》的 记实散文向国人叙述善良的人民在法西斯极权专制下的悲惨命运。刚 20 出头就跻身于罗曼罗兰与斯蒂芬，茨威格等反纳粹作家行列，而且还是中国第一部反法西斯 的文学作品。刘盛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登上中国文坛，不仅高举人道主义旗帜，还以襟怀人类文化前景的高起点，有别于那些吟风咏月的文人。他也是当年的海归 派人物了，与今日归来的留学生不同，他是在民族危亡的七七事变后，放弃欧洲的优裕生活，同许多爱国的热血青年一起共赴国难。当时欧战尚未开始，抗日烽火刚 刚燃遍华北、华东。他回国后即被聘为四川大学教授，时年不足二十六岁。迫于战争形势，川大迁往峨眉山，武汉大学迁乐山，他又受聘于武大。中国教育史中年轻 教授不少，著名的如梁宗岱先生，他执教西南联大也是 27 岁，散文家梁遇春先生也是 27 岁即任北京大学教授。相比之下刘盛亚更属少年俊彦，他既授文学又授德 语，还以专长的戏剧授教于省立四川剧校。华北平原失守后，京沪与欧美的精英汇集于四川，留美归来的戏剧家余上沅先生在江安主办国立剧专，今日还健在的电影 名导演谢晋即出自此校。五四运动以来即从事话剧运动的熊佛西先生又在郫县主办省立剧校，刘盛亚在此校教授戏剧，与肖锡荃、侯枫这些活跃四川剧坛数十年的名 导演共事。后来脱颖而出的青年剧作家刘沧浪就是他的学生。那时，在江安国立剧专执教的吴祖光先生也很年轻，与刘盛亚共誉为少年天才，吴祖光称北方神童，刘 盛亚赞为南方神童。

八年抗战，在重庆也留下刘盛亚的文学与文化活动历史。他的家就在重庆，那时郭沫若在重庆办群益出版社，虽然他的夫人 于立群已在社里工作，郭沫若却聘刘盛亚任总编辑。后来，中国最著名的民营报纸《新民报》迁重庆，主编此报副刊均是大手笔，如夏衍、聂绀弩、吴祖光等，刘盛 亚也有一段时间主编过这家报纸的副刊。1950 年以后刘盛亚进了单位，从西南文联再到重庆文联，他的教授、作家、总编辑、主编等职务都没有了，成了专业创 作员。凭他不凡的资历、学识修养、业绩与声望，应是重庆文联的招牌作家了，却受到一些自诩为革命作家的歧视与排挤，虽然这类人不过是中学生，他们认为你刘 盛亚只不过就是仅仅出国留了一下学，喝了一点海水而已，这岂能和我喝过延水的相比。喝的海水是资产阶级的，喝的延水才是无产阶级的，这就是刘盛亚被这类人 打成右派最早的思想定性了（此段材料文字引自曾伯炎先生文章，作者稍作修饰）。

一天，四下无人，他悄声问我：“晓枫，你饿不饿？”我苦 苦一笑道：“刘老师，谁不饿啊！可有什么办法呢！”他低低地叹口气，抹去流在嘴上长长的清鼻涕，极其悲观绝望地说：“你年轻扛得出来，我看来会死在这里。 晓枫呀！又冷又餓日子真的难过啊！”我道：“你怎么不写信向家里要点吃的东西？”他摇着头，无可明状地说：“这信该怎么写呀？我能说农场吃不饱，这不是又 在攻击党和政府吗！”我听后几乎叫起来：“刘老师呀，这是什么时候了，你还顾虑

这么多，快向家里写信吧。” 但他没有写，一直没有写，每天就样抱着肚子承受饥饿的煞煎。

我出于同类相怜，一次偷偷地送点猪油给他，开初他说什么也不要，在我再三强送下他才收受。他接过猪油，两手激动得发颤，声音近似在哭地说：“晓枫， 你送我的不是猪油是救命的血呀！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我不好意思道：“刘老师，我们现在是同经患难的难友，今后回到单位在写作上求你多指教指教。”他一 脸迷茫，没点信心喃喃地道：“不知有没有那一天？”

我发现饥饿已夺走了他的人生希望，残酷的环境已吞食了他壮年的志气，那颗跳动的心已经死了。后来他家里得知一点情况，寄来的两大瓶酵母片，他竟一次 把它全部（1000 片）吞下，后果可想而知。不久，他一身肿得发亮，快死前急送到农场医院急救，半路上就“脱胎换骨”提前“解教摘帽”了。死后没棺材敛收遗体，也没有属于自己单个儿的坟场，几十个几百个合葬在一起。１９７９年获得“改正”，生者为他举办追悼会时，多次去沙坪觅寻遗骸，面对大片白骨难辩谁是 他的真骸？为此，那灵堂的骨灰盒里只好放下他生前写文章常用的那只派克钢笔，伴着他灵魂的安息。

董时光是西南师范学院的讲师，有弟兄三 个，大哥董时恒、二哥董时进，他居三。在我读到过介绍他的文章中，有位叫陶谓熊先生这样写道：“一九五七年六月下旬的一天，一位身穿短袖白衬衫的中年人走 向西南师范学院大礼堂主席台。看他从容不迫而又大义凛然的气度，像是要对台下 6000 多名师生员工作一次重要报告。此时，台下鸦雀无声，几千双怀着复杂心 情的眼睛盯在那中年人身上。那中年人走到麦克风前，清了清嗓子，用铿锵洪亮的声音开始讲话：［我 1945 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与 共产党并肩战斗，为国民党所不容，不得已离乡背井亡命海外，去美国留学，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我在美国报纸上撰文谴责美帝国主 义的侵略行为，为美国政府所不容，被驱逐出境。1953 年回到祖国怀抱，并来西南师范学院教书。我满怀激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帮助共 产党整风，反对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我没有反对共产党的任何企图……］此时，主持会场的学生会主席马娴华（即后来在陈希同案中自杀的王宝森之 妻）一手夺过麦克风大声叫喊：［不许右派分子董时光放毒！董时光必须彻底交待反党罪行！］接着，台下齐声高呼［打倒右派分子董时光！］［董时光必须低头认 罪！］会场一片骚动。董时光凛然不可侵犯地站在主席台上。这位年青时就向往自由、民主，并为之战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仍然铁塔似地伫立在那里，坚持说他 是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参加整风运动。严词拒绝了会议主持人要他自污自辱、检讨自己的［反党罪行］的威胁和诱导。台下继续呼喊口号，许多争当反右英雄 的勇士，已经手舞足蹈地站了起来，会场秩序大乱。这时，会议主持人用几句陈词滥调对董时光乱吼一通：［你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绝不会有好下场！］随即宣布勒 令董时光继续反省交代，精心安排的斗争会只得草草收场。

在这所学校，董时光用他的智慧和勇敢，第一个粉碎了让右派分子在斗争会上屈膝投降的阴谋，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当年，我作为刚刚跨入这所学校的新生，董先生的正义凛然，极大地震撼了我。”

由 于董时光是全川以至全国的名牌右派，相关资料有如下陈述：1951 年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正是美国盛行［麦卡锡主义］的岁月，他怀着一腔义愤于 1953 年 9 月回国后，来西师教书。抱着自由主义理想报效祖国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多么向往！他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说：［初解放时，知识分子都欢欣鼓舞，以为从此 可以自由地想，自由地谈，自由地写，大胆地批评，大胆地陈述不同意见了。］他在给友人罗容梓的信中说：［以我们的经济平等，加上政治上的民主，我们和资本 主义社会比较起来，便不比他们差了。］然而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缺乏起码的了解。他们不知道专政，是容不得［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 的。虽然董先生没有参加过 1952 年的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但对那些旨在摧毁知识分子尊严，并随意打人、逮捕、逼人自杀的政治运动，却有所耳闻，并深恶 痛绝。在 1957 年 5 月 11 日在老教师座谈会上他发言说：［党员领导们在思想改造中要打垮知识分子的尊严；正是觉得他们太骄傲了，看不起自己，就批判他们 ‘纯学术观点、纯技术观点、纯业务观点，从来不检讨自己纯政治观点。其实纯技术观点，自高自大即使是真的，也绝不会严重到应该受斗争的罪恶地步。］又在稍 后 19 天的 《文科论坛》上的发言说：［思想改造难道必须用残酷的肉体伤害吗？纯学术观点 、不问政治，难道也应该拿来斗争吗？应该把人家关起来写坦白交待，逼迫人家把自己的骂得狗血淋头，害得人家得精神病、自杀吗？］

知道他 的人这样评价他：董时光是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孤傲、不屈、自视高洁，看不惯一切污泥浊水；既鄙视不长脑筋的盲从者，又厌恶趋炎附势的钻营者。 他的性格很难容于专制社会。他寄希望于声称实行民主自由的中国共产党，可惜他太天真。他哪里知道，仅仅把民主自由当作手段的共产党，对于他这种桀骜不驯的 自由主义者，更不能容忍！所以他痛苦、彷徨、呐喊。他说：我们领导上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把肉麻当进步，把投机当积极。真正品德好，有进步思想，不说肉麻 话的人，反而被他们视为［顽固］、［落后］当反右大潮迎面向他扑来，从《人民日报》到地方报刊连篇累牍地向他泼污水的时候，董时光临危不惧地高呼：［你共 产党有四百万解放军，我董时光有正义感！］这样一个临危不惧，有着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最后被西师开除公职送来峨边沙坪劳改农场劳教，真叫中华民族的悲哀，在 严酷的饥饿面前，他和许多右派一样也成了一条觅食的“野兽”。

他个子精瘦矮小，鼻梁上架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身上还穿着质地很好的美式服装，走路老低着头，沉默少言，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他也比我长七八岁，劳动上体力不支，但胃口特好。据说他送来劳教时带有不少钱，可很少见他买东西吃，不知 是出于节俭还是怕露富，但在抢饭上却又一马当先。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次吃完饭，他都用指头去刮黄桶里残留下来的星点米浆，要不把洗碗缸里的清水倒去留下少 许带糊状的泔水取来喝下。有一次干警嘲弄地问他：“董时光，仓谷糊糊好吃不？”他冷冷地回答：“好吃极了！比美国面包还好吃。”干警不知这是有力的回击与 控诉，反视为取乐的趣头。

由于饥饿，由于折磨，由于人与人之间缺少温暖与关怀，似乎大家都变成了一条条以食为目的豺狼。在这残酷恶劣的 境况下，一些难友竟去偷窃别人随身携带的钱和粮票，或家里寄来的吃食，真叫防不胜防。于是，有钱粮的人将它缝制在

衣服中，有吃食的人出工背在身上。董时光 也是将所带来的钱缝制在贴身的棉背心里，一夜也被窃去几十元，害得大家相互怀疑了好几天。自此，睡觉时他也把背心穿在身上，免去失窃的危险，但并未免去死 亡的厄运。后来他同我调到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415”筑路支路去修筑内昆铁路，由于饥餓时间太长，肠子变得越来越细。有一天他出差遇上一位老乡，便将一 件上等呢料衣物拿去换了两斤干牛肉，竟一口气吃完，造成肠梗阻致死。悲哉！中国的知识精英啊！谁叫你们要离开“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来到社会主义的 “人间天堂”，享受共产特有的“幸福”，不死你死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两位兄长董时恒、董时进均是右派，仅比他庆幸一点的是没有死在劳改队而已。

在大量死亡扑向沙坪时，我去了“415”筑路支队，在云南修筑内昆铁路，逃脱死亡一劫。但对沙坪难友一直萦怀于心，直到 1980 年“改正”回归报社碰见当年教民，才知峨边沙坪劳改农场，在不足的三年时间里竟饿死五千多人，罪过啊罪过！

三，临风把酒往事惊心

71 岁的难友林宪君先生是四川省团校政治教究室研究员，因日记上写了一些对现实不满的文字，便被划为极右，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在沙坪整整呆了近二十年。我 们先后在重庆、成都多次见面，一次我们把酒临风谈起当年沙坪农场的往事时，他说，我是 1958 年 3 月中旬被押到峨边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的。在此生活了三年 零八个月，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三年大饥荒造成的数千人大面积死亡场景，亲手掩埋过的死者至少百人以上，1961 年我自己也险些命丧沙坪。从 1959 年起，我 们的口粮供应降为每月 19 斤，每天 6 两。这是吊命粮还要经过层层盘剥，能落实进入肚子里的已是米汤一碗，饿极了的右派们到处搜寻野生动植物充饥。果胶、蕨 苔、和尚头，岩大蒜、野韭菜、隔山撬、糯米藤成为春夏秋冬的主食。当年曾是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此时已变得穷凶恶极，连老鼠，癞蛤蟆、蛇、蚯蚓这类小动物 都不肯放过。只要抓到手，不是煮就是烧着吃了。

1959 年秋，我进深山老林砍柴，路边遇见一条约 40 公分粗的乌稍蛇，爬上枯枝上晒太阳，我急步上前一棍子打死，砍下头剥去皮，不管是否有毒，架在 枯树枝上就烧来吃了。蛇烧得半生不熟，狼吞虎咽之后就上吐下泻差点送了命。冬天，一次我路过大堡,因无粮票吃饭,只好买两斤豆瓣酱充饥.下肚片刻即口渴难 熬，一路上爬在水沟狂饮。夜半时分仍在翻越山间小路，看不清是什么水爬下就喝。天亮后重返路边小溪，只见水中蝌蚪、蚂蝗、红钱虫纷纷游游，令我后悔万分。

他还说：最为悲惨的小劳教（社会上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孤儿），他们饿极了更无理智控制自己。一次我在五中队与公安校来的傅景德带领他们 去挖洋芋，有人竟在洋芋地里挖出一块三斤左右的生羊肉。这块肉已腐烂发绿，爬满蝗虫，臭气刺鼻。转眼之间两个人扑上前去抓住就啃。傅景德见状制止他们说： “这种东西吃了会送命的！”

饿极的他们边啃边吞说：“反正我们早晚都要饿死，打个牙祭死了也心甘。”事后方知，这块肉是一名惯偷从彝胞那里偷来的一只羊，吃不完分成几块藏在这里

忘记了。

小 劳教为了生存，见什么偷什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些知书识理的右派，在与饥饿的斗争中则软弱得让人心酸落泪。华西医科大学教师钟廷跃，全神贯注地等待一 个农村小孩解大便，人去之后他用树枝掀开粪便，捡出十几颗未消化的嫩豌豆，在草地上擦了一下粪渣顺手丢进嘴里。四川大学的戴心如教授，在铁筒里煮熟了一只 癞格宝，正喜滋滋地要享用这“美味佳肴”，都被罗队长一巴掌打翻，他舍不得到手肥肉爬在地上用咀叼起吞在腹中，也许才使他生命延续到 1979 年改正。

三年大饥荒使沙坪农场的绝大多数右派都患上了水肿病，死人的事几乎天天发生。每个中队都有一片坟场，死者既无棺木又无墓碑，一穴数尸或十数尸。我所在的小组开始为 23 人，几个月后只剩下 7 人。与其他组合并后，再过几个月又由 20 多人减为 6 人。我前后经过多次小组、大组、中队合并。能大难不死，保住性 命，实属万幸。

1960 年春，我被派往跑马坪后山林区官料河边烧杠炭，为农场干部冬天烤火用。每天带领 14 名身强力壮的小犯人进入深山 伐木。我常饿得发昏，爬不上山。全天的口粮只有一小碗苞谷萝卜沙沙，出工前就已被我消灭干净。可幸有傅景德在播种小麦时偷来分给我的一包小麦种，平时不敢 吃，只有悄悄带进山，躲在灌木丛里偷偷塞进口中。这袋生麦种助我度过一个饥饿之春。14 名小犯人却因大量吃野生植物得了重病。伐木烧炭任务无法完成，我们 全部撤回五中队。不久，这批小犯人陆续死亡，大部分都是我埋的。年底，我这个烧炭大组连我只剩下三人。其他农业大组的小犯人，大多都躺在通铺上，在呻吟中 等待死神降临。队部为减少本队死亡人数，对即将死亡尚未断气的小犯人，采取立即送作业区卫生所的紧急措施。我身为大组长，几乎每天都有送病号的任务，每送 一个可领一个苞谷粑作加班饭。如果一趟背两个可得两个苞谷粑。那时，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只有二三十斤重，形似一具活骷髅。我一个背兜可以装两个。大多数 还未送进卫生所半路上就死了。卫生所不收死人，再背回中队要挨批评。两难之下，只有就地处理，可手上又未带锄头，人们都是将尸体抛向波涛滚滚的的官料河，由河水将尸体冲走。一次，我背了一个小犯人叫肖复兴，他爬在我背上断断续续地告诉我：“林大组长，我三岁丧父，妈妈靠捡垃圾把我养到十七岁，因肚子饿偷了 公社几根红苕，被判了七年徒刑……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死前能见我妈妈一眼……”说着说着他哭了，我也哭了。走了一程，我再叫他已不再答应，只闻到一阵恶臭扑 鼻而来。

他說：在五中队，一觉醒来常会发现旁边的人已长眠不醒。有的说着话，一头栽下立即气绝身亡。市公安局来的唐步明，就是与我边说 话边倒下的，我再也无法将他唤醒。零下 20 几度天寒地冻的跑马坪，土地硬如坚冰，我们已没有足够的力气挖坑埋人，只是刨开一些浮土把破草席卷的死者放在地 上，刨些泥土盖在身上。如此草草收工。来年积雪融化，尸体暴露荒野，被野兽撕咬得血肉漠糊，惨不忍睹。此种场景令即将入木的右派们不寒而栗。当自己预感将 不久于人世时，纷纷嘱托好友：“假如我死在你之前，看在朋友份上，千万埋深一些。”

沙坪劳教所以万人建场，初多系右派、反社会主义分 子，后成份起些变化并发生大死亡，死者过半，估计五六千人之谱。埋在南瓜山上数百，是一处比较集中的埋葬地，那么多个队，还有大堡作业区，不知领导层有无 统计的精确数字。因死的人太多，又多属草草埋葬，当时数人、十几人共埋一个坑乃是常事，根本无法确定每一位死者所埋葬的确切位置，故医院为应付众多死难者 的亲属来此哀悼亲人，就故意找人设置许多假坟包和假墓碑（实际是一些非常粗糙简陋的石块和木牌），以装点门面，上述死者绝大多数均由饥饿而导致的营养不 良、虚弱亏损，后出现全身机能极度衰竭，终至倒下。最后，不知出于何因，四川省的当权者找了个替罪羊，判沙坪劳改农场梁场长监外刑。令人费解的是在文革之初，梁被“三结合” 进了“老、中、青” 的领导班子。其实，公正地讲，面对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梁场长也罢，吴场长也罢，也根本无力回天，只缘忠实地执行了上面左得出奇的政策，下面也许难免侵 吞，克扣，导致雪上加霜罢了。罪魁祸首呼之即出，究竟是谁？大家心知肚明，然迄今仍云里雾里，并未彻底清算。

四，南瓜山的见证人

重 庆市公安局退休干部、现年 75 岁的难友蒋柏龄先生告?我说：南瓜山并非正式地名，是因为埋的死人太多而出名。它座落于四川省峨边县沙坪劳教农场场部医院一 角，在该医院背后面有一大片荒坡，荆棘丛生杂草满岗，是专门作为埋葬死亡的劳教、就业人员的地方。后来有人在这上面种上南瓜，大概是物化作用的实系，南瓜 长得特别大，季季高产，年年丰收，故尔远边驰名为南瓜山，真是名符其实。尤其在“三年灾害”中不知救活了多少人的性命，因此人们对它深怀感激，成了有口皆 碑的宝地。

说到当年他为何划为右派分子一事，他无不感概地道：“伟大深恩在劫难逃，鸣放骗术自当入罗。”1957 年鸣放高潮，在重庆市 公安局掀起，因揭露出福利费的黑洞，我一时愤然悬笔疾书《雪里送炭此地少，锦上添花我局多》一稿，虽用了“众官分肥”等过激文字，未悖事实。该稿刊于五处 黑板报，全局大哗，竟有好事者公开发动签名，不出三日高达数百警干，大家呼吁“改组局福利委员会，清查账目，纠正偏差”，若非弹压及时有效，还几乎拉上街 头，祸的确闯大了。用当时副局长、党委书记陈宗谱的话来讲：“这事虽做得不对，但与右派借此恶毒攻击是两码事，但必须组织反击，消除负面影响。”

事 态与结果可想而知，一时反戈一击者，声明更正发言者比比皆是。除我“罪有应得外”，确也连累了一些好同志，如老干部任书旺，旧社会讨口，参加革命流血负 伤，因此也划为右派，集训缙云山，家属不服，在市局张贴大字报讨取公道（任的日子更不好过）。对我本人，其实无须再动用其它手段：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掐头 去尾篡改原意，甚至无中生有编织材料，塑造什么“攻击肃反百分之百搞错了，”什么“成为《重庆公安》编辑部右派主帅”云云……什么极右、市局最大右派早就 顺理成章、名正言顺了。于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苛政猛于虎”如果再加饥饿，就是两虎向你朴来，你能受得了吗？

他 说：不久即被武装押送发配至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从此便成为贱民，受尽磨难，尤其在那鬼都不下蛋的地方所受的种种苦楚，真是世间少有，终身难忘。当进入 “三年自然灾害” 时期，我们面临着的又是一场大饥饿、大死亡。当时吃粮每人每月只有 18 斤定量(还是粗粮)，除去炊事班、打柴组、运输组，干部小食堂和职工(即表现好解除 劳教的就业员)伙食，都与我们拉开距离，剩下舀进饭碗的只是沉底的一层包谷沙沙而已，怎么能果腹？又如何劳作？长此下去恶性循环，又在源头上断了生机。庄 稼从播种开始缩水，一直到薄收、绝收，自力更生成一句空话。后分配至场部医院让继续搞广播宣传，由于病室紧张，只好和汤人絜(统计)、叶林(绘画)、程普 (文娱)合住一小帐篷，恰逢叶兄妻子探亲，谈到外面也恼火，叶母在家蒸饭，按定量分别容器下粮，老人家也饿得从孙儿碗中克扣归已，亲情尚淡薄如斯，可想劳 教队是什样了？长期的亏欠，双脚滞重，下病区作例行广播越来越勉强，眼见床满为患，生死变化莫测，又往往人尸难辨(杂工组人少体弱搬运不及)，呻吟之声， 不绝于耳，更增悲凉。还得违心鞭挞违纪现象(主要反映吃欲难抑、私相交换)，提醒病体消化不良，张死人的事层出不穷，实乃走过场而已。偏偏这时又当上了职 工，屈指劳教三年半，噩梦远未终结。医院不比队上，病情高于身份，我接着也进了病室，医生护士多所体恤，但难回天，接着腹水、腹泻、高烧、肝炎并发，挂危 等死。偏神智清醒，隐约听得医护开会、批斗贪食应归我的一个煮鸡蛋的某护士，其实，那是我不想吃。危难之时，幸武汉的兄嫂给我及时雨，寄来一盒肝精针，干 部唐医生笑对我说：“这才把你从阎王那里拽回来。”加之，邻铺的小劳教杨长生，因出去偷海椒被老乡打伤，形成巴骨流痰(即化脓性骨髓炎)，经常周济我的饭 食，真是雪中送炭，可无力报答，终成憾事。病体恢复后，归队杂工组，做些力所能及的轻活。一天，院部向干事召见，忐忑间接受一项特殊任务，盖农场死人的讯 息外传，作家刘盛亚去世后，其重庆的遗属意欲申请来场探视，由于死者太多，有的连个土堆都没有，拟予适当弥补，作一些掩盖伪造。这才令我去南瓜山相机行 事，给阴阳两隔的诸多难友“立碑”，这碑充其量搬块稍大、成形的石头，用红漆写上死者的姓名。

说到这里，难友蒋柏龄已泪不成声，待揩干 眼角的泪水后才继续往下讲：我走出院部办公室，立即前往南瓜山，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绿色海洋”，遍地瓜蔓茂盛，朵朵黄花吐艳，隐约南瓜无数，在入口处 有些高矮不一，但尚能见堆的土丘，实难称作坟场。深知任务艰巨，这南瓜山“临时户籍”可不好当啊!旋即与杂工组负责掩埋尸体的刘职工联系，他东找西找，终 于凑齐资料，看来这些资料起先还正规，有序地画上长方形的格子，格内填写姓名：慢慢的已不是一格一人，而成一格数人，紧接着格也省略了，只是一串人名挤在 一块。刘职工喃喃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死人越来越多，加之杂工组成员体质下降，已不可能一人一只棺木(尽管由几块木板镶嵌而成)，一人一个坟头，忙起 来数人一堆，甚至连棺都免了，力争有土掩盖便行。情况如此，实话实说嘛!”

我接过本子和一些散页，“按图索骥”干了起来。南瓜山盛产南 瓜，其实并不玄妙，亦非耕耘得法，而是死尸多掩土薄，遵循物质不灭定律，这些死劳教、死职工又一次对同学们尽责作奉献。怪不得医院的伙食比队上丰盛些，但 有此经历，我却产生排斥南瓜心理，尤其是南瓜山上的南瓜难以咽下。

我提着一筒红油漆，拿着“花名册”，尽全力对号入座准确定位，含泪书写众多死难者的姓名。虽毛笔字缺乏功底，确实用足了心，鼓足了劲，做到一笔不苟。砌筑坟堆实不可能，搬一成形的石块，权作“坐标”吧！

当 时，也尽量在死人堆里觅熟人，发现我的好同乡、同学、同事刘祝焕在南瓜山。记得我已成为右派后，要去成都省委鸣冤告状前，匆匆会晤，他才新婚，谈到命运处 境早有打算。当时组织正追查他，动员对我反戈一击立功补过。我当即表态，反正事已至此，出于自保尽可检举，十条罪状与八条罪状无所谓。殊料他抛出一句沉甸 甸的话：做人岂容卖良心！

虽然彼此之间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结串连，但连我用“齐天”做笔名，以齐天大圣自诩是明显的，他都不面对， 以“我又不是蒋柏龄肚中的蛔虫，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搪塞。刘祝焕成为右派虽属定数，却不该放弃利用我而争取不劳教的良机。为此我很感激也很遗憾，最终 以支援500元为他的妻子周光秀集资，在机织毛衣社觅得糊口之处相报：这500元是我带去劳教的800元中的大头，知者均赞我高义。

我 坐在刘祝焕坟头，为使其归宿地有所规范，我全力作些归拦，勉强像一座小坟，回首历历往事，不禁潸然泪下。据说他亦死于不克制，将周光秀寄去的吃食一顿囫囵 下肚，不幸由“饿痨”转化“胀鬼”。类似他这样死去的人也为数不少，他该不该这样死去，谁对他的死负责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他说： 大量的饿死，个别的另有死因，但本质不变——阳间糊涂人，阴间屈死鬼。我的另一位同事，公安校教员，河南籍傅景德，原仅仅相识，共同的命运促使交往，其长 清秀为人爽直，因反右劳教思想不通，最后竟颠颠倒倒。和我同在大堡一中队时，经我努力把他塞进大厨房，但为时不久。调队前，主动拿来几件稍好的衣物，硬抵 借我一些钱：虽力拒因他坚持不拉来生账……后不知怎么搞的，成为反改造典型。据目击者当时的劳教张培厚告：傅已带镣反省，一日有雾还让他们出工，不知为 何，傅独越过警戒往前蹒跚走去，神经不作主，未听警卫与带队干部招呼止步。警卫朝天鸣枪仍不停下，请示李主任（李曾是大堡作业区主任，后降为一般职务）如 何处置，答曰：“命中”。立即一声枪鸣，尸横地头，未卜身葬何方。虽后追查发令“命中”不妥，可以去把人拖回来嘛。而该李主任又降作事务长了事，这草菅人 命的源头，亦足以反思。傅的横死，有无结论，通知亲属与否，均系未知数。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四十一）

五、死亡堆里爬出来的编审

四川日报社高级编审兼作家、诗人的曾伯炎先生，曾在峨边沙坪劳教农场和林宪君、蒋伯龄一样也整整二十余年，但不同一个作业区一个中队，他所经历的这场大饥饿、大死亡，又有另番“滋味在心头”。他在他的《幸存者手记》中作了这样细腻的描写：

反 右运动是对右派知识分子精神的摧残，劳动教养则是对他们身体的摧残，而大跃进所带

来的三年饥饿，则是这两种摧残的加倍与加速的摧残。大跃进鼓动这些右派能量超限释放后，出现身体的大虚弱、大溃乏，身上能付出的全付出了，甚至透支了，却得不到足够的补充。在这山里，你身边有点钱想买点吃的也没有，就指望着那炊事房的那点越来越少的囚粮。饥饿便一天 24 小时若幽灵缠住人，无法摆脱，把早饭刚送进肚里，就想着午饭了，好像每个细胞都在哭叫：好饿呵！好餓啊！晚上，希望睡眠来忘掉饥饿，却总睡不熟，老是处于半睡状态，迷糊一、两小时，就饿醒了，便望着天快些亮起来，好去厨房窗口领到那美妙香甜的一点玉米瓣做的饭。于是，倾耳去听厨房的动静，呵！炊事员在劈柴了，在生火了，在揭锅盖了，这一切响声，都像音乐一般美妙，好不容易熬到那一掬玉米粒送进肚子，便又开始盼望下一顿了。人们嘴里谈吐的只有一个字：吃！人们的想象力想得再远，也止于吃，我身旁睡着那个老陈，就垂涎欲滴地在向挨着他睡的老贾说：成都朵颐餐厅里卖的回锅肉、甜烧白才好呵！那么腻的东西，现在我一气能啖他两份。老贾说：我们通江山里那老腊肉才过瘾哩！这些人已两、三年不知肉味，比孔夫子在陈国那三月不知肉味更痨得心慌呢。记得 1958 年在五渡乡建房，半年不见油晕，百多人的伙食团还买到 10 几条山里人家的狗，打过一回牙祭，以后，过年了，也难见到一、二两肉。睡在我旁边那老孙说：太想吃肉了，给我吃饱一顿有熬锅肉的饭，把我枪毙了也心甘。

那里有肉呢？别说劳教营，就是外面那些称为人民的人、称为干部的人乃至反右时的左派，他们都在粮食引路菜当家的饥荒中，我们这些被称为反动分子的右派的饥饿，必然是加倍的了。历史中，凡是大饥荒来时，社会上层的死亡总是很少，常是社会下层的老百姓去做了饿死鬼，劳教的右派是压在下层的下层，岂不更是命中注定的饿死鬼吗？送进腹里的越来越少，开始还能吃上一碗玉米瓣做的饭，渐渐只能吃半碗，1960 年以后，半碗也没有了。我看见队里那老陈，每次开饭前，必定咕噜噜灌一大盅开水，然后才吞咽那点玉米饭，还告诉我这是个窍门，可以使饿感变成饱感。我也模仿了两次，发现这肚腹是难以欺骗的，用水份代替碳水化合物，这胃液不是试剂—试就知道吗？虚假地弄胀了胃造成的假饱，骗不了胃也骗不了胃上的神经与大脑的。肠胃是最实事求是的器官。不久我进了建筑队的蔬菜生产组，这是除炊事员的活儿之外，队里最轻松的工作了。种的莲花白还是秧苗，就有饿慌了的人扯走，把一亩地的苗子用一个大盅子就煮来吃了。剩下的派人看守，也生长得同种菜人一样，奄奄一息，伸出几匹又粗又老的叶，就难有一棵结出球来。全组 10 多人，打钟出工后，便不见人影，体弱的寻个避风的岩洞去等中午领饭了。略剩点力气的，便溜进山谷去寻野生植物充饥，我看见重庆来的邓老头，只是比我们这批年轻人长 10 多岁，便是老头了，因为多些生活经验，身体还未垮，他溜上坡去挖一种绿叶紫茎的植物，只吃下面白色的根。一询问，才知他吃的是泡参，忍不住，我也四处寻找这东西来充饥了。找到了挖出来，已顾不上到山涧里去洗去泥土，用竹片刮一刮，在衣服上抹一抹，就送进嘴里，一嚼，不苦不涩还略有甘味，总能找点进口货去安抚那辘辘的饥肠了。孔子教学生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我是饥饿逼着饥不择食才来神农尝百草哩！这一尝，竟差点把命尝得没了。当我尝到泡参可食以后，又认识了其他几种，如乡下人称为隔山翘的块根，像脚板苕形状的山药，越吃越吃到甜头。有人告诉我，这山上天麻很多，他在过去开荒时曾挖到一撮箕，都上交干警了。我知道这是一种有价值的药用植物，在蕨草丛中伸出漂亮的粉红色茎秆。这天，我在一条滥泥沟里，发现一株粉色茎秆，便惊喜遇到天麻，急忙挖起那块根来，抹去一咬一咽，呵呀呀！我的咽喉如刀割一般疼痛，舌头也在痉挛，心里立即明白：这是误吃了毒磨芋了，急忙找到也是劳教的谭卫生员，他给了我一种解毒的漱口药水，才转危为安。这次教训把我寻野生植物的胆吓破了，从此，就凭忍耐与饥饿较劲，当队里那些被毒菌毒死，被野生植物误死的人不断出现，我水肿了又消瘦了，反反复复，却奄奄一息，命悬一线活过来哩！

当每天醒来，人们第一感觉便是：呵，我 还活着，仿佛两眼一闭，就很可能长眠不起了。睡到半夜，我就被惊叫声叫醒：秦彪死了！这秦彪那魁梧北方汉子的形象便若巨木从山上砍倒一般出现眼前。接连死 的，几乎都是高大英俊的彪汉，在省体工队打篮球的中锋张安庆也这么在我眼前倒下，那个抗日战争中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到缅甸印度作战的董伦也是壮汉，战场上 都活过来了，这饥饿的鬼门关却过不去了。想到自己这小个头在饥荒中比大个头更能熬住了。

我发现睡我右面的老贾，也人高马大的，却还精力 未尽衰，这个通江人是党校的科长，比我年龄约大 10 岁，到底是大巴山生长的汉子，在这小凉山比我更能适应，我发现他每夜都要出工棚，晚上围着火堆学习报纸 上的文章，他总有一个盅子搁进火坑煮得冒出蒸气，钻进我的鼻孔，不是红苕气便是洋芋味，我便知道他半夜出去是学老熊、野猪找庄稼地觅食哩！我很同情，在我 心里那窃而食之的底线虽然没有突破，对别人却不像有的饿鬼最见不得别人动嘴巴就妒忌，我装着没有看见似的。想起那个中专毕业才工作没两年的段辉全，运木料一次能负 300 斤，饿急了溜进炊事房偷吃了两个玉米馍被捉住，就由炊事员带领一批妒忌者对他进行痛殴，这位年轻人便再也起不了床，不久就一命呜呼了。这种 悲剧不能再在老贾身上重演呀！

用劳教营里的行话，我这种态度叫：很落教。大概老贾认为我这书生饿得可怜，或者认为我不戳破他的隐私，值 得感谢，熄灯睡觉时，他凑到我耳边低声说：太阳坪那岔路上的一块彝胞的玉米，长得很好，玉米须子也开始蔫了，12 点以后，我带你去饱一次肚皮。饥饿已使我 忘掉这是偷窃，也忘掉被彝胞捉住会打得五痨七伤，这是有生命风险的事呵！当我俩一前一后溜出工棚时，天空飞着雾雨，唧唧鸣叫不已的秋虫，似乎在给我壮胆， 一刻钟，便走进那片茂密的玉米地，开始扳着玉米棒，老贾很有经验，扳不出声音，我一扳就响得山鸣谷应，吓得我心不停地蹦跳，夜深人静，一点风声也响声不 小，何况这还未完全成熟的玉米呢。我掏出身上的小刀来，依然响声很大，我怕自己累及老贾，扳了两包就不再扳了，开始撕掉玉米包的叶子，不顾这生玉米就啃起 来。啃完一包，并不解饿，因为这生的未煮熟，人到底不是山熊山猪，有生吃的习惯，并且这玉米的淀粉还不饱满呢。老贾说拿到烧草灰的火堆里去烧来吃吧！我俩 找到灰堆，刨出一个火洞来，老贾能把阴火吹成亮火，把玉米烧得哔哔剥剥地响，我就没有这本事，只好就着生的啃进肚里，丧失了这夜窃的兴趣与信心。晦气地溜 回工棚。由此，我体会到古人说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多么艰难，不禁自己刮自己两个耳光，骂道：曾右派你在向何处沉沦了哟！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不轨 行为，也算有运气，没有出意外，假如那夜一旦被人捉住，暴打一顿，还有今天这只笔来回顾这段艰险的往事吗？

饥饿，它如幽灵附体，做梦也在 梦见吃，人们聚在火堆边说的还是一顿饱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有一次，上过川大的老刘收到老家从安岳县乡村寄来的家书，说公社里也饥饿，他的妹妹已饿死了。 失亲之痛使老刘悲哀至极，不禁脱口说出他好想吃一次肉呵，家里能寄点腊肉来不可能，就寄点人肉来也解下馋嘛！信上说乡下死的人也多包括他妹妹，旁边那老邵听了，他是法院送来的右派，便有绍兴师爷深文周纳的习惯，便向上面汇报老刘想吃妹妹的肉。这话一传开，老刘被开会斗争，饥荒对人的斗争就够残酷了，还要再 加上人来斗争，这人怎么能忍受呢？我们的历史学家千万别忘记：那惨绝人寰的历史既有人斗人斗出的大饥荒，还有大饥荒对人的残暴摧残又导致了人性的扭曲和沉 沦。我看见饥饿把人变成自然界的动物，如虫蚁求生觅食，社会中一切规矩、秩序、常识全无用也全不顾了。这天，饿得昏昏沉沉，我倒在土坎边闭目养神，忽听有 人呼唤我，睁开眼一看，这不是叶佛熙吗?这个勘

测队的小技术员，20 岁就成了右派，我见他一张青黄的脸，穿一身乞丐穿的衣服，我说: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他惨然一笑说，住在山麓的铁厂，离街较近，把身上穿的，床上盖的，全卖了装进肚皮了，自己不卖，一眨眼，就被饿得心慌的人窃去帮你卖了，甚至早晨起床，穿 衣服时，衣服已被别人窃去换了一个南瓜或半斤粮票了。他说，你这样子也不像个人，像一个鬼了，随即从腰间掏出一个乞丐用的铁筒子，叫我把筒子里的滥莱叶子 吃了，他说，今天爬上山来，一路上用这铁筒子煮了三次莱叶吃了，才爬到这里呢，我一面嚼着这半生不熟的猪食，一面劝他应注意保持身体的内温时，也应注意防 寒保暖，顾到身体的外温，正说着，只听那边中队部在喊:逮住他!逮住他!随喊声一看:那不是队里运输大组的小山东吗?此时，只有这个炼了武功的小青年，可 以健步爬山了，只见他抱了几包玉米，一面跑一面撕着包皮，爬上小山头，用削好的竹签把一个个玉米穿好，竖立在地上，用手捞几捞就是一抱干蕨草，他盖在玉米 上，划上火柴一烧，只听生玉米烧得哔哔剥剥地响，不到一分钟，他坐在山包上嚼着喷香的烧玉米，有谁还有力气爬上山包去逮他哩!当你爬上去了，他又在另一山 包上了。这小山东是队里唯一还保持一些体力的人，他把父辈对付日本鬼子那些农民式的狡猾也用来对付死神的迫害了。我们这种书生，囚在这蛮荒之地，只能饿以 待毙了。

从 1960 年春天开始，起初是大量涌出病号，山下医务所住满了各队送去的病人，这病那病，这些面黄肌瘦的右派分子，他们都害的 同一种饿痨病，不必用什么药物，最灵验的药，就是大米、玉米等粮食，只要给这些病号一顿一碗大米饭或一个玉米馍，这些拄着棍子的病人，很快就会丢掉棍子 了。可是，大跃进引来的大饥饿，哪里有粮来救命哩！国门是关闭的，不与世界交流，前些年只同苏联老大哥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通商，自从我们反对赫鲁晓夫修正 主义，说他不该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就与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了。只有一盏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与我们交善，但是这欧洲最穷的小国，就是我国正 在大量饿死人时，也还在伸手向我国要求救济，我国仍勒紧裤带去支援世界革命哩！就更难顾到基层的饥饿者，哪还能顾到深山里这些右派囚徒呢？没有粮来医这些 人的饿痨病，却出现了一种称为“康复散”的东西，乃是用糠秕做成的丸子，这东西本是农家养猪用的饲料，也成了治饿的药了。人吃了猪的饲料，猪吃什么？到处 是煮大粪作猪食，那么，地里的肥料又缺乏了。我已经水肿三次，却难配给我一点糠秕做的康复散，身体肿得一按就是一个涡儿，久久不能复原，走起路来双脚像木 头一样僵硬，叫出工了，锄头也无力气扛上肩，是拖着锄头走出工棚呢。哪有力气去耘土，溜到一个背风的岩下，便进入似昏迷又似睡眠状态，忽然被山杜鹃那凄厉 的叫声惊醒，一看太阳才升起两、三尺高，那点中午的吊命粮还吃不到。只好在草丛摘几粒酸酸的野草莓哄哄肚子。我也眼看草丛里蠕动的猪儿虫，吃得肥滚滚的， 还任意地啮着绿叶，我突生羡虫感情，人呵！何必生个头脑，像猪儿虫毛毛虫一样，无忧无虑多么幸福。再看敏感将下雨正搬家的蚂蚁，嘴里都衔着白色的储备粮， 我岂止没有存储，存在肝胆里的早透支成巨大的负数了呀！想到那黑色毛毛虫不久就会化成蛾蝶，多自由地翩舞于天空，做一只蝶多好。意识流在心里流动，不经意 流出明末清初一首有蝴蝶的诗来，其诗云：“一天雷雨诚堪畏，百代风云漫企思。留取闲身卧田舍，静观蝴蝶挂蛛丝。”这位几百年前的诗人，感慨自己是蝴蝶网在 蛛丝上，我难有他那卧田舍的闲身与闲情作那种蝴蝶另梦，只能饿着肚子去羡慕猪儿虫与蚂蚁的命运了。看来诗人是一位隐士了，历史中知识分子出世做隐士的传 统，从伯夷、叔齐到陶渊明再到陈独秀，这种人已绝于当代，你想藏身乡下吗，土地在公社里管着，依然要挣工分来养活自己，陶渊明还活着，也是公社社员哩！不是也只有挣些工分才能分到口粮吗？绝望吧！隐士已绝种了。

时间一分一秒熬过，总算熬到开饭时间，人都像电影《地道战》里的人一样，本来 不见一个人影，突然都涌现在厨房前，一个个人头像鸭子伸着颈项，往窗口张望。这时那个称高干

事的人忙招呼炊事员不准开饭，每人上山到坛罐窑去扛回烧柴的人 才能领到这顿饭。原来这劳力最骁勇的建筑队派两、三个去老林里背烧柴煮饭的人也派不出了，没奈何，煮饭已在砍修房备好的那些房架料，现在，几里外挖茶梯坎 下的几亩幼树没有收拾，正好弄回来煮饭，不然，那几百立方解成材料的房料，将全部进灶孔了。病号们挣扎着去爬坡，为了这顿饭只好去拚命了。每人尽最大力 气，扛 20 斤或拖 30 斤回来，总算领到那几口就吞进肚里的囚粮了。这次拾柴薪，我终于发现挖茶梯挖出的树桩树根，经过一冬一夏，巳干透了，是最好的烤火原 料，那粮食入腹，不是增加热能么?把篝火烧得熊熊的，也可增加身体的热能呀!何况，把身上的湿的衣袜烤干，有一堆火在工棚里驱寒，这睡眠也多些暖气，别人 靠土里的作物来增添热能，我就用这篝火来保持体温，临到火力在减弱了，我看见老贾从火坑中刨出一块砖头，巳烧得微红，他用一些滥布包得严严实实，搁进冰冷 的被窝，我也学他的方法，使那整夜如冰棍似的一双脚现在也有了变化，脚一暖和周身也有暖气，睡眠也更安稳一些了。这天，我正像遭秋霜打了的茄子，蔫蔫地倚 在路旁歇气，小戴扛着锄头往坡上走，我让他歇一歇，他说歇了就挖不好了。问他挖什么？才知道是埋死人的坑，下午完成了，就可以领一个玉米馍，晚上把人背去 埋了，还可以再领到一个，这段时间，他已是专职埋人了。我感伤地对他说，听说有的人埋尸体太不负责，头发与脚趾露在外面，也忍心这么暴尸于光天之下，岂不 遭狗拉猪扯吗？那天，你埋到我时，请你多挖几锄黄泥巴，埋得深点呵！他听见这嘱咐，安慰我说，你还不会死，真是死了，我不仅给你垒个坟堆，还给你做个记 号，让你的亲人来好辨认。我说，这就预先向你致谢了。

我睡的百多人的大工棚里，开始很挤，渐渐很松，甚至空出许多床位来，下面木工房 里，巳在连夜做棺材，就是用豁皮板钉成匣子，后来，死人数量多了，哪有木材来埋葬死人，就挖个坑搁下了事。我所在的建筑队是最棒最年轻的小伙子，死亡率也 超过百分之三十，其他农业中队，在赶挖茶梯田中，就常是一个接一个倒在山坡雪地里，这劳教营的死亡率成了四川省劳改系统的冠军，死亡的右派多是成都重庆送 去的，家属不依不服，到处喊冤叫苦上访，甚至惊动了北京公安部长罗瑞卿，下令追究责任，还抛出场长梁村夫来做替罪羊。于是，四川这座峨边沙坪劳教营名气很 大，据说除了甘肃省改造右派的夹边沟农场死亡率最高，峨边茶场算亚军了。人死了，就是监狱也照章要通知家属的，1960 年前后死在峨边的右派和其他被劳教 者，很多是家属久不见书信，去信打听，也无回音，才知亲人已作古。过了 10 年，成昆铁路修通，有家属乘火车到峨边沙坪茶场来找坟堆，竟难找到一个土堆。当 年参与埋尸工作的重庆人戴富荃告诉我，那时候，埋人也缺乏背得起尸体的劳动力了，能挖一个坑，把死人埋得不露足趾或头发，就是负责了，有的人多挖几锄泥土 掩埋的力气也没有哩！何况那乱葬岗在 1962 年就种了南瓜，更找不到坟迹了。我相信：这劳教营的档案仍记录着那些死者的姓名以及全部非正常死亡的数字，密 而不露 40 多年，但我深信，当这一历史失去保密意义后，还是会公诸于世的。

六，枉死鬼的高干于勉

于 勉是山东烟台人，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银行干部学校校长，系行政十三级高级干部。我和于勉相识于 1958 年 3 月在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三中队劳动教 养期间，初来大堡时，劳教人员住的工棚尚未完工，竹篾片墙还在敷泥，工棚内还没来得及架铺，劳教人员都睡在潮湿的地上，翻开垫被，下面铺的蕨草全是湿的， 上面挂满水珠，许多人因此得了风湿关节炎，走路膝关节疼痛难忍，7 月份才搭好通铺，我和于勉毗邻而眠，晚上常在枕边窃窃私语，天南海北，无话不谈。加之我 又是他的烟台同乡，用胶东土话交谈，格外觉得亲切。当时于勉已 48 岁，大我 25 岁，我们相处不到一年，由彼此了解，信任到忘年交，成

了我一生中难忘的朋友 和师长。

于勉一生操劳，战争与疾病摧毁了他的健康，未满 50 岁的人已满脸皱纹，高度近视，看起来十分苍老。到了劳改单位，迎接他的是劳 累和饥饿，每天开荒、烧草在等繁重而超体能的农活常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其实最难忍受的还是饿肚皮，自他们来到大堡，几乎没有吃过几顿饱饭，每晚收工回来的 晚餐只有一小木瓢包谷清汤粥，靠这点食物充饥常饿得睡不着觉。

当时于勉经济条件较好，常收到亲属从青岛寄来的食物和汇款。他体弱多病少有机会下山。我每次被派外出挑东西都要代他买些麻饼、白糖、核桃之类的东西用于充机，1959 年以后。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吃的了。

于勉知识渊博，阅历丰富，对事物具有深远的洞察力和超前的思维方式，我俩有两次长时间单独谈话，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他不愧为一个极有判断力的预言家。他所说的话，在后来的岁月中都不幸被一一言中，变为既成事实。

第 一次是在 1958 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俩被派往几里外的北山坡中耕洋芋。出工时天气晴朗，不一会儿就下起了大雨，我们躲避不及，只好把锄头插进洋芋地，坐 在锄把上，在草帽的遮掩下靠在一起躲雨。我全身都湿透了，又冷又饿，十分狼狈，当时思想“冒包”，牢骚满腹，于勉见状，就问我是怎样当上右派的？我向他讲 了当右派的荒唐经历：“1957 年 5 至 7 月份我到山东老家探亲去了，8 月份才回省团校，我既没有参加鸣放、写大字报，又没有给任何人提过意见，只是看到 7 个被打成右派的人心里有些纳闷，在日记里多写了几句：他们昨天还是革命同志，怎么给领导提点意见就变成了阶级敌人？毛主席不是事先说好要‘知无不言，言无 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吗？为什么现在又要给言者定罪呢？这不是出尔反尔吗？我对毛主席搞的阳谋、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这套把戏实在弄不懂。我这些想法并未向任何人谈。岂料这期间领导已派人偷撬了我的抽屉，看了日记，然后由王毅校长出面命我交出日记。当天就根据日记上这些话把我划为右派。并说我是利用 日记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不服，极力申辩写日记是当时的思想活动，不属于言论和行动，说不上是进攻。几天之后，我以不认罪，态度恶劣，坚持反动立场 被定为极右分子。直到送劳动教养前才有人悄悄告诉我：省团校分了 8 个右派指标，只差 1 个了，是用你凑数的。指标完成后又发现团课教研室的刘世斌问题比我还 严重，团校请示了市委 5 人小组，答复是：名额完成了就算了吧，把刘划为中右好了。我对这段荒唐经历越说越气，对于勉说：“如果人的思想活动都可以定罪，这 和古代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腹诽罪’，有何区别？是他们撬了我的抽屉，到底是我犯罪还是他们犯罪？”

于勉听后连连摇头，意味深长的 对我说：“宪君啊，你真是个书呆子，政治上太幼稚，你教哲学教党史居然不懂政治，你对毛主席也太不了解了。”他把话锋一转又说起了他自己。他说：“我参加 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也经历过延安整风和建国后的政治运动。我觉得党内斗争比与日本鬼子，蒋介石的斗争还要残酷，还要无情。在挽救失足者和镇 压‘红旗党’的运动中，我看到不少好同志都成了刀下的冤魂。你不要不知足，现在还要感谢毛主席给你留下了一个脑袋哩！”他又说：“我这个右派其实比你还冤 枉，你还有一项思想罪，我是因为没有抓到右派才被打成右派的。”反右派斗争中，上级找他汇报银行干校划了多少右派。他说：“我们学校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右派。”结果这句话成了上级给他划右派的依据。理由是：“你说你们学校没有右派，这句话就是右派言论。毛主席说，‘凡是有人群的

地方都有左中右’。难道你 们学校不是人群？你和毛主席唱反调，不是反党是什么？”他有口难辩，右派帽子就是这样戴在头上的。

他被撤职后新来的校长，一副极左面 孔，上任不久就划了一大批右派，连在校学生都未能幸免。他成了本校的大右派，写不完的检讨，受不完的批斗，又被降为工友使用，天天扫马路，冲厕所，为职工 端茶倒水，听候驱使呼唤。他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羞辱，终于在一次检讨会上发作了。他说：“我看这次反右派斗争，简直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无中生地给人 罗织罪名。”名这句话立刻被上纲上线，批斗会上说他“含沙射影，把领导反右派斗争的毛主席比喻为一条狗，把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的群众说成 是一群狗，这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和广大群众。”从此，他又成为极右派，命运急转直下，最后被送劳动教养。

谈到劳动教养的期限时，我说：“劳动教养是最高行政处分，还够不上判刑，估计最多一年半或就该放回家了吧？”他说：“不会吧！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你既然被当作专政对象送来，我看决不 会轻易放你出去，即使解除劳教还要留在劳改单位就业。公安机关这一套我熟悉！”我听了凉了半截，心里很不是滋味，对前途十分悲观，我说：“这样看来，我这 一辈子不是完蛋了吗？”他又说：“不见得！你才 23 岁，年轻得很，只要能坚持活下来，我看还能等到平反昭雪那一天。”我困惑不解地问：“可能吗？”他的分 析是：“反右派斗争是毛主席在青岛会议上一手策划的。毛主席的为人我是了解的。他从来不会认错，他有一句话叫‘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我看只要毛主席健 在，你我再有多大的冤枉，都不要去想还能翻过来。我年纪大了，病又多，恐怕等不到那一天了，我这副老骨头早晚会丢在大堡这个鬼地方。”当时，我已隐约地领 会到他话中的含义，心里想，只有等毛主席去世以后，我们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了。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毕竟毛主席大我 42 岁，我相信自己一定能等到那一天。

第二次说话是在 1960 年的夏天。从 1959 年起我离开三中队，到跑马坪五中队给小犯人当大组长。和于勉见面的机会就少了。那时沙坪农 场的右派和小犯人们已开始大面积的患水肿病。有些人的脸、手、脚肿得发亮，两只眼只有一条缝。整体已不成人形，有些人则枯瘦如柴，形同骷髅。那些饥肠辘辘 的小犯人，出于求生的本能大量外逃，出去偷吃的。他们什么都偷，甚至刚种下的洋芋块，即使浸泡过福尔马林，洒上大粪也被他们刨出来烧着吃了。跑不动的病 号，呆在工棚已奄奄一息。劳动生产已无法正常进行。大组长的主要任务是背病号送卫生所，埋死人和追捕逃跑的小犯人。1960 年夏天，有一次我抓逃犯路过三 中队，在山坡上遇见于勉，他柱着拐棍，步履蹒跚地向我走来，拉住我的手告诉我：“如今身体已每况愈下，健康日益恶化。战争年代饱一顿，饿一顿留下了胃溃 疡，又患心脏病，实在拖不起了。近来队部给予特殊照顾，每天发一斤大米给我，可以自己煮来吃，免受食堂盘剥。”他手上提一个美国造猪腰子形铝饭盒，据说是 抗美援朝时的战利品，已准备去煮烯饭，见我来了很高兴，顾不得煮饭了，和我坐在山坡上摆起了龙门阵，他问我五中队的情况，我说：“原先有 400 多人。后来 死的死，跑的跑，只剩下一半了，最近又补充进来 200 多人。我那个大组分了 40 几个，结果跑了十几个。现在经常追逃犯都搞不赢。有些小犯人去偷彝胞的洋 芋，海椒，被彝胞用锄头打死了两个，有的夜晚逃跑又不熟悉道路，跌进峭壁深渊，尸体发臭了才被人发现。成年人也死了不少，熟悉的有陈重寅教援，小学老师罗 志荣，大学生周兰新，医生刘天模等，这样下去要不了两年，人都死得差不多了。”于勉听后立即问我：“你知道为什么大量死人？我看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在沙 坪农场是克扣粮食，在全国是决策失误。”他对毛的个人品质极为反感，十分肯定地认为是毛制造了这一场全国性的灾难。

他说：“这场全国性灾难的起因，根子在 57 年。说了真话的人当右派，当阶级敌人；说了假话的反而提拔重用。不然，怎么会有 58 年的大跃进，浮夸风？既然亩产上万斤，怎么会大量饿死人？我看没有 1957 年的反右派，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无疾而终，毛这样一意孤行，中国还会面临更大的灾难！”我为他激烈的言词而担心，怕他说漏嘴惹来麻烦，他对我善意的 提醒似乎不以为然，接着说：“当年我说了真话，如今落到这个下场。现在什么都无所谓了。你还年轻，来日方长，说话可要小心。只要能活着出去，你还可以干一 番事业。反正我是熬不出头了。”他对整过自己的那些人，一直耿耿于怀，对我说：“那些伤天害理，昧着良心整人害人的家伙，决不会有好下场。不管他们在反右 派中捞到多大好处，他们最终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说话的语气就像《基督山伯爵》中那个法利亚老，在伊夫堡监狱向邓蒂斯说话一样，他提醒我：“是什么 人从你的痛苦中获取了利益，今后就找他算账。”他甚至还向我讲了一个春秋战国时期那个著名的复仇者伍子胥的故事。他说：“当年伍子胥破楚后，把楚平王的尸 体从坟墓中刨出来，鞭尸三百以解心头之恨。有人阻拦劝说：算了吧！将军不要意气用事，要注意影响啊！伍子胥摸着满头的白发说：我都这么大一把年纪了，还顾 什么影响不影响。别人爱怎么说就随他去说吧！我才不管呢。”我当时并不怎么理解这个故事的含意，多年之后才逐渐明白了于勉的良苦用心。

这一次见面，他讲的很多，有些内容已记不清了。我看时间不早了，还有追逃犯的任务在身，便起身告辞，匆匆向大堡方向奔去。

两 个月之后，我又一次追逃犯路过三中队，路边遇到重庆市公安报来的蒋柏龄。我向他打听于勉的近况，他说：“于勉已经去世了，他是病饿交加含冤而死的。”在那 个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和人为地制造饥荒的年月里，沙坪农场的山沟里早已饿殍遍野。被关押的右派和小犯人很难摆脱这种厄运。像于勉这样的老者，更是在劫难 逃，最先命赴黄泉。这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缩影。

1961 年春，我又被调到三中队，听和于勉关系较好的郎先瀛等军人讲：“勉死 得很惨，人还未断气，身边的呢子大衣，俄罗斯毛毯和派克钢笔就不知去向。据说是保管在中队部。可谁也没有见过，更没有谁敢打听这些物品的下落。于勉下葬时 半裸着身子，用一张破草席裹着尸体埋在山坡一个土坑里。时间大约是 1960 年秋冬之间，具体日期已无法查证了。

七，四十八年后破解的密

在 此之前，王匡时虽未与我谋面，但对他的情况有所悉知。因为反右斗争中报上长时间批判四川工人日报总编室主任汪岗，如何篡改报纸无产阶级性质，极力为资产阶 级鸣冤叫屈的“反党反人民的罪行”。报上说汪的黑后台是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长王匡时，想不到今日竟面对面的坐在一起。一次我俩走在一起，我忍不住悄声 问：“你们那个反党集团全是高干啊！”他苦苦一笑道：“也算吧”。

何谓高干？他们“反党集团”褂帅人物是中共重庆市常委、委宣传部长张 文澄，一个十三级干部，其它几个成员均是县团级以上重量级的人物，除王匡时外、还有中共重庆市委委员、重庆日报总编辑贾唯英，市委宣传部马列主义教研室主 任谢予，四川工人日报总编室主任汪岗，且清一色的地下党员，统统开除党藉，王、汪、谢三人还开除公职，送来沙坪农场劳教。为什么这些当年提着脑袋与国民党 拼打的老共们，在夺得江山后不去乐享清福，却要跳出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我进一步追问道："你们怎么也成了右派？"

王匡时有点为难了，想了老半天后冒一句："有什么办法，党要我们当就当嘛，一句话服从组织安排。"呵，当右派也是组织安排？

我忍不住哈哈地笑了起。他没有笑，坚口不再讲下去，于是在我心里留下一个难以破解的密，四十八年后才为汪岗先生所破解。

１９８０ 年我右派获得"改正"后回到原单位成都日报社，"官复原职"又做起编辑记者的工作来。不久汪岗从监狱放出来，但未安排工作，住在距报社咫尺之地叫穿巷子的 一间平房里，虽有交往，相互却从不谈及往事。不知是余悸仍存还是有意回避，见面总是左顾而言它。后来我"下海经商"，他去到双流县一家私营药厂当顾问，再 后我又去了北京，消息自此终断。去年十月，我和太太去湖南名胜张家界风景区旅游，回归时取道武汉，专程拜访了现年 77 岁高龄的汪岗先生，对坐品茗闲话往 事，才知当年王匡时避谈此事的内情。共产党历来党内有党，派里有派，你争我斗，残杀火并从未停止。无论是红色根据地井岗山，还是砺兵秣马的延安，以及夺得 权力后的所谓新中国，都在进行尔虞我诈的较量。

四川地下党是中共一个较大的派系，在几十年蒋毛逐鹿中原的征杀中，做了不少事情，立了大 功劳，死在国民党屠刀下不少于几千几万人。较有名的有杨尚昆的大哥杨闇公、地下党省委书記罗世文、车耀先，还有李鹏之父李硕勋，"红岩"江竹筠等。可是中 共建政后他们没有一点地位，每次政治运动一来便遭到整肃，有的打成托派、叛徒，有的逮捕下狱，冤死了不少人。其原因是执掌权力的是"解放区"来的山西帮李 井泉派。准确地说共产党不是"一党专政"，是"一派专政"。全国是"毛泽东派专政"，四川是"李井泉派专政"，上海是"柯庆施派专政"，一言以蔽之，全国 各省市县都以第一把手作为派的头人，谁反对这个"派头"就是反对党，根本没有什么"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可言，只有"派头的利 益"。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你敢去反对党的一把手吗？

1953 年四川省由川东、川南、川北、川西，四个行署合为一个省，省委书记是毛 泽东长期豢养的鹰犬李井泉，故钦定为省委第一书记。但共产党在表面上又要打民主牌，还要召开党代会通过参会代长投票选举。就是老百姓骂的，既要当婊子又要 立牌坊，以掩饰其独断专横的丑恶面目。那一届四川省党代会的常委名单中竟没有一名地下党的代表，全场引起哗然。他们虽然向党代会反映了这个问题，但李井泉 并不采纳。在等额投票选举常委时，李井泉竟少了四票，搞得他很没有面子。会后，他指示省公安厅厅长赵苍壁，通过特技勘查每张票的指纹，很快查出這四个没有 投他票的人，其中一人就是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文澄（1938 年参加地下党，曾担任过四川地下党特委书记）和刘邓大軍三軍团的宣传部长明朗（时 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以及其它两人。李井泉亲自找他们谈话，并勒令写出检查，其他三人在李的淫威下，紛紛表示认错，并写出了违心的检查交待，张文澄性 格倔犟，坚决不写，说："投票选举党的领导，选谁不选谁是党章赋于我的权利，我有什么錯？如果要我认錯，除非修改党章。"他虽然硬过了这一次，但此后在仕 途上却一路坎坷，累遭不测，经常受到顶头上司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的修理，虽然身为市委宣传部部长，却没有一点实权。到了 1957 年，尽管张文澄在反右运动 中没说錯一句话，没做错一件事，还在狠抓右派，但李井泉并不放过他，指示任白戈非得把他揪出来。任白戈坚决执行李的指令，先把张文澄所分管几项工作的负责 人打成右派后，回过头再来揪他。"城门失火，殃及鱼池"。

于是王匡时、贾唯英（女）、谢予、汪岗等均入罗网，一生被毁。尽管王、谢、汪三人都是十三、十 四、十五级干部，从未犯错，但仍全部被开除党藉、公职，送沙坪农场劳动教养，但和我不同一个中队。虽然，他们均于 1962 年摘帽解教，但一直委身作人。谢 予屈死于“十年文革”，王匡时后死于长寿湖，汪岗却一直浪迹社会，至今还是一个无公职、无工资、无住房的“三无人员”。

汪岗出身书香世 家，少有大志，学岳飞效文天祥，报效国家，成功成仁。日寇铁蹄柔躪中华国土，面对祖国破碎山河心疼如绞。刚满 15 岁即投笔从戎，作为青年远征軍去印度支那 守卫干城，后又去上海服役，因不接受美国大兵的侮辱岐视，一次带着 30 多个弟兄把七八个调戏中国妇女的美軍痛殴一顿，于 1947 年逃往解放区参加革命，经 多次战斗考验为一勇者，后随刘邓大軍南下，曾在邓小平身边做过半年文员，再后创办《西南工人日报》（后改为《四川工人日报》）出任总编室主任一职。 １９５７年反右作为牺牲品沦为共和国贱民。二十年后虽摘了帽平了反，但四川省工会党组却不给他落实政策，至今浪迹社会，蓬转天涯。我问，你为什么不去找他 们论理？他苦苦一笑：“找啦，别人不理睬你有什么办法？”我道办法有的是，就看你敢不敢？他道什么办法？我道很简单，在你衣服背上写上一行字：右派分子汪岗，１９４７年参加革命，至今无工资、无住房、无社保。在成都市最热闹的大街上走上三天，保证你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他听后摇摇头：“这怎么行？这怎么 行？”有什么办法，他虽然是个共产党员，却没有派，没派就没有后台，所以只能“零落成泥辗着尘，祇有香如故”。还得一提，他弟兄三人全是清一色的右派，是 现实社会的“一门三杰”。密虽然破解，只多了一声不平的叹息：世间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四十二）

第十八章，“415”屠场

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生命，这些生命的活与死既不属于自己掌控，更不归上帝管辖，仅仅是一批无知识、无文化、地位极其卑微的冷血恶吏。他们自卑，生恐别人看不起；他们空虚，肚里没点东西，故只能用作恶来打发日子，以表示自己“立场坚定” ，步步高升。

一、“教民”奔赴内昆铁路

在 沙坪劳教农场即将大面积饿死人前夕的 1958 年 7 月，也就是毛泽东视为“革命形势大好”的那个年代，为了提前修通内昆铁路，共产党本着投资少见效快的原 则，立即从全省各劳改、劳教单位，抽调出一大批年轻力壮的“两劳”人员，组成代号为“4 15”的四川省劳改局筑路支队。“415”既是它邮政代码，也是它成立的时间(1958 年4月15日)。这是一个县团级编制的“劳改流动集中营”，它有 4 个大队，27 个中队，再加上直属的工程队、机械队、测量队、医院，约有一万多人，其中右 派分子約佔百分之七十，其余是五花八门的“分子”。白夹林中队抽出 20 余人，我名列其中。很快乘车经乐山市穿五通桥去到自贡市收容站集中，三天后编入 19 中队。中队下设 4 个大组，16 个小组，人数在 200 人以上。中队长姓陈，年約 30 多岁，身材不高，長得矮胖矮胖，说话不多，显

得忠厚老成；教育干事姓王， 瘦瘦的，天生一副猴头尖脸，性格活跃，喜欢与有知识的人打交道；事务长姓崔，年龄快 40 岁，平时一个人躲在屋里喝点小酒，从不向劳教人员训话。

修 筑铁路累是累，苦是苦，险是险，但与沙坪劳教农场而言，每人每月不但有 53 斤高标准粮食的定量，还有 18 元人民币的工资；再加上云南气候暖和，没有恶劣的 冷风寒雪，为此大家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振，人人喜笑颜开，个个生龙活虎，好像一下生活在极乐世界里。中国人就这么好骗，这么好统治，一顿饱饭就能使人眉开眼 笑，感激流涕，有什么办法，客观事实就是如此！

经过编队、休整、统一思想认织后，我们扛着行李，乘上从自贡去宜宾的硬座简易火车。加之心 情好又无押送武装，由陈队长、王管教带着，一路欢歌笑语，近似战士出征。到了宜宾吊黄楼住宿一夜，再换乘汽车去筠连县。筠连是四川偏僻之县盛产茶叶、蚕 丝、药材。这里的茶叶条细味淡汤清，在成都称之为河茶。我是茶叶铺出来的徒弟娃，自劳教后从未再喝茶，因那东西健胃开脾，一天肚子空空谁吃那东西？现在肠 子胀伸了自然想喝茶。到了宿营地蚕丝厂，把肩上挑子一撂，即忙跑到街上花去一毛钱买了一小包茶叶，放入瓷缸冲上开水坐在株黄桷树下细细品起茶味来。茶，安 神清肠，快相别大半年了。这东西是能肚子撑饱还得有点闲情逸致才想品味它，现在虽无闲情但肚子暂不受熬煎所以才有此雅兴。我一边喝茶一边想着往事，记得当 童工“受资本家压迫剥削”那年月，一到酷暑天制茶，师娘师婆怕我们被炭火烤出病，总是熬上一大锅酸梅汤解渴，在三餐饭菜上少不了油荤，可现当了老右有谁来 关心你？忍不住吟起诗来：“昔日着奴能饱肚，翻身做囚好悲伤；且喜此时闲有趣，一杯清茶安愁肠。”

组长冯振英和戴长子笑嘻嘻走来坐在一旁 说：“老黄，你真是文人，好会享受。”组长冯振英和戴长子走来坐在一旁，笑嘻笑说。冯振英是四川邮车厂的技术员，因读报原因成了右派。他说，邮车厂工人阶级居多的地方，识字人少，每日政治时事 学习读报的革命任务自然落在他的头上。一次，他正读到章伯均向共产党提出构建“政治设计院”的建议，洽有两位听报工人在下面吵嘴，巧好遇上他情绪不好，干 涉地吼了一句：“吵什么争什么？闹过球呀！”不知谁个有心人打了他的“小报告”，说章伯均在和共产党吵架“闹个球呀”。本来老粗书记就和他有矛盾，当然借 此划他为极右派送来劳教。戴长子是防疫站的管理干部，一表人材天生帅哥，喜欢讲吃说穿迷于舞会，也该当他倒霉，竟与站长年轻貌美的妻子成了一对折不开的 “舞伴”，有什么话说，站长歪了下嘴巴，鼻子一哼就成了个十恶不赦的“坏子分”弄得劳教。我们均是同龄人，很快成了朋友。

冯从身上掏出一 包纸烟，取一只给我，我摇摇头表示不会。“写文章的人怎么不抽烟？太少太少”他说，他和戴长子划亮火柴，燃上纸烟吸起来。“好香！好香！”冯振英边吸边 说：“我也爱好文学，现在一点兴趣也没有了。”戴长子也道：“我也是。 ”我取笑一句：“我们是同病相怜了。”冯突然问：“这修铁路不知修到猴年马年？ ”我随口答道：“劳教又没判刑，想来时间不会长吧！”戴长子深深吸口烟，再吐出一圈一圈的雾说：“判刑还有个数，这时间长短决定改造好坏的说法真没个 底。”大家相视无言，心里空荡荡的。

当夜我们露宿在筠连蚕丝厂的街沿上，第二天吃罢早飯收拾好行李，队伍沿着岖崎不平的山道缓缓前行。筠 连和云南盐津不足 30 公里，当中隔着一道叫牛皮寨的山沟。那牛皮寨又高又陡爬起来很吃力，不过大家心里高兴，到不怎样吃力。我们一路爬山，一路谈着末来， 一是对云南充满兴趣与神秘，白桦的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就取材于这个多民族的省份；二是修鉄路可以学到不少技术，纵是将来回不到机关当干部，做个鉄路工 人也不错。而我却把此行当成体验生活的开始，甚至还想着将来有一天好好写一写建设祖国鉄路题材的作品。虽然肩头上行李加工具有百余斤重，尽管爬山爬得“吃 吃呼呼”，我却以心做纸以嘴做笔放情地写道：人在天上走，云在脚下飘，伸手摘星辰，揽月不伸腰，清风徐徐吹，太阳向我笑，欢迎远来客，鹰翔百灵叫，星夜奔 云南，为国筑鉄道，何惜挥汗水，争取早“解教”……

不难看出此时的我们多么天真纯洁，就像俗话说的：“被人卖了不但不知道，还帮着卖人的 人数票子。”其实我们正一步一步走向死亡，却以为是光明的前景。这时我仍怀着美好的作家梦，记日记写素材，观察生活中每一个细微的细节。我们一路歌声一路 笑，肩挑百斤不觉累。长长的队伍，重沉沉的挑子，顺着弯弯曲曲的山道，从低处向高处看，好像一条五色的綫，飘在云彩中。爬着爬着，渐渐感到吃力，于是脱衣 服，脱裤子，一个个赤膊光身，汗水顺着下巴脊柱往下流淌，一滴一滴，小道的土埂上有了一条湿湿的黑綫。人们咬牙的呀牙，揉肩的揉肩，谁也不愿休息谁也不敢 坐下来休息。王管教说过，上午十二点前必须赶到牛皮寨小学吃午饭，赶不上就没得饭吃。为了吃上这顿午饭，大家说爬也得爬上去。戴长子腰细肋稀，一路虚汗淋 淋，累得喘大气，哭丧着一张脸说：“谁能帮我挑二十斤，中午这顿饭分一半给他。”这本是一句赌气的话，同组一个叫金瞎子的人，竟信以为真道：“我来。”我 白他一眼说：“ 你像饿痨了，人血也想喝么？”转头向冯振英道：“来，我们两人帮他分一点。”经这一激，戴长子不好意思了，死话也不要我们分担他的行李。我们三人结成一 体，相扶相帮振着精神往前走，还一边走一边说趣话。走了一会儿，冯振英叫口渴，拿看瓷缸去路边溪沟里掐了一大缸河水就往嘴里送，我即忙抢过瓷缸道：“你得 歇口气才能喝，现在心肺是张着的，冲了凉会生病。”两人异口同声道：“老黄，你还懂得这个道理。”我憨憨一笑说：“小时候在乡里做活，做累了，也是跑到河 沟里去喝冷水，大人这样告诉我的。”

下午一点正，我们二百多号人的队伍陆陆续续到了半山坡上的牛皮寨小学，放下挑子即忙拿上碗筷去取菜盛 饭，不定量尽肚皮装，所以对赶路并不是包袱。吃罢午饭稍事休息会儿，王管教一声令下：开拔！大家挑着行李又继续赶路了。下半天的路不再爬山，一溜顺风下足 路，轻快流畅不怎么累，只是两个肩头压得生痛。王管教不时与大家聊下天，当得知我过去是报社编辑记者时，含含糊糊说了句：“就为一篇小说就把你搞进来 了。”未待我回答他又串到前面去和别人聊天了。此时阶级斗争的弦还没拉得那么紧，对右派还有点礼遇，“大跃进”和“反右倾”后，为了需要他们的脸才拉得越 来越长了。

太阳落坡前夕，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云南盐津县大关镇。盐津属云南昭通地署管辖，地处滇北，是个深山沟里的穷县。大关镇是县城 所在地，它背倚横江，面对群山，一条石板路穿而过，街上有几十家稀稀落落的店铺，没有来往车辆，

显得冷冷清清，如果在川西坝子里只能算是个小场场。我们一 个中队的人一下涌进这个小场场，立即显得热闹起来。中队长陈不多说话，一切由王管教拍版。王也是个直率人，心儿不坏，他向大家宣布说："要在这里呆几天， 等工具运到。休息时候不要乱跑，对老乡尊重，要严守纪律，如犯了事要严惩。"犯什么？大家都是国家干部，还会违纪吗？
我们依次分组，沿着街沿铺上地铺，架上蚊帐临时住下来。大概就那么几间店铺，串去串来不外乎一点日用品。"一饱百不思"，再没有人去光顾糕点，人们找回了在沙坪农场失去的尊严。

当 夜，我们驻扎在县城的街檐上，沿街坝地铺长长地占了大半条街。三餐由接待站按时送来，大铁锅装的白米干饭尽肚皮装。这种生活引起不少人羡慕，竟有人要求要 来劳教修铁路。陈队长笑着回答："他们是犯了错误的人，你们是公民来不了。"有人又问："我们也犯下错误不就行了？"陈队长不便回答，队伍中一位同学接岔 说：" 这个错误不好犯，你敢去攻击党和毛主席？"引得大家哈哈哈一片笑声。

街檐是老百姓进出的必经之路，我们进出下河坝解手都要经过他 们的家中。横江是一条大河，汹涌澎湃日夜咆哮，河面上走着載运的大木船，运来的多是供应山区人民日常活所需的布匹、油料、食盐，运出的是山里特产木料、水 果和野生植物之类的东西。船行上水需要用人拉，一条竹纤上系着几十个纤夫，他们躬身曲行，胸膛几乎贴着河畔，那悠扬好听的号子声在县城街上都能听见。我呆 呆看着，即兴挥笔写道："一条纤绳飞江上，俯身纤夫系一绳，拉得太阳转过面，拉走青山一遍林。嗨着嗨着嗨嗨着，拉走青山一遍林哟！"下水船则张着帆篷，只 要一个梢公稳把船舵，上百吨的物资运便运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使人不禁想起李白的名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大概是等候工 段的关系，我们在这里住了整整三天，渐渐和房后主人混得烂热，谈话内容也就多了起来。我们驻地那家房主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女人，生得眉清目秀，小小巧巧，说 话客客气气，极有礼貌，一看就知道是个受过教育的女娃。她身边有个两岁多的细娃，一看见我们嘴里就"爸爸爸爸" 不停地叫，使她红着一张脸有点不好意思。一天我要水喝，她死活也不要我喝水缸里的凉水，说："大哥，我们这里凉水不能喝，它是大河水，喝了会生病的。"说 着立即劈柴生火为我烧了一锅滚烫的开水，并放上茶叶。

我一边喝着热热的香茶一边和她聊起天来，才知道她的丈夫原是县里一个中学的教师，去 年十二月时，因说了"教学要注重质量，政治的东西不要太多" 就被划成右派后送到农村劳动。我听后皱着眉头问："那时整风不是已经结束了吗，他还去提什么意见？"她说："是呀，因为地区没有完成抓右派的指标，就把一些教师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在学习班里再不说话，就把你弄到操场去跑步，从早跑到晚，从晚跑到深夜，要想不跑就得发言，向党提意见。我丈夫实在跑不动了，只 好去发言提意见，就这样成了右派。现离家半年多了，所以孩子一见着你们就爸爸、爸爸地乱叫。"我听后很是凄然，想到家里的女儿也可能这样，便安慰道："大 嫂，你丈夫比我们好，他属于保留公职，现在还是国家干部，只不过少几个工资而已。我们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比起他重多了。"说着，我抱

上孩子热烈地亲 了亲说："真乖，真聪明，不愧是我们右派的后代。"她笑起来，笑得十分灿然。
当夜我久久不能入睡，老想着白天的事，不一会儿睡着了,却看着女儿在 一群男人中奔跑追逐，一会叫这个男人是爸爸，一会叫那个男人是爸爸，我正要上前向她说：" 错了，琦儿，我才是你爸爸。"忽见妻从远处跑来，一脸怒气，挥手一把掌打在孩子脸上，低低训斥地说："我向你说了多少次，他们不是你爸爸，你爸爸出差去 了。" 我一惊，原来是场梦。街上飘起细雨，托在树叶上的雨水不停地往下滴，那细微的滴哒声，似乎在说：孩子没错，孩子没错……

黎明一声 集合的哨声，把我们叫起，饭后清点人数，发下筑路工具炮钎、铁锤、挖耳，再由组长分到人头，然后收起行李，由陈队长、王管教带着我们，顺横江而下，沿着一 条又窄又险的山道，向所在工区黄桷槽前行。这里是我们劳动的地方，这里是我们改造的地方，这里是我们付出血与生命的地方。

二、黄桷槽改造的"分子"们

黄 桷槽是个小地名，也是挑夫脚夫歇肩的地方，它有一个卖饭卖茶水的小店，近似川西平原的幺店子。它的得名是因此地有两棵巨大的黄桷树，这两棵树枝繁叶茂，像 两把大大的伞盖护着一块山里的平地，使它冬不寒、夏不热，为来去行人提供了一个天然的休息场所。现在它成了内昆铁路的必经之地，48 号隧道就在这里。我们 中队的任务，就是凿通横亘在两山之间长約三百八十米长的穿山隧道，故称黄桷槽隧道。开凿隧道是项艰险的劳动，一无机械，二无技术，要用我们的双手挥动十磅 鉄锤，一锤一锤地在坚硬的石头上打上炮眼，然后装上炸药，把它一寸一寸地开凿出来，而且是在山腹里劳作，困难可想而知。

我们来到黄桷槽即 住进山坡上新建不久的几座简易工棚，一、二大组住上面工棚，三、四大组住下面工棚。我们工棚后是医务室和事务长、生产干事的办公室，再上去是厨房，对着厨 房的是中队。在山坡下面是一中队，他们人员平均年龄比我们中队大，故负责修便道。紧挨着我们工棚有户姓彭的农民，男的在一家小煤窑厂挖煤，妈和老婆女在社 里当社员。有三间草房，黑黑的没有什么家俱。盐津农民煮饭不用锅灶，每户有个火塘，火塘上吊个铁锅吊，用以煮饭、烧菜、煨水，成天地塘里有火，他们吃盐不 是放在菜中，是用一条绳索把盐（一种称为崖盐的黑盐）系住，吃时放在铁锅里涮一涮，到不是视盐如金，这是几百年相沿下来的习惯。他们一日三餐不是包谷便是 瓜菜，多是汤汤水水的东西，从未见过白米饭。他们的生活使我感到惊讶，解放近十年来的新中国老百姓还不如解放前的农民。彭大娘五十多岁，矮个子，常年头上 缠着张青布帕子，一双解放脚（指那种先缠后放开的足），走哪里都拿着根长长的竹筒烟袋，一坐下来就咕噜噜地吸烟。吸烟是云南农民的嗜好，就像四川人喜欢坐 茶馆。一次我问她，解放前就是这样生活吗？她说，那时三顿白米饭，一月两个牙祭棒棒都打不掉，黄桷槽店子日夜都是人，脚佚、船老大人挤人，每天都有七八个 赌桌，热闹极了，哪像现在鬼秋秋的。话语中对过去充满向往恋眷，对眼下一切十分不满。她突然问我："听说你们过去都是干部，怎么弄来修路来了？"我回道： "是当个干部，可现在是右派了。"她不明白，奇怪地看着我："右派，右派是个什么东西？"我笑笑不知该怎么回应，随便补一句："说话上犯了错误。"她更感 到

奇怪，直直地看我半天说：“说话还会犯错误，是哪朝哪代的王法？”我不便再说什么只好一笑。看来老百姓是质朴的，对共产党做法越来越不理解。

我 编在一大组三小组，大组长叫黄泽澄，原是成都市公安局的，解放前他在一家照相馆当学徒，与一位参加了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解放后被定为特 务组织）的师兄关系较好，他参加公安工作填履历表“社会关系栏”时他如实填报了这一关系，到 1955 年机关“肃反”时，组织上怀疑他也参加了特务组织，因 此受了审查。后来在“整风”中他发了些怨言，结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号角吹响后，又要他交待特务组织的事。他经不住白日夜晚的连续批 斗，在极度疲惫，神志恍惚的状态下默认参加了特务组织。他以为承认了就完事了，哪晓得领导上为了 “扩大战果，乘胜追击“，又问他是不是发展了其它人参加了特务组织？在穷追猛打日夜追击的情况下又牵出了同局工作的王伯勋、王建基、林北富、何培森、李成 基等十多人参加了特务组织，成了市局一个“反革命”大案，但后来终因拿不出参加特务组织的证据，不好定他们反革命罪，但又不愿承认把他们搞错了，于是就把 他和王伯勋划为右派，他的处分是开除公职强制劳动教养，王伯勋是下放农村监督劳动。但他毕竟是公安系统的所以当上了大组长。“吃一堑长一智”身为大组长的 他为人十分谨慎，不轻易和人接近，做什么事都是一是一，二是二，对人和霭可亲，不亲易树立对立面。

组长冯振英，长我一岁，原是省邮电局汽 车队的技术员，刚结婚不久，划成右派原因是长期和车队党支部书记关系不好，认为他没本事，靠拍马屁当官。“整风”中他一次在座谈会上说“搞社会主义建设， 不是靠嘴皮子，靠什么？”他拍了拍手中的一本英文技术书“靠这个!”因此,挣下一个不轻不重的“罪名”：“企图摆脱党的领导 ”。他和我一样，家庭关念极重，每周必须给妻子一封信，缠缠绵绵，亲爱得不得了，信的末尾总是“吻您，热烈地吻您”。我是小组学习记录，和他关系不错。

除 此，小组还有十多个组员，不但性格各异，还各有各的故事。成都市卫生局防疫站的戴长子，因他天生的腿长腰长手臂长，大家按其特点这样叫他。他说話轻言细 语，做事慢手慢脚，纵是火烧着屁股也急不起来，却因攻击苏联而成为极右派。我问：“ 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我反什么苏，一次团小组会上有人说苏联的吉姆汽车比美国好，我说美国的福特汽车比苏联好，谁知就成了亲美反苏的罪行。”我道： “你怎么不找领导说清楚。”他笑了笑说：“我的記者先生，抓右派有任务领导能放过你吗？”我道：“你悔吗？”他似认真似开玩笑地说：“最难过的是再跳不到 舞了。”原来他是个舞迷，过去每周都要去人民公园露天舞池跳两场舞。

同戴长子性格迥然两样的是灌县来的王思贵，他和我同年，1935 年 5 月生。1956 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省灌县政府机械科作科员。鸣放时他没吭一声，是诚心诚意拥护共产党的好干部，只出身成分是个小地主。不知是成分关系 还是他们单位为了完成“ 指标”，于是不明不白地把他搞成了右派分子。他说，1957 年岁末，他回老家简阳过春节，与表妹谈定终身大事，准备来年“五一”节结婚。春节后他高高兴兴 地回机关上班，一天人事科突然通知他收拾行李，去自贡报

到。他以为是调动工作，高高兴兴地和人事科干部一起坐上汽车去到指定的地方报到，才知那是省公安厅 劳改局“415 ”劳教筑路支队的收容站。一进门就叫他打开行李检查，然后解下裤带、鞋带以及随身所带的钱和粮票。他感到情况不对，提心吊胆悄声地问了句：“同志，我是工 作调 ……”未等说完，检查他的公安干部黑着脸说：“谁是你的同志，我们是专政机关，你现在是专政对象，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他急了，一头冷汗，不停 地声明：“我是好人，我是好人，你们可以打电话问我局里。”对方嘿嘿一笑：“好人不会到这里来。你叫我问谁去？右派分子都是不认罪。告诉你，就是你们局里 定性送你来的。”他傻了，哑了，张着的嘴再说不出什么。经过十多天的“思想改造”学习，后送来 19 中队，不但和我同小组，睡觉还连着一个铺。
不过 南充市运输公司黄调度显得更特别，1943 年日本帝国主义攻占贵阳，兵临靠近四川的独山，举国存亡全民忧心，蒋介石先生的儿子蒋经国，发起“十万青年十万 军” 的救国号召，他热血沸腾走出中学校门，成了一名青年远征军。在印度他集训不怕吃苦，在滇缅公路运送战时物资累得吐血……他跑过车技术过硬，无论山海大川百 行无阻。1949 年随 305 师罗师长起义，不久开赴朝鲜与训练他的师父“美帝国主义”作战。1953 年朝鲜停战，他光荣回到家乡南充当了一名运输公司的驾 驶员，后升为调度员，很快结婚安家抱孩子，沉浸到小家庭的快乐日子里。1955 年全民大“肃反”，他作为有历史问题的人，审查关押了近半年时间。当兵的人 性格直，1957 年趁共产党“鸣放”之机，跳出来找党委说个所以然。不但问题未得解决，反弄了个“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罪名，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不服， 每晚在“思想改造”的学习会上发言说：“我反什么党，什么社会主义？全是栽脏陷害，没点事实根据。”我为他捏把汗，私下几次劝他说“明白人不吃眼”前亏。 他道：“怕什么？大不了一颗子弹！”我不好再劝只能听之任之，将他发言如实上报。

又一个姓卢的年长我七八岁，是重庆大学的调干生，长得白 白净净，斯斯文文，一副典型的书生模样，，不苟言笑，很少与人说话交谈，只要是休息时间就一个人躺在那个不足 60 公分宽、两米长的属于他自己的连铺床位上 抱头沉思，像有无数不可告人的心事。后来我通过点点滴滴的言谈，才知道他解放前参加过地下党，后不知为什么失去了组织关系，一直没有受到重用，“肃反”后 才赌气去读大学。在学校表现得十分好，特别是在“反右”运动中帮助校党委极积收集和揭发右派言论，使不少学生沦为右派分子。可在今年年初“补课”运动中， 他却补了进去。原来有人检举他，说他在日记上写有不满意党的话，一查属实，就这样来了“415”。用他的话说“得罪人太多，没有立到功，反让别人立了 功”。用四川话叫“鬼冬哥（猫头鹰）吃妈 —— 一报还一报”。在小组里还有一人比我名气还大的右派叫李康，他是重庆市民盟宣传部的部长，与组织部长苏军合称为重庆民盟“两员反党大将”。他曾是老大公报 的记者，参加过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谈判的采访，见过毛泽东，还与周恩来混得烂熟，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常客。谈起往事一脸红光，感到十分兴奋和光荣。 他常开玩笑称我是“同行”，多次看过我写的家信，叫我“黄抒情”。

另外五个“分子”也各有特色。第一个姓朱刚二十出头的小青年，生性活 泼，喜说大话，干什么事都逞能，组里人给他一个绰号叫“朱天棒”。可能在家里太调皮管不住，父母主动向公安机关申请送劳动教养。半年后又反悔，但要不回儿

子了。“朱天棒 ”在干活上不错，但却说劳教队生活太差，每月十八元人民币工资太剥削人，稍不如意他就敢在人前说浑话：“惹毛了老子，我就脚板上擦油——溜之大吉”。当 时，我们对逃跑做梦也没有想过，只想快一点改造好回机关。与他性格相反的另一个小青年叫李时顺，因在单位常和领导闹别扭被打成“反社会主分子”送来劳教， 来此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妈妈。他父亲在 1951 年“镇反” 时被敲了沙罐，妈妈一把泪一把血把他拉大，苦极了，一想到这些就哭，有时也失悔在单位时不该和领导顶牛，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要有就吃他个十几包。一天早 晨起床他悄悄向李康和我说：“糟糕，昨晚我来尿了。”我们没怎么介意，又听得他继续说：“这尿不多，怎么是粘粘糊糊的？”我明白了，笑道：“这不是尿。”“不是尿？”他怔怔望着我问：“那是什么？ ”未待我回答李康抢先说：“小李，这叫遗精，一个成热男人正常的生理现象。”他 “嗯”一声，一张脸红到耳根。还有一个叫“晋瞎子”的，其实不是瞎子，只因岁数大眼睛不好，成天没事就補衣服，总是请这个或那个给他穿針，久而久之就叫出 了名。他在国民党时期当过排长，后起义参加了解放军，去过朝鲜与美国干了几天，荣获三等功。转业后安排在一家国防工厂当工人，家里有老婆孩子，工资不够 花，一次私将废料拿出去卖了钱，加之口臭与车间主任关系不好，成了坏分子送劳教。一个月１０元伙食费省下两元，再加上 8 元工资合并 10 元，不停地往家里寄，故大家骂他是个“ 顾家不顾命的人”。

其它两人，一姓高一姓田，都是劳 动人民出身，没什么文化，只知都是国营厂矿的职工，因不服从分配，常和领导闹意见而被送劳教。姓高的劳动不出力，一天不停地卷烟，有一只没一只地抽，老是 出神地看着自已吐出的烟圈；姓田的老泡病号，说患有严重胃炎，把厨房买来的包谷沙沙飯老是加水熬煮，纵是出工也拖在后面，不论小组开会怎样帮助他，他就是 “老马不死旧性在”，气得冯振英组长跺脚，他呢依然故我。

【独家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四十三）

三、 短暂的畅意舒心

我们这些“教民”多是 49 年后参加工作的干部，大部分人是读过几天书的 知识分子，根本不懂得开山放炮，架桥铺路的技术活儿，唯一本钱是年轻力壮，有点气力。按理说，筑路支队应对我们进行专业技术培训，至少学习七天半月的筑路知识。可没门，一来就得上“火线”。而开凿隧道技术上又要求十分严格，工序分为削边坡、凿坑道、打扩大、架厢、浇托樑、发旋等，稍不注意就会发生工伤，不 是断腿断臂，就是死人。

削边坡，就是在隧道确定的入口处，要从一两百米的山崖上往下削成一个斜坡排除一切障碍物，然后再组织成四个班 （每班 6 个小时），挥动炮钎、铁锤，在坚硬的岩石上，按指定的位置与方向打出一个个的炮眼，再填上炸药、雷管进行爆炸。紧接着是清理危石、出渣，一环扣一 环，环环相连，一点也不能马虎。我们小组十二人，接年龄和自身劳动情况分派，一是扶钎挥錘打掘进，二是清理出渣干杂活，我是强劳动力屬于扶钎挥錘打掘进的 壮劳动力。每干四个班倒一

次斑，每班 6 个小时，三天上四斑，故睡觉不定时。在倒班有 12 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不是事务长派去挑粮、挑菜，便是生产吴干事叫去 运送坑木和下河扛水泥，总之，得不到好好的休息。我和李康不参加这些工派劳动，负责办中队墙报，一月一期到还划算。在其它人的眼里办墙报是“安胎”活路， 属于干部相信的人，一般人不敢与我们说什么，防备打小报告，其实李康和我是坦坦君子不啃此道。办墙报的地方在彭老乡他们那间称着堂屋的草房里，人熟了出工 也不锁门让我们在哪里折腾。李康和我总是各人泡一盅茶边写东西边聊天，他老是说他当年在重庆当记者的风光以及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情况，我却谈恋爱过程。 中队部王管教经常跑来和我们聊天，有次把喜滋滋地他写的一首情诗来给李康看，别字连篇狗屁不通，李康笑着恭维说：“好诗！好诗！很有水平。”他走后我私下 问道：“肉麻低级，看就心烦。”李康说：“管它的，恭维又不花钱，你我过去在上面吃了亏，还不吸取教训么？”是啊，我怎么老变不乖？此后，老见王管教陪着 新调来的女颜干事在各处检查生产，再不几天又发现生产吴老远远地跟在他（她）们后面，三人像在演一台戏。

当掘进凿到 50 米便增班打扩 大。所谓扩大，就是把坑道扩成隧道要求的宽度后，再打托樑，在托樑上再架上拱木砌上条石，称为发旋。掘道越深，空气越来越不好，不但工作面窄，主要是放炮 后的磺烟散不出。磺烟含着恶臭的硫磺味，闻不到一会儿就会使人翻肠倒肚的呕吐。大家为了立功，争取早日摘帽解教，一上班就脱光衣服挥着大锤拼命干，尽管汗 流如雨，累得喘不过气，由于有希望存在，便把一切困难都置之度外。此时，我除了积极劳动外，就是尽全力办好中队墙报，除此就是每周给妻子写一封情感绵绵， 思念依依的信。可惜这些信一封也没有留存下来，如集结存册出版定是世界级的情书巨著，可惜为离乱毁了！记得我在一封信中写道：“云南的山泉最甜，云南的姑 娘最美，云南的山茶花最好看；最甜的山泉我不愿饮，最美的姑娘摄去不了我的心，最好看的山茶花怎能和故乡的芙蓉相比？亲爱的妻子啊，我思念的泪化着倾盆大 雨。”在另一首《望月》诗中又写道：“头顶乡月滇北居，陌地生人互不识。初婚娇妻梦里见，彻夜不眠衾枕湿。”……

情感是思念的动力，回 忆是人生的思维。没有动力便没有力量，没有思维便没有历史。尽管在沙坪农场我写信向她要点吃食东西而遭拒决，我认为这不是她的原因，是爱的不了解。世界上 爱的悲剧就是发生在相互的不理解，古人云“爱之深才恨之深”，不爱是不会恨的。我认为，如果她当时知道我处在饥饿中，纵是割下自己身上的肉也会寄东西来 的。夫妻应该彼此谅解，而不应该怀恨。这时，每月我有 18 元人民币的工资，除去 8 元生活费外余下的 10 元人民币留两元购买生活用品，余下的全寄回家。当 然，这 8 元钱是个区区小数，却是一个做丈夫应有的责任。此时，她也每信必复，鱼雁频频滋润着两颗思念的心。她的信多是告诉我孩子的变化情况，我的信则是她 我追求改造的信心。我在信心总是说：我是一个最有责任感的人。如果我没有责任心，当年就不会孜孜不倦地去学习，就不会忘我地为革命工作。既然我有了家庭， 就要对家庭负责任。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丈夫，决不是爱妻子的丈夫，也是对儿女不负责任的父亲。就为了这个责任，我愿历经人世间一切艰难险阻，我愿尽饮大自然 一切风霜雨露，我愿……

有责任才有情感，有情感才有希望。希望什么？争取早日回到机关重操记者生涯，为党为人民写出好的作品。每天劳动 下来尽管很累很累，但吃得饱，主食是包谷沙沙，每周可吃上两餐白米饭，一月还能吃上两次咸肉，每次约半斤。这咸肉是几年前供销社的库存物资，现在用上了派 场；菜是云南昭通地区那种特有的黑大头菜，看去像酱箩卜，吃在嘴里香脆，用它来伴包谷沙沙饭到很适合。每月五十三斤饭票由自已撑握，每顿想吃多少就吃多 少，常还有节余，多的随便吃。队里再没有盗窃事情发生，吃的东西乱扔无人要，近似有路不失遗的境界。此时大家一有时间就学习，自觉不断地向干部写思想改造 汇报，痛批有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我只要有丁点时间就拼命读书，读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近代的，并写下大量读书笔记，对回归“党的怀抱”没有 任何怀疑。其它人也和我一样活得充实开心，并纵情谈论人生与今后的打算，没有什么压力与负担，这就是我们右派初投入改造又在吃得饱的情况下的心情。但这个 心情为后来的再次饥饿与漫长无边的劳役拆磨彻底摧毁，有的甚至走上反抗者的不归之路，这是谁之罪呢？

四，中队第一次批判斗争大会

不 久，中队王管教和颜干事不正当男女关系事情爆露，是生产吴抓的现场。于是，王弄到支队去反省交待检查，颜降为一家劳改医院的护士，不久就含羞服毒自杀了。 原来颜的老公是厅里一个小科长，在“整风”中划成了右派，也是开除公职送到一个劳改农场去劳教，她便属于右派家属下放到这里来当干事。巧好王管教没有老 婆，干柴烈火两人就胶上了，因行事不密被吃醋的生产吴发现，一晚两人正在作爱被抓住。七情六欲人之常情，处分未免重了一点。

新来的管教 姓刘，一个十分厉害的人。他个儿清瘦高长，脸颊阴森尖削，两个眼睛儿冷光射人，说话有板有眼，像个训练有素的克格勃。他特别注意大家言行与思想动态，每隔 两三天开次中队大会，总是号召大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靠拢党和政府，积极检举揭发坏人坏事，还要我们墙报组配合。很快大家脸上笑容少了，三三俩俩瞎侃的事 没有了，咬笔头写检举的人多起来。

组里那个当过远征军的黄同学，对他的讲话极不以为然，多次在人前人后说：“老子又不是吓大的，还怕 吗？人家修铁路工人六七十元一个月，我们它妈的才几钱，不是剥削是什么？”这样的“反改造言行”我不汇报总有人汇报。一天，在下面那个空工棚他向我說： “家门（我俩一个姓，故称家门），你认为这个熔炉会把人改造好吗？”

我心里感到奇怪，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问，便不太肯定地道：“会吧。”他笑笑说：“根本不可能，至少我不可能。”我怔怔地望着他：“为什么？”

他 瘦瘦地脸颊上满是人生岁月留下的皱纹，有过军旅生活的他不论任何时候都直挺着腰板。他想也不想地说：“不为什么！我在想我们怎么成了废钢废鉄，到底犯了什 么罪错？要剥夺自由，送来这里冶炼，凭的是哪条法律？你的毒草是他们刋物发表的，我的发言是他们动员的。要说有错、有罪是他们在先，世界的事总得讲个理， 现在共产党一点理也不讲，凭的什么？不就是手里有枪杆子。

枪杆子能改造人吗？除非死了差不多。”

他的话说得有理有据，滴水不漏，我简直无法驳斥，但不敢苟同，只有好言相劝道：“家门，这儿是专政机关，明知鸡蛋碰不过石头，又何必硬去碰呢？何况劳教时间又不长，俗话说‘忍得一日之气，免得百日之忧’。”

他 听后，冷冷嘿嘿地一笑道：“你说劳教时间不长，是一厢情愿啊！既不长，为什么不明明白白写在纸上，不写出来就说明有鬼，共产党从来是说话不算话。抗美援朝 时，我们有个团被美国鬼子包围了，只好投降当俘虏，后遣返战虏，有的怕回去脱不了手，便不愿回国，师里派出宣传队天天来动员，还说你们为革命受了苦，党和 毛主席天天想念你们。最后连哄带骗把他们接回国，不出半年这些战俘判刑的判刑，劳改的劳改，还骂别人是叛徒，没有民族气节。我看，我们现在的命运和战俘差 不多，你说能改造好吗？反正我一个人绝对不会去相信那些鬼话，劳动上更不会出力。”
我是小组学习纪录、中队墙报负责人，天天想着改造好回家，想 去检举吧觉得对不起朋友，不捡举吧会影响自己，想去想来最好不再接近为好。没两天刘管教把我叫去问，开始我不承认，他却一清二楚我们的谈话内容，并厉声批 评道：“黄泽荣，你不要辜负党和政府对你的希望，不要掉进反改造的泥潭，下去立刻把他的反改造言行写出来交到队部。”我不敢反抗，喏喏应声。

经 过刘管教的精心布置和动员，斗争批判黄的斗争大会三天后的休息时间在下面空工棚拉开，我是第一个揭发批判他的发言人，接着是那个姓卢的重庆调干生。他成竹 在胸地站在人前，翻开记流帐的笔记本，把黄到黄桷槽三个月所说的“反改造言行”，一笔一笔有时间有地点有谁在场，说过一清二楚。接着又有好几个发言，黄大 包大揽但拒不检查认错，一连开了三天，他也强不低头，后送到严管队严管。不久听说他在一次强行劳动中，从百米高的山坡纵身往岩下跳，大呼：“不愿折磨活， 宁愿自由死！”当场被砸得血肉横飞，脑浆崩裂。

医务室卫生员叫张麒林，新都人，原是华西大学高材生，和我很要好，年龄相近，有点惺惺惜 惺惺。他生性直率，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鸣放”中竟公开然向学校党委写万言书，提出一系列政治观点：第一，不认同胡风先是反革命，认为这是一个千古奇 冤；第二，认为“对私造”是错误的作法，侵犯了私有财产；第三，共产党限制言论自由，不准私人办刊办报；第四，党委管事太多，学校应由懂教育的专家管理， 而不是工农出身的外行。当然是百分之百的极右，开除学藉送来强制劳教，尽管当上了“吃安胎”（指最轻松自由的活儿）的卫生员，但秉性难移，不断向家里写信 发洩不满。这些不满言论全被记录在案，有天刘管教突然在小范围内召开一个小型批判座谈会，只听他讲“现在中队一些人思想很混乱，认为劳教遥遥无期，改造没 有前途；又说我们共产党整风是专整知识分子，先前动员别人鸣放，结果说了心里话又被打成右派，不是言者无罪，是言者有罪”。开始大家都蒙在鼓里，你望我， 我看看你，不知所指何人。待座谈会开了三个下午后，他才点出张麒林的名字。大家惊了，才知道来往的信件全在他眼睛的监控之下，自此写信再不敢放肆。不几天 张被调回支队医院，换了另一个卫生员，此后我再未见面，有说他判了刑，有说他死了，但没人敢去问刘管教。经过这几挡事，中队空气越来越紧张，大家不敢再乱 说话，乱写信，自此

靠拢政府的人越来越多，各处都是写检举的人，似乎每个角落，每个空隙都有眼睛和耳朵。我却快活不起来，心里重沉沉地觉得当了王连举。

作者惠记到此，文章刊登完毕

